

目 录

- 序..... 汪道涵(1)
- 学习弘扬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金炳华(1)
- 宋庆龄与抗日战争 爱泼斯坦(10)
- 宋庆龄对抗日战争的杰出贡献 季鸿生(14)
-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宋庆龄的爱国主义 张 磊(36)
- 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宋庆龄 杨雪芳 张 鸣(52)
- 抗战与民主
- 宋庆龄关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指导
- 思想 盛永华(64)
- 中华民族的团结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最好保证 华 平(80)
- 宋庆龄论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 傅绍昌(88)
- 宋庆龄抗日战争思想与实践 吴宗明(99)
- 宋庆龄抗战思想研究..... 何继良(109)
- 宋庆龄持久抗战思想探析..... 卢克贞(123)
- 宋庆龄的抗日战争战略思想..... 刘国友(129)
- 宋庆龄的对日观..... 段云章(139)
- 一二八抗战与宋庆龄的抗战思想..... 王乐德(147)
- 宋庆龄与救国会的抗日救国思想..... 庄有为(152)
- 宋庆龄抗日战争时期救济思想及其实践..... 张晓颐(161)
- 浅析抗战期间宋庆龄关于人权的独特视角..... 裴 华(172)

论宋庆龄国共合作思想的发展·····	王苏颖(181)
抗战期间宋庆龄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实践·····	杨小佛(190)
宋庆龄与国共第二次合作·····	吴传煌(195)
宋庆龄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杨振亚 沈 汉(203)
宋庆龄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贡献·····	陈小琴(214)
试析宋庆龄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翟作君 王蕙炎(220)

宋庆龄在抗战前期·····	陆 诒(230)
宋庆龄与十九路军·····	李华明(237)
一二八、八一三时期的宋庆龄·····	张义渔(245)
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苗建寅 王 良(254)
宋庆龄与《申报》的“黄金时期”·····	金维新(263)
宋庆龄与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	夏建强(275)
宋庆龄与救国会·····	沈荣海(281)
宋庆龄与救国入狱运动·····	陈家骥(291)
她似一头“雄狮”	

——评宋庆龄 1936 年到 1937 年的抗日救国斗争

·····	卞杏英(299)
宋庆龄在上海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率作用·····	史慰慈(306)
宋庆龄与武汉抗战·····	毛 磊 宋月晖(314)
宋庆龄与香港一碗饭运动·····	刘家泉(320)
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在抗日战争中的独特贡献	
·····	洪绳之 钱行健 吴让能(329)
宋庆龄与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	尚明轩(339)
高举民主 团结 抗战的旗帜	
——宋庆龄在重庆·····	胡北淇(350)
抗战时期宋氏三姐妹在重庆·····	周 峥(359)
宋庆龄与救援战灾儿童运动·····	张 珏 冯乘序 戴 辉(367)

- 宋庆龄对抗战时期“工合”运动的贡献…………… 朱敏彦(377)
宋庆龄对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支援…………… (韩国)李阳子(386)
“工合”的一种典型
——云南丽江的“工合”运动…………… 谢本书(398)

抗战时期宋庆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初论

- …………… 王 蔚(404)
宋庆龄在抗战中的国际宣传…………… 陈日浓(413)
抗战时期的宋庆龄与国际友人…………… 张爱荣 宋春燕(425)
宋庆龄争取国际援华抗日…………… 张洁明(436)
抗战初期宋庆龄呼吁英国支持中国抗战…………… 杨元华(445)

肩负革命成败 民族兴亡之大任

——围绕着宋庆龄、蔡元培民族主义思想展开

- …………… 蔡建国(453)

宋庆龄与蒋介石

——以抗日战争为中心论述宋蒋关系演变的原因

- …………… 林家有(467)
抗战时期的宋庆龄与邹韬奋…………… 陈 挥(480)
抗战时期的宋庆龄与潘汉年…………… 林铭纲(490)
宋庆龄与白求恩…………… 孙娟娟(498)

耿丽淑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活动

——以保卫中国同盟及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为中心

- …………… (日本)石川照子(510)

- 宋庆龄抗战时期大事记(1931—1937)…………… 黄亚平(518)

- 宋庆龄抗战时期大事记(1938—1945)

.....	冯秉序 戴 辉 冯秉良(563)
后 记.....	(629)

学习弘扬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金炳华

宋庆龄是一位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并且首先是一位爱国主义的伟大战士。爱国，是宋庆龄全部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拯救祖国，献身祖国，反映在她的一生，尤其是反映在整个抗日救亡运动期间她的全部活动中。

抗日救亡运动期间，宋庆龄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集中体现在八个方面：

一、谴责“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挑起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中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镇压日益高涨的学生爱国运动，杀害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宋庆龄十分愤慨，奋笔疾书，写下了《宋庆龄之宣言》，公开宣布“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它受到全国人民的厌弃和痛恨。1932年1月，日军又向上海发动进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宋庆龄当即主张“积极抵抗到底”。她还亲临前线，慰问浴血奋战的第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她率先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仅5天内便赶制了3万多套棉衣送往前线。她还组织力量，筹集资金，创办了国民伤兵医院。在宋庆龄的爱国主义举感召下，短短一个多月，上海各界人士开办了70多所伤兵医院。各种慰问品源源不断送到前线，有力地支援了淞沪抗战。

二、创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进行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斗争

为了拯救民族，团结抗日，针对蒋介石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实行白色恐怖的反动政策，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斗争。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保护和营救了罗登贤、陈骥、廖承志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许德珩、侯外庐等爱国师生，以及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夫妇等，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她不顾个人安危，不畏艰险，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宋庆龄以对鲁迅无比深厚的战斗友谊，主持了鲁迅的丧事。在送葬那一天，她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宋庆龄大义凛然的精神，激励着成千上万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三、主持远东反战会议，争取世界进步力量支援中国抗日

1932年8月，正当世界法西斯侵略活动日趋猖獗的时候，以宋庆龄等为名誉主席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荷兰成立。世界反战委员会决定由宋庆龄等负责在上海召开一次远东反战会议。宋庆龄立即着手此项活动。但是国民党当局却百般阻挠和破坏，致使会议不能公开举行。在宋庆龄及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会议筹备工作加紧进行，1933年9月30日，远东反战会议冲破国民党当局重重阻挠，几经周折在上海秘密举行。宋庆龄冒着危险，于半夜一时摸黑赶到会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并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争》的演讲。会议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斯蒂的决议及宣言》，正式成立世界反战委员会中国分会，推选宋庆龄为主席。远东反战会议的召开，对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世界上更明了中国的实情”，引起各国对中国抗日斗争的更大同情和更广泛的支援。

四、组建救国联合会，开展营救“七君子”活动

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侵略扩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运动，全

国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宋庆龄在上海及时地将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以救国会为组织形式的新阶段。1936年1月，宋庆龄与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成立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宋庆龄等为执行委员。救国会领导了一系列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宣传集会和示威游行，声势日益壮大。然而却引起了坚持内战反动政策的国民党当局的恐慌，逮捕了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负责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宋庆龄当即组织了营救“七君子”出狱活动，与国民党当局镇压救国会的行径开展了斗争。当国民党法院审讯“七君子”时，宋庆龄大义凛然，不畏险恶，自带行李，亲赴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同服“爱国罪”。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七君子”。宋庆龄不计个人安危的爱国赤诚，赢得了举世敬仰。

五、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宋庆龄领衔签名响应。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宋庆龄又与何香凝、柳亚子等率先响应。1936年，毛泽东致函宋庆龄，希望她为促进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进行活动，宋庆龄不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她的厚望，积极为促进国共合作谈判，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从全民族抗日的大局出发，不计前嫌，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她的远见卓识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1937年2月宋庆龄破例参加自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的国民党会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她与何香凝、冯玉祥等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和反共内战的政策，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会议经过宋庆龄等努力，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宋庆龄随即发表了《国共合作之感言》，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而欢欣鼓舞，她十分动情地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宋庆龄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六、投身“八一三”抗日救亡运动，坚信“中国是不可战胜的”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当即在上海广泛联络各阶层妇女成立“妇女抗敌后援会”，不久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该会发动上海妇女广泛参加支援“八一三”淞沪抗战，妇慰分会组成一百多个宣传队进行宣传，响应募集20万双手套运动，帮助政府募集5亿元的救国公债等等。宋庆龄还亲赴抗战前线，慰问前方抗日将士，救护伤病员。八一三期间，宋庆龄还发表了大量的号召民众抗日、抨击恐日言行、呼吁国际支援、批评英美“中立”主义和不干涉政策等等演说和文章。后来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将宋庆龄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发表的演说和文章汇编出版，书名为《中国不亡论》。这本书以对形势的透彻分析和理论的清晰阐述极大地激励着“孤岛”中的上海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使人们坚信：“中国是不可战胜的！”

七、建立保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争取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援助中国抗战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并支援持久抗战，宋庆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离开上海，移居香港。一到香港，宋庆龄便先后建立起保卫中国同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向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寻求了大量的援助。据统计，仅1937年至1942年，海外华侨捐款达7亿多元，购买爱国公债11亿元，汇款回国55亿元。另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英国对工合的捐款约在10万英镑以上，美国约300万美元，连同港澳、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在内，海外对工合的捐款总额共计500万美元。保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从建立起，宋庆龄就强调，海外援助的重点应

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下,这两个机构克服种种困难,运送了大量的医药和其它物资到抗日根据地,还输送了许多著名的医术精良的医生,如柯棣华、巴苏、米勒、马海德等大夫到抗日根据地工作。拥有8个中心医院和42个分院的国际和平医院的建立,更是宋庆龄对抗日根据地医疗事业的重大援助。此外,宋庆龄还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加强对外宣传,大量报道中国军民尤其是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英勇杀敌的事迹,有助于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动员他们在经济上、物资上和人力上支援中国抗战,特别是对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八、坚持团结抗日进步,反对分裂投降倒退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始终坚持了团结、抗日、进步的立场,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破坏统一战线的分裂倒退行径。抗战初期,国民党发表《抗战建国纲领》,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发表文章,一方面表示拥护这个纲领,另一方面提出坚持抗日救亡的具体主张,以弥补其不足。当汪精卫叛国投敌,她痛斥汪精卫是中国革命最大之叛徒,并揭露自称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的汪精卫的伪装。当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她与柳亚子、何香凝等联名致函蒋介石,斥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要求立即停止对新四军的进攻。宋庆龄还及时为新四军筹集一批急需物资,转送到新四军军部。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宋庆龄迁居重庆,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着手重建保盟,继续开展以援助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活动。在重庆期间,她还坚持开展救灾募捐活动,在大后方为团结抗日,尽心尽力,直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宋庆龄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卓越功绩是她爱国主义思想全面

的深刻的体现。今天，我们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回顾她的丰功伟绩，目的就是要学习、继承和发扬宋庆龄的爱国主义精神，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学习宋庆龄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学习她把爱国主义与“为新中国奋斗”相结合。

宋庆龄在青年时代就认为“一个民族的发展及其在世界的地位上，不唤起全民族的精神就不能真正进步”。她在美国求学时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中就指出：中国人出去留学，目的是把一切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学到手，要为“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而学习”。这说明宋庆龄在学生时代就具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把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作为终身奋斗的事业。“为新中国奋斗”，是宋庆龄毕生奋斗的奋斗目标，也是她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的目标，集中表现为谋求民族解放。她认为，民族危亡之际，一切爱国活动，都必须首先服从并服务于抗日救国的总目标。她积极投身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并为此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们学习宋庆龄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学习她的爱国主义与广泛的统一战线相结合。。

宋庆龄痛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而且公开宣告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但她又十分清楚国共两党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处于严重危急关头，她不计前嫌，主张“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强调大敌当前“一切政治上的分歧都成了次要问题”。因此，宋子文请她设法与共产党联系，她欣然同意，毛泽东请她为国共合作进行活动，她不遗余力；西安事变发生后，她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她毅然赴会，呼吁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她努力在妇女界建立最广泛的

统一战线，孔祥熙、蔡元培、张学良、孙科的夫人和其他社会名流的夫人，以及女护士、女职工等都联合起来，参加抗敌后援会。宋庆龄始终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自觉地以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广泛团结海内外朋友，为促成、巩固和发展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竭尽全力，其基础正是她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

我们学习宋庆龄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学习她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在爱国主义精神支撑下为救国救民，振兴中华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宋庆龄除了与这些仁人志士具有共性——强烈的爱国主义之外，她还突出表现在一生将社会主义融合于爱国主义之中，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宋庆龄的抗日救国目标，不是一种打败日本侵略者后仍然是由蒋介石统治旧中国的构想，而是一种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将中国推向社会主义的理想。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她就认为：“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她通过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透彻分析，看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指出：“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而“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她一再呼吁国共两党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然而她的深层思想，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她希望“让我们学习我们的伟大邻邦苏联的榜样吧！铲除一切卖国贼，一切腐朽和自私自利的人们！让我们的怒火摧毁他们！我们将不仅在战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将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宋庆龄认为挽救祖国，夺取抗战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是唯一发展的方向。这样，她就把爱国与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她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一次质的升华。

我们学习宋庆龄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学习她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宋庆龄的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而是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她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她向国际社会指出，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世界各民主国家的敌人。中国的抗战，“同时也是去制止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暴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保卫各地的民主制度”。抗战前期，英美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袖手旁观。对此，宋庆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们不要以为战争仅仅发生在世界上一个区域，昨天的西班牙，今天的中国，谁能保证明天这种死的恐怖不会降临到你们身上！”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宋庆龄的预言。宋庆龄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是十分憎恨的，但对日本的人民，特别是工农劳动大众，是有着国际主义的同情和友谊的。她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这种政策自然只有引起我们的仇恨和抵抗的决心！”“当然，中国人民对于日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并无恶感，因为日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只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欺骗。”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而且也是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人类的敌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庆龄在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援助的同时，为建立世界反对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战后，她又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杰出的国际和平战士。宋庆龄无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无愧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 50 年了，敬爱的宋庆龄同志也离开了我们十几年。然而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和宋庆龄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

伟大实践至今昭示我们，正是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才使中国人民克服了一盘散沙的状况，史无前例地集结起来，浴血抗战，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自 1840 年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的彻底胜利。爱国主义是抗日战争凝聚中华民族之魂，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光辉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

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缅怀宋庆龄的光辉思想和伟大业绩，就是要以她赤诚的爱国主义热忱，以她执著的社会主义信念、以她无私无畏地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和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为榜样，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握时机，真抓实干，为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宋庆龄与抗日战争

爱泼斯坦

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无论是战争时期，或是在战后巩固胜利、发扬成果的斗争中，宋庆龄同志所发挥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她是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忠诚奉献的革命家。简而言之，她是用了自己的全部身心在为人民服务的。

在战争年代的活动中，宋庆龄继承并坚持了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当年，孙中山先生为了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努力奋斗不已。他号召消除中国的封建残余，实行耕者有其田。他提倡中国实行民主，但不是走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他制定了在我们国家建设现代经济的目标，但同样也不是受资本家所控制，而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他还号召扶助工农。

宋庆龄在战争时期所作的主张与活动，实际上都是在这样的框架中进行的。

宋庆龄忠于孙中山所追求的理想，早就在他所建立的国民党内部努力坚持他所提出的主张。在蒋介石背叛之后，她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却更加亲密了。这种合作，本来就是孙中山所开创的。宋庆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致力实现孙先生的主张及其事业，并且将它推向前进的。

在日本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之际，宋庆龄深深认识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团结抗战，战而胜之，这是首要的大事。没有

这一点，那么孙中山的理想与事业，就一点也不能够实现，当然更谈不上继续前进以实现进一步发展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紧急团结起来武装抗日，宋庆龄的观点与之完全一致，并坚决支持。在抗日运动中，她是一位热心忠诚的积极分子，一个辉煌的标志，就是她无畏而又不懈地参加民族救亡运动，对全国广大的爱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她积极投入并领导了救国运动，争取国共团结共建民族大业。在她身上，坚定不移的原则精神，同争取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两者是融为一体的。

以上我概括地叙述了自己的一点看法。这次会上，许多朋友对宋庆龄在抗战期间的言论与贡献进行了缅怀与评价。在这方面，我过去也已写过，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只是从总的方面着重说一下，这就是——所有她的这些具体表现，都是深层次地体现了她的爱国主义与革命精神的相互结合，体现了她对反动势力与投降主义的坚决反对，与对爱国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深切热爱，以及对于代表人类未来的少年儿童在德智体各方面成长的特别关怀，也体现了她对于反法西斯与争取人类进步事业的国际主义性质的高度意识。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一起贯穿于宋庆龄的政治生活与活动之中。从20年代开始，她就在中国人民当中帮助他们提高国际主义的觉悟，并且帮助国外有识之士了解中国对于整个进步事业与反法西斯事业的重要性，在众多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动员最广泛的国际人士支援中国人民进行奋斗的事业当中，她是一位孜孜不倦而又不屈不挠的工作者。为了中国的事业，她在世界各地众多的社会阶层当中广泛地结交朋友。她不仅朋友遍于天下，而且开创了多种渠道，以利于运送物资去支援中国人民的斗争。

与此同时，宋庆龄为人非常谦虚，从来不爱出头露面。她自己清醒地认识并且提醒别人，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她总是想方设法，宣扬人民的最深切利益和他们的愿望。这是她在中国与世界社

会舆论中获得崇高威望的“秘密”之一，而她总是将这种威望转过来致力于为人民服务。不但抗战期间是这样，而且战后在许多新的困难与危险当中也一直是这样。解放战争期间，她与共产党及人民站在一起，并且有如抗战期间一样，大力动员国际力量去支援他们的斗争和争取胜利。

当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宋庆龄也在现场，并且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孙中山所坚持的事业，以及她自己所继续的事业，终于取得了胜利，同时打开了进一步前进的大门。她，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人之一，并且被选为它的一位副主席。在新的情况之下，她继续为人民服务。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今天，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问题。在世界各国中居于平等地位是实现了，大规模的建设事业亦已在进行。但是，在经济与教育领域中的平等，还有待于我们去努力实现。改革开放的政策，正在加速这一进程的发展。但是，如果认为那些旧势力现在已经不找机会去谋一己的私利，那就错了。事实上，在那些不再能够占领的地方，他们会设法制造分裂。他们不能使用武力与经济压力去“遏制”一个远比过去更加强大的中国，他们指望并且助长人们忘却过去的历史，并且腐蚀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败坏他们的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觉悟。在国际上，尤其在日本，一些有势力的人，还在否定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还在美化它们的侵略行为。

为了继续前进，我们一如既往，必须以宋庆龄那样的明确立场为楷模，使得人们在二战以来所取得的成果能够得到发展，并且抵制法西斯主义与反动派的复辟，能够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利益而实现国内外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进步与友谊。一如既往的是，在为中国人民而作的这样的努力当中，有着一个实现、维护与

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人民的爱国思想与革命精神的任务。

我就是这样来看待宋庆龄在战争年代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在当今对我们的重要意义。让我们沿着她在其光辉一生中所选择和经历的道路，坚持下去继续前进。让我们捍卫在这一事业中业已取得的成就，坚持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

(凌扬译 张彦校)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今日中国杂志社名誉总编辑、宋庆龄生前挚友)

宋庆龄对抗日战争的杰出贡献

季鸿生

5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后，取得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自始至终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和反法西斯的斗争，以中国人民民族解放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民主进步为出发点，高举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同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一起奋斗不懈，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组织抗日救国团体，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坚决反对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当宋庆龄惊悉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后，奋笔疾书，发表了著名的《宋庆龄之宣言》^①，揭露了蒋介石政权在民族存亡之际所进行的妥协投降活动，坚信只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二八”事变后，宋庆龄全力以赴支持十九路军抗战，支持和支援上海工人的抗日斗争。

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进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为了发动全民族的抗日救国，针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宋庆龄面对白色恐怖，毫不畏惧，挺身而出，毅然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争取

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国人民要抗日救国，“国民党政府阻挠人民抵抗”“摧残人民的民权”。^②因此，要抗日救国必须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只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抗日的民主权利，才能为广大群众起来抗日救国开辟道路。“同盟”由宋庆龄领导，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组成，他们不仅具有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而且具有独特的社会威望和影响。在蒋介石集团的恐怖统治下，也只有宋庆龄、蔡元培等领导的“同盟”这一特殊社会团体，才能挺身而出，为保障“民权”、“人权”与蒋介石作公开、“合法”斗争并取得成效。“同盟”是为抗日救国争取民主权利斗争中形成的“统一战线”。^③“同盟”上海分会由林语堂任执行委员，北平分会由胡适任主席。史沫特莱、伊罗生以外国记者身份参加“同盟”，为“同盟”做了许多中国盟员无法做到的重要工作，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参加了北平分会。这表明“同盟”在组织形式方面显示它在抗日救国斗争中特有的战斗姿态。由此可见，“同盟”一开始就不仅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一个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进步团体。“同盟”的活动和斗争得到了共产党人的配合和支持。宋庆龄以其崇高的威望和特殊的社会地位，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千方百计地支援、掩护和营救了许多被迫害的同志和爱国人士，这些同志和人士，是宋庆龄称之为“人类解放斗争的先驱者”、“中国人民的精华”、“全都是中国人民为之骄傲的典型”，他们“是中国民族革命精神不可征服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不能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地生存下去。”^④他们是中华民族实现解放所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这是宋庆龄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独特的贡献。

组建国民御侮自救会，发表抗日救国主张。1933年初，日本侵占山海关，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华北。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宋庆龄领导的“同盟”于是年3月同上海邮务工会等30个进步团体，在上海组成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宋庆龄任会长，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抗日救国四项主张，即：（一）派遣全国至少百分之

八十以上的军队，给以充分的准备，和全国所有的飞机，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恢复东北、热河，保卫中国。(二)武装人民并组织义勇军。(三)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自由，立即停止对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和杀戮。(四)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进攻。还指出：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经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且于今年1月提议，在停止进攻苏区，恢复人民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的条件下，苏维埃政府愿意与任何军队或武装部队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④她的演说，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与愿望，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宋庆龄的演说，不仅在国内产生强烈的影响，而且刊载在美国纽约的《民族》杂志上，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御侮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救国的斗争。

筹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号召对日作战。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声明，声称日本对中国有特殊权利，欲排挤英美等国在华势力以独占中国。严峻的事实告诉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等在中共的推动和影响下发起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5月初，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反帝反法西斯同盟等团体为核心，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宋庆龄任主席。“自卫会”在酝酿组织过程中，中共将共产国际代拟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送交宋庆龄，商量宣传这个提纲和筹建“自卫会”的问题。在中共地下党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宋庆龄宣读了这个纲领。后以《中华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为题由宋庆龄领衔发表。在这个纲领上签署的发起人、赞成人包括国民党的元老何香凝、胡汉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马相伯、章任珪、李达、叶夏声和抗日名将李杜、杨靖宇、翁照垣以及工商界人士和侨界领袖等1779人。后来公开签名赞成的达10万人。6月，“自卫会”发表了《为对日作战宣言》，《宣言》明确提出了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任务，它进一步阐述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的基

本纲领)抗日救国的主张。“武卫会”成立后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的活动。

组织救国会,推动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华北事变直接触发了“一二·九”运动,引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兴起。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抗日团体在1935年底相继成立。次年1月,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为主要负责人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在上海救国会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各地也成立了救国会团体。形势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的号召和领导下,开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准备工作。5月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70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的代表也到会并发言。大会通过《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两个文件。宋庆龄、马相伯等40余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被推为常务委员。救国会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参加者有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国社党等各党各派的人,但大多数是无党派的爱国人士。宋庆龄在救国会中起核心领导作用。史良称赞她“是救国会的中流砥柱。”^①救国会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组织容纳各党各派的统一抗日政权的主张,同国民党的“安内”基本国策相对抗,为它所不能容忍的。当年11月,国民党政府无理逮捕了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事件”),宋庆龄为“七君子”被捕发表声明,并发动了“救国入狱运动”。在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在国内外进步舆论和正义呼声的压力下,国民党的法院才迟迟不敢对“七君子”贸然判刑。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国民党政府被迫让“七君子”取保获释。营救“七君子”的爱国民众运动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它标志着“九·一八”以来,中国人民争取从事抗日救亡权利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也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拥护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在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在全国造成巨大影响。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在共产国际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并称蒋介石为先生。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它开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1936年初，宋庆龄受宋子文代表国民党中央之托，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转达了国民党要与共产党谈判的意图。此信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她十分重视，特意嘱托董健吾直送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等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五项原则，托董健吾带回。这样，国共两党中断近10年的关系，在宋庆龄的努力下，建立起来了。这对后来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作了不懈的努力。1936年5月，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8月，中国共产党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确定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并准备派代表与国民党就合作抗日进行谈判。

主张释放蒋介石团结抗日。张学良、杨虎城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遭到蒋介石拒绝后被迫发动了西安事变。是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还是发展成为全面内战而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全国人民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国内时局发展的关键时刻，宋庆龄以民族利益为重，

从大局出发,不计前嫌,准备亲赴西安去劝说张学良、杨虎城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条件下释放蒋介石,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因交通工具问题未能成行。当她从潘汉年(时为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那里知道,中共中央和张、杨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谈,请她劝宋子文等到西安谈判。由于宋庆龄的出面劝说,促成了宋子文、宋美龄的西安之行。经过谈判,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成为国内时局转变的枢纽,为国共重新合作创造了重要条件。宋庆龄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巨大作用。

要求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宋庆龄根据1936年9月毛泽东的来信,希望“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她多次会见潘汉年,并把他引荐给宋子文、宋美龄,便于潘汉年开展上层统战工作。11月10日,宋庆龄在孙中山诞辰80周年前夕发表的《纪念词》中,公开号召“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并号召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①随后,宋庆龄出席国民党于1937年2月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这是10年来,她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国民党三全、四全、五全大会都选她为中委,但她拒绝参加。这次是为促成国共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去的。会上她和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提出了《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案》呼吁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党“实行孙中山遗嘱”,“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②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仍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案》,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③在宋庆龄等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全会终究变剿共战争的国策为和平统一之方针。全会之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

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卢沟桥事变后,宋庆龄于7月中在其寓所会见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3人,坚决支持《中

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示愿为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真正实现而努力。9月22、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了中共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这标志着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宋庆龄闻讯后异常兴奋和激动。24日，她发表了《国共合作之感言》，满腔热情地欢呼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到最近，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重新携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共宣言和蒋介石委员长的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再次提到孙中山的国共合作的主张，“假如孙中山先生国共合作的主张，以及联俄、联共、工农利益的三大政策能够继续到底，则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早已铲除净尽，帝国主义也早被驱逐出去，而中国已成为独立自由的中国了”。“但是不幸得很，十年以来，国共两党分裂。”她谆谆告诫大家要记取十年内战，两党分裂的惨痛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⑨这里充分表达了她为求得民族解放，竭力主张国共合作，共同对敌，夺取胜利的信念。

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国。在国共再次合作形成过程中，宋庆龄就指出：“只有群众起来保卫国家的独立，中国才能得救。”“以为没有群众运动的支持，就能把国家从日本的侵略中解放出来，这是愚蠢的想法。”^⑩国共重新合作后，她多次强调必须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建国工作，实行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一再指出必须实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其中“实行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就可以唤醒群众。”“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已经觉醒起来了。”她尖锐地指出：“单靠装备腐败的常备军，中国是不能建立足以抵抗侵略的国防的。但是在这常备军的背后却屹立广大的人民，他们准备为保卫国家淌尽最后的一滴血。他们打起游击战来，将成为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日本军阀只能发抖。”^⑪当她收

到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的文本之后，在肯定大会制定抗战方针的同时，又分析其表里不一的矛盾。她同何香凝联名发表的《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的声明，提出了包括制裁国民党腐败行为等坚持抗战到底的七项具体主张，其中第二项就是“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并在第七项不忘人民因战争带来的种种惨痛，为改善人民生活，“取消与禁止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等等，这样，可以使全国同胞参加抗战到底。

总之，宋庆龄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坚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大力弘扬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日本侵略者必遭灭亡。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宋庆龄曾多次阐述过中国抗战最终必胜的观点，有力地批驳了民族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论调。日本侵略者曾疯狂地叫嚣三个月即可灭亡中国，国民党内亲日派、投降派则散布民族失败主义。蒋介石集团虽被迫抗日，但对抗战取得彻底胜利缺乏信心，因而迟迟不敢对日绝交和宣战。幻想在上海抵抗一阵，以引起国际干涉调停，取得体面的“和平”。广大民众虽有驱逐日本侵略者于国门之外的强烈愿望，但对抗战必胜缺乏科学的认识。由于日军的野蛮屠杀，因此在部分民众之中，存在“恐日病”的思想。针对上述情况，宋庆龄于1937年8月发表了《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指出：“关于中国，现在流传着许多不真实的看法，说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我们却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任何侵略，并且能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⁹⁰接着，她在《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指出：“不管日本军阀是怎样的疯狂，不管日本军阀的威力怎样，我敢代替全中国人民坚决地告诉你们，日本军阀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还在国民

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就指出：“日本不能战胜中国。因为第一，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不能作持久的战争。第二，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第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后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⑨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论述，指出：从“经济潜力和它的社会结构的力量”来看，“日本工业的基础不健全是很明显的”，“农业产量在逐年下降”，“农民受到三种不同的剥削”，“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已经表面化，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弱点之一。”相反，“中国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在这种情形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于中国人民的长期战争的。”^⑩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宋庆龄认为，“日本黠武主义者自己的残暴行为大大地帮助挑起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情绪。”她高兴地指出：“中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站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中国全部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精神、行动和意志这样的团结一致。”“中华民族是必然不会灭亡的，地球没有一个力量可能消灭她。”^⑪当她知道八路军 115 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板垣师团 1000 多人胜利消息时，她写道：“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竟成了结合全中国一切资源和力量以抵抗暴敌的媒介剂，过去的红军即现在的八路军，已是国军的一部分，正在加入作战。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就获得压倒一切的胜利。”她说：“我们全国的团结统一，已经发生伟大的力量，如堡垒一样坚固，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痛击。”^⑫

淞沪抗战进行到 10 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撤离大场、江湾、闸北等处，日军逐渐包围了租界。这时，上海市民一度出现惊慌，汉奸亲日派乘机散布妥协投降的陈词滥调。对此，《救亡日报》、《抵抗》三日刊发表不少文章予以批驳和痛斥。为了进一步坚定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宋庆龄在 11 月 6 日出版的《抵抗》三日刊上发表了题为《两个‘十月’》的文章，指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及其野蛮和残酷，

在我们领土上造成了混乱和恐怖。”“我们十月的天空，黑压压的战云弥漫。但是我们内心却闪烁着希望的光明。我们的伟大邻邦苏联，不也是在形势比我们更恶劣的一个十月中诞生的吗？”“经过了多年的黑暗，苏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到和平、进步和自由的路。”“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这些破坏我们的文化和进步的人。”她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将不仅在战场上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将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国家。”^④

上海沦陷前后，中共中央很关心宋庆龄的安全，她根据中共来电的建议，离沪赴港。行前，她发表《告英国民众书》，严正表示：“日本侵略者要想把历史开倒车，要想征服我们，要想消灭我们民族的独立，要想把自由的中国人变成日本的奴隶。中国人民任何时候也不会停止其反抗日寇此种侵略之斗争。”

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曾把宋庆龄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发表的讲话和文章汇编出版，书名为《中国不亡论》，这本书的出版给中国人民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增强了信心和勇气，使人们坚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宣扬爱国主义，歌颂民族英雄。宋庆龄深知舆论宣传和精神鼓舞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她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指出：“为了爱国主义的火焰继续增长，绥远抗战^⑤的事迹必须予以宣扬，使中国的每个工人和农民都知道。……必须宣扬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英勇斗争，歌颂那些抵御外侮、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⑥她不仅仅是号召诗人、小说家……们去做，而且她自己热烈宣扬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一切内部的冲突已经自动停止，内部意见的分歧也在外侮威胁之前消灭了。在这个我们所有势力的统一中，结集着我们最伟大的力量。”^⑦宋庆龄还称赞中国青年，在残暴野蛮的敌人面前，表现出：“不退让一步，拼死的斗争，坚持抗战，直到最后的胜利。”这是中国青年对于战争与法西斯威胁的一次答复。“在这种答复后面，有着一种永远不能征服的精神。”^⑧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

义精神。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在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中流砥柱的作用，由于宋庆龄等一批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的大力弘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从而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得到空前的高度的发扬。

四、动员国际舆论、争取国际援助， 千方百计地支援军民抗战

宋庆龄到香港后，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密切配合下，于1938年6月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宋子文出任会长，宋庆龄任主席。希尔达·沙尔文——克拉克任名誉秘书，诺曼·法朗任名誉司库，爱泼斯坦和贝特兰主管宣传。廖梦醒、王安娜、邓文钊、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都参加保盟的中央工作。何香凝是保盟的积极支持者。宋庆龄先后邀请了印度民族革命领袖贾·尼赫鲁、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英国驻港教会主教何明华、知名人士克莱尔·布什、冯玉祥将军、外交界前辈颜惠庆、孙科、宋子文等为发起人。随后，创办了保盟通讯。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为抗战的胜利作了大量的工作。

动员国际舆论，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日运动的任务，由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光荣地担当起来。宋庆龄在纽约《论坛与世纪》杂志上发表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中介绍说：“人民的抗日运动已高涨起来，日寇已不能再以嘘声恫吓的手段来达到它的目的。”“蒋介石已经停止了内战，而国民党也终于在最近的三中全会中讨论了与共产党讲和的问题”。共产党已“成了抗日的先锋”，“共产党希望与政府合作抗日的诚意，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清楚的证明。……释放蒋介石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是共产党主张的。他们已尽了最大力量来保持中国的团结。”^⑧“我们全国的团结统一，已经发生伟大的力量，如堡垒一样坚固，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的痛击。”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暴行。宋庆龄在《致英国工党书》中揭露了日本侵略军两个月来在中国的蹂躏和屠杀，“自炸毁天津南开大学为始，他们用武力占领了我们在华北所有的文化机关，于他们没有用的就一把火烧了去。他们炮击和轰炸上海和南京的大小学校；他们轰炸美国教会的医院，炸死了看护、医生和伤兵。为了恫吓我们的人民，为了要把我们击得‘屈膝’，他们滥炸从战区仓皇逃出的避难妇孺；在城市与和平的村庄中，他们的飞机对无辜的市民一样的肆虐。火车、轮船、难民撤退的车站——那里聚集着最穷苦的人们——都成了他们发泄狂暴的目标。”“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屠杀中国的士兵、工人和农民，以使日本扩展其军事统治于全部的中国。”^⑨忠实的报道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的艰苦卓绝抗战业绩。保盟通讯第20期详细报道了八路军在华北的百团大战，刊登了八路军彭德怀将军对这次重大战役的评价，即：在这整个广大地区，分散的游击队第一次大规模地协同作战，改变了主要铁路沿线的局势，不仅牵制了华北日军，也限制了日军在华南的行动。第22期还刊载了百团大战地区形势示意图，帮助读者理解彭德怀将军的评价。这就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八路军的“游而不击”“封建割据”的谰言。还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内搞摩擦对日暗中妥协活动的事实。

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日。宋庆龄以她在国际上的声望，不顾国内外敌人的百般阻挠，想尽一切办法向国外募捐。保盟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很快与英、美、法、加、澳等国援华团体建立了联系，并获得了大量援助。其中华侨援助，据陈嘉庚先生初步估计，抗战三年汇款回国达20亿元，捐款8亿元。保盟将援助的钱款和物资按抗战的需要或按捐款者的意愿进行合理分配。1940年的港币收支列出的被援助单位有国际和平医院、红十字医疗救济会、八路

军、新四军、中国“工合”、战灾孤儿、难民救济、鲁迅纪念学院、抗日军政大学等。^⑧由此可见，宋庆龄和保盟将援助重点放在最需要援助的地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想方设法冲破敌人的封锁，将募集来的大量款项、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不断地送到抗日前线和敌后根据地。在宋庆龄的影响下，许多外国朋友为保盟运送大量物资，巧妙地通过日军封锁线，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拦截和破坏，到达各根据地。宋庆龄到渝后，保盟的工作比在香港时要困难得多，但仍得到不少外国朋友的大力支持。1944年，保盟向美国红十字会争取到一批医药物资，其中有一台给国际和平医院的大型X光机。由于飞机舱门太窄，经美国史迪威将军批准把舱门电割扩大，然后搬上飞机飞往延安，把它完好无损地交给了国际和平医院。许多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米勒、巴苏、布朗等外国大夫受宋庆龄影响或介绍，先后到根据地工作并建立了闻名于世的国际和平医院。在她的介绍下，许多华侨青年不怕困难和牺牲，毅然归国参加抗战，有的奔赴延安，有的进入抗大等校学习，有的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许多人为保卫祖国英勇献身。

全力支持“工合”运动，宋庆龄和保盟的另一重要工作，就是积极支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宋庆龄在工合创建时就敏锐地注意到工合不仅在经济方面对发展生产、生产自救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政治上它又是发动人民抗日斗争的方式之一。她说：“若从社会和经济的立场上说，它是无价之宝。”^⑨“我相信在中国里面再没有别种运动能够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更为应时和重要的了。因为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⑩所以她利用一切机会呼吁世界人民援助工合。宋庆龄团结中外著名人士于1939年初，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该会一成立就得到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广泛支持。美英等许多国家纷纷成立援助中国工合运动的推进委员会，大批物资和捐款不断而来。正如路易·艾黎所说，“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

靠”。当时吃过国民党政府的贪官污吏亏的华侨表示，“你们不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我们就不汇钱来。”工合运动从陕南开始，迅速发展至全国，以抗日根据地发展得最为有力，它为供应战时的民用军需，建立巩固的国防经济，支持长期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根据地军民对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她支持的工合运动的大力支持，非常感激，铭刻在心，曾以多种方式向宋庆龄致谢！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专程到宋庆龄寓所拜访她，深情地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⑨

五、谴责顽固派倒行逆施的反共阴谋， 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宋庆龄在领导保盟开展积极支持军民抗日的同时，始终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立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分裂倒退的恶劣行径。

痛斥汪精卫的叛国行径。汪精卫投敌后，曾声称其投敌之举是出于“爱护孙先生所手创之中华民国，不忍灭亡于无识者之手中，故毅然排除万难冒万险以主张之”；^⑩并在上海召开的汪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侈谈三民主义。对此，宋庆龄在《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文章中，揭露了汪精卫“孙中山先生信徒”的伪装，指出即使在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时，汪精卫就对孙中山倡立的革命主义持怀疑态度。宋庆龄指出：“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告其信徒曰，我们为欲抵抗外来的侵略，惟有在社会上经济上求强盛。此间对此点表示怀疑者，孙先生说：‘如对此点发生怀疑者，不如不参加革命。’目下背叛国民革命汉奸汪精卫，即对此点不了解，而思想发生动摇者之一。当初汪精卫奉袁世凯之命，与革命党疏通，请停止革命工作，甚至谓：‘现在我们可以不谈革命，我们

所需要的，只是袁世凯拿得金钱，来集中建设铁路的工作。’难怪孙先生在离开南京的时候，发表演说，对汪精卫这些党员们认识的浅陋，表示异常不满。现在对汪精卫的不满，已是全国同胞，而这个卖国的汉奸，竟敢曲解孙先生的学说，随便加以涂改。”^⑧宋庆龄的揭露对汪精卫的投敌叛国行径以沉重的打击。

为“皖南事变”致函致电蒋介石。1941年元旦，宋庆龄、宋子文、克拉克联名致海外友人的新年信中指出：近来日本在中国政治上发动了“和平攻势”，利用汪精卫和别的一些派别的代理人，煽起中国内部的分裂，为抽调日本部队投入别处的行动作准备。广大中国民众对这种挑起分裂的企图进行了坚定回击，他们决不会上日本人的圈套。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这种伎俩对今日中国团结的危害。”现在国内的主要任务是“民主和团结，”宋庆龄在信中提出了保盟的原则立场，“在这种形势下，保卫中国同盟坚定地站在中国的团结、民主和继续抗战的一边。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⑨后来，宋庆龄一再强调这个原则立场。

在宋庆龄发出该信后不久，就爆发了国民党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顽固派破坏、分裂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倒行逆施，呼吁：“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抗日党派。”随后，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制止内战祸国行为”，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⑩

宋庆龄还通过保盟通讯，及时地向世界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强加于新四军的不实之词。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国内人民的反对和中间人士的责难，而且也引起苏美英等国政府的不满。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事变后质问蒋介石，向他表示，进攻新四军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军事势力，这

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美国政府通过总统罗斯福特使居里向蒋介石表示，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之间经济财政各项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英国政府在接卡尔大使报告后，也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苏美英三国外交压力成为制止制造分裂和发动内战的因素之一。这与宋庆龄的及时揭露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有密切的关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精确的、科学的和历史的名词。为了在理论上阐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方法，反击那股投降、分裂、倒退的逆流，宋庆龄发表了《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她明确指出：“中国抗战的关键则在于内部团结。”严厉批评了皖南事变的制造者：“人人都知道，我们民族的团结……在最近数月中已经处于严重的危机中了。在今年年初，那些煽动内战的人似乎又要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给敌人打开大门。”^⑧在国民党里“竟有主张投靠罗马——柏林轴心，赶快和日本妥协的”少数反动派。^⑨她特别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偶然叫出来的，是一个精确的、科学的和历史的名词。

宋庆龄写道：“‘民族’的意思就是说，全国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政党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它的目的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保卫我们共同的全民族的独立。”“‘抗日’这两个字反映着一个事实，即日本今天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威胁，因此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任何不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团体。”“统一战线就是所有合作的党派必须一致面对敌人，团结互助，御以外侮。”针对顽固派所散布的“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和“抗战时期民主有害”等谬论，宋庆龄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说各个属于它的党派不能有各自的观点和目标。并不意味着任何一党一派独裁。”“现在虽有两个大党和几个较小的党派，但是并没有一个充分的民主的代表机构，使每一个党派都能够根据它的党员人数和影响大小而在战时政府中担当适当的任务。”“战时自由中国之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

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缺乏民主也许就是对共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最大威胁，并且给那些想破坏它的人以绝好的机会”。她特别提到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团结的基础，它们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民族团结的危机。”进一步指出：“由于国民党是当权的政党，在重庆实行一党专政，所以扩大民主政府是它的责任。”^⑥宋庆龄的这篇文章对回击那股投降、分裂、倒退的逆流起了重大的作用。

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推动民主宪政运动。宋庆龄到重庆后，受到蒋介石的冷遇，后经国民党一些元老的努力，在国府礼堂召开了茶话会。经覃振的请求，宋庆龄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演说。她指出，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发扬民气，搞专制、搞个人独裁，是一定要打败仗的。她还说，各党各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万不可兄弟阋墙，手足相残。在重庆，宋庆龄重建了保盟。在一切可同国际友人交往的时候，她总是适当地表示保盟的愿望；支援抗日根据地军民和国际和平医院的医药援助。尽管蒋介石对此是不满的，但又不能把宋庆龄的嘴“封住”。因为宋庆龄总是强调团结抗日的主张。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就说过：“除了孙夫人外，没有任何中国人敢于公开揭露高压政策，即使含蓄地讲也不敢。”宋庆龄不愿国民党顽固派的高压政策，不断地揭露和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她在与一位外国记者谈话时极为气愤地说：“不会再打什么仗了。我妹夫把美国给的枪炮都屯积起来，等着美国人替他打败日本呢。然后，他再把枪炮开封，用来打他真正感兴趣的反共战争。”宋庆龄的这一揭露，迅速传遍各地。宋庆龄在《从香港到重庆》一文中，写道：“在保盟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它强调团结。现在，当这些成果为不祥的阴影笼罩着，预示着新的和自杀性的内战时，我们更强调这一点。”从1944年起，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民主宪政的高潮。这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时，宋庆龄发表的讲演和文章，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进

一步呼吁废除一党专政，真正实行民主。她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中指出：“当反动势力公开敌或压制人民和人民的积极性，惧怕并且破坏民主运动而给敌人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中国的抗战就摇摇欲坠，节节失利。”她明确指出：“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是“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而顽固派却“正在准备”消灭这个民主部分的内战。她严正表示：“在抗战期间，我们需要民主，因为我们必须同等看待所有抗日力量。现在第一步就是取消不人道的封锁，这种封锁使得给敌人重大杀伤的游击队的受伤战士得不到必需的医药。如果这种起码的人道主义的第一步骤还没有做到，空谈民主是不会有很大意义的。”

宋庆龄在仅“得到一楼之中的自由”的情况下，就犹如挺拔的大树，岿然屹立于雾都重庆，高举抗战、团结、民主的旗帜，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竭尽全力，奋发工作，经历了四个春秋。由于中共和宋庆龄以及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努力，始终把蒋介石集团稳定在抗日阵营内，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六、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前列，殚精竭虑 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抗议希特勒法西斯暴行，促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意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法西斯统治建立并进一步猖獗时期。法西斯主义不仅加强对本国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而且还对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法西斯强盗企图将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使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正当中国人民和全人类面临危难之际，宋庆龄勇敢地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暴行的前列。她主张要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就得联合行动，把全世界工人、农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人们组织起来。她认为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上，中国人民和西

欧人民的斗争“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有共同目标，我们休戚有关。”^⑧因此，当她获悉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对德国进步人士实行残酷迫害时，即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的名义，在1933年5月13日发表声明，谴责希特勒对德国进步人士的迫害。同日上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前往德国驻沪领事馆，向德国副领事贝连递交了《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国领事抗议书》。是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远东反战会议，会议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宋庆龄被选为主席。次年4月，宋庆龄与何香凝等领衔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提出：“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日本的劳动民众、朝鲜人民等等）作友军，与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同情援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建立友谊的关系。”^⑨1936年8月，宋庆龄委托钱俊瑞作为个人代表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呼吁“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不但要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还要反对日本军阀、财阀的法西斯主义。”^⑩随后，陶行知、钱俊瑞等以上海救国会的名义参加了9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经过钱俊瑞等人的努力，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写进了反对民族不平等，反对侵略、反对军国主义的内容。钱俊瑞等中国代表根据宋庆龄的意见在两个会议期间，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以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时，宋庆龄是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已与罗曼·罗兰、蔡特金、巴比塞、加香等杰出人物并肩战斗，是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巨大影响的领导者之一。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全面抗战之后，宋庆龄连续发表了许多函件、演说和文章，呼吁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德、意法西斯势力对各国人民的迫害、战争威胁，指出它们是人类的公敌。她说，“日本强盗在东方，意、德法西斯蒂在西方，都已表曝了他

们的企图和手段。我们不能让这些兽性的敌人支配全人类的命运。”^①她号召全世界被侵略被压迫的人们团结一致，打倒法西斯，为了全人类的理性与幸福、为解放和自由而战，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不可分割的。她曾多次指出，中国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对黑暗的伟大斗争发展为公开战争的战场之一”，“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前卫”。“它一直是全亚洲的伟大屏障，阻止了日本法西斯统治这个占世界人口半数的地方。”^②因此，中国人民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民主而斗争。”^③她一直反对国际上对法西斯侵略行为采取的所谓“不干涉”政策和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稳定太平洋局势”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她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的战争是远东局势的关键，并且不仅限于远东。我们的继续抗战保障了太平洋西岸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将来。”中国的抗战“使日本在南方不能攫取英美的属地，在北方不能进攻苏联。”^④她再次强调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

帮助中国人民并帮助你们。宋庆龄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为中国抗战的急需争取国际援助，她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并帮助你们”。坚持认为援助是双方的，因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也帮助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而且中国人民是在自力更生基础上争取外援的。宋庆龄多次向海外朋友宣传中国军民在反对日本侵略中表现出来的高度自觉性和牺牲精神。她说：“他们认识到对战友们负责任也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只有把援助和我们自己的力量用在比以前更艰苦的战斗上，我们才有资格要求援助。只有这样，中国的土地才能得到解放，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救济。”^⑤这些论述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仅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具有无比深厚的国际主义情感；同时也充分显示出中国人民是以反法西斯英勇战士的身份来接受国际援助，又对国际反

法法西斯斗争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由于宋庆龄殚精竭虑从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因此在她周围集合了史沫特莱、爱泼斯坦、马海德、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等一群国际主义战士。宋庆龄始终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前列,为实现世界和平民主而斗争。国际知名人士称赞她是“伟大的孙逸仙博士理想的真实的继承者”、“一头名符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宋庆龄的斗争不仅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不断扩大了中国民族革命事业在世界上的影响,并且增强了国际和平民主力量间的团结。

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之所以能发挥重要作用、对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原因是:她始终从民族解放的大局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不朽思想,坚持三大政策的正确原则。她又始终如一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正确的抗日主张和救亡运动,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仍然与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以坚定的革命精神,渊博的学识,高尚的风格,赢得了国内外进步、友好人士的爱戴和崇敬。她那凛然的正气使战友钦佩、使敌人震慑。她始终与其他众多的爱国人士、与广大的民众、与国际爱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宋庆龄在抗日战争中的杰出贡献,作为中国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篇章之一,将永垂史册。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政法系)

注释:

① 收集在《宋庆龄选集》上卷篇名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9、91、119、154、167、205—206、117、195、194、165—167、198、201、211、217、176—177、202、240—241、192—194、201、303、304、322—323、341、343、341—342、382—383、143、222、381、270、340—341、376—378页。

⑤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页。

⑥⑦⑧ 《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123、122页。

⑨ 1937年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致书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⑩ 1936年11月初,日军和伪蒙军王英、李守信两部主力,进犯绥远,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奋起反击,打退了敌军的进犯。

⑪⑫ 转引自郑灿辉等著《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一书,第183、193—194页、第241—242页。

⑬ 转引自《中国福利会史》第61页,中国福利会馆藏。

⑭ 《革命史资料》(沪),1986年第3期,第51—52页。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宋庆龄的爱国主义

张 磊

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她的爱国主义既充溢着挚爱祖国的激情，又蕴含着拯救和发展祖国的理性内容——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相结合，探求独立、民主与富强之路。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她的爱国主义不断获得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丰富的社会内涵，并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高峰。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爆发于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最持久的反侵略正义战争，也是鸦片战争以来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由于抗日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人民以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了相互联系的双重贡献——一方面，保卫自己的家园祖国，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另一方面，完成了应尽的国际义务，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这场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中，正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结成统一阵线，并肩奋战，击溃了猖獗一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从而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础，开拓了民族解放的道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正如江泽民同志的《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所指出：“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浩劫，也教育了世界人民。世界人民赢得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和平与进步”。

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3500 万军民的伤亡,1000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和 5000 亿美元的间接经济损失。所以如此,固然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军黷武;同时,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造成的贫弱和“一盘散沙”的社会状况也为侵略者提供了可能性。因之,只有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高扬,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发挥出难以估量的精神动能。人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义无反顾,投入抗战争的洪流。但是,这种爱国主义的主流并非历史传统的单纯承继,而是赋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丰富社会内涵。作为激情与理性的结合,它不仅蕴含着炽烈而朴素的对祖国的热爱,并且升华为理性——关切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力求拯救和发展危难和贫弱的祖国,致使爱国主义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才无愧为团聚、引导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辉旗帜。宋庆龄的爱国主义,亦复如此。

—

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近代时期的发端,具有特殊的深刻意义。新阶段舞台的帷幕的开启,竟是由英国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所拉动。强烈的外侮迫使近代中国逸出了正常的、健康的发展轨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种为殖民主义枷锁所桎梏的畸变的社会形态。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严酷的事实是: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帝国主义采取了各种手段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把它推向贫困落后的深渊。殖民主义者十分迷信军事手段,非常醉心于坚船利炮,而朽败反动的统治者——无论是清朝政府,抑或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媚外卖国和专制独裁,则使得旧中国总是处于“挨打”的地位,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迄八国联军之役,每次都是以丧权辱国为

结局。

抗日战争第一次赢得了彻底的胜利。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14年的斗争历程可以划分为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两个阶段。大体而言，抗战不断深化与拓展——从分散抗争到团结战斗，由防御、相持到战略反攻。在这期间，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日作战大小约165000次，歼灭日军150万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人数的70%。

中国人民不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还赢得了社会的进步。进步的基本内涵和主要标志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和国民党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相互消长，前者不断发展壮大，后者愈益遭到人民的唾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在根本上为后来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必要的准备，使得中国的命运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后的短暂时间中得到了根本解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历经“艰难”的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至此划下了一个光辉的句号，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开拓了道路。

事实证明，持久的、艰苦的抗击侵略者的过程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逐步发展的过程。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制订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贯彻了科学的战略和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并把他们汇成抗日斗争的洪流。共产党人无愧为敢于和善于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忠贞战士，因之成为人们的希望和信心。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决非——如同某些出于政治偏见的“学者”所非谤——“坐大”，而是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成长，这种长足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必然：在备受欺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任何阶级和政党敢于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并且善于把民族解放战争引向胜利，它就一定成为领导

人民群众的核心力量。

在那艰苦悠长的战争岁月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人心所向的“圣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民兵承担了对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的作战任务，对敌作战 125000 余次，消灭日伪军 171 万余人。“平型关大捷”、“黄土岭战役”、“百团大战”，……都取得了克敌制胜的辉煌战果。正是与这个过程同步共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抗战初期，抗日根据地主要仅有人口不过 150 万左右的陕甘宁边区，军队则只有 30000 余人。抗战胜利前夕，抗日根据地已经遍布于祖国大地的东南西北，区内人口约达一亿，军队和民兵分别为 100 万和 200 万人。正是这种为先进思想所武装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才是真正决定中国命运的因素。

至于国民党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蒋介石统治集团无视日蹙国百里的严峻现实，却仍热衷于“围剿”红军，只是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加以“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才使得蒋介石们放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不参与了抗战大业，并在初期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其作用是应当给予肯定和估计的。但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片面抗战，实行独裁专制，制造摩擦分裂，乃至酿成反共反人民的“皖南事变”，屠杀抗日有功的新四军，囚禁著名的将领、新四军军长叶挺。蒋介石统治集团虽然极力在抗战中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但人心的背离成为后来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

判明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就不难理解蒋介石统治集团竟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欢庆胜利的锣鼓鞭炮的声音刚刚停歇，便向共产党和人民挥起屠刀。但是，1946 年已非 1927 年，抗日战争中发生的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的消长极其有利于人民，国民党政府的 800 万军队绝对阻挡不了历史的潮流。

没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力量的壮大，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会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力量的壮大。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又赢得了社会的进步。

宋庆龄积极投身于人民的抗日洪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爱国主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归根结蒂是全民爱国主义高扬的结果。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是各族人民的共同的主要精神支柱，是动员广大群众奋起御侮的鲜明旗帜，是激励人们前仆后继奔赴战场的巨大感召。

二

然而，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的是：为什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民曾在近代时期多次抗击过侵略者，表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但是，结局大都是悲剧性的——既未赢得战争的胜利，也未赢得社会的进步（当然，屈辱的战争后果促进人们去探索救亡与变革的道路）。只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一洗国耻，爱国主义结出了硕果，不仅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而且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应当对爱国主义进行具体剖析。

爱国主义，大抵是激情与理性的结合。人们总是为自己祖国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多娇的江山和优秀的人民而自豪，并积淀了炽烈的朴素的挚爱。然而，深刻的、丰厚的爱国主义不能局囿于此，它还必须包涵理性的内容——面对备受欺凌的、落后与贫困的祖国，定需寻求救亡和富强之路，对祖国的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体现为把爱国主义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荡。爱国主义由此蕴含了拯救和发展祖国的社会内涵，浸渍了时代精神。

从鸦片战争以迄八国联军之役，中国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在

这个历史时期，国家的权力为清朝政府所控制。这个朽败政权主要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随着帝国主义侵袭的深化而逐步与之结成联盟，充当“列强”的“鹰犬”，甘为奴隶总管的角色。他们是卖国主义者，对侵略者表现出一副奴颜媚骨。然而，封建地主阶级与侵略者之间并非没有矛盾。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及其代表确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主张抗击侵略者，甚至积极投入了正义的战斗。但是，除掉少数的优秀人物外，他们的爱国主义并不蕴含着先进的社会思潮，难以较为完满地回答来自外部世界的双重挑战。因之，战争的屈辱结局无法避免。赢得胜利与进步，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卷入抗击侵略者战争的还有广泛的阶级和阶层，主要是农民阶级和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至于无产阶级虽已诞生，却未成为自为阶级。农民阶级无疑是反侵略的主力，从三元里抗英斗争到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他们保家卫国的情感和英勇，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但是，落后的生产方式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使得他们不能把爱国主义与先进的社会思潮与运动结合，提出科学的民族解放纲领。资产阶级的政派之一，维新派也把这个课题作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他们正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把维新运动推向高峰，把爱国主义与维新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确认爱国必需变革。然而，由于他们缺乏赖以凭藉的物质力量，又对帝国主义存在着轻信和幻想，所以他们的奋斗未能取得真正的重大成果。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爱国主义跨出了新的步伐，与当代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潮和革命运动相融汇，相激扬。他们竭力避免中国惨遭“瓜分”或者“共管”的厄运，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而奔走呼号。严峻的事实是必须从爱国走向革命——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粉碎反动腐败已极的清朝政府和后来的军阀统治，才能拯救中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从未真正建立起全国范围的政权，对帝国主义又曾缺乏深切的认识，以致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始终未能提出鲜明的反帝国口号和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之，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不克得到充分反映和取得重大的成果。资产阶级曾把爱国主义提到历史的新高度，赋予它以时代精神和社会内涵，丰富了爱国主义传统，起了震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只是历史的局限使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彻底胜利，自然也不能真正完成反侵略的首要任务。

近代中国总是处于“挨打”的境地，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伟大胜利根本改变了这种屈辱的历史。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爱国主义与当代中国最先进的社会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即附丽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几经曲折与反复，终于完成了近代民主革命历程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找到了通向胜利的途径——新民主主义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正确解决了当前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诸问题，被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因之，也就科学地解决了它所内涵的民族解放的课题。这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历史趋势的社会思潮和运动，把爱国主义深化和拓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致令人民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高扬的爱国主义，结出了空前的硕果。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这种领导，首先体现为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制订和贯彻。正是共产党最先举起了抗日的爱国主义旗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制订了相应的战略、策略，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共产党确立了抗日战争的军事理论，提出了“持久战”的方针，阐明了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相继阶段的战略，消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干扰，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

人民战争的理论，则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思想武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特别是十年内战的经验，把已经形成的人民战争思想运用于民族解放战争，制订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日的战略和方针，充分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形成势不可挡的抗日洪流。为了贯彻人民战争思想，必须开展战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以之与正面战场的作战相配合，形成抗日的燎原大火，“兵民是胜利之本”，绝不能仅仅依靠国民党军队实行的片面抗战。

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社会基础。共产党人深知为了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乃至暂时的同盟者，使得全国各族人民聚集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共产党人作了不懈的努力，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个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以及广大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为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民党的爱国官兵不顾军政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谋略和命令，在正面战场上抗击了日寇。

正是这种与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结合的爱国主义，谱写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曲。人民不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赢得了社会的进步。

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所以结出空前的硕果，根据就在于此。

三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乃是宋庆龄爱国主义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在对外缺乏独立、对内毫无民主与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爱国主义为了获致深广的社会内涵，它的理性必须蕴涵着挣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臻于富强的要义，即拯救和

发展中国。因之，从爱国走向变革就成为近代爱国主义深化与拓展的最初步伐。对宋庆龄说来，亦复如此。家庭的影响，“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孙中山的导向，加以“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薰染”（宋庆龄，《抗战意见》第30页），使她的爱国主义在初始阶段业已包含改革观念。她企盼“祖国要有一个根本性变革”。至于把爱国主义与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中国旧民主主义的高峰相融汇、相激扬，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无疑是宋庆龄的爱国主义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飞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这样：旧阶段的终结标志着新阶段的到来。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临到了自身的转换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揭开了世界和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使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忠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宋庆龄——和孙中山一样革命看到了“大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反思和探究，孙中山在晚年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高峰，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而对于孙中山后期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宋庆龄显然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不仅因为她出色地承担了助手的职责，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思想的双向影响。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宋庆龄的爱国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相融汇、相激扬，因而，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推向高峰。

正当革命风暴从南方向全国扩展，孙中山却因积劳成疾而非时逝世。在这严重的关头，极其悲痛的宋庆龄深为忧虑的是革命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严峻的形势业已展现，阴影和逆流正在革命凯旋行进中潜滋蔓长。她执着于救国拯民的真理，无畏地迎向错综复杂的斗争，付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但难以挽狂澜于既倒。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变和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路线错误，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代表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新军阀攫取了革命果实，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1927年春夏之交的腥风血雨中转入低潮。但是，辛亥革命的悲剧并未重演。斗争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实际是退却中的进击。实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伟大的战略决策开拓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经历了这次历史的剧变，严酷的实际向所有爱国者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论旧民主主义革命多么辉煌，总难摆脱悲剧的结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如是，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再次面临着意义更为深远的历史选择。

在中国革命处于极为困难的关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忠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孙中山把三民主义统称为“救国主义”的宋庆龄一刻也没有停息战斗，同时，开始了新的奋进。为了把中国革命的真相告诉世界，揭露叛徒的狰狞面目，她前往苏联和欧洲，在列宁和马克思的故乡先后居留了四年。在那里，经历了火与血的洗礼的宋庆龄“沉缅于书籍之中”（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8月14日），广泛阅读了许多书报，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她与先前聚集在当地的中国革命青年和不久前流亡的中国革命家——如邓演达等保持着联系，着重研讨了中国的农民与地土诸问题，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战士蔡特金、多列士等进行思想交流。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观念更为具体丰富地展示了她的自我超越的内涵，她认为当前中国革命仍以反帝反封建为标的。因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乃是桎梏中国发展的主要枷锁。所以，必须“击败”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应当“全力应付”，“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宋庆龄选集》第8页）同时，人民还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是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

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能有任何进展”。（《宋庆龄选集》第31页）。现存的国民党政权已成为革命对象；它已经沦为“欺压群众、祸国殃民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代表”。至于革命的主力军非工农阶级莫属，它们“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建设新自由中国的新柱石”。（《宋庆龄选集》第18~19页）在革命领导权这个至关紧要的重大问题上，宋庆龄明确树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坚信“唯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宋庆龄的思想飞跃，表明她认同和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而，得以科学地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领导力量、主力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可以断言，她在30年代初成为社会主义者，并在后来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让自己的终生不渝的信仰和理想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深化和拓展。

因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投降这个历史时期，宋庆龄的爱国主义高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她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飞跃相应，她的爱国主义愈益自觉地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无愧为当时的最先进的理论和实践。而作为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帝——抗日战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乃是克敌制胜的必由之路。宋庆龄的爱国主义以之构成理性的内涵，充分体现了时代的趋向和历史的必然。

确认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显然是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她从十余年的斗争实践中深切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当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经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悟而把认识上升到理论。她认为“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

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因之承担了伟大历史使命，领导着“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农民从事斗争”。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她还在1927年就已指出它是“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和“最大动力”，并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30年代初期确认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唯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宣称“中国有一个共产党，这就是新的希望所在”。（爱泼斯坦，《宋庆龄》第336页）这种至关重要的确认，集中表现为她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深刻和全面的理解。她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视为中流砥柱，在与共产党的步伐一致中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

对人民战争理论的科学认识，则是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又一主要内容。在日本军国主义猖狂进攻的关头，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形成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才能消灭法西斯。“兵民是胜利之本”，宋庆龄充分肯定了工农阶级的中坚作用，指出“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而且，他们还是“建设新自由中国的新柱石。”（《宋庆龄选集》第18~19页）在她看来，“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27页）她发人深省地提问道：“谁能想象不唤起全体人民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就能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呢？”唯一的正确答案只能是“要使人民广泛地组织起来，掀起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她尖锐批判了国民党当局片面抗战、压制群众的错误方针，十分明确地指出：“有人认为中国要免受日本的侵略可不必唤起民众运动，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因为“只有民众群起保卫国家的独立，中国才能够得到解放。”（《救亡日报》1937年10月16日）宋庆龄不遗余力地从事人民战争的实践，致力于唤起和组织民众的各项工作，不断揭露和打击国民党

的倒行逆施，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给予了一切可能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社会基础，所以，也就必然成为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疑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还在30年代之初，宋庆龄就已意识到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团聚一切可以团聚的抗日力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她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对仍在“围剿”红军的蒋介石集团的罪恶以及共产党内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干扰，没有影响她对剧变形势的判断，未曾妨碍她对中心任务的把握。她坚信，“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这力量是我们的抗日持久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好保证。”宋庆龄认为“‘民族’的意思就是说，全国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政党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它的目的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保卫我们共同的全民族独立。”至于“统一战线”就是所有合作的党派必须一致面对敌人，团结互助，以御外侮”。她的这种扼要的诠释，赋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当然，她非常清楚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地位与作用：前者是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舵手，后者则是执政党并统治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前者的领导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后者在一定时期和程度上可能参与抗战。因之，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面抗战具有“头等重要关系”。宋庆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和实践，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于全党确立后更为自觉。她与共产党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接受了毛泽东和共产党请她“利用国民党中委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的委托，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竭尽全力促成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她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大声疾呼，“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

国家的完整。”她对国共两党重新联系的建立和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均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持久战是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军事理论，因为它完全符合中日两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曾对这个课题作了科学的阐发，它构成了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合乎逻辑的。她通过观察和思考，断言亡国论及各色民族失败主义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所以如此，“因为第一，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不能作持久的战争”，“日本工业的基础不健全是很明显的”；“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已经表面化，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弱点之一”，此种“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于中国人民的长期战争的”。第二，“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第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后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宋庆龄选集》上卷 165～167 页）宋庆龄在这里还批评了武器决定论的偏颇，指出“武器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仅只依靠“军事技术是不能决定战争的”，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无疑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她相信“革命人民只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她更以史为鉴，列举了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北伐战争、淞沪抗战和红军反“围剿”的事例，论证了中国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不仅“在战场上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将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反之，日本侵略者最终必将“自取灭亡”。“日本的武力只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这就是她所作出的精辟论断。与此同时，宋庆龄也说明了战争不可能速胜，只能是一场持久战，这是因为“日本海陆空军的技术装备远胜于中国的军队”和其它许多因素使然。

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争取人民民主，乃是反对妥协和

分裂、坚持抗战和进步的关键。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包含了这个重要内容，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蒋介石集团的社会阶级本质决定了这个政权的反共反人民和对外妥协的特性，而为了得以推行倒行逆施的政策，就必然要实行独裁和压制民主。宋庆龄于此有着深切的感受和认识，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时刻不忘发扬民主。她曾多次指出：特别是在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阶段——当前国内的主要任务就是“民主与团结”，严峻的现实是：“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只有反对独裁，扩大民主，才能制止妥协，防止倒退。正是这样，她紧紧抓住民主这个中心环节，反复申明“缺乏民主也许就是对共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最大威胁，并且给那些想破坏它的人以绝好的机会。”例如，“战时自由中国之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她认为当前中国虽有两个大党和几个较小的党，“但是并没有一个充分的民主的代表机构，使每一个党派都能够根据它的党员人数和影响大小而在战时政府中担当适当的任务。”她批驳国民党当局散布的“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和战时“民主有害”的谬论，指出“由于国民党是当权的政党，在重庆实行一党专政，所以扩大民主政府是它的责任。”（《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1页）对于蒋介石集团迫害共产党——抗日的中流砥柱和民族、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的反动行径，宋庆龄予以彻底揭露和有力反击。“皖南事变”发生后，她立即拍案而起，要求“制止内战祸国行为”，保证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在她看来，“陕北和敌后根据地”正是“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所以“反动势力”进行“压制人民和人民的积极性，惧怕并且破坏民主运动而给敌人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中国的抗战就摇摇欲坠，节节失利”。宋庆龄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对促成抗战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起了重大的作用；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壮大，才能赢得胜利和进步。

昂扬的国际主义精神，无疑是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鲜明特点。她的国际主义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突出了各国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的共同团结主题。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具有世界性。日本军国主义决不会以宰割中国为满足，它的魔爪必会促向更广大的空间：“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宋庆龄选集》第84页）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同时也是对其它国家的“威胁”，“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自由”。因之，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决“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而“确乎有着国际意义”。猖獗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肯定无疑地是“人类的敌人”。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宋庆龄致力于组织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勋业。中国抗日战争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支援了中国抗日战争。宋庆龄的国际主义思想和实践，使她无愧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宋庆龄的爱国主义发展过程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自身的高峰；蕴涵了丰富的理性内涵，结出了空前的硕果。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是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应当继承和发展。

抗日战争的光辉结局无可置辩地证明，爱国主义只有与当代先进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才能使人们对祖国命运与前途的关怀有所附丽，才得以使祖国获致拯救和发展。今天，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只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祖国才能成为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也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宋庆龄

杨雪芳 张 鸣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总结了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尤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丰富实践，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统一战线是我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敌制胜的政治优势，历来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发挥非党人士代表人物的独特作用，是我党统战工作行之有效的一条基本经验。从毛泽东、周恩来到许多领导人都一贯重视这一问题。毛泽东曾经用一根头发和一把头发非常形象的话来比喻说明党外代表人物背后联系着广泛的群众，加强对非党代表人士的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长期以非党代表人士的特殊身份出现，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对建立、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开拓者、组织者和实践者。可以说，宋庆龄的统战工作是我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试图通过宋庆龄关于国共合作的实践来论证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凭借她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对抗日统一战线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杰出贡献，论证

爱国主义是党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以及发挥非党代表人士作用对当今的重要意义。

一、宋庆龄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杰出贡献

1. 为建立和巩固第一次国共合作而努力

宋庆龄一生具有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践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她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贡献则大大丰富发展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她作为孙中山的夫人、战友和得力助手，为促成、巩固和发展这一伟大事业，做了大量的、切实有效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践，使她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她受孙中山思想影响是最直接的。她后来在回顾总结孙中山之所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时，指出：“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以历史眼光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体系的第一声丧钟”。在俄国“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束缚，第一个工农国家建立起来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的人民的国度在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的建立，标志着人类道路上的一个新转折，表明社会制度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已经开始”^①。孙中山看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深远影响，同时认为它“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的枷锁的榜样”。孙中山认识到他原来的救国方案必须修改，他不断寻求使中国人民能够获得解放的蓝图。“正当他在寻求新出路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最早的代表接近了他”^②。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在上海，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一次会见中，讨论建国种种问题，约数小时“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在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和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宋庆龄始终参与其事，使她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加深了对十月革命和国共必须合作的认识。孙中山逝世后，她继承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坚定地同国民党内新

老右派的分裂活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发表声明同孙中山先生事业的叛徒实行公开的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破裂了，但宋庆龄为促成并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所作的贡献将永载史册。她是坚决反对蒋汪集团的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她在与蒋汪决裂的同时积极从事支持共产党人的斗争，深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2. 为促成和发展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作贡献

(1) 抗战前期为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而努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时刻，全国亿万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当局却坚持内战，消灭共产党。他们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卖国求和协定，一再发动数十万军队“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屠杀要求抗日的学生。宋庆龄所在地的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遭到破坏，进步人士惨遭杀害。旅居苏联、德国达4年之久的宋庆龄，1931年8月因母病逝回上海。她目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万分气愤。当她得知蒋介石杀害了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邓演达之后，更是怒不可遏。于1931年12月19日发表了著名的《宋庆龄之宣言》，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宣言》无情地揭露蒋介石国民党个人独裁、争权夺利、剥削群众、残害革命者的种种反动行径。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她坚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这是宋庆龄继1927年7月14日声明后的又一次严正声明，标志着她在思想上出现了新的飞跃，成为她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开始。

在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热潮的推动下，宋庆龄又投入了新的战斗，这一时期，她实际上是主张建立一个统一战线。首先，以实际行动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在淞沪抗战中，她同何香凝等冒着枪林弹

雨，亲赴真如、吴淞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同蔡廷锴等亲切交谈，并为处于困境的十九路军募集款项和物资。还同杨杏佛、史量才等一起动员各方面力量(包括海外援助)筹建伤兵医院。1932年2月，她还致电高尔基，要求声援中国人民的淞沪抗战。高尔基旋于3月2日在《消息报》发表《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一文，指出援助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她还高度赞扬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十九路军，指出：“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④宋庆龄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使抗日将士深受鼓舞。

宋庆龄为了争取抗日和民主，她同社会上层著名人士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于1932年12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央临时执委会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胡愈之等九人组成。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同盟”的宗旨在于支持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斗争。它是一个对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公开、合法斗争的群众团体。正如邹韬奋说：“孙夫人向来主持正义，国际闻名。由于他们两位(指宋庆龄和蔡元培)出任正副会长，该同盟的力量更为增强，在国际宣传上也更为有力。”从宋庆龄所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可以看出其言论和工作都是密切配合着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的，如争取公民权利、赞扬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号召抗日，反对内战等，都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相吻合的。“同盟”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为祖国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这些营救工作，都是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紧密配合进行的。此外，宋庆龄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与国际上反帝、保卫和平的运动。

由上可见,宋庆龄在抗战前期,实际上已经在从事发动和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她注重团结各界人士,其中有军界、政界、新闻界、文化界,还有外籍人士和上层著名人士等,凭着她广泛的社会联系,团结了一大批人,自觉地配合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政策展开了有成效的斗争。但是必须看到党对宋庆龄的态度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在三十年代初期,由于“左”倾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在他们认为除共产党外没有真正革命力量的思想指导下,一度不仅没有很好地去团结宋庆龄,反而认为“国民党各派完全是反动的”,把宋庆龄支援十九路军的行动视为“敌人的欺骗阴谋”,说什么“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要和中间派划清界线,不能和宋庆龄、冯玉祥等接触。”^②这样就严重影响了中共在白区工作的开展。然而宋庆龄自己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不管别人如何对待她,凡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她都积极大胆地去做,她自觉地抵制那些错误的做法,而与党的正确措施配合默契。自1934年5月下旬起,共产国际在策略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保加利亚和共产国际政治活动家季米特洛夫首先提出新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应联合社会民主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季米托洛夫还说服斯大林转变策略,变下层统一战线为上层统一战线。季米托洛夫在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上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次会议具有重大指导意义。随着共产国际策略思想的转变,中共党内“左”倾策略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提出要“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力量,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由宋庆龄及其他有可能参加的一切名流学者、新闻学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等,来签署《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同时,指出:“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使是军阀同国民党内部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要尽量利用。”^③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为开展抗日救国斗争开始重视宋

庆龄的作用，从此党和宋庆龄的合作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2)全面抗战期间，为促成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作贡献

宋庆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于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宋庆龄以《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与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迅速获得各界人士的拥护。1935年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宋庆龄和何香凝、柳亚子等率先响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她全力支持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各党派、各团体、各社会阶层、各族各界同胞和海外侨胞以及广大爱国官兵的爱国行动，把争取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作为己任，在促成国共两党正式接触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她为国共两党接触牵线搭桥。华北事变以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进行了政策调整。他一方面仍调集大军继续“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又悄悄地进行政治试探，想同共产党秘密谈判，这种试探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最早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传给中共中央的是通过宋庆龄。尽管宋庆龄早与国民党政权决裂，后来也一再声明拒绝担任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任何工作。但她时刻关注时局的变化，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以民族利益为重，欣然答应宋子文的要求与中共联系。这样，国共两党中断近十年的联系，在宋庆龄等的努力下接通了。后来，她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敦促国民党尽快实现国共合作。1937年2月15日，宋庆龄出人意料地出席了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这是她在大革命失败后并在1931年宣布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死亡以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这一非同寻常的政治行动正是反映宋庆龄又一次从民族大义出发，为贯彻争取“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⑥抗日救国这一意图而采取的行动。在这次会上，以宋庆龄、何香凝为首的爱国人士与以汪精卫为

首的亲日投降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宋庆龄作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严厉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恐日”病。她大声疾呼：“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同时强烈要求“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宋庆龄的见解得到冯玉祥、李烈钧等国民党 14 名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委委员的呼应。她的浩然正气给予与会者以深刻的印象。这次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3 月下旬，蒋介石不得不秘密请周恩来到杭州开始两党谈判。

1937 年 3 月至 8 月，国共两党的代表就合作抗日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在此期间，宋庆龄先后发表《儒教与现代中国》、《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等文，反复阐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又先后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等，指出：“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②她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并与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还无情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搞磨擦，分裂和破坏国共合作的种种阴谋。她通过保卫中国同盟的刊物《保盟通讯》（英文版），以《坚持统一战线》为题发表长文，最先详细报道了新四军遭袭击的经过，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使世界各地许多人从中第一次知道皖南事变和蒋介石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实。由于她在贯彻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为使抗日统一战线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助了一臂之力。

宋庆龄的突出贡献还在于把统战工作一直做到海外，在中国人民与国际上进步友好人士、海外华侨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她通过保卫中国同盟这一机构，团结了许多中外著名人士，并

通过《保盟通讯》向各人民和华侨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还向许多国家募集医疗器械、药品、现款及其他物资，运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她先后介绍斯诺、马海德、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去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二、爱国主义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宋庆龄之所以能为国共合作作出如此重要的贡献，根源在于她本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她的爱国主义的内涵概言之就是拯救祖国、献身祖国，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一个孕育、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她出生在一个接受过欧美教育的传教士兼革命党人的家庭。其父宋嘉树是启迪宋庆龄思想进步的第一位老师，他是个深受民族苦难，流落海外拼搏谋生、回国后逐渐发迹的爱国资本家。他经常给宋庆龄讲述他早年在美国的经历、旅美华侨所受待遇与痛苦以及在异国他乡对自己祖国兴衰存亡之关切等。这些教诲深深地印记在小庆龄的脑海里。当时，孙中山与宋嘉树已是革命战友，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孙经常来宋家商谈反清事宜，宋庆龄被他们的谈话所吸引。正如她后来所说：“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来，就忘了一切——家庭、学校等，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却担心着中国。”^④宋庆龄在少年时代就培养起朴素的爱国主义，这对她以后决心献身祖国革命事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宋庆龄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和投身大革命洪流 的实践，使她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培养和加强，而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国斗争中，这种爱国主义又得到了高度的发挥。

宋庆龄除了与众多的为了救国救民，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近代志士仁人具有共性——强烈的爱国主义之外，还突出表现在她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融合于爱国主义之中，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从对共产党的崇敬到与共产党合作到

接受共产党领导，坚信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道路，就这样她把救国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地联系起来。

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处于严重危急关头，她及时地把救国和抗日紧密地联系起来。明确指出：“救国运动是以团结抗日为目的，我们目的在抗日。”^⑧她强调大敌当前“一切政治上的分歧都成了次要的问题”她认为由于“高度的爱国主义起来代替了军事割据，使国家有了精诚团结的希望”。^⑨因此，她满怀信心地说，团结起来的民族“是不可征服的。”宋庆龄以国事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积极组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努力。由她出面领导的救国会运动，团结各界抗日人士，使群众斗争冲破了狭小的范围。从秘密的地下活动转入争取公开的合法运动。她把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提高到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和维护全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来看待，因而她不遗余力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走呼号。就这样她把爱国主义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结合起来。

她还善于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她反复宣传我国的抗战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国际援助。她说：“中国不仅单为了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⑩指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惨杀的和非人道的破坏方法，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他们对于所有民主国家以及人类的和平与自由，也同样是威胁。因此，制止日本侵略以增强中国的抵抗力量，这对于许多国家是有利的。“从这共同的基点上，我们有着呼吁你们援助和支持的权利，”^⑪她对争取外援的观点十分鲜明，强调我们必须而且一定要摆脱一切对外的屈从和依赖。她说：“为我们的国家和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⑫这反映了宋庆龄既要争取外援又不依赖外援的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宋庆龄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国际统一

战线的思想。

三、充分发挥非党代表人士的独特作用 是我党统一战线的基本经验之一

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重视宋庆龄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她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她坚持和继承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毛泽东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肯定。他说：“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并要求她利用国民党中委资格去做国民党中央一批元老的工作，以促进蒋介石政策的转变，她都遵照执行，使国民党中央形成了一股赞成合作抗日的进步力量。周恩来在评价宋庆龄时也指出，她“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在国际上影响很大”。^④我党则因为团结了宋庆龄，很多抗日群众团体与组织，由宋庆龄这样具有崇高威望和影响的非党人士的头面人物出面来领导，有利于广泛地争取群众，争取合法和公开地进行活动，可以更有效地与国民党政府抗争、据理力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起到了共产党员所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正如周恩来总理生前深有体会地说，“我们有几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⑤正因为如此，尽管宋庆龄早在1937年就曾经提出过入党要求。而且根据她的世界观转变和实际表现，已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但是党还是希望她留在党外，考虑到这样可以对革命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她完全从党的事业出发，服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党对她的要求，尊重党的意见，暂时留在党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党中央没有从组织上吸收她入党，但一直把她作为重要人物来加以保护和关心，在她周围有一批共产党员不断引导、鼓励、帮助她进行工作，而她也紧紧依靠共产党进行活动，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国民党蒋介石对她进行

监视、跟踪、甚至威吓，但由于有共产党领导和广大群众作为后盾，使她更加坚定不移。类似宋庆龄这样的非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者还有相当一批人。例如何香凝、鲁迅、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他们在中国革命中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以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树立中华民族的正气，对提高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政治觉悟作用极大。正如陆定一在1982年10月访宋庆龄在上海故居题辞中指出：“农民革命战争和白色恐怖下非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者的出现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其所以如此，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腐朽，除了共产主义以外人民没有其他出路。”

当前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同样要充分发挥非党代表人士的独特作用。非党代表人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组织、领导才能的优秀人物。他们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和较大的影响，我们要注意培养和选拔非党代表人士，逐步建立起能与我党长期合作的包括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新老结合的代表人士队伍，以巩固国家政权，稳定政治局面，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地发展。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把非党人士代表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并通过他们，团结更广大的群众，把一切爱国的即使暂时不同意社会主义的人们都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为祖国的统一和中华的振兴，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作者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法系中国福利会联络处）

注释：

- ①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85、388页。
-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7页。
- ④ 刘晓，《十年内战初期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一些斗争》，《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一辑。
- ⑤ 王明、康生两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61 页。
- ⑦ 《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 54 页。
- ⑧ 〔美〕斯宾塞：《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第 22 页。
- ⑨⑩⑪⑫⑬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86、192、202、204、386 页。
- ⑭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51 页。
- ⑮ 转引自爱泼斯坦著《宋庆龄》第 530 页。

抗战与民主

——宋庆龄关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指导思想

盛永华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近7年中，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全力以赴，领导着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斗争。

关于抗日救亡，宋庆龄一贯的指导思想是：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能取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只有实现国内民主，才能动员全国人民以全部力量参加神圣的抗战。

宋庆龄认为，国共合作是实现民族大团结共同抗战的核心；实现国内民主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提条件；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实现国内民主和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宋庆龄深切理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民主革命的总任务。因而，她认为抗战与民主，是中华民族得到拯救和发展的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为此，宋庆龄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担任着实际的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进行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活动，对于民主与抗战的关系，进行了大量而深刻的系统论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作出卓越的贡献。

—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华北事变，宋庆龄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断定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抗日救亡的

最大阻力。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争取国内民主，把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民主权利”夺回来，是抗日救亡的先决条件。因之，宋庆龄自觉地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一致的“抗日反蒋”的立场。在此期间，她不断撰文及发表公开谈话，反复论述反蒋是因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而中华民族要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解放，必须在国内实现民主。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上的讲话》、《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等文中，集中地反映了她的抗战必须民主的观点。

(一)宋庆龄认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国内民主是抗日救亡的先决条件。她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建立和维持独裁统治为首要目的的蒋介石集团，竟然电令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②致使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东北四省全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驻守淞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抗战，蒋介石政府却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在这种退让妥协的反动政策的鼓舞下，日本侵略的战火从东北烧向华北并一步步烧向内地。与此同时，从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的兵力达到五十万，并由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随着内战的越打越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也愈烧愈旺。

宋庆龄在分析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原因时，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自己身上”。因为“中国人民要抵抗日本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阻挠人民抵抗，禁止抵制日货，不援助义勇军，摧残人民的民权。”更有甚之，“国家的主要军队用来打自己的人民与中国的工农，不去打日本人。”^③

她声讨蒋介石集团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痛斥“国民党还在削弱我们广大劳动群众的抵抗力，国民党对于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予以镇压。国民党以最残酷的方法镇压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在它的统治区域里的义勇军。国民党动员了一切可用的武力，来大规模地进攻苏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商谈秘密条件，将东北和华北奉送给日本，而把其余的中国领土贬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④

宋庆龄认为，蒋介石政府的所有这些倒行逆施，是由于这个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个政权“是由日、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成的，是服务于这群利害冲突的主子的”，所以它“镇压中国民族求解放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群众运动。”^⑤同时，这个政权又是“地主及资产阶级联盟的代表”，因而“它怕武装的人民比怕帝国主义的侵略者还厉害”。据此，她断言国民党政府“绝不能统一中国，绝不能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⑥蒋介石政权的媚外政策，在日本大举侵略的时候，只能助纣为虐。

为了扫除抗日救亡的障碍，必须对一贯对外退让妥协，对内专制独裁的南京政权进行坚决斗争。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正在“努力于中国的统一完整”而奋斗，“这个奋斗与中国劳苦民众反对剥削的奋斗是不能分的，与中国民众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的奋斗也是不能分的。”^⑦换言之，中国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是不可分的。在当时，进行抗日救亡与争取人民民主是不可分的。“只有在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像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因之，宋庆龄号召中国人民“在进行着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⑧

（二）坚信中国共产党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实现社会解放的中流

砥柱，确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示了出路。”^②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在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在国内率先公开喊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响亮口号；11月，刚刚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动员全民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反蒋抗日路线的明确表述。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特别是1931年以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导致对形势和阶级关系的错误估计。他们孤立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盲目地作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还导致在国统区工作的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则采取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永世的反革命”，把反蒋的中间势力看成是“帮助国民党维持统治”的敌人，甚至认为国民党左派因为可以“欺骗”群众，而比右派更危险，他们对宋庆龄亦采取不信任，不联系的错误态度。因之，尽管许多共产党人在东北、华北以及华东等地组织领导着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但是被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没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没能争取群众的绝大多数，成为举国上下团结抗战的领导核心，反而使革命陷于濒临失败的险境。反而指责“统一战线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③

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错误，宋庆龄感到困惑与痛苦，但炽烈的爱国情怀使她置个人的恩怨荣辱于不计。基于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及民族解放斗争的内涵的科学认识，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与规律的科学认识，她深知无论是为挽救民族危亡，抑或是帮助危困中的中国共产党以继续推进中国革命，她都不能不高举抗

战与民主两面大旗。

当宋庆龄公开宣布“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表示与完全堕落的国民党决裂的时候，她把全部的希望和信任寄托于处境十分艰危的中国共产党，确信“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①确信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开辟了“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②宋庆龄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国民党高压政策造成的万马齐喑的黑暗中，听到了民族得以独立复兴、人民获得民主自由的阵阵春雷。她满怀激情地宣布：“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在中国存在了许多年，这个事实便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将走上这同一条道路的希望、诺言和保证。”^③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中国革命几乎濒临绝境的危急关头；在广大人民群众困惑、失望、寻求出路的时候，宋庆龄以孙中山事业坚定继承者的身份，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中流砥柱，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路线。对于推动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进程，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可估量的。

(三)呼吁“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以“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④

应该指出，宋庆龄在进行“抗日反蒋”的时候，已经注意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她认为全国人民总动员，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她要求“人民广泛地组织起来，掀起对帝国主义的抵抗，肩并肩地在一支不可征服的队伍中前进，用民族革命的精神来反对中国的一切敌人。”^⑤并且坚信“只有在人民千百万地奋起的时候，中国才能获得解放。”^⑥

民族统一战线，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重要法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也就是向蒋介石独裁政权发动冲击，推进国内民主的过程。因之，对于统一战线的认识与实践，成为衡量政治家、革命家是否成熟的重要尺度。宋庆龄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而逐步发展，她在“御侮会”筹备大会上的演说及领衔发表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表明她的全民族抗战的思想已经形成，而且开始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在实际斗争中，宋庆龄参与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救亡团体，是为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了尝试、宣传及实际的组织工作。只是在当时的情势下，还不可能建立包括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妥协投降的蒋介石集团在内的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已。

二

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全民抗战的可能性的时候，宋庆龄力促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进而实现全民族的大团结，坚决抗击日本的侵略，并且明确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使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实现国内民主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基础。

日本侵略者继占领东北四省以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在冀东建立伪政权，野心勃勃地将侵略势力进一步伸入中国的内地。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和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使蒋介石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的现实；而日

本侵略势力的深入，已经影响到蒋介石政权的稳固存在以及它所代表的美、英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它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对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及国内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有了科学的分析和估计。还在北上抗日的途中，于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会议，确立了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外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写道：“日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①

由于各方面的合力，组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有了极大的可能，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有力地把可能性推向实现。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建立的可能性的时候，作为成熟的革命家，宋庆龄紧紧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武器，全力以赴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而且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促国共两党携手合作，进而实现全民族大团结，共同抗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其核心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这不仅

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而且南京政府统治着大部分国土，没有其参加便不可能实现全面抗战；而中国共产党却代表着当代最先进的思潮与运动，她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胜利之路。拒绝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便会使抗日战争失去正确的方向和中坚力量而归于失败。宋庆龄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因此，她首先着力打开国共两党沟通的途径。她及时转达国共两党谈判的意愿，协助安排双方的磋商，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她还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起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的建议，^④恢复了已中断十年的与国民党的关系，出席了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利用国民党的讲坛，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为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穿针引线。

同时，宋庆龄利用一切机会和各种渠道，反复阐述她的联合抗敌的思想。她指出在国际上“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在国内，“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宋庆龄特别强调，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⑤她提醒国人和国民党中枢注意，中国共产党已经表现了高度的民族责任感：“近十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共产党希望与政府合作抗日的诚意，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很清楚的证明。他们曾尽一切努力来维持中央政府与东北军之间的和平。释放蒋介石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张的。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力量来保持中国的团结。”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进行了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十年内战，“而共产党非但没有被打败，反而成了抗日的先锋。”^⑥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中流砥柱。可见，国共两党是否能合作，关键在于国民党方面。宋庆龄痛斥国民党当局仍然执行反共政策，不断散布“抗日必先剿共”的论调是极为“荒谬”的，造

成了“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的惨痛后果。她大声疾呼“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⑧

(二)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建设国内民主和实现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宋庆龄的抗战必须民主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要群众行动起来，政府必须结束训政时期”；而为了实现国内民主，“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核心——国共合作，关键也在于“要与共产党讲和，只须实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⑨

关于实现国内民主，宋庆龄强调必须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两方面给人民以彻底的民主：

①经济上的民主，在人民如此贫困、国力如此孱弱的中国，“必须实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尽快振兴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才能造就打败日本物质力量。因此，“政府必须解除对群众运动的箝制，发扬群众对建设的主动性和热情”，以“促进我国的农村建设和工业化”，使国家经济高速度向前发展”。孙中山民主主义的实施，有赖于“允许人民群众性运动的自由发展”。宋庆龄把在经济上实现民主，视为“建设国家、稳步发展工业和交通以及改善农村经济的一个先决条件。”^⑩

②政治上的民主，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国民党“必须结束训政时期”，还政于民。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具体步骤即“尽速召开国民会议”，实行“群众真能参加的选举制度”，以便“吸收有才能的人，不论他是什么党派，到政府中来。”国民政府还必须放弃对人民的高压政策，“立即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实行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⑪宋庆龄要求马上建立的这个民主联合政府，是体现了全民

抗战思想和人民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宋庆龄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发展。

宋庆龄进而指出，要实现国内民主，就要“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因为三民主义“适合于目前中国的情况”，而“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工具”。她特别强调：“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

宋庆龄在这个时候重申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以此作为促成国内和平一致对外的理论根据，作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基础，是适时的、切实可行的。这不仅由于新三民主义曾经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涨，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历史经验，而且还因为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只有孙中山的旗帜，才能成为团聚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各阶级、各阶层、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内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战斗旗帜——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一直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继承者；毛泽东当时也曾经申明：“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毛泽东强调“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宋庆龄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者、参与者，作为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的坚定继承者、捍卫者，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呼唤实现国共合作和民族团结，一致对外，反抗侵略，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促成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起着不可代替的积极作用。

三

宋庆龄既然提出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作为国共合作和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基础，那么，她就必须对其内涵加以阐发，捍卫其革命民主主义的内核，使确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基础的，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精髓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而非被蒋介石们所歪曲、阉割及儒教化了的“三民主义”。

宋庆龄对于新三民主义革命内涵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批判儒教而进行的。1937年4月，宋庆龄发表了题为《儒教和现代中国》的长篇政论，这是她为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的重要理论活动。

(一)、宋庆龄通过对孔子学说的封建专制的阶级属性的分析，揭露推崇儒教的蒋介石政权反民主的独裁倾向，指出儒教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重障碍，必须加以彻底的扫除。

宗教化了的孔子的学说，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被历代统治者作为钳制人民思想，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理论武器。九一八事变后，则成为蒋介石政权的不“攘外”专“安内”的反动政策的遮羞布。

在蒋介石不顾华北顷将遭到东北沦丧一样的厄运，亲自在南昌督率五十万兵众对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第五次“围剿”，并配合着在国统区实行严苛的文化“围剿”的同时，他在南昌发起了一个以宗教化了的儒学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亲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以后又任“总会长”。“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人以礼、义、廉、耻为行为的准则，规定了十分繁琐的内容，但中心都是围绕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要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目的是如此之清楚，那就是以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人民的思想，使其绝对服从于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并消弥人民对于侵略者的反抗斗争。

毋庸置疑，“新生活运动”，是作为尊孔崇儒的载体而存在的。

宋庆龄对蒋介石鼓吹尊孔复古，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十分明瞭的。在全民抗战即将实现的时候，宋庆龄对儒教的批

判,正是基于警惕并揭露蒋介石的独裁倾向,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基础而获得巩固和健康发展而进行的。

首先,宋庆龄从革命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对儒教的历史地位及作用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指出它的“封建的、专制的”本质。她从孔子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以及孔子的复杂的言行中,分析他的阶级属性,考察他活动的社会功能,明确判定维护和强化封建秩序,是孔子毕生思想和实践的主流。宋庆龄确认孔子是“为封建社会创造了礼教”,并为“加强这种封建秩序”而“根据历史的传统创立了他的学说”。孔子及其门徒认为“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必得“由贤明的官吏统治”才能保持稳定与安宁。因之儒教是以“服从”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核心,主张“服从是一切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具体说来,“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子女必须服从父母,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统治者和帝王”。为“使人民服从”,孔子及其门徒还“创造了一整套礼仪来加强秩序。”^⑧由此,宋庆龄对儒教的实质作出明确的界说:“孔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封建的、专制的。”^⑨而且,孔子的学说被历代统治者根据需要而更加强化其封建专制的消极——反动的方面,并使其宗教化,以此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宋庆龄既然判明儒教的封建主义的阶级属性,便可以断言“只要一天封建制度存在,就一天需要孔子文道。”^⑩宋庆龄正是通过对儒教的批判,从而揭露以“封建主义哲学”——孔子学说为理论基础的蒋介石政权的封建专制的性质,指出他们“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所谓安定社会,只是一个幌子。”^⑪揭露他们鼓吹尊孔崇儒,不过是为了“安内”——独裁而已。

宋庆龄特别指出:“孔子强调对家族的义务,而很少提到对国家和整个民族的义务。”^⑫因此,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儒教是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重障碍。为了团结抗战,挽救民族的危亡,“我们必须清洗中国人的头脑,”把儒教的影响“从我们的生活与思想中的每一个角落清除

出去”，“从我们的头脑、教科书和我们的内心清除出去。”^⑧而代之以“适合于目前中国的情况”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二)论述儒教与三民主义的本质歧别，指出新三民主义“适合目前中国的情况”，着力阐发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真义。

蒋介石们既要以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自况，口口声声要尊崇孙中山的遗训，以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本，又要借重于宗教化的儒学作为其独裁统治的理论基础，他们就必须对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进行阉割与歪曲，并强行把它纳入儒学的轨道。

针对蒋介石们对孙中山思想的歪曲篡改，宋庆龄在批判儒教的过程中，着力驳斥那种把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与儒教混为一谈的谬论，切中要害地指出两者的本质区别：“正如孔子的儒教代表着专制、压迫和人民的痛苦，孙中山主义就代表着民主和人民的幸福。”^⑨

因之，为促成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清除儒教，而“需要另一种思想意识。”这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为“这些主义适合于目前中国的情况。”

宋庆龄着力于阐发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真义。

她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当前即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保卫现有的国土”，“收复所有的失地”。^⑩为此，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是否能建立、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

对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宋庆龄坚决捍卫其“普遍民权”思想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原则。她说：“孙中山说过，革命若要成功，必须有工人农民参加政府。”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国民党更应该“帮助促进工农运动，邀请工人农民入党，然后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因此，她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训政”，立即召开有广泛群众性的，而不仅仅是只有

“国民党官吏和官僚参加”的国民会议。为了切实保证工农能够参加政府，就“必须立刻改变选举制度，实行普选。”^⑧宋庆龄的这些主张，体现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特定历史时期，人民民主的特定内涵。

最后，宋庆龄还指出“为了提高民族意识，并真正实行民主政治，我们就必须大踏步地实行民生主义。”^⑨根据当时的历史要求，宋庆龄此时所指的民生主义的内容，是发展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我们必须组织全国性的运动，来改善和提高农业生产中的近代技术”；以及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取消“对工人的残酷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改进农民生活。”^⑩实质上是要求在发展经济，为抗战胜利打下物质基础的同时，给广大人民群众以经济上的民主。

对于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抗战与民主，宋庆龄认为“儒教不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⑪作为儒教的载体的“新生活运动”也“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因之，用以武装全国人民思想的，应“是一种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儒教”。“我们不需要儒教”^⑫这就是宋庆龄的结论。

(三)论述只有实现国共合作，才是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遗训。

宋庆龄把蒋介石国民党是否实行国共两党合作，作为衡量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是否施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尺度。她在呼吁坚决实行孙中山遗训的时候，特别强调“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⑬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中，她以相当的篇幅，反复论述只有实现国共合作，才是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遗训。在这里，不妨稍详引述她的一段话：

“我们回忆一下孙中山所说的关于共产党的话，是有点好处的。他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

为什么国民党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在一九二四年，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纵然在今天，孙中山的话还是多么真实！”^④

宋庆龄严斥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口头许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政治犯、给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但这些事情却“一件还没有做”，虽然“内战已经停止，但是关于与共产党和解的事情，尚未得到任何官方消息。”^⑤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倾向，仍然阻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宋庆龄痛心于“过去五千年来，中国受专制之害太长久了。”为了抗日救亡，她强烈呼吁“让我们终于民主起来，创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⑥因为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属于人民的政府——即“必须有工人农民参加”的政府，才能领导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并获得胜利。

宋庆龄在全民抗战将要实现的前夕，高举抗战与民主的旗帜，对在封建社会中几乎总是作为官方哲学而处于“独尊”地位的儒教发起冲击，对蒋介石们“怀着别样的目的”而鼓吹尊孔崇儒进行了清算，这不特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而且在以后的八年抗战中，仍然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高举抗战与民主这两面旗帜，表明宋庆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有着科学的认识。因之，她在努力完成抗日民族解放这一特定的历史任务的时候，为推进革命总目标的完成，进行着多方面的奋斗，起着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作者工作单位：宋庆龄基金会）

注释：

-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136页。
- ② 同上书，第99页。
- ③ 同上书，第136—137页。
- ④⑤ 同上书，第85页。
- ⑥⑦ 同上书，第101页。
- ⑧⑨ 同上书，第137页。
- ⑩⑪ 同上书，第134页。
- ⑫ 同上书，第142页，第135页。
- ⑬ 同上书，第112页。
- ⑭ 同上书，第135页。
- ⑮ 同上书，第154页，第194页。
- ⑯ 同上书，第193页，第194页。
- ⑰⑱ 同上书，第167页。
- ⑲ 同上书，第192页，第194页。
- ⑳ 同上书，第195页。
- ㉑ 同上书，第173页。
- ㉒⑳㉑ 同上书，第174页。
- ㉓㉔ 同上书，第175页。
- ㉕ 同上书，第175—179页。
- ㉖⑳ 同上书，第176页。
- ㉗ 同上书，第177—178页。
- ㉘⑳⑳ 同上书，第179页。
- ㉙ 同上书，第179—180页。
- ㉚ 同上书，第166页。
- ㉛⑳ 同上书，第178页。
- ㉜ 《民国日报》，1937年9月27日。
- ㉝ 刘晓：《十年内战初期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一些斗争》，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辑。
- ㉞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8页。
- ㉟ 《毛泽东书信集》，第61—62页。
- ㊱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50页。

中华民族的团结是 取得抗战胜利的最好保证

华 平

在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我们深切怀念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丰功伟绩的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她在抗战期间倡导、促成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宋庆龄倡导和促成了中华各族人民 的大团结，实现了全民抗战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接着又于第二年进攻上海，挑起了一二八淞沪战争，并不断蚕食我华北地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进一步实现侵吞全中国、奴役全中国各族人民狂妄野心的彻底暴露。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帝国主义侵略已成为我国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一切政治上的分歧都成了次要的问题。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全民抗战是当时放在全国各族同胞面前头等重要的大事。

可是，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族大义，违背全国各族同胞的意愿，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的侵略节节退让，“绝对不抵抗”，对革命人民则实行围剿和屠杀，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立即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抗击日本的侵略，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除了在范围不大的苏区内得

以实施外，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很难了解和响应，因而无法组织浩浩荡荡的民族大军对日本的侵略进行有效的抵抗，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千百万人民遭日寇蹂躏。中国向何处去？许多人感到困惑迷茫，悲愤欲绝。

宋庆龄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她说：“中国有一个共产党，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①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她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成立了名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并担任会长。

宋庆龄的可贵之处是她拥护中国共产党但并不盲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治主张，她是自觉的、无条件的响应的；但是，对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她不但不盲目执行，而且坚决加以抵制。她通过学习革命理论、进行革命的实践，坚持了正确的原则和方向。在缺乏中共临时中央充分合作的困难条件下，她团结和依靠了可以团结依靠的力量，包括一些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共产党员，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独立地、创造性地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她冒着枪林弹雨亲赴淞沪抗战前线慰劳抗日的十九路军将士，称颂十九路军“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②1933年，她又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营救了大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由于宋庆龄的社会地位和她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她的抗日爱国的言论和行动理所当然也就使她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团结救亡的一面光辉旗帜。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以后，宋庆龄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就更加密切和默契了。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宋庆龄立即联合了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于右任、孙科等积极响应。1936年3月，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战议和一

致抗日通电》后，宋庆龄即在同年6月1日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救亡团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号召停止内战，抗日救亡。1936年9月，毛泽东写信给宋庆龄，对她抗日救国的言论表示“无限的敬意”，充分肯定了她几年来为团结救亡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同时又希望她进一步“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④宋庆龄本来早已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划清界限、脱离关系了，为了促进团结抗战，她明确地提出了“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民，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⑤她重新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资格，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合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案》，指出：1927年后，“内争突起，阵营崩溃，三大政策，摧毁无遗”是造成“革命归于失败，外侮接踵而来”的根本原因。她义正辞严地批驳了国民党“攘外必须安内”的荒谬论调，问道：“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再去抗战吗？”并指出“内战必须不再发生”。“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⑥“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⑦

由于宋庆龄的号召与推动，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治主张迅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与心声。要求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呼声响遍了祖国大地，抗日救亡运动此伏彼起，风起云涌。经过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这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二、宋庆龄关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是抗战胜利的 最好保证的论述是中华各族人民确立 抗战必胜信念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以至于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对于像中国这

样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能不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取得胜利是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的。这也是坚持抗战到底的中国各族人民与主张妥协投降的汉奸卖国贼以及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

诚然，当时的中国确实是贫穷落后的，加上战乱频仍，民生凋蔽，因而国力日衰；而日本帝国主义则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有数百万训练有素的陆海空军，他们的武器装备充足精良。有人认为，中日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中国根本不是日本对手。日本军国主义者也狂妄地宣称，3个月便可征服全中国。汉奸卖国贼更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借此鼓吹卖国投降。

宋庆龄旗帜鲜明地指出：大敌当前，“不是革命在中国的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征服和瓜分中国，别的道路是没有的”。^①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唯有“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死不当亡国奴，决不能贪生怕死，苟且偷安。其实，贪生者未必不死，偷安者未必能安，“人类唯有从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乃能从死中求生，险里求安”。^③“虽然我们 must 经历好几年很大的痛苦和牺牲，而这我们早已准备忍受的了”^④。民族的生存和复兴，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前提。一切真正的爱国者，不问其党派、信仰如何，都应在这个大前提下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针对有人认为“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的论调，宋庆龄一针见血地指出：“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⑤“单只军事技术是不能决定战争的”^⑥。因为，武器虽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但武器是要由人去使用的，人的精神力量比武器更为重要。“纵然事实上日本海陆空军的技术装备远胜于中国的军队”^⑦，但日本侵略中国是不义之师。日本人民本身也反对战争，不愿为日本军阀的黠武政策卖命。而“中国人都准备以最后的牺牲来保卫祖国，我们全体民众的义愤，足以补偿军器上的差迟而有余”。^⑧团结就是力量，中国军队

和人民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优势远胜于日军。因此，宋庆龄得出结论：“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野心，终于自取灭亡而已”。^⑧

宋庆龄用古今中外许多历史事实来说明：“革命人民只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⑨，她说：“法国人民在大革命中反对优势的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俄罗斯的工农击退一切帝国主义者的联合武力的斗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我国也不乏这样的先例：北伐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中国的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的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⑩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日军谓四十八小时可以消灭十九路军，某军事家谓日军三日可封锁中国，今十九路军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中国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⑪如果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从中阻挠。这次抗战本来是可以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的。宋庆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大量历史先例指示了中国人民的出路。”^⑫

宋庆龄精辟地指出，中华民族的团结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最好保证。“在这个我们所有势力的统一中，结集着我们最伟大的力量。”^⑬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中国历史是一部失败史、屈辱史。这是因为，过去的中国受反动腐朽的统治集团统治着，中国人民处于“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人民的意志无法体现出来。现在时代不同了“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⑭“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战争是一个事实，但革命形势同样也是一个事实”^⑮。“现在中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站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中国全部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精神、行动、意志这样的团结一致”，“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这力量是我们抗日持久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好保证”。^⑯在全面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宋庆龄就满怀信心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抵抗日本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收复失

地”，在不可征服的中国人民力量面前，“日本军阀只能发抖”，“日本的武力只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⑧不管日本军阀怎样的疯狂，不管日本军阀威力怎样，我敢代替全中国人民坚决告诉你们，日本军阀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⑨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完全证实了宋庆龄的科学预见。

宋庆龄尽心竭力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保证了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宋庆龄指出：“中国抗战的关键在于内部团结”。“国共之间的关系还是具有头等重要关系的。它们的合作就是团结的基础，它们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民族团结的危机。”^⑩“如果没有全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没有我们的两大政党的合作，没有我们军队与民众抗日运动的结合，以及对日本侵略的坚决抵抗，我们的民族革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⑪所以，当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以后，宋庆龄立即打电报斥责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⑫因为，宋庆龄知道，国共分裂，离开了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积极参与和合作，“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毁于一旦。”^⑬抗战将无法进行。宋庆龄说：“我们抗战前途所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能否保持下去，并非党派的问题，而是战还是降，为民族而战斗到底还是用卖国诡计使抗战瓦解的问题。”^⑭由于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以及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国民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实行国共分裂。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关系虽然出现过一些反复与曲折，从总体上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算还是保持下来了。这才使得抗战能够最后取得了胜利。

三、学习、研究和弘扬宋庆龄关于中华民族团结的理论和思想，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宋庆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如果说是

“时势造英雄”的话，那么，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造就了一大批为民族的生存，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仁人志士，他们是中国脊梁，是时代的英雄。而宋庆龄，则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代表，是其中的佼佼者。宋庆龄始终坚定地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代表全中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引导全民族团结起来，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她的声音，就是中国人民的声音，她引导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胜利的方向。宋庆龄之所以能发挥这样伟大的作用，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她的全力支持。宋庆龄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但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离不开宋庆龄。正因为有了宋庆龄这样的特殊人物，发挥了如此特殊的独特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治主张才能如此迅速、及时地贯彻实施，才能如此深入、广泛地动员起亿万人民，中国共产党才能如此有效地实现政治领导。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期间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

宋庆龄关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和理论是我们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巨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在前进，中国人民今天面临的历史任务与抗战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正如宋庆龄曾经说过的那样：“盖抗战建国之伟业，必须合我全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巨力去争取完成，绝非少数人所克胜任，所能完成。”^④我们为之奋斗的“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宏伟大业也是需要合民族之巨力才能完成的。因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仍然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庆龄关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和理论，至今依然焕发出耀眼的光芒，指导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我们今天纪念宋庆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最好的方法是认真学习和弘扬宋庆龄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她以国家民族利益大义为重，努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为实现她终生为之奋斗的“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遗愿而奋斗。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

注释:

① 转引自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 336 页。

② 刘晓:《十年内战初期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一些斗争》,《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2 年第一辑。

③④⑩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87 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61 页。

⑤⑥⑦⑧⑨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54、167、164、115、202、136、202、211、88、136、88、202、194、115、266—267、195—198、211、343、279、323、320、342—343、251 页。

宋庆龄论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

傅绍昌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在空前壮烈的抗日战争中，以她特殊的身份和世界的眼光积极而有力地向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宣传了中国抗战的重大国际意义。早在1937年9月，她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中国抗战“确乎有着国际的意义”的光辉论断。之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就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有过许多精湛的论述。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论述，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而且对于我们现在进一步认识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仍然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一、中国的抗战也是“为了全人类”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所挑起的，而日本法西斯则是发动侵略的急先锋。1931年秋，日本精心策划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之后，又不断制造事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于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中国各族人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开展了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气吞山河的瑰丽篇章。

但是，英、美等一些大国的领导人，对日本的侵略扩张一直采

取“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即实行纵虎为患的“绥靖主义”，在很长时间里根本不认识不承认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宋庆龄由于有世界眼光和国际主义传统，从日本侵略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她在对外宣传中严厉地揭露和批评了西方绥靖主义，并深刻地阐明了中国抗战与保卫世界和平、民主和进步事业的辩证关系。1937年9月，宋庆龄在《致英国工党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黠武主义者以及他们惨杀的和非人道的破坏方法，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他们对于所有民主国家以及人类的和平与自由，也同样是威胁。”因而，“中华民族的抗战确乎有着国际的意义。”她郑重宣告：“中国不仅单为了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①“也为了全人类”这个精辟的论点，决非主观的臆想，而是宋庆龄对历史和事实进行分析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体现了理念和事实，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首先，从日本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的反动实质来看。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军国主义势力逐渐发展起来，处心积虑地对外扩张，不断侵略中国。1927年日本政府首相田中在其向天皇的奏折中赤裸裸地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个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陆政策”的一个标本。按照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日本不仅要灭亡中国，而且要称霸亚洲，征服世界。

宋庆龄对日本大陆政策的反动本质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日本侵华伊始，她就预见到目前“瓜分中国的惨象”，“并将导致世界性的战火”。^②因此，宋庆龄一再以《田中奏折》这份反面教材来唤醒、告诫英、美等国，呼吁他们正视事实，放弃绥靖主义，认识中国抗战也是为世界人民而战的道理。1937年10月，她在《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的文章里说道：“被每个日本军阀认为是圣经的《田中奏折》，是放在一切协约之前的日本征服全亚洲的既定计划，全

世界人士对于这一点，是不是还需要我们来提醒呢？”^⑧事实表明日本不仅是威胁中国，并且是“威胁全世界文明的公敌。”目前日本的威胁，虽仅加于中国，“但谁能保证到了某种时候，这样奇特的态度不会从行动上危害其他民族呢？”^⑨随着战争的发展，宋庆龄又进一步指出《田中奏折》的设想正在加紧实施，“日本希望征服中国，用作征服一切太平洋国家，随后并征服全世界的根据地。”^⑩因此，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十分明显，它“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⑪

其次，从日本侵华直接危害各国的利益来看。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严重影响和损害了英、美等国在华的权益，同时也危及了他们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1937年9月，宋庆龄在致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代表团的信中指出：近两个月来，“日本帝国主义就已损害和破坏了英国在华的利益。日本轰炸机追击英国的大使，险些儿伤了他的命；日本军舰拦阻英国的商船，强求有上船检查旅客表和船上文件的权利；他们在香港的领海中滥扣并破坏海关的巡舰；单就上海而言，英国已有数百万元的财产被日本的军舰和轰炸机所破坏。虽然还没有宣战，而实际上日本已阻止了英国对华的贸易，英国的工业和商业已受了巨大的损失。……战争持续下去，那损失是必然还要增大的。”^⑫同时，她还以日本击沉在长江航行的美舰“帕奈号”，轰炸美国侨民，袭击美国教会医院，炸死了护士、医生和伤兵等事实，向美国人民指出：日本对华侵略，“也包含着对美国本身的威胁。”^⑬并说：“中国的胜利意味着美国的安全。”^⑭

宋庆龄这里强调日本侵华也损害英、美等国在华利益，决不是无视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历史，而是运用策略，利用矛盾，孤立日本，促进广泛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时通过这些事实，也确实可以看到日本侵华的真正目的，“是要剥夺中国的独立和太平洋地区各民主国家的利益”。^⑮对此，她有个形象化的

说法：“日本帝国主义正是目前最凶的一种传染病。它不会单在中国蔓延而不传染到其他自由的国土。”^④所以日本法西斯主义和黠武主义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的抗战既是为自己，也是“为世界各国人民而战斗。”^⑤

再次，从战争的性质上来看。宋庆龄认为“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是用以实施一种特定政策的工具。”^⑥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其罪恶目的不单是要灭亡中国，还要独霸亚洲，征服世界，“要用兽性的野蛮来代替人类的文明，要用中世纪的奴隶制度来束缚全世界的女性。”^⑦因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抗战，其意义必然超越国界，而具有明显的国际性，即中国抗战不仅要求民族自身的解放，还有在全世界制止法西斯暴行，保卫和平民主和自由而战的正义、进步的性质。正如她在1939年纪念国际妇女节集会上所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时也是在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保存民主、争取妇女权利的战争。”^⑧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宋庆龄自然而逻辑地得出了中国抗战也是“为了全人类”的结论。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也是历史所作出的科学结论。

二、中国的抗战粉碎了远东慕尼黑阴谋

宋庆龄认为，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不仅连欧洲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⑨而且还粉碎了远东慕尼黑阴谋，使中国得以保存下来，成为同盟国的最重要的抗日基地，这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在欧战爆发之前，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对日、德、意的侵略扩张不仅没有采取有力的制裁措施，相反实行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为虎作伥。这种绥靖政策的顶峰是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的签订。这个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了德国，从而大大助长了纳粹德国的侵略野心。

1938年底，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法西斯由于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的破产，对中国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新方针，并企图通过英、美等国压迫国民党向日本投降；英、美等国鉴于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欧洲战争风云日益险恶，更加迫切地希望在远东与日本妥协，企图把欧洲的慕尼黑阴谋搬到亚洲，以牺牲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战，换取日本承认它们在中国和远东的权益。一时间，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诱劝中国同日本“谋和”的逆流。1938年冬，英国即力图促成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停战讲和。次年，英、美政府又鼓吹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表示承认长江以北为日本势力范围。同年7月24日，英国同日本签订了可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正式接受日本要求，承认日本侵华造成的现实，宣布英国不干涉日本侵略行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活动，构成了远东慕尼黑的严重危机。

在这关系到中国抗战前途和世界人民命运的关键时刻，宋庆龄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揭露和谴责了国际投降主义者的阴谋活动。1939年7月7日，她在抗战两周年纪念日致美国友人的公开信中说：“我要求你们密切注意民主国家中的保守派”，由于他们害怕中国将“赤化”，“期望迅速结束远东的战争”，因而滋长“鼓励‘求和’与停战的空想。”显然这是一种“蠢笨行为”，它只能“助长侵略者的野心”，“破坏民主国家本身在远东的防御力量”，从而“导致我国的最终失败”。而这一失败，“将使日本易于扫荡民主国家在东亚的最后一点利益。”^①后来，宋庆龄又在《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中，进一步揭露了远东慕尼黑阴谋，并重申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她尖锐指出：“国际局势的变化使英美的一些集团的阴谋和希望复活起来了，它们企图使‘日本脱离轴心’，‘稳定太平洋局势’，缔结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从而帮助日本“达到政治的目的——使中国媾和投降”。^②但中国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是任何别的国家所出卖不了的。她庄严宣告：“我们将要与任何这种倾

向作斗争”。“宁愿战死也不愿作奴隶”的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侵略者作战”，直到最后的胜利。^⑨事实表明，正是由于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慕尼黑的悲剧才没有在亚洲重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始终屹立，使得日本侵略者泥足深陷，无法脱身，为亚洲以至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事业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三、中国的抗战迫使日本推迟“南进” 和放弃“北进”的计划

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地处苏联和南太平洋英美等国的属地之间，因而宋庆龄认为中国战场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的抗战对保障苏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安全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41年10月，她在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国的战争是远东局势的关键，并且不仅限于远东”。“它的国际的重要性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估计出来：它使日本在南方不能攫取英美的属地，在北方不能进攻苏联。”^⑩这就是说，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抗击和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打乱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部署，使它无法实现“北进”侵苏的计划，也迟滞了日本法西斯“南进”的侵略步伐。

宋庆龄这个评价完全符合事实，一点也不夸大。众所周知，向南洋扩张，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国策之一，1940年夏，德国发动“西方战役”，一举称霸西欧。日本估计欧战即将结束，于是决定利用德国的胜利，乘机南下，以攫取英、法、荷、葡在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属地。德国法西斯也积极唆使日本南进，期望它从东方打垮英、法等势力，以示配合。但日本拒绝了德国的要求。日本参谋长泽田道出了其中秘密，他说：“日本的国力因投入中国事变而余力不足。靠自力解决南方问题，实不可设想。”^⑪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的抗战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多么大的打

击和压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日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因而也根本腾不出手来，全力以赴，这就在太平洋战场上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英、美的打击。总之，中国的抗战不仅推迟了日本法西斯的“南进”计划，而且有力地支援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的作战。对于中国军民的这种伟大贡献，美国总统罗斯福是承认的。1942年春，他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掉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⑧

日本对苏联的仇视是根深蒂固的。日本陆军的主攻目标多年来一直是北方的苏联。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就指出：日本侵略东北后，企图将其造成“反苏战争的根据地”。^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之一，即为尔后“北进”作准备。但由于中国的抗战，使日本陆军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因而无力“北顾”。1938年6月，日本在《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的机密文件中指出：目前，“我们正倾注全力设法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因此，“不应在对苏关系上分配超过必要程度的力量”。^⑩这无异宣布“北进”侵苏难以实现。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不断要求日本配合行动，从远东夹攻苏联。日本法西斯深知这是实现侵苏宿愿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外相松冈力主当机立断，对苏开战。但参谋长杉山却认为日本“现在中国使用兵力很大，实际上办不到。”^⑪经过争论，最后决定放弃“北进”政策。苏联得此情报后，便立即从远东调兵到西部，在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由此可见，日本之所以未能配合德国夹攻苏联，使苏联得以避免腹背受敌、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主要是由于中国抗战捆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脚所

致。正如宋庆龄所说：一个民族独立的中国，是保障苏联，对付侵略的最主要的因素。”^⑧对此，苏联元帅崔可夫也曾以感激的心情说过：“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⑨

总之，中国的抗战迟滞了日本“南进”的侵略步伐，打破了日本的“北进”计划，对粉碎德日意的全球战略计划，起了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和策应了苏、美、英等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这是又一个历史性的贡献。

四、中国战场始终是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关键地区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庆龄认为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过程中，随着战争的发展，在全世界形成了几个大的战场，而波澜壮阔的中国战场却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她明确宣示：中国战场是东方的主战场，始终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关键地区”，甚至是“一个决定性意义的地区”，^⑩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就预见到“中国早就在战争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⑪如果中国已经开始了的局部抗战，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就可以“制止未来的屠杀”，成为“和平大厦的奠基石”。^⑫1937年卢沟桥炮响，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站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了。这时，宋庆龄连续发表文章，明确指出：日本侵略者是“法西斯魔鬼”、“国际恶棍”，所以“我们发动反抗这些法西斯暴徒的战争”，“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一切仍旧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⑬这就揭示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法西斯日益猖獗，欧洲战争爆发的前后，宋庆龄从世界风云

的全局出发，不断强调西欧和远东反法西斯斗争是密不可分的，从而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她指出：“日本强盗在东方，德意法西斯蒂在西欧，都已经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的企图和手段。”^①这个事实表明，“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中最危急的一个时代里。”当今世界的特点是：“和平与民主势力对战争与法西斯势力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的生死斗争。”在中国，这斗争早已开始，并采取了“公开战争的形式。”^②也就是说，“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公开的战场。”^③并强调说：“中国的民族抗战，是为保卫全世界的民主而战，它确实是民主国家与民主的敌人之间世界范围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④还郑重表示：“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我们将法西斯侵略者驱逐出大陆，解放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为止。我们将守住世界和平民主斗争的战线上的我们这一环。”^⑤显然，宋庆龄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即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宋庆龄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不仅重申中国是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而且明确指出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1939年10月，她在《致外国团体的信》中说：“目前法西斯侵略的浪潮已扩展到了欧洲”，但“远东前线依然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关键地区，它还将被证明是一个决定性意义的地区。”^①中国战场之所以能成为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关键地区，宋庆龄认为：一是中国的抗日战场开辟最早。在欧洲国家展开全面的抗德战争之前，中国人民就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全面的抗日战争。她说，当西方民主国家还在做着“绥靖主义”迷梦的时候，中国人民就和“笼罩世界的战争威胁作了斗争”。^②“两年多来，中国人民一直处在这个斗争的前列。”^③二是中国的抗战是阻止日本法西斯称霸亚洲的最大屏障。她说：“中国人口占人类的四分之一，几年以来，它一直是全亚洲的伟大屏障，阻止了日本法西

斯统治这个占世界人口半数的地区。”^⑧又说：“中国人民决不会放下武器，直到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被赶回他们在黄海彼岸的老家。一个自由的中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一个自由的中国，将是走向全世界和平和自由的第一与最重大的步骤。”^⑨三是中国的抗战还保障了太平洋两岸和全世界人民的安全。她说：“中国的战争是远东局势的关键，并且不仅限于远东，我们的继续抗战保障了太平洋西岸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未来。”^⑩又说：“我们四亿五千万人民，不做一个征服国的奴隶，为自己的和你们（指国外朋友）的自由武装起来了。这改变了太平洋两岸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未来的历史，并且使它更加光辉了。”^⑪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有所扩大的情况下，宋庆龄仍然强调中国战场无可动摇的重要地位。1943年9月，她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再次自豪地宣告：“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仍然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卫。”并说：中国人民“虽然作战的时间较久，但他们并不借此就要求丝毫减少作为一个同盟国家应负的责任”，现在，“他们正同所有国家的数百万兵士并肩作战，逐渐勒紧敌人脖子上的绞索。”^⑫次年，在《致美国工人们》的信中，又进一步指出：“今天，盟国的力量与中国自己的力量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击日本。中国战斗得越有力量，对日战争就越会缩短，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越会减少。所以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休戚攸关。”^⑬事实正是这样，在太平洋战争中，中国成为同盟国最重要的抗日基地，有力地支援了美英盟军的作战，为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罗斯福深有感触地说：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7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⑭

综上所述，在抗战期间，宋庆龄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从历史和未来的高度，最先全面、深刻、客观、公允地阐

述和宣传了中国抗战的重大国际意义。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鼓舞广大军民更加英勇顽强地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更重要的是突破了“绥靖主义”的怪圈,赢得了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广泛了解、同情和援助,促进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反日阵营的形成,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的完全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无疑也是宋庆龄为中国抗战作出的一个特殊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㊱㊲㊳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45、210、209、245、270、203、283、282、241、273、132、222、269、273、282—283、344、344—345、340—341、134、289、130、314、212、222、265、273、283、267、289、266、289、381、289—290、340、308、376、381页。

⑥ 《申报》1937年10月21日。

⑦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80—281页。

⑧ 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第49卷。

⑨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6—267页。

⑩ 《日本战略决定》,第74页。

⑪ 宋庆龄,《苏联的和平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援助》,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6月6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10页。

⑫ 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通讯社1980版,第38页。

⑬ 《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0页。

宋庆龄抗日战争思想与实践

吴宗明

宋庆龄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先驱，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始终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当今学习与研究她的抗日战争思想与实践，这对全国人民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一、以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必定胜利

1931年8月，宋庆龄从国外回到了上海，接着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沦亡，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从此，宋庆龄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行列中。

为了动员世界舆论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33年夏秋，宋庆龄在上海筹备和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的远东会议，她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关于我们怎样来对付帝国主义侵略，她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当时一些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提出：“你们既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白色恐怖，那末为什么不反对革命

中使用武力呢？”宋庆龄又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会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帮助他们来解除中国人民在目前和将来的斗争中的武装。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①所以，在淞沪抗战中，她对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以高度的评价。她指出：“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②

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宋庆龄认为没有一支革命的军队，人民和国家要克服千难万险而取得胜利，那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1934年秋，她以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名义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团体，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并创办《武装自卫》与《抗日先锋》等刊物，宣传中国人民唯一自救的救国的方法，就是用武装斗争，形成武装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在敌强我弱面前，中国人民能否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呢？宋庆龄认为日本海陆空军的技术设备虽然远胜于中国的军队，但单只军事技术是不能决定这次战争的。她针对国民党内存在的“恐日病”思想，指出他们过高地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这种错误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一方面，她总结了我国革命经验，如“北伐战争教导我们：革命的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中国的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③红军长征的胜利则又显示了一条客观真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一支尽管没有坦克、飞机或其他现代装备但有群众基础的军队，是不可能被拥有这一切武器但没有人民支持的敌人所粉碎的。我们对日抗战所

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和能力。另一方面，她又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国情，从日本而言，它是小国，资源缺乏，一些主要工业、军事原料都主要依靠国外进口，这在战争时期是一个致命弱点；而日本人民则是反对战争，因为他们是战争的最先受害者。再说日本的侵略已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它已处于孤立的地位，而日本的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因此决定了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从中国而言，“中国人民都自发地希望动员起来。中国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在这情形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即使中国不得不单独与日本作战，也不会打败的。但是中国是不会孤立的，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的同情。”^⑧所以，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

二、促进国共重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一片白色恐怖，由于当时党内居领导地位的“左”倾路线，在城市里的共产党组织几乎全部被国民党所摧毁，中共领导以前能在上海秘密进行工作，但后来也被叛徒告密而遭到破坏，不得不迁往苏区。因此，当时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实际上已成为留下来的共产党员相互联络以及同苏区，有时还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的唯一通道。

宋庆龄始终坚持孙中山的国共合作主张，在孙中山逝世后，她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广州和武汉的亲身经历中，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排除任何艰难险阻，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的唯一力量，是团结各种力量的核心，她曾对美国反法西斯战士达德教授说：“中国有一个共产党，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⑨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宋庆龄起了穿针引线作用。

1.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经过宋庆龄传播到了国民党统治区。1934年4月，中共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宋庆龄以《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并与何香凝等联合发表，要求

全民动员，一致对外，实行抗战，迅速获得各界人士的拥护。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宋庆龄和何香凝等率先响应，在全国造成巨大影响。

2. 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是经宋庆龄的努力送到陕北瓦窑堡。1936年1月，宋庆龄向正在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共领导，转达了国民党愿在这一基础上直接谈判的第一个确实信息。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她把一封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托付给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共产党员），与他同行的还有上海地下党的代表张子华，把信送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签署了一封复电，同意讨论具体问题，仍交董健吾带回。从此国共两党分裂十年之后又恢复了直接的接触。

当“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之际，毛泽东致信给宋庆龄，信中指出：“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⑧希望她在国共合作抗日中能发挥关键性的铺路作用。宋庆龄虽然对蒋介石深恶痛绝，但对他从内战到抗日的这一时局转变还是欢迎的。1937年2月，她自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遗嘱》的演讲，其中指出：“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打自己的兄弟，他们知道这是违背民族利益的。”^⑨全会不得不接受这一主张，决定同共产党谈判。宋庆龄为国共两党言归于好，重新携手，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感到异常兴奋。她在《国共合作之感言》中指出，我们要记取历史教训，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相信两党同志，经过十年以来长期的惨痛教训，再加上日寇无情的残酷的进攻，一定能够本“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诚信地友爱地

团结成一体。唯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⑧

国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使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宋庆龄在《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指出：“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竟成了结合全中国一切资源和力量以抵抗暴敌的媒介剂，过去的红军即现在的第八路军，已是国军的一部分，正加入作战。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就获得压倒一切的胜利。我们全国的团结统一，已发生伟大的力量，如堡垒一样坚固，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痛击。”^⑨从此，中华民族已经像一个巨人似地站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了。

三、动员全国妇女为抗日民族解放而斗争

宋庆龄一贯主张把妇女运动作为整个民族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反对战争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和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是一个不可分的斗争。”^⑩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犯下了滔天罪行，野蛮的南京大屠杀，千千万万妇女遭到了屠杀，受了凌辱，万万千千的母亲、妻子，失却了她们的儿子和丈夫，在这样残暴野蛮的敌人面前，她提出：“妇女们只有参加抗日才能解放自己！”^⑪

抗战起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敌人的暴行更促使妇女们加倍努力，团结在一起。首先以地方或职业为单位联合起来，然后再进而联合各地妇女团体，最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妇女组织，即“妇女指导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无党派的妇女参加的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宋庆龄为它的成立和发展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工作，这样就奠定了中国各阶层各党派的妇女友好合作的基础，并发挥了它的重大作用，宋庆龄指出：“占全国人口半数的二万万妇女，对于进一步巩固国内的团结，是有着一半的决定作用的。”^⑫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妇女和男子一样，她们为祖国的独立而

战。宋庆龄指出：“我们中国妇女在我国的生存斗争中是全面参加了的。在每一条战线上，都有成千穿上军装的少女。有的从事于实际战斗，有的在火线上从事勤务工作。在后方，我们妇女们负起了重大的任务，照顾伤员，替军队征募寒衣，收容和教育战时孤儿，进行文娱活动，用斗争的意义教育我们的人民。”^⑧甚至在边缘落后地区的妇女们，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在日本实行海上封锁后，通往外界的滇缅路和通苏联的西北公路，大部分是英勇的妇女们修筑的。

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宋庆龄指出：“在这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妇女人数不是以千计而是以十万计的，同时她们不仅从事救济工作而且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单在陕北，就有二千名妇女被选举担任地方行政上的各种职务。妇女团体负责饲养家畜、缝军衣、照顾伤员和小孩、帮助军属、检查行人等工作，而在男人离家作战的时候，就在田里耕作。她们还时常捉拿汉奸，在敌人中间搜集情报，守护水井和十字路口，以及执行其他有军事价值的职务。”“到过这些区域的人，都会谈起那里的妇女在生活的一切方面所起的作用，她们如何在战争中摆脱了过去的封建黑暗而得到一种崭新的地位。”^⑨

整个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的爱国妇女们，像对其他的人民一样，这是一个伟大的考验，宋庆龄自始至终领导着妇女界，不倦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努力。历史证明，中国妇女是经得起考验的。

四、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

宋庆龄遵照孙中山的遗教，不要使我们自己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她提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尤其要联合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共同制裁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联合日本、朝鲜、台湾各地爱好和平的大众，建立国际统

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⑥

日本攻占上海后，宋庆龄就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见转移到了香港。在香港，她就利用对外联系的方便，于1938年6月，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保卫中国同盟”的主要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向国际封锁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消息，不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抗日真相，通过《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等刊物，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广泛争取各国人民，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对中国的援助，募集医疗器材、药品、现款及其他物资，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人民抗日的战斗。

为了取得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援助，首先，宋庆龄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33年，她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必将“发展成为世界大火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⑦因为“日本希望征服中国，用作征服一切太平洋国家，随后并征服全世界的根据地。”^⑧“我们看到每次日本在中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它就加紧进攻太平洋的英国和美国的据点。”^⑨因此，目前日本的威胁，虽仅加于中国，但谁能保证到了某种时候，它就不会从行动上危害其他的民族呢？她告诉世界人民：“你们不要以为战争仅仅发生在世界上一个区域，昨天在西班牙，今天在中国，谁能保证明天这种死的恐怖不会降临到你们身上！”^⑩而中国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关键地区，也是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地区，它使日本在南方不能攫取英美的属地，在北方不能进攻苏联。因此，“一个自由的中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一个自由的中国，将是走向全世界和平和自由的第一与最重大的步骤。”^⑪

其次，宋庆龄指出，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援助，决不是单方面的什么恩赐，而是相互的援助。“抗日战争同时也

是在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保存民主、争取妇女权利的战争。在中国和西班牙，无论你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两国英勇的人民正在为世界各国人民而战斗着。你们现在帮助中国和西班牙就是帮助了你们自己。”^④宋庆龄《致英国工党书》中指出：“要是中国的抗战一旦失败，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也就完结。”^⑤在《致美国工人们》中也指出：“今天，盟国的力量与中国自己的力量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击日本。中国战斗得越有力量，对日战争就越会缩短，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会减少。所以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休戚攸关。”^⑥

第三，宋庆龄强调要把援助的重点放在敌占区中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她指出：“在中国的最大部分的日军不是在前线上跟我们的国军作战，而是在徒费气力，镇压成千成万的、在所谓占领区内长成的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⑦而人民军队则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但他们得不到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配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而且，由于不甘心做奴隶，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田地和工厂；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衣服和粮食。”^⑧我们需要尽一切努力来援助这些英雄们，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也是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当时有很多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经过“保卫中国同盟”的介绍，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创造的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白求恩大夫所建立的国际和平医院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世界各国人民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经济和医药的援助，宋庆龄指出：“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⑨

此外，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支援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将日本所毁灭的生产力重建起来。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这是由国际友人斯诺夫妇和艾黎于1937年秋在上海发起的,宋庆龄“百分之百的支持”,并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同时在国外建立工业合作协会推进委员会,竭力争取外援来发展我们的自救力量。宋庆龄认为工业合作事业,正是孙中山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工业合作社组织遍及全国各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地区共计近3,000个工业生产合作社,制造了大量军需民用物资,把数以百计的难民和工人组织起来,从事生产自救,这对支援抗战起了不少作用。在抗日根据地,通过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组织,按照民主方针进行了战时经济建设。因此,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宋庆龄作了高度评价。她指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生产者自身的运动,同时也是为生产者而发动的,若从社会和经济的立场上说,它是无价之宝。”^①它不仅为抗战提供一个巩固的经济基础,也为中国将来新的合作运动奠定良好的基础。

以上所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遵照孙中山的遗志,忠实地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担负起救国重任,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高举革命旗帜,坚持武装抵抗,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动员妇女抗战,团结国际友人,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她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也受到了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的仰慕和尊敬。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党校)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1、135、87、136、198、167—168、207、211、267、361、352、268—269、356、357、154、130、245、268、222、290、269、203、381、266、269—270、393、303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10月北京版

- ⑤ 《宋庆龄纪念集》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北京版。
-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北京版。

宋庆龄抗战思想研究

何继良

当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的炮声在中国震荡的时候，宋庆龄就以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坚定意志，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她坚信“中国不会亡”。她呼吁全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去夺取抗战的胜利。她斥责卖国求荣，妥协投降的可耻行径，并希望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及人民给中国的抗战以坚决的支持。在10多年的抗战历程中，宋庆龄写就了一系列理论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演说和谈话，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研究宋庆龄的抗战思想，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宋庆龄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思想情操，有着重要的帮助。

宋庆龄抗战思想，就其发展脉络来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九一八事变起，至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第二阶段是从五届三中全会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其主要区别在于：前一阶段强调反蒋抗日，后一阶段重在联蒋抗日，强调在斗争中求团结，求合作，反对妥协退让。

大革命失败后，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同蒋汪集团决裂。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和邓演达、陈友仁等人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

言》，指出：蒋汪窃取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旗号“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12月23日，宋庆龄致电蒋介石斥责蒋介石等“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而且包括你在内的国民党首领们甚至同派到殖民地中国的讨伐军头目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她坚定地表示：“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②1929年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为了表示她同蒋介石的根本决裂，她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庄严宣告：“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③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宋庆龄发表了著名的《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宣言，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宋庆龄揭露：“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也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私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的高位。”“过去北洋军阀政府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因此，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④

由上述基本立场出发，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宋庆龄一方面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站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第一线，另一方面，又从国民党的对立面立场出发，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行动。

1. 在这一时期宋庆龄的著作和讲演中，继续坚持了反蒋抗日的立场，在与萧伯纳的谈话中，宋庆龄斥责：“南京政府把最好的军队最好的军械军火，用来抵抗中国的农工，不用来抵抗日本。”^⑤宋庆龄认为，日本得以侵略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中国自己身上，中国人民要抵抗日本及其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阻挠人民

抵抗，禁止抵货，不援助义勇军，摧残人民的民权。国家的主要军队用来打自己的人民与中国的农工，不去打日本人。中国军队的领导权都在反动军队的手里”。^⑧宋庆龄强调：“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⑨“我们反日的最好办法，是只有加强我民族革命的力量。”^⑩这一时期，宋庆龄抗日反蒋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也只有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像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⑪也可以说，这一时期宋庆龄希望通过解决国内矛盾最终来解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2. 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工作中，宋庆龄也坚持了反蒋抗日的行动。就抗日问题而言，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宋庆龄率先表示支持十九路军的抗击。她明确表示：“至于抗日战事，当然主张积极抵抗到底。”^⑫并亲自到前线慰问十九路军的将士，还创办了伤兵医院，支持前线的抗战，给抗战将士以极大的鼓励。1933年，她创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1934年，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等人又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武自会成立后，即发表了《为对日作战宣言》，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这一时期，宋庆龄始终把“反蒋”和“抗日”活动联系在一起，只有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抗日救国开辟道路。她积极创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她积极支持救国会的抗日活动，并发起了震撼全国的救国入狱运动，等等。这一系列活动，都是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的。它有力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压制人民救亡运动的政策。

宋庆龄在这一时期坚持反蒋抗日的主张，主要是因为：

第一，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高潮。而这一时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压制民主，镇压国内的抗日民主运动。因此，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是当时进行抗日救亡的前提条件。

第二，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思考后，逐渐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因此，她的思想和观点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保持一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一系列抗日救国、建立统一战线的宣言，但其基本点，是反蒋抗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宋庆龄的思想渊源。此外，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背叛，以及宋庆龄对蒋介石个人的鄙视等，对其思想的确立，都有很大的影响。

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宋庆龄的思想演变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程。华北事变之后的民族矛盾上升、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等，都成为宋庆龄思想调整的重要原因。

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野心进一步暴露。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调整和改变了自己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直坚持抗日救国的基本立场。1935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的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针，随后，中央及时调整了策略，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193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除继续揭露国民党内战卖国政策外，再一次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也肯定了蒋介石对“最后关头”的解释，认为：“蒋委员长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

我们诚恳欢迎这种进步。”^①中共中央提出了国共重新合作的要求，并表示“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②

时局的变化和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对宋庆龄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加之宋庆龄本人对时局的认识，使她的抗战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反蒋抗日”发展到“联蒋抗日”。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一基本立场和思想，一直贯穿在八年抗战的始终。

宋庆龄抗战思想转变的一个显著标志，体现在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词和1937年9月作的《国共合作之感言》。由于时局发展的需要，宋庆龄出席了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十分令人瞩目的举动，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唯一出席的国民党全会。它也表明了宋庆龄思想的变化，那就是，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努力实现国共两党合作而努力。宋庆龄说：“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③1937年9月，经过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各方面的努力，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宋庆龄为之十分高兴和喜悦：“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从新携着手，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④“我相信两党同志，经过十年以来长期的惨痛教训，再加上日寇无情的残酷的进攻，一定能够本‘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诚信地友爱地团结成一体。唯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国走上独立解放的

胜利途径。”^⑧

在以后的抗日历程中，宋庆龄始终不渝地坚持全民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对于一切妥协退让，投降的言行，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驳，形成了一整套抗战的思想。

二

宋庆龄的抗战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不会亡，全民抗战、民族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获得抗战胜利的保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深入，宋庆龄以民族大业为重，大力倡导全民抗战，并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了信心。1937年8月，在日本全面侵华刚刚开始，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宋庆龄以大无畏的气概发表了《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以后，又在一系列的文章中，阐述了“中国不会亡”的思想。

宋庆龄表示，有人“说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我却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⑨“中国不会亡”的结论来自两方面的思考和论证。首先，宋庆龄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力量，最好是分析它的经济潜力和它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宋庆龄引用了大量来自日本第一手的确凿的统计资料，分析了日本的工业、农业、资源和资金情况，明确指出：“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够坚实，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战争“将使日本已很脆弱的社会经济结构面临新的困难，更加捉襟见肘”。宋庆龄的结论是：“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中国人民的长期战争的。”^⑩

其次，中国全民族人民的团结、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

立和坚持,是中国获得抗战胜利的保证。中国抗战伊始,宋庆龄就全力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战,1933年,宋庆龄就提出:“我们愿唤起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努力于这次解放的奋斗,努力于中国的统一的完整。”^⑨当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时,宋庆龄就认定,中国是不会亡的。1938年9月,在《致英国工党书》中,宋庆龄说:“中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站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这种精神,行动和意志这样的团结一致……所有的各党各派都一致联合起来,捐弃了过去的异见,大家集中于对付和击退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华民族是必然不会灭亡的,地球上没有一个力量可能消灭她。”^⑩宋庆龄认为:“我们各阶层人民的意旨一致表现在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这力量是我们抗日持久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好保证。这种意旨的一致是我们敌人所面对的主要障碍。”^⑪宋庆龄十分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把它看作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必备条件。她指出:“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是我们民族革命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没有全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没有我们的两大政党的合作,没有我们的军队和民众抗日运动的结合,以及对日本侵略的坚决抵抗,我们的民族革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斗争中产生的这些条件,是迄今为止我们获得成功的原因。”^⑫

2. 中国需要民主,争取民主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前提和目的。

宋庆龄抗战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民主”问题的阐述,她继承了孙中山的“民主”观,并赋予新的含义。在她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谈及和研究民主问题的文章很多,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国走向民主途中》、《孙中山与中国民主》等,它集中表达了如下的思想。

第一，争取民主权利的意义。宋庆龄认为，在中国争取民主权利，其意义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为了民主权利，工人农民将永远斗争下去，因为他们一旦得到了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权利，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更有利于发展他们争取最后解放的斗争的基础。”^⑧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正受着被帝国主义世界瓜分的威胁，……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的全面战争更加速了这一过程，谁能想象不唤起全体人民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就能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呢？”所以，争取民主权利的意义对抗战更尤为显著。宋庆龄提出：“凡关怀中国和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的人必须明白，要使人民广泛地组织起来，掀起对帝国主义的抵抗，肩并肩地在一支不可征服的队伍中前进，用民族革命的精神来反对中国的一切敌人，不论谁当权，群众都必将从他的手里夺回他们的这些民主权利。”^⑨“只有在政治民主的万丈光芒照耀下，我们才能发现投降派和卖国贼，才能进而解决我们的问题，加强我们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战争。”^⑩

第二，缺乏民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威胁。宋庆龄说：“缺乏民主也许就是对共同的抗日战线的一个最大的威胁，并且给那些想破坏它的人以绝好的机会。”“对第五纵队，潜在的妥协派和求和派有利。”宋庆龄认为，缺乏民主的现象很多，如“没有一个充分的民主的代表机构，使每一个党派都能够根据它的党员人数和影响大小而在战时政府中担当适当的任务”。^⑪又如，“必须同等看待所有的抗日力量，现在第一步就是取消不人道的封锁，这种封锁使得给敌人重大杀伤的游击队的受伤战士得不到必需的医药”。^⑫宋庆龄明确提出，缺乏民主的责任应由国民党承担：“由于国民党是当权的政党，在重庆实行一党专政，所以，扩大民主政府是它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政党里，竟有主张投靠罗马——柏林轴心，赶快和日本妥协的”。^⑬

第三，努力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还在抗战激烈进行的

时候，宋庆龄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趋向就提出了看法：“我们希望战后实现一个建立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的民主的中国，在中国里，工人、农民、工商业家、学者以及自由职业者都将享有同样的地位和权利。”^⑧对于国家的管理体制，宋庆龄继承了孙中山的观点，认为：“中华民国应由人民通过他们选举的代表直接治理，县或区应是自治的基层单位，也是选举国会代表的选区。”她强调：“这个制度只有在最充分、最广泛的民权的基础上才能成长起来。”^⑨

宋庆龄的民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她在抗战时期所阐述的民主观，已经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与虚伪。同资产阶级民主划清了界限，她站在最广大的人民一边，构建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新观念。

3. 只有团结一致，反对妥协投降，才能坚持抗战。

宋庆龄在不遗余力地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坚决反对妥协退让，强调团结抗战的重要作用。宋庆龄首先揭露，东京的军阀“和他们的爪牙曾经不断地企图削弱我们的抗战力量，他们所用的方法不仅是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施行赤裸裸的、残酷的恐怖手段，并且狡猾地提出‘妥协’的建议，以图征服我们的可爱的国家，他们曾企图制造我们之间的新的分歧，企图挑起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旧恨，以便分裂我们。”^⑩宋庆龄认为，抗战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全国人民“一心一德，精诚团结，戮力共济，方克完成”。而决不能三心二意搞什么妥协退让，对这种现象必须严厉打击。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一文中，她提出：“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严厉执行剥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⑪

对于汪精卫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和妥协，宋庆龄同样不断予以揭露和严厉的批评。1939年5月，汪精卫逃抵上海，着手组织

傀儡政府，并一再假惺惺地表示忠实于三民主义。宋庆龄揭露汪精卫。在大革命时期就是：“思想发生动摇者之一”，“难怪孙先生在离开南京的时候，发表演说，对汪精卫这些党员的认识的浅陋，表示异常不满。现在对汪精卫不满的，已是全国同胞，而这个卖国的汉奸，竟敢曲解孙先生的学说，随便加以涂改”。^⑧在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皖南事变反共气焰十分嚣张时，宋庆龄极为震惊与愤慨。她联合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他们的背信弃义，强烈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⑨

宋庆龄深知分裂和妥协对坚持抗战的影响，“我们决不能低估这种伎俩对今日中国团结的危害。”也决不能因为有妥协、退让现象，就因此分裂统一战线。她认为：“国共之间关系还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合作就是团结的基础；它们之间任何冲突都是民族团结的危机。”^⑩在这种形势是，国内主要任务是：“团结和民主”，“保卫中国同盟坚定地站在中国的团结，民主和继续抗战的一边，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⑪宋庆龄坚定地表示，敌人“只能够收买少数人人人知道的两面派、失败主义者以及那些只要阴谋一暴露就会被开除出党和政府的汉奸们，他们非但不能像他们所希望那般分裂我们，反而因为自己的原形暴露而巩固了我们的队伍和澄清了污浊的空气”。^⑫

4. 中国的抗战是一个对于全世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

宋庆龄对抗战的认识和思考，是放在世界这个大环境来进行的，她认为：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斗争。由此出发，她阐述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

第一，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庆龄认为：中国抗日战场，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关键地区，它还将证明是一个决定性意义的地区，……一个自由的中国，是远东和平的唯

一保障，一个自由的中国，将是走向全世界和平和自由的第一与最重大的步骤”。^⑧宋庆龄进一步阐明：“我们的继续抗战保障了太平洋西岸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未来。它的国际的重要性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估计出来：它使日本在南方不能攫取英美的属地，在北方不能进攻苏联。”^⑨宋庆龄对中国抗战地位前瞻性的认识，为实践证明是正确无误的。

第二，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你们自己。宋庆龄认为，中国的抗战是为世界人民而战，中国抗战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应该相互支援。她在抗战刚开始时就提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黠武主义者以及他们惨杀的和非人道的破坏方法，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他们对于所有民主国家以及人类的和平和自由，也同样是威胁。”^⑩宋庆龄认为：“我们中国人民和笼罩世界的战争威胁作了斗争，同时也为着你们的和平作了斗争。”“你们现在帮助中国和西班牙就是帮助了你们自己”。^⑪宋庆龄不断呼吁世界各国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支持和援助中国：“我们有权这样要求你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而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的，强大的和民主的中国，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⑫

三

研究宋庆龄的抗战思想，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和启迪，概括起来说，宋庆龄抗战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

1. 爱国性，在宋庆龄大量论述抗战的论文的演说中，爱国主义精神跃然纸上。第一，呼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在日本帝国主义大兵压境，要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时，她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战，为国家的利益斗争到底。她积极倡导国共两党和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并赋予国共合作以极高的评价。为了团结抗战，她改变了与国民党不合作的态度，出席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会，并亲赴重庆，与宋氏姐妹一起，共赴国难。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二，猛烈抨击卖国投降和妥协退让行径。对于抗战中出现的种种妥协退让的倾向和行为，宋庆龄始终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批驳，把其看作是分裂国家，分裂统一战线的无耻行径，她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和谈的幕后交易，抨击了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行径，斥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以实际行动捍卫了统一战线的完整。第三，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人士支持中国的抗战。她向各国人民进行了大量的讲演，苦口婆心，剖切陈利害，既说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希望各国人民能对中国的抗战伸出援助之手。

2. 科学性。第一，用辩证唯物史观作指导，抗战时期，宋庆龄已经完成了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她以辩证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思想方法来研究和分析现实问题。她的“中国不会亡”的结论，是基于对日本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深刻分析，和对于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充分认识而得出的。她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抛弃，更得力于对无产阶级民主的深刻理解。由于用科学的方法作指导，就使得宋庆龄的抗战思想充满了科学性。第二，对抗战发展规律，作科学的判断。宋庆龄对于抗战诸多问题的论述中，十分注意运用科学的思想武器，对抗战的发展作科学的判断。如她对日本侵华必然会影响太平洋地区的预见，对于抗战是一场持久、长期的战争的阐述，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等，都为以后的实践所证明是正确和科学的。特别是她对于中国前景的论述，有力地反对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企图，为广大进步人士和人民所欢迎。

3. 实践性。宋庆龄抗战思想的实践性，一则表现为它来自实践，无论是对日本和中国国力的认识，还是对中国抗战进程和规律的认识等，都来自于实践。她的杰出之处，就在于善于从理论的高度对实践过程加以概括和总结，得出诸如“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等结论。二则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一致。宋庆龄不仅在理论积

极倡导抗日救国,而且身体力行,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沿,以其坚定的革命精神,科学的人生态度、高尚的思想情操、高贵优雅的气质,赢得了国内外进步,友好人士的爱戴和崇敬。她的凛然正气使战友钦佩,使敌人震慑。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大学党委宣传部)

注释:

- ① 《邓演达文集》,第 332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② 《宋庆龄选集》(上)第 69 页,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③ 《宋庆龄选集》(上)第 72 页。
- ④ 《宋庆龄选集》(上)第 84 页。
- ⑤ 《宋庆龄选集》(上)第 93 页。
- ⑥ 《宋庆龄选集》(上)第 99 页。
- ⑦ 《宋庆龄选集》(上)第 136 页。
- ⑧ 《宋庆龄选集》(上)第 149 页。
- ⑨ 《宋庆龄选集》(上)第 137 页。
- ⑩ 《宋庆龄选集》(上)第 87 页。
- ⑪ 《六大以来》(上)第 773 页。
- ⑫ 《六大以来》(上)第 177 页。
- ⑬ 《宋庆龄选集》(上)第 167—168 页。
- ⑭ 《宋庆龄选集》(上)第 205 页。
- ⑮ 《宋庆龄选集》(上)第 207 页。
- ⑯ 《宋庆龄选集》(上)第 194 页。
- ⑰ 《宋庆龄选集》(上)第 197—198 页。
- ⑱ 《宋庆龄选集》(上)第 101 页。
- ⑲ 《宋庆龄选集》(上)第 201 页。
- ⑳ 《宋庆龄选集》(上)第 266—267 页。
- ㉑ 《宋庆龄选集》(上)第 279 页。
- ㉒ 《宋庆龄选集》(上)第 111 页。
- ㉓ 《宋庆龄选集》(上)第 112 页。
- ㉔ 《宋庆龄选集》(上)第 344 页。
- ㉕ 《宋庆龄选集》(上)第 343 页。

- ②③ 《宋庆龄选集》(上)第 383 页。
- ②④ 《宋庆龄选集》(上)第 343 页。
- ②⑤ 《宋庆龄选集》(上)第 342 页。
- ②⑥ 《宋庆龄选集》(上)第 278 页。
- ②⑦ 《宋庆龄选集》(上)第 267 页。
- ②⑧ 《宋庆龄选集》(上)第 225 页。
- ②⑨ 《宋庆龄选集》(上)第 297 页。
- ②⑩ 《宋庆龄选集》(上)第 322 页。
- ②⑪ 《宋庆龄选集》(上)第 343 页。
- ②⑫ 《新年致海外友人的信》，《革命史资料》(上海)1986 年第 3 期。
- ②⑬ 《宋庆龄选集》(上)第 267 页。
- ②⑭ 《宋庆龄选集》(上)第 289—290 页。
- ②⑮ 《宋庆龄选集》(上)第 341 页。
- ②⑯ 《宋庆龄选集》(上)第 202 页。
- ②⑰ 《宋庆龄选集》(上)第 266 页、269 页。
- ②⑱ 《宋庆龄选集》(上)第 274 页。

宋庆龄持久抗战思想探析

卢克贞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7年又以卢沟桥事变为借口，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日寇野蛮凶恶的侵略行径，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宋庆龄客观分析了中日双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形势，形成了自己关于坚持持久抗战的思想。她的这一思想，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宋庆龄坚持持久抗战的思想，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是不可战胜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侵华之时，企图速战速决，曾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国民党营垒中的亲日派则散布民族失败主义，宣称“中国是弱国，无所谓抵抗”。甚至鼓噪“战必大败。”为其叛国投敌做舆论上的准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虽已转向抗日，但对抗战能否取得胜利缺乏信心，仍寄希望于国际干涉，以取得体面的和平，同时，日军惨绝人寰的烧杀抢掠在一些人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恐日”情绪。在这种形势下，宋庆龄认真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指出：“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够坚实，经不起长期的战争。”^①1937年8月宋庆龄根据日本的经济潜力和社会结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经济上，日本是一个弱国，由于缺乏原料，日本的工业基础不健全；农业上日本农民深受多种剥削，农业产量逐年下降。因此，它的财政经济都很脆弱，不能做持久的战争，同时日本人

民本身反对战争，由于战争，日本劳动人民的负担大大增加，沦为赤贫，日本社会已经出现不稳定现象。日本劳动人民政治活动高涨，对黠武主义越来越愤懑。此外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其补充也很困难，如果战争爆发以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断绝与日本经济往来，那么日本就更不能长期嚣张下去。由此看来，“中国不但能够战胜日本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②

宋庆龄看来，我们则是另一种情况，中国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纵然事实上日本海陆空军的技术装备远胜于中国的军队，单只靠军事技术是不能决定这次战争的，中国人民是在为保持民族的生存而战，因此，中国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占有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没有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③同时她又从世界局势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抗战。中国不仅为了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日本法西斯黠武主义者以及他们惨杀的和非人道的破坏方法，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他们对于所有民主国家以及人类的和平与自由也同样是威胁。因此，中国的抗战将会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民主国家人民在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和帮助，最后，也是具有决定性因素的就是中国人民已决心抗战到底。胜利属于中国人民“是毫无疑问的”！^④宋庆龄的这些观点被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编写为《中国不亡论》，这本书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决心和勇气。“中国是不可战胜的”这一论断不仅有力地驳斥了汪精卫之流的“亡国论”而且它本身也成为号召人民奋起抗日的响亮口号。

二、唤起民众是坚持持久抗战的首要条件

唤起民众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其领导民主革命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后，得到的最有意义的经验教训之一。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伴侣和战友，对唤起民众与中国革命能否成功之间的关系认识尤为深刻。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

一就是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够胜利进军是与中国共产党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分不开的，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野蛮的侵略战争，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唤起民众的抗日激情，动员他们走向抗日第一线。宋庆龄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她在八一三前后发表的一些演讲和文章中，多次阐述了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对整个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大意义。批判了蒋介石政府对民众运动的包办统制政策和片面抗战路线。宋庆龄指出：“认为没有群众运动的支持就能把中国从日本侵略中解救出来，这是愚蠢的想法。”^⑥在日本强大的侵略攻势面前，单靠装备简陋的常备军是不能建立足以抵抗侵略的国防的，“但是在这常备军的背后却屹立着广大的人民，他们准备为卫国保家滴尽最后的一滴血，他们打起游击战来，将成为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日本军阀只能发抖”。^⑦

至于怎样方能唤起民众并动员他们投入持久抗战的问题，宋庆龄认为只有组织民众，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才能唤起民众，才能救中国于危亡。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以革命者的胸怀改变了长期不与蒋介石政府合作的态度，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议案，要求立即实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之后，她即刻敦促蒋介石政府“不在空言而在力行，不在号召而重实现”。^⑧并提出七项具体主张，包括惩治腐败，实行民权、改善民生、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等。对蒋介石政府借“训政”时期，对民众抗日运动横加干涉的行为，宋庆龄指出：“要群众行动起来，政府就必须结束训政。”^⑨中国现在必须准备收复失地，必须使群众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起来，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宋庆龄的唤起民众，动员民众举办抗战的主张在全国，特别是在国统区及时配合了对毛泽东持久抗战中人民战争思想的宣传，在为民众争取抗战自由方面产生了很大

影响。

三、坚持持久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反对妥协投降

宋庆龄着重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重大意义，她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看作是“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侵略者作战，保卫抗战的基础，”^⑩和抗战前途之所系，并表示相信“统一战线和所有抗日力量的合作是中国继续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的唯一保证。”在《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一文中，她重申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统一的力量，这力量是我们抗日持久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好保证。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全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没有两大党的合作，我们的民族革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她把统一战线看作是“迄今为止我们获得成功的原因”。^⑪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形成和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由于十年内战，国共两党之间形成了很大的隔阂，要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⑫因此，宋庆龄竭尽全力说服国民党改变其内外政策，来保证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与合作，她指出：“中国抗战的关键则在于内部的团结”^⑬，“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⑭，国共两党合作是团结的基础，“它们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民族团结的危机”^⑮。她在《国共合作之感言》一文中希望两党同志经过10年长期惨痛的教训，再加上日本无情的侵略，一定能够本“兄弟阋墙，共御外侮”的古训，诚信友爱地团结成一体，唯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国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分裂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她指出，如果没有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没有两大党的合作，要争取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她表示“对中国团结的支持决不动摇，对任何危及中国团结的事情坚决反对。”^⑯

自抗日战争一开始，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亲日派就有投降倾向，

只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日怒潮高涨，才不得不有所收敛。这样，在统一战线内部始终存在着坚持抗战和妥协投降的斗争，随着持久抗战的深入，他们即四下活动，发表妥协投降言论，分裂统一战线。加上国民党反动派所推行的“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一时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蒋介石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宋庆龄为抵制这股投降逆流，鼓励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发表了大量的演说和文章，严厉批评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方针，愤怒谴责汪精卫集团的变节行径。就他们制造摩擦，分裂统一战线的行为，她说：“我们抗战前途所系的统一战线能否坚持下去，并非党派的问题，而是战还是降，为民族而战斗还是用卖国诡计使抗战瓦解的问题。”^⑩由此可以看出，分裂即意味着投降，要坚持持久抗战，就必须反对分裂行为，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宋庆龄非常痛心地说，它“实足使抗战已成立之基础隳于一旦，一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有不堪设想者”，明确要求国民党今后必须绝对停止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为。”^⑪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汪精卫在向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中再次表示愿意与日本和谈。众所周知，在日本要灭亡中国的关键时刻，和平停战必使中国走向亡国灭种的道路，10月28日，宋庆龄即致电林森、蒋介石，要求政府对于“淆乱人心，影响抗战之言论，必当明令禁止，并向国际否认，而主和分子、必当摒弃”。^⑫1939年5月，汪精卫称自己的投降之举是出于：“爱护孙中山先生所手创之中华民国不忍灭亡于无识者之手中。”并窃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主义为自己的变节行为辩护。宋庆龄对他的无耻谰言斥责道：“此国家叛徒，竟敢盗窃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其恬不知耻有如此者！”^⑬由于汪精卫的叛变，日本帝国主义者竭尽其造谣之能事，散布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业已破裂，借以涣散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宋庆龄于汪伪政权成立之次日，与其姐妹联袂出现在重庆，以实际行动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同时她还指出：“际此民族危机

千钧一发之际，国内各党派均有一致团结对外之认识，日寇汪逆宣传国共分裂在即；只能说是他们的梦想。”^⑨

当然，宋庆龄的统一战线思想也包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她也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她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日本法西斯，援助中国抗战方面做出了许多杰出贡献。她所组建的保卫中国同盟成为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的一座桥梁。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列部)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版第198、166、197、195、224、196、341—342、345、343、341、329、343、326、345、320、323、259页。

②③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91、94—95页。

⑩ 尚明轩等《宋庆龄传》第458页。

宋庆龄的抗日战争战略思想

刘国友

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她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其博大的胸怀、战略的眼光、深邃的智慧，设计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蓝图——大战略，即坚决抗战到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的战略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方针、策略和方法。她虽然不是军队的统帅，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更没有参与当时的国家和军队的高层决策，却以其特殊的身份，崇高的威望，出色的活动，贯彻了她的战略思想，为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日本武力是纸老虎

正确认识敌我力量，增强民族意识，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第一位的精神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宋庆龄认为抗战的主流是好的，“中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站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中国全部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精神、行动和意志这样的团结一致”^①，但是，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日本在军事上暂时处于优势，其侵略气焰十分嚣张。日本是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之一。经济上，工业生产比中国发达；军事上，军队的装备和训练素养都超过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日力量对比，日本暂时处于优势的地

位，因此，日本法西斯十分狂妄，“凭着它的优越的武装力量，夸口说它在三个月内便可征服中国”^②，企图吓倒中国人民。

二是，国民党内部的妥协投降派竭力散布失败主义的论调。“一些政客依然不了解实际形势而害着‘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③“说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④抗战必败。

宋庆龄针对当时的“恐日病”和敌我力量对比暂时处于悬殊差别的情况，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进一步教育广大人民，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于1937年8月发表《中国是不可战胜的》一文，详尽而深刻地分析了日本的国力，提出了“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的英明论断。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宋庆龄认为日本在经济上是个弱国，其弱点主要表现为：

缺乏原料的储藏。日本每年都得从国外进口大量的铁矿、棉花、石油、有色金属、黄金与白金等。缺乏原料是日本对外战争的一个致命弱点，因为，一旦它所依赖的国家断绝对日本的供给，就无法坚持战争。

缺乏资本。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每年要投入巨额资金输入原料，这些巨额资金又必须以输出来偿付，在和平时期要做到这一点已非常困难，发动战争后输入原料成倍增加。因此，日本的贸易逆差急剧增加，仅1936年就达一亿三千万日元。

农业生产逐年下降。1929年日本的农业产量价值四百五十亿日元，1935年只合三百二十亿日元。1936年贫困农民负债达五十亿日元。日本需要输入五分之一的粮食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农民还受到地租、赋税和工业品抬价的剥削，生活更加穷困。

其次，从政治上看。宋庆龄认为日本农村社会的不安定已经表面化，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弱点之一。农民已经十分贫困，而政府为了维持军费又年年在增加赋税，这些赋税的大部分又落到

农民头上，因而贫困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有百分之七十的兵士来自农村。所以，农村社会的不安定必然要波及到日本军队及政权。

由此可见，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脆弱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中国人民的长期战争的。”因而其失败也是必然的。

与日本相反，中国的情况是，“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即使中国不得不单独与日本作战，“也不会打败的”。

总之，宋庆龄通过对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并与中国相比较，得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和必然要失败的论断。这个精辟论断和光辉预见是宋庆龄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

二、实行全面抗日的国策

为了实现抗日战争的战略目标，打败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的日本帝国主义，宋庆龄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实行抗日的国策。

第一，政治上——反对独裁，实行民主政治。宋庆龄认为要充分调动全国人民抵御外侮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她说：“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没有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有民主。”^①从历史来看，十年内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忽视了民权主义，为此，早在抗战前夕，她就提出“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等。^②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她又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中说：“照我看来，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允许人民群众性运动的自由发展”，^③随着抗战的发展，宋庆龄又通过正反两面的事实来说明实行民主政治的极端重要性。她说：“凡是民主制度最强大的地方，凡是发挥了人民的积极性的地方，凡是人民战争最不受掣肘的地方，中国的抗战在

那里也就最伟大和最有力量。相反地，当反动势力公开投敌，或者压制人民和人民的积极性，惧怕并且破坏民主运动而给敌人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中国的抗战就摇摇欲坠，节节失利”。^⑧宋庆龄还进一步指出，在抗战期间，中国军队间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民主，消除军事冲突、巩固国共合作的办法在于“实行改革以增进民主”。^⑨因此，宋庆龄在抗战期间，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实行民主，取消一党专政，如开国民代表会议、改革选举制度，使人民真正能够参加政府，在政府中有发言权，释放政治犯，实行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建国工作。总之，“只有在政治民主的万丈光芒照耀下，我们才能发现投降派和卖国贼，才能进而解决我们的问题，加强我们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战争”。^⑩

第二，经济上——改善民生，发展生产。宋庆龄认为改善民生，发展生产，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问题。她指出：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现在人民的生活极端穷困。“乡村中是一片贫困、疾苦和灾难的景象。我们的农民仍受尚未废除的封建残余势力的搜刮，以及苛捐杂税的痛苦。……城市中的失业问题正影响着劳苦大众。不仅工人的处境十分凄惨，青年知识分子也找不到工作”。^⑪因此，为发动群众，抵抗侵略，必须改善民生。也就是说“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有同样的重要性，应该同时并进的”。^⑫1938年，宋庆龄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一文中，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凡与抗战利益不相矛盾，而能改善民生之计，如救济难民，抚恤流亡，优恤阵亡将士家属及死难同胞，取消与禁止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斟酌情形豁免赋税或减低租税……等等，当努力实行，务使全国同胞乐于追随吾党，抗战到底”。^⑬

欲抵抗外来侵略，不仅要改善民生，更重要的还在于“经济上求强盛”，即必须“促进我国的农村建设和工业化”。为要进行这项工作，“政府必须解除对群众运动的箝制，发扬群众对建设的主动

性和热情”。^⑨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战时环境，宋庆龄认为，当时发展经济的最好形式就是“工合运动”，即“最近中国在内地乡村市镇间以工业合作社方式所推行的重建我们的轻工业的运动”。^⑩“工合”是为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种独特的经济力量，它为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三，文化上——发展战时文化，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文化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宋庆龄认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就是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汉奸、投降派的卖国罪行，歌颂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她说：“像自我牺牲这种军事美德，应该予以歌颂”。特别强调，为了使爱国主义的火焰继续增长，“我们的诗人、小说家、作家、画家和演员们必须宣扬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歌颂那些抵御外侮、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使中国的每个工人和农民都知道。”^⑪

第四，外交上——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宋庆龄认为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打败日本法西斯，虽然主要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取得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她就指出：“我们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必须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尤其要联合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共同制裁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联合日本、朝鲜、台湾各地爱好和平的大众，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⑫1937年，宋庆龄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的演说中又进一步强调，为了抗日救国，必须实行孙中山关于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教，她说：“虽然救中国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但是先总理曾指示我们，不要使我们自己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合作。全世界都同情中国的抗日斗争。政

府的任务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去利用这种同情。”^⑧

在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崇高的威望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上述主要抗日国策外，宋庆龄还提出了教育政策、妇女政策、华侨政策等等，在这里不一一叙述了。这些抗日国策保证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争取抗战的胜利、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战略的实质是对力量的运用。大国被小国侵略，根本问题是大国没有运用好力量。宋庆龄思考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造成一种抗日必胜的战略形势，提高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破坏日本军阀的心理稳定，最后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她说：“我们的立场是要求全国人民，不问党派，不问信仰，不问地位，实行真正的精诚团结，停止一切内争，”^⑨“立即对日抗战，这种全国团结一致抗敌的伟大力量，怎能不令敌人寒胆？”^⑩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旗帜是三民主义。宋庆龄认为，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广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民族救国纲领，也是孤立、瓦解敌人的最有力的武器。要把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要有一个各个方面都能接受的抗日救国目标。中国共产党已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⑪宋庆龄希望南京国民党政府能够执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忠实的执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她说：“我坚决相信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⑫“才可以救中国”。为此，宋庆龄提出，在抗战之后，

“将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的目标。这样，可使“民主国家中的保守派”，解除“害怕中国将‘赤化’”的疑虑，也使日本人“利用汪精卫为‘和平与反共’的阴谋破产。”^②所以，宋庆龄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始终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关键、核心是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在对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她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不计前嫌，及时地调整方针，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拥蒋抗日。宋庆龄认为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抗日救国的最好方法，“是只有加强我民族革命的力量”。^③也就是说必须“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④她一再强调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的唯一保证。”^⑤为此，宋庆龄把争取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自己的责任。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崇高声望，推动国民党统治集团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重新与共产党合作，并亲自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牵线搭桥，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基础是发动群众。宋庆龄认为抗日力量的源泉是人民群众，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得救。早在1933年，她就指出，中国正受着被日本帝国主义瓜分的威胁，“谁能想象不唤起全体人民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就能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呢？”^⑥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宋庆龄又强调：“只有群众起来保卫国家的独立，中国才能得救”，“以为没有群众运动的支持，就能把国家从日本的侵略中解救出来，这是愚蠢的想法。”^⑦基于这样的认识，宋庆龄积极从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她要求在农村中进行政治动员，“发动农民自动组织农民团体，由下而上，形成农民的坚强组织”，使“我抗战军事之后援力量，将

宏大而坚强”。^⑧她呼吁妇女紧密团结，在抗日斗争中创立“光荣的纪录”。她动员华侨从物力、财力、人力上积极支援抗战，“使潜在的华侨伟大力量，能充分发挥，贡献抗战，成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⑨总之，要“唤起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努力于这次解放的奋斗，努力于中国的统一的完整。”^⑩

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战略方针指引下，“所有各党各派都一致联合起来，捐弃了过去的异见，大家集中于对付和击退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华民族是必然不会灭亡的。地球上没有一个力量可能消灭她。”^⑪

四、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

中国的抗战是从反侵略中争取民族的解放和自由。抗战的正义的、进步的性质，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主要依据。但从力量对比来说，是敌强我弱，因此，要打败日本法西斯，争取抗战的胜利，除了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行全面的抗日国策外，还需要在军事上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对此，宋庆龄进行了深深的思考。她认为：“人是一切革命事业的决定因素”。^⑫抗日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使其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她说：“人民战争是一个经济落后与缺乏武装的国家所能击退一个优势装备的侵略者的唯一的武器”。人民战争在抗战中“最伟大和最有力”。^⑬必须唤起民众打人民战争。

打人民战争，必须做到“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这是人民战争的基础性工作，必须有胆量有魄力，把“各界同胞动员起来去参加抗日救国的神圣抗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工作”。^⑭宋庆龄要求，“迅予发动农民”，“扩大国际宣传及华侨宣传”，各工厂、学校、一切家庭、商店都应当讨论我们的抗日要求，“使他们觉悟现在时局的严重与未来工作的重大”。^⑮群众动员起

来后，“组织人民自卫团”，^⑧实行军事教育，进行军事训练，“学习使用机关枪，组织防空与其它军事艺术”。^⑨总之，“这是一个广义的反帝奋斗，最后形成武装人民抵抗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⑩

游击战是中国抗战的重要因素。宋庆龄从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出发，十分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她认为“游击战和动员战区的中国人民是中国抗战的重要因素。”^⑪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单靠装备简陋的常备军，中国是不能建立足以抵抗侵略的国防的。”而屹立在常备军背后的广大人民所开展的游击战争，“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给敌人重大杀伤”。敌后人民打起游击战来，“将成为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日本军阀只能发抖”。^⑫不仅如此，人民的武装还把“许多孤立的游击据点扩大为敌后强大的抗日根据地”。^⑬以抗日根据地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这些表明抗日游击战争不只是战术问题，同时也是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战。宋庆龄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后，确定了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她认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有着“强大的现代战争机器”，^⑭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军力等方面远不如敌人。战争开始阶段敌我双方的力量强弱对比，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日本是小国，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加之“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⑮而中国是大国，“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⑯特别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再加上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这些又规定了日本“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完全可以进行持久的作战，因而日本必然遭到最后的失败，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综上所述，宋庆龄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高瞻远瞩，形成她独特的完整的抗日战争战

略思想,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成为她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作者工作单位: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
⑞⑟①②③④⑤ 见《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01页、308页、165页、194页、378页、103页、195页、382页、343页、344页、166页、297页、225页、167页、246页、176页、154页、168页、162页、159页、168页、282页、149页、154页、328页、111页、177页、236页、252页、101页、201页、382页、142页、102页、102页、177页、102页、331页、195页、376页、275页、165页、1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3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32页。

宋庆龄的对日观

段云章

宋庆龄一向重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日本的观察尤为重视，其认识也与时俱进。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终于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对日观。它对历史进程有过重大影响。就其认识发展轨迹看，它是孙中山对日观的继承和发展。

—

从1913年8月宋庆龄与孙中山重逢于日本，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是中日两国间不断发生重大事件的12年。其间，孙、宋曾共同在日本度过近3年流亡生活，1924年11月又相伴访日，和日本各界人士多有接触。这是孙中山的对日观在宋庆龄的参与下，逐步发生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显著变化、最后确立的时期。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途中访日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希望日本改变政策、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中日两国携手合作、加强亚洲人民团结、以对抗西方列强压迫等方面的演讲、谈话，并且郑重指出：“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正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评审慎择。”^①伴同孙中山访日的宋庆龄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的演讲，从妇女问题的角度，表达了与孙中山一致的对日观。她恳切呼吁：共同为正义而斗争的“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

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④宋在这里讲的“动物本能”和“理性”与孙在同一天所作“大亚洲主义”演讲中特别提出的“霸道”、“正道”的含意相类似。

综上所述，孙中山晚年的对日观，实即宋庆龄的早年对日观。它是孙中山早年对日观的丰富和发展，又是宋庆龄最终形成的对日观的基础。概括地说，可分为以下3方面：第一，认识到日本军政统治者执意实行侵华政策、破坏中日两国亲善，扶植中国军阀，压制革命民主力量，企图在中国建立日本主宰下的殖民统治；但对其中某些人士如犬养毅等仍保有个人情谊。第二，寄望日本国民了解中日亲善的根本意义，摆脱日本对外扩张政策所造成的迷惘，群起抵制和纠正日本军阀的错误政策，实现中日两国人民的真正亲善和互利。但对某些以民间人士身份出现、却抱侵华意图的假朋友尚未完全看清；对中国人民必须和终必取得反对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的胜利抱有坚强信念，但又认为在当时情势下，日本凭藉其优势兵力，随时可以灭亡中国。第三，加深和扩大了中日人民同亚洲、世界被压迫人民联合反帝、共谋解放的理想，并有较前增多的谋划。

二

孙中山逝世后的中日关系，更充满着惊涛骇浪。尤其是30年代后，日本一方面加紧实施侵华步骤，通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举侵占了整个东北，继而伸其侵略魔爪于华北、华中，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淞沪抗战。1937年更制造了芦沟桥事件，公然向中国全面进攻，充分显露了日本要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野心。另一方面，日本和德、意法西斯势力紧相勾结，形成欧、亚两大法西斯策源地，图谋实现其征服世界的美梦。这就引起了中国和世界的各种力量的新调度和国际营垒的新调整，日本对华侵略与中国各界人士的反侵略，同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斗争连接起来了。这种显然

大大不同于孙中山在世时的新情势，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日本，宋庆龄更在前此具有的对日观的基础上，适时地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的认识。

首先，宋庆龄将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侵华列强之一的认识进到作为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对的十分凶恶残忍的法西斯强盗、“兽性的疯人”、“全人类的恶徒”的认识。她列数其由局部到“扩展其军事统治于全部的中国”、实行着“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大规模的残酷的虐杀”、“在中国，展开了比地狱还惨酷的场面”并使“全世界笼罩在疯狂的侵略者的毒焰里面，文明处在毁灭的过程中，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大众在战栗中生活”^⑧等等滔天罪行，指出它是中国人民当前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

这些最凶恶的敌人中，当然包括孙中山和宋庆龄有过接触、甚至对中国革命伪表过同情、支持的侵华重要人物。比如，孙中山对之既有谴责也有寄望的日本军部重要人物田中义一，到1927年担任首相时，以秘密上奏，提出先征服满蒙、再征服整个中国、最后征服世界的狂妄侵略计划而为世人痛责；与孙中山保持20余年私人情谊的头山满、犬养毅，还都参加过1929年的孙中山南京奉安大典。然而到30年代，头山满成为疯狂主战的日本法西斯政党大日本生产党和日本右翼集团的总后台，犬养毅则历来热衷于在中国实行经济扩张，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华实行强硬政策，出任日本内阁首相，不过仍为法西斯分子所不容，旋被刺杀。1923—1925年担任日驻广州总领事时，因其对广东革命政府持较“温和”态度而博得孙中山等人的某种好感，而到1934年他作为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却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其他如参预策划九一八事变、指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等重要战犯也曾插手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上述恶名昭著的人士虽未出现在宋庆龄已刊著作中，但其罪恶昭彰于时人耳目，无疑也是宋庆龄从日、英肇起的“五卅惨案”

起而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日益激愤的谴责对象。最使宋庆龄愤恨的是典型的两面派人物近卫文麿，他是“保全支那”、“中日提携”为标榜、而以扩张日本在华势力为宗旨的东亚同文会的创建者近卫笃磨的长子，袭封公爵，曾于1919年前著文批评英美所倡导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背后是利己主义，主张亚洲民族联合起来。1919年1月随西园寺公望参加巴黎和会，途经上海时，与孙中山、宋庆龄会晤于上海孙寓，与孙、宋侈谈东亚民族的觉醒与联合、抵制欧美列强侵略。^④到1937年，他却是发动全面侵华的日本内阁首相，并发表了要公然奴役中国的“近卫声明”，后因其在战时两任首相而被指控为战犯。宋庆龄于“近卫声明”发表后即在一次讲演中，在谴责日本是“非言语所能描述的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时，特别指出：“所谓日本的开明首相近卫文麿竟说‘日本的唯一方法是鞭撻中国，使之屈膝，使下再有战斗的精神。’这种残酷的言词，更放纵了嗜杀成性的日本的军阀。”宋还指出，与近卫相较，“日本其他的外交家是更为狡猾而欠坦白了”，他们继续把侵华野蛮行为“解释为奉天承命的神圣事迹”，是为了实现中日“合作”^⑤。这些揭露和批判表明宋庆龄对日本的公开侵略与欺骗两手都已有十分透彻的认识。

对于日本侵华野心之有进无已并能一时得逞，宋庆龄正确指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日本帝国主义得了英法帝国主义（注：宋后来还提到美国）的帮助，他们都瓜分中国。国际联盟给日本充分的自由行动，他们所努力的不过是帝国主义间的分赃权利与对于他们本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欺骗。第二个原因，在中国自己身上，中国人民要抵抗日本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阻挠人民抵抗，……国家的主要军队用来打自己的人民和中国的工农，不去打日本人。”^⑥

其次，对中日人民特别是对日益奋起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力量的认识，达到了很高水准。

尽管日本人民在对外殖民扩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皇道乐土等毒焰的蒙盖和法西斯暴力镇压之下，反侵略反战争的声音无法伸张，孙中山生前希望日本国民反对霸道、抵制和纠正日本军阀对外扩张侵略政策的呼吁，并未实现。然而，宋庆龄还是看到在艰难中开展的日本工农反战斗争，她表示，中国人民对受欺骗的日本工农和知识分子并无恶感，坚信战争“不仅限于被侵略国家，在法西斯支配下的劳苦大众，也遭遇了同样的惨害。”^⑧这就为包括侵略国家在内的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结成广泛反帝反战统一战线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她完全赞成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并以她与何香凝等的名义，将此纲领以《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公开发表，其中包括“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日本的劳动民众、朝鲜人等等）作友军”。^⑨

关于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长期侵略仇恨之深，孙中山曾多次谈论，并且为谋求抵抗而殚思竭虑。宋庆龄则进而从孙中山逝世后中国人民对日本步步进逼而激发的一浪高一浪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浪潮中，以及中国共产党发布的抗日救亡纲领及其领导的各种抗日活动中，看到了海内外华人的同仇敌忾和人民团结御侮的力量，看到了日本虽然凶极一时实则虚弱的本质，因而较孙中山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作出更深一层的分析，得出了中国抗日终必获胜的科学结论。1937年2月，她就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中，批评了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而又过低估计中国人民力量的恐日病，剴切指出：“日本不能战胜中国。因为第一，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不能作持久战争。第二，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第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后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⑩同年8月，她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中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阐发，指出：“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群众之愤怒上升到非常之高的地步”，“他们准备为卫国保家滴尽最后一滴

血。他们打起游击战来，将成为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日本军阀只能发抖。”加上“日本的侵略已引起全世界对于中国的同情，并引起其他各国对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不满，日本已处于孤立的地位。”她还较细微地分析了日本的经济潜力和它的社会结构的力量，指出日本正面临新的困难，既不可能短期内征服中国，也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在地广人多、资源丰富而又奋起抵抗的中国人民面前，“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①这样一种非常可贵的真知灼见，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这前后对中日战争所作的分析实相辉映，后来毛泽东更概括提高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其次，历来具有世界眼光的宋庆龄一直敏锐地观察世界情势的新变化。1927年她愤于蒋、汪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而出国考察后，更加强了与世界民主反战力量的联系，其视野进一步扩大。她从1927年12月参加布鲁塞尔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并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起，就一直担任国际上重要反战组织及反对日本侵华团体的领导。1933年她在上海参加并主持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她相继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侵华的讲演、声明、谈话和文章，强调法西斯势力对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威胁以及世界人民结成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大声疾呼：要制止法西斯的恶浪，“就必须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②，采取联合的行动。随着英美集团与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的矛盾加剧和分裂，宋庆龄进而表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战线，尤其要联合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安全制度，共同制裁日本帝国主义。”并且认为“这种正确的策略，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已经启示我们。”^③她坚决反对国内国际妥协投降主义，指出：“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就要危及他们的国家，毁灭“他们的美好的将来”^④。她十分自豪地说：“在世界人民

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公开的战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人民正在英勇和成功地同世界侵略成员之一的日本交战；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一样地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可以说，中国人民是“正在为自己也为全世界人民而战斗着。”“它一直是全亚洲的伟大屏障，阻止了日本法西斯统治这个占世界人口半数的地方。”^①

三

应时而生的宋庆龄对日观，受着所属时代的斗争的检验，表明了它的特殊效应。

宋庆龄早年的对日观，虽有其局限性，但显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明确而坚决的反帝观念。就是在1924年11月最后一次访日期间，孙中山、宋庆龄明知日本政府支持段祺瑞、张作霖；北上谋求和平统一，日本的态度实居关键；而日本政府对孙访日又因其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表欢迎；许多日本报刊登载不利于孙的言论；连故旧朋友如犬养毅、头山满或托故不见，或乘机压孙改变反帝主张；神户华侨聚居区在孙访神户期间竟出现以“各埠在留华人救国会”等名义贴出的反孙招贴、传单。可是，孙、宋始终坚持反帝反军阀，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立场。至于其局限性，则应从事物的发展、暴露和人们对它的认知都应有个过程以及出于情势的策略考虑等方面予以历史地理解。总的来说，这种对日观是作为当时先进中国人的反帝观的一个组成部分，适应于并促进着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开展。

三、四十年代终于形成的宋庆龄对日观，反映了宋庆龄在前此对日观的基础上，适应着新形势的发展，与中外先进人士共策共进。前此有过的认识不清和不足不见了，而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中日力量的对比和抗日的必胜、斗争的策略等都有清楚认

识和正确估量。她凭藉其特殊身份,开展了积极的多种方式的活
动,为国内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夺取抗日、反法西斯战
争的胜利起了别人无法取代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宋庆龄的对日观继续发扬,它主要是反对美国
重新武装日本和日本反动派镇压国内工人阶级;同时更加强调“中
日两国人民都是酷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因此,日本人民是中国
人民的朋友。”^④两国人民应紧密携手,反对共同的敌人,维护世界
和平。它切合于新时期的营造国际和平环境、谋求世界各国共同和
平发展的需要,因而赋予宋庆龄的对日观以新的时代特色。

(作者工作单位: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注释:

①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第409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
13—14、23、201、221、208—209、99、201、221、143、165—166、192—198、128、154、378—
381、273、281、591页。

④ 日本东亚文化研究所编,《东亚同文会史》,“本史”,第71—72页。

一二八抗战与宋庆龄的抗战思想

王乐德

宋庆龄积极地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这是她一次重要的抗战实践。研究她参加这次抗战的指导思想，对研究她以后的抗战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爱国主义思想

1931年8月，宋庆龄因母丧从德国回沪。耳闻目睹蒋介石国民党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敌；对内则倾全力于“剿共”，镇压要求抗日的学生和杀害邓演达等爱国人士。她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于1931年12月19日，在上海发表《宋庆龄之宣言》。宣布：“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痛斥蒋介石国民党“背弃革命政策”，“向帝国主义投降”。揭露“忠实的革命者被百般拷打，惨遭杀害”的事实。她说：“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

宋庆龄的这个声明显示了她满腔的爱国赤诚。就在这声明发表后一月余，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违抗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日。宋庆龄怀着一腔爱国赤诚，立即投入了“一二八抗战”斗争。她与何香凝等一起，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前线慰问、慰劳抗日将士；在

战火纷飞的前线发表热烈激昂的讲话。她说：“你们的枪声一打响，海内外男女老少，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①她与何香凝等发起为抗战将士筹饷，缝制御寒棉衣，创办伤兵医院等。她亲临伤兵医院处理各种事务。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和南京政府拒不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所以组织发动群众募捐的任务非常繁重。宋庆龄“几乎每天在外面奔走，常忙得连午饭都顾不上吃”^②“为支援十九路军作战的军需，筹建伤兵医院，援助罢工工人，何香凝、宋庆龄几乎把钱都花光了。”^③

统一战线思想

如何对待十九路军将领起而抗日这一事实？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当时统一战线思想上的一大问题。推行王明极左路线的中共中央认为十九路军将领的抗日是“欺骗群众”，把民族资产阶级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宋庆龄在刚发表的《宋庆龄之宣言》中，亦未能预见到国民党营垒中会出现十九路军将领起而违蒋抗日这种事情的发生，但当十九路军将领起而抗日的事实发生后，宋庆龄则表示热烈欢迎十九路军将领的抗日行动，并给予大力支持，开展了很好的统一战线工作。她亲赴前线与蔡廷锴交谈，并与之合影留念；慰问区寿年、翁照垣等师旅指挥官。她表扬、鼓励翁照垣旅长说：“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翁照垣旅长代表全体将士庄严表示：“要以卫士之责……使敌人无越雷池一步的机会。”^④

如何对待国民党将领起而抗日的问题？毛泽东在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作的报告中说：“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不利于反革命，而利于革命的。”宋庆龄对十

九路军将领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和行动，与毛泽东的理论是一致的。

宋庆龄的统一战线思想还表现在团结《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她的弟弟宋子文以及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共同抗日。在她的带动下，先施、永安、新新三大公司捐献钱物，新加坡华侨胡文虎一人捐献 10000 元；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借出部分校舍办国民伤兵医院等。

全面抗战思想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广泛开展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发动工人、农民、市民、学生捐款捐物和上前线慰劳抗日官兵，抢救伤员，救济难民，运输枪支弹药军需品等；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成立各种义勇军、敢死队等抗战组织支援十九路军抗战；领导和发动沪西区日资纱厂工人举行总罢工；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并发动失业工人一起参加斗争，支援沪西工人的反日罢工。

宋庆龄高度赞扬工人、农民、市民、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所进行的这些抗日爱国行动。她认为沪西区日资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对日本的重大打击，支援了十九路军抗战。“她得知沪西罢工工人生活发生困难的消息后，即派秘书与‘民反会’联系，把募集到的两万元捐款转交他们，用以支援反日罢工的斗争。”^①

宋庆龄、何香凝等和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的全面的抗日救国活动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热潮。捐献款物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1月30日一天中就收到捐款十万元。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共筹款七百万元，相当于十九路军八、九个月的军饷的总数。”^②

宋庆龄在以后的抗战实践中，积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广大抗日军民的抗日斗争；批评蒋介石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坚持和发扬了她的全面抗战思想。

抗战到底思想

在“一二八抗战”中，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访问》中说：“对于抗日战争，当然主张积极抵抗到底。”“人类唯有从奋斗中求生存。”她高度赞扬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犬无畏精神，说：“日本侵略军叫嚷 48 小时消灭十九路军，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中国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①

十九路军等以 5 万兵力，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浴血奋战月余，使日军三易主帅，四次增兵。总兵力增至 9 万人，尚不能越雷池一步，始终被压缩在吴淞沿海一线，这个事实说明，只要抵抗到底，日本的侵略是能打败的。只是由于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求和，不再增兵，迫使十九路军于 3 月 1 日撤出阵地。5 月 5 日，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南京政府的妥协投降行为，丝毫没有动摇宋庆龄“积极抵抗到底”的思想，相反，使她这一思想更坚定、更自觉了。在以后的抗日斗争中，她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分裂、倒退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她“积极抵抗到底”的愿望。与全国人民一起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文化馆)

注释：

①②③ 蒋洪斌《宋庆龄》101 页、102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④ 陈翰笙，《谈谈孙夫人的高尚品格》，载《宋庆龄纪念集》118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 张琼《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 年第二辑。转引自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第 246 页，北京出版社 1990 年版。

⑥ 《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496 页，人

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⑥⑦ 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247 页、248 页，北京出版社 1990 年版。

宋庆龄与救国会的抗日救国思想

庄有为

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尤其是1935年的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作为“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①的宋庆龄，始终站在救国运动的最前列。1936年5月3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号召和领导下，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积极支持并参加了救国会的救亡活动，营救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这一时期宋庆龄的著述和救国会的宣言、纲领，集中反映了关于各党各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建立民族联合阵线、民主制度的确立和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维系联合阵线的基本条件等方面的政治思想。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宋庆龄和救国会诸领袖率先响应，组织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宣传了各党各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主要是：

第一，全面论述了各党各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思想，阐明了建立民族救亡联合阵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宋庆龄多次申明：“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②，“救国阵线唯一的目的只在促

成全国人民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政治主张如何，能够团结一致，完成抗日救国的任务”^⑧；“我们的立场是要求全国人民，不问党派，不问信仰，不问地位，实行真正的精诚团结，停止一切内争，立即对日抗战，求得中国之自由和平等”^⑨。救国会成立大会宣言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作用在灭亡全中国，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立刻全国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⑩；“我们愿以赤诚告诉全国，除了汉奸势力以外，我们决不忍见国内任何的势力，再在相互冲突中遭受一丝一毫的损失，我们要把他们好好的维护起来，统一起来，巩固起来，作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力”^⑪，所以，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是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第二，抨击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早在1933年，宋庆龄就指出：“南京政府把最好的军队最好的军械军火，用来抵抗中国的农工，不用来抵抗日本”^⑫，“中国人民要抵抗日本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阻挠人民抵抗，禁止抵货、不援助义勇军、摧残人民的民权。国家的主要军队用来打自己的人民与中国的农工，不去打日本人”^⑬。救国会成立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中央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之一掷”^⑭。以沈钧儒等4人署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中指出：“蒋先生屡次主张以先安内后攘外的方式准备抗日，……五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个主张是失败了。五年来安内的结果，剿共军事并没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又发生了裂痕。可见安内政策并不能促成真正的内部统一，而唯一得到‘安内’的利益的，却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真正的准备抗日，决不是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而是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纾国难”。^⑮

第三，提出了促成各党各派一致抗敌的联合战线的具体建议：“一，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二，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三，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

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四,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纲领的忠实履行;五,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纲领,以及种种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④。宋庆龄还运用了她在国民党中的影响,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14人在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呼吁“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⑤,极大地推动了各党各派联合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二

宋庆龄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忠实继承者和执行者。毛泽东高度评价宋庆龄,在他致宋庆龄的信函中指出:“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⑥。大革命失败前后,宋庆龄勇敢地捍卫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他回顾了大革命的历史,指出:“为了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冬在革命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⑦，“由于孙中山以大政治家的风度运用了三大政策,并由于三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十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了并供应了革命军队,大举北伐,打到长江这条历史性的防线,更击溃河南奉军主力,推进到黄河岸边”^⑧,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屠杀工农,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宋庆龄坚定地表示:“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因此我得出结论:在与国内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地配合

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⑩。

宋庆龄深刻地揭示了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之间的必然联系。他指出：“孙中山谋求中国独立的努力已经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破坏。国民党背叛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群众运动，并且自那时起，一贯地采取屠杀工农、敌视苏联、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的政策。正因为国民党采取了这个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无阻地侵略中国，夺取东北，深入控制华北，而且现在正野心勃勃地向南窥伺，图谋攫取全中国”^⑪，必须深刻记住这个历史的教训。他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的演说词中说：“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焦灼地注视着它。中国已经被日本的侵略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牺牲已经不可避免”^⑫，“只要政府能够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们，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⑬。要救国，“政府必须解除对群众运动的箝制，发扬群众对建设的主动性和热情。只有这样，民生主义才能实现”^⑭；“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⑮；“救中国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但是先总理曾指示我们，不要使我们自己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合作”^⑯，表达了坚定的信念；“我坚决相信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且能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⑰，充分论证了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中华民族解放胜利的必然途径，这也是救国会领袖的共识。沈钧儒在《孙中山主义与救亡阵线》一文中，认定“孙中山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而三大政策就是救亡联合阵线的政

策”^⑧，并进而阐述了三大政策中第一是联俄政策，“孙中山先生认定中国民族斗争，必须从国际方面找得友军，方能达到最后的胜利：……现在对中国的主要的侵略国家，只是一国，而不是一切帝国主义，因此国际联合阵线，自然应该扩大，而把苏联以及英、美、法等一切反对侵略的国家都包含在内”^⑨；三大政策中第二是联共政策，孙中山“认定要完成国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必须联合各阶层中的反帝力量，共同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因此，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之后，容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且参加政权。……我们回想起孙中山先生手定的联共政策，深觉和目前爱国人士所创导的各党各派团结御侮的政策，主意完全相同”^⑩；至于三大政策中的农工政策，“现在我们要抵抗侵略，必须动员全国民众才有办法，全国民众以农工占极大多数。因此，我们要抵抗侵略，自然必须顾及农工的利益”^⑪。章乃器在1936年11月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的演说词中尖锐指出：“现在的中国，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表面上开口先总理，闭口先总理，而其实际行为所表现的，事实上则无一不叛弃了中山先生的遗教，中山先生指示的革命途径。还有一种是我们大多数民众，我们虽然不是把中山先生挂在口边，悬在胸怀，但我们却懂得怎样来继承他革命的精神，能够‘锲而不舍’地为中国民族革命解放斗争而努力！中山先生生前有三大政策，即联俄、容共和农工政策。我们救亡阵线，现在不但承继了先生的联俄政策，而且还主张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来共同制裁侵略国。中山先生主张容共，我们为了当前民族危机的严重，我们更主张联合国内各党派，以及一切社会阶层分子。中山先生叫我们实施农工政策，改善农工生活，解除他们的痛苦，然后可以把这支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力军，导引他们一同踏上抗争的火线！……”^⑫。

宋庆龄与救国会关于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是实现各党各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这一政治主张的正确途径，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争取抗日民族解

放斗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宋庆龄深刻论述了争取民主权利与争取民族解放的一致性。他指出:要实现全民族抗战,必须唤起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以为没有群众运动的支持,就能把国家从日本的侵略中解救出来,这是愚蠢的想法。孙中山说过,革命若要成功,必须有工人农民参加政府。国民党必须帮助促进工农运动,邀请工人农民入党,然后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⑧。而要唤起全体人民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必须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他指出:“凡关怀中国和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的人必须明白,要使人民广泛地组织起来,掀起对帝国主义的抵抗,肩并肩地在一支不可征服的队伍中前进,用民族革命的精神来反对中国的一切敌人,不论谁当权,群众都必将从他的手里夺回他们的这些民主权利”^⑨。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必须“实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变选举制度,使人民真正能够参加政府,在政府中有发言权,释放政治犯,实行出版、结社与集会自由,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建国工作”^⑩。争取民主权利与争取民族解放的一致性,这也是救国会领袖的共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提出:“大会认为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是各国联合战线丝毫不能让步的要求”^⑪。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建立民主制度,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蒋介石南京政府建立后,先后制定《训政纲领》和《训政时期约法》,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1936年5月,又公布了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和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规定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行政院长对总统负责而不是对国民大会负责,总统

有发布紧急命令及为紧急处分之权，总统处于最高操纵者的地位，确定总统独裁制的政治制度和国民党一手包办的选举制度。宋庆龄指出：“要群众行动起来，政府必须结束训政时期，尽速召开国民会议，吸收有才能的人，不论他是什么党派，到政府中来。国民会议能否完成它的任务，全靠一种群众真能参加的选举制度”⁹⁰。救国会的文件也指出：“中央当局所颁布的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实在是联合战线的障碍物”⁹¹。第二，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的自由。宋庆龄一再强调：“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惟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⁹²；“政府应立即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实行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⁹³。保障自由，尤其是要保障抗日救国的自由，释放一切因爱国行动而被捕的爱国志士，针对国民党政府逮捕救国会领袖的“七君子事件”，宋庆龄严正声明：“我们正同全国有良心的同胞一样要求政府立刻无条件恢复被捕九位先生⁹⁴的自由，释放一切因爱国行动而被捕的同胞，以巩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作，加强全民族抗敌的力量。政府应当动员并允许全国的民众参加并组织各种救国的团体，进行抗敌救亡的工作”⁹⁵；当局应该“一面把七位先生释放，一面允许救国自由，然后上下团结一致，共谋民族复兴，这样中华民国一定有光明的前途”⁹⁶。

从上述宋庆龄抗日救国思想的主要内容探析，可见其显著特点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高度赞扬救国会领袖“坚决声音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⁹⁷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我们的路是长而艰苦的，但只有伟大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我们非常欣慰，签名于这救国会的纲领和宣言之后，我充分支持这个纲领和宣言”⁹⁸，充分支持救国会的正义行动。为营救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指出：“沈先生等七人，并没有罪。所谓罪就只是爱国罪，如果爱国就有罪，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民，

还再有人敢去爱国吗？假定人人不爱国，试问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没有！……这关系就决不是沈先生等七位，而是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爱国的人民，而是整个中华民国的前途”^⑩，“我们不是大家都来挽救中华民国的危亡吗？既然要救国，一定要有救国的勇气”，“现在我们宁愿牺牲自己，来促成团结抗日与救国自由”，“救国入狱运动是目前最适合的一种救国方式”，“大家都起来公开地参加救国工作，中国自然就有救了”^⑪。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思想，是我们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政法系）

注释：

①② 毛泽东，《致宋庆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③ 宋庆龄：《孙中山诞辰纪念词》，《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④⑤⑥ 宋庆龄：《为救国会七领导人被捕事件宣言》，《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0页，162页，161—162页。

⑦⑧⑨⑩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86—87页，89页，90页。

⑪ 宋庆龄：《与萧伯纳的谈话》，《宋庆龄选集》上卷，第93页。

⑫ 宋庆龄：《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上的讲话》，《宋庆龄选集》上卷，第99页。

⑬ 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救国会》，第121页。

⑭ 宋庆龄：《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3、164页。

⑮⑯⑰ 宋庆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9页，50页，52页。

⑱ 宋庆龄：《中国的自由与反战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3页。

⑲⑳㉑㉒㉓㉔㉕ 宋庆龄：《实行孙中山的遗嘱》，《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5页，166页，167页，168页。

⑶㉗㉘ 沈钧儒：《孙中山主义与救亡阵线》，《救国会》，第148—149页，147页，147—148页，148页。

② 《悲壮盛大的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救国会》，第 179—180 页。

③ 宋庆龄，《儒教与现代中国》，《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77 页。

④ 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问题的任务》，《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12 页。

⑤ 宋庆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94 页。

⑥⑦ 《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救国会》，第 100 页。

⑧ 宋庆龄，《营救许德珩等代电》，《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89 页。

⑨ 指全国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和南京救国会的孙晓村、曹孟君。

⑩⑪⑫ 宋庆龄，《关于救国入狱运动对上海新闻界发表的书面谈话》，《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84 页，186 页，187 页。

⑬⑭ 宋庆龄，《致救国阵线领袖》，《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48 页，149 页。

宋庆龄抗日战争时期救济思想及其实践

张晓颐

我们在研究宋庆龄抗日战争时期的救济思想及其实践时，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既不仅仅是一种济贫救灾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不只限于某些慈善活动，而是宋庆龄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学习、继承、捍卫和发展孙中山三民主义及其伟大革命实践的结晶。从其重要意义来看，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的两个时期中，宋庆龄反对侵略战争，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高度体现，并且是以“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伟大国际主义为前提的。在前一时期里，宋庆龄为促成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国共合作；领导建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争取民权，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力争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得以实现，并使之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的救济思想和实践活动发展到更高阶段。她号召中国人民树立坚持斗争、长期抗战，直至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被赶出中国的坚定信念；领导保卫中国同盟把救济送给反侵略的战士们，她以实现自助为目的，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并竭力维护一条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紧密相连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使中国人民完成为自己也为世界人民而战的国际主义崇高使命。

一、为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奋斗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7年间，宋庆龄救济思想主要体

现于她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对人民的专制独裁，捍卫人民的基本权利，营救被捕革命者，支持国共合作，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因为只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才能为宋庆龄救济思想的全面实现创造有利的局面。

(一)反对独裁，捍卫民权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面前，宋庆龄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刻分析：“我们的工人，不是失业，便是在极低的工资、极长的时间、没有安全的保障的条件下忍饥苦工（最近两个胶皮厂的爆炸案便是例子）。农民受苦受饥，还要受苛捐杂税与高利贷与重租率的掠夺，他们没有足够的土地，只有在地主绅士的封建剥削制度的下面呻吟，同时还要受军阀混战的痛苦。从政治方面来说，所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一类的民权，都不许存在。激烈的革命分子，都逃不了监禁、私刑与杀戮的结果。……这些情形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向中国的进攻更加严重。”^①“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却阻挠人民抵抗，‘禁止抵货、不援助义勇军、摧残人民的民权’。”^②“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工作者和领袖们却因为反对祖国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逮捕、酷刑、处死，在中世纪的牢狱中活受罪”。^③宋庆龄指出：中国的人民大众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绝不能乞求当局的恩赐。“只有我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把我们的国家从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走狗的魔掌中解放出来，建立我们自己的法庭和其他自由人民的机构，才能永远消灭这些罪恶行为。”而“首先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反对当局继续迫害这些已经在领导斗争的革命战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达到我们目的的一个手段。”^④为此，宋庆龄以大无畏的精神，与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宋庆龄竭尽全力捍卫民权，她“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更不忍见

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⑧宋庆龄争取民权的斗争同人民的民主革命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息息相关，是她救济思想实施的重要步骤。她英勇无畏，仗义执言，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营救被捕革命者

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的短短半年间，宋庆龄领导它积极从事营救被捕革命者的工作。1932年12月，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拘捕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北大许德珩等教授、学生数十人，宋庆龄即致电国民党当局：“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要求立即释放进步师生，为“共赴国难”、“以重民权，而张公道。”^⑨

为了营救5名被捕的革命者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宋庆龄发表了《告中国人民》一文，呼吁“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⑩。“释放他们……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不能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地生存下去”。^⑪并于1933年4月与杨杏佛等亲赴南京营救，她面斥蒋介石：“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一役一直跟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的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⑫

对于那些被国民党强迫自掘坟坑，秘密杀害的青年作家——左翼作家联盟的6名年轻的领导人，宋庆龄悲愤地说：“那就是我们的委员长，竟活埋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很显然，他在研读《圣经》时还没学到哥林多前书和后书。”^⑬宋庆龄以《圣经》中阐明博爱真谛的《哥林多书》抨击蒋介石的凶残，彻底剥去了他自命为基督徒的伪装。她曾经说过，“如果蒋介石是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⑭这同宋庆龄以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礼义廉耻的观念斥责蒋介石的杀人行为一样，深刻揭露了当时的蒋介石既未受到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教化，连中国的传统道德也弃之如敝屣，所以蒋介石政府依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等等

剥夺人民生存权手段扼杀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也就毫不奇怪了。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宋庆龄等人的领导下，还全力营救第三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和他妻子，宋庆龄并承担了照顾牛兰夫妇4岁的儿子吉米的责任。当她得知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后，野蛮地迫害进步人士和犹太人时，立即发表抗议书，表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⑧。宋庆龄同蔡元培、鲁迅和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前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书。

1933年6月18日，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蒋介石手下“蓝衣社”分子所暗杀。宋庆龄发出了“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途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⑨勇敢正义的呼声，而且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参加杨杏佛的吊唁及入殓仪式。就在抗战爆发前夕，宋庆龄为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与共产党团结抗战之时，蒋介石政府非法逮捕了“救国会”沈钧儒等七位领袖。为了实现抗日的统一战线，身为救国会执行委员的宋庆龄在发表营救释放“七君子”的宣言和谈话中，将谴责集中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把民权问题同抗日救国问题联系起来，但未能奏效，于是她同何香凝等人士采取了大无畏的果敢行动——争取爱国自由的人狱运动，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胜利。

（三）力促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为促成抗日的统一战线，早在1933年9月，宋庆龄就在上海成功地召开有300人之多的、来自国内外的反战人士参加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的远东大会。1934年4月，宋庆龄与何香凝等1799人联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热烈赞同。1935年后，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节节进逼，宋庆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顺应历史潮流，以她那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政治技巧，帮助国

共两党相互接触，力促国共合作。虽然她对蒋介石深恶痛绝，但在经过西安事变，国共两党从内战转为共同抗日的新局面下，她于1937年2月出席了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这是宋应龄10年来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会议，也是最后一次。她在会上联合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提出了《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演说，庄严宣告：只有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她有力地批驳了“抗日必先剿共”的论调，形象地揭露这是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的荒谬澜言。呼吁“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④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宋庆龄以她崇高的威望和地位，机敏灵活的斗争策略，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千方百计地支援、掩护营救了许多进步人士，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合作，做出了她独特的重大贡献，为全面实现她的救济思想开拓了道路。

二、宋庆龄救济思想及其实践在 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宋庆龄始终坚持以抗日救亡、争取“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的爱国主义为核心；以“为全人类而战斗”，“帮助了中国就是帮助你们自己”的国际主义为前提全面展开救济工作直至抗战胜利，是宋庆龄的救济思想及其实践为抗日战争做出的伟大贡献。

(一) 树立坚持斗争，长期抗战，直至最后一个侵略者被驱逐出境的坚定信念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挽救民族危亡，宋庆龄于1938年6月，在香港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的救济活

动得以全面实施，她的救济思想则是真正代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使抗日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强大的爱国主义思想武器。这种救济思想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善，她更抵制历来把中国人民当作“施舍对象”的那种“恩赐”观点；她理直气壮地要求并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相信“得道多助”，而且正义的反侵略斗争一定会胜利。在1937年日本侵略者节节进逼，战争环境异常残酷的日子里，宋庆龄在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和中国的经济潜力及社会结构的现状后，坚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准备收复失地”。因为“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⑧宋庆龄高瞻远瞩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人民，毫无怨言地坚持着斗争，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长期的抗战直至最后一个侵略者被驱逐出境，他们才能获得自由和一个更美好的未来。”^⑨这使得全世界能够了解中国人民真正力量——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促使每一位愿意救济中国的人，成为这个斗争的自觉支持者，中国是不可战胜的，中国的军事力量顽强抵抗敌人的打击，中国人民对胜利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

（二）主张首先把援助送给反侵略的战士们

宋庆龄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曾经指出：保卫中国同盟完全致力于救济工作，但是，救济工作要有一定目的。它希望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并仅仅就自己的范围之内，帮助打赢这场反法西斯的战争。同盟反对打着“人道主义”幌子的“中立”的救济观念，主张首先把援助送给反侵略的战士们，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用斗争来挡住了侵略者的路，那么，侵略者获得胜利之后就会造成那样深重的苦难，即使是全世界的救济力量也无济于事了。宋庆龄明确地阐述了救济的目的，并说“因为中国贫困，中国的士兵缺少武器，穿不暖，吃不饱却走上战场”。^⑩那么，在战争中，还有什么问题比伤病、饥饿更亟需解决呢？而什么问题比缺乏医疗技术、药

品、食品、御寒物品这些维持士兵的起码生存条件更严重呢？所以，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从敌占区到游击区——解放区，一切救济工作都必须围绕着反法西斯战争展开，而且要把重点放在游击区，因为他们“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因此，他们的需要也是最明确的——大量的防治疟疾、霍乱、伤寒、痢疾和回归热的药品，改进医疗工作的各种医疗设备，绷带、换药用品和急救用品，冬天给伤员保暖的毛毯，给伤病员和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孤儿吃的罐头牛奶和浓缩食品。“中国的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⑧宋庆龄认为，这才是最真实的人道主义。把最需要的救济物品送到每一位抗日战士的手中，这就是宋庆龄主张的、救济工作最人道的目的，也是抗日战争最直接的需要。

（三）请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助；中国有权要求国际援助

救济“要给予真正的、持久的、建设性的和民主的救济，不是通过外国机构来分配救济款物，而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有自救的力量”^⑨。这是宋庆龄救济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精华。因为“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才能把中国建设成新世界的一部分”。宋庆龄的救济思想具有着深刻的辩证逻辑性——使中国人民通过外界的援助，实现自助，达到自立。这也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在国际上的自由平等”这一孙中山曾为之奋斗40年的目标的重要途径。为此，保盟的工作不仅要帮助在中国建立一套长期的医药救济制度，以真正实现自救——保盟建立了国际和平医院，并拥有8个中心医院和12个分院。正如联合国救济总署医学部驻中国的负责人的报告中评价说，“这些机构（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是任何医院都不能比拟的，在战争时期，他们冒着对生命和医疗设备的危险在进行工作，但仍旧建立起健全的医疗制度，并且在人民中间掀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医学卫生普及教育的运动。”^⑩国际和平医院还成为新中国现代化医疗机构的一部分，它的第一任院长白求

恩大夫的伟大国际主义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作为宝贵的精神遗产永远留在了中国。

保盟还支持了一项具有创造性的事业，那就是由新西兰进步作家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等创立的，以民主方式重建国家工业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因为这个组织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组织了广大失业工人、难民和灾民生产自救。就连国民党军队用的军毯，差不多都是由工合供应的。工合还建立了一个修理网、小型机器厂的工作网以及许多抗战所需的消费品的合作社。它使千万个沦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路。^⑥为从经济上支持长期抗战作出了贡献。

宋庆龄向国际社会呼吁：中国受法西斯侵略比西班牙共和国还早，中国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在远东的公开战场，“中国人民绝不会投降，他们正在为自己也为世界人民而战”，他们以血肉之躯“守住世界和平民主斗争战线上的我们这一环”。“为全人类而战斗”着的中国人民，理应得到国际上的援助。中国人民有权要求给予援助，更多的援助。保盟不是乞丐！保盟曾经揭露过某些外国救援团体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过期无效的产品也拿来“施舍”给中国。保盟在它的机关刊物《保盟通讯》上公开斥之为“可耻”！同时，又善意地要求救援团体在给中国援助时要认真检查、清点和保管好救济物资。如果不是处在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平等互助关系上的援助，这种救济对于被援助者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侮辱！

实践证明，坚持这种原则，维护民族尊严，理直气壮地呼吁援助的结果是赢得了更多同情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朋友，从罗斯福总统夫人、史迪威将军、卡尔逊上校、英国工党议员、实业家，直至许多毫不知名的外国友人，都对中国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能是争取民主的救济，只有这样办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并帮助你们自己”。这样的原则为世界人民所接

受。

(四)两个统一战线的结合,使救济工作得到保证

宋庆龄把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紧密结合,使她的救济工作得到了保证。“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因此,宋庆龄理所当然地全力支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他们是中国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她竭力谴责那些对救济工作实行“封锁”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真正的敌人”。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沉痛地表示:“不只痛恨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件怪诞而野蛮的事件,而且我们也为毁坏了新四军的一支医疗队伍而痛心,它的工作是中国游击队里医疗工作的模范。这支医疗队主要是由保卫中国同盟支援的医药器械和款物建立起来、维持下去的。”^⑧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为了使保盟“始终保持着对自由中国任何地区的受难民众和任何军队的伤病员给予救济的自主权”,宋庆龄坚决地“向一切破坏、阻挠和袭击做斗争”。并且大声疾呼:建立一个较为民主的政府,恢复中国的统一战线,加强中国的团结,放弃那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争端。这是“在替大多数的人民在讲话,是在替那些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伤的任何一个中国友人的讲话”^⑨。事实又证明:正是保盟积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那里的人民,这就对壮大人民力量,坚持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救济战灾儿童——保存中国未来有生力量

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救济思想和实践活动极其丰富,但其中一以贯之的追求则是今天的奋斗是为了明天。这充分体现在她紧急呼吁的一项救济工作——宋庆龄极为重视的救济数以百万计的战灾儿童,他们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战士的遗孤;是被罪恶的日本侵略者杀害了父母的子女;是流离失所并被饥饿和疾病夺去生命的难民的后代。还有无数的儿童的父母们或在前线作战,或被日寇赶出家园,无法照料自己的孩子。然而,正是这些儿童“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

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为此，宋庆龄领导保盟发起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立足于“绝不能让战士们的子女成为‘迷失的一代’，必须把他们从由于饥饿而濒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遭受摧残的恶果中拯救出来。”²⁹

——通过各种方式的信息传递和举办义演、义赛、义卖等活动吁请国内外人士救助战灾儿童，“请你们把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捐给他们的任何礼物，包括食品、衣物、奶粉、罐头、药品和护理经费，“都是对人类进步的直接贡献”。

——在陕西等地区建立孤儿院，为孩子们提供医疗、食物、衣服、住所，进行常规教育，“以便训练他们成为未来的有用公民，能够担当起国家交给他们的任务”。

——在需要的地方，任何正在进行着为实现一个自由的新中国而战的的地方，进行救济战灾儿童的工作，以便使他们能够保存下来，并成为未来“强盛之中国”的栋梁之材，失去他们，中国将无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未来——这就是宋庆龄救济思想的最终着眼点。救济工作从来就不是应急的短期行为，而是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的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工程。

宋庆龄的救济思想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产生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与她为实现人类最终的理想，为全人类共同走向进步的长远目标紧密相联的，是她自从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以来坚定不移的执著追求。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们学习和研究宋庆龄的救济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不仅是为了缅怀纪念这位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领袖人物，以及她的伟大的、不可磨灭的功绩。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到很多重要的启示。有助于我们用胜利去迎接新世

纪的到来！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编辑室)

注释：

-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9 页。
- ② 同上书，第 99 页。
- ③ 同上书，第 118~119 页。
- ④ 同上书，第 119 页。
- ⑤ 同上书，第 85~86 页。
- ⑥ 同上书，第 89 页。
- ⑦ 同上书，第 116 页。
- ⑧ 同上书，第 119 页。
- ⑨ 《我所认识的宋庆龄同志》，廖梦醒著，载《人民日报》1981 年 6 月 3 日。
- ⑩ 《宋家王朝》，(美)斯特林·西格雷夫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424 页。
- ⑪ 《宋庆龄——二十世纪伟大的女性》，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亦儒译，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32 页。
- ⑫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20 页。
- ⑬ 同上书，第 124 页。
- ⑭ 同上书，第 168 页。
- ⑮ 同上书，第 198 页。
- ⑯ 《永远和党在一起》，中国福利会编，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 页。
- ⑰ 同上书，第 16 页。
- ⑱ 同上书，第 46 页。
- ⑲ 同上书，第 17 页。
- ⑳ 《国际和平医院》，马海德著，载《永远和党在一起》第 118 页。
- ㉑ 《保卫中国同盟与“工合”》，路易·艾黎著，载《永远和党在一起》，第 75 页。
- ㉒ 《永远和党在一起》，第 28 页。
- ㉓ 同上书，第 35 页。
- ㉔ 同上书，第 6 页。

浅析抗战期间宋庆龄关于 人权的独特视角

裴 华

什么是人权？顾名思义，人权就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权利。其基本内容就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自由和平等。这种自由和平等观念通过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就是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平等权等基本人权以及由此而派生的一切社会权利。自由平等是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就国内法律而言，人权实际上就是公民权，即每个公民作为国家的一个社会成员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种基本权利。具体而言，这些基本权利包括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经济财产权利、劳动文化教育权利等方面。

本文从人权这一新的角度，对抗战期间宋庆龄关于人权的独特视角进行尝试性的分析，以期对抗战时期宋庆龄的人权思想有一初步的探索与总结。

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兴起，到1945年9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结束，历时十四年，这正是本文所要涉猎的时间段——抗战期间。

抗战时期，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人权问题严峻而突出。在中国，内有蒋介石为首的政府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专制，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日益猖獗的侵略，内外交困的形势之下，中国国内民权不兴，民生危机，国家主权不立，中华民族处于灭绝的边缘，中国人民的人权遭到了持久而严重的漠视、肢解、摧残和践踏。在世界，德、

意、日法西斯主义抬头并蔓延全球，整个人类的尊严与进步、文化与道德遭到了无情的蹂躏。这一时期，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人权受践踏的程度空前，另一方面世界范围捍卫人权的斗争也前所未有地高涨。宋庆龄正是期间中国乃至世界捍卫人权的杰出代表。也正是通过这一时期丰富而不懈的人权斗争与实践，宋庆龄对抗战时期的人权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她从人权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和人权与自由平等这两个特殊的视角，对抗战期间的人权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1938年，在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时，宋庆龄请求美国青年帮助中国人民“在东方拥护地球上最老的民主国家”，帮助中国人民争取“解放、自由、平等，以及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具体化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这些神圣的人权”。^①这是最明确和集中体现宋庆龄关于抗战期间人权问题界定的一处论述。

视角之一：人权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抗战时期，宋庆龄的著作、演讲、谈话中有“人权”这一具体而明确的提法。例如，1933年她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中，曾提醒中国民众“不要信任国民党的纸上诺言，例如新宪法中最近提出来的‘人权’，而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力量”争取“民主权利”。^②同年5月，为抗议德国迫害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宋庆龄指出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于国内、国际人权问题的关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③这里，宋庆龄将“民权”与“人权”相提并论，表明了她对两者关联的认同。事实上，抗战时期宋庆龄基本上是采用“民权”这一范畴来表述对人权问题的看法的，她所从事的捍卫、促进民权的活动其实就是捍卫、促进人权的活动。简言之，“民权”与“人权”在宋庆龄那里是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提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尤其民权演

说是其人权思想及其实践的深厚理论根基。

人权理论萌芽于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确立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展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二战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至于中国，到了近代，严复、沈家本、孙中山等人提出了初步的、比较严格意义上的人权思想。其中孙中山先生不但全面引进了包括天赋人权的西方政治学说，而且还创立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换言之，孙中山先生的人权思想集中体现于他的三民主义之中。三民主义之中的民权学说又尤为孙中山先生人权思想的精髓，它包括“主权在民”、“五权宪法”等重要原则及主要内容。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忠实而勇毅的继承者，她在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他的人权思想，从而构成了自己关于人权问题的独特视角。

首先，宋应龄从宏观上把握住三民主义的重要性。抗战初期，宋庆龄侧重从指斥国民党反动当局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分裂压制共产党，建立独裁恐怖政治，以致造成国内分崩离析的惨淡局面等方面，阐述执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的重大意义。抗战中期，国共两党由分裂走向合作，共同抵御外侮，宋庆龄敏锐领悟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有其深层的理论根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鉴于这一理论根基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特的凝聚作用，宋庆龄愈发有意识地高扬起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旗帜。抗战后期，国民党当局分裂共产党、压制抗日进步力量的恶劣行径时有发生，宋庆龄侧重呼吁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贯彻实施的紧迫性，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予以阻止和还击。

这一时期宋应龄专门谈到三民主义的文章便有《实行孙中山的遗嘱》、《国共合作之感言》、《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等。

其次，宋庆龄从宏观上全面理解民族、民权、民生三者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个整体。宋庆龄在抗战时期始终将外争国权——民族独立自主权，与内争民权、民生的活动有机结合，从实践上坚持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三民主义。在理论上她也反复论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她在《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中，她更明确地指出：“孙先生认为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是有联带关系的，是救国目标中不可分离的部分。他认为三民主义是为民众求三方面平等的武器，所以民族、民权、民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要同时平行的来发展”；“孙先生认定：中国的民众假使没有得到民主的权力和经济上的改善，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假使我们没有抵御外来的侵略，则处于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永远不能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国家，给予民众政治上的平等和生活上的改善，所以惟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然后才有真正独立的中国”。^④也就是说，民权的振兴、民生的改善，促进民众合力求民族独立，反之，民族的独立则是民众民权得到充分实现、民生得到根本改善的先决条件；因而民族、民权、民生三者只有平行发展，中国的独立自主才有希望。

事实上，民族独立自主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民权（人权），人民生计的振兴是生存权意义上的民权，民众人身、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参政等方面的自由则是最直接意义上的民权。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学说构成的三民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一种综合意义上的人权学说。宋庆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始终有意识地将几者有机统一于一体，在推进三民主义的同时，也深化和丰富了自己的人权观。

再次，宋庆龄从微观上进一步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思想。这正是本文即将展开论述的宋庆龄抗战期间关于人权问题的又一视角。

视角之二：人权与自由平等权

自由平等权指的是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享有均等

的人身、言论、参与等自由。换言之，自由平等权指的是人们在生存权、发展权、参政权等基本人权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各种社会权利方面生而自由、人人平等。

自由平等权，在宋庆龄看来属于民权（人权）的核心部分，因而是她在抗战期间捍卫、争取人权的侧重所在。具体而言，宋庆龄这一时期的人权思想和实践集中体现于争取和维护生存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参政权两方面的自由平等。

1、关于生存的自由平等权

生存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生存权包括生命存在的安全保障和生命延续的生活保障两部分，前者是基本条件，后者是基本内容。

抗战期间，一方面因为积此前数十年外有强权侵略、内有军阀混战所成的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恶果；另一方面因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加紧了侵华的步伐，而国内战争仍连绵不绝所形成的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国人民毫无生存权可言。国家不能独立，人民的生命就没有保障。危害中国人民生存的，首先是日本的侵华战争。因此，争取生存权首先要争取国家独立权，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宋庆龄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始终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沿，她所从事的所有活动，她所发表的所有言论无一不是以抗日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为核心和宗旨。这是她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平等的生存权——与其他民族自由平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方面。

宋庆龄为中国人民争取生存权的第二方面主要表现在她为因战争而缺乏基本生活资料的中国民众、抗日军队尤其游击区的战士、战灾儿童呼吁和奔走。

只要有会机，宋庆龄便诚恳、积极地呼吁政府重视、改善民生。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在会上指出：“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①1938年，她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中指出：“勿忘全国同胞在被占区或作

战区域，因战事影响，或遭暴敌惨杀奸淫，或过奴隶生活，或家破人亡，或流离失所，或遭死难……种种惨痛，当铭刻吾人脑际勿忘，党政当局，贵能牺牲少数人之安荣利禄，而以解除全国人民生活苦痛为前提，抗战期间，凡与抗战利益不相矛盾，而能改善民生之计，如救济难民，抚慰流亡，优恤阵亡将士家属及死难同胞，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斟酌情形豁免赋税或减低租税……等等，当努力实行……”。^⑧

只要有会，宋庆龄便热切而执着地呼吁各界爱国人士、华侨、国际友人等对中国人民的生计极度艰难给予关注，请求他们为中国人民提供急需的基本生活用品。1938年宋庆龄倡导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便是她进行难以数计的诸如此类工作的典范载体和桥梁。该同盟尤其在支援游击区的人民和军队改善其恶劣的生存条件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封锁，游击区抗日战士得不到同等的救济与援助，生存自由平等权遭到严重限制，为了争得游击区战士自由平等地享有受援助、救济、医疗的权利，宋庆龄著作、演讲、奔走。在《救济工作与政治》一文中，她明确指出：“作为一个独立的救济团体，我们始终保持着向受难平民和自由中国的任何地区、任何军队的伤兵提供公平的治疗和公平的救济的权利”，^⑨又“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所有地区，游击区得到的基金和医疗物质最少，也因为我们相信，游击战和动员战区的中国人民是中国抗战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在过去特别致力于帮助华北和华中游击区的伤员和战争受害者。……我们始终特别关心着中国游击队的需要”。^⑩对于政治封锁线，宋庆龄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指出：“今天最沉重地打击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阵地的军队，……国内的政治封锁使他们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由外国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取消封锁，并吁请大家不要对封锁默许。这种封锁在中国划出了一条无形的界限，一

边是每一个抗日受伤的战士都可以有资格受到医疗，一边则不然”；^⑧“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⑨

只要有机会，宋庆龄便亲自投身于改善民生的实际工作中去。她积极倡导、参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为生产者而发动的”“生产者自身的运动”，还提出了融接受外援与自力更生为一体的著名口号——“帮助中国人民使之能够自救”。^⑩

2. 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参政等方面的自由平等权

抗战时期，争取和捍卫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参政等方面的自由平等权，是宋庆龄为中国人民的人权作出特殊贡献的又一突出方面。宋庆龄关于此方面的思想与实践集中体现于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依托的活动之中。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1932年夏秋间宋庆龄联合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筹备并创立的。“民权保障同盟是借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一词，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蔑视民权的法西斯政治”。^⑪该同盟主要成员之一的邹韬奋曾指出：民权，最主要的“是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和生命的自由权；而人民生命的自由权，尤为基本的基本，因为生命的自由权如果得不到合法的保障，什么都无从说起”。^⑫

宋庆龄认为同盟的宗旨就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其“首先关切的是援助那些拥塞在监狱中的大量无名无告的政治犯”；^⑬同时同盟还以“摧毁审问政治犯的秘密法庭”为己任，因为“在那种地方不仅是最起码的公道，而且连人的基本权利也一齐遭到玩弄与蹂躏”。^⑭

基于以上理解，宋庆龄在抗战前期主要以该同盟为依托侧重于争取、捍卫、促进公民尤其是已失去了自由平等权的政治犯的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参政等方面的自由平等权的获得。

抗战中后期(“七七事变”前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内各党派与团体民主参政共同抵御日寇成为全民族的最强音,宋庆龄紧随时代的脚步,侧重争取各党派与团体参政的自由平等权。1937年她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中呼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变选举制度,使人民真正能够参加政府,在政府中有发言权,释放政治犯,实行出版、结社与集会自由,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建国工作”。^①1941年,在《救济工作与政治》一文中,她指出:“我们将继续呼吁在中国政府里实行更民主的制度,因为我们相信,只有沿着民主的路线,通过更大的自由权利,让中国人民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国内局势才能得到改善,中国才能在不威胁着自己,也威胁着别国的危险面前继续保持团结”。^②

为了争取和贯彻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宋庆龄不仅重视号召、指导和关注有关人权实践的具体活动,难能可贵的是她在关键时刻总能以身示范,从根本上做到知行合一。这方面的典型的事例比如“救国入狱运动”,为了诸如“七君子”一样的爱国者和民众的爱国权利与自由,宋庆龄不惜放弃自己的一切自由,甚至牺牲生命。

以上是笔者所选取的抗战期间宋庆龄关于人权的两个比较突出的独特视角。事实上,这一时期宋庆龄的人权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她关于人权的视角也是多维的、广泛的,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和研究。笔者在此所作的至多只能算是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

(作者工作单位:宋庆龄基金会宣传研究部)

注释: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45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同上第111页。

③ 同上第120页。

④ 同上第295—296页。

⑤ 同上第166页。

- ④ 同上第 225 页。
- ⑦⑧ 同上第 331 页。
- ⑨ 同上第 377 页。
- ⑩ 同上第 378 页。
- ⑪ 同上第 303 页。
- ⑫ 《周蓬人谈民权同盟》，载《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 15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版。
- ⑬ 同上第 162 页。
- ⑭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91 页。
- ⑮ 同上第 114 页。
- ⑯ 同上第 194 页。
- ⑰ 同上第 336—337 页。

论宋庆龄国共合作思想的发展

王苏颖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两大政党。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史上，有过两次合作的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于1924—1927年，这次合作，壮大、发展了国共两党的力量，结束了军阀混战，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出现崭新的局面。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通过再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了日本法西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两次国共合作中，宋庆龄都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坚决捍卫者和继承者，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她杰出的、特殊的贡献。

—

宋庆龄从1915年起就投身革命活动。她同孙中山先生的结合虽然是出于对英雄的崇拜，但自此以后，她始终坚定地同孙中山站在一起。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是近代中国社会运动发展的结果。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一生的唯一目标是救国、富国、强国。正如宋庆龄所说：“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导致了封建帝制的崩溃与共和国的建立，但并未推翻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未取得真正的胜利。当时中国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仍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秩序，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民主的和富强的新中国。在寻求革命的同盟者的长期艰难的道路上，孙中山逐步认识到，要实现革命，“不是在广东少数的国民党员可以做得成功的。必要应用群力，请全国人都同心协力去做，那才容易成功。”^⑧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崭新的面貌。它首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制订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发动了工农群众运动，传播了革命思想。在同敌人的搏斗中，共产党人表现出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是伟大的爱国志士，他们是光荣的革命先锋。正是这样，孙中山才把诞生不久的、队伍尚小的中国共产党引为同志和战友。他在回答宋庆龄提出的“为什么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⑨

宋庆龄始终坚定地同孙中山站在一起，殚精竭虑地帮助他改组国民党，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孙中山处于重大的历史转变关头，宋庆龄的鼓励、推动、慰藉起到了他人无法取代的作用。在孙中山创建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她并不是消极被动地追随，而是积极地促进事态的发展。她参加了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李大钊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越飞的会见，做了大量的切实有效的工作。也正是通过这些活动，她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为她此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她的国共合作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1924到1927年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两党合作的基础是以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

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主要体现在革命任务相同，即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性是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彻底革命的政党，它不仅要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国民党则不同。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于历史的原因，原国民党中的一部分地主、豪绅、军阀、官僚、政客、买办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仍然留在党内。他们多为国民党内的左派，与坚持新三民主义的左派相对立，他们没有停止过同共产党的斗争。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反对国民党内的右派活动，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左派领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与国民党右派及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等共产党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宋庆龄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政策，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始终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她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厉谴责汪精卫等人违背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反动行为，严正宣布退出武汉国民党中央，同孙中山的叛徒公开决裂。她在声明中说：“我认为我现在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工具而已。”“现在，我认为背弃了孙中山领导革命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⑧这个声明表明宋庆龄是彻底地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是孙中山革命原则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

宋庆龄退出国民党中央后，并没有停止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而奋斗，没有停止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1927年8月底，她去

苏联考察，临行前在上海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重申仍然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声明在回顾了国共合作的历史之后说，国民党之所以能进步，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展，统一广东和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正是由于孙中山先生以大政治家的风度实行了三大政策。她表示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但是背叛革命投靠反动势力的是少数。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所制订的三大政策，并会为之奋斗到底。她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国民党如能和这两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会大大地帮助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⑧这一声明，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宋庆龄第一次公开表明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表示了要继续“联共”的愿望，也就是说，宋庆龄的国共合作思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确立以后，一直没有动摇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她继续谋求同中国共产党的再度合作。她去苏联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计划同苏联领导人商量国共继续合作，把中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正忙于解决内部的托派问题，无暇顾及中国的革命。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因仇恨国民党屠杀政策而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也使宋庆龄要求国共再度合作的希望难以实现。尽管如此，宋庆龄仍在继续寻找一切同共产党合作的机会。

二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当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在短短4个多月时间里，我国东三省就全部沦入日本之手，变成它统治下的殖民地。宋庆龄在九一八事变后就积极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

1932年3月，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联合上海三十多个进步团体，组成国民御侮自救会。在御侮会的筹备大会上，宋庆龄发表了长篇演说，第一次提出她关于中国抗战的全面主张，“（一）派遣全国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军队，给以充分的装备，和全国所有的飞机，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热河，保卫中国。（二）武装人民，并组织义勇军。（三）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自由；立即停止对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和杀戮。（四）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进攻。应该着重指出，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经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且曾于今年一月提议，在停止进攻苏区、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武装人民的条件下，苏维埃政府愿意与任何军队或武装部队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⑧宋庆龄的上述要求实际上也是共产党的要求。当时，中国工农红军正遭受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受到严密封锁。宋庆龄在演说中宣传共产党的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声明，对共产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御侮会是宋庆龄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它在对人民进行抗日爱国宣传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34年初，宋庆龄应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亲自出面筹备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并发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签名运动。1934年6月20日，由宋庆龄领头的1799位中华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发起人、赞助人，将“六大纲领”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为题公诸于全国同胞，其主要内容是：（一）全体武装总动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采取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和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战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⑨这是九一八后，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情况下，继苏区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对

日宣战之后，第一个代表中国人民对日宣战的宣言。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强划冀东各县为非武装区以后，又进一步企图吞并华北5省。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的步步进逼面前，却节节退让，先后跟日本签订了断送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跟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等率先响应《八一宣言》的号召，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日本的步步进逼和中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冲击下，感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已经难以继，于是改行先安内而后攘外方针的新策略，企图通过与共产党谈判，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为此，蒋介石开始寻找与共产党接触的线索。在“打通共产党的关系”中，宋子文找到了宋庆龄，请姐姐设法与中共联系，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消息传递给中共方面。宋庆龄虽然早已宣布断绝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但是现在，她认为蒋介石走出这一步符合历史潮流，与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一致，若能成功，对国家和民族是有利的。因此，她欣然同意出面斡旋。她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当时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的董健吾（化名王牧师），由他去陕北传递消息。董健吾成功地完成了使命。就这样，国共分裂后，在民族存亡关头，宋庆龄最先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庆龄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立了第一功。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宋庆龄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虽然她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一贯抨击，但对这件事，她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这一事件。她清醒地看到，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如果图一时之快，杀了蒋介石，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以长

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宋庆龄对这次事件的主张再次与中国共产党不谋而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至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障碍已基本扫除。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顾全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她从1927年7月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会上，她跟何香凝、冯玉祥、经亨颐、李煜瀛等14名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提案指出：“在过去六月中，我们得到中国共产党儿封致本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和通电，请求国共再度合作，联合抵抗日本。它证明团结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一致的要求，此事更进一步地为西安事件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既然愿意停止危害本党政治权力的活动，并支持统一抗日，所以本党更加便利来取得恢复先总理三大政策的机会，以挽救本党和祖国免受奴役，并完成我们的革命工作。”^①18日，宋庆龄在全会上发表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她严厉批评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指出：“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些个别人仍然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先要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消耗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她要求国民党联共抗日。她说：“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意打自己的兄弟，他们知道这是违背民族利益的。一切内争是可以的，而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②宋庆龄还严厉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恐日”病。她指出：“丧权辱国的

对日谈判必须停止。”“最不幸的，还有一些政客依然不了解实际形势而害着‘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这种错误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宋庆龄坚信日本是不能战胜中国的，因为“第一，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不能作持久的战争。第二，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第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后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⑧

1937年9月22日和23日，经过宋庆龄的大力推动和督促，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关于团结御侮的谈话。蒋介石在谈话中尽管没有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纲领给予正面的确定的回答，也没有承认国民党在过去10年中对招致严重民族危机所应负的责任，但毕竟还是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对此，宋庆龄撰写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表达自己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由衷的高兴。她这样写道：“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地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的几乎要下泪。”“回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兄弟党，在最近十年以来，互相对立互相杀戮，这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先总理孙先生生前所不及意想到的。到最后，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从新携着手，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⑨她希望两党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诚信地友爱地团结，使中华民国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中，宋庆龄再次强调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倘使他主张的国共合作一直不间断地继续到现在，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强国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

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①

总结起来，宋庆龄的国共合作思想形成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时她的思想仍带有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这是其国共合作思想的第一个时期。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宋庆龄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谋求同共产党的合作，这是其国共合作思想的第二个时期。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宋庆龄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力促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其国共合作思想的第三个时期。宋庆龄的一生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非同一般，从孙中山的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转变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党派的拥护或反对，都以救国救民为标准，永远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所以，她很少受党派偏见所左右”。^②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她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值得称颂；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她那爱国爱民的高尚品德，更值得人民的敬仰。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注释：

- ①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4页。
- ③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7页。
- ④ 《宋庆龄选集》，第18—22页。
- ⑤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9页。
- ⑥ 《宋庆龄选集》，第78页。
- ⑦ 转引自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第254—255页。
- ⑧ 转引自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第367页。
- ⑨⑩ 《宋庆龄选集》，第99—102页。
- ⑪⑫ 转引自陈漱渝，《宋庆龄传》，第173—174页。
- ⑬ 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第180页。

抗战期间宋庆龄关于国共合作 的主张和实践

杨小佛

191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决议，从而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对此宋庆龄是坚决支持的，她的积极参加武汉政府便是明证。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既无土地也无部队，所以合作的内容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然后在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中发挥作用。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对他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①。可见两党的密切关系。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即告结束。只因各地情况不同以及还有人国民党抱有幻想，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真相未明时已被杀害了。政变时候绍裘在南京，他被捕后与上海的侯硯圃失去联系，侯硯圃去找杨杏佛打听情况并表示要去南京找寻。杨告诉他形势大变，你我去南京都极危险，告诫他切不可去^②。上海是反革命政变的中心，而侯硯圃等却未看到租界以外地区的白色恐怖。

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和同年11月在莫斯科与邓演达、陈友仁一起发表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③控诉了国民党的反革命罪行，从而给第一次国共合作划上了句号。

国共分裂后，蒋介石实行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政策。他一面利用特务滥施捕杀，一面大举进攻苏区。这种恐怖的局面持续了许多年，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则采取各种方式的斗争进

行反抗。

1931年牛兰夫妇被捕后，宋庆龄改变了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立场，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以公开合法斗争方式进行营救活动。1932年10月宋庆龄还亲自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建议组织一特种委员会专门处理政治犯案件。随后他们又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通过揭露特务罪行并采取各种方法营救被捕的政治犯。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至主要地位，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变化。尽管国民党政府做了许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不义行为，但国共合作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共两党都在秘密找寻接触和谈判的渠道。

1935年年底，宋子文找宋庆龄请她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传给中国共产党。1936年1月初，宋庆龄召董健吾将说明此意的信囑送至延安面交毛泽东、周恩来。董完成使命并带回复信和作为证物送给宋庆龄的边区银币和布币等。1936年潘汉年到上海又带来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内容为希望宋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建立。^④不久在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推动下，国共两党终于恢复了中断近10年的联系。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去莫利哀路29号看到宋庆龄忙于打电话。她说这两天南京有人来商量事情，小佛你过几天再打电话来约晤好吗？当时我还小，未去研究她忙些什么。后来我了解到西安事变时，史沫特莱适在西安采访，宋庆龄很快就得到国内外几方面的消息，她对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特殊的作用。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庆龄出席了会议并与何香凝等提出“恢复孙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这是她们正式提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

芦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宋庆龄积极团结各界人士发起

组织上海抗敌后援会，指导成立妇女训练班培训护士为伤兵服务。她同时密切关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发展。1937年9月24日她撰写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表示看到国共两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都强调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非常感动。同年11月她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指出：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完全不同。它不但拥有土地（名称因时因地为苏区、边区、游击区、根据地、解放区等），政权机构、民众，而且还有人数量多、战斗力强的部队（名称先后为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解放军等）。对这一重大变化，国民党政府视若无睹，妄图以政令军令统一为理由予以吃掉。

鉴于这种事实上的变化，宋庆龄关于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主张也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其内容可概括为：

一、通过传媒向海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独立性；

二、中国共产党的地区和部队有权获得相应的财政贴补、军饷和给养等；

三、中国共产党的地区和部队有权获得国际机构或外国给予中国的各种经济、技术和物资援助；

四、中国共产党有权参加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并有权派出代表参加国际机构的活动。

在实践中，宋庆龄在香港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一贯致力于争取国际对我国的医药和救济物资的援助，同时又把援助的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地区和部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与“保盟”保持密切联系，“保盟”募集的药品、食品、经费等均由该办事处送交八路军、新四军。

“保盟”的机关刊物英文《新闻通讯》经常报道中国共产党部队

抗日活动的消息。皖南事变发生后，举国震惊，但国民党政府严密封锁消息。1941年2月15日《新闻通讯》发表《坚持统一战线》一文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宋庆龄还大力支持路易·艾黎发起的“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运动。“工合”不但将机器设备运到西北游击区以发展后方工业、改善当地经济，而且将捐款直接转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肯定了“工合”运动的重大意义并表示欢迎和感激。^②

经宋庆龄和“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努力，1942年延安合作社拥有的工人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合作社工人的总和。与此同时，各根据地的合作社均有相应的发展。

宋庆龄还致力于将来自加拿大、印度、奥地利、德国的专家白求恩、柯棣华、罗森培尔、米勒等及医疗队送到边区参加救援工作。1945年“保盟”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后继续接受国际援助并转送到解放区。

1946年7月22日，宋庆龄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有权以独立身份参加联合政府。

在宋庆龄关于国共合作的一系列主张下，经过党和人民的不懈努力，1945年4月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此外，其他同志也有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联合国救济总署除设立国统区的行政院救济总署外，另为解放区设立解放区救济总会。这表明联合国机构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为一独立实体。

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期间做了大量中介工作，只因双方严格保密，外界所知甚少，本文述及的只是个别的例子，实际的工作远不止此。

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大不相同已如上述，宋庆龄一直反对国民党政府以政令军

令统一为理由来吃掉这一独立实体。

在实践中，宋庆龄和她领导的机构一贯致力于：

一、通过各种媒介向海内外宣传中国共产政权和部队的存在和活动；

二、将国际机构或外国给予中国的经济、技术和物资援助送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和部队；

三、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活动；

四、努力促使联合国机构将解放区作为独立于国统区的实体对待。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注释：

① 陈淑谔：《宋庆龄传》第 61 页，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1982 年侯福圆在寓所对作者回忆往事的内容。

③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沈苏儒汉译本)第 210 页，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④ 同③第 339 页。

⑤ 纪锋：《救苦救难的“活观音”》刊《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 年第 3 期第 14 页。

宋庆龄与国共第二次合作

吴传焯

神圣的抗日战争所以能够进行,并取得最后胜利,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和,实现第二次合作。宋庆龄对国共抗日合作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是两党中枢领导决策圈外最具影响的参与人物,发挥了他们之中谁也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

—

国共第二次合作,从根本上说是互找同盟军。两党由于历史和现状的不同,致使他们在诸多主张和看法上存在根本的差异。要建立和坚持合作,首先必须扫除认识上的障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宋庆龄全身心地投入,撰写文章,发表谈话,阐述自己对国共合作许多原则问题的观点,促使两党逐步取得认同,一道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反对日本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是国共合作的核心问题和政治基础。日本的进攻,构成对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威胁,从而决定了中华民族主要任务是举国一致,共御外侮。

实现民主联合,是国共合作的根本途径。国共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党,各有自己的政权机构、武装部队和组织系统,各自独立,互不统属,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指挥与服从的关系,因此两党的合作

应当遵循民主的原则。宋庆龄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为什么民主是团结抗日的关键呢？首先，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拒绝给共产党民主权利和平等地位，企图把共产党打下去，从而导致十年的内战。“由于过去十年间中国忽视了民权主义，我们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害。内战绵延不已，国家深受摧残，千百万人民丧失了生命，亿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所以要与共产党讲和，只须实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其次，这是团结抗日的要求。抗战伊始，国民党同共产党关系较好，也给了共产党某些民主权利；但是，尔后不久又故态复萌，收回了抗战之初给共产党的某些民主权利，甚而多次发动反共事变，就不能不损害乃至破坏了国共合作。“战时自由中国之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这对敌人是有利的。缺乏民主也许就是对共同的抗日战线的一个最大的威胁，并且给那些想破坏它的人以绝好的机会。由于国民党是当权的政党，在重庆实行一党专政，所以扩大民主政府是它的责任。”宋庆龄正是从合作和民主一致性的原则出发，一再呼吁“在中国政府里实行更民主的制度，因为我们相信，只有沿着民主的路线，通过更大的自由权利，让中国人民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国内局势才能得到改善，中国才能在不仅威胁着自己、也威胁着别国的危险面前，继续保持团结。”

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秉持理性，前瞻和积极态度，是国共合作的基本保证。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段利益，又对峙了10年，心存芥蒂，积怨颇深，是难以避免的，也不能不对他们建立和坚持合作关系增加难度；但是应当看到，“由于人民日益要求抗日，一切政治上的分歧都成了次要的问题”。国共如若能以民族大义为重，不纠缠过去的恩怨，不计较往昔的得失，通过接触和谈判，相忍为国，完全可以找到带有根本性的共同点的。宋庆龄指出：“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龈，自然都应一笔勾

销,大家都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至于两党在一些次要问题暂时尚难达成一致,可以放置一边,应当本着“统括大体,而不苛求枝节”的原则去处理,切不能因小异而损大同。若是任凭感情用事,坚持一党私利,采用以邻为壑的手法;甚或向对方施毒计,非但不能建立信任关系,反而必将危及合作事业。所以宋庆龄警告国民党说:“不必要的磨擦猜忌仍是团结不能达到精诚无间的主要障碍。”“除去自私自利的偏见,大家推诚相与,进一步加繁团结在一起,一切只以抗战的利益为依归,遵循一定的工作纲领做去,我们实在不难粉碎敌人的侵略。”

防止日本和汉奸的离间,不容他们插手两党事务,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原则。中国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办理,国共的关系由双方解决,这是民族利益,两党尊严所在。日本和汉奸是中华民族和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他们明白国共合作是他们侵略中国的“主要障碍”,因此就“企图制造我们之间的新的分歧,企图挑起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旧恨,以便分裂我们。”其目的“惟欲我抗建实力之削弱,以至于消灭……惟欲我发动剿共,以展成无限制之内战”。国共两党一定要“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用之伎俩”,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敌人所欲我者,我当避免,敌人所不欲我者,我当坚持。”这是国共两党处理双方关系,坚持抗日合作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政治原则。为了实行这条原则,宋庆龄在皖南事变后特别指出,国共一定“痛心敌人以战养战之阴谋,应从扶植沦陷区域各种抗日实力入手,力避敌人以华制华之毒计,当于保障国内绝不酿成分裂开端……诚如此,国内前后种种磨擦事件无因而生,敌人近来种种谣言攻势不攻自破,总裁所痛过去敌人之挑拨离间,齧割分裂政策,将永无实施机缘”。

二

国共在历史上曾有过第一次合作,然而不幸的是,自1927年

后发生了分裂。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由于民族敌人入侵，国共不仅需要调整政策，更需要实行调整后的政策。为此，宋庆龄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极大地帮助了国共再度携手同行，一波三折地走完了8年抗战的里程。

在国共两党合作酝酿过程中，宋庆龄以历史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从中牵线搭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遇事总是率先行动。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适应民族危机日益发展的要求，提出在3个条件下与任何部队联合抗日的主张，尽管共产党中央还未根本改变“左”倾关门主义思想，但表明自己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朝着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一步。但是，国民党仍然坚持其反共内战和对日妥协政策，拒绝共产党的建议。宋庆龄首先于2月17日向来华访问的英国文豪萧伯纳，继之于3月8日向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介绍共产党的上述主张，并批评国民党没有作出“任何有效响应”，要求国民党“停止向中国苏维埃进攻。”这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连萧伯纳都认为共产党的主张是一个“很公平的提议”。1935年随着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两党通过4条渠道进行接触，商讨恢复谈判事宜。其中最为重要一条渠道是宋庆龄应宋子文的请求，委托中共特委二科董健吾携带国民党要与共产党谈判意图的密函赶赴陕北瓦窑堡，并由董健吾带回毛泽东、周恩来愿与国民党谈判及谈判5项条件的复函。宋庆龄率先沟通国共两党最高层接触，为国共合作抗日建立头功。在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到来之际，共产党中央于1935年发表了八一宣言，尤其是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并且预见到随着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党可能发生分化，从不积极反对日本到参加反日战线。宋庆龄带头响应八一宣言，赞同瓦窑堡会议决定；还将上述两个重要文件介绍给国际反法西斯战士达德。为了敦促国民党改弦易辙，联共抗日，宋庆龄又领衔要求国民党召开

五届三中全会，并在会上提出“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发表“实行孙中山遗嘱”演说，反对汪精卫坚持“剿共”方针的提案，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原则，要求国民党做到“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尽管未通过宋庆龄等人提案，但是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在国共两党准备建立合作抗日的每一重大步骤中，宋庆龄都是首先支持共产党调整政策，敦促国民党改弦易辙的人物。

国共合作建立后，坚持合作便成为主要问题。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顾全大局，真诚地保持同国民党的合作；国民党却从狭隘的利益出发，不积极地同共产党合作，不时限制、溶化和打击共产党。这样，国共合作就出现了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局面。宋庆龄本着“对中国团结的支持决不动摇，对任何危及中国团结的事情坚决反对”的原则，极有分寸地把握团结和斗争两个方面及其关系，维护着国共抗日合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冰释前嫌，再度携手共赴国难，做了件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头等大事。宋庆龄高度评价国共合作，指出：“我相信两党同志，经过十年以来长期的惨痛教训，再加上日寇无情的残酷的进攻，一定能够本‘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诚信地友爱地团结成一体。唯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她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物质上支持国共合作抗日事业；在8年抗战中，宋庆龄坚持不懈地做着一方面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力争取国际社会的物质援助，对国共双方同时进行救济。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组织了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向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济委员会、设于贵阳的医疗急救训练学校、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医疗工作、延安的抗日大学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援助”。宋庆龄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救济团体，我们始终……向受难平民和自由中国任何地区、任何军队的伤兵提供公平的治疗和公平的救济”。至于为什么要这样

做，她解释说：“我们支持中国的统一战线，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我们的救济工作是建立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的，我们认为自由中国的所有地区都应有得到同等救济待遇的权利。第二，因为我们相信，统一战线和所有抗日力量的合作，是中国继续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的唯一保证。”但是，一旦国民党制造摩擦，发动反共事变，破坏国共两党合作时，宋庆龄便怒不可遏，严厉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说：“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隳于一旦。”她强烈要求国民党“恪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一举手措足之劳，即可奠定抗建基础，安如磐石。”同时正告国民党：“共党问题原为世界性的问题，世界之病态不除，此种组织必存在……即我假武力作一时侥幸之解决，仍必复生滋长，决不能以人工加以消灭，已为无疑之问题。”国民党所以要发动反共事变，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只要一党专政，反对和压制共产党和人民抗战，因此，宋庆龄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在政治民主的万丈光芒照耀下，我们才能发现投降派和卖国贼，才能进而解决我们的问题，加强我们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战争。”不难看出，宋庆龄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国民党，都旨在维护国共抗日合作。

三

宋庆龄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既重视斗争原则性，又讲求策略灵活性。在日本决心灭亡中国的形势下，宋庆龄高度灵活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充分发挥自己的斗争才能，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维护着国共合作。

晚年的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缔造并直到病逝前始终坚持国共第一次合作。宋庆龄是孙中山的伴侣和战友，一贯坚持孙中山国共合作的主张，因此最有资格要求国民党站到孙中山的联共旗帜下。她反复强调共产党忠实地执行着孙中山国共合作的遗愿，

问题是国民党也要这么做，同时强烈要求国民党“应当谨记着，要是不顾先总理遗教，抛弃了工农大众利益，将成为民族罪人，等于国民党的自杀。”对此，国民党是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公开加以反对的。

作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的宋庆龄，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虽然在亲情上同其兄弟姐妹还保持某些接触，但是在政治上却森严壁垒，双方关系降至冰点。华北事变后，她与兄姊冷却了的关系又开始升温；抗日战争前期和中期竟和好如初。1940年宋氏三姐妹联袂由港赴渝，并一道向美国发表广播演说，一时成了海内外关注的新闻焦点。宋庆龄的重大行动，既有感情色彩，又带政治意义，不仅向世界显示国内的团结，而且敦促宋氏家族努力抑制国民党内的投降反共趋势。“这样一来，日本人散布的统一战线正在崩溃的谣言（传得有根有据）暂时平息了下来。”^⑧

自从国民党葬送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宋庆龄多次声明她将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时隔10年，当国内外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她又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名义出面活动，第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抗战建国纲领》。宋庆龄时在香港，未能莅会，但与何香凝联名撰文，评论《抗战建国纲领》，向国民党提出7项要求，其中特别指出：“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先，排除一切不利民族国家之私见，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⑨1942年，在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不久，宋庆龄从香港移居重庆，出席国民党元老林森、覃政、于右任、李烈钧、张继、戴季陶等参加的欢迎她的茶话会，利用这一难得时机，她发表讲话指出：“各党各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万不可兄弟阋墙，手足相残。”^⑩指责国民党违反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则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在8年抗战中，凡是有益于国共合作的事情，她每每积极参与，凡是联络国共两党的工作，她总是慨然允诺。宋庆龄“觉得，

她留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可以体现两党之间的兄弟合作，孙中山晚年曾明确强调这种合作。”^④

宋庆龄是极具声望的国际和平战士，她的言论在世界民主国家是很有份量的。她看到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援助中国抗战时，缺乏应有的公正平等态度，往往忽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既影响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抗战，又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共逆流，从而威胁着国共合作，于是呼吁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应当给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予同等的份额。“把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品和礼物平等分给一切积极抗日的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凡是不这样做的军队，就不予分配。”只有这样，才能增进国共合作，因为“捐赠象征着外国对中国团结抗日的兴趣，间接地削弱了破坏团结的力量。”而国共合作的坚持，才能赢得抗战的胜利，也才能帮助美国对日作战和保卫美国安全。”“中国战斗得越有力量，对日战争就越会缩短，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越会减少”，“中国的胜利意味着美国的安全。”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宋庆龄是在同国共第二次合作中走过来的。为了打败民族的穴敌，她在理论上提出深刻的见解，精辟论述国共抗日合作的原则；在实践上进行一系列重要活动，坚决支持国共抗日合作的事业；在策略上采取极富灵活性的举措，努力维护国共抗日合作的关系，从而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和独特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兰州商学院马列部)

注释：

- ① 《宋庆龄逸集》上卷第 214 页，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 ②④ 《斯诺文集》第 1 卷第 268、101 页，新华出版社 1984 年 8 月第 1 版。
- ③ 《宋庆龄纪念集》第 99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3 月第 1 版。

宋庆龄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杨振亚 沈 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对外来侵略战争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因此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除了世界上反法西斯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外，主要还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之故。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宋庆龄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曾作过特殊的贡献。即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过程的三个环节上，她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沟通两党中央的联系

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中，两党的合作与分裂，关键决定于两党中央政策的变化，两党的政策又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自从1927年7月15日，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全面分裂以后，两党就处于敌对状态，拼杀了10年之久。两党中央的联系也随着两党的全面分裂而断绝。直到1935年下半年，由于国际法西斯的猖獗，许多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共产国际为领导各国共产党建立起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于1935年7月，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反蒋”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共中央在得知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之后，于12月下旬，也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中国共产党和杨虎城的第17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先后达成了抗日救国协议，形成了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这个联合成为国内逼蒋抗日的基本力量。

1935年秋，“华北事变”以后，蒋介石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扩张，乃企图亡我整个之中华民族，使我堂堂中华永作彼之附庸而后止。他也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一旦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必将首先占领沿海的城市和港口，断绝中国的外援，蒋介石认为中国没有外援，就无法抗日。面对这种情景，他不得不考虑与中国有广阔陆境相连的苏联。苏联当时面临东西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威胁，为了摆脱这种险境，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的扩张，也需要中国拖住日本，因此也愿意援助中国。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就必须处理好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唯恐苏联援助中国的同时，支持中共发展壮大，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因此他要想方设法解决中共问题。在他了解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后，他改变了过去那种一味的军事“围剿”的办法，在不放松“围剿”的同时，又采取了政治“招抚”的一手。为了寻找与中共的联系，先后找到了几个线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找到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中共中央接通了联系。宋庆龄委托中共党员董健吾等去陕北寻找中共中央。他们于1936年2月27日到达陕北瓦窑堡。次日，董健吾（进苏区后化名周继吾）即将宋庆龄托带的密信呈递给在瓦窑堡留守的中共中央常委博古等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顷蒋尚有款^①。3月4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联名致电“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明确表示中共“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与南京当局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

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⑨董健吾返回南京后，即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从此国共两党高层之间断绝了几近十年的联系，是经宋庆龄之手接通了，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酝酿，此后不久，即开始了国共两党代表之间的谈判，使两党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日后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的发展仍然是坎坷不平的，但是，两党中央的关系毕竟疏通了，两党关系史上的新时期也随之开始了。

二、消除两党长期的对抗

在宋庆龄的帮助之下，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接通以后，为处理好两党的关系进行了两党代表的谈判。中国共产党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就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揭露，号召和“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⑩次年4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以后，又发布了《对日宣战通电》，正式宣布对日作战，愿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可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围剿”红军，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于不顾，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九一八事变以后，直到国共两党中央重新恢复联系，仍不思改悔。两党代表开始谈判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却把中共的“联蒋抗日”政策看作软弱可欺，妄想通过谈判来达到收编红军的目。为此，蒋介石一面派代表与中共代表谈判，而另一面，却又调集重兵继续“追剿”红军，企图把红军赶进蒙古沙漠，使其无法生存，以达到最后“招安”的目的。1936年11月10日，中共代表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会晤。潘汉年把周恩来致陈立夫、陈果夫、

蒋介石的信交给陈立夫，陈立夫也转述了蒋介石的意见：首先是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 3000 人至 5000 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取出洋，半年后回国，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按此办法解决，中共所提政治各点就好考虑。潘汉年当即予以严正驳斥，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并指出，两党应该合作抗日，建立全国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建立两党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双方保持政治上组织上之独立性等。^④陈立夫一再强调蒋介石之旨意在于必须首先解决军事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办，并提出请周恩来出来谈判。潘汉年也明确地予以答复：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能出来谈判的。中共坚持原则，诚恳相劝，希望蒋介石能回心转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还通过宋庆龄以及通过与张学良、杨虎城结成的“三位一体”，从国民党内部逼迫蒋介石改弦更张。可是蒋介石却痴心妄想，非置中共“就范”不可。

1936 年 12 月 4 日，蒋介石从洛阳到西安，对张学良、杨虎城宣称：“剿匪已进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⑤张学良怀着满腔救国热血，一再向蒋介石哭谏，希望他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蒋介石却捶案教训：“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⑥12 月 9 日，蒋介石召集参谋人员会议，决定在 12 月 12 日颁布第六次总攻红军命令。如果张、杨不服从命令，就解除张、杨武装。^⑦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提出：红军可以在抗日救亡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指挥，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在抗日战争中扩充，国民党方面如有诚意，必须立即停战，以此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⑧可是，蒋介石却顽固不化，既不接受中共的建议，也不听张学良的劝谏，一意孤行，对张、杨教训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

即可全部解决。”^⑧杨虎城认为已无法挽回，只有兵谏了。宋庆龄当时也“曾敦促张这样做。”^⑨从以上可知，是蒋介石把张学良、杨虎城逼上了梁山。

1936年12月12日，就在蒋介石要颁布第六次总攻红军命令的这一天凌晨2时许，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和随从他到西安的一批高级将领。当天，宋庆龄得知了这一消息后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⑩宋庆龄事先就知道张学良打算要干这事，她甚至怂恿过他这么干，她告诉他：“你得有所作为，洗耻雪辱。”^⑪中共中央这一天也知道了，并且立即致电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要其发动人民“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交人民审判。”^⑫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⑬从以上资料看，我们可以知道宋庆龄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第二天，12月13日下午，宋庆龄突然改变了态度，要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⑭宋庆龄对蒋介石态度突然变化的原因，看来有两点：一是她得知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从12日深夜至13日凌晨3时，举行的联席会上，主张派大军围攻西安的何应钦等讨伐派占了上风。”^⑮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⑯二是她得知了斯大林的电报内容，并将电报转给了毛泽东。“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介石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⑰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宋庆龄以国家利益为重，只好拂逆个人的感情，愿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与此同时，宋庆龄把电报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勃然大怒”，“连连顿足。”^⑱但是，经过痛苦的讨论以后，19日，中共中央已经明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周恩来说：“我们一个星期没睡觉，想法来做出决定，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

决定的事。”^②可见中共中央的领导者们也同样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抑制住了个人的感情，终于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6项协议以后，才答应释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蒋介石改变了政策，被迫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达到了西北“三位一体”的预想，实现了“联蒋抗日”的策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内政局转变的枢纽，成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开始。从此结束了国共两党10年的敌对状态，走向合作抗日的新阶段。宋庆龄在消除两党长期对抗的过程中，又起了关键的作用。

国共两党的敌对状态虽已解除，但是，要达成两党正式合作，仍然有一段艰难的路程。在促成两党合作的形成过程中，宋庆龄又作了不懈的努力。

三、促成两党合作的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从对抗走向了合作。但是，国内和平并不巩固，蒋介石依然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只不过是变换了手法，从过去的军事“剿共”，变成了政治“溶共”，对红军也从过去的军事“围剿”，变成了和平“缩编”或收编。为实现国共两党平等合作，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斗争。在这9个月中，宋庆龄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建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为切实履行停战协议，1937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向红军高级将领发出指示：“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等之进攻，……请他们亦勿再有攻击行为。”与此相反，1月1日，何应钦却下令中央军挺进西安，国内和平顿受威胁。为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行为进行斗争，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允诺的六项条件。并指出蒋氏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

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⑨11日，周恩来致信蒋介石再次重申：中共历来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方针。只要中央军不向西安方面部队进攻，红军就不参加内战。1月30日，西安、南京方面在潼关谈判，经过商谈达成协议，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到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返回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常委由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这样才避免了内战的发生。

为了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早日形成，中共中央致电在上海的冯雪峰，要大造舆论以促蒋介石实行在西安的诺言。2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这是对国民党作出的重大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⑩

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在她中断了与国民党中央十年的联系之后，第一次出席了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她按照“九一八”五周年时毛泽东的来信委托：“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请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⑪为此，她领衔和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李石曾、孙科、鹿仲麟、李烈钧、梁寒操、经亨颐等14人，联名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关于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提案》。“提案”指出：“总理于民国十三年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之三大政策后，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民国十六年以来，内争突起，阵营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凡属血气之伦，莫不椎心泣血。”接着又指出：“本党同志负革命成败、民族兴亡之大任，将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将何以慰诸先烈不死之英魂，更何以

告数万杀身成仁残手断足之革命将士？”“提案”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继而呼吁立即恢复三大政策，以救国家于危亡：“虽与本党向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⑨

18日，宋庆龄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大声疾呼，慷慨陈词，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焦灼地注视着它。中国已经被日本的侵略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牺牲已经不可避免。”“只要政府能够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们，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

接着，她针对亲日派汪精卫在会上的反共叫嚣，进行了义正词严地批判：“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有些个别人士仍然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她接着严厉地责问那种人，难道“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看抗日吗？”最后，她既沉痛地回顾了过去的教训，又唤醒人们重视当前的责任，她说：“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了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经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我坚决相信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能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⑩

在宋庆龄演讲的感召之下，抗日派与亲日派进行了斗争，否决

了汪精卫提出的、以坚持“剿共”为中心内容的政治决议草案。会上虽然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说明蒋介石等仍然妄想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达到“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目的，但是，对中共“国共合作的提议，也并不表示拒绝。”^②“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局面基本到来，这就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从而进入了两党代表为建立正式合作的谈判阶段。

国共两党代表的正式谈判，从1937年2月12日开始，直到9月21日，蒋介石同意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止，长达7个多月，进行了多次艰难谈判，终于达成了在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的基础上的合作。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的基本内容是：（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为此，中国共产党郑重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③

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发表谈话。这个谈话实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④

宋应龄对国共两党的谈判时时给予密切的关注,对中共的主张表示坚决的支持,并为促成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尽心尽力。9月24日,在她得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形成之时发表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她说:“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回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兄弟党,在最近十年以来,互相对立,互相杀戮,这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不及想到的。到最近,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重新握手,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①

从以上可知,宋庆龄对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无私无畏地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她也为自己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而感到欣慰。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对外来侵略战争中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宋庆龄的功勋也在这一页中永放光芒。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 注释 ·

①⑦⑧ 转引自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49页、第575页、第574—575页。

②④ 《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4期第2页、第8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

⑤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⑥ 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31页。

⑦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21页。

⑧⑨⑩ 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⑪ 193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胡服(刘少奇)。

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 1936 年 12 月 13 日。

⑮⑯ 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宋庆龄纪念文集》第 113 页。

⑰ 毕万刚,《斯大林、宋庆龄与西安事变》,《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4 年第 5 期。

⑱⑲ 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版第 2、4 页。

⑳㉑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47 页、第 364 页。

㉒㉓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 138 页、第 194 页。

㉔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61 页。

㉕㉖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7)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 451 页、第 449—451 页。

㉗ 《解放周刊》第 18 期。

㉘ 《宋庆龄选集》第 205 页,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宋庆龄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贡献

陈小琴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宋庆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推动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团结御侮的过程中，为体现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两党之间的合作，她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为促成和巩固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整个抗战时期，她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始终高举抗战、团结、民主的旗帜，一方面团结、督促蒋介石政府抗战；一方面又坚持不懈地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投降分裂活动和独裁统治作斗争。宋庆龄牢牢把握住了“团结”这个民族力量的凝聚点，以无私无畏的气概，顶住强大的压力，以斗争来促进和维护民族抗战的大业，并义无反顾地为之付出自己的心血与汗水。“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她的政治主张表达得最有说服力和动人的时期”^①。处于中国当时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下，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宋庆龄的地位和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对中国发动侵略。此时，正在江西“督剿”的蒋介石不顾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竟电令张学良，“力避冲突、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在蒋的不抵抗命令下，日军长驱直入，迅速吞并东北三省，直逼平津、华北告急。在这严重的民族存亡关头，如果不把一切可争取的力量都调

动起来，进行抵抗，中国就将有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灭的危险，它的人民将遭受双重奴役。

1933年初，宋庆龄与江苏和上海的地下党筹备成立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3月8日，她在筹委会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且提议与任何军队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②这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第一次宣传中华苏维埃政府的统一战线方针“当时的中共和红军除受到军事进攻和白色恐怖外，还受到严密的新闻封锁……，现在宋庆龄传播了中国的重要主张，这可以说是从1927年武汉时期以来她同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整体——的第一次正式合作。”^③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发表狂妄声明，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将进一步大举侵略中国的野心。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四月二十日，经宋庆龄以《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与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迅速获得各界人士的拥护，先后在《纲领》上公开签名赞成的达十万人，掀起了在国统区内抗日救国的群众性运动。

红军长征后，蒋介石在“围追堵截”红军的同时，开始运用政治手段，谈判方式，以迫使中共向国民党“输诚投降”。

1935年冬至1936年春，蒋介石派人先后在国际国内多条渠道打通与共产党的联系。开始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秘密接触和谈判。

1935年底，宋子文受命和宋庆龄商议，派一名使者进入陕北，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由于宋庆龄细心周密地安排，使正在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共领导人，得到了国民党决策层愿意在这一基础上直接谈判的确实讯息，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初步接触，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

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1936年9月，潘汉年从陕北到上海。他携带着中共中央拟定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致宋庆龄信等重要文件，来与宋作具体磋商。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中提出：

“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④

为了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尽早实现，宋庆龄在将近十年没有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之后，于1937年2月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上，与亲日派、投降派展开了激烈斗争。宋庆龄会同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向全会提出了《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二月二十八日，宋庆龄在全会上作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讲演。她严厉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恐日”病，强烈要求国民党改变反共内战政策，指出：“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些个别人士仍然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做抗日吗？”^⑤

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她引用孙中山的遗嘱强烈号召建立统一战线，斥责反对停止内战的政府领导人。宋庆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种近乎神奇的感召力，在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日子里，她把两桩极艰难的使命溶于一身；即让孙中山理想的火炬不灭和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她原来是个不愿抛头露面的腼腆女性，但此时，她却成为一个公众领袖。由于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的据理力争，会议经过激烈斗争，确定了对外维护领土主权、对内进行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处理与共产党的关系上，由武力“剿共”的方针改为“和平统一”的策略，标志着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的重大转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平津，沿津浦路南下，中国共产党接连数次致电蒋介石，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

的新进攻。”7月15日，周恩来到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年，“八一三”事变发生，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月19日国共两党就此达成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布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⑥

9月24日，宋庆龄撰写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她欢欣鼓舞地写道：“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地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她希望两党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诚信地友爱地团结，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

在全面抗战初期，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战，促进了全国的团结和进步，增进了中华民族的抗战信心，形成了强大的抗日高潮，广大爱国官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勇气和决心。1937年宋庆龄在秘密撤离上海前写给斯诺的一封信中说：“中国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过。他们在为世界和平、改善社会、经济秩序、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共同斗争。”^⑦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加强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在日本诱降阴谋的蛊惑下，国民党内妥协、投降的情绪迅速增长。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激起全国人民无比愤怒，举国上下一致要求当局对此等逆贼予以严厉制裁。

为了使统一战线得到巩固与发展，宋庆龄逐渐将她的活动公开化，任何有助于抗战胜利的事业她都尽力去做。内战的停止和统一战线的建立，也给政见不同的三姐妹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她们第一次丢开了原先存在政治分歧，轻松、愉快地尽情享受姐妹亲情给

她们带来的温馨和欢乐。她们一起闲话家常，一起下厨烹调，相互开着轻松幽默的玩笑，说着外人不得而知的生活趣事。

为了还击投降派，宋庆龄此刻与她的姐妹一起在公众场合露面，并同意和她的姐妹一起去重庆。“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访问国民政府所在地”。再次向人们显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巩固的。宋氏三姐妹的“统一战线”的确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重要的反响。它对鼓舞人民的抗战热情，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现代史中，没有哪一个家族能够像宋氏家族那样，对中国的政坛和政治产生如此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氏家族内部关系的变化，也就是中国政治气候及国共关系变化的风向标。“她的两个姐妹竭尽全力夸示宋家难得的大和解”，她们想使她显得完全同意蒋的政府，所有不同政见均已消除。但是，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公开宣传背后，宋庆龄保留着自己的立场，她没有忘记自己和她重庆的主人之间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正如她在战后所说：“我尽量避免政治上的争论，因为这对（抗战）事业是有害的，我保持沉默是因为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打赢这场战争上。”

1939年7月7日，宋庆龄发表《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她强调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需要举国一致以及国际上的团结一致，同时批评破坏“两个一致”的人。首先，中国的保守派一直妨碍着统一战线的发展；第二，外国的反动分子想同日本在远东进行妥协，借口是战斗下去的中国可能要“赤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法西斯国家进一步合作。这充分体现了宋庆龄一贯强调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紧密相联的观点。她以不懈的努力和充分利用自己独特身份的优势，成功地争取了国际反法西斯国家的声援和支持，为配合中国共产党，坚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宗教事务局）

注释:

- ① 爱泼斯坦,《为了国际友谊和了解》,《中国福利会五十年》105页。
-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142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③ 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337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62页。
-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163—164页、167页。
- ⑥ 《中国国民党史》427—429页。
- ⑦ 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10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试析宋庆龄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翟作君 王蕙炎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抗日，兵谏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后，全世界都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时因坚持孙中山革命主张而受到蒋介石威胁迫害的宋庆龄曾经有过的表示：“如果我处在他（指张学良）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的，只是会做得更甚于此。”然而，出于强烈的责任感，考虑到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局的需要，冰释前隙，不念旧恶，于翌日——13日便打算约何香凝、胡子婴等一起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要答应抗日。宋庆龄此举是出于本意抑或受外来影响呢？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庆龄不论是表示支持张学良的举措，还是打算前往西安劝说张学良有条件的释放蒋介石，都是在情理之中的。她的一切言行都基于中华民族之利益，中国革命之利益，对西安事变之态度，正是这一点的体现。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她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或党派之间的得失及恩怨。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她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为捍卫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同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长期的、不懈的斗争。然而，孙中山逝世不久，自称是孙中山忠实学生的蒋介石

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大肆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在南京建立起了与武汉政府相对抗的另一个国民政府。当时，宋庆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委员，在武汉参与领导工作。蒋介石为了利用宋庆龄在国民党元老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争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先后派孔祥熙和宋子文秘密前往武汉劝说宋庆龄支持南京政府。宋庆龄断然拒绝，并积极参加武汉地区的讨蒋运动。

随着国内形势的恶化，披着国民党左派外衣的武汉汪精卫集团于7月14日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分共”，准备公开背叛革命。汪精卫邀请宋庆龄与会，宋庆龄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而且在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发表了著名的《为抗议违犯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强烈谴责蒋、汪背叛革命的罪行，明确表示退出国民党中央。她在声明中郑重宣布：“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图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①

为了继续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宋庆龄决定赴苏访问。这次出访，原本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生前“亲赴莫斯科与苏联友人会谈”的遗愿。然而，在国民党右派公开背叛革命以后，宋庆龄的这次访苏便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1927年8月，她在离开上海前发表了《赴莫斯科前的声明》，指出她此行不仅仅是要去完成孙中山临终时的嘱托——完成一次出访，而且她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目的还在于要使中国、苏联和世界人民相信，尽管中国革命暂时受挫，“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并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②1927年9月1日，宋庆龄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陈友仁陪同下抵达莫斯科。9月6日，宋庆龄在莫斯科发表声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破坏国共合作，革命的联合战线已经破裂。”“那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人，虽然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国

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他们是“为了个人利益和权势企图把中国拉回到军阀混战的老路上去”。^⑨宋庆龄在声明中表示自己代表“国民党左派”，要继续执行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为推进新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又步步紧逼，大举进攻华北，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在此紧急关头，蒋介石政府非但不积极抗日，反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镇压抗日民主运动，迫害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痛恨。1931年12月19日，她在上海发表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揭露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以及它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各种投降主义活动。声明谴责了蒋介石国民党的个人独裁、争权夺利、剥削群众、残害革命者的种种反动行径。声明说：“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在地方上，他们也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私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至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宋庆龄一针见血地揭露蒋介石之流所叫喊的“和平”，“不过是和平的分赃”，叫喊的“统一”，“不过是对群众进行统一的掠夺而已”。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明确地表示：“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认为“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

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②当时，在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下，环境极端困难，宋庆龄以她的特殊身份和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进行了大量的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工作。如她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便营救过许多革命志士和爱国人士，其中有红军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陈赓、全总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全总宣传部长及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邓中夏等。这些营救工作有的是宋庆龄基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主动做的，有的则是应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同中共党组织配合进行的，也有的是应共产国际与苏联的要求而进行的。如营救牛兰（驻沪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一事，宋庆龄就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牛兰于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被逮捕。是年7月，宋庆龄在柏林得知母亲倪桂珍去世的消息后，为回国奔丧途经莫斯科时，曾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了秘密会谈，具体内容虽未公布于世，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即宋庆龄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了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机构上海站负责人哈尔德·左尔格和中共中央保卫部潘汉年统一领导的营救牛兰的活动。宋庆龄出面邀集了杨杏佛、斯诺等32人成立了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并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她不辞辛劳，做了大量营救工作。1937年底，牛兰夫妇越狱成功返回苏联。

在这一时期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来自共产党的要求或是共产国际的要求，只要是革命的需要，是民族利益的需要，是反帝的需要，都是符合宋庆龄的主旨的，她都一如既往竭尽全力而为之努力奋斗。

二

宋庆龄在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是和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一致的。

共产国际、苏联对张学良兵谏蒋介石不满，是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1935年冬，苏联和南京国民政府关系进一步改善，这对于共产国际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立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南京政府曾探求过同日本政府妥协的政策，但日本方面却提出了要南京国民政府停止联合英美，而与日结成联盟；承认“满洲国”和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利益；同日本联合行动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等三项条件。这种强盗式的回答使蒋介石政府无法接受，只得试求与苏联建立反日联盟；而在苏联方面也出于其对远东的需要，希望与南京政府形成默契。1935年底，陈立夫全权代表南京国民政府访问苏联，回国后，不仅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洛夫保持了接触，而且同共产国际也开始来往。因此，1936年5月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便断然停止了“反蒋”宣传，并强烈要求中共实行“联蒋”策略。基于这样的策略，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对待1936年6月发生的两广事变便采取了谴责态度，指责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动中国内战，以便掩盖对华北的新的进攻，其真实的原因则主要是因为两广事变提出了“抗日反蒋”的口号，而反蒋不符合他们的本意，他们认为“建立统一战线主要是同蒋介石会谈”，只要蒋介石同苏联结成反日联盟，蒋就会“加入抗日阵营，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领导者。因此，西安事变一爆发，苏联立即表明他们在事变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中心去团结各派政治力量的新政策，故而“没有共谋绑架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罪过。”^⑥

但是，中共中央在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上与共产国际苏联是有所不同的，而且有一个发展过程。当两广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认为在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同时，不能违背革命力量发展的原则，即决不放弃同反蒋的各派军阀的联合，唯有这样，才能从“反蒋抗日”进而“逼蒋抗日”。认为两广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意义”^⑦因而发表声明予以热情支持。1936年起，国内形势发展表

明吸收蒋介石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一定的可能性。这年，国民党领导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通过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与中共中央有了接触，董健吾带回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南京方面提出的关于停止内战等五项具体要求，国共两党高层之间的联系打通了。而且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改善也有利于推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于1936年9月1日发出了《中共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标》，指明“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联合”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党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②在中共中央确立“逼蒋抗日”策略方针三个月后，即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及由他率领赴西安的全部高级军政将领，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当日，张学良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意见，速复。”^③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即电复张学良，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将钳制胡宗南、曹万宗、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并告知周恩来将赴“兄处协商大计”。^④西安事变的发生充分说明中共中央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中国共产党只有联合国内主张抗日的各政治派别才能迫使蒋介石加入抗日阵营。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顿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日本外相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政府“反共防共”。12月21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会见张群，声明张学良所提的八项主张“在思想上和日本为东亚大局着眼的根本方针，恰恰相反。”^⑤显然，日本帝

国主义为图改变事变的目的方向，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与张、杨、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以便从中渔利。

英、美则鉴于日本独霸中国的步骤严重威胁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深知中国大规模的内战只会有利于日本，南京政权也有落入亲日派之手的危险，故积极赞成西安事变和平解放。

英、美、日对西安事变的不同态度，反映在南京政府就是亲日派与亲英美派的对立。事变发生的当天，南京即召开了国民党中常委、中政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委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①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坚决主张“讨伐张、杨”，扬言要炸平西安。想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他们一面调遣大军逼近潼关，一面也促汪精卫回国，以便组成亲日派政权。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英美派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宋美龄连夜从上海赶回南京，一面亲自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讲话，反对进攻西安；另一方面与英籍顾问端纳密切合作，积极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共产国际、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表示了极大的愤怒，毫不犹豫地谴责了张、杨。1936年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第一版以显著地位报道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说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同时发表社论《中国的事变》，说“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中国效劳。”说张学良“在外国主子的授意下，竭力在中国制造新的有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侵略计划的混乱局面。”与《真理报》报道西安事变和发表社论的同一天，《消息报》发表了署名文章维护蒋介石国民党说：“去年就已形成了中国各派社会力量围绕着南京政府的形势，南京政府尽管以前它动摇、退却……它犹豫和反对统一战线运动，可是现在它已经表现出愿意和能够领导抗日。”^②《国际通讯》等共产国际刊物也不断地把张学良说成是“叛

徒”、“强盗”。在何应钦打起了“讨逆”旗号，命令中央军开赴潼关，派飞机滥炸渭南、赤水车站时，《国际通讯》却称赞南京“讨伐”是值得赞扬的形势变化，称赞蒋介石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制止这一惩罚性的征讨。”^⑧直到蒋介石被释放时，《国际通讯》还说“叛徒张学良在陕西的叛乱已经可耻地结束了。这是导致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日本阴谋的真正失败。”

广大人民群众对张、杨扣押蒋介石理所当然地拍手称快，并坚决要求给他的惩罚。因此事变发生后，不管在西安或是在保安，都有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杀蒋呼声很高。12月12日到16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与南京政府的电报，《红色中华》报上的公开舆论都曾提出过“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当时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面前的严峻问题是：在复杂的形势下如何处置蒋介石？如何正确解决西安事变才符合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为此，中共中央随即对事变产生原因及对事变的处置作了正确的分析。1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国际对张、杨举措的错误指责，明确指出：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⑨党中央认为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⑩指出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是为了要以西北的统一战去推动全国的统一战线，因此中共决定反对新内战，“主张在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12月18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国民党立刻实行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条方针。同时指出，若能实行，不但民族国家得救“即蒋氏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从此，“罢免蒋介石”、“公审蒋介石”等口号不再提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罗瑞卿等应张、杨

的多次请求，于12月16日到达西安，坚定地执行了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当时西安的群众团体、各界人士，包括党的一些干部，对释放蒋介石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特别是由于日本特务分子的猖狂活动，一些受汲“左”观点欺骗的群众，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整个西北军，都不赞成轻易放掉蒋介石，认为放蒋回南京，无异“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但是中共中央在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后，分析了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审时度势，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唯一的正确方针。经过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坦诚磋商，顶住了国际的压力，坚持通过谈判，坚持了必须放弃“剿共”打内战，答应抗日才能释放蒋介石的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指导下，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声援下，经过努力，排除了各方面的干扰、破坏，终于以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结局而解决。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做法恰恰与宋庆龄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所表示的将“亲自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必须答应抗日”的主张不谋而合。宋庆龄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与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如此的一致，表明了宋庆龄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保卫民族的利益，保卫祖国的利益，是她一切思想行动的出发点。正如她所强调的：“中国目前正处在战争之中”，“所有军队的当务之急是：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任何阻碍此战线形成的做法，都是在犯罪。”她呼吁：“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⑨

宋庆龄对西安事变的主张与明确态度是她为中国前途与命运而献身的伟大胸怀与崇高人格的一个小小侧面，也是她一生谱写的火红革命乐章中的一个音符。对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难道是一些所谓的“外来因素”所能左右的么？！

（作者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法系、上海市第二中学）

注释：

- ① 《宋庆龄选集》第 18 页，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
- ② 《宋庆龄在上海》画册第 74 页
- ③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 14 页，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
- ④ 《宋庆龄选集》第 51—53 页，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
- ⑤ 阿本德，《我在中国的生活 1926—1941》
- ⑥ 1936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
-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85 页中央档案馆
- ⑧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 620 页
- ⑨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 621 页
- ⑩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 624 页
- ⑪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 621 页
- ⑫ 苏联《消息报》1936 年 12 月 24 日出版
- ⑬ 《国际通讯》第 52 期 1936 年 12 月 24 日出版
- ⑭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 621—622 页
- ⑮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1936 年 12 月 19 日
- ⑯ 《纪念宋庆龄文集》199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宋庆龄在抗战前期

陆 诒

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宋庆龄即以其献身中国革命和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战争的实际行动而享誉全球。她曾与当时国际上为人类正义和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杰出人物高尔基、罗曼·罗兰、蔡特金、巴比塞等并肩战斗。人们一致称颂她是，“伟大的孙逸仙理想的真实的继承者”。

她是 1927 年 12 月在比利时和 1929 年在德国召开的两次反帝同盟大会的名誉主席，1932 年她又是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大会的执行委员。在 1933 年，她被选为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主席，又是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副主席。她像磁石那样凝聚并团结了大批国际主义战士，如史沫特莱、马海德、埃德加·斯诺、爱泼斯坦、路易·艾黎等，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不息。

西方人每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认为是从 1939 年 9 月 4 日英、法对德国宣战日开始的。而我们中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侵略，即使不远溯到甲午之战，至少也应该说早从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军进攻沈阳的北大营时就开始了！

宋庆龄同志很早就提醒国人警惕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有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危险。她说：1931 年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国早就在战争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①她这句预言后来果然由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证实了。

她旗帜鲜明地支持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在上海挑起淞沪战争，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市各界人民热烈支援和激励下奋起抗战，使敌军屡吃败仗，粉碎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少将所称的4小时内解决战斗的狂妄野心。

当时，我作为上海《新闻报》实习记者，曾于1932年2月7日第二次到真如十九路军军部访问军长蔡廷锴。蔡将军对我叙说战况之外，又微笑对我说：“昨天（2月6日）孙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夫人曾亲临军部亲切慰问，还带来不少慰劳品，这对全军将士真是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孙夫人还告诉我们，她与廖夫人何香凝、杨杏佛先生等正在筹备成立国民伤兵医院，专门救护并治疗十九路军在前线受伤的弟兄们。”在2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到吴淞要塞前线指挥所访问十九路军七八师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将军。他对我说：“当我们从闸北前线调来接防吴淞阵地时，吴淞要塞的露天炮台早已被敌机炸毁，吴淞港口连遭敌舰炮击与敌机轰炸，已成为一片废墟。敌人发动海、陆、空军协同作战的攻势，企图在吴淞和宝山登陆。有好几次敌军的进攻，都给我军奋勇击退了。最使我们激动的是，孙夫人宋庆龄还在两天以前，由一位女秘书陪同，冒险亲临吴淞前线指挥所来慰问。我恭敬地向她汇报近日战况，并劝她以后不要冒险到吴淞来，因为这里日夜有敌机侦察、扫射，还有敌舰上排炮的轰炸，危险极了！上海各界妇女日夜缝制的丝棉背心，如今都分发到前线，穿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热血沸腾，士气振奋。”孙夫人说，不到前线来看望你们，我心里总是不踏实，现在看到你们了，我就放心了。这是我访问前方将领时，听到他们讲述宋庆龄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932年12月30日假座上海南京路华安人寿保险公司8楼（今华侨饭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并宣告同盟成立。我出席这次会议，见到杨杏佛、胡愈之、邹韬奋、鲁迅、郁达

夫、史量才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当时她任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与英文《中国论坛报》编辑伊罗生等人。那天同盟主席宋庆龄因病未出席,由同盟副主席蔡元培代表她在会上宣读书面发言稿。她在发言中说:“我们的组织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换句话说,民权保障同盟是倡导和保卫出版自由的。因此,新闻界为它自身的利益,应该热忱地赞助这一组织。”

我参加同盟的政治活动,并为它作新闻报道。主要活动有营救国际友人牛兰夫妇,营救北平被捕各校师生许德珩等,抗议枪杀江苏镇江《江声报》记者刘煜生案和营救中共党员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陈赓、陈藻英及作家丁玲、潘梓良等。又在5月13日上午,由同盟正副主席宋庆龄、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等亲赴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希特勒法西斯暴行。

宋庆龄主席认为反帝抗日与争取民权、释放政治犯运动,两者有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民权保障同盟作为团体会员,也参加国民御侮自救会的筹备工作。1933年3月下旬,国民御侮自救会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时,同盟主席宋庆龄和总干事杨杏佛都出席讲话。宋庆龄在讲话中号召全国各城市和乡村一致奋斗,要求:(1)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适当的军械与飞机,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收复满洲、热河,保卫祖国。(2)人民应全部武装起来,组织人民自卫团。(3)人民的民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应立即恢复,对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与杀戮应立即废止。(4)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地区的进攻。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欢迎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派遣来华调查团的筹备工作。^⑨

1934年4月20日,宋庆龄与何香凝等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日本劳动民众、朝鲜人等等)作为友军;同时,与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同

情援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建立友谊的关系。”^③

1936年8月，宋庆龄委托钱俊瑞作为个人代表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呼吁“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不但要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还要反对日本军阀、财阀的法西斯主义。”同时还揭露蒋介石集团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性，指出这种法西斯主义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出卖领土主权，是帝国主义帮凶，因此必须加以反对。^④宋庆龄以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统治的坚定立场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在中国全面抗战前夕，即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具有崇高威信的领导着之一。

在国内，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宋庆龄一贯支持中国各界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特别在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抗日示威游行之后，全国各地抗日救国运动正如燎原之火，引起连锁反应。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礼堂举行。会议通过章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等为常务委员。全教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就在同年6月2日，沈钧儒和章乃器将全教会的宣言和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亲自面交给上海市长吴铁城，希望得到当局的认可，取得公开合法地位。吴铁城不仅不予承认，反而在6月5日他所召集的全市大、中学校校长茶话会上，诬蔑全教会是“少数野心家操纵的反动的东西”，还扬言将取缔一切救国团体，逮捕救国会负责人。对于这种诬蔑和恐吓，沈钧儒和章乃器誓不屈服。宋庆龄闻讯后，曾于6月5日写信给救国会领袖，完全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并庄严声明：“签名于这救国会纲领和宣言之后，我充分支持这个纲领和宣言。”^⑤

正当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国民党当局突于1936年11月23日，在上海先后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旋即移解，关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全教会于11月24日和27日发表《紧急宣言》和《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领袖，保护救国运动，实现抗战。宋庆龄特于11月26日严正声明：“余以全国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鉴于全国救联七领袖被捕，特提出抗议，反对此等非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她愤慨地表示：“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

与此同时，绥远发生局部抗战，傅作义将军出兵收复了敌伪据点百灵庙，全国人民奋起支援绥远抗战。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当日通电全国，其中提到：“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通电中所提八项政治主张之一，就是要求立即释放救国会领袖。

宋庆龄通过宋子文和中共方面的联系，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内战的爆发。国民党于1937年2月中旬召开三中全会，宋庆龄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14人在会上联合提出了《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使救国会为之全力奋斗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局面，开始出现曙光。但历史的发展，有时是曲折前进的，当时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彻底转变，他们对一切爱国运动，竟视为“危害民国”。同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竟罗织“危害民国的十大罪状”，对沈钧儒等一案提起公诉，并通缉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等，又于6月11日和25日两次在苏州开庭审讯。

6月25日，当沈钧儒等一案第二次公开审讯时，宋庆龄、何香

凝、彭文应、张定夫、胡愈之、潘大逵、王统照、张天翼、沈兹九、胡子婴、陈波儿等 16 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向江苏高等法院联名具状，表示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应与沈钧儒等同受制裁之列，要求悉予羁押审讯。第二天，宋庆龄等又向上海新闻界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宣言中说：“我们准备去入狱。不是专为了营救沈先生等。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七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⑧7月5日上午，宋庆龄等 11 人，满怀义愤，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苏州，要求江苏高等法院予以收押，使法院负责人狼狈不堪。救国入狱运动，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有力支持和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逐步形成。7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沈钧儒等“七君子”交保释放。

从 1937 年 10 月至 1938 年 6 月，宋庆龄连续发表《致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的信》、《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告英国民众书》、《向全世界妇女申诉》、《苏联的和平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援助》等对海外的信函、演说和文章，呼吁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法西斯主义对全世界的战争威胁。1938 年 6 月，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这是一个致力于争取国际援助以帮助中国抗战的救济工作的机构，它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就是援助反侵略战士打胜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并保证维护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维护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不受危害。保卫中国同盟始终保持与全世界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世界和平的斗争团结一致，实际上成了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系起来的桥梁和纽带。它一成立即得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广泛支持，并吸引了许多国际友人参与其工作，从而产生重大的影响。

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作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战胜种种艰难险阻,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争取到了广泛而有力的国际援助,各国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对全国难民、伤兵、战灾孤儿给予了多方面的救济,特别是支援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队所开展的人民战争,促进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不仅增进了一般国际人士对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的了解。还对一些国家的中上层决策者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扩大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国际影响,宋庆龄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是永垂不朽的!

(作者工作单位:解放日报社)

注释: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② 见1933年3月27日英文《中国论坛报》第2卷第3期。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④ 见钱俊瑞所写《痛悼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一文,《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

⑤ 信件原文,见1936年6月14日《救亡情报》。

⑥ 见1937年6月27日《申报》。

宋庆龄与十九路军

李华明

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一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军队。它的前身是爱国将领邓铿领导的粤军，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建为国民革命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许多官兵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在南征北战中屡建战功。1930年被正式命名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十九路军军长。1931年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吉安参加“剿共”，与中国工农红军作战。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号召下，蔡廷锴率领全体官兵在江西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①他表示宁可全部枪械丢到长江，也不愿长此参加内战。使它从一支曾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共部队转变为积极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军队。1931年10月被派驻宁（南京）沪（上海）一线。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借口日僧事件，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原已接到军政部命令调离上海，尚未及离防，突遭日军进攻。蔡廷锴等十九路军爱国将领激于民族义愤，并受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毅然率部违命抵抗。经过一个月的英勇顽强的抵抗，在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以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援下，迫使日军三易主帅，官兵伤亡惨重，打破了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虽然后来由于日本不断增兵，蒋介石拒绝给十九路军增援，十九路军在腹背受敌，众

寡悬殊的情况下被迫撤退，国民党政府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致使一二八淞沪抗战由胜利走向失败。但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以少胜多，以步枪、手榴弹装备战胜陆海空先进装备的日军，开创了上海军民抵御外来侵略的新篇章。

十九路军的胜利是史无前例的，它的胜利与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援分不开的，特别是宋庆龄在国家危亡之际，不顾个人的安危，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以她个人的特殊地位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十九路军同呼吸共命运

1931年8月13日，宋庆龄因母亲病逝从德国回到上海，她目睹国民党种种倒行逆施，特别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反共反人民，血腥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她义愤填膺写下了著名的《宋庆龄之宣言》，严正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她号召“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在国家当前形势危急的时刻，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①《宋庆龄之宣言》对追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信仰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一二八事变他们违背南京国民政府妥协退让的指示，毅然率领部队英勇抵抗。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始终与十九路军同呼吸共命运，她与何香凝一起在激励和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1月30日，宋庆龄和何香凝顶风冒雪同赴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进行慰问，她与十九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亲切交谈，热情赞扬十九路军违命抗战，认为这样才能洗刷九一八事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奇耻大辱，鼓励他们为中华民族抗战到底，她还向阵地上的官兵发表

演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⑤宋庆龄全力支持十九路军的坚定立场，给广大官兵巨大的鼓舞，个个磨拳擦掌，发誓要“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2月6日，她又携带大批慰劳品到真如犄角，在巡视战地时邀请蔡廷锴合影，并手捧战利品日军炮弹，站在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她与十九路军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2月12日，宋庆龄又冒着枪林弹雨到吴淞前线，慰问守卫吴淞的官兵。在敌机盘旋下，她执意要翁照垣旅长陪她到前沿阵地向战士慰问致意。她高度赞扬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历史意义，对翁旅长说：“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尤望继续奋斗，不使我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翁旅长代表全旅官兵回答：“以卫土为责之将士，决不使敌人稍肆横暴，使敌人决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⑥果真，十九路军官兵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历一个月的英勇顽强的抵抗，迫使日军始终压缩在吴淞沿海一线，未能“越雷池一步”。

宋庆龄和何香凝赴前线慰问时，看到由于国民党政府歧视这支抗日部队，拒拨军饷和物资，迫使十九路军官兵穿着单薄的军衣在冰天雪地里作战，感到十分痛心。她们回到市区后立即发动募捐活动。《申报》上刊出“前方将士无衣御寒”的消息，各界民众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前方抗日将士捐制棉衣，不到5天就收到群众捐助的全新棉衣3万余套，棉被2千余条。基本上满足了前方将士的急需。《申报》刊出前线急需交通工具时，不到半天，上海全市大小小车辆，不论汽车、运货车、机器脚踏车和脚踏车全部出动，解决了前方运输工具不足的困难。上海地方维持会两周内就送去军米达7010石，其它副食品、生活用品不计其数。到沪战结束，十九路军公布，收到国内外捐款计大洋1000万元以上。这些捐款金额和物资远远超过国民党政府停发十九路军8个月的军饷。

救死扶伤创办国民伤兵医院

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何香凝就组织了国难妇女救护训练班，培训了一批救护人才。抗战爆发后，她立即将救护训练班改名为“国难妇女救护队”，并亲自率领 60 余名队员和两辆装满慰劳品和药品的卡车，到闸北太阳庙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与翁照垣联系，接受前线伤兵救护任务。国难妇女救护队还在新闸路江海关监督公署设立办公处，负责前方伤员的安置和接受后方民众支援等任务，不久，该救护队与红十字会救护队合并编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七救护队，担任救护事宜。

在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市各团体、医院、各大医学院校纷纷组织救护队，出发前线，从事救护活动。为了集中各方救护力量，统一领导，在何香凝的指导下，将全市各种救护队伍，统一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下设各分队。至 2 月底止，红十字会共有救护队 30 余队，队员 2 千余人，活跃在炮火纷飞的前线，先后救出受伤官兵 6 千余人和难民数万人。

宋庆龄和何香凝在创办医院中倾注了巨大精力。战事爆发后，何香凝和妇女界人士先后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伤兵医院和国难战士救护会临时伤兵医院。当时，民众自动创办的各种类型的伤兵医达 70 余所，其中编入中国红十字会伤兵医院的就有 43 所，使前线受伤的 6 千余名官兵得到及时的治疗和休养。为了改变各界举办的伤兵医院数量不少，力量分散的状况，宋庆龄和何香凝商量后认为“应有持久集中之组织”。^⑥决定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医疗力量、能给受伤的官兵以精心治疗的国民伤兵医院。她们的倡议得到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的热烈支持。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借出校舍，东南医学院院长捐赠大批医疗器械和药品，《申报》馆和先施、永安、新新等各大百货公司的工商实业家均踊跃捐输钱物，新加坡华侨胡文虎汇来 1 万元巨款援助。经过紧张的筹备，一所设

有 300 张床位, 医疗器械设备完善的国民伤兵医院于 3 月 5 日在交通大学内正式开办。国民伤兵医院公推宋庆龄和何香凝担任理事主持工作, 并聘请中西医学专家为伤员精心治疗。医院成立的当天, 宋庆龄向记者发表谈话, 指出: “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 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 不顾目前利害。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 器械财力均不如人, 而能不顾一切, 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 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 不特为军队之模范, 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我辈之设立此医院, 仅站在民众一分子之地位, 对此空前之革命战士表示其敬仰感谢而已。”^①宋庆龄坚定的抗日立场受到全市人民的拥戴, 当《申报》刊登“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创办之国民伤兵医院尚缺服务人员”的消息后, 一时中西医云集, 大批妇女、学生前往医院报名, 要求参加护理工作, 义务为伤员服务。宋庆龄和何香凝更是日以继夜地为医院操劳, 对重伤官兵医疗救护工作都要亲自安排, 还不时地慰问受伤的官兵, 向伤病员嘘寒问暖, 并给伤员送水、喂药、喂饭, 还特地选购广东乐曲唱片《小桃红》等慰问广东籍的伤病员, 用家乡音乐来减轻他们肉体上的伤痛, 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 伤兵们深受感动和鼓舞, 纷纷表示要早日重返前线, 继续英勇杀敌。

支援沪西工人反日大罢工

一二八事变后, 沪西 17 家日商纱厂, 近 4 万名工人, 在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和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下, 举行历时 70 天的反日大罢工, 有力地支援了十九路军抗战, 在政治上、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

沪西工人开展反日大罢工后, 罢工工人反日情绪十分高涨, 他们组织义勇军奔赴前线协同十九路军运输枪枝弹药, 修筑工事, 抢救伤员, 成为一二八抗战中一支强大的后援力量。留在后方的罢工工人在沪西区罢委会的领导下, 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宣传队和募捐

队。纠察队成为维护沪西地区罢工秩序和社会治安的重要力量。宣传队连续组织各种学习会、动员会，十分活跃。一时，沪西成为全市工人反日斗争的中心。

沪西工人在反日罢工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本来就一无所有靠低微工资度日的工人，罢工以后更是毫无收入。沪西区罢委会根据刘少奇要保持罢工工人的反日情绪，就必须十分重视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的指示，他们一方面发动群众去包围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要求给予救济；另一方面组织宣传队、募捐队走向街头，向各界宣传反日罢工的意义和目前罢工工人的处境，争取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宋庆龄对沪西工人开展反日大罢工的爱国行动十分赞赏。当她得悉数万日商纱厂工人聚集在沪西坚持反日罢工斗争，吃饭、居住都存在严重困难，就千方百计地为罢工工人筹集了2万元经费，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派人与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联系，请该组织负责人到她寓所，详细询问沪西反日罢工工人的斗争和生活情况，亲自把支票交给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吴驰湘，请他转交给沪西区罢委会，并嘱咐转达她对反日罢工工人的支持和敬意。

2月15日，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并公开在全市各报刊登工人反日罢工募捐启事，呼吁社会各界支援。宋庆龄见报后，又带头捐助大洋1500余元，并订购了沪西一家米号的粮食，作为专门发放反日罢工工人的救济粮。在她的带动下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解囊资助。何香凝从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的义卖收入中抽出部分款项捐助给沪西反日罢工工人，甚至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官兵也从民众捐助的慰劳金中提取部分款项支援反日罢工工人。

在各界的大力支援下，沪西区罢委会在石灰窑一带盖起一批简易草房供无家可归的罢工工人和家属居住。这样，沪西反日罢工

工人的反日情绪更为高涨，反日大罢工一直坚持到停战时尚未结束。这对前线爱国官兵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沉重的打击。

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党组织在发动和组织各界民众开展反日斗争着重于工人、学生和左翼文化团体等基层群众，宋庆龄则利用她的威望和特殊地位与身份在上层人士中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一二八抗战爆发前后，宋庆龄与史量才、黄炎培、杨杏佛等定期联系，交换情报，共商对策，对推动工商界上层人士的转变，丢掉幻想，团结抗战起了重大作用。上海工商界成立以史量才为会长和王晓籛为副会长的地方维持会在抗战期间担任了慰劳军队、救济难民，维持商业秩序，调剂金融，联络军民，支援抗战等任务，实际上担负起国民党地方政权放弃了的那部分职权。宋庆龄在动员宣传舆论支持十九路军抗战方面，集中抓社会影响最大的《申报》，她经常与陶行知、史量才等讨论《申报》言论的方针和内容，认为《申报》应有更鲜明的支持抗战，反对内战的立场。《申报》发表了陶行知撰写的《敬告国民》、《国家的军队》两篇时评，号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国土”。还发表了《剿匪与造匪》等文章，竭力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这些舆论导向对促成军民联合抗战的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宋庆龄还是一位世界上有影响的国际反帝战士。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她就以国际反帝大同盟的名义致电世界各国著名进步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呼吁主持正义，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反对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苏联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收到电报后即在《消息报》上发表了《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一文，表示全力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事业。我国海外广大侨胞在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号召和推动下，以赤子之心在居住国掀起了捐

款捐物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热潮。在沪战期间，各国华侨捐款捐物总数达数百万元之巨。

总之，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宋庆龄在推动各界民众和海外侨胞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促成上海军民联合抗战局面的出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她的不朽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史册。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 ①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 ② 《宋庆龄之宣言》，《申报》1931年12月20日。
- ③ 蒋洪斌，《宋庆龄》，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 ④ 《吴淞战地视察访问翁旅长纪》，《申报》1932年2月13日。
- ⑤ 温济泽，《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抗日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页。
- ⑥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9页。
- ⑦ 《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4—55页。

一二八、八一三时期的宋庆龄

张义渔

30年代,上海蒙受了两次日帝侵略。一次是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于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一二八事变。另一次是继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的8月13日的八一三事变。这两次事变是震动世界的大事,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势造英雄,辨忠奸。历史证实了宋庆龄为这两次抗日御敌大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一、特 点

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先后爆发后,国内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对是否抗战,抗战后采取什么路线等等都有着不同的态度。宋庆龄对待这两次事变的主张和活动也有她自己的特点。

(一)为了保卫祖国勇敢走向前线

当九一八和一二八日帝侵略战火烧到我国时,中华儿女掀起了爱国的狂澜,到处吹响了冲锋的号角。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却是一片腐朽没落的景象,他们公开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帝的侵略,推行不抵抗主义,对内实行反动的“剿共”内战,对广大群众起来要求抗日,进行镇压,对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给以种种压力和刁难。

1931年8月,宋庆龄从欧洲回到上海。她亲眼目睹这些事实,她义愤填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发表宣言,严词揭露国民党统治

集团所热衷和关心的是什么。她说：“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也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①把国民党的本质暴露无遗，使广大群众认识国民党的反动真相。宣言对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②宣言还指出国民党政府一方面镇压要求抗日的爱国学生运动，一方面让日本侵略军侵占锦州。使人们通过这样的对比又一次清楚认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和屈从日帝的丑恶本质。

当一二八战争激烈进行时，宋庆龄率领有关人士两次奔赴十九路军前线阵地，先在真如，后又到吴淞慰问十九路军。她在真如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亲切交谈，称赞他们说：十九路军这样做才能洗刷九一八事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奇耻大辱，还鼓励他们为中华民族抗战到底。当时，阵地上炮声隆隆，时有敌机飞来的声音，宋庆龄就在阵地上，对十九路军官兵发表演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支援你们，支持你们。”她还手捧士兵们缴获的战利品一枚日军炮弹，站在断垣残壁前面留影，以表示她对十九路军抗日的支持。她在吴淞前线又鼓励守军翁照垣旅长说：“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寸土入敌人之手。”^③谁都清楚，在前线阵地，随时都会遇到生命危险。只有具备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的人，才会做到，才会表现出如此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二）尽可能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各爱国阶级、党派和人士，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一部人起来，要求抗日。曾和红军打过死仗的国民党将领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前线奋勇杀敌，并主张停止“剿共”内战，联合抗日。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上海《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反对积极支

援十九路军抗日。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依旧坚持反动立场，除了前面讲到的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外，1933年，杀害了要求抗日的杨杏佛。1934年，又以同样原因杀害史量才，以后又逮捕囚禁救国会沈钧儒等“七君子”。1937年八一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有了变化，同意实行国共合作，对待爱国进步人士也不再采取杀、关。但是对待他们的救国进步活动，却有着种种限制。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成立的进步团体要登记，活动要报告。

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广大党员和团员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但党的领导人王明推行关门主义一套做法，把所谓中间人物视作“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认为十九路军士兵可以团结，而把蔡廷锴等将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史量才等都视作“最危险的敌人”，甚至对待长期和我们党合作的宋庆龄也同样对待，直到1935年以后，才逐步有了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正确路线，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待爱国进步人士采取了团结合作的态度。

宋庆龄以国事为重不计个人恩怨，坚持原则，中国共产党是宋庆龄所敬仰的，但她对王明“左”倾关门主义以实际行动给以抵制，不以个人好恶而迁就。她积极团结蔡廷锴等十九路军抗日将领，她热情褒奖十九路军违命抗战，认为这是洗刷了九一八不战而降的耻辱，勉励他们为中华民族抗战到底。她团结史量才、杨杏佛、黄炎培等，支持他们的抗日活动，每周与史量才、陶行知等晤谈一次，交换情况，互商抗日对策，当日军大批增援上海，她根据他们所知信息分析，绘制地图，并由史量才在民族资产阶级团体上海地方维持会内讨论。宋庆龄还和胡愈之、史量才、陶行知等一起研究《申报》今后的方针和内容，取得一致认识，通过《申报》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

1935年，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

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传到上海。报告精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和可能性。宋庆龄带头响应。她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努力、欢呼。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她又积极配合中共上海地下党和蔡元培、郭沫若等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这个救亡协会成员，可以说是集当时上海文化界知名爱国进步人士之大成。和何香凝等一起成立的上海妇女界抗战后援会（后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特请当时上海市长俞鸿钧夫人和杜月笙夫人担任副会长。

综上所述，一二八时期，在团结一切爱国力量进行抗日的方面，宋庆龄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是根本不同的，蒋介石是极力反对，并屠杀镇压爱国进步力量，而宋庆龄是团结他们抗日的。和王明“左”倾关门主义也存在分歧，王明把大批爱国进步人士视作敌人，而宋庆龄是视作朋友，进行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当然这种分歧和蒋介石的分歧性质不同，蒋介石是由于对日帝侵略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而引起。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是由于对九一八以后形势变化，在国内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认识不清而引起的。到了八一三时期，蒋介石虽然改变了过去“剿共”的主张，同意了国共合作，但是他们是迫于形势的变化，因危及本阶级的利益而抗日，反共之心并没有改变。对待爱国进步人士总是心存芥蒂，把他们视为妨碍他们统治的异己力量。而宋庆龄配合共产党主张的实现，由衷地拥护国共合作的实现，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三）依靠工农，坚定执行全面抗战略线。

是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全面抗战，还是实行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中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中国共产党认为全面抗战是群众战争，只有这种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片面

抗战虽比不抵抗主义是进步了，也抗战了，但仍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

八一三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虽然改变了以往不抵抗主义，投入了大量军队抗战，但是奉行一条由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对人民群众救亡运动作了种种限制、排斥。在上海，国民党方面的潘公展在文化界救亡协会首次理事会上，就指责当时广大民众的各种抗日要求和主张，是“不懂军事的普通民众”在“怀疑和乱发议论”，“贻害国家一定不浅”，提出要“绝对信仰领袖和政府”，“在举国坚决抗日之下，思想是不能自由的。”^④

宋庆龄则和他们完全不同。她认为工农“两个阶段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⑤抗战初期，她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说明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对整个民族解放的重大意义，批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她指出：“有人以为中国要免受日本的侵略可不必唤起民众运动，这种想法是很愚蠢的”。“只有民众群起保卫国家的独立，中国才能得到解放。”^⑥“单靠装备窳陋的常备军，中国是不能建立足以抵抗侵略的国防。”人民群众的力量“将成为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日本军阀只能发抖。”^⑦

因此，宋庆龄在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中都是积极支援工人斗争，广泛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一二八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实现总同盟罢工，反对日帝占领上海的号召。沪西17家日商纱厂4万多工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宋庆龄得知这个消息后，千方百计筹募2万元经费交给中共上海地下党，转达了她对工人阶级的支持和敬意。八一三期间，她积极支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妇女界等救亡团体。通过这些团体把全市各界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四)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紧结合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帝侵略，实际上是

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极其重要部分。七七和八一三事变，和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更为密切。宋庆龄把这些事变和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这种看法特别在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是超越一般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的。

首先，宋庆龄把这些事变看作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在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她指出：这是人类“从奋斗中求生存”，十九路军“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⑧当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她又指出：“我们当前的世界正面临到和平与民主势力对战争与法西斯势力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与生死斗争。”现在中国所受法西斯主义侵略和非人道的破坏、掳掠，直接威胁着所有国家。她说：“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⑨因此，中国的抗战“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⑩

其次，宋庆龄把日帝侵略中国和侵略苏联紧紧联系起来。她说：自九一八、一二八以来，日帝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是为了“达到它最后进攻苏联的目的”。^⑪日帝要把我国东北作为“反苏战争的根据地”，但是它决不以东北为满足，最后是征服全中国。

第三，宋庆龄把日帝侵略中国和侵略英美等国联系起来。当西方国家企图以牺牲中国来保护自己时，宋庆龄指出：日帝是不会以侵华为满足，还会侵犯太平洋及印度支那。八一三事变后，她对英国工党访华的人士说：“你们自己看看，在仅仅两个月里，日本帝国主义就已损害和破坏了英国在华的利益。”日机轰炸，英国大使险些丧命，单就上海而言，英国已有数百万财产被日舰、日机所破坏，阻断了英国对华贸易，英国工业、商业受到巨大损失。宋庆龄也向美国人民说：日机轰炸美国侨民，袭击美国教会医院，炸死护士、医生，指出：日本对华侵略“也包含着对美国本身的威胁。”

最后，宋庆龄以极大地热情寄希望于全世界人民。她向各国工人、妇女、青年宣传我国反对日帝侵略重要意义；控诉和谴责日帝

在中国的罪行，揭露英、美等西方国家支援日帝各种军事上所需的物资，批驳这些国家的政府推行绥靖主义，期望各国人民起来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共同抵御日帝侵略。

二、意义和作用

宋庆龄在一二八、八一三时期积极抗日具有深刻的意义和巨大的作用。

首先，鼓舞了全体将士抗日斗志，勇敢杀敌。以一二八抗御日军侵略来说，十九路军奋勇杀敌，但是不仅得不到国民党政府在军饷、武器等各方面的支援，而且蒋介石、汪精卫还派遣军政部长何应钦专程到沪，要十九路军撤兵，准备接受日方无理要求。当时，蔡廷锴气愤之极。

宋庆龄两次亲赴前线，并积极表态支持，慰勉有加，显然和国民党政府态度截然不同。这种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十九路军，该军全体官兵在阵地宣誓：“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吴淞前线旅长翁照垣代表前线官兵表示：“以卫土为责之将士，使敌人决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十九路军打得日寇三易主帅，屡遭挫折。沉重打击了日军嚣张的侵略气焰，日帝开始鼓吹只需四天时间就可打败中国军队，而实际上打了一个多月，打乱了日帝侵略部署。显然，宋庆龄在这场战争中是起着积极作用的。

第二，配合中国共产党贯彻落实全面抗战路线。

一二八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的反日斗争，尤其是反日大罢工，给日帝以重大的损失。据统计日商在上海的工厂、银行、商店损失达到9100万两。^⑨广大工人通过这次斗争在政治上得到锻炼，觉悟和政治能力得到了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伟大的斗争力量以外，和宋庆龄参与发动各方人士积极支援也是密切有关的。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是我国阶级关系变化关键时期，上海民

族资产阶级和各党派不少人士，逐步认识蒋介石国民党的真相，要求摆脱他们的控制，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实行抗日。而当时王明推行着关门主义的做法，把他们拒之千里，不仅不团结，还要反动他们。而宋庆龄在一二八事变前后，广泛地团结他们共同抗日。这实际上为我们党开展着统战工作，把他们联合和组织起来。史量才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捐物，捐钱，宣传鼓动，办伤兵医院等等，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当时的抗战，而且对以后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32年，宋庆龄又进一步和蔡元培、杨杏佛、鲁迅、邹韬奋、沈钧儒等筹建民权保障同盟，对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营救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起了巨大作用。1936年的救国会活动，宋庆龄团结更为大批进步爱国人士，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高潮。这些都和宋庆龄在一二八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有着密切关系。

八一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明确提出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民族革命战争即全面抗战路线，宋庆龄更自觉地贯彻这条路线，她所参加领导和筹建的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了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戏剧队、募捐队等等。单是宣传队就拥有2000名队员。他们不仅活跃在本市大街小巷，各工厂、学校等单位，而且在八一三战争结束后，又散布于全国许多地方，为全国的抗日救亡活动作出杰出贡献。宋庆龄参与的妇女界救亡活动也大致相似。

第三，推动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运动和反侵略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是世界上法西斯国家最早、最大规模地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为此震惊。此时，共产国际虽然并没有摆脱“左”的路线。但是要求组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坚决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舆论已经逐步形成起来。当时，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对此还缺少经验，宋庆龄积极支持反对日帝侵略的大罢工和团结一切反日的爱国进步人士，筹组统一战线，无疑对世界人民和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有着十分有益的启示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1933年9

月，由英国萧伯纳、马莱，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罗曼·罗兰、古久里，中国的宋庆龄、鲁迅等组成的国际统一战线组织——世界反帝大同盟特决定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协助下于上海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会议由宋庆龄主持。会上正式成立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她被推选为主席。宋庆龄在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团结反对主要敌人的爱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36年9月也就是八一三战争爆发前一年左右。在巴黎召开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与会代表纷纷赞扬宋庆龄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主持会议的罗曼·罗兰情不自禁地说：“你们以为我们卓越的副主席宋庆龄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吗？不！不！她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量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⑨这实际上是世界进步舆论对宋庆龄推动世界上反法西斯运动和反对侵略战争的评价，也说明了宋庆龄这些主张和活动已为国际上广大进步人士所接受，而成为一股强大而有力的反法西斯力量。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①②⑤⑦⑧⑩⑪ 《宋庆龄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83、84、44、195、87、202、265、270页。

③⑫ 1932年2月13日《申报》。

④ 1937年8月1日《新闻报》

⑥ 1937年10月16日《救亡日报》。

⑬ 当时宋庆龄任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引文转自钱俊瑞，《痛悼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载《宋庆龄纪念集》）。

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苗建寅 王 良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一个爱国进步团体。其名“是借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一词，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蔑视民权的法西斯统治”^①而得来的。它的宗旨在于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项自由。尽管其存在不到一年时间就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扼杀于襁褓中，但其所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可抹煞的。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 30 年代的黑暗社会中犹如鬼魅横行世界中的一杆大纛。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国破家难人犹在 救国救民总未晚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中国处于一个分裂、黑暗的社会之中。一方面，九一八事变以后几个月，日本侵略军不仅蹂躏了中国的东北三省，而且它的铁蹄已逼近平津一带，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時刻；另一方面，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抵抗日本的侵略，反而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大肆屠杀同胞。全国监狱密布，特务到处横行，国内政局令人毛骨悚然。在这样黑暗的社会背景下，素有革命传统的中华儿女不仅没有屈服，反而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府进行了坚决、英勇的斗争。宋庆龄正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宋庆龄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由来已久，从蒋介石一伙背叛

国民革命起，宋庆龄就与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捍卫先总理的“三民主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尤其是斗争进入新的阶段以后，她认识到要反对反动派残害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的罪行，要揭露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单凭个人以及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应动员国内外一切进步人士共同起来进行斗争。于是她决定发起组织一个以上述任务为己任的爱国团体。从1932年夏季开始，她联络中外进步人士，会同我国文化界、知识界的杰出代表蔡元培、鲁迅和杨杏佛等人酝酿成立一个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营救政治犯为主要任务的非政党性质的爱国进步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宋庆龄认为，成立民权保障同盟不仅必要，而且也很有可能。因为：一方面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营救政治犯不仅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部分，会得到全国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而且还能吸引许多爱国志士的积极参加，这又会为民权保障同盟顺利地开展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从而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在营救政治犯的过程中，她已经认识到合法斗争在民族危亡时刻对于争取舆论、团结民众、打击敌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她决定利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开展民权保障同盟的组建工作。

宋庆龄组建民权保障同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31年6月15日，国际主义战士牛兰及夫人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所谓的共产党嫌疑罪名逮捕，为营救牛兰夫妇，宋庆龄与杨杏佛、斯诺以及其他中外知名人士发起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宋庆龄担任主席。她从维护人身自由不可侵犯这一角度出发，为挽救牛兰夫妇生命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她说：“我侪与欧美各国之著作家……共同联络，为人道正义及不可侵犯之政治自由权，请求应准牛兰夫妇之请求，……或将其全部释放，此种请求须立时应

允。”^②宋庆龄为营救牛兰夫妇四处奔波，由于她的努力，暂时保住了牛兰夫妇的生命。受营救委员会的影响，宋庆龄拟在国民党中央组建类似任务的组织。10月31日，她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的资格，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设立一个专门处理政治犯的特别委员会，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10月15日，陈独秀等12人被逮捕，社会上和国际上掀起了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当时社会上只注重营救陈独秀，而忽略了其他11位志士。鉴于这种情况，宋庆龄感到当务之急是立即成立一个保护和营救政治犯的组织，于是她向外报发函，表明想建立一个政治团体的愿望，她说：“社会仅知营救陈独秀，而不提其同时被逮捕之十一人，更未追论恐怖时代被牺牲之志士，予现拟参加组织一团体，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及清共时被牺牲者为职志。予盼中外知识阶级及友朋参加此项运动。”^③在宋庆龄的努力和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的积极活动下，经过半年的筹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终于成立了。

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召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大会，宋庆龄在会上发表演说，阐明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和首要任务。她说：“我们组织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项民主权利而进行斗争。”^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首要任务是“援助那些拥塞在监狱中大量的无名无告的政治犯。”^⑤以后在她的一系列演说中，她还详细地阐述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及任务：“这个同盟不是一个政党，它的目的不是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去作政治和经济的斗争……不在于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却是政治性的”^⑥她把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归为三个：“一是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狱、酷刑和处决制度；二是予政治犯以法律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三是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斗争。”^⑦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当天，宋庆龄

被选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以后又先后成立了上海分会和北平分会，对于它顺利开展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国为民勤奋斗 吾以吾血荐轩辕

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开始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动员和组织民众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斗争。宋庆龄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以后，多次发表演讲，号召人民大众起来与日寇和卖国政府作斗争。她在描绘人们的苦难时指出，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忍受着严重的困难。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受苦受饥”，并且“还要受苛捐杂税与高利贷和重租率的掠夺”，“同时还要受军阀混战的痛苦”；另一方面，“所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一类的民权”都被剥夺，而“激烈的革命分子，都逃不了监禁、私刑与杀戮的结果。”^①宋庆龄在江苏镇江《江声日报》事件发生后，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更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实质，对事件真相进行揭露，指出：“刘煜生之死非死于描写社会生活之文字，而实死于揭载鸦片公卖之黑幕……是刘非死于死时状况之法理，非死于戒严时期之情势，乃死于为吾民呼吁抗拒烟毒而引起大员之挟嫌报怨也甚明”，她还要求广大民众对此有“明确认识”。^②针对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她告诫人们不要对政府抱有任何希望，她指出：“蒋介石与其它国民党领袖在日本的侵略面前是不会抵抗的”。^③在人民大众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情况下，宋庆龄为他们指出了唯一的出路，那就是自己行动起来与卖国政府和日寇作坚决的斗争，去唤起广大民众，去“唤起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并且与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努力于这次解放的奋斗，努力于与中国的统一的完整。”^④她认为，“只有这种奋斗可以产生出一种不可征服的民族与社会势力，来打破帝国主义与其在中

国阴谋叛逆的联盟的势力”，这样我们将“不是被帝国主义征服与瓜分的中国，而是工人与农民的自由的团结的革命的中国。”她还呼吁：“一切革命分子都应担当起参加这种奋斗的责任。”^⑧

第二，开展政治犯营救活动。宋庆龄领导民权保障同盟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营救政治犯作为它的首要任务，在民权保障同盟存续的时间内，进行了多次营救活动，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宋庆龄领导民权保障同盟开始的第一个营救活动，就是继续营救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办事处秘书牛兰及夫人。在它成立以前，尽管宋庆龄已联合国内外各界人士进行了努力营救，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敷衍以及某些国民党党徒的阻挠，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在它成立以后，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宋庆龄致电国民党当局重要官员汪精卫、居正、罗文干等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并希望他们：“此次请勿再以‘暂缓’、‘正式手续’等空言搪塞”，她指责了国民党政府所采用的伎俩：“前此政府人员所期许之正式手续等等诺言，今日已经证明完全为说谎之辞”。^⑨要求国民党政府无条件释放牛兰夫妇，痛陈政府如一意孤行将会遭到的后果：“全世界革命舆论、自由主义舆论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仅与德国希特勒式之野蛮残酷差可比拟。”^⑩宋庆龄为营救牛兰夫妇，前后奔走长达6年之久，使国民党反动政府最终未敢杀害牛兰夫妇，宋庆龄和民权保障同盟取得了胜利。

营救许德珩、侯外庐等爱国师生是宋庆龄领导民权保障同盟开展的第二个营救活动。1932年12月17日，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当天，她与蔡元培、杨杏佛和林语堂等5人致电蒋介石、宋子文，要求他们释放非法逮捕的许德珩等北平爱国师生。谴责当局“摧残法治，蹂躏民权”，指责政府之行为使民众“在家时怀朝不保暮之恐惧”，更不敢谈“鼓同仇敌忾之精神”，并且指出：“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惟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他们要求国

民党当局释放爱国师生，“以重民权而张公道”。^⑨由于以宋庆龄为首的“民保盟”的营救工作和北平各校被捕师生后援会的斗争，大部分被捕师生陆续获释，营救取得了胜利。

宋庆龄和民权保障同盟又一个活动是营救廖承志、陈赓等5位志士。廖承志、陈赓等没有任何犯罪的证据，只是因为巡捕房眼线的报告而被捕，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宋庆龄获悉后，立即同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等4人赴南京进行营救。她向汪精卫、罗文干提出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民权保障同盟还就此事件发表宣言，指出：“在此国难期间，欲言御侮，国人必有反帝国主义之自由，不应对于努力此项工作者反愈加压迫，致伤元气。吾人应速自觉悟，奋起力争，而要求罗、余、廖及一切政治犯之释放，尤为第一要图”。^⑩宋庆龄还亲自找蒋介石交涉，斥责蒋介石忘恩负义。她指责蒋介石说：“陈赓救过你的命，现在你要杀他？”使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让她把陈赓带走，宋庆龄领导的“民保盟”进行的爱国斗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除以上重大营救活动之外，宋庆龄还领导民权保障同盟做了许多保障民权、抗议迫害无辜、营救被捕者的工作。其中包括营救中共左联党团书记丁玲，中共中央文委书记潘梓年，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中共地下党员刘尊棋等。总之，在那个时代，只要有非法逮捕，侵犯人权之事，宋庆龄和民权保障同盟就把援救工作做到那里。

第三，声援反法西斯进步事业。宋庆龄和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越出国界，与国际进步力量相结合，互相配合彼此行动。1933年5月13日，为了反对希特勒的迫害行为，宋庆龄发表了《对德国迫害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抗议书》。在这篇文章中，表现了高尚的国际情操。她指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她列举了法西斯德国统治者对

德国人民大量的迫害事实，并对德国统治者的恶劣行径表示严重抗议：“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事实……我们抗议这些对付德国无产阶级与进步思想家的可怕的恐怖手段，因为这摧残了德国的社会、学术和文化生活”。^⑩不仅如此，宋庆龄还会同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向德国驻沪领事递交了抗议书。她和民权保障同盟把国内救亡运动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相结合，大大地推动了国内救亡运动的开展。

第四，开除胡适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在领导民权保障同盟进行工作时，既注意团结大多数，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又坚持高度的原则性。她说：“本同盟不是一个政党，它的行列可以容纳一切真诚支持我们的斗争要求的人们，但是那些帮助政府压迫人民或为这种压迫辩护的人们，在本同盟中是没有立足余地的，本同盟也不容留那些只是软弱地‘批评’政府个别的专横残暴的行为，而实则拥护那整套压迫人民的‘合法的’恐怖制度，并支持国民党——地主、资本家、豪绅和军人的政党——箝制民主权利的人们”。^⑪她丝毫不能容忍内部成员的妥协行为，对同盟内部的妥协者进行了坚决的、彻底的斗争。最突出的一个事例就是开除胡适出民权保障同盟。由于民权保障同盟的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特别是他的反共行为，因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干涉和破坏。胡适当时身为北平分会主席，在国民党的压力面前，不仅没有坚决反击，反而发生动摇，制造内部分歧，袒护国民党的反动政策，直至完全背叛民权保障同盟。他公开反对民权保障同盟提出的“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口号，认为：“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⑫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如某些团体所提出的那样，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不予依法治罪的要求。一个政府应该有权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

为”^①他这样明显地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行径辩护，这自然与同盟的原则性和宗旨相违背。宋庆龄对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把他开除出民权保障同盟。

宋庆龄与其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面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毅然决然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彻底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的实质，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统治，对于在国难当头唤起民众，保护革命力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处在黑暗的时代，难免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恼恨，国民党政府对它恨之入骨，妄图把同盟解散，反动政府特务机构数次向宋庆龄等重要领导人投恐吓信，打恐吓电话，甚至邮寄子弹进行威胁，可他们都失败了。对于反动派的威胁，宋庆龄和其他领导人不仅没有屈服，反而使他们斗争更坚强，态度更坚决。他们横眉以对，用坚决的斗争态度来回答，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甚至作好了以“自己的膏血”来换取人民的光明的准备，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丝毫不动摇。他们使反动派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拿出看家的绝招——暗杀。鉴于宋庆龄、蔡元培在国内的影响及声望，反动派不敢向他俩开刀。于是，经过反复谋划，他们选择了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同盟中坚分子杨杏佛下手，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被无耻的反动派特务所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遭到了成立以来最大的损失。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列部）

注释：

① 《周建人谈民权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

② 《宋庆龄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③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

④⑤⑥⑦⑧⑨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103、120—

123、103—104 页。

⑧⑩⑪⑫⑬⑭ 《中国论坛》第 2 卷第 3 期，1933 年 3 月 27 日，第 4 期 1934 年 1 月 13 日。

⑯ 《晨报》，1933 年 2 月 4 日。

⑰ 《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0 页。

⑱ 《申报》，1933 年 3 月 29 日。

⑲ 《独立评论》第 38 号，1933 年 2 月 19 日。

⑳ 《字林西报》，1933 年 2 月 21 日。

宋庆龄与《申报》的“黄金时期”

金维新

宋庆龄是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之瑰宝”。她一生的业绩，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掘和整理宋庆龄在1931—1934年间与《申报》相关的史实，将使我们再次领略她的人格、品性，从中获取教益，同时也为抗日战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献上一瓣心香。

《宋庆龄之宣言》在《申报》发表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日本之手，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秋。1931年8月，旅居苏联、德国四年之久的宋庆龄因母逝奔丧、赶回上海；她坚持“走我自己的路”，迎接新的战斗。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已具六十年历史的《申报》政治面貌也在变化之中。国家民族的危亡，宋庆龄的沉着战斗，《申报》面貌的重大变化，这三者之间互有因果。其中，《申报》之所以出现1931—1934年这一段“黄金时期”，宋庆龄等人对《申报》当时的总经理史量才的直接影响，功不可没。

1931年12月20日，《宋庆龄之宣言》在《申报》公开发表，可视为宋庆龄结识史量才之始。

旅欧返国的宋庆龄，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面对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1年11月29日，她的挚友、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在南京被秘密杀害。12

月5日北平大学学生赴南京请愿遭镇压；12月17日上海、苏州、南京、北平、济南等地万余大中学生晋京举行反蒋抗日总示威，又遭镇压，酿成“珍珠桥惨案”。宋庆龄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行径，悲愤填膺，怒不可遏，“珍珠桥惨案”发生后，连夜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宋庆龄之宣言》。在这一宣言中，宋庆龄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谴责国民党残杀革命者邓演达、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等法西斯暴行，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内部分争权夺利、个人独裁及其各种卖国投降活动，痛斥国民党当局“背叛孙中山先生遗教”，以反共为名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宣言”严正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进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这是宋庆龄归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政治宣言，是声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坚持反共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檄文。它再次重申宋庆龄在1927年为抗议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背叛革命而发表的声明，显示不与违反孙中山遗愿的国民党冒牌领袖同流合污的严正态度。“宣言”也表明，宋庆龄归国短短三个多月中，思想开始了新的飞跃。她在“宣言”中回忆1927年4月以来的历史过程，并在邓演达被害之前，她还希望能够和国民党左派一起挫败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现在不能不作出新的判断，深知这种希望已不可能。她说：“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她在思想上开始树立起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在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热潮的席卷下，九一八事变前后，《申报》的办报宗旨发生变化。《申报》不论从1872年英商美查(E·Major)创办始，还是从1912年史量才接办始，一直是一张商业色彩较浓的报纸。办报宗旨主要是赢利，藉以求自身发展，与经济上大胆发展相反，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四面应付，不明确发表政治

主张，不卷入党派之争，以不得罪于租界和北洋军阀执政当局为原则。在报纸业务上，表现为：广告第一，新闻居次，言论第三。遇有国内大事每每写点“太上感应篇”和“温吞水”之类文章，以示其“民间报纸”姿态。国家民族日益深重的灾难，促使《申报》、史量才改变办报宗旨。九一八前，《申报》较早地觉察到战争的预兆。在日本挑起南满铁路纠纷、万宝山案件、中村事件时，就发表时评认为：这是隐蔽的“日本传统的大陆政策”，是“田中奏折”的狂妄侵华计划。1931年7至9月，又连续发表许多重要专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分析中日关系的症结，指出战争发生的必然性。九一八事变第二天，《申报》就刊登了85条电讯，其中47条是由记者自己采写，及时地详细地报道了事变真相，用“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蔑弃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等标题，鲜明地点出日军行动的侵略实质。9月23日，发表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指出：“我国家于今日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之际，亟应力谋所以抗暴力，谋所以自卫，换之而言，即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对于12月5日、17日接连发生的国民党镇压学生请愿抗日案件，《申报》冲破当局的新闻封锁，作了详尽报道，并发表时评《学生爱国运动评议》，认为“其情则可愿，其行则可敬”，“我民族之一线生命，应其在斯”。在此同时，一直致力于“开启民智”、回避政治的史量才，也开始参加抗日救亡的社会活动。9月22日，他第一次出席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会议，被增选为委员，负责主持国际宣传委员会和检查奸商偷售日货的工作。9月26日，史量才作为救国会委员参加大会作如下宣誓：“督促政府出兵抗日”，“督促政府收复失地”，“督促政府驱逐日兵”。珍珠桥惨案后，《宋庆龄之宣言》切中国民党的要害，南京当局竭力阻挠上海各报刊登。许多报纸屈于压力进退两难；史量才以上海日报公会主席身份召开公会临时会议，慷慨陈词，“宋庆龄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她的宣言，我们的报纸为何不可发表？”^①史量才的坚决态度，使《宋庆龄之宣言》得以于12月20日全文在《申

报)刊登,除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外,其余许多上海报纸也予以发表。

淞沪抗战中共同声援十九路军爱国行动

1932年1月28日深夜,驻守在上海闸北天通庵路的十九路军还击日军的突然袭击,打响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在这次抗战中,上海军民同仇敌忾,协力抵抗33天,先后在闸北、吴淞、江湾、大场击退了武器精良、兵力十倍于我的日本海陆空军的猖狂进攻,写下抗战史上扬眉吐气的篇章。抗战最终虽因国民党政府拒不增援,十九路军被迫全线撤退,以失败而告结束;但它唤起人们的抗日热情,将抗日救国运动推向全国,势不可挡。

在淞沪抗战的日日夜夜里,在声援十九路军等爱国将士的各项活动中,宋庆龄同《申报》、史量才既各自发挥所特有的作用和影响,又密切合作,进一步加深结识。

宋庆龄十分清楚十九路军违抗国民党不抵抗命令自卫抗战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为支援爱国将士的正义行动,为贯彻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贯主张,不顾个人的安危,1月30日至2月12日3次亲临真如、吴淞抗日前线,会见将领,慰问士兵。她同蔡廷锴亲切交谈,褒奖十九路军违命抗战洗刷了九一八不战而降的耻辱;她勉励翁照垣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尤望继续奋斗,不使我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宋庆龄巡视中看到,由于国民党政府拒增军饷物资,前线官兵身穿单夹军衣难御刺骨寒风,不少战士急待救护治疗而医疗设备奇缺。她在何香凝、杨杏佛的协助下,立即组织发动募捐活动,创办伤兵医院。短期内,收到海内外大笔援助,募捐来数万件(套)棉衣,办起了“国民伤兵医院”;宋庆龄为医院操劳无巨细,巡视病房,为伤员送水喂饭,爱国热忱令士兵落泪,为世人敬仰,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淞沪抗战的爆发,把《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推向抗日救亡的前

沿。战事爆发前不久，1月14日史量才就在哈同路（现铜仁路）自己的寓所，约请工商文化界人士20多人组成“壬申俱乐部”，讨论时事，商议对策。1月31日，事变第三天，在“壬申俱乐部”的基础上，“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宣告成立，史量才被推为会长。他在会上讲了一番很动情的话：“我年近花甲，自幼深惧列强瓜分中国，立誓生不作亡国奴，死不作亡国鬼。现在日军已向淞沪侵略，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维持会成立后，史量才全力主持该会会务。白天在维持会会所办公，审阅文稿，检查帐目；晚饭后，约定由申报经理马荫良到寓所汇报当天《申报》记者前线采访、读者投书支援抗战等情况，以及报馆中的其它事务。接着，又接待各方来访人士，商谈支援抗战事宜，有时直至深夜。

这一时期《申报》主张抗战的政治态度鲜明突出，新闻、言论居重要地位，报纸面貌大为改观。1月29日，发表时评说：“上海事件发生以来，我当局处处隐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然而含垢忍痛之结果，仍不能满日人之意，又作军事之发动。我国至此，万难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当之防卫。”1月30日、31日又连续发表时评《敬告国民》、《国家的军队》，指出此次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国土，将一个可怜的弱国变为一个令人敬爱的大国；希望市民踊跃参加十九路军，并从物质上积极支援和救济难民。《申报》派出记者及时详尽报道每日战况，报道宋庆龄、何香凝等巡视战地、创办伤兵医院和市民支援十九路军的情景。《申报》在上海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挥其舆论动员组织作用。一是募集救国捐款。2月1日接陈姓读者送来支票1万元，并附来信。信件第二天刊出，连着许多天，一批又一批具名“爱国者”、“一市民”的来信、捐款，涌进报社。募集到的救国捐款，总计达93万多元。二是募集战地所需物资。《申报》刊出消息：目下十九路军“最需要者即运货汽车、

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及药品等”，半天后，“上海全市大小小车辆几乎完全捐空，齐向军中输送”，盛况可谓空前。《申报》刊出《前方将士无以御寒》消息，5天中就收到市民捐赠的旧丝棉背心、绒线衫裤、棉被等2000余件，全新棉衣裤3万多套。三是救护伤病官兵。申报刊载“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创办之国民伤兵医院尚缺服务人员”消息，一时中西名医云集，大批妇女、学生前往医院报名，要求为伤病官兵义务护理。四是稳定人心、稳定金融。战事卒起，上海金融市场一度混乱，不少人纷去银行挤兑，银行为避免倒闭停止营业。纸币的继续兑现和流通顿时成为关键。《申报》发表时评，呼吁银行“即日开市，以安定金融”；《申报》还发表银行兑现纸币、“维持金融办法”消息，安定民心。

在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同史量才的结识迅速加深。马荫良先生曾告笔者，在此期间，宋庆龄每周都要到史量才寓所晤谈一次。晤谈的内容，主要是交换淞沪抗战情况，互商支援抗战对策，其间也涉及《申报》的言论、报道。为保证宋庆龄往来的安全，约晤通过直线电话联系，晤谈时宋庆龄所乘坐的汽车从不停在史家门外。宋或雇出租车前来，由史自备汽车门内驶出送归，或由马荫良驾车接送。在此同时，史量才同王晓籁、黄炎培等地方维持会负责人也在史宅每周晤谈一次，这主要是听取维持会交际股报告收集到各方面的情况，沟通军、政、民三方的联系。有一次，宋庆龄、杨杏佛和史量才一起分析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失败后的形势，认为：日本正从国内调兵换将增援上海，日军大部队不可能在黄浦江码头登陆，也不可能淞沪一带驻扎，很可能在长江沿岸与东海沿海地带寻找登陆之地和驻扎场所，必须加强江防、海防工事。晤谈后，宋庆龄、杨杏佛托人绘制苏浙两省和东海沿岸地图，晒成蓝图多份，交史量才在地方维持会讨论，并由史量才、杜月笙（2月下旬增选为副会长）两人深夜面交吴铁城，转送蒋介石。可是，蒋介石不予重视。3月1日，日军果然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为避免腹背受

敌，被迫撤离淞沪。此事使宋庆龄、史量才等悲愤异常。3月2日、3日，《申报》连续发表时评，明白地说：“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的决心，以民意为依据，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事实的教育，宋庆龄的晤谈，使史量才愈益看清，不能指望现有政府领导抗战，坚持抗战必须反对这个政府，彻底抛除对它的幻想；史量才最终成为一名反对派的代表人物。

密切磋商揭露蒋介石“剿匪”反动本质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既定的反动政策。在对外妥协投降的同时，蒋介石对内加强镇压，追剿“异己”。1930年12月、1931年4月、1931年7月，蒋介石接连出兵对红军和苏区发动第一、第二、第三次军事“围剿”；淞沪抗战失败后，蒋介石又调集军队，加紧其第四次“围剿”的准备。揭露蒋介石的“剿匪”反动本质，反对专制独裁，事关国家民族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在反对蒋介石“剿匪”发动内战的斗争中，宋庆龄、杨杏佛同史量才、陶行知，密切磋商，相互配合，使在淞沪抗战中声誉大增的《申报》，更显辉煌。

就在淞沪抗战爆发前的1931年，史量才锐意革新《申报》，在总经理下设立总管理处，聘请陶行知为顾问，主持申报的改革工作。陶行知建议，申报抓住“时评”这个“头”和《自由谈》副刊这个“尾”，并切实加强对读者的联系。史量才感慨地说：“蒋介石顽固坚持‘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政策，全国人民愤恨已久，如不再言，愧对全国人民。”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陶行知的旧友杨杏佛，兼管国际交换处工作，国际友人极多。蒋介石拟利用杨的国际影响，约杨赴江西苏区访问，为国民党作反动宣传。史量才得知此事，就同蔡元培、宋庆龄商量，一致认为：经三次“围剿”后，国民党封锁苏区，人们对苏区真实情况无法知晓；这次蒋约杨前去访问是个绝佳机会，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劝杨应约。^⑤

1932年5月，史量才两次深夜约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在史

宅小书房长谈。杨杏佛详谈访问经过，在座的都赞成《申报》发表评论表示人民立场。谈话后，陶行知要马荫良将《申报》资料室收集的蒋介石和军政长官关于“剿匪”的文告、讲演，以及外文报刊关于苏区的点滴报道，送到他的住所。6月中旬陶写成评论提纲，虽患重感冒，仍抱病参加讨论，随听随记，随谈随改，形成了集体的写作提纲，由编辑部执笔成文，最后由陶行知修改。这样，著名的《剿匪与造匪》（一论、再论、三论）三篇时评，遂于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在《申报》发表。^②这三篇时评，由陶行知起草、定稿，也是宋庆龄、杨杏佛、史量才、陶行知的集体创作。它以确凿的事实、严密的逻辑，痛斥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指出：“举国之‘匪’皆黑暗政治所造成”，“一部分‘剿匪’军队，剿匪其名，而剿民其实，……实则兵之扰民，尤甚于‘匪’，民之畏兵，尤甚于‘匪’”；由此时评说：“杀一贪官污吏，实胜于动员一师‘剿匪’军队，整饬一师军纪，则又胜于动员十万大军。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此为定理，绝无可疑。”如此透彻有力的文字，表明《申报》与国民党当局已完全分道扬镳，引起蒋介石的极大震惊和恐慌。7月初，南京又发生了中央大学学潮，《申报》报道学潮的经过，并评论其起因、根源，锋芒直指蒋介石政权。教育部长朱家骅、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向蒋介石摘要报告了《申报》对“剿匪”与有关“中大学潮”的评论，诬称：“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蒋介石看了这份报告，随即批示：“申报禁止邮递”。因此，1932年7月16日至8月21日，前后共35天，发行全国的《申报》，只能在沪、京、杭这个“小三角”中递送。为对付“禁邮”，史量才一方面采取邮寄、航运等多种办法将申报寄运他地；另一方面又约请宋庆龄等面商对策。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建议，先派人去摸清蒋介石的意图。史量才请《申报》驻南京特派员秦墨晒通过他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有过交往的关系，去办此事。蒋介石避不见秦，最后由“剿匪总司令部”

秘书长杨永泰代接见，提出三项条件：(1)《申报》时评改变态度；(2)陶行知、黄炎培、陈彬和离开《申报》；(3)国民党派员指导。史量才同宋庆龄等多方研究，答应(1)(2)项接受(陶行知没有公开任职，不作公开声明)，(3)项决不接受，否则宁可停刊不办。蒋介石、杨永泰会商后接受史量才的意见，8月21日，《申报》“禁邮”解除。

“同盟”赢得了争取民权保障的舆论环境

形势不断发展，斗争日益深入，宋庆龄同史量才的结识更加紧密，《申报》愈益成为威慑国民党政权的一股舆论力量。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保障民权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实际活动时间虽不足一年，但在白色恐怖年代，为保障“民权”发挥了一个公开的、合法的群众团体的最大作用，在国内外影响广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独特的贡献。作为“同盟”的创建者、主席宋庆龄，同没有参加“同盟”但积极支持“同盟”的上海报界领袖史量才，在向国民党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携手合作，形成了一股争取民权保障的舆论洪流。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2月29日在上海华安大厦(现金门大酒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告成立。宋庆龄因病未到会，由同盟副主席蔡元培宣读宋的书面讲话。讲话说，我真诚希望新闻界同仁和“同盟”的盟员们并肩站在一起，“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我们的组织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我认为一个坚强而勇敢的新闻界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来在舆论方面兴起一个有利于自由和正义的潮流”。宋庆龄的讲话宣读后，史量才即席发言，他说：“我个人并代表《申报》坚决拥护同盟所提出的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非法捕人。最近《申报》由于发表反对‘剿匪’言论并报道南京中央大学的学潮真相，竟遭政府禁止邮递达

35天。未经法律手续，就采取此等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对于这种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加以容忍。”史的发言，引发了热烈的掌声。

《申报》史量才对“同盟”的支持，不只是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同盟”筹创过程中，史量才就派已辞去《申报》职务的陈彬和、《申报》记者钱华参加同盟，任总会和分会的执行委员，协助撰写文件及新闻报道。同盟正式成立后，《申报》及时地发表同盟的宣言、函电，报道同盟的各种活动，扩大它的影响。1933年2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非法逮捕并枪杀镇江《江声日报》记者刘煜生，同盟联合上海记者公会发起抗议运动，《申报》发表时评，并刊登同盟的宣言和上海市200多位记者的联名宣言，谴责顾祝同的暴行。同年3月，共产党员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3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及时登载同盟的营救过程，并发表律师为3人所作的辩护声明。《申报》对同盟活动的及时翔实报道和它的有关言论，使同盟争取民权保障的正义呼声传遍全国，为同盟保护和营救大批中共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舆论环境。当时，蒋介石慑于《申报》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禁邮”不行，又来笼络。他邀史量才在自己身边留影，并先后委史以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等十多个名誉职务。然而，史量才秉性耿直，既然走上了反对投降、反对专制的进步道路，他就越加坚定地向前走去。他对友人讲过：“《申报》有十余万读者，我岂能昧着良心，不讲事实，欺骗读者？现在《申报》得人信任，是由许多朋友们协助而来，我岂能负我朋友？《申报》产业属我个人，玉碎我也自愿。苟且取巧，我素耻恶。”正当史量才与读者、朋友们一起继续前进的时候，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于杭州返回上海途中——沪杭公路海宁县境翁家埠附近。

《申报》出现“黄金时期”宋庆龄的“无声细雨”是个因素

《申报》从1872年创刊到1949年上海解放停刊，经历几个时期，具有77年历史；其中，史量才接办22年。纵观这77年，其“黄金时期”是史量才接办的最后5年，即1931—1934年。这5年，是抗战的前期，是国家民族存亡危急之秋，也是史量才这位爱国新闻事业家从认清国民党政权反动面目到与之决裂的一个完整过程。这5年，《申报》对外主张抗日反对投降，对内要求民主反对专制，政治态度鲜明，报纸业务锐意革新，言论、新闻“比翼双飞”，《自由谈》上鲁迅等名家的“匕首、投枪”云集，《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务补习学校等社会服务机构影响深远，赢得了国内广大读者的信任，报纸的发行量上升到15万份（创刊时600份，史接办初为7000份）。

《申报》在77年历史中，显现出这段“黄金时期”，固然有着时代的大背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全民抗日救亡热潮席卷中华大地；有着阶级利益的驱使——《申报》及其总经理史量才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削弱、摇撼；有着主持者个人素质、志向乃至秉性的因素——史量才一生爱国，寻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道路，力主“开启民智”，素性“好直言，嫉恶如仇”，等等。然而，宋庆龄、陶行知、黄炎培等进步人士对《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直接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以上可以看到，在这短短几年中，宋庆龄同史量才的结识在快速加深。史量才作为一个爱国者从幻想国民党政权能成为“廉洁政府”，到看清其反动面目，“宁为玉碎”，选择了跟“读者、朋友们”前进正确的斗争到底的道路；《申报》从反对投降妥协，到反对“剿匪”、内战，到争取民主自由，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愈益鲜明、扩展和深化；这中间，宋庆龄的言谈、访晤、商议、谋划以及品德的感染，是多么珍贵的“无声细雨”！

纪念抗日战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人们不能不铭记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历史功绩，不能不缅怀宋庆龄在这一时期为解救民族危亡所作的英勇斗争，不能不珍视上海英烈、爱国新闻事业家史量才所创造的《申报》“黄金时期”。

(作者工作单位：解放日报理论部)

注释：

① 见马荫良、储玉坤，《关于“伍豪启事”的一些背景材料》，《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二辑。

②③ 见马荫良，《陶行知为〈申报〉撰写时评》，1991年10月16日《解放日报》。

宋庆龄与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

夏建强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的侵略步伐，它在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以后，又积极向华北地区开始新的侵略扩张。从1月到5月短短几个月中，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了东北通往华北的门户山海关、承德，战火一直烧至平津附近。1934年，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4月，日本外务省天羽英二发表了狂妄的《天羽声明》，强调日本对中国有特殊权利，企图排挤英美等国在华势力而独占中国。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面对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1934年初，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也发起组织了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及时地唤起民众的抗日意识，推动抗日斗争的开展。

1934年4月20日，民族自卫会以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草拟经宋庆龄等人共同协商修改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①，《纲领》内容是：全体武装军队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采取办法解决战费；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②。《纲领》表明，民族自卫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时，也表示了其自身的抗日立场。5月3日，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反帝反法西斯同盟、上海工团联合会等团体为核心力量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筹备会的策划和组织

者宋庆龄担任了主席。筹备会成立后不久，6月20日，中国民族自卫会又发表了《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为对日作战宣言》，进一步明确了自卫会抗日救亡的主张和立场。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的产生，无疑，正是全中国民众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最鲜明的表现，它是中华民族危机深刻化的产物，同时，它也积极地推动着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也只有团结全国民众，一致起来拥护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红军，反对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反对国民党阻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要求全国陆海空军立即北上抗日，把枪口对着帝国主义与汉奸放。”^⑧它的产生，反映了当时“只有广大群众的武装抗日，只有坚强的领导和组织，才能保证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道路”，^⑨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决抗日的心声和要求。

在由宋庆龄领衔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署的发起人、赞成人有：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王克勤、白云梯、王佑臣、李达、章任琢、胡汉民、李杜、杨靖宇、李廷禄、赵尚志、王德泰、周保中、翁照垣、叶夏声等1779人。他们都是各界知名人士，有的是国民党元老，有的是社会的政治活动家，有的是政治理论家，有的是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的将领，有的是十九路军的名将，还有工商界领袖等等。最后，在《纲领》上公开签名、赞成其观点、主张的达10万人之多。对日作战的纲领明确了民族武装自卫会的抗日主张，发表时的签名运动，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了进一步阐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抗日救亡的主张，筹备会于6月20日，又发表了《对日作战的宣言》。^⑩《宣言》为了唤醒民众，首先向“全国各父老兄弟”和“全国各报馆各团体”悲愤指出：“鸦片战争后的九十年间，我国失地二百余万方里，而在最近的两三年内日本所夺去的土地且倍于此，现在五分之一的中国版图，已经变色，六分之一的人口，已在日本及其他列强的铁蹄蹂躏之下”，中华民族已

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日本已把枪口瞄准了中国人民，亡国瓜分之祸已临在我们头上，如不愿做亡国奴，只有自己起来对日作战，中国才能自救。“中国人民已到了不战不胜的时候”！^⑥

民族自卫会的《对日作战宣言》，一方面强调中华民族所处的存亡危机，力图唤醒民族自救的意识，另一方面，又主张成立由工、商、农、学选出来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对日作战的共同领导机关。《宣言》主张，“我们号召全国同胞，一切爱国志士，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公民，不分民族、宗教、党派、性别来拥护抗日作战纲领，结成反日统一战线，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宣言》又同时主张，对日作战应做到“有钱者出钱，有枪者出枪，有粮者出粮，有力者出力，各尽所有，一切为抗日神圣战争”。因此，《中国民族自卫会为对日作战宣言》着重指出，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地组织起来，成立各界抗战团体，同时，要在全国各地、世界范围内结成广大的抗日统一战线，以推动抗日斗争的胜利发展。要进行抗日战争全民总动员，不能单靠军队进行独立的抗日，否则抗日救亡是不能实现的，这些主张，有力地推动了以后的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自卫会的对日作战宣言，最后也总结了救亡救国运动的经验，针对救亡运动中，全国上下出现种种现象和情况，明确必须排除种种障碍，首先主张的是，必须排除不抵抗主义，因为不抵抗促进了日帝的急进，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其次，要排除希望列强主持公道、信赖国联的幻想；再次，要排除国内的卖国亲日政策和粉饰卖国的“建设救国”的政策；最后，又必须排除的是借口中国无力的失败主义。只有排除这些障碍，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才能健康顺利地得到展开，救国救亡才能走向胜利。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在发表《基本纲领》和《对日作战宣言》的同时，还进行了许多其他的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8月，自卫会

的机关刊物《武装自卫》创刊，筹备会通过自己的机关刊物，发表文章，宣传其救国抗日的主张，主张全民族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共同保卫祖国。9月，筹备会又成立了战事工作研究会，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代表大会的召开准备条件。9月18日，正值九一八3周年，自卫会筹备会又发表了《为九一八3周年纪念宣言》，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和海陆空军动员起来，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斗争，同时，又要求全国举行罢工募捐、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没收日货及卖国贼的财产，组织民众武装队伍，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

1935年上海发生“新生”事件后，武装自卫会筹备会发表了《关于〈新生〉事件告民众书》，与此同时，又发表了《关于杜重远被惩罚告民众书》，向社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丑恶的行径和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压下加害杜重远的可耻行为，呼吁民众行动起来，营救杜重远。一二九运动发生后，武装自卫会筹备会又发表宣言，主张抗日，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学生。

在宋庆龄等领导组织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积极开展民族自卫自救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自卫运动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为策应武装自卫运动，1934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发出了《上海各区关于自卫运动的报告》，要求各区工人开展罢工。12月，中共江苏省委在《关于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工作决定》中，又一次强调扩大抗日作战武装自卫会的签名运动，建立各种自卫会。1935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又在其《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中，提出巩固和发展全国武装自卫运动。这样，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成为当时全国一切反日斗争的一个中心力量。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压制，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筹备会，虽然做了大量的抗日工作，但未能全面地开展筹备工作，其抗日救国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影响。1936年，随着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救国会的建立和各方面的救亡运动的不断发展，武装自卫会的实际工作已停止了。但是，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等

人的抗日救亡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到了1936年8月,当上海各报刊载以武装自卫会名义的“自首宣言”,表示向国民党当局归顺时,宋庆龄、章乃器联名发表了《为中国人民自卫会事告大众》,明确表示:“自首宣言”的炮制者“根本没有资格代表该会说话,该会没有向任何国内政权表示归顺的必要”,对于“无耻宣言,不能不加以驳斥”。11月,宋庆龄、章乃器对于上海仍有部分心怀叵测的打着“武自会”旗号,干着破坏救亡运动的卑劣行径,再次声明:“中华民族自卫会上海分会,早已停止活动。……,大家不要贸然参加,免受暗算。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大众,可以自由加入各救国团体,为民族解放努力!”^①宋庆龄、章乃器的声明,揭穿了反动分子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使抗日运动得到深一步的发展和推动。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建立和《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发表,这是抗日救亡运动中,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中许多事例中的一个。这对宣传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政法系)

注释:

① 博古在1934年7月8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演讲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党在四月二十日的宣言中,定出了反日统一战线中的五大纲领”,(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辑第319页)。这五大纲领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要宋庆龄领衔发表显然是不可能的。经协商修改的“六大纲领”体现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愿望,才有可能使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赞成签名。最后公开签名的人达10万人之众,人们都认为“六大纲领”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正因为是经过协商修改的,所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既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又被编入《宋庆龄选集》,以《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篇名。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42—143页。

- ③ 《红色中华》第 236 期社论,1934 年 9 月 21 日。
- ④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见《六大以来》(上)第 611 页。
- ⑤、⑥ 同②。
- ⑦ 《救亡情报》,1936 年 11 月 11 日。

宋庆龄与救国会

沈荣海

救国会是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在国难日亟的三十年代中期，发起成立的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全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简称全救会。

九一八事变后，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宋庆龄，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积极开展各项救国活动。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她广泛团结和依靠各阶层爱国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冲破当局禁令，创建救国会；每当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支持救国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无所畏惧地反对国民党的“爱国有罪”暴政，捍卫救国会。她无私无畏，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救国会的坚强支柱，众望所归的实际带头人。

支持中共中央的团结抗日主张 创建救国会

1913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华侵略的新阶段。由于蒋介石采取所谓“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的不抵抗方针，东北三省迅速沦陷。

蒋的不抵抗方针，更使日寇有恃无恐，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攫取平津，进而侵吞整个中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加紧“剿共”，处处对日妥协，先后与之签订一系列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的

协定，并颁布所谓“邦交敦睦令”，严禁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

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及时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宋庆龄、何香凝等率先响应，引起全国巨大反响。在《八一宣言》影响和宋庆龄的积极支持下，同年12月，由北平爱国学生掀起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抗日救亡运动由此重新走向高潮；与这同时，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也不顾当局禁令，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强烈要求停止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一致抗日，打破了上海救国运动在国民党压制下的沉寂状态，并在全国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在几个星期之内，全国各地和各阶层人民中就成立了数百个救国会的组织。”^①反映了炎黄子孙决不愿当亡国奴，坚决要求抗日的决心。

为了把分散的各救亡团体联合起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号召和组织下，于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等30人被选为理事会理事，负责上海的抗日救国活动。在这基础上，又经一段时间的积极准备，全国20余个省市、60余个救亡团体的代表，于同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举行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全教会的《章程》、《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在这些文件中规定：全教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②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③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作用在灭亡全中国”，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是“全国各实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废弃一切教导人民亲敌、堕落民族气节的所谓‘合作’、‘亲善’、‘敦睦邦交’等可耻口号，同时给与人民以抗敌的组织和言论的自由”。^④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

随后，其中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 14 人被推为常务委员。从此，抗日救亡运动有了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构。

全教会的成立，实现了全国各地救亡团体的大联合，并使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宋庆龄“是全教会的带头人，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前列，她全力以赴，支持全教会的斗争，”^⑧使全教会成为抗战前夕，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

反对国民党暴政 捍卫救国会

国民党当局“为了保存自己的历史而不惜断送民族的历史”，^⑨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竭力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全教会成立后，更是被它视作心腹大患，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为支持和捍卫救国会，宋庆龄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全教会刚成立，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就攻击它“是非法的、少数野心家包办的反动组织。”并气势汹汹地威逼沈钧儒、章乃器放弃全教会宣言的救国立场，自行解散救国会。沈、章理直气壮地说，成立救国会，是“为良心所驱使，根据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工作，除此以外，别无要求，更谈不上什么野心。”^⑩并坚定地表示：“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⑪刚病愈的宋庆龄得知后，立即致函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充分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并签名于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之后。这不仅是对国民党攻击的有力回击，更是对各界爱国人士的极大鼓舞和支持。

1936 年秋，伪蒙军在日寇指使和配合下，大举进攻绥远，驻绥傅作义部孤军奋起抵抗。为援绥抗敌，救国会发动会员上街募捐，支援前线抗敌将士。这一爱国义举，竟也遭到当局的无耻攻击。9

月1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布所谓“严禁藉名募捐”的通令，再次攻击救国会是“非法团体，反动分子之集团”，并诬蔑援绥募捐是“藉救国为名敛钱肥己”。对这殊深骇异的攻击，宋庆龄当即与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8人，联名发表启事回击。启事中指出：救国会“曾否敛钱肥己，想为国人所共谅。十年来敛钱肥己者究为何种人，亦难逃国人之耳目。市党部果见有敛钱肥己之事实，尽可按法惩治，何能一纸文书，妄加诬蔑”。并反诘道：“倘为政府抗敌军队募捐而竟成为反动，则岂非媚敌卖国，乃得称为正动乎？”在以理批驳当局对救国会的种种诬蔑后写道：“窃以国难严重若此，党政诸公既不能领导人民从事救亡工作，人民自动组织，应何欣慰之不遑，詎忍诬为反动，实所不解。”^⑧这就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反对人民救国的丑恶面目，有力地申张了正义。

同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为教育民众不忘国耻，推动救亡运动的发展，救国会联合市总工会，市商会等20余个团体，决定在漕河泾举行九一八纪念碑奠基典礼。当局事先曾表示同意，后又出尔反尔，突然下令禁止，在这天派出大批军警特务，阻拦殴打整队前往漕河泾参加奠基典礼的爱国群众，“致受伤者达百人以上，失踪者数十人，被捕者二十余人。”^⑨宋庆龄对当局制造的这一血腥事件，愤慨无比，即与何香凝联名发出快邮代电，严词指责当局：“民众甚至不能和平纪念九·一八，国事尚堪问乎？政府准备抗敌之诺言，尚能为人民所信任乎？政府果欲人民忘九·一八之耻，以便于敌人之亡我灭我乎？”强烈抗议当局的血腥暴行，并提出了“严办负责官吏，抚慰受伤人民，释放被捕诸人，以安人心”等严正要求。^⑩

正是由于宋庆龄不畏强权，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爱国有罪”暴政，及时揭露和抗议当局迫害救国运动的反动行径，才迫使当局不得不有所顾忌。这是救国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始终未被扼杀并不断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全力以赴 积极营救“七君子”

1936年11月上旬，上海日商纱厂华工因不堪承受厂主的残酷剥削和欺压，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救国会深切同情并积极支持罢工工人，引起日本帝国主义对救国会的更大忌恨。11月18日，日本驻沪领事馆向国民党上海当局提出了即刻“逮捕抗日救国会的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以及其它五人”的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扬言如不然，“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⑧国民党当局早就企图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只是怕在政治上造成太大的被动，才未敢动手，在日寇的压力下，竟不再顾及一切，于11月23日凌晨，在上海悍然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随后移解到设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当局在逮捕“七君子”的当天上午，即秘密通报日驻沪领事馆，说明此举是“不顾法律常规加以逮捕，希望切勿登报。”^⑨这充分反映了国民党对外屈从日寇，对内非法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也反映了它妄图秘密处置“七君子”的险恶用心。

宋庆龄在当天得到“七君子”无辜被捕的消息后，殊为愤慨，立即全力以赴地组织营救活动。她在同日致冯玉祥的函中指出：“章先生等系救国会办事人，救国为全国国民责任，岂救国者即为共产党乎？”要冯主张公道，迅电蒋介石，“立即释放章先生等七人”。^⑩翌日，她组织全教会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强烈谴责当局迫害救国会领袖。并郑重宣告：“救国会的人士既以身许国，决不是逮捕等等，足以阻遏其志愿的！”^⑪严正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诸领袖！公开保护救国运动！打倒汉奸！立即抗战！”^⑫同时，还通过萨空了主编的《立报》，将“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公诸于世，及时粉碎了当局妄图秘密处置“七君子”的阴谋。11月26日，她又以被当局诬为“非法、反动”的全教会执行委员身份，发表《为沈钧儒

等七人被捕声明》，对当局“以毫无根据的罪名”，违法逮捕救国会诸领袖，提出强烈抗议，并正确指出：“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帝国主义的影响所致。”但其结果“完全会出于他们原来的意料之外，仅能更引起中国人民反日的愤怒和爱国热诚。”^⑧

“七君子”的无辜被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宋庆龄声明的发表，更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迅速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营救运动。各地各阶层人民以至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的抗议呼声持续不断，日益高涨，敦促立即释放“七君子”的电函，如同声讨国民党“爱国有罪”暴政的檄文，纷纷从海内外飞向南京当局。

在宋庆龄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包括某些上层人士，也投入了营救活动。时任国民政府军委副委员长要职的冯玉祥，接到宋庆龄的信后，即密电蒋介石，“拟请电令释放”章等七人；后又与于右任、孙科、李烈钧等 20 余名国民党中央执委，联名致电蒋介石，要蒋对此事“郑重处理”；甚至与于右任在南京发起了征集 10 万人签名的营救运动。爱国将领张学良为营救“七君子”，更是只身飞赴洛阳，面请蒋介石“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遭无理拒绝后，当面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⑨12 月 12 日，他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对蒋介石进行“兵谏”的通电中指出：“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并提出了包括“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在内的八项救国主张。^⑩

国民党当局屈从日寇淫威，非法逮捕“七君子”，原以为可以整垮救国会，扑灭抗日救亡运动的烈火。但结果与此相反，救国会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在全国以至海外，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在宋庆龄领导和推动下，举国上下群起反对国民党“爱国有罪”暴政，抗日救亡热诚愈益高涨，并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对抗。

发起救国人狱运动 力争救国自由

国民党非法逮捕“七君子”后，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抗议，在政治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如一意孤行，对“七君子”判罪，必将进一步激怒广大人民，以至众叛亲离，使局面不可收拾；如顺应民意，无罪释放“七君子”，则无异于公开承认救国会的合法地位，势必更难控制迅猛发展的救国运动。因此，一再延长此案的侦查期，迟迟不敢开庭审理。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等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经多方努力，终于得到和平解决，使中国政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指出：“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政府应立即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实行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⑧并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联名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⑨在宋庆龄等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在五届三中全会后，对过去实行的误国政策开始有所转变，救国会所努力追求的团结抗日局面，也开始逐渐形成。

在此形势下，人们“皆以为沈钧儒等必可无罪释放，而司法方面亦曾一再向沈等作私人表示，法律完全不成问题，不致提起公诉。”^⑩4月3日，是“七君子”案羁押侦查期法定最长期限的最后一天，按照法律规定，如不起诉，不得再继续关押他们了。正当人们期待着“七君子”出狱的这一天，法院却突然抛出一篇匆匆泡制的起诉书，以所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等罪名，对“七君子”提出公诉，与已开始出现的“团结御外，共赴国难”的政治气氛大相径庭，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再次掀起营救活动的高潮。

为了营救“七君子”，配合他们在狱中的斗争，并推动正在形成

的团结抗日局面的发展，宋庆龄发起了一场特殊的，以自请羁押的和平方式进行的救国入狱运动。6月25日，她与何香凝、张定夫、胡愈之等16人联名向江苏高等法院递状，自请与沈钧儒等“并案办理”，将他们“悉予羁押审讯”。状文指出“窃爱国无罪，不待烦言。沈钧儒等从事救国工作并无不法可言，……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等同受制裁之列。……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并要求法院迅予办理，“以解天下之惑。”^⑧他们还在公开发表的《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中壮严宣告：“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并指出：“我们准备去入狱，不是专为了营救沈先生等。”还为了使全世界知道“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最后在宣言中号召各界人民：“我们都为救国而入狱罢！”^⑨在宋庆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向法院呈文，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救国入狱运动。

7月5日，宋庆龄抱病亲赴苏州“投案”，同往的有张定夫、潘大津、胡愈之、胡子婴等共12人。行前，宋庆龄因胃病发作，已多天没有吃饭，胡子婴关切地问：“孙夫人胃病发得这样厉害，到苏州去不要紧吧？”她坚强地说：“不要紧，精神还是很好的，别人因救国而受罪，我这小小胃病，算得了什么！”^⑩江苏高等法院对这突如其来包括“国母”宋庆龄在内的12个“投案者”，始料不及，茫然不知所措，对他们提出的爱国“如果无罪，应把七位救国会领袖立即释放；如果‘有罪’，则把我们一起关押起来，因为我们也都是救国会负责人”的严正要求，^⑪更是无言以答，始终支支吾吾，被追问得狼狈不堪。

宋庆龄大义凛然，抱病前往苏州“投案”，以坚定的态度，机智、合法的和平方式，与国民党迫害爱国人士的反动行径，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把营救运动推向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使狱中的“七君子”和

全国人民深受鼓舞，在政治上造成了对国民党的巨大压力，迫使它始终不敢对沈钧儒等判罪，并在“七七”事变不久，不得不将他们交保释放，后又正式撤销了这起冤案，使这场为人民争取救国权利和自由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由此可见，宋庆龄不愧是救国会的坚强支柱、救国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她在外敌入侵日益猖獗，中国人民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日趋严重、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始终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无私无畏，竭尽全力地支持救国会斗争，卓有成效地发动广大民众，掀起了一浪高于一浪的抗日救亡斗争的新高潮，充分显示了她伟大的人格力量和不同凡响斗争艺术；她所特有的感召力，极为广泛地带动了包括国民党内部一些上层人士在内的各阶层爱国人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坚决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积极争取“团结御外、一致抗日”的统战力量，对国民党转向抗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她在救国会时期的革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注释：

-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52 页。
- ② 《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6 页。
- ③ 同②，第 97 页。
- ④ 同②，第 84 页。
- ⑤ 《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0 页。
- ⑥ 同②，第 68 页。
- ⑦ 同②，第 199 页。
- ⑧ 同①，第 148 页。
- ⑨ 同②，第 203 至 204 页。

- ⑩ 同①,第 150 页。
- ⑪ 同上。
- ⑫ 《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5 页。
- ⑬ 同上。
- ⑭ 同①,第 155 页。
- ⑮ 同②,第 206 至 207 页。
- ⑯ 同①,第 156 至 157 页。
- ⑰ 同②,第 219 页。
- ⑱ 同②,第 220 页。
- ⑲ 同①,第 166 至 167 页。
- ⑳ 同①,第 163 至 164 页。
- ㉑ 同②,第 243 页。
- ㉒ 同①,第 188 页。
- ㉓ 同①,第 181 页。
- ㉔ 《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9 页。
- ㉕ 同⑤,第 114 页。

宋庆龄与救国入狱运动

陈家骥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悍然秘密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7人，随后将他们解往苏州，拘押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蒋介石政府为什么要下如此毒手呢？这就要研究救国会的历史，只有我们明白了救国会的产生及活动情况，就能回答上述问题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对于日本的大举侵略一贯妥协退让，把中国半壁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在国统区加紧镇压人民抗日活动。蒋介石的这些倒行逆施，暴露了他的独夫民贼的真面目，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谴责。

正是在这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沈钧儒等人一方面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的本质，认识到要迫使他抗战救国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单纯发表几篇文章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联络有志之士共同奋斗，另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抗日救国。沈钧儒等政治行动方针确定后，迅速发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该会于1935年12月27日成立，在该会成立前一星

期，由史良、陈波儿等发起组织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随后还有沈钧儒、周新民等发起的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沙千里发起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陶行知发起的国难教育社等。这些目标完全一致的爱国团体为推进抗日救国运动的需要，在宋庆龄支持下联合了起来，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31日发展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成立，打破了淞沪抗战被蒋介石出卖后几年的沉寂状态，抗日救国之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

救国会的性质是爱国群众团体，成员包括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它不是一个政党，好像是一种胶水，把各种力量凝聚起来，一致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形式是委员制，没有会长。成立大会选举了执行委员40余人，常务委员15人。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何香凝、邹韬奋等任执行委员。在宋庆龄、沈钧儒领导下，救国会在国统区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北平、天津、南京、广州及其它各大城市以致海外都有救国会的分支组织。救国会的活动不但得到职业界、劳工界、青年学生的拥护，也获得工商界人士和国民党广大官兵的同情和支持。

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救国也是有“罪”的。救国会的全部活动虽然采取合法斗争方式。但从开始就受到反动政府的严厉镇压和打击。1936年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说什么上海救国会的成立是共产党“欲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之下，作卷土重来之计”^①。诬指救国会“反对中央”、“颠覆政府”、是“赤色帝国主义”的“爪牙与工具”，扬言“当予以最后的严厉之制裁”^②。6月2日，沈钧儒、章乃器前往上海市政府会见市长吴铁城，向他阐述救国会宗旨，并递交成立大会宣言等文件，吴铁城非但不予支持。反而诬指救国会有野心，要求他们收回宣言。随后不久，蒋介石又邀请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到南京去谈判。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救国会接受国民党的领导。蒋介石

企图把救国会变成国民党当局的一个御用机构，从而无形中扼杀民众救国运动。沈钧儒等坚决予以拒绝，说：“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就不领导也领导了。我们救国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亡图存，谁这样做，我们就同谁团结。”^⑧7月，吴铁城摆下“鸿门宴”邀请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到市府便餐。席终，吴提出：“你们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又有独立主张，那就是对抗国民政府，那不是要另组政府又是什么？现在我宣告你们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非法，命令你们：一、立即写好通告解散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二、把所有的印刷品送到市政府来，以备销毁。否则今天便把你们拘留起来！”沈钧儒等据理反驳后庄严宣布自己“一不躲避，二不逃跑。”^⑨便起身告辞。

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正气凛然，威武不屈的精神，以及他们在广大群众中日益增高的威信，使蒋介石既妒且恨，于是他们改变策略，派遣特务分子和共产党叛徒混入救国会，从内部破坏和分化瓦解救国运动，同时动员御用报纸大肆污蔑，抢在各学校开学之前，掀起了一股攻击救国会的恶浪。9月18日，国民党军警对救国会组织的群众游行队伍进行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救国会的活动，更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度仇视。18日，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派领事寺崎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交涉，要求蒋介石政府“逮捕抗日救国会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以及其他五人”^⑩在日本帝国主义压力下蒋介石政府终于对救国会下了毒手。

事件发生后，宋庆龄对国民党反动行径极为愤慨，在全国人民支持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奋笔疾书，发表声明和宣言，揭露蒋介石政府妥协投降政策，宣传救国无罪的真理。(1)在“七君子”被捕后的第三天，她发表《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声明说：“余以全国救国会执行委员之一，鉴于全国救联七领袖被捕，特提出抗议，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诸领袖。”^⑪这样，她一开始就亮明自己的身份，自己也

是救国会的领袖之一，一定要与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同命运、共呼吸，推进救国运动到底。接着严厉正告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救国会的七位领袖虽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让日本军阀当心吧！他们虽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七位领袖，但是全中国人民是不饶他们的”。她的声明，爱憎分明，气贯长虹。四海内外，反响强烈，一个营救“七君子”的运动席卷神州大地。正是这一声明，迫使蒋介石政府对“七君子”不敢秘密处置，只得公开开庭审判。(2)1937年6月25日，即第二次开庭审理的当天，由宋庆龄领衔与何香凝等16人，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具状称，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同等受制裁之列，具状人等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为此联名具状，“束身待质，仰请钧院具状等悉于羁押审讯”。这一呈文具状，充分展现了宋庆龄大智大勇和崇高自我牺牲精神。(3)1937年6月26日，宋庆龄等16人发表书面谈话，阐明了发动救国人狱壮举的意义，并且号召：“我们不仅自己这样做，我们还希望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同样做”，^①而且对参加者定下了3条简单规约：递状到法院请求与七位先生并案办理；随传随到；要绝对和平守法，拥护政府，不得有扰乱秩序，妨碍治安以及任何轨外行动。也就是说，将采取的是和平的合法的救国运动方式，这种方式使蒋介石政府无可奈何，不敢公开干涉和镇压，完全陷于被动状态，在发表上述谈话的同时，宋庆龄等又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宣言》宣布：“我们准备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接着质问国民党当局：“沈先生等犯了什么罪？就只是犯了救国罪，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呢？”严正声明：“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危亡的中国。”“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人，而有千千万万个。”并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

而入狱”^⑧正是通过宋庆龄声明、宣言，全国人民终于清楚了“七君子”被逮捕的真相，无不痛恨蒋介石政府的罪行，增强了对蒋介石政府的愤慨。二、领导救国会成员同蒋介石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宋庆龄不是口头革命派，她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为了人民的利益，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勇往直前，一切都以抗日救国大业为重。1937年7月5日早晨，她同救国会胡愈之、胡子婴等12人，不避酷暑，不畏艰险，自携行李，离开上海乘火车到了苏州高等法院，她庄重宣布，如果爱国有罪，自请政府关押，她和反动当局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当众训斥了法院院长等人。她说，“你们竟敢把爱国的领袖都关了起来，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只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奴才做得出这种事来！”^⑨宋庆龄的到来，使法院院长手忙脚乱，理屈词穷，到下午被迫作了4点答复：（1）救国会本身并非犯罪；（2）对于孙夫人请求侦查，法院准备开始侦查；（3）如孙夫人等递出补充证据，法院接受办理；（4）如有其他救国会会员，请求检举，法院应同样办理。宋庆龄认为救国会代表提出的请求已有初步答复，决定返沪提出证据，再听候传押。于是他们看望了沈钧儒等人，当晚9时多回到上海。宋庆龄亲自到苏州要求救国入狱的壮举，震动了全世界，使国民党当局十分被动，骑虎难下，其反动嘴脸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三、给国民党统治集团核心成员发出紧急电报，迫使蒋介石政府立即释放“七君子”。宋庆龄清楚，逮捕“七君子”，冒天下之大不韪，罪魁祸首是蒋介石，同样，能使“七君子”立刻释放，也完全取决于蒋介石。可是，蒋介石的顽固不化是众所皆知的。宋庆龄通过宋氏家族做了工作，但未成功。怎么突破这一障碍呢？宋庆龄经过周密思考后，在1937年7月6日，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军委冯玉祥、国民党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院长孙科、居正、于右任、戴季陶等人，严正表示，宋庆龄等及全国救亡运动中人，断不敢坐视沈钧儒等夙因而己身享有自由。电报要求他们，“迅予主张公道，

勿失全国志士之心。”^⑧既然蒋介石是生杀大权在握的首要人物，而宋庆龄为什么不单独给蒋介石发电报呢？笔者认为，这是宋庆龄斗争策略高明之处。宋庆龄对蒋介石本性了如指掌，她知道凭一个电报让蒋介石改变决策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民族矛盾上升，国民党统治集团不再铁板一块，即使上层人物也会分化，他们对日、对民众运动的态度必然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差别。她认为，利用这种差别，扩大国民党上层集团在处理“七君子”事件上的分歧，争取其中一部分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情与支持，形成一种国民党内部给蒋介石的压力，迫使蒋介石释放“七君子”是完全可能的。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如宋庆龄预计的那样，她给国民党领导人的电报公布后，蒋介石不仅遭到广大党员批评，更受到冯玉祥、于右任等许多要人的谴责，陷于更加孤立和不得人心的困境。

由于宋庆龄的积极营救、“七君子”坚强不屈的斗争、国内外广大群众的有力声援，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在1937年7月31日，宣布“七君子”交保释放。中国现代史上一场紧张而又壮烈的政治斗争以人民的胜利而结束。

宋庆龄领导的救国入狱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独特斗争形式，有着光辉的、深远的重要意义：

1. 粉碎了蒋介石政府企图秘密处置甚至杀害“七君子”的阴谋。蒋介石集团视救国会为眼中钉、肉中刺，攻击救国会“危害民国”企图“颠覆政府”的反动组织，他们秘密逮捕了“七君子”，陈果夫、陈立夫主张立刻处决，刽子手们凶相毕露，“七君子”生命危在旦夕，形势极端严重。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挺身领导了救国入狱运动，最早发表声明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的法西斯面貌，并亲自救国入狱，唤醒了群众，一个营救“七君子”出狱的救国运动立刻席卷神州大地。北平和广州的学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代表组成请愿队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诸领袖”^⑨，文化界知名人士

李达、许德珩等 107 人亦致电蒋介石政府，要求对“七君子”“即日完全开释，勿再拘传，以慰群情，共赴国难”^②旅居海外的华侨，如陶行知、冀朝鼎等 600 多人发表了告海外同胞书，严正指出：“抗日救国不仅我全国同胞之公意，亦我全国人民之天职，若谓沈、章诸先生有罪，是我国万万同胞均有罪也。”^③国际上，许多学者、知名人士如爱因斯坦、杜威也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七君子”。一时，蒋介石政府陷入人民包围之中，成了万夫所指、众矢之的。他们的凶残阴谋被揭穿，不得不公开此案，循司法程序审理。可以说，没有宋庆龄领导的救国入狱运动，“七君子”完全可能死于蒋介石之手。那么，这将是中华民族难以弥补的损失。

2. 救国入狱运动的胜利，大大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迅速到来。蒋介石政府逮捕“七君子”目的是镇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抵制共产党团结抗日路线。这次运动的胜利，大大增强了人民参加抗战并去夺取胜利的信心。由于蒋介石卖国嘴脸的暴露，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某些实力派人物的痛恨和反感，先是李宗仁、白崇禧发出的营救电，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在他们的 8 项主张中，明确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后又出现冯玉祥等对蒋介石的批评，上述各种政治力量汇合成一个新的，强大的抗日洪流，迫使蒋介石释放“七君子”等所谓政治犯，终于出现了中华民族抗日新高潮。

3. 唤起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这种因素，成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救国入狱运动引起了各国人民特别是政界和知识界人士的极大关注，许多人同情中国人民，公开站到了中国人民一边，批评蒋介石的卖国行径，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是有世界人民作自己的坚强后盾，从而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4. 救国入狱运动的胜利，充分显示宋庆龄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救国的旗帜。宋庆龄领导的救国入狱运动和在这之前领导

创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武装自卫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会一样，清楚表明她是一个不畏强权、不顾个人安危，充满公理、正义、智慧的 20 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不仅如此，她同坚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保持了亲密友好的关系，积极学习中国共产党各种文件，自觉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各项政策。因此，她的全部言行，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了一致，体现了人民的愿望，捍卫了民族的利益。人民从她身上汲取了力量，树立了胜利的信心，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可以说，宋庆龄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救国的伟大旗手。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教育学院历史系)

注释：

①② 《救国会》(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97 页、198 页。

③ 《沈钧儒纪念集》第 11 页。

④ 《救国会》第 440 页。

⑤ 转引自《上海滩》1987 年第四期。

⑥⑦⑧⑨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0 月版，第 156、186、181、191 页。

⑩ 吴大琨，《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1981 年 5 月 26 日《中国财贸报》。

⑪⑫ 《救亡情报》第 28、29 期，1936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9 日。

⑬ 《七君子事件》第 216—218 页。

她似一头“雄狮”

——评宋庆龄 1936 年到 1937 年的抗日救国斗争

卞杏英

时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的宋庆龄，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被主持会议的著名作家罗曼·罗兰高度赞扬，他说：“你们以为我们卓越的副主席宋庆龄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花朵吗？不！不！她是一头名符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①他精辟概括并生动描绘了宋庆龄历经艰辛，冲破罗网，为实现孙中山遗嘱，为反对侵略、压迫剥削，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反对战争付出的毕生精力，歌颂宋庆龄是东方中国英雄，是一名不屈不挠的刚强女性。

宋庆龄在 1936—1937 年，中国历史重大转折时期，以她大无畏的勇气与毅力，在国际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冲坚毁锐。

反日的最好方法是加强民族革命力量

华北事变后的中国，日本侵略者直接威胁着它的生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各界爱国人士抗日救国活动方兴未艾。宋庆龄正在寻找一个最好的方法实现抗日救国。她认为要促进“全国人民，不问政治信仰”，党籍不同的区别，以成立统一战线从事民族解放战争，又能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以“求得中国之自由和平等。”^②只有“加强民族革命力量”。^③加强民族力量应当组织起来，她与马相柏、沈钧儒、章乃器等民主人士商议并领导成立了全国各

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救国会主张举行各党各派的合作抗日会议，“促进政府与人民一致成立统一战线，抵抗日本侵略”。^④

促进国民政府抗日，是救国会加强民族力量的重要工作。救国会抓住时机进行大量的宣传活动。两广事件发生后，救国会发出《对时局紧急通电》，要求国民政府抗日，96岁高龄的马相伯呼吁“全息内争，共御外侮”，1936年7月，利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救国会派沈钧儒、章乃器、史良、彭文应、沙千里5人赴南京请愿，召开记者招待会，提出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等要求。10月，救国会在南京，上海分别印发《为中日问题敬告同胞》和《为中国外交已到最后关头》的宣言，征求群众签名，以表民意。由于救国会的积极活动，扩大了社会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至1936年底，救国会会员达10万人之众。对此，宋庆龄甚感欣慰，她评价说：“整个领导，亦甚正确”。^⑤

然而，国民党政府不能容忍救国会组织的存在，10月28日《日日新闻》报道，蓝衣社研究决定：(1)将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等数十名救国会首脑，以对付史量才之手法暗杀。(2)收买抗日救国会内部动摇分子，进行分化。(3)绝对禁止救国会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等公开活动。它预示着救国与卖国、民主与法西斯较量即将发生。11月23日凌晨，当局将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领袖和南京救国会志士孙晓村，曹孟君逮捕，接着查禁大批救国刊物，压迫救国会组织。

面对此状，宋庆龄愤慨万分，立即以救国会执委会的名义发表《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在七君子被捕的第二天，她致书冯玉祥，请他迅电蒋介石，要求立即释放章乃器等人，并希望冯玉祥设法营救七君子。

七君子事件，激发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义愤，纷纷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发表宣言，函电、评论、举行集会，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当局宣判七君子无罪释放等营救七君子活动。

宋庆龄似头猛狮，带头救援七君子运动。她和何香凝等 16 人发表关于救国入狱活动，联名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在上海对新闻界发表关于救国入狱运动书面谈话。宋庆龄等 16 人联名具文赴苏州高等法院。其呈文：“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之救国责任。”^⑨宋庆龄领导制定《救国入狱运动规约》提出以采取救国无罪为其唯一目的，准备自愿为救国而入狱。他们的具状书送出 10 天仍杳无音讯，宋庆龄等以身试法，亲赴高等法院要求收押。宋庆龄对高等法院院长说，“我是救国会发起人，也是救国会的执行委员，我与沈先生他们七位在工作上做的是同样事情，在法律上则愿负同样责任，请把我押起来，与沈先生他们七位一样受不自由的处分。”^⑩世界上哪有自动要求关押的“政治犯”？只有胸怀坦然，敢于斗争的勇士，才有如此大胆行为，宋庆龄刚正不阿，勇往直前，似一头猛狮戳破国民政府的高等监狱。首席监察官和法院院长被驳得理屈词穷，无法招架，同时，宋庆龄致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电，再次表示“庆龄等愿牺牲个人全部之自由，以明沈等之忠诚”。特函电奉告，讨还公道。宋庆龄等人的行动使当局非常被动，同时也教育人民，在更大范围内展开救国、爱国运动。

抗日救国与保卫世界和平

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著名的国际主义者。她主张建立国际反侵略的阵线，将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早在 1933 年在上海筹备远东会议时，她代表中国发表声明，并出席会议。1935 年她向美国朋友呼吁“不让一枝美国枪和一分美国钱用于帮助南京政府及其走狗粉碎中国广大群众的合法愿望”。^⑪由于她的努力和声望，担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

1936 年 9 月 10 日在法国巴黎召开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援助西班牙共和，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声援各国反法西

斯群众运动诸问题。理应宋庆龄出席会议，但因迫于她的处境险峻，在她旧居上海莫利哀路 29 号周围，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不得自由行动，无法出国，她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请钱俊瑞（时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党组书记）代她出席这次会议。为此，宋庆龄先后两次找钱俊瑞谈话，交代任务。据钱俊瑞回忆，第一次谈话，在场有胡愈之参加，谈得简单。第二次，她把专程来华请她去巴黎开会的美国反法西斯战士达德教授介绍给钱俊瑞。宋庆龄阐明会议目的，主动联系中国实际。她说：“我们中国呢，还有一个卖国独裁的法西斯”，这个法西斯我们应不应该反对？钱俊瑞和达德异口同声说，当然要反对。宋说，对，你们说得对，当然要反对，而且要反对到底。这次钱俊瑞去出席会议，就要代表我把这层意思讲透，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不但要反对希特勒，反对墨索里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都是凶恶的侵略者，压迫者，还要反对卑鄙残暴的蒋介石法西斯主义。她指出，对于东方这两个法西斯主义，欧美各国人民还不很清楚，因此要让他们知道。宋庆龄为帮助达德了解中国，同时扩大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影响，特地请钱俊瑞设法找一份“八一宣言”翻译稿讲给他听，让达德也懂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可以在会上宣传。

宋庆龄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宣传中国抗日救国斗争，不失任何时机呼吁各国对中国人民的道义和物质的援助。

为国共停战抗日牵线

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破裂已近 10 多年，共产党作出多种努力，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民党蒋介石在华北事变后，企图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已被打破，南京政府已不能容忍日本侵略者的逼进，迫使它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对日政策。于 1935 年底开始试探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南京政府主要通过3条途径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第一条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沟通关系；第二条派曾养甫与中共周小舟等联系；第三条是蒋介石要宋子文负责国共谈判全盘工作，宋子文通过其二姐宋庆龄来牵线搭桥。

宋庆龄非常赞成中共八一宣言，又根据局势的发展变化，认为国共两党中断关系影响民族解放，应当促进联络，逐步恢复关系。为此，宋庆龄请董健吾去共产党中央联系，她交给董一份重要文件，董化名周继吾（王牧师之称），行资百元，以南京政府财政部委员名义作为通行证。宋庆龄再三嘱咐，此行将“益国非浅”。

董健吾到达西安，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包围封锁，无法入内，经张学良的帮助，乘飞机到延安，再由骑兵护送到瓦窑堡，与他同行的还有负有同样使命的张子华。他们被中共中央林伯渠、秦邦宪等接见。

3月4日，毛泽东提出和国民党谈判5条原则：（1）停止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侵略；（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董健吾带此密件回上海交给宋庆龄，又由宋庆龄交给国民党中央。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宋子文称：“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之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联合抗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赞誉宋庆龄的高尚行动。称之为“我们无限的敬爱”，在“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并寄希望于宋庆龄“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之活动”。^⑨

正由于宋庆龄的牵线，中国共产党更积极主动地对国民党有关方面工作，以推动当局转变政策，及早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共赴国难。

团结御侮是历史的必然

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发生后，蓝衣社给宋庆龄寄去了恐吓信，信里附有两颗子弹，其意，蒋介石被扣西安，万一有生命危险，这些子弹是不认人的。宋庆龄面对威胁，从容不迫地说“不怕他们”。她深谋远虑，从国家民族利益考虑，为实现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毅然提出释放蒋介石。她分析形势：若以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图谋蒋介石，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本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宋庆龄对胡子婴说：“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邀何香凝同行。何香凝虽病初愈，同意西行，后因不能解决飞机而作罢。

宋庆龄不计恩怨，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使宋美龄深受感动。对于宋庆龄在促进国共两党合作中的作用，可从周恩来与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谈判，便知一斑。周恩来提出“推宋庆龄、林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①宋子文提出以此作为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在谈到“释放政治犯”之事，宋子文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宋庆龄）商办法”。^②宋子文强调与宋庆龄商办，确定他已认识宋庆龄是深明大义，办事公道可信赖者。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14人联合提案《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宋庆龄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发表了演说，她强调国共“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③批评当今政府中仍有个人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她生动比喻地说，难道“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④会上，由于多方努力，据理力争，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初步实现。

七七事变后，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待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中共代表，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御侮主张，并赞扬中国共产党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壮举。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现的第二天，即9月24日，宋庆龄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一文，她表示“异常兴奋，异常感动”，她说：“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这是她为实现中山先生遗嘱长期奋斗的希望，是为对日抗战，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感动。她要求国共两党“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都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她告诫国民党，应该谨记着，“要是不顾先总理遗教，抛弃了工农大众利益，将成为民族罪人，等于国民党的自杀”，一定要记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⑧的古训。宋庆龄满腔热忱地祝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抗日御敌胜利的前途必将到来。

宋庆龄在短短的两年中，对抗战战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以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参与国内外重大社会活动，积极努力地朝着一个目标——忠实地实现孙中山遗嘱。她的作为获得全世界人民极大的尊敬。她似一头“雄狮”，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和国际的反战斗中屹立着，怒吼着，奋斗着。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列部）

注释：

① 钱俊瑞《痛悼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1981年6月1日《人民日报》。

②③④⑤⑥⑧⑨⑩⑪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62、149、156、151、188、144、163、167—168、206—207页。

⑫ 《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页。

⑬⑭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61页。

⑮⑯ 《周恩来选集》上卷，1980年版，第71、72页。

宋庆龄在上海妇女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率作用

史慰慈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广大的妇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为赢得民族解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宋庆龄始终以其睿智的思想，精辟的言论，大无畏的行动，为激励和鼓舞妇女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起到了强有力的表率作用。

妇女反帝斗争的旗手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妇女，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坚韧不拔、英勇善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妇女运动之决议案》中指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成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在党的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上海妇女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开展，她们以产业女工为主体，成为五卅反帝运动中新崛起的一支生力军。

在这场五卅反帝斗争中，宋庆龄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她犹如夜空中一颗闪耀的明星，成为妇女反帝斗争的旗手。

五卅运动的发生，正是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两个月。这场震撼人心、席卷全国的反帝斗争，使处于巨大悲痛中的宋庆龄，迅速地

痛苦中站起来，把民族与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定地投身于斗争的行列。她抱病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严正指出：“今日所急者不在扑灭此爱国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凡中国国民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宋庆龄以鲜明的观点，揭示了五卅运动的反帝性质，并要以此为契机，引导人民奋起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压迫。

宋庆龄还以她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依靠人民共同奋斗的路线：“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这一路线恰恰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五卅惨案发生当天，中共中央深夜即召开会议，确定了进一步的斗争策略，将运动扩大到各阶层，组成各阶级的联合阵线；号召全上海人民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屠杀；组成行动委员会来领导这次斗争。无疑，宋庆龄提出的这条斗争的路线，不仅与当时提倡“依靠政府交涉”，以扑灭人民反帝运动的舆论针锋相对；更是对贯彻中共对五卅运动的斗争策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五卅反帝斗争，是宋庆龄自孙中山逝世后，为捍卫先生的革命主张而进行的第一次独立的战斗，她一开始就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一起。

为了团结各界妇女投入反帝斗争，同年6月3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6月5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在中共“三大”通过的由向警予起草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即提出了“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的口号及进行联合的方式。这次行动正是在党直接领导下实现的，参加成立大会的有20多个团体及学校代表80多人。宋庆龄亲临出席了这次成立大会，给与会妇女代表以极大的鼓舞。会上，钟复光致开会词，向警予宣读《对外人惨杀同胞宣言》，提出撤退外国武装，释放被捕群众，惩凶道歉等12

条要求，得到一致通过。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成为女界援助五卅惨案的总指挥部，她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妇女界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

宋庆龄作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在五卅反帝运动中，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发挥出了她的独特的作用。为唤起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她委托国民党左派杨杏佛在上海创办《民族日报》；她组织国民党左派向国内外募捐，援助失业工人，还在上海发起组织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并亲自前往大同大学，发表题为《近代之外交史》的长篇演说。

宋庆龄身体力行，她的大无畏的精神，给上海妇女以莫大的启迪和鼓舞，为妇女投身反帝斗争树立了榜样。

“一位敢死之救国女杰”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2年1月28日再次侵犯上海。驻守在沪的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由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奋起迎敌，爆发了英勇的淞沪抗战。

战幕拉开，上海各界妇女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支前的战斗中去。

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实现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号召，日商纱厂的千百万女工首先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她们自动宣告停工，议决：日兵一日不撤退，工人则决不进厂复工，女工们还编印《反日妇女》三日刊，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对抗日战争的压迫；有的女工自动组织起来，冒着枪林弹雨奔赴火线抢救伤员。

上海各界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团结全市妇女彻底反日，促进民族解放为宗旨，组成了中国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她们发出了《为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告劳动妇女书》，号召劳动妇女奋起斗争，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组织宣传队，分赴街头、工厂作罢市、罢工共同御侮的宣传；组织慰劳救护队，许多女医务人员纷

纷奔赴前线，参加抢救护理工作，她们表示：“战争会有牺牲，但只要为了救国，一切都愿献出，包括生命。”

中国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成为淞沪抗战中一支有力的妇女大军。

在淞沪抗战的日日夜夜里，宋庆龄与上海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支援 19 路军，奉献了全部精力。

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宋庆龄显示了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者的赤子之心。战事一发生，她就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对于抗日战争，当然主张积极抵抗到底”、“不使我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这掷地有声之言，正是千百万人民的共同心声，也是对南京国民党当局破坏 19 路军抗战的谴责。

宋庆龄和她的亲密战友何香凝怀着满腔热血，顶风冒雪亲赴真如慰问 19 路军将士。宋庆龄高度赞扬将士们英勇抗日的精神，她说：“19 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宋庆龄对将士们的无比敬爱，恰恰表达了她对维护民族尊严的忠诚感情。

在前线慰问中，她们目睹了由于国民党拒增军饷物资，战士们只穿着单夹军衣战斗在隆冬刺骨的风雪中，许多为国负伤的战士急待抢救治疗，而医疗设备及药品都严重缺乏。这情景使宋庆龄感慨万千，忧心如焚。她们回到上海，立即发动了募捐活动，并致电海内外，呼吁各界爱国民众和海外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还成立“妇女界捐助军用服装会”，妇女们通宵达旦赶制御寒棉衣，5 天内，数万件绣有红色“胜”字的丝棉背心 and 3 万套棉衣，送到了抗日将士的手中。

在淞沪抗战惊天动地的 33 天里，宋庆龄用她激昂的言词，勇敢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广大妇女群众，使她们相信中国人民是有

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也使她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是一个投降卖国的反动统治集团。她们将继续紧密地团结起来，投入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斗争。

一位在淞沪抗战期间采访过宋庆龄的美国记者曾经写道：“孙先生之宋夫人，德才如玉，刚强正直，爱国义勇，不畏强暴，……她是一位敢死之救国女杰”。宋庆龄是当之无愧的。

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宣传群众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任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宣言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海妇女在《八一宣言》的指引下纷纷行动起来。文化界的青年妇女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领导下，于1935年秋冬创建了青年妇女俱乐部；在女教师中，由女共产党员冯光灌出面，成立了女教师会；家庭知识妇女们由杜君慧、徐镜平领导成立了“蜜蜂社”；广大女工的教育工作，则通过工人夜校，以及基督教女青年会所属的女工夜校开展。这多种妇女组织，经常举行报告会、读书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使妇女接受进步思想，提高她们的觉悟，逐步培养成妇女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1935年12月21日，在原有小型妇女群众组织的基础上，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又称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率先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它的成立及其以后的活动，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妇女运动的新高涨。

妇救会成立大会是在四川路青年会召开，1000多名妇女济济一堂。史良在讲话中指出：“今天我们上海各妇女团体和各妇女个人，在此总集合，就是我们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接着何香凝讲

话，她号召上海妇女要敢于武装起来与入侵的帝国主义抗争。大会结束后，即上街示威游行。妇女们手挽着手，浩浩荡荡地通过南京路，她们喊出：“欢迎民众参加我们的队伍”的口号，于是成千上万的群众跟着大队一起行进。声势浩大的妇女示威大游行，在民众中引得广泛的同情与共鸣，打响了妇女抗日救亡的第一炮。

1936年5月30日，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的成立，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现全面抗战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会上，宋庆龄当选为执行委员，她义不容辞地挑起了这副光荣的重担，率领群众站在抗日行列之首。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宋庆龄重视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她把自己的观点、思想和理论，通过舆论透彻明白地向海内外广为传播、广为宣传，使之化为大众的共识，这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7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1月26日，宋庆龄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向报界发表严正声明，尖锐地指出：“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所致。”她强烈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下的。请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他们虽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被捕，但还有全国四万万人民在咧！”声明见报后，各界奔走相告，争相阅读。一时全国各地声援要求释放“七君子”的电文，如同雪片一样飞来。“七君子”事件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世界性的和平组织和国际名流纷纷声援。

宋庆龄的一则声明，将“七君子”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世，给国民党蒋介石营垒以强大的反击。

1937年4月4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对“沈案”提出公诉，

为配合法庭上的斗争，救国会由宋庆龄公开出面发动了一场“救国入狱运动”。

在这场永载史册的“救国入狱运动”中，宋庆龄以其智勇双全、一身正气的光辉形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1937年7月出版的《妇女生活》上，刊登的由作者胡子婴所写《赴苏投案始末记》一文，详情地描述了宋庆龄在与苏州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官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文中有这一段叙述，大意是：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官，对宋庆龄一行迟迟不敢出来接见。“他们一天不出来，我们等一天，两天不出来，我们等二天，”孙夫人的怒火终于冲出她的喉头。之后，由一名书记官、一名检察官出来应付。“我们要见院长与首席，不然我们不说话！”孙夫人先开口，接着大家一齐站起来“不开口”，这雷鸣般的声音，把这两人给镇住了，他们只得默然退出。……一位夏姓的检察官又来了，孙夫人第一个开口：“我是救国会发起人兼全教会执委，我与他们七位在工作上做同样的事情，在法律上也愿意负同样责任，请你把我收押起来，与他们七位一样的受不自由的处分。”检察官无言对答，……

这篇生动的报道发表后，在广大妇女读者中引起巨大的反响。

宋庆龄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领导这场斗争中，运用舆论充分显示了她的斗争的坚定性和灵活性，可称得是她革命生涯中光辉的一笔。

宋庆龄永远活在上海妇女的心中

八一三抗战爆发，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了《妇女工作大纲》，提出这一时期的妇女工作以“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并特别注意发动与组织劳动妇女，为我党妇女工作的路线。”总的目标是“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

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上海的妇女工作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开展的。

在上海各届妇女救国联合会的基础上，何香凝领导上海各界妇女于1937年7月22日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后易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上海分会）。何香凝任该会主席，宋庆龄被推选为理事。在慰劳分会的领导和发动下，在8—10这3个月中，上海各阶层妇女程度不同地发动起来了，她们竭尽全力支援前线抗日战争，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能上战场的去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出来作救护慰劳工作。所做的工作既轰轰烈烈，又深入艰苦，为淞沪抗战坚持3个月之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以后上海妇女在孤岛环境中始终如一地进行抗日活动打下基础。

1937年10月下旬，抗日战争的形势日益严峻，上海的形势更为紧张。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来电，为孙夫人的安全，请她撤离上海去香港。12月上旬，上海租界陷于日军包围之中，成为“孤岛”。中共中央再次来电催促宋庆龄赶快离开上海去香港。宋庆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于12月23日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的掩护下，安然登上开赴香港的巨轮，顺利到达香港，展开了她为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新的一页。

宋庆龄离开了上海，但她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在上海妇女的心目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的高瞻远瞩、博大精深的思想言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无畏行动，热情坦诚的情感风格，都成为上海妇女的表率。当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上海，在造就跨世纪妇女人才，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中，宋庆龄的光辉形象，仍是一面鲜亮的旗帜，引导着上海妇女奋勇前进。

宋庆龄永远活在上海妇女的心中。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滩杂志社）

宋庆龄与武汉抗战

毛 磊 宋月晖

有人认为“武汉抗战”就是武汉市的抗战；也有人认为“武汉抗战”就是武汉会战。这些观点都不尽准确。我们认为，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至1938年底这一段时间的全国抗日战争叫“武汉抗战”。“武汉抗战”在八年抗战中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或者说“武汉抗战时期”是八年抗战的一个“断代史”，这是以前史学界在研究抗日战争史过程中所没有明确提出的。我们把“武汉抗战”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不仅有充分的历史事实根据，而且也有着理论根据，这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武汉抗战”这个概念的论述。1937年11月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此时的形势是：“目前是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①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对整个抗战形势理解深刻、准确，多次提出了“武汉抗战”这个概念，并作出正式的文字上的表述。1938年10月，周恩来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中明确指出：“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②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把1927年称为“第一个武汉时期”，而把1938年称为“第二个武汉时期”。^③周恩来在这里已非常明确地提出武汉抗战是作为一个独立

“时期”载入抗战史册的。武汉抗战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处于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八年神圣抗战中的一个高潮。武汉抗战在中国革命史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都是与宋庆龄的英勇斗争分不开的。

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庆龄为了民族和革命的利益，为了配合共产党的积极的让步政策，把个人恩怨放在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一改大革命失败以来对国民党中央的抵制态度，第一次以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了1937年2月份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她在会上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十四位国民党中央委员，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合作一致抗日的建议，联名向大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提案指出：“在过去六个月中，我们得到中国共产党几封致本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和通电，请求国共再度合作，联合抵抗日本。”^④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宋庆龄还在会上作了题为《实行孙中山遗嘱》的演说，她强调：“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⑤在会上，宋庆龄与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针对汪精卫之流的反共叫嚣，她义正辞严地斥责道：“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看抗日吗？”经过宋庆龄等人的积极努力，终于迫使国民党三中全会接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宋庆龄内心无比激动，立即连续发表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两个“十月”》等文章，表达自己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由衷的高兴和愿望。十一月，她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要求国共两党“尽弃前嫌”，强调“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再次表明她积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

上海被日寇占领后，为了得到为全民族抗战服务的自由，宋庆龄拒绝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而是转移到香港。临行前，她发表了致国际人士的声明，控诉日本侵略军侵华和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呼吁世界各国“积极拥护中国的抗日斗争。”明确指出：“在今天来帮助我们抗日，维持世界和平，用抵制、制裁与封锁等办法来惩罚法西斯侵略者——这便是避免明天世界大战。”^⑥

1938年3月底到4月初，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某些进步却又很不彻底的矛盾状态。总的指导思想，仍是坚持独裁统治，只是在日本侵略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在形式上对人民作了某些让步。宋庆龄当时在香港，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密切注视大会的进行。她在4月14日，与何香凝联合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一文，充分肯定了临时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救国方针，并且中肯地指出：它“能否最后完成任务与达到最终之目的，不在空言，而在力行；不仅号召，而重实现，希望全党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致努力为建国纲领奋斗到底！”^⑦这是宋庆龄与何香凝在抗战爆发后第一次发表的全面的政治主张，体现了充分发动民众，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

1938年6月，正当武汉保卫战处于高潮之际，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1945年后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解放后又改为“中国福利会”），由她亲自担任主席，委员有廖承志、克拉克、法朗士、邓文钊、爱泼斯坦等。《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明确声明：“‘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⑧

根据这样的目标，宋庆龄领导“保盟”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向全世界宣传抗日，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

迹；坚持不懈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破坏国共合作、限制人民起来抗日的政策。她还以她崇高的国际威望和各国人士对她的景仰，想尽一切办法，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人士和海外侨胞进行募捐，当时人们希望在捐款的收条上得到她的亲笔签名，她曾为此磨破了手指；又想尽办法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把募集来的大量款项、药品、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罐头食品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解放区。著名的白求恩、柯棣华等外国大夫所组织的医疗队，都是通过宋庆龄的介绍到武汉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在周恩来等的直接关心下最后送往解放区工作的。白求恩所建立的闻名全国的国际和平医院，就是这些医疗队工作成就的一个表现。

1938年7月5日，正值日军由长江南北进攻武汉之际，宋庆龄发表了《抗战的一周年》一文。在文中她“首先向阵亡诸将士及死难同胞致以哀悼的敬礼！”^⑧称赞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儿女。同时指出：“伟大的一年来的奋斗与牺牲，不过是争取我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开始，最后胜利的获取，还需要同志们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努力前进！”^⑨当时国内一些怯于对外、勇于对内的政治家大唱失败主义，甚至从汉口用电报撰文主开和议刊载上海《文汇报》。宋庆龄非常愤慨，她义正辞严地指出：“明知今日全国将士，全国同胞，个个抱有‘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抗战决心，此项阴谋妥协之幻想，无从实现，而人有斯人斯事者，实因我抗战的政治动员，不能与抗战军事动员并驾齐驱。”^⑩并且号召要实现抗战的全盘政治动员，“要斩断敌寇侵略的另一只魔手——政治诱和的阴谋。”^⑪

日军拼命进攻武汉的同时，又抽调一部分兵力进攻广州，以便切断中国的海上对外联系。宋庆龄当时积极地在广州的外国侨民中活动，争取他们对保卫广州、武汉和中国抗战的援助，批评英、美国家执行的虚伪的“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当时英国新闻界多次发表宋庆龄致英国政府和团体的函电，在英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

反响。他们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宋庆龄还致电美国总工会，呼吁美国工人抵制把军火运往日本。1937年10月20日，她在上海美商广播电台，向美国人民发表了著名的英文演讲《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明确指出：日本对华的侵略，“也包含着对于美国本身的威胁”；她大声疾呼：“趁残酷的火焰未燃烧到全世界各国之前，将它扑灭”。^⑨宋庆龄的这些呼吁，在英美国家人民中反应强烈，英美两国反法西斯民主运动高潮，客观上支援了当时中国的抗战。

不仅如此，当时由斯诺、艾黎所发起的，在中国组织工业合作社来支持抗日战争的运动，也得到宋庆龄有力的支持，她不仅亲自安排艾黎等来往于武汉与香港之间，而且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直到香港沦陷为止。当时，在宋庆龄的大力号召和影响下，华侨在国外各地组织救国救民的团体，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大量财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1938年8月16日至23日，世界青年大会在纽约举行。24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宋庆龄向大会播音演讲词，她表明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严厉谴责了英、美帝国主义国家打着中立的伪善招牌，供给日本侵略者军火、钢铁、石油、技术、军车、坦克、飞机零件屠杀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希望美国青年积极行动起来，支持中国抗日，支持中国开展的工业合作社运动。

在武汉抗战期间，宋庆龄也非常重视妇女工作。1938年的“三八”节，她在香港发表《向世界妇女申诉》的论文，控诉日本法西斯以奴隶看待妇女的罪行，号召世界妇女援助中国。7月，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宋庆龄为它的成立和发展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发展非常迅速，正如宋庆龄指出的，这是因为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建立起来的“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共产党和无党派的妇女站在平等的地位，参加会议讨论。”尽管妇女指导委员会中的成员政治主张不尽相同，但在宋

庆龄、邓颖超等影响、支持和推动下，它促进了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妇女进行友好合作，在武汉抗战中起了它应起的作用。8月，中共中央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派邓颖超为代表，到香港会见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代表。在宋庆龄的特别关怀下，邓颖超在广州顺利地开展了工作。

在抗战的中心武汉，宋庆龄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崇敬。她的文章、讲话都经常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时，她被选入大会名誉主席团，并派选出席参加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武汉抗战期间，宋庆龄身虽不在武汉，但她一再督促国民党局在实际行动上而不只在口头上贯彻总理遗志。1938年10月27日，当广州不守、武汉失陷之时，宋庆龄又与何香凝等联合致电国民党中央，公开斥责汪精卫妥协和平的言论，并要求国民党中央立即施行四项方针：（一）加强中枢政治机构，（二）遵守总理所定外交政策，（三）发动全国民众力量，（四）迅速启用知兵宿将，保卫广东。

（作者工作单位：中南财经大学，湖北省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政教部）

注释：

- (1)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388页。
- (2) 《周恩来政论选》(上)第223—227页。
- (3)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2页。
- (4) 《双清文集》下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5) 《宋庆龄选集》第101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 (6) 《救国时报》1938年1月10日。
- (7) 《新华日报》民国廿七(1938)年4月17日。
- (8)(9)(10)(11)(12) 《宋庆龄选集》上卷,1992年10月第1版。
- (13) 《申报》,1937年10月21日。

宋庆龄与香港一碗饭运动

刘家来

宋庆龄在1941年7月1日香港一碗饭运动开幕式的讲话中，对一碗饭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也阐明了它的深刻意义：“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都是很值得赞扬的。”“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她还指出：“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战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①由于宋庆龄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她的倡导和组织下，香港一碗饭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又别具特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也显示了香港同胞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一碗饭运动最早是由美国医药援华会和在美国的中国难民紧急赈济会、妇女赈济中国难民会、工界赈济中国难民会等团体于1938年在美国发起的，当年即获得捐款20万美金。1939—1940年举行第二届，运动扩展到美国40余州，大小城市200余处。1940—1941年又举行第三届，3届共获捐款60万美金。一碗饭运动不但遍及美国全国各州，连西北部边陲的阿拉斯加地区和檀香山均纷纷响应。

据美国医药援华会负责人施蒂芬说：发起者所以要取名“一碗饭运动”，首先是取自中国西汉“漂母助韩信”的故事，藉以表示美国助华为一种“纯挚之同情心”。曾帮助汉王刘邦建功立业，后来得到汉王拜将封侯礼遇的淮阴人韩信，青年时代却十分穷困潦倒，他常到淮水钓鱼卖几个钱糊口，有时钓不到鱼就只好饿肚子。当时在淮水边浣纱的一个老太婆，看见韩信饿得可怜，就把自己带来的饭分一碗给韩信吃，韩信非常感激，说：“我将来一定报答你”，老太婆反而生气地说：“谁要你报答！”后来韩信拜将封侯，扬名天下，就给历史留下了“漂母助韩信”的动人故事。施蒂芬说：“发起一碗饭运动表明美国民众助华，既非如市侩之流，专以利益交换为前提，亦无炫示富贵之心理，而使受者有耿耿不安之感焉。”其次，“中国人民以饭为生，取接济米饭，普渡众生之意，所谓‘一碗饭’者，即助华运动之象征耳”。再者，人天天要吃饭，“每饭不忘”，“亦为表示助华运动非五分钟之热潮，将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素以面包为主食的美国人‘一碗饭’足以引起好奇心理，‘故具有不可思议之吸引力量。”

由于发起者对一碗饭运动的良好意愿并广为宣传，获得了各阶层人士广泛响应，广大华侨更踊跃参加。旧金山华侨为开展一碗饭运动，在街上搭起了大型彩牌，并举行了化装游行，不少侨胞扮着难民，各执空碗一个，喊着“多买一碗饭，多救一条命”的口号穿过三藩市(旧金山)的大街，“情景至为动人”，旧金山唐人街更是“万人空巷”，表达了广大侨胞心怀祖国，热心救亡的赤子之心。如此动人情景亦出现在纽约的唐人街。

“一碗饭运动”唤起了无数的美国人民救助苦难的中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的热情。“一碗饭运动”当时被誉为“中美打不破之链锁”，这个运动种下了中美人民“根深蒂固之笃谊之情”，一碗饭运动“势必成为(美国)对华亲善之特殊运动”，成为“中美亲善之象征”。因此，发起者预言“一碗饭”3字，或将为所有对华亲善之国

家，一律仿效而采用之。

事实正是这样，一碗饭运动后来扩展到英国、加拿大、南美洲等许多国家。

二

当时担任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和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孙夫人看到一碗饭运动在美、英推行以后成绩斐然，意义深远，影响巨大。感到在香港发起这个运动对激发香港 150 万同胞的爱国救亡热情，募集救灾救难的经费具有重要意义。她在香港一碗饭运动开幕式的讲话中曾强调指出：“今晚在这一百五十余万华侨最多的香港首次举行，并承各友邦同情的友人们都来参加，这是何等有意义！”^⑤在宋庆龄的倡议下，成立了香港一碗饭运动委员会，由她担任该会名誉主席，自从她发出开展这个运动的呼吁后，香港各界山鸣谷应。早在 1941 年 5 月 9 日就成立了由各界人士组成的特种委员会，提出发售餐券，由各餐馆承包以开展一碗饭运动的方案，开始商联会曾以香港的环境关系难以开展这个运动为由，曾否决举行这一运动，但香港总商会郭泉非常支持孙夫人的倡议，他联合了许多茶居饮食业的同人积极支持这一有意义的爱国运动，他还亲自担任了一碗饭运动特种委员会的主席，并且“为协助中国保卫大同盟会会长国母孙夫人之一碗饭运动筹款恤难义举”，郭泉领导的华商总会还组织了“小组委员会，专责办理此事并去函酒楼室主五行商会请予报效炒饭一万碗，共襄义举。”^⑥

接着香港文艺界进步人士夏衍、于伶等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号召，纷纷撰文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碗饭运动。由保盟资助创办的香港《华商报》，为一碗饭运动提供宣传阵地，有时，一天刊登多篇宣传一碗饭运动的文章，并为这个运动出版特辑。很多文章情文并茂，或情词恳切，或慷慨激越，富有感染力，扣人心弦。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在文章中说：“假使你不是不关心国家的兴废，民族的存亡。……

你就应该同情这一运动，帮助这一运动。”著名剧作家于伶热情地呼吁：“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饭的人，多购买‘一碗饭运动券’，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饭的人，无力购买一碗饭运动券，也能了解‘一碗饭’运动的意义。”著名演员王莹更富有鼓动性地说：“希望每一个海外同胞都参加孙夫人领导下的一碗饭运动，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荣誉。”

不但中国人，还有不少外国热心人士也为一碗饭运动进行宣传。克拉克夫人曾在香港《华商报》的“一碗饭运动特辑”中写了这样的题词：“买一张一碗饭运动的饭券不仅是做一件慈善的事，还可以使中国的难民有工作能生活/帮助他们吧，使他们以合作来自助。”詹姆斯·贝特兰写下了这样富有感染力的题词：“你，中国的朋友，在香港的饭店里买一碗炒饭，那黄河边上千千万万无家可归的人民就可以一起工作，过着快乐的生活。”

当时宣传一碗饭运动的一个有力的形式是在香港中央戏院公开放演一碗运动的记录电影，把欧美等国掀起一碗饭运动的真实情景，“千百万侨胞精诚团结洋溢爱祖国的热情”，“中美两国人民亲善合作结成反侵略阵线”的动人镜头呈现给广大观众。中央戏院在香港的《星岛日报》刊登的大幅广告说：凡是爱国同胞都应参加“一碗饭运动”，凡是爱国同胞都应来看“一碗饭运动”。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老外交家颜惠庆、旧金山市长罗司先生以及美国爱国华侨领袖邝炳舜先生都参加了影片首映的揭幕式。

开展一碗饭运动之初，五行商会原提出每碗饭须收回成本两毫，但由于香港总商会积极响应这一运动，而“各热心茶楼餐馆主人多以事属爱国义举”，因此不但不收回成本，且竞相提高报效的碗数，龙泉茶室司理劳源自动捐出炒饭二千碗，且致函香港华商总会，这封信很可以代表当时的一般茶楼餐室的老板和同人的爱国热情，不妨摘录如下：

“华南总会响应一碗饭运动筹备小组委员会列位先生公鉴：经起者，贵会响应孙夫人提倡一碗饭运动事，救国热诚，至堪钦佩，国家多难之秋，凡属华胄，均应同负其责，尤贵万众一心，群策群力，方能救亡扶危，达到最后胜利。……际兹贵会此次义举，尤与敝行有密切关系，敢竭棉力，聊尽报国之心，用特捐出爱国饭二千碗，献捐贵会，共襄义举”。

有的餐馆老板还将响应一碗饭运动的宣言张贴门口以表达参加救亡运动之热诚，水坑口的汉商酒家门口张贴的大幅宣言说：

“孙夫人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近倡一碗饭运动，援助我国救济难民事原起于美洲，中外人士热烈襄行，我为世界和平及求本民族生存而抗战，由此可见友邦对我极表同情，身为中国人，安忍旁置，保卫中国大同盟倡兹义举，吾人函当拥护，小号同人虽身处异域，然心在国家，过去举办献金捐车等救济工作，莫不竭诚参加，兹逢义举，又岂容辞，爰集东家工友，节食节衣，勉捐炒饭千碗，依照大会定期举行，窃念车薪杯水，未敢云动，亦稍竭绵力而已，惟饭券推销，尤有待于热心侨胞之输将，方克有成，伏祈爱国同胞，共鉴血诚，鼎力相助，最后胜利，实行赖之，谨此宣言”。

三

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香港一碗饭运动举行了正式的开幕式。

1941年7月1日，香港湾仔著名的英京酒家，宾客如云。在英京酒家的宴会厅里，香港各界名流荟萃一堂，当时正值盛夏，虽然顶上的吊扇和在当时算得上是豪华的落地电扇转个不停，但由于来宾很多，仍然暑气蒸人。尽管大家挥汗如雨，苦热难当，但气氛活跃，情绪热烈。

首先致词的是穿着浅色短袖旗袍的孙夫人宋庆龄。虽然，今天外国来宾很多，但孙夫人并不像通常那样用英文发表演讲，而是操

着浓重的上海口音具体阐明了开展一碗饭运动的重大意义。

保盟的名誉书记、香港医药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克拉克女士站起来讲话，她发出了诚挚热情的呼吁：“国际人士对中国的援助很热烈，中国人对中国的事业应该更关心，更积极的赞助一碗饭运动。我们设想一下，能让中国同胞百分之四十死于饥寒交迫之下吗？伸出诸位底仁慈的手腕吧！去援助水深火热的人们！”

香港总督罗富国原要出席今天盛会的，但因故不能出席，却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孙夫人宋庆龄和司徒永觉夫人：“此次君等发起一碗饭运动，并设宴款待各界人士，藉以推广宣传，鄙人卒不获躬兴盛会，至深抱歉，然承不弃，以赞助人一席相界，荷宠之余，则以与人为善之心，稍得见抒，又颇自介慰。鄙人深信此运动在香港将如在英美一样成功，蓄其目的在援拯侵略主义下之被牺牲者，而此救死扶伤之义，凡属血气之伦，均应引为己任。”信中还说：“抑当中帼之士，挺身为穷苦被压迫人们奋斗，其感人之深，与赴义之诚，殆无出二君右者，二君既问肩艰巨，作此运动之领导，吾人正应为深庆得人耳，谨祝前途无量成功。”^④当香港立法局华人首席议员罗文锦大律师宣读完这封信时，大厅响起的热烈掌声使英京酒家下面站在庄士敦道上驻足围观的数百民众不约而同地仰视3楼灯火通明的会议大厅。

出席当天盛会的有驻港英军陆军总司令贾乃锡中将、海军总司令景连臣、香港医药总监司徒永觉夫妇、辅仁司史美夫人和部分立法局议员。出席盛会的还有中国工合技术顾问路易·艾黎，香港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中国红十字会总队长林可胜、华商总会主席郭泉、孙中山生前副官马坤、香港各妇女团体、救亡团体的代表等共150余人。

这次盛会为当时轰动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拉开了帷幕。

香港很多餐室酒楼为了响应孙夫人宋庆龄倡导的一碗饭运动，竞相认捐炒饭，在餐室茶居业形成一个爱国的热潮，位于上环

水坑口 21 号的乐仙酒家原捐出爱国饭 1000 碗，该号司理庞永棠复以个人名义慨捐 2000 碗，使该酒家认捐达 3000 碗。除前面提到的龙泉、汉商酒家外，还有英京、广州、天燕、小祇园、金星、金门、南京、北极、怡安等酒家茶室都纷纷踊跃捐献，不少社会团体如华商会、妇女慰劳会、中国青年救护团、岭南同学会、港九居民联合会等均纷纷响应宋庆龄和“保盟”的号召为一碗饭运动推销餐券，还有不少个人如郑铁如、罗文锦、唐谭美、高福申等也为一碗饭运动捐款。有的工厂的工友还捐助出薪金以资助一碗饭运动，如深水埗的阮氏内衣厂由于厂主阮硕夫向工友热烈宣传，该厂工友乃自愿将 15 天的薪水抽出一成捐给一碗饭运动。

8 月 1 日，是群众性的一碗饭运动正式开展的第一天，当天一清早刚刚出版的《华商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孙夫人宋庆龄为开展一碗饭运动所作的亲笔题词“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分外令人注目。本来很繁荣的香港街头，今天显得格外热闹，车水马龙，人潮如涌。

突然乐声大作，人声鼎沸，只见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大碗的模型，喊着“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等口号，穿过上环、中环、铜锣湾、湾仔等闹市区，引来了许多行人驻足观看，很多公共汽车、电车上、张贴着“大家来吃爱国饭”，“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的标语、口号穿过市区，使本来就已深入人心的一碗饭运动更显得声势赫赫。

很多承担捐助炒饭的酒家餐室把厅堂门面布置得新颖别致，有的在餐室门口挂出“爱国之门”“光荣之门”的横额，有的餐室张贴着“欢迎来吃爱国饭”、“欢迎来吃救灾饭”的巨额标语；有的在店堂里张贴爱国宣传画；有的还展出了抗日将士英勇杀敌、工合社员努力生产的图片等。乐仙酒家更以捐款达 100 元以上者，则用该店珍藏多年的大红古碗盛饭款待，该店还卖巨型爱国饭：碗内有白米一斤，鲜虾肉四两、鸡肉四两、叉烧四两、鸡蛋六个，售价港币 100

元,吸引了不少人慷慨解囊,还出现了不少家庭举家扶老携幼去餐室吃“爱国饭”,“救灾饭”的动人情景。

原定各餐馆售卖炒饭时间为3天,但很多没有吃上一碗饭的港九同胞,为了表达自己爱国救难的心意纷纷要求延长时间以便有机会去吃上一碗爱国饭,所以有的餐室延长到8月15日,少数延至30日。原来计划售出2元港币一张的餐券2万张,很快就超过了这个预定目标。

当时谈一碗饭成为香港的美谈,吃一碗饭运动成为香港的佳事。

9月1日下午5时,一碗饭运动在英京酒家举行结束、颁奖典礼。

孙夫人宋庆龄亲临主持,廖夫人何香凝、伍朝枢夫人何宝芳、印度妇女运动领袖卡玛拉黛维夫人和香港各界知名人士以及各酒家、团体的代表100余人出席了颁奖典礼。

廖夫人首先致词说:一碗饭运动在孙夫人、司徒永觉夫人、罗文锦先生的积极支持下,得到港督罗富国爵士的热烈赞助,和中外各界人士的积极帮忙,“在短促期间收到如此美满成绩,实令人万分感谢,惟我国抗战正酣,国内同胞蒙难尚多,敢望侨众再接再厉,加倍努力,由一碗饭运动进而感动全中国,进而感动全世界,相信团结抗战抵抗侵略必得成功,必获胜利。”

卡玛拉黛维夫人作了简短演说。她说:“中国的这次抗战,在近代历史上实在是一个奇迹,这战争的意义,不但是为着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同时亦是为着保卫全世界一切被侵略民族,反抗法西斯侵略阵线,中国反侵略的抗战必将胜利,而中国的胜利,亦即是全世界被侵略民族胜利的先声。”

接着,宋庆龄亲自向在这个运动中作出较大贡献的英京、乐仙等13家酒家餐室的代表颁赠了绣有由她亲笔书写的“爱国模范”4个字的红缎锦旗,并向英京酒家店主高福申、乐仙酒家司理庞永

棠、小祇园素食馆司理欧阳藻棠赠送了孙中山的遗墨“努力前进”，作为特别奖品，以表彰他们三人为一碗饭运动作出的贡献，当宋庆龄笑容可掬地亲自将奖旗、奖品一一颁给得奖者时，全场掌声雷动。

轰动香港的一碗饭运动圆满结束了，这场运动犹如一曲爱国救难的动人之歌，它激励了香港 150 万同胞的爱国热情，也表达了 150 万侨胞爱国救难赤诚。

孙夫人在这个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胸怀祖国、心悬人民的高尚情操，深入群众，事必躬亲的工作热情和实干精神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和赞扬。原计划发售餐券 1 万张，每张 2 港元，共计 2 万港元。最后纯收入达 22144 港元，国币 615 元。英国赈华会香港分会将款项凑足 2.5 万港元，全部捐赠给工合国际委员会作为救济基金。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部）

注释：

①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338—339 页。

③④ 香港 1947 年 7 月 2 日《星岛日报》。

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在抗日战争中的独特贡献

洪绳之 钱行健 吴让能

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是宋庆龄 1931 年从欧洲回国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并领导的许多团体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组织。从它的孕育、诞生以及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无不渗透着宋庆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显示着宋庆龄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人格力量。保盟的历史功绩,也就是宋庆龄在抗日战争中最具个性色彩的贡献的一部分。她亲自领导这个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会)长达 43 年之久,伴随她度过革命的后半生。宋庆龄对它也怀着一种特别的深厚感情。在保盟诞生 20 年之后,亦即在纪念它成立 20 周年的时候,宋庆龄写道:

中国福利会(保盟的后继组织——笔者)是在一个时代里诞生,而在另一个时代里成长的。我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垂死的痛苦中开始了工作,并曾用我们绵薄的微力来加速它的崩溃;我们看见了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和它初期的成长,并用我们的全力参加了它的建设。

从上述这段论述,结合保盟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宋庆龄就把“保卫中国”和缔造新的中国结合在一起,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结合在一起。保盟的诞生是宋庆龄对时代呼唤的回应,是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密切合作的光辉的革命实践。

本文拟通过对保盟的历史考察,对宋庆龄在我国抗日战争中独特贡献进行初步的探讨。

国际性的救援组织

1931年8月宋庆龄因母丧从欧洲返国,一个月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翌年初,又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我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坚定地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前列,同时,不顾个人安危,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迫害爱国志士及共产党人的反动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出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形势仍然十分险恶,特别是在上海沦为“孤岛”时期,面对着有危及生命之虞的复杂环境,宋庆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建议,于1937年底秘密来到香港。

当时,国际上美、英、法等国政府仍然对法西斯势力妥协,实行“绥靖”政策;国内抗日战争进入了持久的阶段;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敌后根据地,正面地迎击着日本侵略军,以粗劣的武器抵挡着强大的敌人,尤其在医药物资和器械上极其短缺,“需要帮助这个军队建立药品和器械库”。^①

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宋庆龄深知军队医疗工作在中国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她从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就派去的马海德医生给她的信中早就了解到: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那里除巫医和走方郎中以外,没有一所真正的医院!抗战伊始,宋庆龄又从林可胜医生和深入前线的外国记者如詹姆斯·贝特兰等人的报告中了解到:我国至少需要3万名合格的军医医官,而当时只有6千名;在西北战区只有60%的伤员能得到治疗,而在这些人中又会有70%的不能活过半年,连疟疾都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疫疾,在长江流域作战的一支部队,竟因疟疾致使战斗力被削弱了60%;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伤病员甚至需要毯子御寒!宋庆龄看到,中国迫切需要的

是先进的军队医疗机构、合格的医务人员和医疗、医药等物资，同样重要的便是在游击区维持小规模工业而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开展的工合运动。宋庆龄认为，这些经济和医药援助，对于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⑨

时代在呼唤，必须有一个政治态度鲜明但又不属于任何政党，能为战胜法西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而广泛团结海内外一切力量，冲破蒋介石政权设置的障碍，竭尽全力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救援机构。这个机构还必须特别熟悉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海外有关机构和个人）之间的桥梁。当然，这样的团体还需要有一个最恰当的领导入。

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在“反法西斯力量聚集和重新组合的时期”应时而生了，它建立在不受蒋介石政权控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是因为当时要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区开展这些工作是极端困难的”，保盟的工作使它必须具有开放和便于与世界联系的特征。因此除了选择一个最适当的地点外，还必须选择最合适的成员。宋庆龄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她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经历，特别是她在30年代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以及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定立场赢得世界性的声望，被誉为“中国的良心”。保盟是中国人领导的组织，其会员则是国际性的。保盟的中央委员会和支持者中绝大多数是国际友人。这些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人们，首先是通过宋庆龄，在她伟大人格和思想的影响下，正确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现实，进而看到了当时并不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却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和未来。这批人何止几十人，几百人，他们之中有新闻记者、传教士、医生、护士、社会活动家、军人和官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正义立场出发，进而投身到中国的抗日斗争，甚至为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宋庆龄以她的人格魅力——保卫和拯救祖国的爱国主义炽热感情，投

身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崇高国际主义精神——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无出其右的。

因此，在宋庆龄署名发表的保卫中国同盟宣言上，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它的目标：“一在现阶段的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保盟还欢迎各国的援华工作机构“在他们国家里改组成保盟支部或成为保盟的盟员”。保盟建立一年后就向世界宣告：它要帮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长期的医疗救济体系，同时和重建中国工业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密切协作。

“同志们，冲啊！有白求恩大夫在这里照顾伤员！”战士们发起冲锋时的呐喊声常常萦绕在宋庆龄的耳边。她完全同意叶挺将军的看法：军医工作做得好，胜利就有保证。

正是保盟这样一个国际性的救援组织，保证了它工作的效率和稳定，即使发生了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宋子文宣布退出保盟的严重事件，并没有对保盟造成组织上的危机。宋庆龄以她高度的政治敏感和特有的机智方式作出妥善处理，使保盟这一国际组织继续显示了它旺盛的生命力。

世界反法西斯的鲜明旗帜

保盟不是一个政治党派，但它的工作却有着鲜明的倾向性。“我们对于中国是有政治立场的，我们的立场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立场。”宋庆龄一直认为，中国从1931年九一八以后就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比西班牙共和政府受害还早。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的远东战线，中国抗击了日军绝大部分兵力，以巨大的牺牲牵制了日军，这就首先和最早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因此，“我们有权要求你们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助”，“帮助中国，也就是帮助你们自己”。从世界反法西斯的眼光注视中国的抗日战争，又以抗击日本侵略

者的实际行动来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这就是保盟开展工作的思想基础。如同保盟最重要的中央委员之一贝特兰所说，保盟像一个联络委员会，它把中国抗日的实情和需要介绍到海外，从而从海外得到相应的援助。宋庆龄如同一个“建筑师”，以大无畏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构筑了一座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中国的桥梁，包括各种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中外友人。不仅有罗斯福总统的母亲和夫人、英国工党领袖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夫妇以及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等，还有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卡尔逊上校。更有一批支援国际和平医院来华的医务人员，据统计，他们来自加、印、美、英、奥、德、东欧各国和新西兰、日本等10多个国家120多人。广泛的国际联系和真诚的支援，这条通道是由宋庆龄开辟和打通的。人们团结在宋庆龄的周围，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支持保盟的工作。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

宋庆龄向中国在海外的友人公开宣称，保盟的职能是纯救济性的，但不是中立的；它完全致力于救济工作，但是，救济工作有一定的目的。保盟希望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并仅就自己的范围之内，帮助打赢这场反法西斯的战争。当世界还没有完全加入这伟大斗争的时候，本同盟反对“中立”的救济观念。在整个反法西斯力量聚集和重新组合的时期，宋庆龄通过保盟一再向全世界宣告：“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救济。只有这样办，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并帮助你们自己。”^④宋庆龄按照这样的原则，理所当然地呼吁海外朋友大力支援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因而最缺少资金和医疗物资的游击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武装力量是打击日本侵略者、反对法西斯的中坚力量。宋庆龄领导保盟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地为那里的军民募集资金、医药、救济物资，在那些地方建立起长期的医疗救济体系，这个医疗体系的核心便是国际和平医院。它从最初的一所迅速发展为

分散在4个抗日根据地的4所中心医院以及附属于这些中心医院的医科学校、制药厂和设在延安的白求恩医学图书馆等。它还专门有一个保证支援的运输工作费用的计划。到1943年底,这些中心医院又都从各自的四周延伸到各自的前线,沿途设有救护站、野战医院和流动医疗队,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国游击战争的医疗网络。

这些既无现代化建筑又无漂亮设备的医院,被当时的专家们称赞为“世界上最不平常的医院”。这些医院拥有老红军的革命传统,白求恩、柯棣华的国际主义和反法西斯的战斗精神,以及他们培养出来的具有科学医疗知识和技术的白衣战士。这些医院是世界反法西斯组织——国际和平委员会于1938年先后在伦敦和巴黎召开世界代表大会上决定所产生的成果;当年,宋庆龄代表保盟同国际和平委员会派出的代表何登夫人经过研究后决定,把“国际和平医院”这个名称给予白求恩正在那里工作的五台山医院,并请他担任这个医院的院长。《保盟通讯》第2期在发布这个新闻时说:“这一做法是十分恰当的,游击战士在华北雪野用简陋武器战胜着日本皇军。他们确实称得上是为国际和平而战斗的先锋。”他们是远东反法西斯阵线上的勇士,面对野蛮凶残的日本法西斯只有仇恨和斗争而没有丝毫的畏惧!

1939年5月1日,宋庆龄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充满胜利信心和自豪地说:“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其中一个公开的战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人民正在英勇地和成功地同世界侵略集团成员之一的日本交战;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一样地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宋庆龄坚定无比地宣告:“中国人民绝不会投降。他们正在为自己也为世界各国人民而战斗着”。因此,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保盟有权要求你们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助。

宋庆龄领导保盟高举着这面反法西斯的伟大旗帜,从世界各

地募集了不少拯救战士和平民生命的药品，其中甚至有当时世界上刚刚生产出来的最有效的消炎药；募集了不少医疗器材、高效营养品、优质御寒物资以及不少资金；迎来了不少医生、护士、药剂师、化验师和其他技术人员，其中有来自日本、德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也有原为日本天皇效命而今觉醒过来的士兵和医务人员，更有如白求恩、柯棣华那样的白衣战士，有的在岗位上光荣殉职，有的把光辉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归根结蒂都是为了持久的国际和平。生命是无价的。大量药品和物资、钱财至今也无法统计出准确的数字。我们仅知，从1941—1946年8月底为止，美国援华会就向保盟提供了各项救济款项总数为：美元，1,588,286元；法币，439,386,188元。^④但是，这也仅能窥其一斑而已！

世界反法西斯的嘹亮号角

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中唯一健在的爱泼斯坦对保盟的作用作过这样的评述：

在物质方面，是收集医疗和其他必要的物资运往中国战时的医院、教育中心和保育院，特别是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教育方面，通过它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及其他出版物，保卫中国同盟使全世界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战胜敌人，使全世界认清中国人民的处境和他们斗争的重要性。

保盟独一无二的领导人和组织者宋庆龄始终如一地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开创性的工作。保盟和它的机关刊物《保盟通讯》在争取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好的号角作用。宋庆龄在德国纳粹掌权之前就已洞察了法西斯主义的危害，被世界进步人士誉为“超前的反法西斯行列”中的伟大战士，赢得了人们的崇敬。善于把中国的事情放在世界形势中来观察的宋庆龄，也早从蒋介石

的特务组织“蓝衣社”散发出来的气味中，辨别出它们同日本军国主义的组织、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具有同样的法西斯的腥臭。因此，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人民要求以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例，一致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却利用在“蓝衣社”等特务组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秘密警察，用法西斯的手段，镇压和杀害所有同情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老百姓；同时又对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地区严密封锁。宋庆龄毅然领导保盟，通过《保盟通讯》把中国人民在法西斯阴影下的危险处境和他们的英勇斗争传播给全世界同情中国、支持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人们。它向全世界全面、真实、准确地宣传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和建设民主自由新中国的理想。它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在蒋介石“花费大量金钱来涂抹一张抗战的画皮”的年代里，《保盟通讯》宛如一颗晨星，向全世界披露和介绍了敌后战场上军民团结、开展生产运动和英勇抗击日寇的真实情况。如果说，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次向全世界反映了被围困在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的话，那么，《保盟通讯》和其他出版物是宋庆龄在关键的时刻，让世界人民及时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军民赤诚的爱国主义以及在残暴的日寇的疯狂兽性面前砥柱中流的坚强的民族精神。“对于世界上真正想了解中国的斗争的人们来说，这些出版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贯串在保盟宣传工作的灵魂是真实性和战斗性。几乎每一期《保盟通讯》都有“战地报告”，这些报告的大多数作者是国际友人，无一例外地绘述了作者目睹耳闻的亲身经历，这里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沸腾的斗争实录；摒弃了任何繁文褥节和八股腔调，提出的是急需援助的项目或物品清单。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公正立场和正义情感，因此它具有巨大的思想震撼力和现实的功能作用；在弗莱茨·詹森所写的《湖南的伤兵运关情况》中，描写了一个农民出

身的战士何丰被日本军队打伤以后，由于战场上医生和药品的缺乏，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悲惨地死去时，留给读者的并不是颓唐和失去希望，而是激起人们对法西斯侵略的憎恨。连同《保盟通讯》的其他文章，今天读来，仍体现出凝重的历史感和新鲜的现实感。

毫无疑问，宋庆龄在保盟国际宣传工作中发挥着最重要的指导作用，她的坚定性和原则性是《保盟通讯》的政治基调，她提出的目标和任务突出了《保盟通讯》的战斗风格。她请宋美龄为《保盟通讯》写稿，同时也为宋子文退出保盟亲自撰写声明。既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进行不懈的努力，也对损害保盟破坏团结的行为进行原则性的斗争。

与此同时，宋庆龄总是不失时机地呼吁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们迅速团结起来共同战胜法西斯、像中国和西班牙人民那样起来抗争。1939年10月，她及时提醒人们注意：现在法西斯侵略的浪潮已经蔓延到了欧洲，同时又立即表明：在没有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回黄海彼岸之前，中国人民是不会放下武器的。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号召组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的前夕，宋庆龄在1941年12月9日香港的《南华早报》上呼吁：“……炸弹已经千真万确地掉下来了！我们所必须的是一条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把中国自身的斗争同英国、俄国和美国人民的一致努力联结起来，把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主义彻底粉碎。”当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失败已经在望的那些时刻，宋庆龄在1943年9月18日《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又叮嘱人们：“我们就更需要保持并加强用这样大代价换来的团结；我们就更需要保持并发扬民主；全世界人民就更需要孜孜不倦地为全世界一般人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努力。”在这封信中，宋庆龄在赞扬我国那些积极抗日的优秀战士同时，还抨击了国内那些“认为现在可以让别人去争取胜利”，而自己坐享其成的人，并且再一次呼吁取消国内

的政治、军事封锁，吁请大家不要对封锁默许。这些呼吁的目的，也都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时候，对于保卫中国同盟的历史作用和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应该也完全可以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是，如果没有宋庆龄，就不会诞生保盟。正如爱泼斯坦曾经在谈话中精辟地指出：宋庆龄就是保盟，而保盟也就是宋庆龄。因此，保盟是和宋庆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保盟的全部工作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保盟的工作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因此，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是和共产党的伟大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福利会)

注释：

- ① 《保盟通讯》第一期。
- ② 《永远和党在一起》第 48—4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③ 同上第 47 页。
- ④ 据中国福利会档案。

宋庆龄与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

尚明轩

宋庆龄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世界杰出的妇女运动的活动家和领袖。她从少女时代发表宣传男女平等思想的《现代中国妇女》一文之后，研究妇女问题和进行妇女运动，就成为她一生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毕生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并为之呕心沥血，为中国妇女运动史谱写出不朽的篇章。

本文仅就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对妇女运动的贡献及其特征略作述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了神圣的民族全面抗日战争。时在上海的宋庆龄，目睹自己与全国人民盼望多年的全国抗战局面终于出现，无比激动和兴奋，积极地投身于妇女抗日救亡斗争中。

面对日军入侵后民族危机上升成了主要矛盾，宋庆龄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发扬过去上海妇女界第一个成立救国会的爱国传统，与挚友何香凝一道倡议建立上海妇女界抗日团体，准备最大限度地团结妇女界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挽救国家的危亡。她俩经过广泛号召、联络和紧张的筹备，以原妇女救国运动领袖为核心，团结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夫人，以及各行各业的妇女界人物，于抗战爆发后仅半个月的7月22日就创建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简称后援会），该会明确规定“以号召妇女团体抗敌以

及战时负救护慰劳救济工作为宗旨”严正表示要发动妇女“和男同胞们共赴国难”，“一致起来抗战”。^①并制定《简章》、发表《宣言》，计划团结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妇女，共同为拯救祖国而斗争。宋庆龄亲任理事，还分电各省妇女界成立各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希望把全国各妇女团体的抗日救亡力量统一起来。

后援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妇女界抗日救亡运动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它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出的最早果实。宋庆龄在此树立了捐弃前嫌、共同抗日的榜样。

同年8月，由于出现南京成立了以宋美龄为主席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并要求各地组织分会的新情况，宋庆龄与何香凝为保持和扩大统一战线，以利于团结各界的妇女，和利于抗日救亡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经她俩提议和后援会理事会的决议，将后援会改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简称妇慰上海分会），从属于南京妇慰总会，并向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登记备案，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

在抗日救亡这一民族最高利益的大目标下，宋庆龄抛嫌释怨，以政治家的伟大气魄与宋霭龄、宋美龄从此结束因政见不同而长达12年之久的分道扬镳，走到一条路上来了。宋氏三姐妹的关系随即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她们于1940年春和1941年秋在香港公开露面参加抗战筹款会议，又一道飞重庆视察妇女儿童及战灾救护工作，密切携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相互配合，彼此支持，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庆龄和何香凝领导的妇慰上海分会，广泛地团结各界各派妇女参加救亡运动发展很快，到9月份历时仅一个多月，它下属的团体会员已有中华妇女互助会、中华职业妇女俱乐部、妇女运动促进会和妇女战地服务团等20多个，其中包括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方面的妇女团体，实际上成为当时上海妇女抗日救亡工作的总指挥部。各妇女团体还在浦东大厦设立联合办事处，以协调和加强彼此

间的联系,共同推动妇女救亡运动。她们积极从事创建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徐家汇等战地后方医院,抢救抗战伤员,还迅速举办妇女护士训练班,培训护理人员,并在两个月中就培训出2000名临时护士,先后分派到部队和后方医院服务。同时,大力开展募捐、慰问等工作,有力地支援了上海抗战。

尤为可贵的是,宋庆龄还在具体的实际活动方面为妇女运动做了许多工作。她不辞辛劳地挤出时间到处作抗日演讲,撰写救亡文章,口笔并用地呼吁妇女动员起来努力为抗战出钱出力,挽救民族的危亡。在一次给上海南洋女子中学的演讲中,宋庆龄慷慨激昂,热情洋溢,号召妇女们要爱国、爱人民、为祖国的抗战神圣大业贡献出一份力量。她那种坚毅的神情和爱国的热忱,深深地打动了广大师生的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她的鼓舞下,全校师生在校内外开展了为前线战士和难民同胞的募捐活动。短短几天中,在南洋女中校长所居住的西康路一带的居民,就赶做出1000多件丝棉背心,送往前线和有关救济单位。^②

为使妇女界的救亡运动和其他各界开展的救亡运动结合起来,宋庆龄和何香凝曾与文化界救亡团体等,联合举行纪念九一八6周年的宣传活动,并率先响应和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起的募集20万双手套支援抗日战士的义举。在上海各个救亡团体冒着风雨出动938个宣传队进行宣传活动中,妇女界就出动了600多人,组成100多个宣传队踊跃地加入到此一意义重大的行列里。^③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特别注意争取国际妇女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她经过多次与在沪的外国妇女联络,于同年10月间召开了中外妇女联合会议。美国妇女领袖史密司夫人、各国驻沪领事夫人等76人,与中国妇女界著名人士和代表1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以各国妇女代表和妇女团体的名义,致电国联妇女和平会会长丁曼,申诉为着正义人道,“吁请布鲁塞尔各国代表以切实的办

法,维持条约的尊严”,和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正义斗争。^④

抗战初期,宋庆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政治情操,运用个人的特殊地位,在上海极力推动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使之向纵深方面发展,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当时,出现了“许多妇女、工厂女工、交际妇女、女学生和女童子军,都并肩在火线上一起工作”的生动感人情景;妇女界确实总动员起来,真正做到了“千千万万妇女都出钱、出力或者既出钱又出力”。^⑤

二

在8年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随着战局的变化曾三度迁居,先居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移居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又迁至重庆。其中居住香港的4年,是她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活跃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宋庆龄往返奔走于香港、广州之间,与广东和国际上的各妇女团体建立密切联系,促进了全国各妇女团体的工作及它们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开辟了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在香港,宋庆龄利用该地的特殊政治环境,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呼吁国际援助中国抗战上,以便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一场战场广阔的较量。她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活动在外国朋友和香港各阶层人士之间,四处联络,各方协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以她任主席的沟通中国和世界各国联系,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终于在1938年6月成立。在保盟这一抗日爱国组织内,宋庆龄专门设立了一个妇女促进会的机构,负责联络国内和international的妇女团体,协助开展妇女抗日救亡运动。

妇女促进会,通过对华侨妇女和各国妇女援华团体的联系,取得了对中国妇女抗日运动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并先后取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母亲和夫人、菲律宾总督夫人等国际知名妇女在道义上物质上给予的援助。还有不少国际妇女直接参加保盟工作,如赛

尔文·克拉克夫人、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均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与此同时，宋庆龄大力号召和领导全国的妇女同胞，积极响应法、美两国中国之友会为帮助我国抗战所发起的义卖筹款活动，促使其获得圆满成功。

1938年7月，在宋庆龄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全国各党派的妇女团体代表在庐山召开会议。不同政治派别的妇女，集合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团聚一堂，认真总结、研讨了战时妇女合作抗日工作，及今后妇运的方向和中心任务，并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全国妇女的统一领导机构。该机构的工作，不仅包括援助孤儿和受伤的军民，并且包括进行文娱活动来慰劳前线军队，教育农村妇女，出版杂志，恢复和改良手工业方法和发展地方生产，以及训练这一切工作的干练的领袖与组织人员等。

宋庆龄赞扬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共产党和无党无派的妇女站在平等的地位参加会议的讨论。在出席庐山会议的代表当中，有许多内战时期被迫转入地下、遭到通缉的极能干的妇女，像邓颖超就是一个。”^⑤并明确认为，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各阶层各党派的妇女友好合作的基础”。^⑥

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各项工作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和发展，大大促进了全国妇女界各个团体间平等友好的合作，妇女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从而对全国的抗日救亡工作起到了很大的配合作用，促使运动开展得波澜壮阔。因此，1938年间既标志了中国民主团结军民抗战的高潮，同时，“这时期也标志了妇女运动的高潮”。^⑦

为了全面开展广东妇女救亡运动，宋庆龄经多方推动和联络，于同年9月在广州亲自召集广东女联会、省妇女抗敌会等10多个妇女团体，举行联合代表会议，成立了统一的广东妇女抗敌工作协

会。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从而促进了广东妇女团体的大联合,并为开拓广东妇女救亡运动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当1938年夏秋间华南局势危急时,宋庆龄密切注视着广州人民在危难中保卫祖国的战斗。她多次到广州视察女壮丁队和各种救护队的训练情况,慰问伤兵难民,领导救护战灾妇女儿童工作,并发表言论,鼓舞士气,激励各阶层妇女们“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与敌拼殊死战”。^⑧还曾亲自参加广州人民反对侵略的火炬游行,同浩浩荡荡的男女同胞队伍一道前进。^⑨“她的精神和人民大众的精神融成了一体。”^⑩在一次与各妇女团体的代表讨论征募寒衣办法时,她提出“一个广东妇女捐制一件寒衣”的号召,并以身作则自己捐出5000元作为购置寒衣的费用。^⑪积极开展为前方将士及后方难民征募寒衣的工作。她的号召得到了广东各界妇女的积极响应,迅即掀起捐制棉衣运动热潮,短期中就顺利完成捐制50万件棉衣的任务。^⑫这些活动,确是“给广州这个城市带来了坚决的意志,并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诚。”^⑬

港澳地区的妇女运动,通过宋庆龄的积极领导和促进,也掀起抗日救国热潮,出现了新的局面。由宋庆龄发起组织的香港中国妇女慰劳分会,1938年间一次就捐款29万元,并有大批的药品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⑭1939年三八节,港九地区的妇女及侨居港澳的妇女近万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纪念活动。宋庆龄分别参加了在香港利舞台和花园道举行的纪念大会和国际妇女节集会,并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呼吁所有的妇女,不论她是何种国籍,不论种族和阶级,都应该站在前列来反对侵略战争,继续支持中国的抗战,援助在敌后战场上英勇战斗的游击队。她还在会上表彰了在募捐活动中贡献出色的中国妇女慰劳会和香港中国妇女会等团体,赠送了“努力救国”的锦旗,以资鼓励。”^⑮在这一起着全港妇女总动员作用的活动之后,港澳地区各妇女团体的征募捐献、慰劳救护、义卖、救济灾民等工作进一步得到深入的开展。

1941年底宋庆龄移居重庆后的岁月里，虽然环境笼罩着令人窒息的阴霾的政治气氛，处身于险恶和复杂的逆境中，她仍然不遗余力地推动妇女运动工作。宋庆龄殷切地“希望全国姐妹更加努力，……都能起来做坚持抗战的工作”。^④当时，她在沉寂的山城深居简出，却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动向，并凭着她的大智大勇，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及各种有利条件，团结一批国内外朋友，继续推进保盟工作，与美国援华会、英国联合援华会等外国友好团体保持联系，争取国际社会援助；同时，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妇女们的争取民主权利和抗日救亡的斗争。例如，她在关键时刻发表重要讲演和文章，反对专制独裁，真正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以争取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多次举行影响颇大的救灾募捐活动，筹集救灾款项援助男女灾民等。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抗战时期宋庆龄对妇女运动的贡献是杰出而独特的。她为广泛发动我国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做了许多领导和组织工作，建树了光辉的业绩。正如当时一家有影响的报纸所赞誉，宋庆龄在整个抗战时期“始终坚决地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⑤其作用和影响不能低估，也是任何他人无法替代的。

三

考察抗战时期宋庆龄从事妇女运动的言行活动，可以清晰地看出，它显示着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结合。

妇女运动历来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若从民族观念而言，妇女运动又是民族解放的一部分。因此，只有阶级、民族的解放，妇女才能得到解放。宋庆龄深切理解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联系一起的道理。她视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是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一部分，

确认妇女解放只有在参加抗战的最后胜利中才能获得，大力倡导汇集妇女力量于民族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并坚定地在实践中付诸实行。

在抗战时期宋庆龄发表的关于妇女问题几篇专文里，一再阐明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关系，期盼妇女姐妹们把自身的解放与中国抗战结合起来。她说：“妇女解放和世界最大多数大众的解放有共同的命运，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现阶段的妇女解放和幸福，和中国、西班牙乃至一切被侵略民族的抗战的胜利，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⑨并明确指出：“没有中国全民族的解放，妇女的解放是谈不到的。”“所以妇女们应当怎样加倍努力，团结在一起，以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因而获得自己的解放。”^⑩

正是从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结合出发，宋庆龄以极大地热情引导妇女运动围绕着抗日战争向前推进。她呼吁全国妇女在拯救祖国危亡的紧急关头动员起来，帮助政府说服自己的丈夫、兄弟、儿子去服兵役，参加战地服务、后方生产，有钱者出钱购买公债，齐心协力进行保国卫士的战斗。并勸勉妇女们忘我地奋力救亡，以便“在将来抗战胜利的历史上替妇女争得极荣耀的一页。”^⑪

宋庆龄坚持妇女运动与革命运动相结合的观点，并非始于抗战时期。早在大革命时期，在她的重要著作《妇女应参加国民革命》和《妇女与革命》等文中，就透彻地阐述过妇女解放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即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并鼓励妇女不仅需要在小家庭中做一个“良母贤妻”，同时要在国家这个大家庭中做一个“良好的国民革命的妇女”^⑫。随着时迁岁转，她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到抗战时期是更加深刻，并且在实践中使两者相结合，把妇女运动同抗日救亡运动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这正是宋庆龄具有远见卓识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正是她的伟大之处。

其二，把妇女运动与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相联系。

宋庆龄主张发动全国人民群起抗战的路线，衷心拥护中共提

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殷切期望“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都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⑧她认为占全国人口半数的2万万妇女是抗日战争的一支庞大力量，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去，以充实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她积极动员各阶层妇女集会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并极力促进和维护妇女的统一和团结，以求开辟妇女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可是，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从1940年夏开始竟肆无忌惮地打击妇女进步力量，禁止妇女团体的救亡爱国活动，并唆使“妇女回到厨房去”腐朽滥调甚嚣尘上，许多部门还宣布不用女职员，妄图把妇女驱逐出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里，掀起了一股歧视妇女、破坏妇运的恶浪。

针对这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逆流，宋庆龄挺身而出，于1942年夏疾书《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旗帜鲜明地予以严加驳斥。她说：“一方面要求妇女有同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却不给她们以平等的权利。……这种观点既违背了孙中山的主张（他坚决主张人人都有责任积极参加并改进政府的工作），也违背了中国所艰苦赢得的整个进步趋向。”^⑨并通过大量史实，雄辩地论证妇女思想上解放与经济上、政治上的解放同样重要，坚决维护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正确路线，即广大妇女必须在革命斗争与生产斗争中，谋求自身的安全解放。宋庆龄激励全国妇女巩固已经取得的斗争成果，进一步在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新的斗争中争取得彻底解放。她一再强调中国需要反法西斯的团结和人民的民主，认为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日，没有民主也就没有团结。坚定且明确地提出，中国只有扩大民主，包括妇女的权利在内，最广泛地动员妇女的力量，组成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

其三，把妇女运动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联系。

抗日战争既是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庆龄认为，“抗日战争同时也是在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保存民主、争取妇女权利的战争。”^⑨因此，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是赢得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就是利用她特独的政治地位和国际上的崇高声望，为完成联络世界和争取国际援助的使命而设立的机构。她所从事的妇女运动，同样也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联系的。

宋庆龄认为，“反对战争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和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是一个不可分的斗争。”^⑩因此，她在开展的踏实有效的妇女运动实际工作里，处处关注到汇集妇女力量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潮之中，从而扩大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她的这一特征，在利用1938年三八节这一“纪念反压迫的国际妇女运动的伟大节日”所发表的文章中，显示得尤为突出。该文强烈谴责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强调现阶段妇女的解放和幸福，与中国、西班牙乃至一切被侵略民族抗战胜利“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她说：在“全世界笼罩在疯狂的侵略者的毒焰里面”情况下，“你们不要以为战争仅仅发生在世界上一个区域，昨天在西班牙，今天在中国，谁能保证明天这种死的恐怖不会降临到你们身上！”明确宣告：“我们为着全人类的理性和幸福而战，为着全女性的解放和自由而战。”^⑪她“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的名义”，呼吁全世界的妇女援助中国，并号召广大妇女“和全世界被侵略的千万大众站在一起”，反对侵略战争，打倒法西斯侵略者，争取世界和平和全女性的解放。

总之，抗战时期宋庆龄从事的妇女运动，有其鲜明的特征，和杰出而独特的成绩，是一份珍贵的妇运遗产。我们应该总结，也值得继承和发扬。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注释:

① 参见吴若安:《宋庆龄同志对教育妇幼工作的亲切关怀》1981年6月4日《文汇报》。

② 1937年11月7日上海《救亡日报》。

③ 《妇女生活》,第三卷四期,1937年11月。

④ 《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54—355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⑤⑦ 《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55页。

⑥ 同上,第359页。

⑧ 《孙夫人在广州》,《中山日报》1938年8月23日,另参见1938年8月26日《新华日报》。

⑨ 李洁之:《宋庆龄同志在广州的日子里》,1981年6月4日《广州日报》。

⑩ 爱泼斯坦:《我所了解的宋庆龄》,《人物》1980年第三期。

⑪ 1938年8月22日汉口《新华日报》。

⑫ 同上,1938年10月11日。

⑬ 爱泼斯坦:《回忆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工作》,中国福利会编《永远和党在一起》第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⑭ 《救亡日报》,1938年4月30日。

⑮ 参见《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5—270页。

⑯ 重庆1940年4月8日《新华日报》。

⑰ 同上,1940年4月3日。

⑱ 《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22页。

⑲ 《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57页。

⑳ 《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57—258页。

㉑ 《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9页。

㉒ 宋庆龄:《中国不亡论》,第43页。

㉓ 《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60页。

㉔ 《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9页。

㉕ 《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7页。

㉖ 《向全世界妇女申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21—222页。

高举民主 团结 抗战的旗帜

——宋庆龄在重庆

胡北洪

抗日战争中后期，宋庆龄曾两次来到重庆。

第一次是1940年3月31日至5月9日，宋庆龄与宋霭龄应宋美龄的邀请，并由宋美龄陪同，联袂自香港飞抵重庆。宋庆龄此行，主要是考察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抗战局势和妇女工作，并与亲属团聚。这次宋氏三姊妹共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成为团结抗战的象征，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特殊的政治影响。

宋庆龄第二次到重庆是1941年12月10日至1945年1月，宋庆龄在重庆整整生活、战斗了四年。这四年在宋庆龄伟大一生中是短暂的，但却是特别闪光的四年。本文拟对宋庆龄在重庆的这四年，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1941年12月7日，日军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香港很快被日军侵占。12月10日宋庆龄在香港机场落陷前数小时，仓促飞赴重庆。

当时在西方，德意法西斯称霸欧、非，英伦三岛变成孤岛，苏联大片土地也陷入德军之手。在东方，日本法西斯则横行于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日本舰队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耀武扬威，世界反法西斯战线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

在我国，日本一方面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另一方面强化了对国民党当局诱降。1941年初，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掀

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抗战到底的前途崩岌岌可危。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了揭露和痛斥。蒋介石对之是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宋庆龄来到重庆。蒋介石当时十分高兴：由于中国正式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战场，他自己就因此而登上了亚洲最高指挥官的宝座，可以坐待美国盟军的援助和战斗，自己则可不顾一切地沿着保存实力、封锁边区、压制民主、专制独裁的道路走下去。同时，蒋介石还因宋庆龄丧失了香港的活动基地，来到了他的权力统治中心而得意洋洋，满以为可以限制宋庆龄的活动直至迫使她完全就范。

宋庆龄抵渝之初，居无屋、出无车、通讯无自由、工作无人手，寄居宋霭龄家中，处境十分艰难。1942年4月18日周恩来在《关于对反共高潮的估计致毛泽东并中央电》中，列举了国民党反共举措109条，其中第58项便揭示了宋庆龄在重庆的艰难处境：“孙夫人住孔家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房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当群众会故意推孙夫人为主席团，但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1944年2月14日给美国国务院报告中，曾披露过宋庆龄的处境：“我应约拜访了孙夫人，同我前四、五次碰到她时的情况相比，她是更加直言不讳，而且显然是近乎怒不可遏了”。“美国一些救济团体邀请孙夫人访美，蒋介石不予批准。”“我不能不得出这种印象：孙夫人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她比以前更像一个囚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回忆说：“甚至她想离开重庆到中国别处去换换空气也不行，更不用说到国外去了。”实际上宋庆龄受到特务的经常监视，她的一举一动，都被列入每天要专送蒋介石过目的《情报辑要》。

但是国民党当局的冷遇、刁难和监视只能更加激起宋庆龄的斗志，升华她的才干智慧和斗争艺术。重庆的物质条件和政治自由远不如香港，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重庆所具有的优越性，却是香

港根本无法提供的。

在当年，重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高层人士，包括国民党内的元老和民主派力量，有社会各界民主进步知名人士，有各国驻华、来华高级军政官员、半官员人士、新闻记者和众多的国际友人，特别是还有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他们都渴望能与有国母之尊的“中国的良心”宋庆龄有所接近，宋庆龄也十分需要与这些人士有所交往。这就给宋庆龄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具有丰富内含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宋庆龄以她非凡的智慧、毅力和人格力量，在十分艰难、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抓住这些机遇，运用这些条件，不仅突破了蒋介石对她的刁难和限制，而且奠定了宋庆龄作为抗日民主运动领袖地位的坚实基础。在重庆的4年中，宋庆龄及时有力地抨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热情地支持群众性的民主进步活动，赢得了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更广泛的国际援助与支持，畅达了与中共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好地互相支持，并肩战斗，并通过以史迪威为代表的国际力量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人民力量建立了一条通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输送救济物资的可靠通道，为打破蒋介石的封锁，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宋庆龄真似敢于“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啊！

“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无论是香港时期、重庆时期和后来来到上海转变为中福会时期，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十分卓越的贡献。保盟是宋庆龄及其战友们用心血凝聚起来的中国革命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保盟不仅仅是个救济组织，实质上，它是一个强烈要求民主、

平等的政治组织，一个具有广泛性，特别是具有国际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也是一个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艰苦抗战真实情况的宣传组织。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和革命实践，许多都是通过保盟来实现的。

宋庆龄到重庆后，蒋介石企盼保盟从此烟消云散。但符合人民和时代需要的保盟，经过八个月的筹划，在中共南方局的协助下，终于在1942年8月重新组建起来。重新建立的保盟没有办公场所，只有在宋庆龄寓所里开会和工作。再加上蒋介石顽固派的干扰和阻挠，保盟的邮件发不出去，出版物没有地方承印，要保盟到国民党市政府去登记，要报告每笔募捐款的来源和用途。为了突破这些阻力和困难，正如爱泼斯坦所说，以她个人的独特地位和交往方式，努力在保盟及其周围，在中国内部和国外，建立了一条攻不破的统一战线。在保盟周围，国内有孙科、何香凝、冯玉祥、贺耀祖和夫人倪斐君以及茅盾等高层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在国外，有印度的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德国著名作家托玛斯·曼，在美国，除了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文森特·希思，著名歌唱家、黑人领袖保罗·罗伯逊，著名作家赛珍珠和克莱尔·布恩外，还有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母亲安娜·罗斯福和夫人埃利诺·罗斯福担任领导的美国援华团体“援华委员会”和“美国援华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此外还有英美驻华高级军政官员，如史迪威将军、美国大使、英国大使、苏联大使、加拿大大使、澳大利亚大使等。这样庞大的阵势，国民党顽固派要对保盟实行镇压或公开指责都是很难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更是全力支持保盟工作，令蒋介石顽固派对保盟的刁难更是显得莫可奈何。这些条件，使“保盟”的工作如鱼得水，有声有色。如人所共知，通过史迪威用飞机送大型X光机到延安；通过美军延安观察组交通飞机的往来，运送救济物资；通过中共代表回延安将成吨的医药等救济物资运送边区，以及通过各国使节和国内知名人士组织赈灾救济的义赛、义演、义卖等活动。保

盟在重庆期间这些具有传奇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至今仍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

为了感谢保盟对敌后根据地的大力支援，1944年9月，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140多位伤病员和工作人员，联名在一幅白绢上写了一段对宋庆龄表示感谢的话，一个个签了名，托人带到重庆赠送给宋庆龄：“掠世界者虽倾颓在即，而国内暗影足虑尚多。先生继总理之遗志，鹤立堪风。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敬先生者，爱先生者固不仅我院工作人员全体也。特赠宋庆龄先生。”在这140多位亲笔签名者中就有刘伯承和陈赓在内。

据1945年夏天，特务密报《情报辑要》严字第76号称：“5月26日上午11时许，国际和平医院以大卡车一辆，在本市马路街装药品40大箱赴延。药箱上书有‘陕西延安’字样。装载完毕后即有一着白衣花短衣裙、年约30余之外籍女子将车子驶蔡园坝方向去。”足见保盟在抗战胜利前夕还在重庆不断地支援着国际和平医院！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和平谈判，8月30日下午即由周恩来陪同专程到宋庆龄寓所会见了她。毛泽东深情地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

宋庆龄在重庆4年间政治生活的鲜明特点，就是十分强调争取民主的斗争。她高举民主、团结、抗战的旗帜，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早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期，宋庆龄就以其政治家的锐敏洞察力，于1941年1月1日的

新年致国际友人书中，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的论断。把要求民主摆到了首要的地位。

宋庆龄到重庆后的首次公开活动，就是参加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的欢迎茶会。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她到重庆后的第一篇讲话，就是针对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政治沉闷、压抑环境发出了要求民主的呐喊；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须实行民主；要求各党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并痛斥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而实则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她的讲话锋芒所指，直刺蒋介石顽固派的脊梁。在场的许多国民党开明人士，都倍感宽慰和振奋；有了孙夫人这面旗帜，便有望扭转大后方万马齐喑的局面，可以遏制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了。宋庆龄的这篇讲话是她到重庆后，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战斗宣言；决不与专制独裁者妥协，决不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者合流。

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公然宣称，他准备两年之内消灭共产党及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同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顽固派更是得意忘形，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能否继续团结抗战到底，并真正取得胜利受到了严重挑战。

及时向全世界揭露蒋介石的种种阴谋，这是宋庆龄一贯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早在1942年7月，宋庆龄便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在过去两年中，尤其是在最近数月中，我们统一战线的情况已经大大地恶化了。失败主义者和内奸竭力挑拨两大政党之间以及游击区与大后方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太成功了！那些在抗战开始以后销声匿迹的反动分子现在又能够抬起头，大事活动来取消人民在四年战斗中所赢得的民主果实。”由于根据地人民动员起来，积极保卫边区，加上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全国人民的反对，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了。宋庆龄始终相信：只有在政治民主的万丈光芒照耀下，我们才能发现投降派和卖国贼；只有扩大民主，包括妇女权利在内，才能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

1943年3月，蒋介石表露出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时候，宋庆龄在重庆对记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同等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给以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胜利。”宋庆龄的这一讲话，彻底揭露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其实是孙中山叛徒的“自白书”！

为了让海外人士了解中国当时需要民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43年9月18日宋庆龄发出了《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的公开信》，她在信中写道：“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没有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有民主，而这种积极性是建筑在对于大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这一基础上的。”宋庆龄的这一论述，把人民的积极性与民主、民主与团结、团结与抗战的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为大后方人民争取抗战胜利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1944年2月8日，宋庆龄委托爱泼斯坦带到国外发表的《致美国工人们》一文，宋庆龄令人信服地介绍和论述了抗战以来“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抗战的路线。”她写道：“凡是民主制度最强大的地方，凡是发挥了人民积极性的地方，凡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一个经济落后与缺乏武装的国家能够击退一个优势装备的侵略者的唯一武器）最不受掣肘的地方，中国的抗战在那里也就最伟大和最有力量。相反地，当反动派势力公开投降，或者压制人民和人民的积极性，惧怕并破坏民主运动而给敌人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中国的抗战就摇摇欲坠，节节失利。”宋庆龄要求美国工人“要公开发表申明反对中国发生内战。中国反动派正在准备这种战争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这些部分就是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文章还戳穿了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

中全会上作出战后一年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宪政决议案的虚伪性。宋庆龄指出：“我们的政府曾不止一次答应我们要实行宪政，并说在战后一年各党派将一律平等……。我们需要民主，因为我们必须同等看待所有的抗日力量。现在第一步就是取消不人道的封锁，这种封锁使得给敌人重大杀伤的受伤战士得不到必要的医药。如果这种起码的人道主义的第一个步骤还没有做到，空谈民主是不会有有多大意义的。”

《致美国工人们》一文是一篇直指蒋介石顽固派的战斗檄文，它鲜明、真实、尖锐。在世界人民面前把蒋介石顽固派在抗战中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卑劣伎俩暴露无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英勇抗战的业绩，如实地加以介绍和赞扬。蒋介石对《致美国工人们》一文，感到十分恼火和愤怒，接二连三派人去严厉责难宋庆龄，甚至准备对她扣押软禁。这事还引起了孔祥熙等人的担忧，并劝宋庆龄屈服。但是，宋庆龄大义凛然，岿然不动。当年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对此十分感佩，他说：“除孙夫人外，没有任何中国人敢于公开揭露高压政策，即使含蓄地讲也不敢。”《致美国工人们》发表一个月之后的3月12日，宋庆龄仍不顾个人安危，冲破了顽固派的再三阻挠，应美国知名人士的邀请，对美发表了题为《孙中山与中国民主》的广播演说，进一步揭示了“国际民主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同时每一个国家内部也有一个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与自由表达意志的基础上的政府。”同时广播还把中国人民对政治局势的意见传播到海外，增进了中美人民之间互相了解和友谊团结。

宋庆龄在重庆工作十分繁忙，时间非常宝贵，对一般的社会应酬从不参加。但是对有利于争取民主、团结、抗战和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活动，她总是全力以赴。如对苏联的一些纪念日和庆祝活动，总是和民主人士一起出席，以表示对苏联及其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对已故爱国进步人士的纪念活动，她也从不缺席，如

领衔举办邹韬奋追悼大会，参加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活动等，以此表示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抨击和对人民民主和团结抗战的有力支持。

宋庆龄高举民主的旗帜，并不是把民主作为斗争的手段，而是把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基本思想的人民民主政治的实现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备加赞赏，就是因为那儿实现了真正的民主。不仅如此，宋庆龄还将战后应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制度的社会，作为主要斗争任务，正如她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的：“这种靠人民一致努力所赢得的胜利，将不允许任何不民主的制度存在下去。”

宋庆龄在重庆渡过的四个春秋，是她光辉奋斗一生中最为艰苦的时期，同时也是最能表达她的爱国主义和人民民主思想的时期。她以革命家的胆识，思想家的锐敏，和政治家的斗争艺术，高举民主、团结、抗战的旗帜，直接打击了蒋介石顽固派专制独裁、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稳步发展，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维护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引向人民民主的全面胜利，铸造了一块基石。宋庆龄在重庆的四年赢得了人民的崇敬和怀念。1945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宋庆龄时，热诚赞誉她忠诚不渝，信守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贵的革命气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这是对宋庆龄在重庆四年斗争岁月的崇高评价。

虽然，这些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它影响深远，至今回顾起来，仍有鲜明、亲切的感受，更有多少温故知新的启示啊！

（作者工作单位：宋庆龄基金会重庆市分会）

抗战时期宋氏三姐妹在重庆

周 峥

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个家族能像宋氏家族那样显赫，而在宋氏家族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却是三位女性，即声名远播的宋氏三姐妹。在现代中国社会纷乱多变的复杂局势下，三姐妹截然不同地分为两派，以宋庆龄为一方，以宋霭龄和宋美龄为另一方，两方为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而斗争，以致三姐妹长期在政治上势同水火，互不相容。但是，在抗战初期，宋氏三姐妹进行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也是她们各自政治生涯中的联合行动——1940年三姐妹联袂重庆之行。这次行动对鼓舞国民的抗战热情，对抗日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

七七事变后，宋氏三姐妹就分别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无数中华儿女热血疆场，中华民族遭受危难之际，许多旧有的矛盾淡化了，退居次要的地位。抗日是民族大义之所在，宋氏三姐妹正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为抗日战争尽一份力。

宋美龄身为国民政府的第一夫人，她也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洪流中。以她的地位和影响，出面担任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主席，对于统一妇女团体在抗日中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她还积极地争取外援，为建立国民党空军出钱出力。

宋霭龄一向深居简出，很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对大众的疾苦也是冷漠的。但抗战开始后，她也开始走出豪华奢侈的生活圈子，频繁地出入难民营、医院和学校等地视察。战争的严酷和难民的悲惨状况使她感到震惊，于是她也投入了救助难民和伤病员的事业，她组织人们送医送药，捐助了不少的金钱和实物，还担任了伤兵之友总社的理事，并兼任香港伤兵之友协会会长，活跃在支援全民族抗战的前列。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与何香凝一起在上海创立了妇女抗敌后援会，会中联合了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和著名人士的夫人，其中就有宋霭龄。不久，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要求各地妇女界迅速组织分会，与总会取得联系。宋庆龄与何香凝以抗日大局为重，为取得合法地位，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遂将上海妇女抗敌后援会改成妇慰总会的上海分会，从属于宋美龄的统一领导之下。这样，在抗日这个大目标下，宋氏三姐妹有了共同的事业和向往，从而有可能结束因政见不同而带来的长期对立，开始了相互合作，她们之间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上海沦陷后，1937年底，宋庆龄移居香港。她一直密切关注着抗日战局的发展。到香港后不久，她就着手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战区提供援助和救济。尤其重视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区进行援助。随后，宋霭龄也迁移到香港暂住。1940年初，宋美龄因病到香港疗养。这样，时代的因素和历史的机遇使宋氏三姐妹走到了一起，而此时政见不同的她们已有了共同语言。开始形成统一战线。

二

宋美龄到香港后，住在宋霭龄家中，后来她们一起邀请宋庆龄搬来同住。这样，三姐妹在分手10年后第一次聚居在一起，她们不再争执政治上的分歧，只是一起回忆亲情，闲话家常，度过了一段

平静的生活。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举行所谓的“还都典礼”，公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立傀儡政府，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哗然。日本的宣传工具以宋氏三姐妹相聚在香港一事大造谣言，说她们正积聚财宝欲离开中国，远走他乡。

在这种情况下，宋氏三姐妹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她们三人一起决定在香港的公众场合一次交谊舞会上公开露面。三位名声巨大而又政见不同的姐妹从未在公开场合一起露面，因此，此消息不胫而走，所造成的轰动效应是始料不及的。“消息很快传开，顷刻间舞厅看来有点像温布尔登的人群一样拥挤，一对对舞伴沿着长桌翩翩起舞，他们的头转来转去，好像猫头鹰把脖子伸得长长的，一双大眼睛按英国礼貌所允许的限度紧紧盯着她们。”^①

3月31日，宋霭龄与宋庆龄接受宋美龄的邀请，启程同赴重庆。这是她们进一步向国内外表示，宋氏三姐妹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计前嫌坚定地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站在一起的决心。

当三姐妹的座机在重庆机场降落时，受到了公开而热烈的欢迎。重庆的各大报纸争相追踪报道，《新华日报》也发表短评，欢迎宋庆龄的到来。短评指出：“当前抗战进入巨艰阶段，反汪除奸和宪政运动正在逐渐展开，而更需要加强民众抗日的力量，首先是举国一致的精诚团结，更需要团结妇女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到抗战中间来的时候，孙夫人的来渝，定能在这些方面，有极大的宝贵的贡献。”^②

从4月3日起，宋氏三姐妹频繁地参观重庆及成都的孤儿院、医院、防空洞、工厂、学校和机关。她们还会见各界民众，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汉奸卖国贼。在她们参加的社会活动中，身边总是围着许多记者，对她们的一言一行进行详细的报道。

4月7日，宋美龄为欢迎宋霭龄和宋庆龄的到来而举行重庆

妇女界茶宴。宋庆龄在谢词中说到：“我们不要做表面的文章，我们需要做实际的工作”，“做坚持抗战的工作”。宋霭龄也说“我希望全国姐妹们继续努力工作和彻底合作，因为只有合作，才能得到真正的团结！我在这里答应各位姐妹，我们要以忠诚来贡献祖国，这只是为了一个可以在短时期内达到的目的——造成一个新的强盛的中国。”^⑩

在整个4月份，类似的宴会、招待会等活动很多，宋氏三姐妹一般都应邀联袂出席，有时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上层人士也在场，这时期她们的讲话中都体现了团结一致坚持抗战的精神。

4月18日，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到重庆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并由NBC广播网向美国全国转播，这是宋氏三姐妹重庆之行中重要的一次对外宣传活动。宋霭龄首先发言，她在演讲中用充满感激之情的口吻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和支持，痛斥汪精卫的卖国投敌行为，强调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团结抗战的信念，她还回忆了自己在美国生活、学习时留下的美好感情，呼吁美国人民继续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支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等。接着，宋庆龄和宋美龄也分别作了讲演。宋庆龄在演讲中说：“日本借着它拥有优越的武器，在开战以前，曾经向世界夸口说，要使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于三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始终不屈地做有效的抵抗，现在已有三十三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太平洋和全世界人民的将来历史，一定和以前不同，且将再见光明灿烂，因为中国不愿做奴隶的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世界人类，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宋庆龄呼吁美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中国抗战有力的援助。宋美龄也发表演讲，她谴责美国政府继续向日本出口战争物资的可耻行为。她说：“中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必能全力以赴，同日寇血战到底。问题是，我们会得到公正的对待吗？这只能由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国会

议员来回答。”宋氏三姐妹用流利的英语向美国人民作演讲，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为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起了促进作用。

4月下旬，宋氏三姐妹到了成都，她们一起视察了成都工业合作社。在欢迎会上，她们强调了“工合”事业对实行孙中山“民生主义”及改善人民生活的意义。在视察的几天中，宋氏三姐妹多次遇到敌机空袭，她们与普通老百姓一样，钻防空洞，曾被人流堵在大街上动弹不得。晚上住在当地简陋的旅社里，虫咬蚊叮，不能很好地休息，第二天她们却仍然精力充沛地视察各种公益机关。

当时，蒋介石、宋美龄和宋霭龄都希望宋庆龄“长住重庆领导妇女工作，辅助国民党政府”。但是宋庆龄婉转而坚决地拒绝了。她说：“不久我便要回香港。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这里那样，当展品。”

5月9日，宋庆龄回到了香港，轰动一时的宋氏姐妹重庆行落下了帷幕。从这里，透露出宋氏姐妹的联合行动本身虽起了巨大而良好的宣传作用，有助于推进抗战事业，但并没有消除政治上相互间的分歧和隔阂。返回香港后，宋庆龄对记者谈了这次重庆之行的印象，她说总的说来，她是受到鼓舞的，人民的民族情绪高昂，坚信中国能坚持抗战下去，生产也有所增长，最终一定会胜利，但在政治上，还是有所改进的，对“改善民生，缺乏具体步骤，深感遗憾。”

三

虽然，宋氏三姐妹的重庆之行是以“联合阵线”的面目出现的，对稳定国民抗战信心，消弭因汪精卫投降而带来的负面作用，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她们之间的区别依然存在。她们是在抗日这个民族大前提下的统一，仍保持着各自的立场和传统。

自从大革命失败后，宋氏三姐妹就分化成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宋庆龄坚定地继承孙中山的遗志，高举救国爱民的旗帜，成为自由、民主的象征，并成为共产党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坚定战友。宋美龄身为蒋介石的夫人，积极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搜刮财富，坚决维护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宋霭龄虽然极少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但她也是蒋氏独裁政权的积极维护者，只不过她的最大目的不在于权势，而是如何利用这一独裁体制攫取更多的钱财。在当时流传的“霭龄爱钱，庆龄爱国，美龄爱权”。可以说是人们对她们个性的真实写照。

宋庆龄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业就会坚定不移地去做。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就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完善而不懈地努力。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庆龄曾积极地在各方中间周旋，为蒋介石的被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蒋介石的获释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接连攻占了上海等地，宋庆龄也转移到香港。一到香港，她便着手组织建立保卫中国同盟，以公正、及时地争取国际对华援助。1938年6月14日，保盟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主席，宋子文任会长。这是宋庆龄自宁汉分流以来第一次与宋氏家族内部成员共同携手创办一项事业。但是，宋庆龄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宋氏三姐妹的统一战线中表现出不同于其他两姐妹的思想和言论。她始终像《新华日报》短评中所希望的那样，强调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政治民主化，展现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风采。宋庆龄还为维护统一战线作出了努力，在三姐妹对美国的广播演讲中，她对宋霭龄的爱国行为进行了很大的赞扬。宋庆龄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重庆之行的目的达到后，便毅然回到了香港，以便更好地从事她自己的事业。

香港沦陷后，宋庆龄不得不移居重庆，但她不轻易参加国民党政府举行的集会活动，保留自己与蒋介石之间的距离，保留对国民

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批评。如宋庆龄所主持的保盟工作中，由于蒋介石的刁难，救济药品不能及时顺利地送到陕甘宁边区，为此，她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时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行为进行了批评，要求政府能及时顺利地将救济物资发放到抗日的人们中去。出于团结抗日的愿望，她在公开信里没有公开抨击国民政府，而是含蓄地谴责了这种行为。对于宋庆龄在重庆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独立的观点，正如王安娜所记述的那样：“对自己的家族即‘宋家王朝’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她并不抱幻想”。“她始终如一地执行着在她看来是正确的路线，态度极其鲜明。她是宋家一族中唯一不谋私利的人，她是为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生活、工作的。人们对此十分了解。”^①

对于宋美龄和宋霭龄来说，这次三姐妹重庆之行也是难得的一次在公共场合的集体露面。特别是宋霭龄，她生性爱财，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捞取钱财的机会，一向给人留下贪婪、冷酷的印象。但是，她在抗战初期参加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加上这次重庆之行，改变了她昔日的贪婪、势利、冷漠、自负的形象。这些活动在公众心目中也是有益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宋美龄身为国民党政府的第一夫人，自然要积极地推行政府的政策，这次重庆之行也是她为团结全国妇女界的力量，更好地支持抗战而做出的努力，当然其中也隐含着要拉拢左派，消弭反对蒋介石的力量等意图。

总的说来，宋氏三姐妹的“统一战线”的确在当时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它对于鼓舞人民的抗战热情，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建立和完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注释：

- ① 《宋氏三姐妹》，〔美〕罗比·尤恩森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
- ② 《新华日报》，1940年4月3日。

- ② 《未加冕的女王宋霭龄》，杨者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3 页。
- ④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王安娜著，第 383 页。

宋庆龄与救援战灾儿童运动

张 珏 冯秉序 裁 辉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难以计数的难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贫病交加，生活无着，挣扎在死亡线上，其中尤以数百万之多的战灾儿童更为悲惨。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宋庆龄没有子女，她唯一孕育中的孩子，在与陈炯明叛乱作斗争时不幸失去了。然而她有千千万万的孩子热爱着她，亲热地叫她宋妈妈！宋奶奶！

宋庆龄何以能够得到如此众多孩子的衷心爱戴？正如她自己所说，因为她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①，对儿童倾注了她毕生的心血和奉献了她全部的爱。

现就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站在拯救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高度，广泛开展援助战灾儿童的活动，作如下论述。

为了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

宋庆龄于1938年6月在香港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它的任务是进行国际宣传、募集经费、医药和救济物资，全力支援抗战，争取抗战的完全胜利。同时，救济战灾儿童，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是宋庆龄和保盟的又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儿童和儿童工作，是宋庆龄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而且在她的整个革命生涯中占有突出的地位。1939年春，她牵肠挂肚地关怀着大约有300万之多的战灾儿童，考虑着对他们的救济工作。之前，由宋美龄和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发起组织的全国孤儿救济

总会虽然进行了艰巨的救济孤儿的工作，如 1938 年 10 月在延安开办的边区孤儿保育院，就是响应蒋、冯两位夫人的呼吁建立的，但救济工作量仍然非常之大。为此，保盟发起了一个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在 1939 年 3 月 28 日的开幕式上，宋庆龄发表了题为《救济战灾儿童》^②的演说。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保盟还把它配上插图制成第一份传单，向全世界人民发出呼吁：“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宋庆龄说：“现在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战灾儿童。其中有的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战士的遗孤；有的是被空袭炸死的父母的子女，有的是流离失所并被饥饿和疾病夺去生命的难民的后代。另外，还有成百万的儿童，虽然他们的父母还活着，但有的是战斗在前线的战士，有的是被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的难民。他们无力照顾这些孩子。”她着重指出：“这些因战争变得无家可归的无所依靠的儿童……他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这样鲜明的高瞻远瞩的思想，同她以后一再强调的“缔造未来”^③的思想完全一致，而在此时已经开始形成。她在文章中还介绍了已在陕西三原建立的收养有 500 个儿童的孤儿院的情况，除为孩子们提供医疗、食物、衣服、住所外，还进行常规教育，以便训练他们成为有用的公民，能够担当起国家交给他们的任务。培养目标十分明确。最后，她以极富感召力的语言，向全世界人民呼吁：“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中。”^④

援助战灾儿童的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因陋就简开办了不少儿童保育院，而保盟给予的物质的与精神的支援，使一些保育机构得以建立、维持和扩展。

路易·艾黎的义子黎雪，在《保盟通讯》第 19 期（1940 年 8 月 15 日出版）发表的《今日的孤儿——明天和平的建设者》^⑤，是一篇内容真实，观点鲜明的好文章。文中写道：日本侵略者的燃烧弹大

量破坏了城市、乡村以至山坡上的木房、竹屋。众多的游击战士离开了家园，许多人在同敌人作战中牺牲。今天中国有 300 多万孤儿，其中大部分年龄在 6 岁至 15 岁之间，失去父母无家可归，生活悲惨。在抗战后方，只有 47 所保育院照看约两万多名孤儿。他们中有个叫蒋东平的孩子，原本过着和平的日子，他写了自己的遭遇：“日本侵略军来了，把他们的毒焰烧到了我们和平的村庄。轰炸机 10 架一组地飞来了……村庄被炸毁了，死了好几百人……现在我来到了这个孤儿院，我将在这里长大，我要学习和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后来，蒋东平参加了抗战的队伍。1992 年，一位解放军少将专程来到浙江海宁，寻访故乡亲友，原来他就是当年在孤儿院里长大的那个蒋东平。

人们发现，保育院的孩子有两大特点：强烈要求抗战；迫切追求知识。为此，保育院尽可能给予良好的教育，以便把这些目前的孤儿“变为明日世界文明的建设者”。

孤儿保育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他们食物中缺少维他命所导致的营养不良。中国各地的孤儿都需要富有维他命的食物。

黎雪的文章，最后这样说：“捐赠给这些未来和平建设者的任何礼物，都是对人类进步的直接贡献。”

保盟驻延安的代表马海德大夫，对边区战灾儿童保育院作过深入的实际调查，他向保盟提供了许多具体资料，在《这些儿童是中国的未来》^⑥的报道中反映：目前最大的需要，是用于维持和管理保育院的开支的基金。迄今为止，大部分经费来自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提供的捐款，这部分经费总是可以得到的。然而，只有通过海外友人进一步的援助，才能够在西北这个重要的战略地区里，推行保护“中国的未来”——今日的孩子即明天的战士——这项重要工作。

边区保育院的工作、教育方法和培养目标，充分体现了宋庆龄“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战略思想。

设立保盟战灾儿童基金

宋庆龄在《救济战灾儿童》一文中具体提到：“在开展这项工作中，我们只需要钱。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管理和教养这些孩子的。只要有相当于二美元或八先令的钱，就可以维持一个孩子一个月的费用，包括食物、衣服、医药和工作人员的费用。”^②

马海德反映：儿童保育工作的主要困难是经费不足。边区保育院已收养来自华北、东北的孤儿 400 名（尚有近千名 1—15 岁的孤儿和部队子女在等待入院），每个孩子开支 5 元，如有足够的经费，便能收养更多的战灾儿童。

美国朋友卡尔逊少校《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③一文中也反映：新四军重视照护战士的孩子，但缺少设备和经费。他说，每月 6 元中国币就能照护一个孩子，每月 600 元——约 30 美元就可为 100 个孩子提供全天照护。这些孩子普遍营养不足，有的受到疾病的折磨。新四军十分需要经费来合理组织对孩子的照护。

宋庆龄和保盟深深理解，要有效地救济战灾儿童，必须设立保盟战灾儿童基金，并积极开展募集捐款和物资的各类活动，广泛争取国际救济团体、友好人士和爱国侨胞的支援。宋庆龄认为“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④。

宋庆龄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以她自己的社会影响力，高举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旗帜，大力开展国际宣传，广泛联络和团结各方人士，并采取各种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因而募捐活动取得很大成功，募得了数量可观的保盟战灾儿童基金，使不少保育机构得到援助，更多的战灾儿童得到了救济和照护。

编辑、出版《保盟通讯》是宋庆龄和保盟进行国际宣传的主要阵地。宋庆龄在《真实报道的传统》^⑤一文中说：“保卫中国同盟不但在为中国的斗争争取国际同情、为前线与敌后的战士争取物质援助方面负起责任，并且感觉到应该承担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真实

情况的职责。我们把报道实际情况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就是在《保盟通讯》上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的。《保盟通讯》以大量篇幅对战灾儿童的情况和迫切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保盟还印制了许多传单、圣诞卡、宣传画和小册子，进行生动有力的宣传。宋庆龄自己则不断写信给各国友好人士、爱国侨胞，进行宣传联络，争取对中国战灾儿童的同情与援助。美国洛杉矶爱国侨胞及友好人士就是通过宋庆龄和保盟，以他们的捐助在延安的窑洞里建立了洛杉矶托儿所。宋庆龄还以此作为范例，写信给澳大利亚响应孙夫人呼吁筹赈会主席黄家权说：“我们向世界上某些社会团体募款，以供应一个特定的托儿所，或者创办一所新的托儿所。新托儿所将以某一捐款的城市命名，例如‘悉尼托儿所’。这种方式有一个先例，那就是设在延安的‘洛杉矶托儿所’是用洛杉矶华侨的捐助兴建的，或许悉尼市能参与诸如此类的创举。”^⑩这使我们看到宋庆龄在募款方式上的灵活性和开创精神。

宋庆龄和保盟的募捐活动富于创造性，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举行义演、义映、义展、义卖以及义赛，还有一碗饭活动等，都是保盟捐募款物行之有效的方

1940年10月18日晚上，保盟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音乐舞蹈义演，获得净收入3685.35元用作保盟战灾儿童基金。这次演出，香港代理总督诺顿中将热心赞助。宋庆龄在玫瑰厅门口亲自欢迎客人。在知名人士中，有孙科博士和夫人，史密斯先生和夫人，宋子良先生，周寿臣爵士，罗文锦先生以及李树风博士等。从伦敦回来的舞蹈家戴爱莲，上海的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以及香港的音乐家赵浦卫等艺术家参加了义演。为义演印制的纪念特刊的售卖也十分成功。

在菲律宾的一场援华义演，被誉为外国友人同菲律宾的华人团体之间合作的榜样，是各方面合作获得成果的一个范例。

1940年11月27日在碧瑶伯恩翰公园礼堂为援助中国战灾儿童、难民和伤员的义演，主要负责人是菲律宾救济中国委员会成员克罗特夫人。这次义演收入达337.34美元，其中一半捐给香港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另一半捐给宋庆龄用作保盟援救伤兵和战灾儿童基金。

菲律宾华侨孩子资助中国战灾儿童的事迹更是感人。1940年8月15日出版的《保盟通讯》报道说，保盟最近收到马尼拉的菲律宾华人洪广学校孩子们的一封信，信里附有港币300元。这些孩子在儿童节这天没有把假日花在游戏或看电影上，而是分成小组，拿着鞋油和刷子，到马尼拉市的华人区，为店主、职员和遇到的一切人擦皮鞋。他们干了一天，赚了300元钱，并决定把这笔钱寄给保盟，资助西北边区孤儿保育院。

1941年5月2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中国之星”演出，是由美国援华会和美国援助中国战争孤儿委员会主办的。一些著名艺术家演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音乐节目。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参加了义演，他还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美国援华会费城分会执行秘书弗兰克·苏凯明发表募捐演说，为国际和平医院和中国战争孤儿募得500美元。他在给保盟的信中说：“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中国之星’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次活动的全部收入，将由美国援华会寄给你们。”^①

电影义映，也是一种独特方式。1941年4月21日保盟在香港“李剧院”首映著名的反纳粹影片《牧师礼堂》。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及许多知名的英国和中国朋友观看了影片。这次义映净收入3217.30元（开支只用去60元），不仅充实了保盟战灾儿童基金，而且还使人们懂得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保盟在宋庆龄直接领导下，对中国战灾儿童给予有力的救济和援助。仅在1939年至1940年2月就资助战灾儿童5789.47元（港币）；1942年至1945年保盟在重庆时期，资助儿童工作项目共

有55万多美元和4700多万元(港币)。

宋庆龄和保盟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鲜明的原则性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如果捐赠者指定是给谁的,那么一定按捐赠者的意愿办理。宋庆龄对钱财方面的事情特别认真,严格管理,克勤克俭,把每一文捐款,都用于为战灾儿童服务。她对每一笔给保盟的捐款,不论数额大小,都要开给收据,并亲笔签上她的名字。卡尔逊曾说过这样的话:在她那尖锐的目光下,没发生过被工作人员无耻吞没的事情。这同国民党政府的贪污、受贿、腐败、欺压百姓形成鲜明的对照。保盟在中外人士心目中享有正直无私、值得信赖的声誉。

为了孩子三姐妹在一起

宋庆龄和宋霭龄、宋美龄三姐妹于1940年3月在香港团聚,而且一起出面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宋美龄于3月28日在香港召集各爱国团体会议,发起伤兵之友运动。更为不寻常的是,宋美龄在演讲中,对她姐姐宋庆龄通过保盟和工合,为中国战灾同胞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赞扬。宋庆龄和宋霭龄也作了发言。《保盟通讯》第16期卷首还刊登了宋美龄为该刊撰写的《伤兵之友运动》专稿。宋庆龄的这一举动,对鼓舞人们加强团结抗战的信心,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有的人大事渲染,认为亲人之爱战胜了一切原则分歧。爱泼斯坦对此作了这样的评析:事实上,三姐妹对于在不很紧张的情况下,聚会固然感到愉快,但此事的基础既不是任何一方放弃政治信仰,也不是纯粹的私人关系,就像中国各党派战时的统一战线一样,这里面“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爱泼斯坦的见解十分精辟,非常深刻。

宋氏三姐妹于3月31日飞赴重庆,到战时首都和成都作为期一个半月的视察。但宋庆龄表示:“不久我便要回香港。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

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这里那样，当展品。”⁹

不过，宋庆龄在重庆期间，三姐妹在为了孩子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共同的活动。

4月3日下午，三姐妹同到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看望难童。宋庆龄对孩子们说，难童诸生既受此良好的训练，将来必不致产生汪精卫一类人物。第二天，4月4日是当时的儿童节，以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三位夫人的名义向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赠送500份糖果，祝贺儿童节。这一天，三姐妹还一起参观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中苏儿童照片展览”和“儿童科学玩具展览”。

宋庆龄到达重庆后的4月2日，《大公报》发表短评《欢迎孙夫人》，称赞她的精神是反侵略的，不妥协的。短评说：“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无论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¹⁰

当然，为了孩子，她们三姐妹在一起活动，这也体现了团结的象征。

保育院孩子的鲜花

1947年7月2日，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院长杨志芳率全体工作人员暨全体儿童写信给孙夫人。信中说：

“溯忆本院自一九三八年成立以来，屡蒙先生殷切关怀，时赐精神与物质的各种热情援助，至为感激！先生为全国儿童福利事业暨其他各种社会救济事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百折不挠，始终如一，此为民谋福之伟大精神，实素为我全国同胞所敬崇，尤为我全院数百儿童暨工员所衷心热爱和拥戴，今特向您致热烈的慰问和崇高之敬礼！”

“本院自诞生以来，在陕甘宁边区民主政府之扶助与培植下，在国内各界正义人士鼓助和声援下，儿童日益增多，院务日益扩展。在同仁等积极努力渗淡协作下，一切设备皆粗具规模，儿童生活在自由幸福的乐园里，心身均获得良好之发育，孩子们个个都呈

现健康结实之体格，聪明活泼之姿态，无奈这种安静美好的生活，被战争挑拨者，万恶的蒋匪军的炮声所击毁了。孩子们留恋地离开了延安院址，丢弃了她们心爱的小床”，“转移至农村后方”，“在战争期中，孩子们的困难，也随之加多”，正值困难倍加之际，欣获中国福利基金会之捐款，遂悉数用之于改善儿童营养及玩具设备等，经数月摄心调养，今全部儿童已恢复健康，心身均又获得迅速发展，此即最大告慰先生之关切者，并向您致深厚的谢意。今奉上决算书一份，敬盼察阅。”

“我们怀着十分的欢欣，来企望先生不断的给以指导和各种援助，在先生热忱的策励和援助下，使本院得到更迅速的开展。”^⑥

这封信是请解放区救济总会主任董必武转交的。它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在该院成立以后，得到宋庆龄的关怀和给予精神和物质的各种援助，信中还提到抗战胜利后，在延安暂时撤离后，还得到宋庆龄的关怀和援助，一再表示衷心感谢，并希望继续不断地给以指导和种种援助。这是一封很有历史意义的信件。

保育院的孩子们受到宋庆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怎能不从心底里感谢她呢。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柳无垢等陪同下，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北平。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到达北平火车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人到车站迎接。最后，一群幸福欢笑的孩子捧着鲜花来欢迎她，宋庆龄高兴地接受了孩子献给她的鲜花。

这群孩子来自洛杉矶托儿所，他们代表着抗战以来受到宋庆龄时刻关怀着的数百万战灾儿童，他们正是新中国的有生力量——祖国辉煌未来的希望。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福利会）

注释：

① 《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1981年5月)。见《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175页。

② 《救济战灾儿童》，见《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第5—6页。

③ 《缔造未来》见《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卷首。

④ 同注②

⑤ 《今日的孤儿—明天的建设者》，见《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译本(以下简称《保盟通讯》)，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182—185页。

⑥ 《这些儿童是中国的未来》，见《保盟通讯》第345—350页。

⑦ 同注②

⑧ 《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见《保盟通讯》第264—267页。

⑨ 见《保卫中国同盟声明》(1945年12月)，《永远和党在一起》第48—50页。

⑩ 《真实报道的传统》(1962年1月)，见《宋庆龄选集》下卷，1992年10月第一版，第375—379页。

⑪ 见《宋庆龄致黄家权》，中国福利会档案原件。

⑫ 见弗兰克·苏凯明致保卫中国同盟的信，引自《保盟通讯》第373页。

⑬ 见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第一版，第367页。

⑭ 见《宋庆龄在重庆活动纪事》(宋庆龄基金会重庆市分会宋庆龄研究室编写，李耀椿执笔)。

⑮ 见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杨志芳等给宋庆龄的信，中国福利会档案原件。

宋庆龄对抗战时期“工合”运动的贡献

朱敏彦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一场经济救亡运动。它对于组织人民大众，开展生产自救，克服经济困难，支援长期抗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曾有“经济国防线”之誉。宋庆龄以她的崇高威望和杰出才能全力支持和积极促成工合的兴办，对工合运动的蓬勃开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支持筹建工业合作协会的设计， 积极促进工合运动的兴办

中国工合的最初发起人是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原名海伦·福斯特)。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斯诺夫妇和艾黎目睹日本侵略军对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进行疯狂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从战略上破坏中国的工业基地”，造成中国战时军事和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的局面。他们决心改变这一状况，经过多次商讨，产生了一个“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难民的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①合在一起的工业合作社的方法。这一设想当即得到宋庆龄的赞同和支持。

宋庆龄认为兴办工业合作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它能够“吸收大批的难民，并且将日本占领区内不事生产的难民救济所的

几百万经费转移过来”，发展中国的中小工业；其次，“能够维持经济稳定，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与匪患”；再次，“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另外，这可是最重要的，“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可图”^②。为此，当艾黎、斯诺他们还在酝酿筹办工合时，宋庆龄不但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一事业，而且主动提出愿意做发起工合的保证人。^③宋庆龄看到工业合作社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的然而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即民生主义。

在宋庆龄的支持和鼓励下，艾黎他们很快制订出一份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发展工业合作社的计划草案，并在由中外进步人士参加的星一聚餐会上进行讨论，专门加以研究。大家认为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工业合作运动，应取得国民政府的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以便顺利进行，同时也必须保持这个组织的群众性，这样，才能调动广大难民、工人的积极性，并可以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宋庆龄对这一意见十分赞同，经她联系，取得了宋子文在财政上的援助，替工合筹划了初建时急需的资金。在宋庆龄的支持和促进下，经过国际友好人士和国内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8月24日，中国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社正式成立，这样，工合运动就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发展起来。

全力宣传工合的性质、作用， 呼吁国内外人士支持中国“工合”

中国工合开展之初，宋庆龄通过演讲、著文以及与国际友人通信等各种场合宣传工合的性质、作用，呼吁国际友人、援华机构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大力援助中国新生的工合事业。

正当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之时，8月15日，宋庆龄

便通过广播演讲，向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介绍了中国工合运动。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毁坏和攫取了中国 75% 的新式工业，造成 100 余万在业工人失业的罪恶行径后，指出，中国人民对此并没有失望和屈服，他们决心在战争中，要把被日本所毁坏的生产力重建起来。“我们打算在所有内地，甚至在日本所占据的铁道两旁建起成千成百的小工厂。为要推动我们的人民广泛参加这个共同斗争，为要使他们的牺牲有意义，并且使这个运动有充分的民主性质，它是以合作社的方式开展着的——是政府与消费者共同经营的”^④。她呼吁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和人士，尽他们的最大力量，支持和援助中国这一新生的进步的工业合作社运动。

为了争取更多的捐款，宋庆龄还多次写信要求国际友人支援中国工合事业。1939 年 5 月 1 日，她在给全世界朋友的一封信中呼吁他们“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流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⑤

中国工合运动开展一年之际，1939 年 12 月 10 日，宋庆龄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在香港电台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讲，指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重要性，不单只是重建社会，它更可以促成经济的改善。”“若从社会和经济的立场上说，它是无价之宝，由于这种扩大的组织，人民的生活程度一定迅速高大。此外，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更可以消除东方劳力廉贱的传统陋弊，单此一点，便足裨益世界不浅”。“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⑥

1940 年 4 月，宋庆龄从香港来到四川，曾先后视察了重庆、成都等地的工业合作社。当她来到成都工合事务所，了解到该所成立虽然仅一年，却已扩展到 50 多个生产合作社，十分高兴，鼓励他们说：工合运动的开展，“正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广大工合社员对孙中山的

“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俾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①

宋庆龄还通过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向海外援华机构和个人介绍中国工合的情况，并呼吁：“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并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实现自助的人们，你们应当关注于中国工合。保卫中国同盟将代为接受你们援助工合的基金，或者是给任何地区的专项捐款，例如在日本占领的游击区里的‘战地工业。’”^②

通过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对中国工合的介绍，呼吁海内外人士援助工合，使新生的进步的工合事业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进步人士所了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工合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开展。在1940年到1941年，工合总会先后设立了西北区办事处（陕西宝鸡）、晋豫区办事处（河南洛阳）、东南区办事处（江西赣州）、浙皖区办事处（浙江兰溪）、湘桂区办事处（广西桂林）、滇黔区办事处（云南昆明）和川康区办事处（四川重庆）等7个大区一级的办事处。这样，一条漫长的工合线，便一路从东南敌后的游击区一直伸入西南、西北大后方，从沿海地区直至云贵高原，工业合作社星罗棋布地出现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18个省的大半个中国广阔大地上。这种新生的工业以一星期25所的速率出现，“以致昨天的资料还没印出来就已经是陈旧”^③。据不完全统计，到1942年6月，工业合作社的分布情况为：西北区共建立325个合作社，4019名社员；西南区246个合作社，3485名社员；东南区433个合作社，5395名社员；川康区247个合作社，4800名社员；云贵区158个合作社，2497名社员；浙皖区68个合作社，874名社员；晋豫区118个合作社，1610名社员。七个区共计1595个合作社，22680名社员。整个工合每月生产总值达24022944元（法币），社员股金5645558元，总会和银行贷款15727857元^④。

发起建立工合国际委员会， 努力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援助

中国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也赢得了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的深切同情和鼎力相助。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捐款和物质援助，同时也为了避免国民政府的官僚“控制全部海外捐款”，“建立官僚主义的工合组织”，推动工合运动进一步健康发展，经宋庆龄倡议，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由于宋庆龄的声望和影响，香港地区的许多中外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该会由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香港的英国主教何明华为主席，陈翰笙为秘书，陈乙明为司库，斯诺、艾黎、卡尔森、普律德等国际友人和香港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以及宋子文、何东等20多人作为委员。

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宋庆龄立即着手在国外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使国外援华机构和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活动能更有效地开展。受宋庆龄的委派，斯诺夫妇、艾黎、普律德女士等国际友人分赴世界各地筹建当地工合促进委员会。

斯诺同其夫人尼姆奔赴马尼拉筹组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由于宋庆龄的声望，斯诺夫妇来到马尼拉之后，很快就成立起100多人组成的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由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夫人塞尔担任名誉主席，博雷博士为主席，但诺尔先生为总干事。该会成立之初，当即筹募捐款20余万元汇交宋庆龄收转中国工业合作社。接着，斯诺夫妇又赶到菲律宾著名的避暑胜地碧瑶。为了加强宣传工作，宋庆龄又委派艾黎前往碧瑶，协同斯诺夫妇开展宣传活动。艾黎抵达碧瑶后，多次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宣传工合运动的意义，深深激起菲律宾友人和华侨的热情，纷纷慷慨解囊，艾黎在菲律宾逗留不到两周，就带回15万元的捐款。

普律德女士奔赴纽约，筹组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该会由美国

总统罗斯福夫人亲任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任主席，普律德担任秘书，美陆军部长史汀生等 100 余人为委员。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在海外各国中是最大的，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纽约等主要城市都设有分会。

宋庆龄还派员赴伦敦，推进英国援助中国工合活动的开展。英国建立的援助中国工合组织取名为英中合作发展公司，表示英国在战后仍希望同中国工合保持长期的经济技术合作的联系。该公司推英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夫人为名誉主席，工党政府交通运输大臣、国会议员巴恩斯为主席，英国《新政治家 and 民主》杂志编辑吴德满为秘书。此外，宋庆龄还派员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建立工合促进机构，向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提供大量援助。

工合国际委员会和国外促进委员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宣传中国战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以及工合对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作用。这样，一方面扩大了中国人民神圣抗战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联系，从而推动了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侨募集捐款活动的开展。整个抗战期间，英国对工合的捐款约在 10 万英镑以上，美国约 300 万美元，连同港澳、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各地在内，海外捐款总额共计 500 万美元。^⑨从而，在资金、材料、设备等方面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

在宋庆龄的组织下，工合国际委员会与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共同举办了许多活动，筹集募捐资金，援助工合事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 1941 年 7、8 月间举行的持续两个月之久的一碗饭运动。仅这次活动，就募捐到 22144 元港币，615 元国币，英国赈华会香港分会又补赠 2000 多元港币，共凑足 25000 元港币。这些钱款全部捐赠给中国工业合作社，用于发展工合事业。

筹募大量资金、设备、物资、支援和 推动抗日根据地“工合”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政府对工合的支持，主要局限在国统区，其拨给工合的经费，也几乎全部资助国统区的工业合作社。据1940年初的调查，解放区的工合数量占全国工合的六分之一，所得贷款仅占四百分之一。^⑧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党政府由片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对工合运动也由支持到应付，甚至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工合活动加以歧视和压制。但是，在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努力下，在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解放区的工合运动终于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

工合国际委员会通过西北区办事处把大部分捐款汇交解放区。仅1940年初这一次，宋庆龄就将斯诺夫妇在马尼拉募得的10万元捐款，提供给陕甘宁边区，用来发展边区的毛织工业合作事业^⑨。宋庆龄还安排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陈翰笙，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唐明照，把部分捐款转到延安。连绵不断的捐款通过各种途径送往解放区，促进了解放区的工合事业的发展，工业合作社的生产能力也由此不断增长。至1942年9月底，延安地区已发展有41个工业合作社，共1041名社员，入股资金已从1941年的669314元法币增加到3434040元。据1945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各解放区先后建立了包括40余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230多个。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工合国际委员会也经常委托西北工合承制大批的棉军衣、棉坎肩、背包、军鞋等。1939年，宋庆龄曾一次委托西北工合承制10万件棉衣，当时宝鸡、西安等地的纺织、服装工合组织不分昼夜地赶制出来，打包托运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⑩。工合根据需要，必要时还迁建一些生产军需物资的合作社到解放区。一次艾黎受宋庆龄的委派，为开展工合工作到延安，从毛泽东那儿了解到晋

西北的贺龙部队缺乏制造手榴弹的铁料时,就想方设法,从晋东南迁一个炼铁合作社到晋西北,帮助贺龙部队制造手榴弹等军用物资。对于宋庆龄领导下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给予解放区的大力相助,毛泽东曾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他深信,只要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坚持中国与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⑧。

宋庆龄对战斗在华中敌后的新四军也给予很大的帮助,她多次嘱托艾黎到新四军活动的东南地区发展工业合作社。为此,艾黎多次奔波于浙江金华和安徽屯溪一带,筹建工合浙皖区办事处,经过艾黎他们的努力,1939年春,在距皖南新四军驻地附近的兰溪建立了工合浙皖区办事处。1939年10月,工合浙皖区办事处在新四军根据地的中心泾县茂林镇办起了泾太(泾县和太平县)事务所,尔后的7、8个月中就在茂林地区先后办起了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烧炭、竹器、雨具等十几个合作社。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新四军军需之用。如造纸合作社生产的纸张供应新四军印刷《抗敌报》和印文件之用,从而打破了敌人对新四军重重的经济封锁^⑨。为了支援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的临时工厂输送技术力量,宋庆龄还先后两次委派艾黎亲自到皖南新四军驻地,指导皖南工合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工合在皖南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广大新四军指战员的大力赞赏。叶挺曾专门寄信给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会,感谢工合在皖南组织合作社,高度评价了工合对新四军的有力支援,赞誉“皖南工业合作社给予我们重要的援助。这些工业使我们区里的难民得以生产自救。它们帮助我们利用本地的原料,使不致落于敌人之手。因此,我们能够抵挡敌人货物之侵入,并有可能自给自足,使皖南人民得到了好处”^⑩。为此,叶挺认为工合在皖南开展的这一切活动,有力地支持了新四军长期开展敌后游

击战争，增强了部队对敌斗争的物质力量。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宋庆龄始终关心和支持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她为工合运动作出的功绩是无与伦比的，是举世卓著的。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

注释：

① 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斯诺文集》第三集，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9页。

② 宋庆龄：《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载《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

③ 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99—103页。

④ 宋庆龄：《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载《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

⑤ 宋庆龄：《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载《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年。

⑥ 宋庆龄：《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载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1日。

⑦ 《新华日报》1940年4月19日。

⑧ 《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年(英文版)1939年香港，第34—37页。

⑨ 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斯诺文集》第三集，第153页。

⑩ 陈翰笙：《中国合作社史话》，《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⑪ 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71辑，第126页。

⑫ 《新华日报》，1940年2月24日。

⑬ 《新华日报》，1940年2月24日。

⑭ 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71辑，第119页。

⑮ 《艾黎自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⑯ 蒋传骥：《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第38页。

⑰ 路易·艾黎：《保卫中国同盟与“工合”》，《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宋庆龄对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支援

(韩国)李阳子

从1937年爆发中日战争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八年抗战期间，宋庆龄的抗日救国活动有如下特征：一、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而保持同国民党合作关系；同时为民族解放和民众的利益和救援事业的献身精神。二、积极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并通过舆论和广播等方式号召世界人民支持抗战而发挥的巨大作用。

她在此期间的活动大体可以分4个阶段：1. 致力于八一三上海抗战期间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致力于对美、英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对日绥靖政策及中立态度的抨击性舆论形成。2. 上海沦陷后，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募集战时的医疗救济和儿童福利物资，号召全世界支持中共的抗日根据地。3. 成立泛世界性的为支援抗日战争期间的合作社机构，并在全世界开展对此的支持运动。4. 经历了一、二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打开了过去因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和民族的团结而克制着对国民党的攻击炮火，抨击了蒋介石独裁政治。

本文仅对宋庆龄为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支援进行论述。

中日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不仅失掉了上海、天津等经济中心地，正在进行重工业建设的武汉、广州的沦陷也给全国经济体制以致命的打击。而且随着天津、上海、广州等港口被日军占领，使贸易联络网断绝，因此国民党政权在经济方面完全处于孤立状态。由于沿海、沿江工业城市的沦陷，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业受到沉重打击，使国民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加上进口商品锐减和中

国大部分机械生产减退，交通的不便和军需物资的增加使后方的工业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极为紧张。从而采取了对策：①即刻动员经济资源和工业资源的同时强化抗战力，并防止日本商品的流入。②把中小民族工业作为抗战经济的基本。③把危险地区的机器运到内地建设新工业等措施。④为此紧急着手于国家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革。即实现 1938 年 4 月 1 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中提出的《抗战建国纲领》和团结全国力量实现总动员的决议，并在经济上采用管理统制政策，将对外依存转换为国内自强体制^⑤。决定把集中在沿海、沿江等城市的主要工厂迁移到内地^⑥。国民党政府为了顺利地进行转移和再转移，组织了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和下属机关工矿调整委员会、中央迁厂委员会并交付贷金，因机械工厂和纺织工厂、化学工厂有利促进内地工业建设，但工厂转移有很多困难，经营也不容易。不用说投入生产的资金、机器、劳动力的不足和运输网的未装备，最成问题的是日本空军的轰炸。因此从南京、上海一带大小 5000 多个工厂中迁移到内地的也只不过占 0.5%。以持久战形式迁移工厂也是不可能的。^⑦因此，工业界的新潮流——工业合作社运动变成了突出的重要的运动。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运动设立了许多合作社形式的小型工厂，并且利用剩余的劳动力和分散在各地的丰富资源制造各种日用品和军需品，还运用流动手工业、半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结合工业和农业在各地区均匀铺设生产、销售大动脉，进行长期抗战。并且建立一支中国未来新经济机构的主动轴。^⑧

这场运动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美国的埃德加·斯诺等共同发起。他们在摸索为了对抗日本进行的工业基础建设问题中逐渐认识到只有走工合运动的工业之路，才能拯救中国，便发起了这场运动。^⑨这一设想经同上海实业界、金融界、文化界人士的商定在小规模合作社引进近代生产方式。

1938 年 4 月中国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成立，浙江兴业银行总

经理徐新之任主席。接着拟定了《中国工业合作社组织计划案》，这一草案由曾赞同艾黎意见的宋庆龄、宋子文、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大使馆秘书亚力山大的帮助，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等国民党首脑的支持。^⑧工合组成计划实施中，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随时与宋庆龄商议。宋庆龄非常赞成这项支持抗战的经济计划，并出任工合的保证人，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这项运动的发起。她还通过宋子文筹集了建立工合的资金，还在自己开展的保盟工作中把支持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当作重要事项。^⑨工合的创立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武汉筹备工合总会时路易·艾黎和斯诺一同找到周恩来，商议工合组织的性质和人事分配问题，周恩来鼓励他们继续坚持这项工作，并指出工合组织的主要任务要由蒋介石的抗战来促进，并尽可能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⑩

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武汉成立。年末，工合组织机构在广州正式成立。由孔祥熙提议，曾留学美国的刘黄沛任总干事^⑪。设置了总务、业务、财务、推进、组织、技术等组。由曾任救亡运动（救国会）领导的沙千里、胡子婴担任推进组织处长、副处长。工合总会理事会由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张治中、俞鸿钧等，共产党方面的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等，还有各界著名人士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名。宋美龄任名誉董事长，孔祥熙任理事长，路易·艾黎任工合技术顾问，他为创立工合，发展工合作了很大贡献。^⑫

国民政府着眼于海外对工合的好评和来自海外的援助资金。支持小规模工厂计划的工合协会，建立促进工厂迁移的中央迁厂委员会，工厂资源开发为目的的工矿调整委员会机构和促进工业重建的3个支柱。由于日军占领主要城市，战线扩大等不利条件下召开的南京军事会议中决定放弃正规战采用游击战体制，国民政府在3个机构中非常重视工合协会。以“游击经济”为基础的小型工厂比重也大大增多。随着“3万单位的工业合作社”创建计划^⑬，

工合协会开展了实际活动。1938年夏艾黎带领一些难民到达陕西省宝鸡，全部资金由宋美龄筹措。这就是最初的工合活动，它不仅受到广大民众欢迎^⑧，许多进步青年、爱国者、国内外技术工作者、合作专家也自发加入进来。

工合成立初，宋庆龄以演讲、报纸、杂志、书信等形式介绍工合的性质、作用、也号召海外的亲友、国际援助机构、华侨、还有香港等地的权威人士援助工合事业。1938年8月15日，由5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世界青年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时，宋庆龄向大会作了播音演讲，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中国的工合运动。这场运动稳定了中国的经济，维持了内地的市场，继而拯救了荒废的乡村，使人们免遭饥饿进行抗战，世界青年向各国政府和银行家申请帮助中国并且派遣技术工作者^⑨。

1939年7月，宋庆龄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在美国纽约《新群众》杂志发表文章说：“工合是以民主的方式进行战时建设，有利于各界、各阶层大多数民众。”同年12月她又在香港作广播讲演阐明了工合的地位和意义^⑩。

宋庆龄把对工合的支援作为保盟的主要任务，经过她的努力，工合工作很快传到国内外人士当中并能很快展开工作。

工合运动最初受到国内外友好人士和援助机构资金使其得以开展，为了得到更多的国际援助，促进工合运动的发展，宋庆龄在香港发起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1939年1月这一组织正式成立。她还使香港地区的国内外著名人士加入这一委员会，并且由她担任名誉主席，香港的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陈翰笙任秘书，陈乙明任司库，斯诺、艾黎、普律德和在香港的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等爱国人士和宋子文为首的20多位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⑪。

当时普艾达女士受宋庆龄的委托到美国纽约建立了以罗斯福总统夫人为名誉会长，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雅纳尔为会长，并有百余名会员参加的工业合作社美国促进委员会，因而工合运动得到了

关心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文化界的有力支持。抗战期间这一委员会支援工合的资金已超过 300 万美元^①。斯诺夫妇受宋庆龄的委托去菲律宾成立了工业合作社菲律宾促进委员会。此后，艾黎数次去菲律宾讲演也加快了捐款筹集。至 1941 年止华侨等从菲律宾送来的援助总金额达到 200 万元^②。另外，英国的英中合作事业振兴协会和法国的国际工人组合联盟巴黎支部也提供了援助，新西兰，澳大利亚成立工业合作促进机构也给予了帮助。其他地方的侨胞和中国妇女协会的资金也按时到位^③。海外的资金援助在全部工合资金中所占的比率虽然不大^④，但对于工合却有着重要意义。至少工合有着民主主义和大众运动的机动性和自觉性。为了提高生产力有必要在政府和国家银行以外寻求财源、因为政府想以提供资金的代价试图控制工合，这也是阻止它的发展的重要对策。当时，工合虽在机构的形式上属于行政院，但工合运动不受它的约束，进行独立的无党派的活动，而且一定时期不受陈果夫指导的合作事业管理局（1939 年 3 月 5 日成立，属于行政院经济部）的约束，也是因为得到了海外的支持的资金援助的缘故^⑤。

艾黎和斯诺是从民主、民生的立场出发发起工合运动，因此不单纯是为了给劳动者提供职业，保障他们的最基本的生活，而是为了唤起他们对劳动的兴趣和作为生产决策者的责任感。这些方面都接近于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和中立民主派的主张。宋庆龄追求工合体现民生主义，认为工合对人性的恢复、经济的进步、民主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特别对生产者自己掌握领导权的大众运动有重大意义^⑥。另外章乃器、杜重远、邹韬奋等把工合作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也看到了把工合引进到边区的积极性^⑦。斯诺特别重视工合的统一战线作用。作为战争时期民主统一的基础，把它看作左右两派都能接受的建设纲领^⑧。

如果简单审视工合协会所属各区的实情和特征如下：^⑨首先五区办事处中最初建立的西北办事处（1938 年 5 月建立）的庞大

的剩余劳动力和关中的棉、延长的石油、凤县的铁、甘肃的皮革等丰富的资源不光可以用来大量生产，自给自足，也可以补充北方战场需要。作为合作社原有的运输、纺织、采矿、织布、染色等只有互相联合使效率得以提高，才引起注目。包括湖南、广西、贵州等地区的西南办事处（1938年9月建立）设立了机械、印刷等合作社与生产军靴、棉手巾、袜子、医疗器具等合作社。妇女劳动者发挥很大作用，妇女工业训练班、妇女社会福利部、托儿所等的壮大是它的特点。管辖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区的东南办事处（1938年10月建立）主要是组织难民进行纺织、制革、制糖的工合，并经营烟、火柴、食品加工合作社。以重庆为基地的川康办事处（1939年1月建立），因处于全国工合运动的中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所以政府和银行给予的支援最大，其业种是机械、化学药品、玻璃、毛毯等37个项目。云南办事处因劳动力不足仅有棉织、制粉、制革等8个合作社。^②

虽然游击队地区的工合部分属西北办事处管辖，但山西、河南和浙江、安徽游击队地区办事处却独自选定，工厂组织编成游击队形式，因为游击队的弹药、粮食等是补给性移动工业，因此小规模机械工厂、手工业工厂等设备较简单，创设起来容易。这是兵力的不断移动和性质上最适合“机械战”的工合，所以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历上做出了很大贡献。生产的产品首先是为军队，然后才是本地区民众所需的面粉、纸、皮鞋、衣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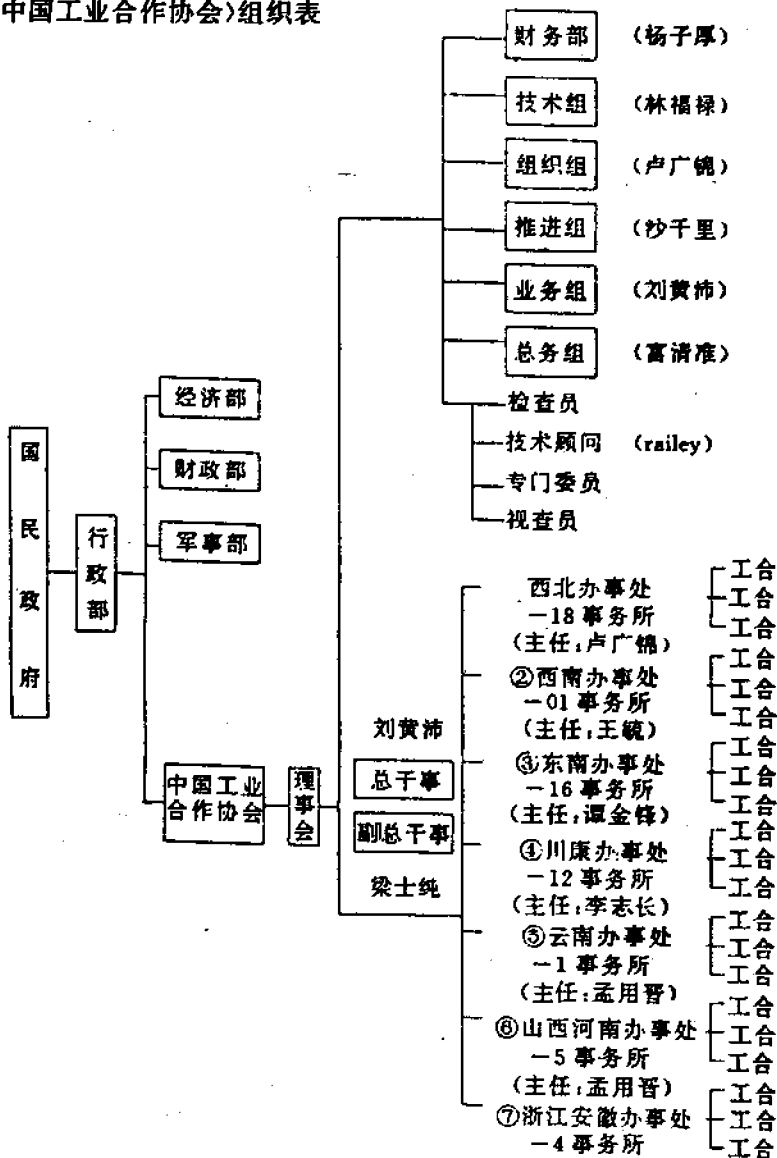
边区的工合活动起初不大活跃，但经过陕甘宁边区政府长期努力，成立了毛织品、纺织、农具、皮革工厂，农村手工业也涌现出来，并且成立了进行生产研究和资源调查的自然科学研究院，并采取了积极接受外部援助的态度。因此1939年边区生产合作社已发展为有146个县，23531名社员的组织，并不断成立制盐、制粉、造纸、精油、化学等各种工合，为后来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打下了基础^③。

工合运动受到国际上的高度评价,这一运动在统一战线方面也是非常出众的。因为它与共产党的基本战术一致,所以工合运动在边区也是非常积极的。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的成立得到了西北办事处的贷款,但重庆政府反对工合向边区扩展,终止了对延安事务所的援助。从而,这个事务所得到了艾黎从海外华侨那里筹集的资金和宋庆龄领导的保盟的援助,开始进行经营^⑧。特别是边区的工合社员有不同与其它合作社的集体所有,甚至从地主到商人都是工合的拥护者,因此可以说在经济方面,民族统一战线的机能得到充分发挥。

宋庆龄和工合国际委员会在西北办事处的工合创建时起就提供了许多经费、药品、医疗设备,并且支援了妇女工作,保健业务,医院建设。随着国民党对边区工合实行待遇差别和增加压制及封锁,宋庆龄为了解除边区的具体困难,派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去延安对工合情况进行视察,然后进行汇报。另外,艾黎又两次访问延安(1939年、1940年)参观了工合产品展览会,准备了新工合事务所的开设,帮助建立了皖南工业合作社,援助了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开设。宋庆龄和工合国际委员会检查了边区存在的困难并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促进了边区的工合工作^⑨。

宋庆龄对工合的援助最有名的要属1941年夏的“一碗饭运动”。当时,黄泛区的灾情十分严重,流浪到西北地区的难民非常之多。为了救济难民开展了这项活动。为促进这次运动,宋庆龄亲自担任名誉主席,香港的首席议员罗文锦律师担任主席,还让包括香港在内的内外人士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这场运动的募捐形式是委员会把一万张餐券按2元发出,买餐券的人到指定的食堂吃一份炒饭。人们称它为“救国饭”。它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巨大反响,并积极响应^⑩。这场运动后,宋庆龄继续坚持对工合的支援运动和对抗战的援助。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表



工合运动以 1941 年为转折逐渐衰退。其原因虽然有资金不足、通货膨胀的激化、国共对立、及工合内部的腐败等诸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上的压迫。特别是国民党地区工合所标榜的“劳动者参加经营”,把劳动者所重视的民主、革新的方向与地方地主、商人、高利贷相对立,引起他们的警惕,使他们与工合的自主倾向,民主方向发生对立^①。因此国民党统治较薄弱并得到很多外地援助的西北地区(边区)非常发达。

工合是时代的产物,是抗日战争民族统一的产物,在抗日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民族危亡的苦难岁月中,曾为战胜敌人经济封锁,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供应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尤其是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敌斗争做出过积极贡献。

“附录 1”^②

(作者工作单位:韩国釜山东义大学史学系)

注释:

① 石岛纪之,《国民党政权的对日抵抗力》(《讲座中国近现代史》6. 抗日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P. 49.

② 荣孟源 主编《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5)P. 484—488. 何俊,《一年来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1939. 9)《东方杂志》35 卷 4 号, P. 26.

③ 腹地(内地)是大后方,主要是西南的 6 个省即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和西北的 5 个省即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石岛纪之,上述论文, P. 49).

④ 述周,《抗战中的新流——工业合作社》(1939. 8)《群象》3 卷 11 期, P. 311.

⑤ 述周,上述论文 P. 311.

⑥ 路易·艾黎(Rewi Alley)《对埃德加·斯诺的回忆片断》(《光明日报》1982 年 2 月 3 日).

Edgar Snow, 《The Battle for Asia》(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41. Copyright 1972 by Lois Wheeler Snow; 森裕严译《阿美利加的战争》(筑摩书房,1988) P. 75.

⑦ 菊池一隆《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历史学研究》10. 历史学研

究会论集,青木书店,1980.10)P.31.

⑧ 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P.102—103.(三联书店,1973年版).

⑨ 郑灿辉、李鸿生、吴景平,《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P.198.

⑩ 刘黄沛毕业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他曾前后担任沈阳东北大学工学院教授,甘肃省建设厅厅长。他担任“工合”总干事时,一开始是民主派,后来他突然转变立场,将工合技术顾问路易·艾黎(R. Alley)排斥出工合。国共内战爆发后刘黄沛逃往台湾(菊池一隆,参照上述论文P.37注(1))。

⑪ 参照《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表“附录!”

⑫ 森裕严译上述书籍P.191.

⑬ 菊池一隆上述论文 P.31.

⑭ 《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

⑮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中国福利会编,人民出版社,1983.)P.75.

⑯ 尚明轩、陈民、刘家泉等编著《宋庆龄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P.116.

⑰ 尼姆·韦尔斯著 东亚研究所译《支那民主主义建设》P.89 张法祖《工合与抗战》(群星书店,1941)P.360.

⑱ 田家英《抗战中的工业合作运动》(一)《解放日报》(1941.12.8),菊池一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起源与现代的意义》(中国近现代史论集—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汲古书店,1985)P.519—520.

⑲ 尼姆·韦尔斯著上述书籍 P.260—264.

⑳ 《工合》的资金源(1940年的例)。

项 目	金 额	百分率
政府出资金	11,060,000	30.20
社员投入资金	381,388	1.04
海外的援助金	1,890,000	5.16
银行借入金	23,200,000	63.33
个人借入金	100,000	0.27
总 计	36,631,388	100.00

参照尼姆·韦尔斯《支那民主主义建设》(1942.12)P.271—273.

㉑ Edgar Snow,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London Gollancz,1960)P.222.(松

岗洋子译(自觉めへの旅行),1963,P.338.)

② 宋庆龄《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P.298。

② 菊池一隆,《抗日战争期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P.32。

② 尼姆·韦尔斯的上述书籍,P.38,P.251。

② 参照附录上的《工合协会》组织表。

② 5办事处下的《工合》状况(1940)。

办事处	事务所数	社数	社员数	资金(元)
西北	18	423	5,572	54,783
西南	10	227	2,884	12,866
东南	16	236	2,783	20,333
川康	12	464	5,862	173,615
云南	1	8	69	881
总计	57	1,385	17,170	262,480

参照菊池一隆《抗日战争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P.34-35。《宋庆龄与救亡运动》P.209。

② 菊池一隆,上述论文P.36。丁冬芳《陕甘宁边区经济研究》(《新华日报》(1940年8月14日))。

② 尼姆·韦尔斯(《Note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in China》)P.64。转引自菊池一隆上述论文,P.37。

② 《宋庆龄与救亡运动》P.205-206。

③ 1941年7月1日宋庆龄在“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强调该运动的意义:“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见刘家康《宋庆龄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P.373-377。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P.65-66。

④ 国民党特务部派内奸打进工合,抓住工合内部亲共事实,杀害工合成员。见王安娜著,藤原正英译《革命中国に嫁つた》(1975)P.309。

⑤ 沈雷春,陈禾章《中国战时经济建设》(1940)P. 31—32;董文中《中国战时经济特辑》续编(1940)P. 139—140;谢君哲《经济的新堡垒》P. 96—116。转引自菊池一隆的上述论文,P. 35。

“工合”的一种典型

——云南丽江的“工合”运动

谢本书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沿海一带工业遭到破坏，大批熟练工人被迫逃离中国东部的沦陷区，成为流落内地的难民。中国工业需要发展，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而大批难民也需要救济，以稳定抗日大后方社会经济形势，使抗战能够坚持下去。于是，“工合”运动应运而生。到1942年，全国各地的“工合”组织已发展到近3000个，社员达30000多人。^①“工合”的产品既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时期的军需民用，又帮助了难民、失业者、贫困者的生产自救。抗日战争时期的“工合”运动，其意义不可低估。

“工合”运动甚至深入到了边远的穷乡僻壤，并且在生产自救、扶助贫困、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以支持抗战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的效益和作用。在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又在云南极西北边的多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丽江，“工合”在这里也生了根，发了芽，茁壮成长起来。云南丽江的“工合”运动，是“工合”发展中的又一种典型。解剖这个典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工合”的价值和意义。

1941年，俄国人顾彼德（彼德·古拉特，Peter Goultart）受“工合”总部的派遣，来到云南丽江，开展“工合”运动，组建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上海总会滇黔区丽江合作事务所”。“丽江合作事务所”的成立，标志着“工合”运动在丽江的开始。

丽江地处云南极边，纳西族聚居之所，古“纳西王国”之地（纳

西族木化土司长期世袭统治)。在民国时期,这里仍然是一个相当落后和贫困的地区,所以顾彼得回忆说:丽江“那个地方太遥远了。可以说那个地方在中国之外,是‘边远蒙昧之地’,是沉没在甚至不通汉语的野蛮民族之中的无人之地。”^⑧

丽江是个自然风光美丽的地方,山明水净,山川秀丽,这里有玉龙雪山、虎跳峡巍峨壮观,石鼓长江第一湾气势磅礴,泸沽湖澄碧如玉;然而,这里却十分落后和贫困。贫困到什么程度?顾彼得有生动的记载。一次,顾彼得考察“工合”运动,途径一个苗族村寨时,他看到了:“苗家的棚屋低矮而黑暗,苗家女子身穿衬裙,坐在屋里,在原始的织布机上织着麻布。棚屋附近一些低矮树上,我看见有些巨大的鸟巢,我正在纳闷这些巢是什么鸟筑的,突然间我看见孩子的头从里面探出来。‘这些是我们的娃娃。’我的苗族朋友告诉我,‘他们晚上天气很冷,孩子们睡在一起取暖。’的确,他们在那里——蜷缩在干树叶中,只有一块破布打伙拉扯着。”^⑨

“工合”运动在这样的地区开展,其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顾彼得从1942年起,根据“工合”总部的指示,以贷款方式,从丽江资源优势出发,先后在丽江县城大研镇扶持组织了毛纺织、染色、皮革、铜业等手工业合作社;在丽江县农村的束河、白华、长山、黄水、良美、九河等地分别扶持组织了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毛纺织、皮革、铸铎、铁业、造纸、木器、编麦秆草帽等手工业合作社;还组织了城乡结合的合作社,如社址设在县城,却在丽江县大具乡种植桐油的“大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直到1949年夏天,丽江还有45个工业合作社。^⑩至于极盛时期,究竟组织了多少个合作社,因无精确统计,已难于回答。值得注意的是,“工合”运动在丽江组织的工业生产合作社,差不多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里我们不妨举几个合作社为例,加以简要说明。

1. 毛纺织合作社

丽江的工业合作社,是从毛纺织开始打开局面的。据顾彼得回

忆，在丽江的工业界，“最伟大的事件就是我引进的毛纺车。”在这以前，这里群众对毛纺车毫无所知。顾彼得组织毛纺织生产合作社后，用他随身带来的毛纺车模型，很快做成了“一架真正可用的毛纺车。它所引起的轰动，可能与古代建造第一辆战车引起的轰动一样大。它被成百的人复制再复制，不断制造，有的有所改变，有的一成不变。不到几个月，全城都在疯狂地纺毛线了。”丽江从西藏进口的羊毛，过去每年不过百多包，毛纺车推广后，“上升到每年两千多包。羊毛编织品的订货单，从昆明、拉萨，甚至从重庆，像雪片似地飞来。”贫困落后的丽江，这时却成了“云南省毛纺工业的大中心”了。^⑥

毛纺织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及其取得的巨大效益，为“工合”在丽江的开展，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2. 铁矿合作社

顾彼得在丽江地区组建的工业合作社中，以距离丽江县城 60 多公里的纳则铁矿合作社规模最大，有 43 名社员，包括纳西族、藏族、普米族、苗族和汉族成员。“这个合作社以这样的成员成份存在了许多年，确实是个奇迹，在多民族合作方面，这又是个非凡的试验。”^⑦藏族和纳西族社员负责挖矿，普米族社员负责烧炭，苗族社员负责打铁，汉族社员只有一人，负责购买食品和承担杂务。他们生产的生铁，卖给犁铧合作社和其它几个铁匠，有的还出售到鹤庆、剑川和下关，去铸造铁锅、铁钉、马钉、刀和镰刀等产品。他们合作得相当和谐和有序。

3. 造纸合作社

顾彼得建立的另一个生产合作社是纳则造纸合作社，社址在海拔高达 4000 多公尺的高山上。这个合作社有 8 名社员，其中有纳西族和来自四川的一名技术员。造纸原料是一种山竹，即满山遍野生长的野芦苇。由于生产工艺比较简单，生产出的纸呈黄色，较厚，粗糙得不宜于写字，却可以用来接生婴儿，能起到卫生毛巾的

作用。由于这个合作社地势甚高，所以有一个绰号叫“云霄合作社”。^⑤

4. 奶牛合作社

顾彼得建立的最远的合作社在洱源，是一个奶牛合作社，距丽江县城约 120 公里，社员以白族人为主，有 20 人。这些社员是庄户人家，有自己的奶牛，合作在一起进行生产牛奶。顾彼得从美国运来了一个奶油分离器，捐赠给了这个合作社。白族的木匠合作社为奶牛合作社做了一个非常可靠的拌乳器，奶罐和其它容器则是由铜器合作社制造的。顾彼得在这个合作社住了一个多月，教社员们“欧洲式的制奶油工艺。”不久，合作社每天制造的奶油达到 50 磅之多，用小桶装好，到昆明出售。“生意兴隆，发展大有前途。”^⑥

5. 皮革合作社

顾彼得在丽江县城组建的皮革合作社，由 23 名纳西族青年社员组成，年龄从 18 岁到 25 岁之间，只有一名管理员为 38 岁。由于社员年轻，被当地人称为“娃娃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之初，他们只会鞣制一种非常粗糙的皮革，做成的女鞋不方不圆，像个马铃薯，既不好看，也不好穿。为了提高技术，顾彼得选送一名社员去重庆一家真正有水平的上海皮革厂培训，小伙子在重庆学了两年，然后带着大量化学剂品和器具回到丽江。不久，皮革合作社就能生产各种不同规格和样式的皮鞋，式样美观，价格低廉，颇受欢迎。他们甚至“造出那时伦敦庞德街和纽约第五街所穿的皮鞋的完美的复制品，而价格只有那些皮鞋的二十分之一。”他们还生产高级马靴、皮球、左轮手枪皮套、军用皮带等，于是皮货定单源源而来。“几个月内丽江经历了一场相当可观的服装变革，城里的和乡下的男子简直都得穿上闪闪发光极为漂亮的黑色和棕色的最新式皮鞋，为了与鞋子相配，他们也要定漂亮的西式皮裤。”^⑦合作社的皮革产品还销往保山、下关、昆明以至西藏等地。直到今天，丽江的皮革产品仍享有盛誉。

云南丽江“工合”运动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样,“衣服褴褛的学徒社员现在成了富裕而重要的公民——吃得好,穿得好,受邻居和朋友们的尊敬。”^⑨

云南丽江“工合”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和明显效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说明了“工合”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兴起是必然的和有生命力的,它适应了长期抗战的需要,适应了生产自救和发展大后方经济的需要,这是首要的原因。第二,“工合”在丽江扶持组织生产合作社,有社章社规,进行民主管理,并建立了完善的组织(例如建立监事会和理事会),有一定的办事规程。难能可贵的是,每个合作社的第一笔贷款(一般只是200—500元的银元),由于经济效益好,又有章可循,因而“偿清贷款,毫不困难”。而且,在还贷方面,顾彼得“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⑩这是很不容易的。第三,组织合作社从丽江资源优势出发,又采取简便易行的管理方式,保证了合作社得以顺利发展。例如,社员们住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饭,平时不领工资,到年终按工作实绩分红,领取报酬。这就保障了贷款首先用于生产。而且分红时留有公积金和公益金,公积金用于发展再生产,公益金用于支付社员的婚礼费用,这对社员是很大的鼓励。第四,“工合”还注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请进技术人员传授先进技术和工艺,或派人到先进地区学习先进技术和工艺,如派人去重庆,成都学习皮革加工技术,派人去上海学习染色工艺,派人去福建长汀学习造纸技术,派人去甘肃山丹工艺学校学习等。这对于提高丽江生产合作社的产品质量,促进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丽江的“工合”运动,对丽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认为,丽江“工合”的发展,是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等人领导的“工合”运动取得成就的一个缩影,一种典型。

二

进一步说，“工合”运动还为近代丽江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丽江正是在“工合”运动中，开始了自己近代工业发展的历程。

为了进一步发展丽江的工业和经济，认真总结丽江“工合”运动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为此，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与加拿大温哥华西门弗雷泽大学国际交流中心联合确定了一个课题，题目是：《云南丽江“工合”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前景》。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总结“工合”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丽江进一步发展工业合作社的报告。报告认为，作为中华国威国力高扬的一根威力无比的杠杆，“工合”一开始就显示出强大生命力。丽江是中国“工合”运动崛起最快的地区之一。继承“工合”打下的基础，借鉴“工合”的经验，丽江工业近年来得到了新的发展。到1991年底为止的统计，丽江全县有“工合”性质的乡镇企业60个，占全县工业企业数的82.2%，工业总产值4629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1.43%。研究结果表明，“工合”是中国传统的低发展地区的农村实现工业化的一种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农村快速走向现代化的一条最好的途径。^⑩“工合”的经验，在新形势下，正在发扬光大。

（作者工作单位：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

注释：

① 转引自刘家泉：《宋庆龄传》第37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 （俄）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第10、285、277、99、278、290、293、294、295、105页，李茂春中译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⑫ 参见中加联合研究项目：《云南丽江“工合”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前景——发展丽江工业合作化调查报告》，铅印本。该报告未注明印刷日期，由云南社科院中加联合课题组印。

抗战时期宋庆龄反法西斯 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初论

王 蔚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的长期斗争中所赢得的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由衰弱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抗日战争胜利的取得，与中国本身所具备的各种因素固然有关，同时也是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援分不开的。可以说，中国抗战的胜利，也就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在建立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宋庆龄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崇高的国际声誉，长期坚持不懈地积极地从事建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宣传舆论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制止和反对法西斯是中国 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任务

本世纪 20 年代起，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不断激化，现代文明社会的恶性毒瘤——法西斯制度先后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粉墨登场，随之而来的战争、屠杀和奴役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临着苦难的深渊。在这危急的时刻，宋庆龄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站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暴行的最前列，对法西斯的危害性、反动性进行无情的揭露。她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不论是德国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还是日本法西斯，都是人类最大的危险和敌人。它们虽然在不同的地域横行霸道、侵略扩张，但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受到了摧残。因此，制止和反对法西斯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任务。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 1936 年 8 月，她

就委托钱俊瑞到即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呼吁：“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不但要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还要反对日本军阀、财阀的法西斯主义。”宋庆龄认为，为了制止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法西斯暴行，必须有联合行动，要把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人们组织起来。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上，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的斗争“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休戚相关。全世界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法西斯，反对压迫和剥削，挣脱自己的奴隶地位。”^①

抗战全面爆发后，宋庆龄更加积极地从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宣传舆论工作，她呼吁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法西斯主义对全世界的战争威胁。她指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威胁着中国的独立，而且也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人类和平与自由。”^②宋庆龄通过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和世界法西斯势力对各国人民的残酷迫害，指出它们乃是人类的公敌，全人类都有义务加以制止。她指出，在世界范围内，“疯狂的法西斯侵略者想要拉回人类进化的历史，要用兽性的野蛮来代替人类的文明，要用中世纪的奴隶制度来束缚全世界的女性。日本强盗在东方，德意法西斯蒂在西欧，都已经充分地表曝了他们的企图和手段。我们不能让这些兽性的疯人支配全人类的命运。”^③为此，她呼吁全世界被侵略被压迫的人们团结一致，打倒法西斯强盗，为全人类的理性与幸福而战，为解放与自由而战。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 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庆龄在抗战初期，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途径，在发表的大量文章、讲话和函电中，反复论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它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宋庆龄明确指出：“中国不

仅是为了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中国正在进行一个对于全世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④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争取国家生存、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也是在全世界制止法西斯暴行、保存民主、争取人民权利的战争。中国的抗日战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性地区”，甚至，“是有决定性的一个地区”，并明确指出：“一个自由中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一个自由中国将是全世界向和平与自由迈进的第一和重大的步骤。”^⑤中国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对黑暗的伟大斗争发展为公开战争的战场之一。”“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仍然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前卫。”^⑥“她一直是全亚洲的伟大屏障，阻止了日本法西斯统治这个占世界人口半数的地方。”^⑦

1941年10月，宋庆龄在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战争是远东局势的关键，并且不仅限于远东。我们的继续抗战保障了太平洋两岸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未来。它的国际的重要性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估计出来：它使日本在南方不能攫取英美的属地，在北方不能进攻苏联。”^⑧宋庆龄还以中国坚持抗战的情况同英、法、美曾经竭力推行的对法西斯主义的绥靖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加以对比，强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巨大贡献，指出：“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一样地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⑨

宋庆龄指出：“我们的民族革命，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开始的抗战的推动下，已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的革命兼有解脱美国殖民地地位的美国革命和摆脱旧政权的法国革命的成分。”“只有在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完全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之后，中国巨大的生产力才会解放出来，使整个世界受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是全人类进步的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步。”^⑩宋庆龄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抗日战场的客观公正

的评价,有助于各盟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战场地位、作用的全面、正确认识,促进了中国与各盟国之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

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 主持正义、坚持进步的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援

抗日战争是弱小的中国与强大的日本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其艰巨性、长期性是不言而喻的。需要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大力援助。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救济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实际上,这一组织的诞生,就是宋庆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体现。宋庆龄领衔发表的《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明确表示,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①依据这样的目标,宋庆龄领导保盟大力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出版刊物、发表演说、接待来访者,向国际社会和海外华侨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意义及困难,呼吁援助。“保盟”出版的20余种宣传品、一年一度的工作报告和各种小册子广泛发行到了欧美和东南亚各国,对联络国际、沟通信息,帮助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和需要,动员他们以捐款及最急需的物资支援中国抗战,起了重大的作用。宋庆龄在《告英国民众书》中指出:“为了制止侵略势力的猖狂,没有比帮助中国抗战更好的办法了。”^②她在《给外国机构的一封信》和《给国外朋友的一封信》中呼吁各国友人继续不间断地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更多的物资和资金的援助,“千万不要放松你们过去为中国所做的努力,并且要继续下去甚至加强这种努力”,“不减少一分力量,一直坚持到我们的胜利——也即是你们的胜利为止。”^③

宋庆龄在呼吁国际援助方面的一个特点,是其着眼点非常广

泛，她既努力争取盟国政府的同情与支持，也积极求得各民间友好团体的捐助，既重视对各国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的工作，也注重对下层人士和劳苦大众的宣传，更重视对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的动员与沟通，成为联系和沟通国际援助的桥梁和纽带。

宋庆龄在呼吁国际援助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她强调，中国人民欢迎外援，但是决不一切依赖外援，我们决不放弃独立自主的神圣原则，“只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至哭哭啼啼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为我们的国家和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¹³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崇高民族气节。

援助是相互的，中国的抗战既 保卫了自己，同时也帮助了援助者

宋庆龄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以及他们血腥的和非人道的破坏行为不仅威胁着中国的独立，而且也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自由。因此，中国人民的抗战，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也是为了全人类而战斗。中国的抗战既是为了全人类而战斗，那么，中国人民就有得到世界人民支援的权利；世界人民帮助中国，实际上也就是帮助他们自己；中国人民在接受帮助的同时，也意味着帮助了提供帮助的国家和人民。在此，宋庆龄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帮助他们自己——并帮助你们。”¹⁴

宋庆龄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应该互相支援。她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呼吁：请你们援助中国，“我们有权这样要求你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而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的、强大的和民主的中国，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¹⁵她

在香港演说时指出：“……我们看到每次日本在中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它就加紧进攻太平洋的英国和美国的据点。如果中国投降，如果中国不战而沦为日本法西斯军事机构的一个物资供应基地和人力补充站，那么，请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在香港安静地坐在这里吗？”^⑧因此，中国人民既是“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全人类，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又明确指出：“今天，盟国的力量与中国自己的力量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击日本。中国战斗得越有力量，对日战争就越会缩短，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越会减少。所以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休戚攸关。”^⑩

她不仅清醒地看到了中国抗战对盟国的意义，而且也充分估计了盟国作战对中国的意义。1938年6月6日她在《苏联的和平政策和苏联的对华援助》中指出：“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是保障苏联、对付侵略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正如苏联以策安全的自卫武力，是中国抗日救国斗争的重要因素一样。”^⑪在此，她把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及其援华反法西斯的努力看作中国抗战的胜利因素，反映了她敏锐的国际战略意识。

在论述相互援助关系时，她更重视中国与各盟国间平等与民主关系的建立。她认为1943年1月中美、中英之间分别签署的关于取消美英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的条约与换文，展开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有利于打败法西斯和维护世界和平。^⑫

宋庆龄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 战线思想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第一，宋庆龄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需要，是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尽管在宋庆龄开始大声疾呼和从事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时候，一些所谓的世界“强国”、“大国”，从狭隘自私的阶级和国家利益出发，玩弄慕尼黑阴谋，企

图以出卖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小国家的利益来换取和求得一时的安宁，但最终被证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时间和事实促使这些国家逐步清醒，并终于站到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中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援助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宋庆龄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向美英两国人民和政府呼吁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成平等的反法西斯盟国关系方面，在舆论宣传上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

第二，宋庆龄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做出的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遥相呼应、协调一致。

1935年7月至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包括中共代表团在内的65个共产党的5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的重要议程是正式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共产国际的这一战略转变得到了各国共产党的积极响应。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明确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取得国际援助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②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了对苏联的猖狂进攻。次日，毛泽东在《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中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③

1942年元旦，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宣言》

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的舆论宣传工作始终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保持一致，而且由于她的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她的观点和见解往往能起到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第三、宋庆龄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舆论宣传工作，为中国的抗战军民，特别是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抗战中坚——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赢得了宝贵的物质援助，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宋庆龄的大力宣传呼吁下，诸如美国援华会、中国人民之友、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伦敦医药援华会、法国巴黎的中国人民之友等等一大批团体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仅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以金钱（不包括物资）捐助中国抗战的就有遍及美、英、法、加、澳、新、印等各国的社会团体100多个，以及无数的个人。大批的物资、金钱、医疗器械及药品被送到了最需要它们的人民抗日武装手中，并涌现出了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那样援助中国抗战的优秀国际主义战士。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初，各地华侨的抗战捐款即达26亿元，此外，1939年前后，保盟还获得了各国朋友的抗战捐款达约40万港元。^①一个以国际和平医院、前方流动医疗队和医科学学校为骨干的效率很高的医疗网在北方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这一切说明，宋庆龄的国际舆论宣传工作取得了明显的实际效果。

宋庆龄的功绩，正印证了著名的反法西斯战士、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评价：宋庆龄不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更是“一头名副其实的方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注释：

① 参阅《宋庆龄纪念集》钱俊瑞文，《痛悼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宋庆龄》，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抗战联合旬刊》第四期,1937年10月,转引自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第404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8月版。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22,375,376,381,284,231,386,378,266,381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① 《宋庆龄选集》第123—124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⑤⑥⑧⑩ 《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3,7,13,1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⑫⑳ 参见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第402,108,412—413,418,414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⑲ 转引自《宋庆龄诞辰百周年学术论文集》第229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㉑ 参见爱泼斯坦《宋庆龄》第374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⑳ 参见尚明轩等《宋庆龄年谱》第134,138—1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㉒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49,764页。

宋庆龄在抗战中的国际宣传

陈日浓

当人们回首二战和抗战的历史时，都会以崇敬的心情怀念那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人类的和平而奋斗的杰出人物，其中之一就是宋庆龄这位巾帼英杰。在她光荣的一生中，抗战期间是她生命中相当辉煌的一段历史，她虽然不是军事家，但却以特殊的身份和活动，作出特殊贡献，成为伟大的世界和平战士和出色的国际宣传家。

一、突破新闻封锁，承担国际宣传的历史重任

宋庆龄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为争取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作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仅就新闻舆论及国际宣传方面来看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国内她为争取人民的民主、争取新闻出版自由、唤起民众、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去夺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在国际上她真实传播中国人民抗战实情，让国际友人了解、同情与支持中国的反侵略正义事业；沟通中国人民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与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实现人类和平。

中国的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极为重要的东方战场，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理应在军事上、政治上相互了解相互支持，但由于日本的破坏和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当时中外相互了解与支持十分艰难。此时宋庆龄以崇高的名望和丰富的经验，在中外之间架设了相互了解、相互支持合作的桥梁，起到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当时中国的新闻舆论界及国际宣传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宋庆龄又怎样开展新闻舆论斗争呢？

宋庆龄在1962年撰写的《真实报道的传统》中，曾简要回顾当时的复杂形势。她写道：“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十分复杂。人民要求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闻名的敌后游击根据地为例，一致奋起，拿起武器，把残酷的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但是国民党害怕人民武装起来。……它处心积虑，妄图实现其摧毁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根据地的梦想，而另一方面，对日本侵略者作战则采取消极态度。”

她在文中接着分析：“这就是那些年代里中国局势的真实情况，然而，这种情况是决不允许向世界各国透露的。国民党对于新闻报道和新闻发布实行严密的检查。同时，它又花费大量金钱来涂抹一张抗战的画皮，把我国的实况按照它的版本予以传播。当时，许多外国的新闻机构和记者往往甘愿充当那种“新闻”的忠实的传声筒。少数正直的记者发布的真实消息反而常被湮没在歪曲报道和纯粹谎言的洪流中。”^①

在面临这么复杂、艰难的背景下，宋庆龄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机智灵活的国际宣传策略，以大无畏的精神，克服重重的困难，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把中华民族的正义呼声，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业绩，通过多渠道、多媒体，真实及时地向全世界传播，争取各国朋友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同情与支援，并相互支持，共同努力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二、灵活多渠道地开展国际宣传

综观宋庆龄在抗战期间致力于新闻传播与国际宣传的活动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是建立自己的传播阵地——创办保卫中国同盟的对外刊物《新闻通讯》；其二支持进步刊物；其三团结依靠一批有正义感与同情支持中国的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其四利用外国传媒——电台、报刊、包括一些灰色，甚至反动的报刊。宋庆龄之所

以采取这些灵活、多渠道的新闻活动，一方面是基于中国人民斗争的需要和客观上存在的复杂局势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是她本人特殊地位和才干，她是孙中山夫人，是中外瞩目的政治活动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威望，是著名的和平运动先驱。她留学美国，了解西方文化，又擅长英语写作，且结识不少外国朋友，这都为她开展国际宣传提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1. 《新闻通讯》——国际宣传的重要阵地。

宋庆龄在抗日战争中的特别贡献是于1938年在香港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这个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相结合的进步团体，大力呼吁和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特别是对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援助，同时又承担起国际宣传的重任。她说：“保卫中国同盟不但在为中国的斗争争取国际同情、为前线与敌后的战士争取援助方面负起责任，并且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②为此在宋庆龄亲自指导下，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刊物——《新闻通讯》。

《新闻通讯》创刊于1938年后期，开始是一份油印的简报，1939年4月在香港第一次印刷出版，到香港陷落前不久的1941年11月停刊，先后共出版了36期。宋庆龄邀请进步的外国记者贝特兰·爱泼斯坦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在最后一年的增刊中，还增出了中文版，由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和金仲华担任编辑和撰稿，以争取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抗战的了解与支援。关于刊物的内容，宋庆龄回忆说：“我们运用各种方法，通过中英两种语言，说明了哪些地方真正进行着对敌斗争，我们刊登了描绘中国人民在战场上和在自力更生的生产运动中英勇战斗的生动报道；此外，我们还揭露了那些贪污腐化背信弃义的人们，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来破坏这一场光辉的事业。”^③

《新闻通讯》是宋庆龄在抗战时期创办的唯一的刊物，她为之倾注了许多心血，使这个短小精悍的刊物造成了广泛的对外影响，

为中国开拓对外传播事业留下可贵的一页。

宋庆龄先后为刊物撰写了8篇文章和评论,起了定下刊物主要方针和基调的作用。她通过刊物,高瞻远瞩地向国外朋友阐述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关系,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关系。她指出日本的侵略罪行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也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自由,因此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中国不仅是为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中国正在进行一个对于全世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她还指出:“中国的民族抗战,是为保卫全世界的民主而战”。“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其中一个公开的战场。”而且“中国人民绝不会投降。他们正在为自己也为世界各国人民而战斗着。”^⑧与此同时她反复强调,中国的反侵略斗争需要国际的援助,但是世界人民帮助了中国,也是帮助他们自己。保卫中国同盟的响亮口号就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帮助他们自己——并帮助你们。”^⑨从而把争取援助的工作提高到国际主义的高度,成为共同维护人类进步与和平的伟大事业。

在宋庆龄的亲自指导下,《新闻通讯》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良传统,它有着鲜明的立场,为团结抗战服务,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为此它勇敢捍卫真理,致力于报道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尤其被封锁的敌后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敌的情况,这就是“真实报道的传统”。刊物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善于组织外国友人,以其在中国各地前方与敌后的亲眼目睹的经历,写出具体生动的报道文章,非常有说服力。特别是《新闻通讯》上开辟的“战地报告”栏目上,就有许多这样生动活泼的文章,如马海德大夫对诺尔曼·白求恩的回忆,伊文思·卡尔逊上校介绍他访问新四军的经历等,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正如该刊英文编辑爱泼斯坦所回忆的:这些文章“它并不是用一般的言词来要求人们给予支持,而是用那些在战地做实际工作的人们写的报告,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感到

那些取得成功、存在的问题，那种有创造性的战胜危险和困难的情景都是他们自己经历的事。”因而中国人民的斗争令人信服地取得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

这批国际友人的作者队伍中有不少知名人士，除马海德、伊文思·卡尔逊外还有英国的乔治·艾尔温·霍格、希尔达·赛尔文·克拉克夫人、路易·艾黎、詹姆斯·贝特兰、凯塞琳·霍尔、弗里茨·詹森、罗尔夫·贝克尔等等。

保卫中国同盟出版的《新闻通讯》及其他小册子，广泛发行世界各地，对沟通信息，帮助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真相和需要，争取他们的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援，起了重大作用。而且《新闻通讯》也为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2.《中国评论》、《中国呼声》——正义之声

宋庆龄在30年代曾热情支持这两份进步的英文刊物，使其能在国民党统治区伸张正义，反映人民要求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呼声。《中国评论》的主编是伊罗生，他出生于美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30年到中国，在上海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大陆报》任记者，他深入中国现实生活后，尤其在九·一八后，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对中国人民的斗争深表同情，思想倾向于革命之后，他接受共产国际委托，帮助中共工作，于1932年1月13日创办了《中国论坛》，直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是党在白区的一份外国报纸，经史沫特莱介绍，伊罗生结识了宋庆龄。1933年宋庆龄创立民权保障同盟，他成为同盟的中央执委。宋庆龄还派了两位秘书史沫特莱和陈翰笙协助伊罗生办好此报纸。《中国论坛》热情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并配合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同盟的文件材料，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进行及时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宋庆龄曾利用这份报纸，发表重要文章，如她在《中国论坛》第3期上刊发了《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上的讲话》分析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揭露蒋

介石不抵抗运动，提出武装人民团结抗击日本侵略者，宋庆龄1933年8月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会议上的声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她在上海反战大会上的演说——《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均是在《中国论坛》上发表的。文章阐述了面对帝国主义挑起战争的灾难“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她还指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⑧这份报纸由于凭借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理的执照得以公开存在。在民权保障同盟停止活动半年后，它才停刊。虽然后来伊罗生转向托派，与中共中央决裂了，但该报在当时为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奋斗起过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事实。

宋庆龄支持的另一份英文报刊是《中国呼声》。1935年美国友人格兰尼奇夫妇到上海后，结识了宋庆龄、鲁迅，他们很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义斗争。为此宋庆龄请他们出面，创办了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主要是宣传人民的抗战，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宋庆龄对他们给予热情鼓励、指导，中共地下党也通过宋庆龄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宋庆龄亲自为这刊物搜集材料，约请一些知名人士谈对局势的看法。不少进步的国际友人也在此刊物上写文章，支持中国抗战，在宋庆龄的关怀下，《中国呼声》在国际上起了很好的作用。

3. 利用国外传媒传播中国抗战的真相，争取国际的了解与支持。

在国民党实行新闻封锁的情况下，这是宋庆龄开辟国际宣传所采取的又一种灵活战术。正如她自己回忆所说：“由于我站在中国人民一方面，因此我向广大群众说话的一切途径都被封闭起来了。出版和广播都完全操纵在反动派的手里。”她说自己写的文章许多是以外国读者为对象的，“主要是我在中国通过英文报纸和其他国内外可资利用的媒介写给英美人民的。”她还说“当我的意见必须传播得越广越好的时候，我就只好依靠外国报刊和其他外国

的媒介了。”“这种公开的传播方式有时也使得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途径而听到。”

如1935年1月，她通过美国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刊发了《向美国朋友的呼吁》，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在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瓜分中国的惨象正在我们眼前可怕地出现，并将导致世界性的战火。”^②宋庆龄的重要文章《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就是1937年8月刊发在美国纽约《论坛与世纪》杂志上的，该文精辟地分析了中日的力量对比，批判了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的悲观论调，指出日本的武力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国共合作之绝对必要”，“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中国是不会孤立的，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的同情”^③宋庆龄写于1937年12月的《告英国民众书》是刊发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的，文章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并指出中国团结抗战也是为全世界和平事业，为反对法西斯与反对战争而奋斗，帮助中国，“便是避免明天的世界大战”。^④1941年10月写的《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是刊发在美国纽约《亚细亚》杂志上的，1944年2月《致美国工人们》则是通过美国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的，1944年3月《孙中山与中国民主》是为向美国广播而写的。宋庆龄正是巧妙地运用国外的许多新闻媒介广为传播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并将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罪行揭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以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致，支持中国抗战，也支持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

4. 宋庆龄善于团结一批国际友人特别是一些进步的外国记者、作家。通过他们在国际舆论上，传播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和抗战真相，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法西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在帮助中国的国际宣传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史沫特莱是宋庆龄较早认识的国际友人和记者。她出生于美国的工人家庭，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1928年以后，史沫特莱先后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支

持中国革命斗争，深入采写许多抗战的新闻报道。她曾作为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协助宋庆龄支持进步报刊，1938年秋，在新四军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史沫特莱奔赴皖南采访新四军。后来她将信写在白手绢上，由沈其震经上海去香港会见宋庆龄争取援助。宋庆龄看了信说“艾格妮丝（即史沫特莱）的报道我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已读过，你们缺医少药的情况我是知道的”。这次会见使新四军得到了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的药品等救济物资的支援。史沫特莱写过很有影响的书籍，有力地支持中国的正义斗争，如1934年出版了《中国的战歌》以及采访朱德写成的《伟大的道路》。

斯诺的陕北之行和由此诞生了震惊中外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舆论上的历史性突破，而斯诺的成功又与宋庆龄的帮助是密切相关的。1931年1月斯诺曾去上海找宋庆龄请求协助联系去陕北考察，斯诺回忆说：“那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9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这彻底唤醒了我为记者的本能欲望。”“我请她帮助我，以便到红区以后起码作为一个中立者的待遇，而不被当作间谍。”宋庆龄经过地下党与陕北取得联系，不久获得中共中央的来信：“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随后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1936年6月斯诺与马海德终于得以秘密进入陕北，斯诺的陕北之行的硕果是完成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使世人第一次了解中国共产党长征的英雄业绩和抗日的主张。

宋庆龄又一位好友是新西兰记者，作家詹姆斯·贝特兰，他原是新西兰的教师，1937年来远东旅行研究，同年由北平秘密前往延安，访问了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问题。在1938年——1939年间任英国《每日先驱报》和《曼彻斯特卫报》驻华特派员，此后参加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为中央委员，与爱泼斯坦一起负责保盟的国际宣传，编辑出版《新闻通讯》。他深入抗战前线与后方，采写了不少好文章，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介绍了中

国人民抗战的业绩，有部分战地报告文章就刊发在《新闻通讯》上，如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穿越中国战场，随救护车赴西北的行程》、《同日本摊牌？》、《纪念白求恩》、《日本在华北的进攻》等。他还有数部关于中国抗战的专著，如《西安事变真相》、《华北前线》、《战争阴影》等。宋庆龄非常欣赏贝特兰写的文章，曾给他写信说：“你的文章写得好极了，读来令人精神振奋，我非常欣赏。”并鼓励他继续报道中国抗战。“你一定要回到这里来继续写下去！我极力主张你致力于报道赵妈妈的情况，她是中国的游击队之母。既然你特别要报道中国抗日游击队的情况，那么，写赵妈妈是最合适不过的了。”^⑧贝特兰的这些对外真实报道无疑对国际朋友了解中国支持中国起到积极的作用。

团结在宋庆龄周围的还有一批进步的国际友人如路易·艾黎、马海德、伊文斯·卡尔逊等人也写过不少介绍与支持中国抗日斗争的文章、著作。

三、新闻活动的宗旨与风格

在抗战时期宋庆龄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新闻舆论及国际宣传工作，有其明确的宗旨、鲜明的立场观点及自己的特色、传统、风格。

1. 明确的宗旨：宋庆龄在这时期所开展的一切新闻与国际宣传工作，都是作为她致力于民族独立解放和人类和平进步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为夺取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服务。正如她在《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所回忆的当时创建保卫中国同盟的宗旨在于“积极参加了争取民族生存的尖锐的斗争，积极参加了反抗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的斗争。”^⑨

宋庆龄的新闻活动对国内旨在唤起民众、团结抗战。对外的国际宣传则在于真实报道抗战，争取国际的了解，同情与支援并沟通

与支持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

在当时国民党实行新闻封锁，而我党又尚无法大力开展国际宣传的情况下，宋庆龄特别致力于国际宣传“为中国的斗争争取国际同情”“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她还说“我们把报道实际情况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⑨为此创办了《新闻通讯》。

对外真实报道中国情况最突出的事例是宋庆龄通过保盟的《新闻通讯》，最快地向世界传播了国民党阴谋制造的皖南事变的真相。宋庆龄在抗战中极力促进了国共合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对支持中国的统一从不动摇。我们对任何危害中国团结的事物坚决反对。”宋庆龄对皖南事变的揭露，使得“世界各地有许多人是在保卫中国同盟的《新闻通讯》上第一次知道了1941年的皖南事变，那正是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最严重的时刻，而国民党竟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总部进行了罪恶的伏击与破坏。”^⑩但宋庆龄一贯主张团结一致来拯救国家，所以以后仍然致力于反对分裂，加强团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宋庆龄在国际宣传中，充分表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反复宣传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要求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而这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她站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人类和平进步的前列，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不懈的努力，为此她发表了许多致世界人民、国际友人的信件，广播和文章，历史已证明由于宋庆龄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在抗战期间，架设起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相沟通相联结的重要桥梁。

2. 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唤起民众。抗战的最大力量在于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团结，但是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与消极抵抗的政策相应的是限制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为此宋庆龄与一切进步人士一起开展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人民

争取民主，争取言论出版自由，从而唤起民众团结抗战。她在不少文章中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及控制新闻工具的目的在于为反动统治服务的阶级实质，明确指出：国民党当局不仅将出版和广播都完全操纵在自己手里，“对于新闻报道和新闻发布实行严密的检查，”同时又花费大量金钱来为自己涂抹一张抗战的画皮，按此版本进行传播。

为了让人民了解真相，以唤起民众，团结抗战，必须争取民主，争取言论出版自由，以免真实的消息和人民呼声“被湮没在歪曲报道和纯粹谎言的洪流中”。在1933年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宋庆龄就提出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她甚至明确说：“民权保障同盟是倡导和保卫出版自由的”。她还说：“我认为一个坚强而勇敢的新闻界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来在舆论方面兴起一个有利于自由和正义的潮流。”“实行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就可以唤起群众。”这将成为抗战中不可征服的力量。”

3. 对外传播的真实传统。正是针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的造谣、歪曲及新闻封锁，宋庆龄对进步的报刊，尤其对外传播提出“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反映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和抗战的英勇业绩。这点在她指导下的《新闻通讯》树立了优良的传统。以至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她在创办新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时，还强调说：“出版《中国建设》来继承并发扬它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所建立的、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她还认为这也是“忠诚地为真理效劳。”

4. 国际宣传的特点与文风。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虽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区别，国际宣传有自己的特点与要求，这点宋庆龄是非常清楚并树立了楷模。她曾说过：“我所发表的文字许多是以国外读者为对象的。”这提出国际宣传非常重要的原则是针对不同于国内的“国外读者”，使他们了解中国情况，并了解中国的斗争与各国人民争取安全与幸福的密切关系。国际宣传要善于用事实。早在

创办保盟时她就提出要弥补与改变过去的一个工作缺点“缺乏事实以进行宣传”，要给宣传工作者“取得有关资料”，特别是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

宋庆龄的文章都有自己的风格，她不仅爱憎分明，观点立场明确，深入分析，以理服人，而且文风技巧生动活泼。周总理对宋庆龄的文章独特的风格作过很高的评价：“宋庆龄的文章说理清晰、语言新颖，是亲自动手写的，这种作风和文风很值得学习。”

这都表明宋庆龄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国际宣传家，她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善于写作，特别是擅长英文写作，因而在抗战中留下不少浩然正气，传播于世界的名篇佳作，成为她伟大事业一部分，铭记在中国人民以及世界爱好和平、友谊的朋友们的心中。

（作者工作单位：《今日中国》杂志社）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6、376、376、375、376、376—377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3、378、137、145、198、219、228页。

抗战时期的宋庆龄与国际友人

张爱荣 宋春燕

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始终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她以自己在海内外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积极争取世界进步力量支持中国人民伟大的反侵略斗争，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她无愧为英勇的民族斗士和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二十年代末期，国际上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延续了三、四年之久，使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日益尖锐。中国一直是美日英三国激烈争夺的焦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成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工具，其对外妥协退让，对内镇压革命力量的政策，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行动。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矛盾，悍然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蒋介石奉行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侵占了东北全境，使无数同胞呻吟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宋庆龄主张积极抵抗到底，她曾多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略中国，除了其帝国主义本性之外，国际上是由于英美政府的纵容，国内则是由于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内战，国力被削弱的结果。”^①在中华民族面临亡族亡国危险的关键时刻，宋庆龄先后辗转上海、香港、重庆从事救亡活动，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波，为动员广大民众投身于

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疾呼；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批评英、美等国对中日战争的“不干涉”方针，呼吁各国大力援助中国抗战，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她那坚定的革命精神，渊博的学识，高尚的风格赢得了国内外进步好友人士的爱戴和崇敬，唤起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日运动的支持，促进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宋庆龄与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所起到的宣传作用

宋庆龄曾多次指出，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还要争取国际正义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为了向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深入了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使世界大多数人民深入地了解事实的真相。宋庆龄与她的好友格兰尼奇和艾黎于1936年2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呼声》，并由格兰尼奇和艾黎承担此刊物的主要工作。格兰尼奇文思敏捷，提笔成文，《中国呼声》的每期社论都出自他之手。艾黎善于观察，组织能力强，他不仅以“赵大琪”等笔名在每期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还与宋庆龄一起，在上海的中外名人中组织稿件，鲁迅、茅盾、史沫特莱、马海德、魏璐诗等，都在《中国呼声》上发表过文章。这些文章全面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喊出了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中共地下党也通过宋庆龄在《中国呼声》上发表文章，宣传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个刊物成为宋庆龄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朋友团结的旗帜，很快蜚声中外，销路也很好。艾黎说，“每期杂志一到报摊，立刻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地买了带回学校去。在新加坡等亚洲各国沿岸，尽管英国当局制止，也很快销售一空。”^②为了扩大宣传阵地，向世界人民阐明中日战争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好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宋庆龄又在香港创办了《保盟通讯》，邀请了不少在华的外

国友人参加《保盟通讯》的编辑和撰稿工作。原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爱泼斯坦负责《保盟通讯》的编辑出版工作。杰克贝尔敦为该通讯撰写长篇战地报告《新四军》，详细介绍了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教育、医疗、组织民众生产自救等方面的情况。马海德撰写的《西北边区的医疗工作》，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开展医疗工作的情况。埃文斯·卡尔逊撰写的《在长江流域的战士当中》，详细介绍了他和艾黎等人在新四军部队和驻地进行考察的情况，及时报道了新四军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状况，急需要解决医疗用品和过冬棉衣。此外，《保盟通讯》还刊登了爱德勒·罗易写的《在西北战区的旅程》、约翰·福斯特的《与中国西北的八路军在一起》等文章，以作者耳闻目睹的事实，向世界人民报道了八路军在抵抗日军侵略的英勇斗争中所取得的战果和需要援助的情况。《保盟通讯》还对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进行了及时的揭露，指责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威胁最严重的时刻，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总部进行袭击的罪恶行径。《保盟通讯》成为及时而全面地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人民抗战实况的权威性的英文宣传物，为争取国际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朋友支持中国抗战起了极大的作用。

宋庆龄不仅团结国外朋友一起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抗战的情况，她还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演说，电台、广播等多种形式表明她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宣传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各地蔓延后，英、美等一些大国在很长时间里不承认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对此，宋庆龄抓住日军侵华暴行，进一步阐明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朋友们，你们自己看看，仅在短短二个月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已经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失和破坏，单就上海而言，英国已有数百万英镑的财产被日本的军舰和轰炸机所破坏，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宣战，日本已经妨碍了英国的对

华贸易,使英国工商界蒙受巨大损失。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损失是必然还要增大的。”^④宋庆龄又以日军轰炸美国侨民,袭击美国教会医院,炸死护士、医生和伤兵等事实,向美国人民指出:“日本对华侵略,也包含着对美国本身的威胁。”^⑤宋庆龄这里强调日本侵华也损害英美在华利益,并不是肯定英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历史,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运用策略,利用矛盾,组织广泛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宋庆龄为了让世界更多的人理解援助中国与保卫世界人民利益的关系,经常通过给外国朋友的信函呼吁援助中国抗战,她在给斯诺夫人的信中说:“我们很想知道在当前的形势下,你在援华工作上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你过去几个月所做的工作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现在向你们发出呼吁:‘请你们把已经很好开展起来的援华工作继续坚持下去。请你们把中国的斗争同你们自己的斗争一样看待’。”她在给外国朋友的信中说:“现在有更多的人承认,中国才是阻挡太平洋战争与他们之间的唯一屏障,直到最近中国的斗争才被认为是保卫太平洋地区民主进步力量的前线。”她在给坎农信中说:“五年来,中国保盟一直在帮助这些英勇的战士,游击队在几乎没有武器和外界支援的情况下,在装备精良的占领军的后方保持并建立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宋庆龄以她独特的身份,团结国际友好的人士,利用“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阵地,紧紧抓住世界人民关心的两个互相关连的问题,坚持不懈地宣传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和援助中国与保卫世界人民利益的关系,赢得了世界广大人民对我国抗日战争的理解和支持,使抗日战争最终发展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宋庆龄与国际友人在中国与 世界之间架设援助的桥梁

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处于最紧张的阶

段，宋庆龄深感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需争取更多的国际物质援助，特别是“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解放区人民。”^⑥要使世界人民详细地了解到中国抗战最需要什么，所援助的物资即将运送到什么地方去，就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保盟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当时香港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沙尔文—克拉克女士担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担任名誉司库，爱泼斯坦负责宣传，廖梦醒、王安娜等也参加了“保盟”的工作。许多国家知名人士给“保盟”的工作以很多的帮助，如：贾·尼赫鲁、保罗·罗伯逊、元莱尔·布什等人。廖承志是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他与“保盟”有着密切的联系，“保盟”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药品、医疗设备、食品、经费等，许多都是由办事处转送的。

保盟成立不久，宋庆龄就写信给旧金山的“中国人民之友社”介绍了中国各地所需的食品、药物的情况，呼吁该社努力唤起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美国的美国救济委员会马上决定募集五百万美元援助中国。同时，美国各地的一百多个团体也参加了中国救济委员会。在宋庆龄和“保盟”的呼吁及多方努力下，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与“保盟”建立了联系，并且通过“保盟”给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援助。这些团体主要有：美国援华会、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纽约的美国医药援华会、旧金山援华会、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伦敦医疗援华委员会、法国巴黎的中国人民之友社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和平民主联盟等，其中有些团体是宋庆龄直接促成的，如美国援华会就是宋庆龄委派抗战初期担任“保盟”上海分会秘书的耿丽淑去美国组织的。宋庆龄十分关心这些团体的巩固和发展，经常写信给这些团体负责人，要求他们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和参加，同时，宋庆龄还亲自做国际上层人士的工作，请他们支持本国的援华工作。她的崇高威望和正义呼声，往往产生有求必

应的效果，如美国援华会就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的支持；英国援华会也得到英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爵士的支持。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实行疯狂的“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还灭绝人性地进行细菌战，使疾病流行，伤员和灾民急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冲破敌伪军的种种阻挠和破坏，从医生和护士的配备，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供给，到医院的创办，给予了大量的支援，其数量之大，工作之繁杂，斗争之激烈，精神之感人，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38年9月英国援华会向“保盟”提供2450英镑，协助筹办国际和平医院。宋庆龄决定把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建在刚刚开辟的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该院第一任院长就是白求恩。后来，在共产党的要求下，在延安及各根据地又先后建立起11所国际和平医院，42个前方流动医疗队和8个医科学校。为了保证前线医疗网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宋庆龄长期不懈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先后向国际和平医院派去了大量的医务人员，1938年她在广州接待了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其中包括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卓克华、木克华，还有一些其它援华医疗队成员，如白求恩、法莱、米勒、布朗、哈里森等。当时，这些国际主义战士在抗日根据地抢救伤病员，培训医务人员，创办医疗与医药学校，建立药厂等，为根据地的医疗保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根据地处在遥远而偏僻的内地，这些物资来华后，宋庆龄和“保盟”又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把它送到目的地。一次应周恩来的要求，宋庆龄安排王安娜到越南的海防、河内等地，护送“保盟”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大量医药用品和野战医院的设备，使之尽快通过印度支那进入中国内地顺利运抵目的地。1939年，英国朋友桑勒克诺弗捐助了一辆大型救护车，这辆救护车设备齐全，有九个担架位，六个轻伤员位，以及电灯、冷热水设备。宋庆龄决定把这辆车送往延安，给流动医院和条件较差的地方用作临时手术室，她安排新西兰作家贝特兰

专职护送，贝特兰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克服千辛万苦，胜利完成了任务。

1940年，在敌后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国民党反共和封锁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行动的不断升级，支援工作越来越困难。国民党切断了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一切援助机构对游击区的援助达三年之久。1943年，在斯诺、史迪威、卡尔逊的推动和英美盟国的帮助下，经过宋庆龄和共产党的顽强斗争终于恢复了中断三年的对八路军、新四军医疗物资的援助。当时，宋庆龄得到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的热情帮助和友好合作，他控制着滇缅公路，这是中国与外面的唯一通道。他经常帮助“保盟”用这条公路运送外来物资，并同意从印度飞来的美国军用飞机将药品及救济物资运往延安和解放区，还从他管辖的军用仓库里拨出一些药品和物资送给八路军。

宋庆龄争取国际援助获得巨大成功，正是她15年呕心沥血组织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一项重大成果。她始终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她虽然为争取国际援助殚精竭虑，但是她丝毫没有依赖外援的思想，始终把争取抗战胜利的基点放在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为此，宋庆龄以很大的精力挖掘本国人民的力量，支援抗战前线，使人人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如“保盟”在香港和重庆搞的一系列义演、义买、义赛和“一碗饭”运动就是如此。这些动员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所开展的活动，是一条与军事上抗敌平行的战线，率领这支千军万马的队伍胜利前进的宋庆龄，也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她对巩固抗战后方和支援前线杀敌，起了不可替代、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三、宋庆龄对国际友人的影响

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国民党、共产党和宋庆龄都进行了争取国

际援助的工作,吸引了一批友好国家进步团体和友好人士,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反日阵营,在这个阵营中宋庆龄领导着一条特殊战线,团结争取了这条战线中的国际友人,有的在本国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呼吁,采取一系列行动,援助中国抗战,如美国总统罗福斯夫人、英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爵士夫妇、美国驻菲律宾专员夫人赛雅,以及印度的贾·尼赫鲁、美国歌唱家保·罗伯逊、宁·赛珍珠等;有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直接间接地参加宋庆龄领导的抗日工作。其中得到宋庆龄关心和帮助,进而成为中国人民的友人,给中国革命和抗战很大的帮助,如史沫特莱、斯诺、艾黎、马海德、格兰尼奇、爱泼斯坦、史迪威等,有的甚至,把毕生献身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宋庆龄以她人格的魅力,形成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量,在赢得国际友人帮助的同时,也帮助一些在华的国际友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使他们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的朋友。有许多一直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现在依然和我们保持着友好往来。

在宋庆龄外国朋友中埃德加·斯诺,是受她影响很深的一个人,他们之间的友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胜利,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诺原来是一个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曾有误解,对蒋介石政权抱有幻想,以为是蒋介石把中国从“暴民”统治下拯救出来,“正义”在国民党方面。后来,他改变了这些看法。在这一转变中,宋庆龄的影响起了主要作用。正如斯诺自述:“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⑧通过宋庆龄,他了解到国民党及其领导层的内幕,从而疑惑大解。他说:“宋庆龄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了解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的抱负。她还帮助我了解她的家庭情况,了解她为什么拒绝与宋氏家族一起和蒋介石政府合作,以及其它许多我从书本上无法了解到的事实。”结果,斯诺的思想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

的境界：“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⑧从此，他认清了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腐败、缺乏效率和独裁的政府，是中国一切苦难的根源。中国非但不能依靠蒋介石这个独裁者拯救，相反必须切除这个毒瘤。中国需要有一场血与火的暴力革命。他虽是一个美国人，却不愿意当一个旁观者，而要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来。斯诺在陕北参观访问了三个月，然后写出了震惊世界的巨著《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使西方人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斯诺成功的基础，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本身的价值，但是宋庆龄的言传身教无疑是他同情中国的动力。

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和美国医生马海德是深得宋庆龄的教益，与宋庆龄友谊最深，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鞠躬尽瘁的两位国际友人。艾黎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结识了宋庆龄。他们初次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仇恨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共同的思想感情，使他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宋庆龄刚毅的性格、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风度令艾黎无限敬佩。艾黎说：“从我后来和她的交往中，我越来越感到，在她秀丽文雅的外表下，包容着一颗钢铁般坚强的心。她总是利用自己最熟悉的阵地，来帮助那些为她所坚信的一切而奋斗的人们”^⑨。马海德是在史沫特莱家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的宴会上与宋庆龄相识的。相谈之下，马海德茅塞顿开，决心在继续钻研医学、治病救人的同时，积极跟随宋庆龄投身革命，并发挥自己的特长，用医学为革命服务，帮助宋庆龄开辟新的战斗领域。为了提高艾黎和马海德等外国朋友的思想觉悟，宋庆龄帮助他们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小组。史沫特莱、海茵茨、西普、特鲁德、罗森堡、鲁思、韦斯等也参加了这个小组。他们认真学习《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等

马列著作。通过学习,使他们初步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为了帮助他们理解,宋庆龄又组织他们深入工厂进行调查,并写出了《铬中毒在电镀工业里的情况》的学术报告。马海德说:“通过调查访问,看到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更加激起了我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决心。”“正是在宋庆龄同志近五十年来的培养和教育下,我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我的一点力量。”^⑧

爱泼斯坦与宋庆龄有着四十二年的革命友谊。是宋庆龄终生的朋友。从1938年与宋庆龄相识后至今,他始终在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爱泼斯坦从童年时代起就留下了对宋庆龄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回忆说:“我第一次看到宋庆龄的形象是在1925年,报纸上登了一张她和孙中山到达天津的照片,我逐渐领会到从照相机的镜头所显示出来的宋庆龄的魅力,是精神的美和力量的结合。”以后,宋庆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坚持革命斗争的传奇事迹,进一步吸引逐渐长大起来的爱泼斯坦。特别是在从事新闻工作以后,他开始直接接触到宋庆龄的一些言论和活动的报道材料。他说“我后来就是从这些声明和呼吁当中了解到她所具有的独特风格:不仅说理雄辩,感情强烈,而且直截了当,切中问题要害。”^⑨1938年,爱泼斯坦在保卫广州战斗中,与宋庆龄相识了,从此开始了同宋庆龄的友谊。在战争年代里,他一直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并成为“保盟”的委员,并负责宣传工作,同时他还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他写过许多文章,向国外发表。如:《人民之战》、《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等等。这些文章的发表,使世界人民真实的了解到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支持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

宋庆龄所以像磁石一样,能吸引如引众多的国际友人,即使经过几十年都始终不渝,主要是她的崇高品质具有特殊魅力。“她很

善于交朋友。她对朋友十分关心，十分热情……凡是同她有过通讯联系的人都知道，她不管多忙，如果不是收到来函的当天回信，至迟也要在第二天作复的。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她一和谁交了朋友，好像就要同他永远保持友谊。当然，有的人则要另当别论，这就是那些蜕化变质、立脚点完全转移到敌对立场上去的人，或者是那些企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企图滥用同她的友谊关系来为一己的私利，来为卑鄙可耻的目的服务的人，对于这样的人，那她是断然唾弃，坚决和他决绝的。”宋庆龄就是这样一个人。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宋庆龄故居)

注释：

- ① 参见《宋庆龄选集》(1966年版)，第76、77、121页。
- ② 田森，《艾黎春秋》第22页。
- ③ 参见《宋庆龄选集》第84、91、124页。
- ④ 《申报》1937年10月21日。
- ⑤ 宋庆龄，《为人民服务四十年》。
- ⑥⑦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第98、99页。
- ⑧ 参见《艾黎自传》。
- ⑨ 马海德，《宋庆龄——我的革命导师》。
- ⑩ 爱泼斯坦《我所了解的宋庆龄》。

宋庆龄争取国际援华抗日

张洁明

抗战时期，宋庆龄以其特殊的身份，开辟了一条争取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特殊战线。在这条战线上，她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和国际意义，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援助；她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正义之士，从事援助中国的抗战事业。在这条战线上，她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步步紧逼，1937年七七事变，又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达到侵占中国的目的，日本一开始就利用先进的舆论工具，进行“侵略有理”的国际宣传。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宋庆龄为中国抗战奔走呐喊，并积极承担国际宣传这一历史重任，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通过对外国政府、友好团体和国际友人大量的函电、演讲以及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抗战，以取得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针对日本“侵略有理”的宣传，宋庆龄详细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使世界人民了解日军侵华真相。早在淞沪战役时，宋庆龄就以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的名义向世界进步人士呼吁，得到了热烈的响应。1933年，在远东反战会议前夕发表声明，痛斥帝国主义战争

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困苦。七七事变后，宋庆龄更详细揭露日军在中国各地的暴虐行径。1937年9月17日在《致英国工党书》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还不以奴隶东三省和华北的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经济剥削为满足，他们更深思熟虑地进而破坏中国的文化，并使中国的人民降为愚昧无知的奴隶”，“过去两个月来，你们当已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蹂躏和屠杀”，无辜的难民都成了他们“发泄狂暴的目标”，^①在同年12月的《告英国公民书》中，向英国人民揭露了日军的暴孽和凶残。她说：“敌人用尽了一切现代的武器，用尽了一切凶残恐怖的手段，把我们的土地沉浸在无辜人民的血海中。”“灾祸之烈，实较欧战犹烈。”^②

宋庆龄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强调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她说：“日本强盗在东方，德意法西斯蒂在西方，都充分表露了他们的企图和手段。”^③“日本希望征服中国，用作征服一切太平洋国家，随后并征服全世界的根据地”^④。因此，“日本法西斯主义和黩武主义以及他们惨杀的非人道的破坏和方法，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他们对于所有民主国家以及人类和平与自由，也同样是威胁”^⑤。显然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为国家生存、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同时也是在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保存民主、争取人民权利的战争。宋庆龄郑重宣告“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⑥。说：“中国的战争是远东局势的关键，并且不仅限于远东，我们的继续抗战，保障了太平洋西岸人类四分之一的未来。它的国际重要性可从下面的事实估计出来，使日本在南方不能攫取英美的属地，在北方不能进攻苏联。”^⑦

宋庆龄还大力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抗战伊始，宋庆龄就充满信心地指出：“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中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站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⑧虽然中国是在跟占着武器很大优势的敌人作战，但单就军事技术是不能决定这次战争的。中国最大的优

势来自于“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大众”，他们正英勇地为：“保持民族生存而抗战”^⑧，而且“抗战已经证明了中国军队和人民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优势”^⑨。

通过上述宣传，宋庆龄向国际社会大声疾呼：“拥护中国的抗日战争”，“制止日本侵略以增强中国抵抗力量。”^⑩宋庆龄的呼吁，得到了国际上进步人士的积极响应和支持。1932年世界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各国反帝组织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人民。高尔基也在1932年3月2日的《消息报》上发表《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呼吁》的文章，用钢铁般的语文指出：“援助中国”，“不准干涉中国”，1937年9月国际工会通过决议，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并通过会员国抵制日货，募捐援助中国工友。国际运输总工会也在1937年10月通过各国运输工会，禁止运送军火至日本。1937年12月，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联合世界著名学者杜威、爱因斯坦、罗素发表《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宣言，强烈谴责日本摧残东方文化，表示要抵制日货，“停止一切足以帮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对日合作”，同时尽一切可能“帮助中国进行救济，增强自己”^⑪。

那些“相信中国事业正义性的各国男女们”响应宋庆龄的呼吁，纷纷发表言论谴责他们的政府对日贸易，“限制了对侵略者的公开援助”。德籍加拿大传教士S·洛登凯教授在《南华早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以基督和人类的名义，请你们要求西方善良的人们拒绝向日本出售铁和石油。日本正是用此来折磨、奴役中国。”^⑫新西兰作家詹姆斯·贝特兰指责英美等国不讲良心，违背道义的做法。他说：“美国、大英帝国与荷属印度一起向日本提供了它所需的90%的重要战略物资。”从而“在加剧这场屠杀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⑬。

国际社会在道义上的声援和支持，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对这一系列的声援，中国人民是“何等的感激和欣慰”。

二、以保盟为阵地，争取国际社会广泛援助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向国际社会真实地报道中国抗战的情况，广泛争取国际团体和友人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保盟在成立宣言中就阐明其目标：“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并指出过去由于“外国朋友所得到的关于远东的真实情况，是极不充分的，因此他们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援也就遭到阻碍。同时，这样的事实也是极为明显的，过去我们所取得的物质支援，在我国分配时，既未能根据最危急的需要，又未能按照捐献人的意见做到合理”^⑧。保盟要通过工作，努力弥补这些缺点。

在保盟开展工作，争取国际援助时，宋庆龄始终坚定地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强调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敌人，中国抗战是为全人类的自由、民主、和平而战，所以应该得到全世界的支持和援助。她说：“我们的抗战是反抗压迫者、法西斯主义和黩武主义，而这一切也是你们的敌人，从这共同的基点上，我们有着呼吁你们援助和支持的权利。”^⑨而“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最强大的成员之一，中国应该得到同她的抗战相应的援助”^⑩。宋庆龄的这些观点，为争取国际援助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思想，正如爱泼斯坦回忆所说：“它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真正面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勇的先锋，并且力图使所有的捐款人成为这个斗争的自觉支持者，不仅支持中国一切斗争，而是世界各地的斗争。”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不是一味地怜悯施舍，中国人民争取援助，也不是乞求恩赐，而是国际主义的相互援助。不仅是助人者在帮助受援者，反过来，也是受援者在帮助助人者。基于这一思想，“保盟”提出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帮助他们自己——并帮助你们。”^⑪

保盟成立后，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立即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发行了7种宣传品。1939年4月1日正式铅印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同时还出版发行了《保盟工作报告》和各种小册子，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和具体困难，请求和指导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援助工作。

日本侵华，在中国大地上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战灾儿童，他们无家可归，无依无靠，处境十分凄惨。宋庆龄在1939年3月发出了“救济战灾儿童”的呼吁，她说：“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④。纽约的朋友们立即响应，专门成立了以亚瑟伯朴为主席的中国战灾孤儿美国委员会，进行各种募捐活动。

1938年冬天，长江下游地区进行游击战的新四军，曾有数百名伤员，不是死于伤病，而是因无物裹身而冻死。为此，保盟在1939年春夏连续发出了“冬季前需要5000条毯子”、“为我们的伤员提供两万条毯子”、“我们仍然需要毯子”，“在9月份之前，把两万条毯子运送给我们，将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救护十万名伤兵”等一系列紧急呼吁。这些呼吁，得到了各国援华团体和个人的踊跃响应，纷纷向保盟寄来毛毯和代购毛毯捐款。据《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1940年》统计：美国医药援华会捐赠了3000多条毯子与被褥，美国的中国民众救济会送来了4大捆毯子与衣物，新西兰的左派图书俱乐部提供了1010条毛毯，悉尼的华侨救济难民基金会等3个团体运来了2200条新的优质羊毛毯，捐送毯子最多的国外团体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从1939年7月到1940年1月，共向保盟提供了26大箱毯子。此外，更多的团体与友好人士踊跃捐款，请保盟代为购买毯子，援助新四军伤病员。

宋庆龄和保盟还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的业绩，并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缺医少药，急需物质支援。1939年3月8日宋庆龄在香港国际妇女节集会上发表了

《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演说。她说，我们英勇的游击队战士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配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而且，由于不甘心做奴隶，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田地和工厂；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衣服和粮食”，“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我们的责任则是“需要扩大外来援助的数量与范围，以帮助这些无名英雄”^⑧。面对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封锁，宋庆龄指出，游击区是“保盟”最需要援助的地区，强调“中国的所有地区都应得到同等救济待遇的权利。”^⑨宋庆龄的这些宣传报道，赢得了国内外正直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援助。1938年9月英国援华委员会向保盟提供2450英镑以筹建国际和平医院。宋庆龄把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建立在刚刚开辟的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后又在延安及各个根据地建立了11所国际和平医院、42个前方流动医疗队和8个医科学校。据统计，保盟为国际和平医院提供的经费，在所有援助项目中是最大的：1939—1940年为46878.46元（港元），1942—1945年为652435美元，170856608元（法币）。^⑩

宋庆龄还以保盟为阵地，通过义演、义卖、义赛等一系列活动募集资金，支援抗战，其中最著名的是1941年7、8月间为援助工合而举行的一碗饭运动。宋庆龄在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指出这一运动是用募集经费来“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⑪。一碗饭运动共得捐款2.5万元港币，悉充工合扩大救济伤兵与难民之用。

宋庆龄和保盟的宣传和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积极的响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量的捐款和医药、救济物资的援助，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如宋庆龄在抗战结束后所说的，“这种支

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②

三、以其人格力量，吸引国际友人为中国抗战而奋斗

宋庆龄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世界人民的仰慕和崇敬。她的高尚品质，特殊魅力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友人，为中国的抗战作出牺牲。“他们或在海外为中国的需要募款，或作为志愿的人道主义工作者来华，工作在中国的最前线。”^③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美国工党领袖斯特拉德·克里普斯爵士夫妇、美国驻菲律宾专员夫人塞雅以及印度的贾·尼赫鲁、美国歌唱家保·罗伯逊、作家赛珍珠等，都在本国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呼吁，采取一系列行动，援助中国抗战。而像史沫特莱、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格兰尼奇、耿丽淑、爱泼斯坦、王安娜、卡尔逊、史迪威等也都直接、间接地支援和帮助宋庆龄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工作。

抗战时期，中国的缺医少药极其严重，在宋庆龄和保盟呼吁下，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了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以贾·尼赫鲁为首的印度国大党派遣了爱德华大夫率领的医疗队；1939年挪威援华委员会和西班牙委员会又派来50名外科大夫。著名的白求恩、柯棣华、米勒、巴苏、布朗、哈里森等外国大夫，都是通过宋庆龄的介绍，先后来到根据地工作，并建立了闻名全国的国际和平医院，其中白求恩大夫和柯棣华大夫先后担任了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并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宋庆龄在《致柯棣华大夫家属的慰问信》中说：“像白求恩大夫的名字一样，柯棣华大夫的名字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因为他给他们带来了医术，带来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支援。”^④

在与这些“为中国的抗战作出牺牲”的国际友人共同战斗中，宋庆龄与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斯诺是受宋庆龄影响最深的一个。这位美国新闻记者初识宋庆龄时，便认为她是“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恒久的核心。他说：“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

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④。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他来到陕北，考察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3个月后，写出了震惊世界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使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情况，许多国际人士都是受到了《西行漫记》的感染来到中国，献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曾给友人写信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⑤

那些受到宋庆龄感召而献身中国抗战的人们，反过来又影响了更多的国际人士，从事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并影响了一些国家的中上层决策者。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看了《西行漫记》后，曾3次接见斯诺，并亲自推销这本书。当时任美国驻华总司令的史迪威，倾向中国抗战。他在向财政部的报告中表示：美国应奉行更积极的政策，“我国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的形式帮助中国，对我们本身也是一种防御措施”。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意史迪威的看法，也认为“反对法西斯侵略、支持中国极其重要”^⑥，力促总统向中国提供贷款。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安排了给中国的2500万美元贷款。

宋庆龄的高尚品质和特殊魅力，在保盟开展的各项募捐活动中，还成为人们信赖的标志。保盟每收到一笔捐款，不论数额大小，收据上都有宋庆龄的亲笔签字。很多外国大资本家，从英国的大工业家到挪威船主，都曾为支援保盟捐助巨款。他们中不少人仰慕宋庆龄“有些人就是为了得到她在收据上的亲笔签名而慷慨解囊的”^⑦。宋庆龄对待钱财方面的事情又特别认真，“在她那鹰一般尖锐的目光下，没有发生过钱被无耻官员吞没的事情”^⑧。因此，澳大利亚响应孙夫人呼吁援助游击战士联合会在1945年12月的工作报告中，以把捐款给了宋庆龄“是确确实实地由孙夫人底能干主持之下，用来救了不少的伤兵、难民”，而把它列为“荣幸的事实”^⑨。

宋庆龄为争取国际社会援华抗日而奔走呼吁，不辞辛劳，得到

了国际进步人士的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在舆论上的声援,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的援助,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庆龄在广泛争取国际援助这条特殊战线上,起到了别人无法起到的作用,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201、219—220、222、245、202、202、340—341、201、194、202、203、231、203—204、378、272、269—270、328、339、393、364、403页。

⑳ 《抗战》(三月刊),第33号,1938年3月1日。

㉑ 转引自《一个基督徒谴责对重庆的轰炸》载《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4期。

㉒ 詹杰姆斯·贝特兰,《同日本摊牌?》,《保盟通讯》第21期。

㉓㉔ 《保盟通讯》第31、2期。

㉕ 引自唐宝林《探谷幽兰——战时国母风采》,第278页。

㉖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第99页。

㉗ 敏惠,《跟随“红军”去延安》,1979年12月25日《北京日报》。

㉘ [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265页。

㉙ 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页。

㉚ 转自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抗战初期宋庆龄呼吁英国支持中国抗战

杨元华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揭开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宋庆龄不仅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而且在争取国际进步力量支援中国抗战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以她特殊的身份取得了一般人难以取得的巨大成效。本文试就抗战初期宋庆龄呼吁英国政府、政党和人民支援中国神圣抗战的活动作一叙述。

一、谴责英国政府的对日绥靖政策， 强调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

1937年5月上台的英国保守党纳维尔·张伯伦政府，不仅在欧洲对德意法西斯主义采取全面的绥靖政策，而且在远东对日本军国主义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虽然英国在亚太地区特别在上海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和巨大的经济、金融、商务方面的利益，但英国的衰落使它不再成为当年可以任意发号施令的“日不落帝国”。因此，在1937年11月召开的“华盛顿九国公约”缔约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布鲁塞尔会议上，英国不敢带头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不敢提出对日本的制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会上称，英国准备讨论集体对日制裁的可能，但必须缔结多国参加的共同防务条约，英国决不带头，只是参加美国采取的一切行动。而美国考虑到美日之间的贸易额是所有欧洲国家对日贸易额的两倍，对日

制裁经济损失最大的是美国，因此，只表示愿对在远东恢复和平进行“建设性的努力”，不考虑对日制裁。经过三个月的空谈，布鲁塞尔会议在发表了一篇连对中国进行道义上支持的话都不敢提的空洞宣言后闭幕。

与保守党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相反，英国在野党工党对中国的抗战抱同情态度，多次抨击政府的绥靖政策。1937年10月4日工党将举行全国大会，讨论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9月间，工党组成代表团来中国调查日本侵华暴行。其时，上海抗战正在激烈进行。

宋庆龄获悉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华，即于9月17日以英文给工党代表团写信，吁请工党支持中国抗战。

宋庆龄首先提请英国朋友注意：“过去三十年中，日本帝国主义和黠武主义者一块一块地割去了中国的土地。我相信你们总还记得一九三一到三二年间中国的东北四省怎样被掠夺了去。日本的这种行动是把《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撕得粉碎了。”^①宋庆龄谴责了英国政府的绥靖政策，她指出：“英国政府虽然是上述各约的签字国之一，可是你们当记得，英帝国却并不曾发声抗议，以阻止日本的分割中国。在一九三二到三五年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扩展它们统治的势力于北察哈尔和河北，国联和各签约国对这些暴行依然是袖手旁观。自然，这种态度大大地鼓励了而且在客观上还帮助了日本强盗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②

事实正是这样，英国等西方国家及其控制的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行径的姑息纵容，是日本帝国主义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仅是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且具有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国际意义。宋庆龄指出，只要对中国的抗战“仔细的审察”，就会“认识中国不仅单为了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因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黠武主义者以及他们

惨杀的和非人道的破坏方法，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他们对于所有民主国家以及人类的和平与自由，也同样是威胁。”^④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抗战确乎有着国际的意义。中国已获得了其他国家道德上的支持和同情，但这还不足以阻止日本黠武主义者征服全中国的疯狂行为。制止日本侵略以增强中国抵抗的力量，这于许多国家特别是英国有利。”^⑤

二、指出日本侵略中国也损害了英国在华利益

尽管英国对日本侵略者姑息养奸，采取绥靖政策，但是日本侵略者并不买英国人的帐，它要称霸东亚，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要把英美势力赶出亚洲去。还在中日战争初期，日本便侵犯了英国在华利益。1937年英国在华投资约有12.5亿美元，其中72%集中在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后，尽管英国一再宣称保持局外中立。但日本不久就封锁了中国的全部海岸，瘫痪了英国通过上海港及其它沿海口岸同中国贸易的渠道；英国控制的上海、天津海关的船只全部被日军没收；12月5日，停泊在芜湖江面的英国军舰遭到日军袭击；12月12日，停泊在南京与芜湖间江面上的英国商船和军舰又遭到日机轰炸，英舰“瓢虫号”被日军野炮击中，死一水兵，伤数人。日本飞机还追逐俯冲扫射悬挂英国国旗的英国驻华大使馆汽车，射伤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

日本侵略军严重损害英国在华利益的行径，曾使英国试图作出强烈的反应。1937年10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备忘录中，明确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对日本实行制裁的建议。

但是，由于美国在华利益远远低于英国，而在日本却有远远高于欧洲各国在日利益。美国的资本大量投放于日本，日本的汽车工业差不多全部掌握在美国人手里，美国商品在日本的进口贸易中约占三分之一。美国又想趁机削弱英国在远东的势力。因此，对英

国的提议持消极态度。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备忘录的答复是，美国宁愿采取“和平与合作的方法”以解决远东的冲突。直到日本军队侵占南京并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后，美国政府还一再发表宣言，建议在美、英、日、中4国代表参加下，就一切“争执问题”举行谈判。

由于美国的消极态度，英国孤掌难鸣，加之它在欧洲的麻烦日增，遂转而采取妥协政策，姑息日本肆意侵略中国。在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气势下，英国同意把一向由英国人把持的在中国日本占领区的海关管理权交给日本人控制；把日本占领中国港口的全部关税收入（中国对外债的抵押品）由英国汇丰银行转交给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使得日本能获取外汇购买战争物资。英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不久后终于导致出卖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出笼。

针对这种情况，宋庆龄列举了日本侵略者侵犯英国在华利益的大量事实，她对英国人写道：“你们自己看看，在仅仅两个月里面，日本帝国主义就已损害和破坏了英国在华利益。日本轰炸机追击英国的大使，险些儿伤了他的命；日本军舰拦阻英国的商船，强求有上船检查旅客表和船上文件的权利；他们在香港的领海中濫扣并破坏海关的巡舰；单就上海而言，英国已有数百万元的财产被日本的军舰和轰炸机所破坏。”^①

宋庆龄警告英国政府：日本虽然还没有对英国正式宣战，“实际上日本已阻止了英国对华的贸易，英国的工业和商业已受到了巨大的损失。”^②宋庆龄特别强调指出：“这些都不过是短短两个月来日本破坏英国利益的例子。战争持续下去，那损失是必然还要增大的。”^③

三、向英国公众揭露日军侵华的暴行

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侵略者的铁蹄所到之处，数以万计的无辜人民遭到了残酷的屠杀和蹂躏。

对于日本侵略者的烧杀奸淫抢掠的残暴罪行，宋庆龄义愤填膺，予以无情的揭露。她在给英国工党代表团的信中说：“过去两个月来，你们当已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蹂躏和屠杀。自炸毁天津南开大学为始，他们用武力占领了我们在华北所有的文化机关，于他们没有用的就一把火烧了去。他们炮击和轰炸上海和南京的大小学校；他们轰炸美国教会的医院，炸死了看护、医生和伤兵。”^⑧

宋庆龄还无情地揭露日本侵略军惨无人道地屠杀无辜的难民，她说：“为了恫吓我们的人民，为了要把我们击至‘屈膝’，他们滥炸从战区仓皇逃出的避难妇孺；在城市与和平的村庄中，他们的飞机对无辜市民一样的肆虐。火车、轮船、难民撤退的车站——那里聚集着最穷苦的人们——都成了他们发泄狂暴的目标。”^⑨在《告英国民众书》中，宋庆龄更是以悲愤的笔触写道：“敌人用尽了一切现代的武器，用尽了一切凶残恐怖的手段，把我们的土地沉没在无辜人民之血海中。城乡各地，所过成墟；青年同胞，断肢裂腹。炸弹横飞，妇孺遂成残废聋哑。成千成万的兵士，肝脑涂地。”^⑩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整个南京城内，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遍地展开，残暴的日军还展开了杀人比赛，以屠杀中国人取乐。六朝古都南京城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南京的许多外国人目睹了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当时的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日军的暴行，甚至连德国法西斯的代表在其给政府的报告中也指出：“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⑪据统计，在日军占领南京的短短两个月中，中国军民被屠杀达30万余人。

宋庆龄在写《告英国民众书》时正是1937年12月，她离开上海去香港前夕，根据从南京断断续续地传来的不完整的消息，她在信中愤怒地写道：“外国人士也曾目睹南京之惨状。仅仅在南京一地，日人便已屠杀了五万居民。真正像欧洲中世纪时代那回大瘟疫一样，日寇蹂躏着我们七个省区，使我成百万的人民流离失所，困

顿饥饿以死。灾祸之烈，实较欧战尤酷。”^⑧宋庆龄的《告英国民众书》于1938年1月5日在伦敦的《每日先驱报》上发表；1月10日又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此文被称为“宋庆龄女士秘密离沪前致英国人士之动人的号召。”^⑨在英法等国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四、强烈呼吁英国支持中国抗战

英国政府的绥靖主义政策引起了宋庆龄强烈的不满。为了唤起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注和支持，宋庆龄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她指出：“不仅是为了正义和公道，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主要的利益，英国的人民也应尽力阻止日本对华的侵略，事情是很明白的。要是中国的抗战一旦失败，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也就完结。”^⑩她对英国政府迟迟未表示支持中国抗战的态度不满，她说：“对华侵略的战争已经进行两个月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你们积极援助我们以阻止法西斯侵略者的明白表示，这是很为遗憾的。”^⑪她希望英国能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她特别指出：“中华民族的抗战确乎有着国际的意义。中国已获得了其他国家道德上的支持和同情，但这还不足以阻止日本黠武主义者征服全中国的疯狂行为。制止日本侵略以增强中国抵抗力量，这于许多国家特别是英国有利。”^⑫

与英国政府的态度相反，英国的工人阶级表示了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宋庆龄在给英国工党的信中特别提到，香港商船“塞文莱号”(Severnleigh)的英籍水手以罢工的方式，抗议运载货物去日本，以免增加日本侵华的力量。宋庆龄对英国水手的这种行动表示感激和欢欣。她说：“我们欢呼这种对我们抗战团结的表示，我们吁请伟大的贵党也能用明白的行动来表示同情。”^⑬

对于英国工党，宋庆龄寄予极大的希望，她热切地说：“贵党承继着自由、民主以及为改善广大群众生活的奋斗的遗绪，我们的抗

战是反抗压迫者、法西斯主义和黩武主义，而这一切也是你们的敌人。从这共同的基点上，我们有着呼吁你们援助和支持的权利。”^①宋庆龄还怀着自信和希望，坚信英国工党将会在一切行动和场合竭力支持中华民族的壮烈抗战，以反对残暴的野蛮的法西斯主义。

宋庆龄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宋庆龄的有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与中国其他军队一起加入抗战行列。她向英国朋友介绍：“中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站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中国全部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精神、行动和意志这样的团结一致，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华民族是必然不会灭亡的。地球上没有一个力量可能消灭她。”^②“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一致，去为全世界和平事业，为增进社会经济秩序，为反对法西斯与反对战争而奋斗。”^③

宋庆龄强烈呼吁英国支援中国抗战，认为这是制止侵略，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好方法。她说：“侵略是可以制止的，只要各个民主国家起来对侵略者实行经济抵制。”^④“在今天来帮助我们抗日，维持世界和平，用抵制、制裁与封锁等方法来惩罚法西斯侵略者——这便是避免明天的世界大战。”^⑤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争取各国支持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争取英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援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仅从她为呼吁英国支持中国抗战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即可感受到她那颗赤诚的中国心。让我们继承她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腾飞而努力奋斗！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注释：

① 《宋庆龄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99页。

② 同上，第199～200页。

③ 同上,第 202 页。

④ 同上,第 203 页。

⑤ 同上,第 202~203 页。

⑥ 同上,第 203 页。

⑦ 同上,第 203 页。

⑧ 同上,第 201 页。

⑨ 同上,第 201 页。

⑩ 同上,第 219 页。

⑪ 引自龚古今、府塔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1 月版,第 118~119 页。

⑫ 《宋庆龄选集》(上),第 220 页。

⑬ 同上,第 219 页题记。

⑭ 同上,第 203 页。

⑮ 同上,第 203 页。

⑯ 同上,第 203 页。

⑰ 同上,第 203 页。

⑱ 同上,第 203~204 页。

⑲ 同上,第 201 页。

⑳ 同上,第 219 页。

㉑ 同上,第 220 页。

㉒ 同上,第 219 页。

肩负革命成败 民族兴亡之大任

——围绕着宋庆龄、蔡元培民族主义思想展开

蔡建国

正确的历史认识可以从正确的现实认识中描绘出其相关关系。

在五十年前那场残酷的世界性战争中，在东方战场上最终以中国胜利的历史事实，不仅证实了宋庆龄在“日本的黩武主义”^①面前“中国是不可征服”的^②以及蔡元培“我国决为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奋斗到底”^③论断之预见性，而且两人都揭示中国人民面对着强大的军国主义集团的入侵和蹂躏，有着不屈不挠、团结一致，为保卫正义、以正义战胜非正义的这种基本的民族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之中。近代以来，这种精神尤为突出，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历史认识。

本文拟通过宋庆龄和蔡元培民族主义思想的比较分析，旨在从思想史的角度剖视激荡的近代中国社会对这两位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思想影响，从理论上探讨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高昂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渊源及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

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要素、内涵及其时代性

众所周知，被誉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和“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的蔡元培在执着地追求民主主义的同时，灼热的民族主义精神构成了他们思想的内涵。

近代中国，在受到了来自西洋列强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至思想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激烈冲击，西方文明从被迫打开的中国

国门中奔涌而进的同时，也受到过东邻日本的侵略，巍巍大清帝国，居然败于弹丸之地的岛国，经营了多年的号称盛强的“船坚炮利”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东西方列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尖锐而深刻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危机。康有为称此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华民族与外国列强之间的深重矛盾，尤其是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人以更深的刺激，一些有识志士率先议论，艰难地探求着救亡图存和实现民族独立的道路和方法。因此，为争取民族统一和独立的斗争是上述矛盾在政治领域中的集中反映。孙中山“恢复中华”的理想是近代中国革命的目标和近代中国人所负之历史重任的高度反映。围绕着实现恢复和振兴中华的宏大理念，本世纪前半所爆发的两次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派所领导的民主和民族革命及为此所作出的奋斗，正是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独立和繁荣的理想的集中反映，也是为达此最终目标而集中表现出来的不屈精神。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的宋庆龄和蔡元培是时代的代表，他们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及其理论构造是近现代先进中国人世界观的缩影。

研究宋庆龄和蔡元培的民族主义思想必须注意到他们这一思想形成的基础以及与民主主义思想的内在联系。

生于1893年的宋庆龄虽然在她7岁的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的严重事件，但当时她毕竟还处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因此她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矛盾深重性的认识，可以说是来自间接的，而早于宋庆龄25年出生的蔡元培除了直接感受自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激烈变迁以外，还直接受到1894年甲午战争及其以后中国惨败的深刻刺激，因此对于中华民族的深重矛盾比宋庆龄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态：“上决与倭议和……。日蹙百里，且伏祸机。

……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⑧当时年仅 26 岁的蔡元培是翰林院编修，他虽身居朝廷高位，然而为民族的前途忧虑的情怀可见一斑。他根据自己在京城的观察和体验，深感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势下，腐朽的“北京政府，无可希望”，^⑨“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以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⑩。他毅然抛弃高官利禄，选择了一条新路——委身教育，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培养人材。他明白，拯救民族危亡、改革政治必先启迪民智、培养人材，教育则是根本途径，这是蔡元培当时就确立的思想。他与其他革命家的不同之处是，他更注意为振兴中华而启迪民智，为中国的进步，从事民智的开发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又与其他翰林不同的是，他投身了革命，走向了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的道路并坚持而终。他回到故乡绍兴兴办教育并在上海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以后，又去欧洲留学近 5 年，学习西洋文化的底蕴，西洋的民主主义思想给予他深刻的影响。当国内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消息传到德国以后，他“为之喜而不寝”，^⑪并充满信心地表示革命“可成，因运动已久了”。^⑫他匆匆从外地赶赴留学生集中的柏林，动员留学生作响应革命的举动。

与蔡元培相比，宋庆龄早期虽然没有像蔡元培那样的个人经历，以至她对中国社会的危机以及民族主义的认识在时间和程度上也会存有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她以后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相反，由于她出生在国际大都市的一个完全西洋化了的商人家庭，父亲是个思想开明的基督教徒，早期与孙中山就有密切的交往。她本人在 14 岁时即 1907 年开始留学美国，从小就接受着西洋的教育和新思想的熏陶。家庭背景和本人经历及她本人思想的敏锐性，构成了她世界观形成的要因。她是这样回忆在美国受教育的情况的，“我在美国渡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陶，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接受教育的一部分，这对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

的”。^⑧正因为有这些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前提和基础，又有中国社会的严峻现实以及民主主义教育的作用，使她在清末就“潜心思考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内在意义，考虑她的父亲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孙逸仙博士魂牵梦萦的革命事业的是非曲直。”^⑨她在美国留学期间，“似乎深切地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⑩在她留学的佐治亚洲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刊上发表的题为《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的文章中，对清王朝的独裁专制作过激烈的批判。当辛亥革命发生、清王朝被推翻后，她闻讯即撰写了那篇被认为是她的代表作的著名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政论刊行在上述校刊上，她是这样评论这一事件的，这场革命使“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她指出清王朝是“充斥着野蛮习俗的道德败坏的朝廷”。“这个王朝所进行的残酷的剥削和自私自利，使一度兴盛的国家沦于极度贫困。”正是“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而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⑪这些主客观原因为日后她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政治实践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从上述宋、蔡两氏在海外留学期间对国内发生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言行可以揭示他们为拯救和振兴中华民族，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源流。

除了民族危亡的严峻考验和通过学习西方，接受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以外，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宋庆龄和蔡元培两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对他们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和重要的感受。

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其意义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讲演中明确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⑫他还指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

义”，^⑨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⑩孙中山主张“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要他恢复转来”。^⑪

具有严密的内在联系和深刻内涵的三民主义，曾是指导中国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依据，其中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又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有力武器，它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因此它对中华民族具有不可低估的魅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它的上述作用可以从抗日战争胜利的事实中得到诠释。

作为孙中山同路人的宋庆龄和蔡元培两氏都是怀有强烈的爱国民族感情的革命者。在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危机的时刻，他们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投身于民族革命的历史洪流中。

晚清以来，中国在遭受来自西洋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民族危机日深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对中国的侵略时间最长，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也最惨重。

有着 2000 年文化交流悠久历史的中日两国，自近代以来国家关系的状况可以以相互竞存、敌对予以概括。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这种既合作又对立的且双重相互密切交织着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和左右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以及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并且可以断言，这种状况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必定还会持续下去。形成这种对立关系的原因除了文化和意识的差异等要素之外，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先后在 100 年和 50 多年前两次悍然向中国发动进攻是引起敌对关系的一个重要和直接的因素。前者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后者是日本黩武主义者在尝到了前次战争胜利的甜头以后，以中国国内国共分裂、军阀混战、内战频仍为侵略契机，再次染指中国。在持续了 8 年以后，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这一负一胜的战争结果向人们昭示：中国正在强大，中华民族不屈的

民族主义精神正在光大，先驱思想家和政治家正引导民众为维护人类和平事业走向克敌制胜之路。

宋庆龄经历过上述的后一次战争，蔡元培则在青年和晚年亲身经历了上述两次战争。如果说作为士大夫的青年蔡元培与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对发生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只是持有惊异、愤慨而无可奈何的民族情绪——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的话，那么对发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处于中国文化界领袖地位的蔡元培所作出的贡献，则充分反映了他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最大限度发展——这也反映了这个时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性。中国政治的形势和革命前途的命运、执着地追求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理念、作为孙中山思想遗产的继承者、国民党左派或元老、思想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宋庆龄与蔡元培的紧密团结始于此时，两氏为中华民族的危亡而走在革命斗争的前列。然而，他们的追求和理想及其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虽然是一致的和共同的，但由于各自年龄体质、性格特点、文化素养以及社会地位的相异性和特殊性，决定他们在抗争的具体方法上有所不同，这也是不难理解的。相反，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革命民族主义精神，并且可以给分析历史人物提供一种客观的思维方法。

研究宋庆龄和蔡元培民族主义思想时，不能不提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勃发之际，4天之内分别致宋庆龄和蔡元培的信，上面言及的特殊之处可以从这两封信中体现出来。

毛泽东在1936年9月18日给宋庆龄的信中，对她自武汉分别近10年来的革命救国言论和行动，表示敬仰。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资格作具体实际的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信中说派潘汉年来面申组织统一战线的意见，与她商酌公开活动的办法，并请她介绍蔡元培等与潘面谈，4天以后，毛泽东在致蔡元

培的信中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政策主张，希望他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自由解放之林”，在信的最后，毛泽东请蔡元培转达他对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几十名国民党高层和民主人士的问候。^⑨

这里似乎已经没有必要来讨论毛泽东分别致函宋、蔡两氏及内容各异的原因了。但是，回顾和展示宋庆龄、蔡元培在这场捍卫民族独立斗争中的政治态度对于理解两氏民族主义思想却是有益的。

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位是通过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活动在中国曾产生过极大的政治影响的重要人物。在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虽然都是知识分子，但始终是“政治中人”、是“政党中人”。宋、蔡两氏的政治生涯始终与孙中山及其创造的国民党相始终，孙中山逝世以后，在中华民族又陷入新的政治危机之际，他们分别以“国母”和“元老”的角色自觉地为维护三民主义的纯洁性与孙中山思想的背离者——蒋介石南京国民党集团相抗争并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革命的同时，当中国遭受外敌入侵，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他们站在一起，呼吁处于严重对立的国共两党为民族大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抗日战争的中途，74岁的蔡元培因病辞世，宋庆龄继续她的活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她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成为它的一名党员。

宋庆龄与蔡元培在 30 年代初，一方面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以与国民党有特殊关系的身份营救被国民党集团逮捕和遭虐待的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为人类的和平和进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严重对立的狭缝中起缓冲激烈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高涨而曲折的潮流面前，他们以自己在国外的崇高声望，向国际舆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罪行，向世界民众表示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在这方面，两氏的用力各有侧重。

宋庆龄除了以发表文章和演说的途径以外，还致函国际友人揭露日军侵华真相，谋求援助。此外，她为营救救国会“七君子”而奔走，组织保卫中国同盟，通过她的威望，团结各界人士开展救援工作“作具体实际的活动”，有力地支援前线的战斗。此外，宋庆龄还秘密地协助着中共的革命事业。

此时已进入晚年且身患重病的蔡元培，从年龄、体力和精力上虽然已不可能再做具体实际的工作，但他除了仍竭尽全力领导中国科学事业的最高机关——中央研究院，以促进中华民族强盛为己任直至生命的最后以外，他以中国文化界和教育界领袖的身份或单独或领衔多次不遗余力地向各种国际性组织发出电文抗议日军侵华的暴行，强烈吁请国际社会制裁日本。他还以国民党元老的地位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宋、蔡的这种默契分工虽属偶然，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两氏略有不同的社会背景。

如果说在清末蔡元培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与实践比宋庆龄丰富，亦即由于她的年龄和经历使宋庆龄还不清楚如何达到振兴中华民族的话，那么下述重要事实揭示了两氏对民族主义认识的发展已达到了尽乎一致的程度。

他们在筹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后又有几次重大的共同活动，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逝世，宋庆龄亲往中央研究院报告蔡元培，并商议葬仪事宜“是日晨五时，鲁迅先生（周树人、豫才）去

世，孙夫人来院告我，并约我加入治丧委员会。”⁹⁸宋、蔡共同主持丧葬，蔡元培亲为执紼送殡，两氏并致悼词。这次有约10万人参加的送殡活动，实际上是一场争取民族自由，向黑暗挑战的斗争。

蔡元培的民族主义原则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抗战前两年，他挥泪劝告汪精卫一事，就清楚地显现出他在民族大节上的不苟态度。罗家伦说：“在七·七抗战前两年，先生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这后变作汉奸的汪精卫请先生晚餐，进的是西餐。先生苦劝他改变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的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看见先生的眼泪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⁹⁹王世杰回忆此事说：“蔡先生在席上对主人说，‘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精神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一面说，一面两行热泪已经流到杯中了。主人极不安。举座无不感动”。¹⁰⁰上述所引，能说明蔡元培晚年的民族主义思想。

日军侵入上海以后，许多民主人士纷纷移居香港。宋庆龄也于1937年12月23日离开上海，把革命活动的基地转移到那里。蔡元培早于宋庆龄一个月到达香港，1937年11月29日“晚七时到香港，有陆海通旅馆招待人称该馆有空房，因以行装付之”。¹⁰¹

这里不能遗忘另一个重要史料。在港期间宋、蔡两氏有一次重要的聚会，即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以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1938年5月20日在圣约翰大礼堂举办艺术品展览会。应宋庆龄之邀，蔡元培出席该展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了抗战与美术之关系的演说，他在讲演中号召大众“在全民抗战中担得起一份任务。”¹⁰²蔡元培在当日的日记中是如此详细地记载这一活动的过程的“前数日，孙夫人及廖女士偕陈友仁之子伊范来访，言陈君擅长木刻画，近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两团体发起，开一艺术品展览会于花园道圣约翰大礼堂，陈列现代英美美术作品及第一次中国国防美展中代表作品，自21日至23日（自24日至30日则移陈干诺道65号华商总会图书馆）。将于20日下午四时半行开

幕礼，约我及香港大学副校长 SLOSS 君致辞。我允之。今日下午，廖女士来接，养友（即蔡元培夫人周养浩——笔者注）同去。渡海后，孙夫人备车等候，同往圣约翰大礼堂。晤港督夫妇，副校长夫妇，许地山夫妇，云五（王云五——笔者注）、彬和（陈彬如——笔者注）、江亢虎、陈其尤诸君。我演说抗战期中需要美术之陶养，请云五译成英语。会毕，孙夫人约同车游浅水湾，送至摩理臣山道 38 号云五家中”。^⑧这一段日记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宋、蔡之间的关系以及宋庆龄对年长的蔡元培的尊重。另据蔡元培于 1938 年 11 月 17、18 日两天的日记记载，可以佐证宋、蔡在港为国内的抗日救亡活动所作出的功绩，其中 11 月 17 日的日记所记“任叔永（任鸿隽——笔者注）及其夫人邀我午餐，座有子竞（周仁，周养浩之弟——笔者注）及叶企孙。企孙言平津理科大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轰炸敌军通过之桥梁，有成效。第一批经费，借用清华备之公款万余元，已用罄，须别筹”。拟往访孙夫人，属作函介绍，允之。”翌日的日记载“致孙夫人函，由企孙携去。”^⑨

纵上所述，曾以香港作基地，为国内的救亡运动作出贡献的宋庆龄的作用是什么别人所绝不能替代的，她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高峰。蔡元培是在抗日战争的中途、在香港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距那次讲演仅一年多以后他就逝世了，但尽管他已大病，仍竭尽全力地领导着中央研究院。这里有必要提示蔡元培下列活动的史实：在他去世前 8 个月还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第二届名誉主席，在去世前 3 个月他抱病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作会歌，从歌词的全文，可以更清楚地展示他直到去世前仍持有的饱满的民族主义理念和昂扬的爱国主义情怀：“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羸拙。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⑩；在他逝

世前一个月即1940年2月5日，被毛泽东、吴玉章等发起和赞助、在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推为名誉主席；同月20日即他逝世前半个月，他和宋庆龄、何香凝、毛泽东、朱德等人被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尽管他无法出席，但他的名字仍被列为众成员之首。举这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旨在证明蔡元培的作用。行文至此，当引吴玉章于1940年在悼念蔡元培文中所言以概括蔡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与四年前毛泽东致蔡元培信相映证，“九一八日寇进攻中国以来，国难日趋严重，我党中央屡向全国人民及国民党中央提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子民先生直接间接对于国内团结共御外侮，用力甚多，卒能于七七抗战以前，达到国、共合作的目的。前年4月，我由欧洲回国，道经香港得与晤谈时，他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今当日寇深入，举全国之力以抗战，……而驱逐日寇出境之战斗任务，还非常艰巨，……国家前途之危险实甚，正需国民党中明达之士如子民先生者主持大计，砥柱中流，以宏济艰难。不幸先生遽尔溘逝，这不仅是我文化界的一大损失，而且是全国抗日人民的重大损失”。^⑧周恩来挽蔡元培联更是对蔡一生所坚持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最确切的写照“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⑨这里所引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吴玉章语可见蔡元培晚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种坚定的抗日立场，在国民党元老中并不多见，它揭示了蔡元培的思想境界。

宋庆龄、蔡元培民族主义思想的另一侧面

综上回顾宋庆龄与蔡元培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对于理解他们一贯持有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有意义的。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从革命史观的角度来观察，宋庆龄的思想认识高于蔡元培，而如从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的视点出发，两氏的思想基础和认

识程度却是一致至少是相近的，从文化史的层面来考察蔡元培，他为振兴中华民族，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所作出的贡献又是大于宋庆龄的。宋庆龄与蔡元培在抗战中所处的地位略有不同，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从前面所论述中可以看出，宋庆龄是一个充满着朝气，从事具体活动以援助抗日，而蔡元培是一个忠厚长者，从高层和舆论以促进抗日。他们作用的相异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思想的一致性以及坚持民主、民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主张的一贯性，并从他们思想发展的轨迹可以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动因。

然而，宋庆龄与蔡元培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就是在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他们的日本观也是两重和着眼于未来的。

如前所述，他们在政治上一方面批判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一方面又注意把军国主义同日本民众区别开来，表现了两氏不仅具有高昂的民族主义气概而且还有博大的国际主义胸怀。在文化层面上，他们主张两国人民要加强交流，宋庆龄在《把鲁迅先生的战迹献给日本人民》一文中指出“我相信，由于他的著作的介绍，日本的思想界将能最好的理解中华民族，使中日两国劳动人民达到进一步的理解和结合。”^⑧蔡元培注意学习日本，多方位地研究日本，希望从日本的近代化思想中得到新知，受到启示。他分析日本强国的原因，学习近代日本的教育制度，注视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方法，借鉴日本文化中有用于中国的合理成分。他从清末民初的学习、研究日本发展到后来的借鉴日本经验以作用于中国。这就说明，素有“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自近代以来国家关系上存在着主流和支流、积极和消极之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幸是暂时的，友好是长期的。道路是曲折的。友谊是主流，是趋势。从宋庆龄、蔡元培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反映出来的日本观便是明证，他们的这种两重性和着眼于未来的精神体现了一个思想家的

远见,也正是这种精神构筑了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另一个趋势。

笔者认为,目前研究宋庆龄、蔡元培负革命成败民族兴亡之大任,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民族主义精神,绝不是仅仅单纯出于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的“纪念史学”的需要,而应该估量这种思想对当前我国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所进行价值观念革命时的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在如何保持和坚持民族主义精神的重大课题上,宋庆龄和蔡元培的理念和思想给我们以某种启示。

(作者工作单位:日本新潟国际信息大学)

注释:

① 宋庆龄,《致英国工党书》,见《宋庆龄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下同)第 202 页。

② 宋庆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同上书,第 192 页。

③ 蔡元培,《致国际联盟大会主席电》,见《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版,以下同)第 7 卷第 224 页。

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 年)第 114 页。

⑤ 蔡元培 1895 年 4 月 17 日日记手稿。

⑥ 蔡元培口述传略,见拙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 年版,下同)第 251 页。

⑦ 蒋维乔《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 25 页。

⑧ 蔡元培 1911 年 10 月 18 日致吴稚晖函,《蔡元培全集》第 2 卷第 125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下同)。

⑨ 蔡元培自写年谱手稿。

⑩ 《宋庆龄自传》(光华出版社 1938 年版)第 38 页。

⑪⑫ 转引自盛永华著《宋庆龄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6 页。

⑬ 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宋庆龄选集·上》第 1 页。

⑭⑮⑯ 孙中山《三民主义》讲演稿,见曹锦清编选《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5、6 页。

⑰ 转引自蔡元培,《三民主义与国语》,见《蔡元培全集》第 5 卷第 412 页。

⑱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3年版,下同)第581页。

⑭ 同上书第584页及《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9页。

⑮⑯ 蔡元培日记手稿。

⑰ 罗家伦:《伟大与崇高》,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84页。

⑱ 王世杰:《追忆蔡先生》,见《蔡元培先生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422页。

⑲ 蔡元培:《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美术展览会演说词》,见《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212页。

⑳㉑ 蔡元培日记手稿。

㉒ 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274页。

㉓ 吴玉章:《纪念蔡子民先生》,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98页。

㉔ 周恩来挽蔡元培联,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3页。

㉕ 见《宋庆龄选集·上》第170页。

宋庆龄与蒋介石

——以抗日战争为中心论述宋蒋关系演变的原因

林家有

一

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的演变是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缩影。他们两人都曾在孙中山爱国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启迪下，追随孙中山革命，但由于他俩之间对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品格和道德不同，便成为在孙中山生前尤其是在孙先生逝世后影响中国革命和他俩之间关系的重要根由。

宋庆龄作为二十世纪全世界的伟大女性，中华民族的瑰宝，无论是政治远见，思想的深刻，爱国主义的激情，以及个人品格都是完满而又独特的。她的一生总是同时代的脉搏谐和一致，不断进步，不断前进；她一生为全人类的和平友好事业，为妇女的权利与进步，尤其是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振兴做了大量工作，贡献巨大。凡是跟她有过交往的人都深切感到，她给人温暖，给人力量，给人智慧，也给人勇气。

蒋介石则不同。他狡猾多变，又为人狠毒，他把个人的好恶凌驾在别人之上，知人知面不知心，是一位令人生畏的独裁者。尽管他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后，曾经拟订了一个“韬光养晦以待时”的行动纲领，表示自己在“四十岁内，专心求学，培养德业，不问世事；四十岁以外，奋进功名，雄飞世界，行道济时。”^①这个纲领的前四句是假的，后四句则是真的，真真假假，以假乱真，正好反映了蒋介石，作为一个野心家的心路和心迹。

宋庆龄对于蒋介石是没有好印象的。据美国著名作家埃米莉·哈恩在《宋氏三姐妹》一书中透露，蒋介石是在孙中山家里认识宋美龄的，还说蒋介石请孙先生说服夫人庆龄同意她的妹妹美龄下嫁蒋介石，而孙先生一直不敢将此事告夫人，后来庆龄知道此事则坚决表示，她“宁可看到妹妹死，也不愿意让她嫁给一个在广州城内至少有一两个情妇的男人。”^③这虽是宋庆龄从蒋介石的男女作风上看他的人品，但也包含着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基本看法：蒋不是宋氏家族中理想的男人。

每个人的历史终归是每个人的思想与行动的结晶。人们每天都在创造历史，而且每天也都在改写自己的历史。宋庆龄与蒋介石的最大不同，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公，即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去创造自己的历史和改写自己的历史；一个则是一心一意地为私，即为个人的权利、野心一步一步地改写自己的历史。在孙中山逝世之前，蒋介石的野心和权力欲望已经暴露，但由于孙中山在高位在掌舵，他还不可能为所欲为，因此蒋介石采取两面派手法。然而，孙中山长眠后，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蒋介石则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法驾驭，夺权和独裁的野心明显暴露。对此，宋庆龄看得十分清楚。她为了维护国民革命的成果，在国民党内外掀起承继和捍卫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宣传高潮，赢得国民党“二大”与会代表的拥护与尊敬，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她参加各种会议，劝说妇女和各界人士要明白孙中山三民主义，了解国民革命的目的，坚持革命到底。这时期，蒋介石与宋庆龄表面上还有某些合作，但实质上已经各行其道，各走各的路。11月16日，宋庆龄一行离广州取道韶关、南昌前往武汉。12月2日，宋庆龄一行到达南昌，蒋介石还组织盛大欢迎会。^④此间，宋庆龄参加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的庐山会议。会后，蒋介石和邓演达、宋庆龄又一起由庐山前往九江。^⑤然而，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期间在迁都和要不要继续执行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等一系列

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蒋介石与宋庆龄之间已经进行了尖锐和激烈的斗争。

后来，宋庆龄与蒋介石由政治上的分歧，发展到行动上的严重对抗，主要的原因是孙中山逝世后，应该如何对待孙中山的思想、政策和事业等重大问题上看法不一引起的。这个分歧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的，而是关系到当时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事实证明，宋庆龄当时的所作所为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要求国家统一、安定、发展的愿望，因此她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戴和崇敬，而蒋介石则反共、反苏、反人民，为国人所不齿。

二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虽标榜自己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信徒，但在行动上则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背叛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撕破了自己拥戴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破坏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宋庆龄立即作出反应。4月22日，宋和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号召革命军民起来跟蒋介石作斗争“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⑧7月12日，蒋介石致函宋庆龄，要求她“即日回沪”，宣称“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妄想借宋庆龄的威望以助其反革命的声势，宋即予以拒绝。^⑨7月14日，汪精卫又在武汉举行“分共”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制订的国共合作政策。针对蒋、汪新右派的背叛行为，宋庆龄于17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坚决不同违背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人同流合污。她指出：“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不能贯彻

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她号召国民党员和广大民众起来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把革命引上歧途的人作坚决斗争。^⑧8月1日，宋又与毛泽东、邓演达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宋庆龄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⑨为了抗议蒋、汪集团反苏、反共，公开与孙中山革命三大政策抗衡，宋庆龄决定访问苏联以实际行动与蒋、汪对抗。8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指出：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领袖们”，实则如出一辙的小政客，他们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妄图“依赖新军国主义以完成革命的伟大事业”，但是“他们必然失败”，因为他们走的是一条以人民为敌的道路。8月底，她便与陈友仁父女等人乘船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9月6日，宋庆龄抵达莫斯科后发表一系列声明，向全世界宣告那些背叛孙中山的国民党冒牌领袖，并不代表革命的国民党，指出革命只是暂时挫折，号召世界人民用各种实际行动支持中国革命的力量去反对革命的叛徒和一切反动派。12月17日，当宋接到蒋介石与苏联断交的电告后，即复电严斥，指出：“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断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劝蒋趁早“悬崖勒马”。^⑩23日，宋再电蒋介石，对蒋诬蔑其留在莫斯科是受别人胁迫的结果给予训斥，说这是对她的诽谤和侮辱，揭露蒋介石及其一伙“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并表明她要誓死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坚定地“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⑪

由此可见，宋庆龄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和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继承人，由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和政策，她便与蒋介石由革命的同路人变为敌对者。从1927年8月至1929年4月一

年多时间里，宋庆龄在国外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的虚伪、无耻、卑鄙和渺小，高高地举起孙中山革命的旗帜，从而赢得了国内外一切主持正义，反对邪恶势力的朋友们的崇敬和爱戴。

蒋介石不仅宣称他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并想通过他与宋美龄政治投机的结合，以孙中山亲属的名义，拉拢孙夫人宋庆龄作为桥梁，踩着她的走向自己的目标；同时他又试图把宋庆龄和她的事业从人们的心中抹掉，以便树立其权威，这使宋庆龄感到极大的羞耻和愤怒。她表示她绝不会同败坏了中国革命和孙中山事业的蒋介石之流妥协，她决心要将孙中山开创的民主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1929年4月底，宋庆龄从德国启程经苏联回国，参加将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5月28日，宋庆龄等随孙中山的灵车抵达南京浦口，蒋介石、宋美龄等也来迎灵。6月1日晚，宋庆龄在南京参加完孙中山的国葬仪式即离南京返上海。蒋介石要宋庆龄回来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一行动拉拢宋站到他们一边，来挽救因军阀之间派系斗争所造成的危机。6月9日，宋美龄又专程从南京到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南京参加将要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但宋庆龄识破蒋介石玩的阴谋把戏，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一切“善意”都断然拒绝。为避免在人民中造成混乱，她几乎拒绝了与南京政府官方或半官方的一切社交。8月1日，宋庆龄应“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在电报中她严厉地谴责了蒋介石政权，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体，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然而，“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为了避免蒋介石政权找麻烦，中文报纸和英文报纸都不登这个电报，只有一家例外，但这家报纸登出的是一则从日文翻译过来，又完全被颠倒了黑白的电文，把宋庆龄写成是赞同恐怖政

策的人。宋庆龄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⑧

蒋介石和宋美龄为了讨好宋庆龄，不仅宋美龄亲自到上海找姐姐倾谈，而且还指派戴季陶夫妇去找宋庆龄，说服她到南京去。8月10日，戴氏夫妇到上海见了宋庆龄，她们之间谈话笔记后来发表在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China Tomorrow》)刊物上。这篇谈话真实地反映了宋庆龄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合的态度，也是宋庆龄鄙弃蒋介石，拒绝与蒋介石合作的宣言书，所以很重要。戴夫人问孙夫人为什么不到南京去。戴夫人说：南京紫金山“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孙夫人庆龄直率地回答戴夫人的提问：“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宋庆龄接着又指出：“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贵党”，你们这样做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现在“没有哪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因为“我除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⑨这是继宋庆龄拍给国际反帝大同盟那篇措词激烈的电报之后，又一次强烈地抨击了蒋介石和他的政权。这是宋庆龄与蒋介石的又一次摊牌。她为什么如此对待蒋介石？无他，是因为她认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也就是背叛了孙中山的事业，原来的国民政府是革命政权，蒋介石叛变后建立的南京政权便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政权，所以她虽可怜她的妹妹美龄，但她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她不能与蒋介石合流。这是非常可敬可颂的精神，也

是一种很有胆识和勇气的表现。9月间，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再次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9月21日，宋庆龄登上开往法国马赛邮船的邮船前往德国，以实际行动同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决裂。这是宋庆龄对蒋介石南京政权严厉的谴责和抗议。事到如今，只能怪蒋介石。

三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造成内战，极大地耗损了民族财富和人力资源，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路轨，并炮轰沈阳城，明目张胆地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宋庆龄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8月13日，宋庆龄从欧洲回到上海。^⑧8月16日宋庆龄与宋氏家属，还有蒋介石、孔祥熙等参加母亲倪太夫人的葬礼。9月5日，宋赴南京祭扫孙中山陵墓，9日即返上海。蒋介石为实现其“攘外安内”政策，九一八以后把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杀害了。宋得悉蒋大开杀戒处决了邓演达勃然大怒，发表宣言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促成国民党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党内自己的领袖蒋介石。宋明确表示对于国民党的灭亡，我们不必惋惜，因为它的领袖已经堕落，我们不能依靠它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⑨此后，宋庆龄坚持反蒋抗日政策，她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友好人士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她四处奔波募集款项和物资，成立“国民伤兵医院”及慰问上海十九路军抗日受伤将士，并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捕捉的爱国革命人士，为保障和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行英勇斗争。

蒋介石政权阻挠上海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居然答应日本侵略者的要求，从上海撤走中国驻军，并在全国禁止抗日运动。宋庆龄出于爱国的激情，她发表很多谈话和文章，谴责蒋介石政权的不抵抗主义，她严厉指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商谈秘密条件，将东北和华北奉送给日本，而把其余的中国领土贬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这不是生路，这是中国民族的死路。”^⑧她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向那些背叛国家、把我们的国土一省一省地出卖给帝国主义者的人们作斗争”。^⑨

这个时期，宋庆龄的主要政治倾向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实现“全体武装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⑩并呼吁世界各国断绝对蒋介石政权的一切支持，迫使蒋介石停止反共，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投身抗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华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威胁，因此宋庆龄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态度也由对抗逐渐转变为争取对话、力求合作，一致对外。

1936年11月10日，宋庆龄在《孙中山诞辰纪念词》中讲了这样的话：“在目前的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应该认定我们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为了实现打倒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⑪停止一切内战，完成抗日救国的任务。基于这个认识，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不念旧恶，主张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次日，宋庆龄与胡子婴商议邀请何香凝一起同去西安，劝说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后因交通问题未能成行。^⑫由于多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各项谈判达成了协议。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条件，担保不再打内战，同时，蒋还允诺抵南京后释放爱国领袖；宋子文、宋美龄也答

应与宋庆龄商议办法分批释放政治犯。^⑧这是宋庆龄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转机。

由于蒋介石接受抗日，宋庆龄立即作出反应。她接受9月18日毛泽东来信的劝告，改变了自1927年以来对国民党中央的抵制态度，决定以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1937年2月15日于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领衔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13人联名，向大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迫使全会接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通过同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决定在统一军队编制和政权形式等条件下，可与共产党合作，将武装剿共方针改为“和平统一”共产党的方针，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

此后，蒋介石虽不愿意根本改变独裁政策，但在七七抗战爆发后，他也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宋庆龄为推动蒋介石加快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步伐，接连发表文章，重申孙中山关于“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的思想，^⑨强调国民党领导人必须改正“十年反共战争”的错误，赞扬“共产党与政府合作抗日的诚意”，指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⑩

经过宋庆龄和各方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推动与督促，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终于在9月22日和23日，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正式宣告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而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创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新局面，奠定了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的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宋庆龄欢欣鼓舞，内心无比兴奋。她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前嫌，发表文章肯定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态度的转变，肯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所有的各党各派都一致联合起来，捐弃了过去的异见，大家集中于对付和击退日本侵略者”，在精神、行动和意志上显示的巨大力量。她说：“中国红军在

朱德将军的指挥之下，今天已跟中国其他军队共同在蒋介石将军领导下作战了”，这是势力的统一，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⑨9月24日，宋庆龄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一文，指出：“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她强调，国共两党都要记取十年分裂的惨痛教训，“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她还希望大家都要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⑩1月6日，宋庆龄又发表《两个十月》一文，再次表达其对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喜悦，她在文中指出：“充满了希望的白昼正在代替令人失望的漫长黑夜”，“今天在我们领土上的每个角落里我们听到了炮火的怒吼，这是庆祝我们全国统一的礼炮”。她并坚信：“我们将不再是自己国内的封建奴隶。……奴役的枷锁将不再束缚在我们的民族身。”^⑪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宋庆龄在香港，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她密切注视着大会的进行，当她得见大会宣言和纲领的内容后，她即与何香凝共同署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声明，认为国民党复订抗战建国纲领“甚为适当与必需”，她俩除向领导代表大会之蒋介石致以敬意外，还向全党祝贺，并提出坚持抗战到底的七项具体主张，包括制裁国民党的腐败行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各党派精诚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改善人民生活等项，极尽全力推动国内局势向进步方面发展。^⑫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至抗日战争结束，宋庆龄虽发现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并非真诚，但她认为蒋介石坚持抗战毕竟是个进步，因此在这期间，宋凡是谈到蒋介石之处均称“蒋中正同志”或“蒋委员长”，这是个明显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根本原因不是宋庆龄屈服于当时的局势，更不是因为蒋介石是她的妹夫亲情，而是蒋在“西

安事变”后接受了中共和宋庆龄重新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表示愿意重新建立国共合作，共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正由于宋庆龄同蒋介石改善了关系，才使她能和姐姐霭龄、妹妹美龄重新团聚。1940年3月31日，宋氏三姐妹一起抵重庆，成为当时传媒议论的中心。尽管这次宋氏三姐妹在重庆团聚的原因有种种说法，但正如爱泼斯坦先生所指出，宋氏三姐妹团聚的基础“既不是任何一方放弃政治信仰，也不是纯粹的私人关系。就像中国各党派战时的统一战线一样，这里面‘既有团结，又有斗争。’”^①宋庆龄决定赴重庆是为了联合抗战，是用行动实现其团结、统一、联合抗战的理想。正如她在《渝行观感》的谈话中所指出的，是因为民族危机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国内各党派都应“一致团结对外之认识，日寇汪逆宣传国内分裂在即，只能说是他们的梦想，际此大敌当前，国难未除，我信贤明当局，均不愿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之举，为日寇所乘。”^②无疑，宋庆龄的重庆之行，对实现全民抗战，对争取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综合上述可见，宋庆龄与蒋介石都是很有个性的政治人物，他们之间关系的演变，充分地表现了他们之间的理想、道德和价值观的不同。在抗日战争时期，宋蒋关系的改善是由于蒋介石表示要同中共合作抗日，但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而宋庆龄则把中国共产党视作真诚的朋友，坚决主张联共抗日。正由于这样，宋庆龄不可能成为蒋介石政权的装饰品，而蒋介石也不可能完全接受宋庆龄要他放弃独裁，扩大民主，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主张。因此，宋庆龄与蒋介石的合作是临时性的，不可能是持久的。后来他们的行动完全证实了这点。

（作者工作单位：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注释：

①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年谱初稿》“导言”，第4页，档案出版社

1992年12月版。

② 参见王朝柱：《宋美龄和蒋介石》，第1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③ 《林伯渠日记》，第5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7月版。

④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1日。

⑤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⑥ 《蒋介石致宋庆龄函》，影印原件藏北京宋庆龄故居，参见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⑦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3—4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⑧ 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⑨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9—52页。

⑩ 上海《新闻报》，1927年12月19日。

⑪ 宋庆龄：《再致蒋介石电》，《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8—69页。

⑫ 参见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66—267页。

⑬ 宋庆龄：《与戴传贤谈话笔记》，《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3—78页。

⑭ 尚明轩等，《宋庆龄年谱》第73页，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280页。郑灿辉等：《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第2页，说是6月回到上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⑮ 上海《申报》1931年12月20日。

⑯ 宋庆龄：《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7页。

⑰ 宋庆龄：《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8页。

⑱ 宋庆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42页。

⑲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54页。

⑳ 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教国会时期二三事》，《宋庆龄纪念集》第11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㉑ 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㉒ 宋庆龄：《儒教与现代中国》，《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78页。

㉓ 宋庆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4页。

㉔ 宋庆龄：《致英国工党书》，《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1—202页。

㉕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5—206页。

㉖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13—218页。

㉗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23—226页。

②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 365 页。

③ 重庆《新华日报》，1940 年 5 月 31 日。

抗战时期的宋庆龄与邹韬奋

陈 挥

宋庆龄和邹韬奋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生长于同一时代，很早就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改造社会的愿望，树立了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伟大抱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成熟。“九一八”事变以后，宋庆龄和邹韬奋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教育下，政治思想迅速发展，先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岁月里，他们亲密合作，并肩战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

30年代初期，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抽调大量精锐部队进攻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在国统区制造白色恐怖，非法逮捕监禁和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肆意蹂躏人权。面对这种黑暗统治，宋庆龄于1932年夏秋间，开始筹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揭发这种违法现象和无人道行为，营救一切受害的人们。10月31日，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就组织这“专门处理政治犯事件”的“特种委员会”亲赴武汉找蒋介石交涉。^①返沪后，她又致函某一外报称“予现拟参加组织一团体，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及清共时被牺牲者为职志。予盼中外知

识阶级及友朋参加是项运动。”^②

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发表宣言，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月30日，蔡元培在上海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大楼（现金门大酒店）主持记者招待会，宣告由宋庆龄任主席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邹韬奋应邀出席。宋庆龄因病未到，但仍向新闻界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同盟的宗旨是，“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她强调，“同盟首先关切的是援助那些拥塞在监狱中的大量无名无告的政治犯”。她希望“在舆论方面兴起一个有利于自由和正义的潮流。”^③

邹韬奋认为，当时“所谓特务已经横行，他们避开法院和法律，用绑票方法秘密捕人，酷刑逼供，惨无人道，随意处死，有冤莫伸。在这种无法无天的黑暗情况之下，有用的人材和无辜的青年被牺牲的不知多少”！^④“也许以宋、蔡诸先生身负党国重望，益以精诚热血，力争正义，为暴戾恣睢者所未敢横加摧残，收效或非平常民众团体所可同日而语，我们当然希望该同盟之积极进行，并愿竭其绵力所及，实践孙夫人所谓‘对于共同之使命应有联合之战线与忠实之合作’”。^⑤因此他在这次招待会后毅然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了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积极参与了同盟的各项活动。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细致、切实有效的工作，特别是营救了一些被国民党非法逮捕的共产党员、反蒋爱国民主人士，发挥了一个公开的、合法的群众团体在白色恐怖下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由于同盟敢于揭露国民党的残暴，矛头直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统治核心，坚持不懈地同他们的黑暗统治作斗争，因此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必须除之而后快。他派遣大批特务监视宋庆龄邹韬奋等同盟成员的行动，破坏同盟的活动，而且还策划种种阴谋企图暗杀宋庆龄。但慑于宋庆龄

在海内外的崇高威望，不敢遽然下手，只好下令于1933年6月18日暗杀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妄图以此达到“杀杨儼宋”的目的。

宋庆龄获悉杨杏佛被刺噩耗后，立即发表声明，严肃指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和“他们所雇佣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她坚定地表示，杨铨虽然被残酷地杀害了，“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她还警告国民党当局：“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暴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④

6月20日，杨杏佛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入殓。当时国民党特务曾扬言，要在这一天暗杀其他“同盟”成员，但这并没有吓倒革命者。宋庆龄、鲁迅、邹韬奋等尽管都被列入黑名单，但仍冒着很大危险，前往特务严密监视的殡仪馆吊唁。邹韬奋认为，杨杏佛“为保障民权努力，为保障民权运动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这一点说，他的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⑤他在7月8日出版的《生活》周刊上撰文指出：“世界上黑暗的国家，统治者对于革命的男女青年的摧残蹂躏”，“不但惨酷而已，而且还要用极卑鄙恶劣的手段，造作种种蜚语，横加侮辱，以自掩饰其罪恶。这种手段当然是极端笨拙愚蠢的，因为略明事理及知道事实的人决不会受其欺骗，在统治者自身，徒然暴露其心慌意乱，倒行逆施，增加大众的愤怒和痛恨罢了。”“俄国革命便由统治者在这种压迫青年自掘坟墓中酝酿起来”。^⑥

二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又伸向了华北。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推动了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1月16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创刊，首先举起了鲜明的抗日救国旗帜，各界爱国人士也都纷纷行动起来，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救国会。救国运动以燎原之势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十人为常务委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规定，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持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它现阶段的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⑧7月15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更是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救国会这一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意志和要求的呼声，引起了国内各界人士的重大反响，特别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同。毛泽东发表了《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充分肯定了救国会的主张，并表示愿意在救国会的纲领下签名，同救国会及“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斗争”。^⑨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各地的救国组织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加强，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展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36年10月19日，中国伟大的革命文豪鲁迅逝世了。宋庆龄获悉这一不幸的消息后，极为悲痛，立即前往鲁迅寓所吊唁志哀，并与许广平、周建人等共商治丧大事，成立了以她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并电告救国会总干事胡子婴，提出鲁迅的丧事应由救国会来办，而且要发动民众，把鲁迅的送葬活动搞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⑩第二天，她又亲自陪许广平视察了墓地，还以三千重金为鲁

迅购买了一具能供群众瞻仰的、有玻璃窗口的棺木。

22日下午，鲁迅灵柩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宋庆龄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救国会领导人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在隆重的葬礼上，宋庆龄和邹韬奋等人都发表了演讲。宋庆龄激昂地说：“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⑧邹韬奋的演讲只有一句话：“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后来宋庆龄自己回忆说：“当时白色恐怖厉害，在鲁迅的追悼会上发言要冒生命危险。”^⑨但是宋庆龄和邹韬奋都不怕牺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邹韬奋在10月25日出版的《生活星期刊》撰文指出，“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个文学家，并且是一个思想家。他的伟大是在他对于一般民众的普遍而深入的影响。”“我觉得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遗产，是他那样始终不懈的积极的斗争精神。他是一位最早反封建的努力革命的老将。无论怎样的穷困，都屈服不了他；无论怎样的压迫，都屈服不了他。我以为我们后死的斗争者，应该承袭鲁迅先生的积极的斗争精神，为民族解放的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努力前进。”^⑩

国民党自己不抗日，也不许人民抗日。救国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他们的摧残。他们先威胁利诱，后竟然于11月22日晚上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等7位救国会领袖，造成了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从而激起了人民的极大义愤。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发表声明，抗议这种违法的逮捕。她认为，帝国主义者主使的这种手段，“仅能更引起中国人民反日忿怒和爱国的热诚”。她庄严宣布：“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罢！他们虽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

被捕，但还有全中国的四万万人民在这里哩！”^⑧她还和何香凝等16人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要求政府“立即把沈钧儒等七位先生释放”。如果“沈先生等一天不释放”，“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她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中强调，“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⑨1937年7月5日，宋庆龄扶病偕同胡愈之等12人，由上海乘火车去苏州向江苏高等法院投案。几经交涉，检察官勉强表示可以对宋等人侦查，宋庆龄等人才决定返沪补递证据，再听候传押。宋庆龄等人还在狱中看望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对他们表示了亲切的慰问。直至晚上九时多，宋庆龄才乘火车回上海。翌日，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联名写信给宋庆龄，表示对斗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以感谢宋庆龄的关怀。

由于宋庆龄等人的积极营救，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坚强不屈的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大力声援，由于“七·七”事变后全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的租界成为孤岛。宋庆龄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决定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6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她亲自担任主席。《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指出：“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⑩

宋庆龄领导下的“保盟”主要活动是广泛动员和争取海外华侨与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以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为主要目标。他们冲破国民党的种种军事封锁，把大批

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救援物资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手中，还积极介绍和输送外国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大夫都是在宋庆龄和“保盟”的协助下前往抗日前线参加战地服务工作的。“保盟”还出版了英文半月刊《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向国外报道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使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对争取他们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支援起了很大作用。

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先后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战宣传工作。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但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也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肆行高压政策，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都被封闭，他主编的《全民抗战》被迫停刊，他的活动也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1941年2月24日，邹韬奋愤而辞去了国民参政员一职，并于次日凌晨离渝，准备到香港去从事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到达香港后，邹韬奋积极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担任了“保盟”执行委员，并为《新闻通讯》撰稿。韬奋夫人沈粹缜在追念宋庆龄时说：“一天，韬奋从庆龄同志家开会回来，对我说：‘孙夫人募捐来大批救济物资，准备送往解放区，需要请几个人去帮忙整理。她让你也去，你去吧！’我欣然同意。就这样，我和廖梦醒、倪斐君等一起参加了整理工作。记得那天我遵照嘱咐，到了香港湾仔的一个仓库里。庆龄同志亲切和我们握手，随后像谈家常一样提出了要求，她说解放区缺医少药，这些募捐来的物资有衣服、日用品、医疗器械、药品、奶粉罐头，品种很多，请你们帮助分类整理，集中装箱，我会想办法运到解放区的，我们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还编了物资细目。庆龄同志自己一有空也来帮着整理。”^⑧这个时期，邹韬奋还和金仲华一起，担任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文版的主编。实际上从撰稿、编辑到出版、发行都是由他们两人亲自动手的。《“保盟”通讯》中文版向海外的中国人介绍了“保盟”的工作

和中国抗战的情况及物资需求，在海外华侨社团中影响很大。为了让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看到进步报刊，香港的中共党组织决定创办一份统战性质的报纸。廖承志和宋庆龄商量后，决定由“保盟”拨款，请邹韬奋、金仲华、邓文钊三位“保盟”执行委员和夏衍、范长江、胡乔木等人一起参加筹办并担任编委。4月8日，中文晚报《华商报》正式创刊，宋庆龄亲笔题词：“为坚定抗战作有力之后盾，为保持团结作有效之喉舌，为实现民主作正义之呼声，为人民幸福作出正义申诉，给予侵略者以严重之打击。”邹韬奋对《华商报》的最大贡献是撰写《抗战以来》。从4月8日创刊开始，一共写了77篇，近二十万字，至6月30日才登完。他根据自己切身经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对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丑恶行径作了无情的揭露，受到海外侨胞的热烈欢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韬奋继续为《华商报》撰稿，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先后发表了近三十篇论文。这些文章严厉抨击了国民党政府反民主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尖锐驳斥了他们阻挠、破坏民主运动的种种谬论。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始进攻香港。在香港陷落前的6小时，宋庆龄才在大家的极力劝说下登上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赴重庆。不久，邹韬奋等一批文化人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也安全撤离了香港险境。

四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不幸在上海逝世。9月26日，宋庆龄和董必武、林伯渠、冯玉祥等72人发起召开邹韬奋追悼会，并在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启事。10月1日，邹韬奋追悼会在重庆举行。宋庆龄和林伯渠、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等8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她亲题了“精诚爱国”的挽词，对邹韬奋表示深切的哀悼。会场上国民党特务密布，但慑于其崇高威望，未敢下手进行破坏。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了上海。她非常关心韬奋夫人沈粹缜，多次派李妈到其住处探望，送去日用品和水果。有一次宋庆龄还派车接沈粹缜到她家去吃饭，并围上小饭单亲自下厨做菜招待。席间，宋庆龄真诚地对沈粹缜说，“邹先生去世了，你不能太悲伤，身体要紧。邹先生的文章代表人民讲话，在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下，为进步青年指明了出路。他用他的笔做了很多好事。你有机会也要到社会上去做事，你能做的。”^⑩建国以后，沈粹缜一直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成了亲密的好朋友。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7月24日是邹韬奋逝世五周年的日子。上海各界人士在解放剧场举行了纪念大会。宋庆龄在会上说：“韬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英勇的人民战士。他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最光辉的榜样。”“今天，以沉痛的心情悼念韬奋先生，但是大家的信心是更强了，因为韬奋先生一生所努力的革命工作，已经初步完成了，因为韬奋先生的榜样，已经照耀出革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一条大路。”^⑪

几十年来宋庆龄始终把继续完成韬奋为之奋斗的事业、发扬韬奋精神，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1979年7月24日，年近九旬的宋庆龄还欣然命笔，为纪念韬奋逝世三十五周年题了词：“韬奋同志舍己为公，用他的一枝笔为革命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里。”^⑫1981年5月12日清晨5时，身患重病的宋庆龄让人扶着艰难地走到写字台旁坐下，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韬奋手迹”四个大字。这是她应韬奋夫人沈粹缜的请求为韬奋纪念馆编选的《韬奋手迹》题写的书名。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然把弘扬韬奋精神的使命放在自己的心上。这几个在她重病中挣扎着起来题的字，竟成了她最后留下来的题签。宋庆龄病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沈粹缜日夜守护在她身边。5月29日清晨，宋庆龄已处于弥留之际，她微睁双眼看到在病榻前陪伴她的沈粹缜，断断续续地说：“沈大姐，

你休息吧！……你休息了？……一定要休息。”一连说了三个休息。这是宋庆龄最后说的话。^②

宋庆龄逝世以后，沈粹缜在自己的卧室里一直挂着宋庆龄的照片，保存着宋庆龄给她的40余封信，并先后发表了《我的追念》、《慈祥宽厚、平易近人》、《我心中的榜样》等纪念文章。她充满深情的说：“夫人对我以知己相待，我视夫人为风雨知音。眼下我已是期颐之年，夫人的风范仍像航道的灯塔，照耀着我晚年的历程，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党，爱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爱着我永远尊敬的孙夫人庆龄同志——我心中的榜样。”^③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社科部）

注释：

① 《申报》，1932年11月1日。

② 《申报》，1932年11月3日。

③④⑤⑥⑦⑧⑨ 《宋庆龄选集》上卷（1992年版）第91—92、125、153、157、181、231、465页。

④⑦ 《韬奋文集》第3卷第333、335页。

⑤⑥⑧ 《韬奋文集》第1卷第49、57、73—74、90、201—202页。

⑨⑩⑪ 周天度编，《救国会》第9、128、460页。

⑫ 宋庆龄，《追悼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第2页。

⑬⑭⑮ 《宋庆龄纪念集》第173、174、176页。

⑯ 《人民日报》，1979年7月24日。

⑰ 《人民日报》，1993年1月27日。

抗战时期的宋庆龄与潘汉年

林铭纲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建立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拓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关键,也是战胜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彻底胜利的基本保证。在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形成、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宋庆龄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特殊贡献,潘汉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本文拟循着历史的轨迹,对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革命家宋庆龄相互联系、合作与支持,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抗战初期),为促成国共合作抗日,为建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起的重要作用,作如下的论述。

—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步骤,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它企图独占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围绕着是战还是降,是团结抗日还是分裂内战,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激荡,各种政治力量重新组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最大的、最能影响全局和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政党,正在研讨、调整和确定各自的方针、政策与策略。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0月上旬的一天,潘汉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身负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团结抗日谈判的重任,离开陕北经西安、南京,风尘仆仆到达上海。他不顾旅途劳累,立刻前往位

于法租界的莫利哀路 29 号宋庆龄寓所(今为香山路 7 号孙中山故居),拜访他十分景仰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刚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虽然才到而立之年,但却早已是一位久经考验、精明干练的革命家了。他曾在上海从事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工作和秘密参加中共中央保卫机关的情报工作,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三年前的夏天,他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江西瑞金,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同年 10 月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遵义会议后,又受中共中央派遣秘密经香港到上海同陈云会合。在宋庆龄帮助下,陈云于 1935 年 8 月 5 日搭乘苏联货轮去海参崴。8 月下旬,潘汉年也乘船前往苏联。陈云、潘汉年于 9 月底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在刚结束不久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号召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8 月 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1936 年 2 月,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回国到南京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谈判未果,他返回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报告详情,对于中央决定从“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起了重要作用。9 月 24 日,潘汉年携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件离开陕北。同时,他还带来了毛泽东亲笔写给宋庆龄的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件。潘汉年到达上海后,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在展开一系列活动之前,最先去会见宋庆龄,恳切地希望她在促成国共谈判合作抗日方面能发挥关键性的铺路作用。潘汉年对于宋庆龄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他还知道,是宋庆龄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第一个确实讯息。就在三个月前,潘汉年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还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向

她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且得到了她的赞同。

二

潘汉年怀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走进了宋庆龄的高所。宋庆龄亲切而热诚地欢迎这位来自陕北的中共代表。在客厅里，潘汉年向宋庆龄呈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关于这次宋庆龄会见潘汉年的详细情况，我们迄今尚未见到

有关的史料。但是，从此后一连串的事态发展中可以判断，宋庆龄对于潘汉年转达的毛泽东信中提出的中共主张和对她的要求，是完全赞同、坚决支持与大力协助的。她与由潘汉年任主任的中共驻沪办事处——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地址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经常保持联系，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为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竭尽全力。

为了执行党中央交付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使命，潘汉年日以继夜地从两方面进行了紧张而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同尚处于对立状态的国民党当局进行复杂的谈判；二是向各方面的朋友介绍与宣传中共的主张，以取得他们的赞同、支持与配合。在这两个方面，潘汉年都得到了宋庆龄有力的帮助与配合。

就在这次会见后的几天，10月18日，鲁迅先生病情恶化。当天晚上，潘汉年和冯雪峰（中共驻沪办事处副主任）商量，决定第二天就去请宋庆龄，再请一位更好的医生来为鲁迅治病。不幸他们还来不及去见宋庆龄，鲁迅就在19日凌晨与世长辞了。潘汉年当天就发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巨大的不幸消息。宋庆龄和蔡元培等组成治丧委员会，亲自参加了10万群众为鲁迅送葬的行列，并在万国公墓鲁迅墓前发表了演说。她说：“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

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委派潘汉年为代表，直接和国民党当局谈判。11月9日，周恩来电告潘汉年，要他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正式谈判。在谈判中，潘汉年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并及时用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同陈立夫谈判的情况。

11月10日，宋庆龄公开发表文章，号召“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强调指出“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她满怀信心地写道：“我们只要不屈不挠，勇往直前，铁和血

一定可以铸造出来灿烂辉煌的民族解放功业。”

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给潘汉年打电报指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使谈判难以进展。同时，他对内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于11月26日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以“危害民国”罪名加以逮捕，投入监狱。在长达八个月营救“七君子”过程中，潘汉年同宋庆龄经常联系，并亲自到苏州监狱去看望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人，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慰问。宋庆龄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对国民党镇压抗日的救国会领袖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7年7月5日，宋庆龄不顾天气炎热，胃病发作，疼痛难忍，坚持与胡子婴等12人亲赴苏州高等法院投狱，使该院院长、首席检察官狼狈不堪。返沪后，又于7日致电蒋介石等，坚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7月底，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沈钧儒等7人，营救活动取得了胜利。当“七君子”回到上海时，潘汉年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慰问，并转达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他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会见，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转向抗战。

三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用武力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何应钦宣布了“讨逆令”，准备轰炸西安，企图置蒋于死地，趁机取而代之。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强烈要求南京与西安之间谋求妥协，把蒋介石救出来。正在上海的宋美龄深知，如果蒋氏一死，宋氏利益难保。他不仅请兄长宋子文去见二姐宋庆龄，打听中共方面的立场与动向，而且急忙找到二姐宋庆龄央求她出面斡旋，与中共联系，以求保住蒋的性命。宋庆龄立即将这些情况转告潘汉年，征询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也

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已决定派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参加协商谈判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同时建议她劝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团商谈，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

潘汉年还向陈果夫、陈立夫派来的张冲说明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表示陈立夫如果要去西安，他可以陪同前往。潘汉年从宋庆龄、张冲那里分别获悉了南京方面的种种动向之后，便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赶到南京秘密会见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商定由端纳陪同他们去西安参加谈判。另外，又同陈立夫面谈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对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宋庆龄的态度非常明确，和中共的主张是一致的。不久前，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在整理珍藏的宋庆龄遗稿时，发现了一份她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英文打字稿）。译成中文摘要如下：

中国目前处在战争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正在入侵我国的绥远。考虑到现在国家正处在危急时刻，所有军队的当务之急是：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任何企图阻碍此战线形成的做法都是在犯罪。

是什么促成“西安事变”的发生？目前还不太清楚。有一种说法认为，“西安事变”是由于张学良个人对蒋介石的不满而引起的。然而，在一份电文中，张学良称，他唯一的目的是劝谏蒋介石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抵御日本的入侵。

.....

内战必须停止！这是我一贯的立场。面对日本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

现在，另外一场南京和西安间的内战正在有逼进的危險。我热切地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自

己的祖国。

宋庆龄

这份无标题的文稿在左上角写有“与来访者的谈话”和“立刻发”字样。目前虽然尚未发现当时的中、外文报刊刊载了这篇声明，但宋庆龄很可能已经将这些观点与主张告诉了潘汉年以及宋子文、宋美龄等人。

西安事变很快就取得了比较圆满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共正确主张的胜利。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经过周恩来等同蒋介石的多次谈判，终于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中共的政策也从“逼蒋抗日”发展到“联蒋抗日”。1937年9月24日，宋庆龄在《国共合作之感言》一文中写道：“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

综上所述，在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宋庆龄确实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特殊贡献，潘汉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四

1937年11月12日、12月13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祖国山河破碎，遍地硝烟弥漫。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特地从延安连拍两次电报建议她离沪去香港。潘汉年收到电报后，立即派交通联络员李云（祝秀贞）转达给她。宋庆龄接到第一次电报，表示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暂缓离开上海。接到第二次电报，她才决定立即动身离沪去港。

12月23日早晨，天气阴沉而寒冷。宋庆龄惜别了居住多年的莫利哀路寓所，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护送和李燕娥陪同下，乘车到达公和祥码头，由李燕娥陪同登上一艘德国邮船驶往香港，潘汉年派李云在船上陪同前往。

宋庆龄到达香港后，为了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五大洲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争取国际友人、海外侨胞、香港同胞的援助，支援抗日战争，支援正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依靠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于1938年6月组织了有国际友人参加与支持的保卫中国同盟。

潘汉年也于1937年12月撤离上海到达香港，和廖承志一起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并领导一部分秘密工作。在香港，潘汉年参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廖承志一起向海外华侨募捐寒衣，运送给八路军。他还参加了宋庆龄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宋庆龄领导“保盟”向海外许多友好团体和人士募集了大量医药物资，一批又一批地运送给八路军、新四军，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周恩来紧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立即派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离港。9日，宋庆龄从香港启德机场乘飞机安全飞抵重庆。在重庆，她重建保卫中国同盟，继续支援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军民英勇抗战

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将工作重心移至上海，继续进行情报工作。

8年后，宋庆龄和潘汉年于1949年5月在上海重逢，共同欢庆上海解放，欢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

宋庆龄与白求恩

孙娟娟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广泛争取国际援助，支援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在“保盟”的积极工作下，许多医术精湛的外国医生先后来到中国工作，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支援中国的抗战。生前宋庆龄虽然从未与白求恩见过面，但他们却始终保持着联系。在宋庆龄及“保盟”的支持下，白求恩在解放区创建了第一所模范医院，并担任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他首先提出“医生去找病人，不要病人来找我们”的口号，他组织前线流动医疗队，直接在战地实施医疗工作，他用他精湛的技术挽救了无数抗日战士的生命，而他本人却在为伤员动手术时不幸感染了败血症，以身殉职。他的榜样和国际主义的崇高精神曾激励着世界各地的人士向他曾奉献的事业提供款项和帮助，也激励着中国人民为抗战的胜利为世界人民的和平而斗争。

—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 1890年3月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祖父是多伦多的杰出的外科医生，父亲是一个传教士，母亲是一位英国国家俱技师的女儿。白求恩从小就立下了要像祖父那样当一名外科医生的志向。他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并获得了

医学博士的学位。毕业后他曾在英国海军，加拿大驻法航空队当军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白求恩退伍在英国伦敦一家医院里当实习医生。1924年，白求恩回到加拿大，后又去底特律，在那儿开了一家小诊所。1929年，进了蒙特利尔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当外科医生。在那里，白求恩专心致志钻研医术，他的医疗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34年，白求恩正式担任了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逐渐成为美洲大陆有名的胸外科专家，并在防治肺结核方面有了突出建树，因而闻名于世界。但白求恩渐渐地发觉，“外科医生治疗肺结核只是在个人身上产生后果”，而大多数病人却因为交不起钱而无法进入医院。因此，他觉得首先应该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把医药直接送到人民那儿去”。

1935年夏，白求恩到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在那儿他见到了苏联一些设备一流的疗养院，产业工人享受有公费优先权。他非常振奋，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制度。回到加拿大后，他就加入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白求恩志愿担任医疗队队长，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抗佛朗哥法西斯，保卫人民政权的战争，在那里他发明了战场输血术，挽救了许多伤员的生命。1937年6月，白求恩回到加拿大，开始为帮助西班牙人民的工作在加拿大和美国进行巡回演讲，呼吁支持民主西班牙。就在这时，中日战争爆发了，白求恩从各种渠道得到有关中国战场的消息。当时，以宋庆龄为首的爱国人士强烈地意识到有责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独立和解放，还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宋庆龄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寇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认识国际和平的不可分割性，要求他们“在今天来帮助我们抗日，维护世界和平，用抵制、制裁与封锁等办法来惩罚法西斯侵略者——这便是避免的世界大战。”^①宋庆龄认为很有必要组成一个保卫中国的大同盟来担负这

一历史使命。于是，她一到香港就集中精力为筹建“保盟”四处奔波。宋庆龄委托新西兰作家、英国《每日先驱论坛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把筹建“保盟”的信息带到美国和英国去，告诉国际友人：保卫中国同盟，今天为了中国的战争，明天为了中国的建设。支持“保盟”的外国友人，他们援华是希望中国能获得最后胜利，希望有助于中国独立、民主和自由。“保盟”的宗旨和方针正能够实现他们的这种愿望。

“保盟”在筹建过程中就已经逐步开始了活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和远东的真实情况，收集医药、物资、捐款，它已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和“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

白求恩阅读这些来自中国的消息，他知道了中国的宋庆龄和“保盟”。1937年7月30日晚，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了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在宴会上白求恩遇到了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是为联合华侨和国际人士支持国内抗战，促进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力量的联合自筹经费在世界二十八个国家地区进行宣传）。主人热情地为他俩作了相互介绍，白求恩听说陶行知来自中国，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形势，白求恩被这些爱憎分明的话语感动了，他当即表示“如果中国需要，我将到中国去”，他毫不犹豫地作出到中国去的决定。在巡回演讲告一段落后，白求恩与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讨论新的援助计划时，他向大家宣布，他感到西班牙需要援助，但已得到了援助，而中国对医生的需要比西班牙更迫切。他说，“在纽约已成立了一个国际援华委员会，配合孙夫人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援华会的计划是对在中国北部和日军作战的游击队给予医药援助”。^②他请求率领一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和游击队一同工作。几天后，他就动身到纽约和援华会完成各项安排。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外科医疗队的设备和器材，乘“日本皇

后号”海轮从温哥华启程去香港，然后从香港飞抵汉口，后进入陕甘宁解放区。

白求恩是如何冲破层层封锁，最后到达延安的，有一种说法为“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抵香港后，在香港逗留了三天，宋庆龄详细地向他们介绍延安抗日军民缺少医疗的情况，然后介绍他们先飞往武汉，再去延安。”还有一种说法为“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香港就找到宋庆龄，并经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具体安排，在香港采购了大批医疗器材后，于1938年春到达延安。”但是笔者最近从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珍藏的一封宋庆龄1959年1月16日给白求恩传记的作者西德尼·戈登的回信中了解到“由于白求恩直接抵达汉口，然后去了延安”，所以宋庆龄本人“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白求恩）。”这封信纠正了以前“宋庆龄与白求恩在香港见面，然后介绍白求恩大夫去延安”的误解。宋庆龄在这封信中说“白求恩大夫是在纽约的美国援华会的赞助下来中国的，该组织是和保卫中国同盟有联系的海外机构之一。由于保卫中国同盟是为游击区的医疗工作筹集人员、物资和资金的主要团体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团体的话），所以白求恩大夫是在我们的支持下来中国的，我们还尽了一切努力提供他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不过由于是在战争期间，加上国民党阻挠，交通运输极其困难，并且很不安全，所以我们并不总是能够满足白求恩大夫的各种紧急的需要。”^⑨从这封信及查找有关资料，我们得知宋庆龄并没有见到过白求恩，也没有直接安排白求恩进入解放区。1938年1月20日白求恩到香港，三天后飞到汉口，在一个深夜，周恩来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周恩来向他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因为白求恩急于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周恩来就嘱王炳南为白求恩一行去延安作出安排。白求恩一行乘火车离开汉口，2月22日抵临汾，在那里由一位八路军军官李少校，把他们护送到延安。一路上，他们乘骡车、搭卡车，终于在3月23日到了延安。这时在

延安已有一个代表团在迎候他，为首的是马海德大夫。马海德是接受宋庆龄的建议，1934年由宋庆龄安排到达延安的。他也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代表及延安八路军的卫生顾问。综上所述，白求恩实际是由周恩来安排进入延安的。但是正如宋庆龄在信中所说的那样，白求恩虽然不是由宋庆龄直接介绍去延安的，然而他却是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保盟的感召和支持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宋庆龄和白求恩虽然从未见过面，但共同的事业——为全世界自由人民的事业进行斗争——把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宋庆龄在《外科解剖刀就是剑》的序言中这样写道：“（白求恩）他的生、死和他所遗留的事业与我个人关系特别密切，这不仅由于他对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贡献，而且由于我个人在由我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①事实也是这样，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到达中国后，宋庆龄就一直关心着他及医疗队。宋庆龄通过各种途径设法同白求恩大夫保持联系并竭尽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当时在白求恩率医疗队路过香港赴延安时，廖承志与廖梦醒等就组织了一个支援白求恩小组；白求恩大夫到达延安后，马海德就作为“保盟”在延安的通讯员、同白求恩大夫的联络员，经常把医疗队对医药器材的急需情况向宋庆龄和“保盟”反映，使宋庆龄与白求恩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而白求恩在极需帮助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也是孙夫人。

二

白求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就被邀请同毛泽东会谈，在会谈中，白求恩提出了组织战地医疗队的计划。这个计划立刻被毛泽东批准了。4月24日白求恩一行出发巡视延安前方医院。5月1日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进行巡视。在贺家川的后方医院，白求恩给纽约的援华会发出了第一份报告。到6月底他们的视察工作已完成了。此时白求恩离开加拿大已六个月了，可他没有收

到援华会的任何消息(实际上白求恩与援华会的来往书信均被国民党扣留或耽搁)。当时几个军区的后方医院医疗条件极差,没有一件外科手术需要的器械,没有麻醉药、纱布,绷带是用过又洗,晾干再用,药品大部分是本地自制的丸散膏,药效不可靠,探针用铁丝做,铁片代替钳子和镊子。白求恩迫切希望得到援助,他通过延安给纽约的国际援华会拍了求援急电:“过去一个月在日军后方晋察冀军区和游击队工作平均每天十次手术,迫切需要款项及药品器材,”^⑤同时他写信给在延安的马海德大夫,请他把留在那儿的爱克斯光设备送来,同时问他“你想纽约方面收得到电报吧?你或许应该把这些报告转给孙夫人,她可能有点办法,我需要帮助。”^⑥这时保卫中国同盟正式成立,这消息迅疾传到陕北,白求恩对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当即给中国同盟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他叙述陕西省东北部黄河西岸贺家川医院的情况,报告写得很具体,很感人。他写道:一、伤病员一百八十人。二、伤病员分住在村中二十五家,有的相距数里路,没有手术室,仅有一露天包扎所。三、医务人员:二名医生,十八名护士。四、医疗技术:相当差。没有合格的医生,亦无医科学生。……五、医院的设备:很差。没有床上用的便盆、便壶,也没有床单、枕头,只有五十床供重伤员使用的棉被。没有敷料桶,只有两只弯盘,十支吗啡针剂。没有“来苏儿”水,肥皂也几乎没有,只有公用的擦手毛巾。没有二氧化碳和酒精,只有少量红汞。没有达金氏冲洗液、胶皮管、灌肠器,也没有胶皮垫子和手套。六、食物:不充足。几乎没有肉、亦无蛋、牛奶等食物。伤病员的血红蛋白平均只有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饮食全是软食,很多伤病员患有慢性营养不良。……七、伤病员分类:经内外科治疗,处于恢复期的伤病员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八,因伤员化脓而接受外科治疗的伤员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下面我们且不谈那些处于恢复期和内科的伤病员,仅就这百分之四十二点二的病例做个分析:这部分伤员自受伤以来平均已有四个半月,时间最

长的是三年，最短的是三个月。伤员平均年龄为24岁，年纪最大的39岁，最小的17岁。白求恩在报告中摆出种种困难之后提到急需设备和用品，如药品和医疗器械并且提出要“在西北地区开办两所永久性的后方医院。”白求恩在报告中深情地说道：“最后我要说的是，我能在此为英雄的中国朋友略尽义务该是多么快活。”^②

白求恩的报告到达香港后，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和名誉书记希尔达·塞尔文·克拉克夫人以及所有工作人员凡是看到这份报告心情都感到很激动。

白求恩的报告对为什么要支援中国抗日根据地军民，需要援助些什么物资和设备，都极有参考价值。所以宋庆龄见到白求恩报告之后，于1939年在国际三八妇女节集会上特意以《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为题发表演讲，她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代表的名义对外国各界人士说道：我们的游击队战士们正在用老式步枪、手榴弹和刀剑、棍子和拳头奋不顾身地打击装备优良的日本侵略者，但是无名英雄抗日游击队战士“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因此“我们需要扩大外来援助的数量与范围，以帮助这些无名英雄；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保卫中国同盟名誉书记克拉克也于1939年3月4日专门写了一封《至友人的募捐信》，并在信中附有白求恩的这份报告。她说：白求恩的这份报告写于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开办之前。得到援华委员会（按：指美国一个援华组织）给该医院的捐赠后，那里的情况将会有所好转。

白求恩在发出报告的同时，便开始为着手建立晋察冀边区正规军和游击队的一个医务系统而积极工作。此时，白求恩不仅是加一美医疗队队长，同时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府卫生顾问。他就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设在五台县的原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第二休养所（一个非常简陋的医院）改建成为一个模范医院。白求恩亲自

制定了图表和计划，领导开展了“五星期运动”。经过五个星期的努力，终于在松岩口的小庙里创立了模范医院。与此同时，还开办了附属这个医院的卫生学校。白求恩在这里培训辅导医生和护理人员，他还根据经验撰写了《战地医院的组织与技术手册》一书作为医院的工作方针。模范医院创立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各个解放区。

1938年7月在巴黎举行了国际和平运动世界大会。在会上作出了在中国建立国际和平医院的决定。宋庆龄与何登夫人商议后决定把这一名称给白求恩所在的五台山医院，并请白求恩担任该医院的院长。“命名国际和平医院的这一事实，对世界和平运动在14个国家中建立的委员会产生影响，他们有义务全力支持该医院。英国的援华会捐赠2450英镑维持该院，并已另筹措到950英镑，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的友社也提供了捐赠。”^④

通过宋庆龄及“保盟”的工作，白求恩所在的模范医院得到了外国友人的援助，医院逐步得到了发展，并且逐渐闻名于整个华北游击区。据宋庆龄在《我们的第一年》一文中讲：“从‘保盟’创立到1939年6月15日为止，13个月中各国朋友通过‘保盟’的捐款共约港币25万元（约合美元8万元）这些捐款大多用以购买医疗物资运往内地。”宋庆龄及“保盟”虽然通过向海外呼吁募集到大批的资金和物资，但要把这些急需的物资运往内地却是异常困难。除了克服山川险阻的交通困难外，还要受到伪军的封锁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刁难和阻挠。为了把物资从西安运送到设在五台山的国际和平医院，每次要用18匹骡马驮运7000磅先到延安，然后用人力从延安挑到五台山。尽管遇到如此困难，宋庆龄及其“保盟”还是千方百计设法把白求恩所急需的物资、医务人员送到那里。宋庆龄始终把此作为“保盟”的一项重要任务。1941年6月宋庆龄在《救济工作和政治》一文中说“如果说在过去三年中我们有什么突出价值的成就，那就是建立与维持国际和平医院。他们在游击区的这种开路

工作，第一次给那些最缺医少药的中国战士带来现代医药援助，目前只有保卫中国同盟仍在做着这项救济工作。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白求恩大夫，一位为中国牺牲了生命的伟大的加拿大外科医生要求我们把维持和支援这些医院的任务担负起来。”

1938年11月25日派往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疗队终于到达了五台山。白求恩非常高兴，他在给马海德的信中写道：“延安医疗队是11月25日到，我一直盼望着这个医疗队来，不单因为它来了，对卫生工作有帮助，而且因为我希望收到一些书籍、报刊、杂志，以及外界的消息。……他们带来了一套没有发电机或直立式（铁）的爱克斯光设备，因此不能用。他们也给我带来了加拿大香烟、巧克力粉、可可粉和一管刮脸膏。”^⑩在信中白求恩还特地询问马大夫：“你和孙夫人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联系吗？加拿大或美是否派更多的医生或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吉西大夫出了什么事？柯棣华大夫呢？（在此几个月前白求恩就听到了吉西，柯棣华要来医院的消息。吉西是准备前来接替白求恩工作的，因交通不便，加上国民党的阻拦，经过一年多还未到达目的地，后来他在陕西的部队医院里工作。）他们全让截住了吗？难道封锁有那么厉害？”最后他在信中告诉马海德，“药品、材料情况已相当严重，倘使别的办法都行不通，我想去北平一次买些药品器材。”

由于通讯联系困难和白求恩日夜忙于医疗工作，有关该院工作详尽情况外界很少知道。为了尽快地获得白求恩的情况，1939年4月“保盟”特地委托新西兰作家杰姆斯·贝特兰先生前往晋察冀边区总部的国际和平医院了解情况。贝特兰先生越过日本占领区，通过山西的山地到达了五台山地区。他把所了解的白求恩大夫的工作情况向“保盟”作了报告。1939年夏天，宋庆龄又委托“保盟”驻重庆的代表王安娜前往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向白求恩了解医疗工作的详细情况，并向香港的“保盟”和宋庆龄汇报。

1939年8月白求恩向“保盟”发出了最后一份“战地报告”。报

告中再次提出对物资和药品的紧急要求。报告最后说，“究竟为什么我们不能从中国和外国得到更多的援助呢？请想一想吧，20 万人的部队在医院总共有 2500 名左右的伤兵，去年一年里就进行 1000 多次战斗。可是总共只有 5 名大学毕业的中国大夫，50 名未经过训练的中国‘医生’和一个外国人来干所有的这些工作。”^⑩

事实上，保卫中国同盟在当时已逐步建立起物资的运输体系，把各国的捐款和物资运往解放区，由于五台山远在敌后，交通不便，收到物资最晚。1939 年初，“保盟”收到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捐助的五个卡车底盘，立即拨款安装了车身并支付运费。为了募集装满五辆卡车的救济物资，及时运到西北抗日根据地，宋庆龄和“保盟”名誉书记克拉克夫人亲自奔走呼号，在香港筹集了五万多元，购置药品、医药器材、食品、毛毯等物品，装满五辆卡车。在“保盟”派人押送下，经过越南海防、广西、贵州、四川、陕西辗转运抵延安交给八路军，其中一部分物资运达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但是由于战斗频繁，这些药品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以后如何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材，白求恩经过反复思考后，向聂荣臻司令提出改革医疗机构的建议。他提出要开一个新的卫生学校来造就一大批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和护士；要设法运一些药品器材进来建立自己的合作工场，准备在当地制造一些主要器械和一些简单的药品。为解决经费问题，白求恩决定于 11 月份亲自去加拿大和美国进行募捐。不料 11 月初，白求恩在为伤员做手术时划破了手指，感染中毒，不幸于 1939 年 11 月 12 日清晨去世。不幸消息传来，大家无不感到无比的悲痛。在延安八路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朱德总司令讲了话。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在前线，战士们用从白求恩大夫的榜样得来的百倍英勇来纪念他的牺牲。他们高呼“白求恩”，从山里出击，狠狠打击日军。对白求恩的逝世，宋庆龄感到非常悲痛。1939 年 12 月 16 日她悲伤地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写信告诉了尼赫鲁，后尼赫鲁复信表示哀悼，并说，“你也许知道，我们

国民大会医疗队的医生已去了五台山”。(后来印度柯棣华大夫接替白求恩大夫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直到因病逝世)。“保盟”专门在《保盟通讯》上刊登了纪念白求恩大夫的文章。

白求恩去世了,但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宋庆龄曾这样写道:“他(白求恩)的生活和工作为中国在海外的朋友树立了榜样,他忘我地献身于别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因为他确信,他们的事业是整个人类进步事业的一部分。为了这个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的全部力量、心血和一生。”“让派遣他的美国和加拿大人民,让他祖籍所在地英国的人民,通过增加对那些为中国的自由而斗争的战士的援助来纪念白求恩。”^⑨白求恩大夫去世后,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对一个以白求恩名字命名的项目提供了大笔捐赠,保卫中国同盟决定用这笔款子在延安建立白求恩纪念图书馆。1940年11月21日,在白求恩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白求恩原来所在的医院被正式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被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为了永远纪念白求恩,宋庆龄帮助为白求恩写传记的加拿大作家西德尼·戈登和泰德·阿兰获取了白求恩在中国的全部书信文稿和日记,并亲自为这部传记写了序。宋庆龄在序言中写道:“我很荣幸来介绍诺尔曼·白求恩的生平,让为数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这位当代英雄——他如此崇高地象征着所有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共同利害。……保卫中国同盟正在为继续白求恩事业的白求恩和平医院及白求恩医学院获得援助而工作。”

“新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白求恩大夫。他是那些帮助我们获得自由的人中的一位。他的事业和他的英名永远活在我们的中间。”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注释：

① 见1938年1月10日《救国时报》。

②③④⑤ 西德尼·戈登·泰德·阿兰《外科解剖刀就是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

⑥ 见1959年1月6日宋庆龄给西德尼·戈登的回信，此信现存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⑦ 见《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⑧ 见《诺尔曼·白求恩关于八路军医疗状况的报告》，载《党史研究资料》(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至200页。

⑨ 见《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第2期。

⑩ 见《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第11期。

⑪ 见《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第24期。

耿丽淑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活动

——以保卫中国同盟及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为中心

(日本)石川照子

前 言

在宋庆龄漫长的活动生涯里，抗日战争中的活动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她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的特色可以说具有“国际性”。例如，她创建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卫中国同盟，“工合”国际委员会等组织里有很多外国成员。中国的情况从世界观点来看，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阶段。赞同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而追求祖国的独立和统一斗争，很多国际人士来华，开始了帮助和参加中国人民的斗争。例如著名的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白求恩等等。原来宋庆龄本人也参加过很多国际性组织，重视国际舆论。上述各个组织的创办目标也包括呼吁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支援和帮助中国人民的斗争等工作。

耿丽淑(Talitha A. Gerlach)1926年来华以后，同中国人民一起开始了长年的活动。1938年，她作为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秘书开始工作以来，一直帮助宋庆龄进行活动，她们之间有了亲密的交流。

这次作为宋庆龄研究的一部分，我想对耿丽淑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活动作一个报告。

一、关于耿丽淑

1896年，耿丽淑出生于美国基督教一个牧师家庭。在美国基

督教女青年会工作以后被派遣到中国。她主要活动地方是上海。1930年以后,作为女青年会成员,同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成员们一起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她一边继续女青年会的工作,一边又从事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1940年回国到1945年,她在美国继续支援中国人民的斗争。

1947年到1951年,她还是在美国进行活动,但在1951年遭到纽约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的解雇。之后回到上海,成为中国福利会顾问,终身从事儿童教育事业,直到今年2月份在上海逝世。

耿丽淑生前的活动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在美国的活动(~1926年。1940~1946年。1947~1951年)。另外是在中国的活动(1926~1940年。1946年。1951~1995年)。她的中心活动是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①

二、耿丽淑与保卫中国同盟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她为团结国际上进步和友好人士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而创办这个组织。保盟1945年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以后改名中国福利会。

保盟的任务是(1)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例如:出版《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2)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3)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它捐助物资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例如:援助国际和平医院设立,派遣医生);(4)支持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例如:进行“一碗饭运动”^②。从这些可以了解保盟非常重视国际舆论和支援,作为桥梁进行活动。

保盟由宋子文任会长(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41年退出),宋庆龄为主席(兼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是希

尔达·沙尔文、诺曼·法朗士、爱泼斯坦、贝特兰、廖梦醒、王安娜、邓文钊、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廖承志等等^⑧。中央委员会又设立了4个工作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运送委员会、宣传出版委员会、促进委员会。

1938年8月，宋庆龄亲自委托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吴大琨，到上海筹建分会，并委托耿丽淑具体协助。耿丽淑担任上海分会秘书（她是分会唯一的外国人会员），另外吴大琨、张似旭（美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经理。回国华侨）、吴耀宗（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负责人）、沈体兰（上海麦伦中学校长）作为成员参加工作。

上海分会的任务是支援新四军在江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具体工作是：在上海募捐活动，派遣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慰劳团带去了手术器械、大量药品、食品、被服、文化用品、蚊帐、炼乳、毛毯、寒衣等），提供资金作为医院的开支等等^⑨。

耿丽淑是上海分会的中心人物。她接应和转运捐募的财物，同新四军的代表（沈其震，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医务处长等）秘密接头，又负责接应国外的捐助（美国朋友服务团、美国基督教公会等）。经常与宋庆龄联络，耿丽淑为她递送信件、报告情况（她也与保盟总部保持联系、取得宋庆龄的指示）^⑩。耿丽淑保持她和宋庆龄来往的信件和日记，满满一大箱，但是在宋庆龄逝世后被她销毁了^⑪。如果这些信件还存在，当时的情况能更明确了。

上海分会被日本和汪伪特务机关严密监视，1939年7月19日发生了张似旭暗杀事件，可是分会的活动继续下去了。

三、耿丽淑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

在抗日战争中，传教士大量减少，活动经费短缺，基督教会受了很大损失。当时以司徒雷登（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校长）、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青年会等为代表，大部分的基督教会，对国民党政府表示支持、协力^⑫。但耿丽淑、吴耀宗、刘良模、刘湛

恩等有些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徒帮助设置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抗日事业。

1890年在杭州弘道女中成立中国第一个学校女青年会。1905年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中国委员会成立,1908年以后在上海、广州、北京等成立市会,现在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南京、广州、杭州、香港、台湾等有女青年会。全国总会是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设在上海。1949年以后,女青年会实行“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宗旨是“提倡在青年妇女中进行德、智、体、群四育来发展”“完全人格”。当初外国人传教士领导女青年会,然后1926年,丁淑静初次任全国协会中国人总干事,以中国妇女为活动中心了^①。

女青年会重视劳动问题,1922年设立劳工部。1923年10月15日举办第一回全国代表大会后,进行宣传活动,要求改善职业女性的社会上地位和待遇。当时女青年会主要从事救济运动,不参与政治运动。1928年以后,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女工的教育,上海女青年会开办平民学校、女工夜校^②。

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0月女青年会组织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同年12月组织抗战妇女座谈会。她们也参加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1938年参与计划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扩大、改组。另外动员妇女组织救护伤兵,缝制兵士棉衣等。通过这些工作,女青年会担任抗日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任务^③。女青年会了解战争中最大牺牲就是妇女与孩子,就敏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样女青年会的积极参与抗日运动的态度是跟基督教青年会等别的基督教团体不一样的。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进行经常活动的组织一共有5个。家庭妇女部组织伉俪社、研究家务、做菜、儿童健康问题。职业妇女部安排妇女学习打字机、钢琴等,办理托儿所、宿舍。学生部组织学生公社,少女部组织华光团。^④劳工部的活动是

最活跃的。教育方面开办女工夜校、友光团、交友会。服务工作有诊疗室、贫病贷金、劳工托儿所等。作为劳工福利实验站，组织歌咏师资训练班、戏剧组和写作组、校友读书会、编友光通讯、编辑教材等。^⑧

托儿所是最重要的服务工作之一。1940年举办后，1941年设立职业妇女托儿所和上海托儿所。1942年合并为女青年会托儿所。^⑨女工夜校是1930年代初期开办的。钟韶琴、邓裕志、白美丽、夏秀兰(利尔·哈斯)、耿丽淑、曹亮等是从事女工夜校事业的中心成员。1934年设立六个女工夜校(600名学生)。夜校是两或三年制，设置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另外设置识字班、课外活动等。^⑩

抗战中的活动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37年8月13日到11月，约共3个月。在这个时期差不多完全集中力量在抗战。第二个时期是1937年到1941年。当时集中力量在组织会员等女青年会经常工作。第三个时期是1941年到1945年。当时工作个别、和小单位。主要活动是儿童工作、救济工作。抗战中的主要活动是：服务伤兵、救济工作、组织工作、强化会员组织、教育工作、体育工作、托儿所运动、儿童工作、义务教育工作、准备救护工作等等。^⑪

1926年耿丽淑在纽约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争取到了受聘去中华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的机会，初次来到中国。1930年代初期她同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主任干事邓裕志、人事部主任干事夏秀兰等一起在上海小沙渡路三合里创办女工夜校。夜校的学生是童工、养成工。^⑫抗战开始后，耿丽淑积极参加抗日运动。她组织教会大学女学生慰劳抗日将士，为了募捐活动，又组织女子大学生上街宣传抗日和义卖。^⑬耿丽淑在女青年会工作很长时间，尤其在募捐方面是有名声的。史沫特莱说耿丽淑是“后勤”，是特殊的“后勤”。^⑭

结 束 语

耿丽淑是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的中心成员。作为保盟和外国组织之间的桥梁,尤其在捐款以及支援新四军活动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她同宋庆龄经常有着密切联系。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虽然耿丽淑的正式身份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说耿丽淑跟劳工部的工作很有关系。例如通过女工夜校工作,她一直努力实现女工的真正自立。耿丽淑本人的言论记录现在已经很少了。1947年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时发言的讲话是她很少言论记录之一。她说:“中国妇女生活的解放,在程度上说,自然是要比英美妇女差得多,自胜利到现在,妇女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而且更在水深火热中,不过我相信中国妇女解放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妇女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职业机会的平等,争取教育,参政……改善家庭生活,普遍建立托儿所,公共食堂等,我希望中国妇女能和全世界的妇女站在一起,为妇女真正的自由平等解放努力!”从这里也能看到她对妇女问题的密切关心。在抗日战争中,她主要从事募捐活动。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时期耿丽淑对抗日救亡运动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那么对耿丽淑的思想怎样评价好呢?到1951年她一直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成员。抗战时期她也作为一个基督教徒,积极展开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她同路易·艾黎,乔治·哈特姆等参加政治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新四军也有交往。并且在1951年麦卡锡主义风波里,被看作“中共支持者”,不得不离开美国。但是她从基督教徒有没有真正变成共产主义者,还需要探讨。

在30—40年代,很多外国人来华参加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之中有像在工合运动中实际上发挥了最重要作用的路易·艾黎等人物。作为中国和外国援助人士、团体之间的桥梁,他们都做出了独特贡献。除耿丽淑以外,还有从事编辑《保卫中国同盟新闻

通讯)的爱泼斯坦、贝特兰等代表。虽然他们政治上的观点不一定,但是都愿意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今后对于各人物之间的关系要进行研究而加以明确。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基督教,总是只重视它对革命运动的观点,以及同帝国主义密切的关系等。结果在妇女运动史方面,由于政治变革对妇女解放的作用很大,对于基督教在妇女运动中的评价很低,有关研究也很少。直到最近才开始评价基督教在历史上各方面的作用,重新研究各个基督教组织的活动。

对于基督教女青年会来说,在抗战时期一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边继续日常活动。女工夜校、托儿所等活动在支援妇女,改善妇女社会地位,实现经济上自立等方面贡献很大。这样又踏实又有很大实际成果的社会活动要进行正确的评价。由于女青年会本来对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它在政治上的界限性受到了多次批评。但是可以说它不像基督教青年会等,女青年会不偏于任何政治势力,所以能保持不卷入各种政治斗争的旋涡,保持自主性。

保盟及宋庆龄和女青年会之间的关系现在还不清楚。耿丽淑本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保盟。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没有人员的交往,是今后研究的课题。完成了如此各种课题之后,一定会对宋庆龄研究做出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宋庆龄日本基金会)

注释:

① 关于耿丽淑的生涯,参见肖岗《耿丽淑》,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93年。

② 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编《宋庆龄在香港》,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第4页。

③ 郑焯辉、李鸿生、吴景平《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1—172页。

④ 同上,第192页。

⑤ 《耿丽淑》第89—90页。

⑥ 同上,第152页。

⑦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2—404页。

⑧ 关于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概要，参见朱越利主编《今日中国宗教》，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基督教词典编写组编《基督教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

⑨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著，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编译《中国女性运动史 1919—1949》论创社，东京，第118—120页、第285页。

⑩ 同上，第335—336页、第354页、第361页。

⑪ 末次玲子《中国における父权家族改革とキリスト教(1912—1949年)》(中国女性史研究会《中国女性史研究》第5号，东京，1949年9月)。

⑫ 王知悫、邢泽《淡淡劳工部》(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主编《妇女》第2卷第2期，1947年5月20日)。

⑬ 《上海女青年会的托儿所》(《妇女》第2卷第8期，1947年11月10日)。

⑭ 《中国女性运动史 1919—1949》第285—287页。

⑮ 张志学《八年来的女青年会事工》(《妇女》第1卷第1期，1945年10月20日)。

⑯ 《中国女性运动史 1919—1949》，第285页，《歌丽淑》，第63—65页。

⑰ 《歌丽淑》，第78—80页。

⑱ 同上，第80页。

⑲ 《三八的话》(《妇女》第1卷第12期，1947年3月8日)。

宋庆龄抗战时期大事记

(1931—1937)

黄亚平编写

1931年

7月

宋庆龄因母丧离开德国经苏联回国。

8月13日

宋庆龄抵达上海。随即乘车到母亲灵前行礼祭奠。

8月18日

宋庆龄与宋氏家属参加母亲倪桂珍的葬礼。

8月24日

接见德国《法兰克福报》美籍记者史沫特莱，并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

9月5日

宋庆龄赴南京祭扫孙中山陵墓。

9月9日

返回上海。

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炮击沈阳，向驻守在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电询南京请示对策。南京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内。

11月

宋庆龄为蒋介石逮捕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曾亲自赴南京找蒋介石、何应钦交涉，未得结果。

11月28日

何香凝乘轮船从法国回国到达上海，下船后即赴宋庆龄寓所，会见宋庆龄，畅谈甚久。

11月29日

蒋介石将邓演达秘密杀害。

12月14日

宋庆龄不知邓演达已被蒋介石杀害，从上海赶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想营救邓演达，及至宋已知邓被杀害后，宋庆龄非常愤慨，表示一定要公开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12月19日

宋庆龄针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和滥杀革命志士，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宋庆龄之宣言》，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此后，宋庆龄不再称自己是“国民党左派”，转而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

12月20日

《宋庆龄之宣言》由陈翰笙、谢树英共同译成中文，刊登在上海《申报》第17版，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

12月31日

宋庆龄致函申报总主笔，针对国民党当局把持的南京、上海等地某些报刊登载她和陈友仁等曾有议案提交李宗仁一事，郑重声明

明：“交李提案诸消息完全不确。”

1932年

1月28日

晚，日军发动对上海的侵略。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不顾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自动奋起抗战。

1月30日

宋庆龄与何香凝顶风冒雪赴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进行慰问。宋庆龄与十九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亲切交谈，热情赞扬十九路军英勇抗战。她还对阵地上的官兵发表演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在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号召和组织下，上海人民和海外华人踊跃捐款献物，积极支持十九路军英勇抗日，当日就收到捐款达10万元。

1月31日

为了对工人的爱国反日行动予以有力支援，宋庆龄请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到莫利哀路寓所商谈，并将筹集的2万元支票捐赠给沪西罢工委员会。

2月6日

宋庆龄与宋子文夫人张乐怡携带大批慰劳品到真如犒军。在巡视战地时邀请蔡廷锴合影，并手捧战利品日军的炮弹，站在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她与十九路军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

2月12日

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亲赴吴淞前线十九路军区寿年部翁照垣旅，慰问守卫吴淞的官兵。在敌机的盘旋下，她执意要翁旅长陪她到前沿阵地向战士慰问致意。她对翁旅长说：“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尤望继续奋斗，不使我中国有寸土入于敌手。”

翁旅长代表全旅官兵回答说：“以卫土为责之将士，决不使敌人稍肆横暴，使敌人决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当翁旅长说这里日夜有敌机侦察、扫射，还有敌舰上排炮的轰击，危险极了，劝她以后不要再到吴淞来时，宋庆龄说：“不到前线来看望你们，我心里总是不踏实，现在看到你们了，我就放心了。”

2月15日

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并公开在全市各报刊登工人反日罢工募捐启事，呼吁社会各界支援。宋庆龄见报后，带头捐助大洋1500余元，并订购了沪西一家米号的粮食，作为专门发放反日罢工工人的救济粮。

2月

宋庆龄致电高尔基，要求他呼吁苏联人民积极声援中国人民淞沪抗战。

3月2日

高尔基在苏联《消息报》发表《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一文，指出：“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有力地证实，这并不是一句空话。”

3月5日

宋庆龄与何香凝、杨杏佛等积极奔走，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借出部分校舍，创办“国民伤兵医院”，可容伤兵五六百人。宋庆龄亲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在宋庆龄号召下，群众的爱国热忱空前高涨，一时名医云集，慰问品不绝而来。宋庆龄经常亲临病房慰问抗日受伤的战士，鼓舞他们的士气。

3月初

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度赞扬奋起抗战的十九路军，指出：“人类惟有以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

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我辈之设立此医院，仅站在民众一分子之地位，对此空前之革命战士表示敬仰感谢而已。”

5月27日

宋庆龄接到“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发来的电报，邀请她代表中国出席将于7月2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大会，并通知她已当选为大会筹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委员。宋庆龄当即复电同意担任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表示能否出席会议当视牛兰夫妇案件的情况而定。

6月30日

是日《申报》每隔一天发表一篇时评（即《剿匪与造匪》一论、二论、三论）这三篇时评是由宋庆龄、杨杏佛、史量才、陶行知集体讨论后由陶行知执笔的。

7月11日

宋庆龄偕牛兰辩护律师陈瑛意等从上海抵达南京，前往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视牛兰夫妇，劝告他们进食。并赴中山陵谒陵。

宋庆龄与杨杏佛、埃德加·斯诺以及其他中外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宋庆龄担任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在宣言中说：“我侪与欧美各国之著作家、医学家、法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及政治家，凡关心牛兰夫妇案者，共同联络，为人道正义及不可侵犯之政治自由权，而请求须立时应准牛兰夫妇之请求，将案移沪，或将其全部释放。此种请求须立时应允。今日为牛兰夫妇在南京绝食之第十日，世界最高思想所系之二人之生命，国民政府视之如儿戏，牛兰夫妇果因绝食而死，任何谦意，任何理解，皆不能涤此污点。我侪欣然与世界营救总会合作，以达成功。”

7月12日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宋庆龄在南京亲自找了汪精卫及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等进行交涉。当晚，宋庆龄乘夜车返回上海。

7月16日

蒋介石亲笔批示：“申报禁止邮递”，使《申报》的发行发生了很大困难，史量才与宋庆龄商讨对策后，派人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8月21日《申报》禁邮解除。

7月17日

宋庆龄再次从上海抵达南京，与杨杏佛一起前往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望牛兰夫妇。经与国民党司法当局交涉，结果由其一一人担保让牛兰夫妇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牛兰夫妇亦同意停止绝食。

8月25日

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特赦牛兰夫妇。

8月27日—29日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出席代表2200余名，代表世界各地3万余个群众组织。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罗曼·罗兰被推选为主席，巴比塞等人为副主席。未莅会的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

9月7日

宋美龄奉蒋介石令自武汉抵沪看望宋庆龄，姐妹俩畅谈良久。宋美龄此行的真实目的是劝宋庆龄赴南京居住并在政府任职。

10月15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宽释。秋，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会见了瑞士友人范桑夫妇。

10月31日

晨8时，宋庆龄自上海抵达南京。在中山陵稍事休息后，即搭乘飞机赴汉口。此行目的，因“陈独秀案，欲与蒋有所协商。”她本人拟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资格，向国民党中央提议组织一种特

别委员会专门处理政治犯事件一事，向正在汉口的蒋介石征询意见。

11月2日

宋庆龄向外报发出专函指出：“社会仅知营救陈独秀，而不提其同时被捕之十一人，更未追论恐怖时代牺牲之斗士。予现拟参加组织一团体，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及清共时被牺牲者为职志。予盼中外知识阶级及友朋参加是项运动。”

12月上旬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发表宣言指出该同盟成立目的是：(1)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2)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3)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同盟总会设在上海。最高执行机构是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会设分会于国内各重要城市。同盟规定，凡赞成同盟主张，并愿从事实实现主张之实际工作者，不拘国籍、性别及政治信仰，由会员三人之介绍，经执行委员会多数之通过，得为本盟之会员。同盟由宋庆龄担任主席，蔡元培担任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

12月17日

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致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蒋介石、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和北平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要求释放被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的许德珩等人。电文指出：“报载北平警察非法逮捕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平

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

12月30日

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南京路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大厦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宋庆龄在会上对新闻界发表了书面谈话，号召新闻界同人和民权保障同盟的盟员们应该并肩站在一起，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宋庆龄指出：“我们的组织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换句话说，民权保障同盟是倡导和保卫出版自由的，因此，新闻界为它自身的利益，应该热忱地赞助这一组织。”宋庆龄强调：“本同盟首先关切的是援助那些拥塞在监狱中的大量无名无告的政治犯。你们新闻界当然知道有无数同胞被非法逮捕和监禁，知道那中世纪的残余——秘密军事法庭的存在。你们对这些暴行将熟视无睹、不加抗议呢，还是将全心全意与民权保障同盟共同努力，为这些无数无人保护的不幸者主持正义呢？我认为一个坚强而勇敢的新闻界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来在舆论方面兴起一个有利于自由和正义的潮流”。胡愈之、邹韬奋、史量才、陈彬和、钱华、顾执中、陆诒以及英文《中国论坛》主编伊罗生、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华美籍记者史沫特莱等中外新闻界人士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年底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讨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问题，决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

1933年

年初

胡志明径厦门抵沪，赴莫利哀路拜访宋庆龄。胡志明1931年6月在香港被捕，此行是他刚出狱为恢复与党联系，请宋庆龄将一封信转交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

1月4日

鲁迅接受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邀请，出席会议。

1月6日

宋庆龄和蔡元培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副主席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要求释放被非法逮捕的北平学校师生。电文说：北平学校师生许德珩等数十人“被非法拘禁，经各方呼吁营救，仅许德珩等少数人获得保释，其余诸人，拘押致今，既未依法审判，亦不释放，于党义法治，实有未合”。“又据确切消息，入狱者尚有十四岁之小学生，与十六七岁之中学生多人，中央屡言保障人民一切自由，扶植民主政治，乃此辈中小学年龄之儿童，竟不矜全，横遭非法，诚可痛心，务请贵会力持正义，尊重民权，即日令平公安局释放被拘马哲民师生。”

1月11日

宋庆龄在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流所召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

1月16日

宋庆龄、蔡元培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副主席名义打电报给北平市政府、市长，继续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1月17日

下午4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和、胡愈之、鲁迅等9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了分会章程和拟发表的宣言。宣言中指出：“中国民众，至今无最低限度民权之痕迹。反之，杂志与报纸时被封禁，集会与结社动遭禁止。最近五年之中，出版物之被禁止或停止出版权力者，以数百计，……禁令之严，文网之密，致使被封禁杂志报章之编辑人，即幸免入狱，亦不敢出而抗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愿唤起中国人民，起而努力，实现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一切真正民权之利益，反对一切检查与禁止。愿唤起民众要求最低限度民权之普遍享

受，停止对努力中国进步与解放之著作家、美术家与杂志报章编辑人之压迫。”

1月21日

宋庆龄接到鲁迅来函。信中称：“黄平被捕后，民权保障同盟曾致电中央抗议，见于报章。顷闻此人仍在天津公安局，拟请即电该局，主持公理，一面并在报端宣布电文，以免冥漠而死也。”

宋庆龄、蔡元培再次打电报给北平市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1月20日—25日

宋庆龄为慰问榆战伤兵和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特委派杨杏佛为代表专程赴北平。

1月24日

宋庆龄、蔡元培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副主席名义打电报给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要求对黄平进行公开审判。

1月30日

下午4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于北平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成立大会。会上议决，要求政府将21日擅杀镇江《江声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之江苏省主席顾祝同查办，并请检察院彻底进行弹劾。

2月3日

为了抗议刘煜生被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再次发表宣言指出：“刘煜生之死非死于描写社会生活之文字，而实死于揭载鸦片公卖之黑幕，及赵育禄之不检行为。是刘非死于死时状况之法理，非死于戒严时期之情势，乃死于为吾民呼吁抗拒烟毒，而引起大之挟嫌报复也甚明。愿同人对此案是非，有明确认识。”

2月8日

宋庆龄、蔡元培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要求释放在山东

被捕的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委员。

2月17日

晨6时，作环球旅行的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乘不列颠皇后号轮抵达上海吴淞口。宋庆龄于晨5时即偕杨杏佛等乘海关小轮前往吴淞口迎接。后登轮往访，与萧伯纳在轮船餐厅谈话，共进早餐。萧伯纳表示，过沪本无意登岸，仅想一晤孙夫人。后轮船改泊杨树浦码头，萧即登岸赴宋寓。宋庆龄在寓所设午宴招待萧伯纳。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等出席作陪。下午4时半，宋庆龄又偕杨杏佛送萧伯纳返回停泊于吴淞口之皇后号轮船，萧伯纳于当晚11时乘原轮离沪赴秦皇岛。

2月28日

宋庆龄、蔡元培打电报给胡适，要他公开更正在《字林西报》上攻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言论。

3月3日

宋庆龄主持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议，决定开除公开进行叛盟活动的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同日宋庆龄与蔡元培致电云南省政府，要求释放陶国贤。

3月8日

晚，上海工人、学生界、文化界等28个团体在上海青年会召开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章程。宋庆龄出席了会议并发表讲话，介绍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号召全国抗日群众紧密团结，一致奋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并反对一切阻碍一个真正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的种种企图；宋庆龄呼吁：“我们愿唤起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努力于这次解放的奋斗，努力于中国的统一的完整。这个奋斗与中国劳苦民众反对剥削的奋斗是不能分的，与中国民众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的奋斗也是不能分离的。只有这种

奋斗可以产出一种不可征服的民族与社会势力，来打破帝国主义与其在中国阴谋叛逆的联盟的势力。”宋庆龄强调：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我们将赢得“不是被帝国主义征服与瓜分的中国，而是工人与农民的自由的团结的革命的中国。”宋庆龄提出了四项要求：“(1)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适当的军械与飞机，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满洲热河，保卫中国；(2)人民应全部武装，组织人民自卫团；(3)人民的民权(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立即恢复，对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与杀戮应立即废止；(4)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进攻。”并号召全国每一城市和乡村，必须为实现四项要求而斗争。宋庆龄被推选为国民御侮自救会主席。

3月18日

下午4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在八仙桥(今西藏南路)青年会召开会员大会。由于会章规定中央执委不得同时兼任分会委员，而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邹韬奋、胡愈之、林语堂、伊罗生等7人已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因此会议议决他们7人皆辞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职务，另选举沈钧儒、郁达夫等7人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选举揭晓后，还议决通过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名义参加国民御侮自救会，及推代表赴上海市公安局调查犯人待遇情形等议案。会后即召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

3月28日

宋庆龄发表声明驳斥某些报纸登载有关其行踪和在南京购置产业等种种谣言，严正指出：“此种记载，或为反动者所散布，实则庆龄近来始终在沪，每日处理中国民权同盟之会务。庆龄愿声明，凡新闻记者，欲悉本人在沪之行动与工作，可致函本人住宅，或民权保障同盟见询，传播无稽之消息，似非必要也。”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秘书余文化、中华海

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 3 人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勾结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

3 月 29 日

宋庆龄和蔡元培等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议决两案：(1)检查租界及华界监狱待遇政治犯之情形，检查员定吴迈等 5 人；(2)刘煜生案，质问检察院不办该案理由，并要求检察院全体委员辞职，以谢国人。

3 月 30 日

宋庆龄因廖承志被捕事，前往何香凝寓所，表示亲切慰问。廖承志因何香凝、柳亚子营救而于 31 日保释。

3 月 30 日

宋庆龄主持召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讨论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余文化、陈藻英等 5 人的办法。宋庆龄和蔡元培出面委托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等为被非法逮捕者辩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为此发表宣言指出：对罗登贤等人的逮捕全属非法，应立刻释放。宣言强调：“在此国难期间，欲言御侮，国人必有反帝国主义之自由，不应对于努力此项工作者反愈加压迫，致伤元气。吾人应速自觉悟，奋起力争，而要求罗、余、及一切政治犯之释放，尤为第一要图。”

3 月。

宋庆龄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阐明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以及保障和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性。文章指出：“这个同盟不是一个政党。它的目的不是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去作政治与经济的斗争，因而它的目的不在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但另一方面也必须了解，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却是政治性的。在我们初次的宣言中，我们所列举的任务如下：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

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宋庆龄强调：“民主权利是不能与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国的斗争分开的。相反地，它和这些斗争是结合在一起，而且是这些斗争的一部分。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对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说对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不然除了投降与分裂，就没有其他出路了。没有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和中国的朋友会希望中国投降和分裂。……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为防止投降分裂的斗争的一部分。”宋庆龄义正词严地批驳了种种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歪曲和污蔑，澄清了一些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她着重指出：“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对人民大众来说，始终是有名无实的。……民主只是形式的，只是宪法上的具文，只有在它不妨碍资本家剥削掠夺人民的‘权利’时，才被允许留存。事实上，这些‘民主’制度不过是严密保障着一小撮剥削者的权势的一种制度。这些制度的‘民主权利’不过是掩盖这一小撮剥削者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独裁统治的烟幕。……国民党更糟糕。它的法律据说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而实际上却公开的、无耻地为极少数封建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有关‘人民’的纸上法律只是一种宣传，内容完全是空洞无物的，每天都发生极端残酷地镇压工人、农民和学生的事件，这就说明了真实的情况。”宋庆龄严正宣告：“那些自以为可以无限期延长他们对人民的血腥统治的人是大错特错了。人民大众一定要为他们的基本权利而斗争。这个斗争会加强起来，会席卷全国，会使中国强大和统一。……中国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力量，但明天一定会解放自己的。……我相信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所以我相信革命一定会建立自己的权利，建立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人民自治的权利。我以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推动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

4月1日

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告中国人民——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书，严正指出：罗登贤等革命者的被捕，“正是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蒋介石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已使今日中国濒于全部分裂、沦为帝国主义属国的境地”。“上海公共租界，这帝国主义称之为‘安全与公正的’岛屿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敌人、汉奸、中国人民的叛徒、鸦片贩与流氓们的天堂。租界本来是卖国活动的大本营，是反对中国人民和危害中华民族生存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宋庆龄赞扬被捕的罗登贤等“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了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她指出，他们“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宋庆龄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她大声疾呼：“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释放他们，释放几千个与他们一样的人，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不能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地生存下去。”

4月2日

宋庆龄和蔡元培为营救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藻英等4人联名致电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部长罗文干。电文指出：罗登贤等4人“由公安局解京，罪证既不成立，移提久禁，已属违法，务望力争，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以重民权而保司法独立”。

4月3日

宋庆龄在中央研究院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及上海分会联席分议。会议讨论了营救罗登贤等4人的办法，决定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经过票选，宋庆龄和杨杏佛、沈钧儒、陈彬和等7人被选为委员。会议决定推派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伊罗

生 4 人为代表，赴南京营救罗登贤、陈赓等人。

4 月 4 日

为营救被非法逮捕的罗登贤等 4 人，宋庆龄和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等人赴南京。

4 月 5 日

凌晨，宋庆龄和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等抵达南京。到南京卫戍司令部探望罗登贤等人并转交一个秘密“纸条”给陈赓；旋即又赴江苏省第一监狱探视牛兰夫妇，询问其在监狱的生活情形。

宋庆龄在下榻的扬子饭店，接见来访的汪精卫、罗文干等，并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汪、罗等书面提出“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严惩狱吏蔽护犯人及受贿行为”等 4 点要求。并要求即刻释放日前解京的罗登贤、余文化、陈赓、陈藻英等人。

晚，宋庆龄和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等赴国民党南京警备卫戍司令部探访被监禁的罗登贤、余文化、陈赓、陈藻英等。

4 月 12 日

江苏省第二监狱（即上海漕河泾监狱）全体政治犯向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团体发出呼吁书，揭露国民党监狱当局对 2000 多名政治犯的残酷虐待。

4 月 23 日

宋庆龄致函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辞去该会主席职务。信中说：“因庆龄所任其他工作，已感时间精力穷于应付，万难再尸位误事”，“此后仍当以会员一分子之地位，追随先生之后，努力御侮工作。庆龄对一切事业，向来量力负责，不作虚伪谦让”。

4 月 26 日

宋庆龄主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决议营救被捕入狱的罗

章龙。

4月

宋庆龄听到蒋介石企图杀害红军将领陈赓，曾在南京当面斥责蒋介石说：“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一役一直跟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蒋介石被骂得哑口无言。

4月

宋庆龄致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称：罗登贤等4人“前承先生电允，依法办理。务望鼎力，即日移解正式法庭，以重民权而维法治精神。”

5月1日

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国民御侮自救会沪东、沪南、沪北各分会举行游行示威，遭到镇压。

5月2日

国民御侮自救会各分会被查封。

5月13日上午

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对德国迫害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抗议书》。德国领事馆副领事贝连接见了他们，表示将代为转达该国驻华公使。《抗议书》指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我们从来源各不相同、但又十分可靠、并且代表着各种政见的材料里，知道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已被逮捕了。……德国工人数十年斗争得来的权利被粉碎了。出版、言论和集会的自由没有了，结社的权利和群众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采取的行动的的权利也没有了。所有

德国进步的学术与文化生活全被摧残。……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事实，这些事实一再登载在欧美报纸上。我们抗议这些对付德国无产阶级与进步思想家的可怕的恐怖手段，因为这摧残了德国社会、学术和文化生活”。

5月14日

《对德国迫害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抗议书》在《申报》全文发表。

5月24日

发表《中国的工人们，团结起来！》一文，指出“帝国主义决不能征服和瓜分中国，我们将建立一个属于工人和农民的自由统一、革命的新中国。”

5月

共产国际通过宋庆龄向廖承志了解上海党的情况：1. 上海的秘密工作能否坚持下去；2. 叛徒名单。

6月16日

杨杏佛因得到友人告警说国民党特务阴谋加害宋庆龄和他，专程前往莫利哀路宋庆龄寓所告诉宋庆龄：特务已把她列入暗杀名单，请她务必注意安全。宋庆龄说已接到若干恐吓信，并叮嘱杨杏佛“自己也务须小心”。

6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欢迎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来华及反帝大会的筹备通知》，通知各级党部，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将在7月来华，准备9月初在上海开世界反帝大会。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门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6月19日

宋庆龄发表《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严厉斥责蒋介石指使的国民党特务的卑鄙手段。《声明》指出：“这批人和他们所雇佣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6月20日

宋庆龄偕同伊罗生及女秘书一人，前往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参加杨杏佛的成殓仪式。宋庆龄在瞻仰遗容时，“深感悲哀，盈盈欲泪”。她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对杨被刺事，业已有一文告发表。民权保障同盟之会务，当然继续进行。”

6月下旬

宋庆龄在接见报社记者时说：“我虽然受到某些方面的威胁，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停止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的。”“杨杏佛之死决不会影响运动的进展，相反地此事将激励同盟加倍努力工作。”

7月2日

杨杏佛灵柩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吊唁时，宋庆龄送了挽联及花圈志哀。灵柩安葬于上海永安公墓。

8月6日

宋庆龄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上海筹委会主席名义，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代表的声明》。《声明》指出：帝国主义把人类投向战争、死亡和毁灭的活动，正是当前时局的特点。而帝国主义开辟的战

场，总有一天必将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墓地。宋庆龄呼吁：“必须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惟有他们才能使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计划归于无效。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她号召一切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都派遣代表出席九月在上海举行的反战大会”。

8月13日

宋庆龄写信给蔡元培，邀请他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

8月18日

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会议第二次大会决定在上海召开，由宋庆龄出面组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负责筹备，上海反帝大同盟、“社联”、“左联”组成筹备小组。

8月

宋庆龄在领导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会议远东会议筹委会的工作中，同妄图阻挠会议召开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前来参加会议的外国代表乘船抵达上海，遭反动当局的无理阻拦，不准代表登岸时，宋庆龄以不畏艰险的革命魄力，蔑视反动派的禁令，亲自上船去欢迎出席会议的代表，挫败了反动派的破坏活动。

9月30日

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协助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第二次大会在上海沪东区秘密举行，宋庆龄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宋庆龄指出：当前时代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时代，“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的战争。”会上正式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宋庆龄被推选为主席。

10月13日

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发起成立妇女救护慰劳联合会，推宋庆龄为会长。

11月21日

晚，宋庆龄获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与福建人民政府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后，向各报发表亲自签名的《宋庆龄之声明》。《声明》指出：“一切报纸所载，余与最近福建变动有关，及更荒谬的传余已赴闽垣，诸种无稽消息，均系对余愚笨而又恶意的中伤。余郑重声明，余与任何军阀政客集团，不论现在抑或将来，绝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余之立场，始终不变。”

11月29日

上海女声社发起选举中国现代伟人民意测验，宋庆龄被选为现代妇女伟人的第一名。

12月30日

宋庆龄致电汪精卫、居正、罗文干等，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电报说：“牛兰绝食已十日，牛兰夫人绝食亦三日，此次请勿再以‘暂缓’、正式手续等等空言搪塞。前此政府人员所期许之正式手续等等诺言，今日已经证明完全为欺骗之辞。君等如不能完全对牛兰夫妇生命负责，请即时正式传令将之恢复自由，否则亦须即时释放牛兰夫人。因渠之孱弱身体，关系其目前之生或死，已非日而为时之问题也，君等究将如何处置渠二人，请即时赐知。”

1934年

1月10日

在江苏第一监狱绝食14天的牛兰夫妇致书宋庆龄说明他们绝食的理由。

1月12日

宋庆龄为牛兰绝食事再次致电汪精卫、居正。电文指出：“牛兰

绝食二十四日已濒死境，其妻亦去死不远，政府苟愿有所举动，或接受渠等要求或即传令释放，二十四日以来应早有表示。此际补救仍未为晚。君等若始终不欲牛兰夫妇复食，不应允渠等之要求，则全世界革命舆论、自由主义舆论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仅与德国希特勒式之野蛮残酷差可比拟，君等如欲成全渠二人之性命，请迅即为之，因完全责任均在君等之掌握中也。”

4月20日

毛泽东就日本政府发表的“天羽声明”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纲领》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想用武装力量来实行民国四年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件，它并且用流血政策来开始实现田中内阁的所谓对华积极政策（即完全占领全中国及把全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因此，现在全中国的民众，不管是汉人或是其他民族（蒙古、回族、满族、西藏、苗瑶等等）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关头，他们都有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枪毙，砍杀，拷打，强奸，侮辱的危险。”强调：“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的救国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换言之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对日作战，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唯一正当的方法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宋庆龄以《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与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联名发表。后公开发表赞成签名的达10万人。

5月3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反帝反法西斯同盟、上海工团联合会等团体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推选宋庆龄为主席。

7月12日

领衔签名发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筹备委员会宣言》，在《宣

言》上签名的达 3000 余人。

8 月 1 日

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领导人员：主席宋庆龄；组织部长李定南；宣传部长林里夫；军事部长李国章；经济部长章乃器；总务部长陈璧如等。

8 月 18 日

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发表《为“九·一八”三周年纪念宣言》和《募捐启事》，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和海陆空军动员起来，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纪念“九·一八”；要求全国举行罢工、募捐、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没收日货及卖国贼的财产，组织“一切民众武装队伍”；同时“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

11 月 13 日

《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在杭州返沪途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11 月

宋庆龄在史沫特莱寓所参加史沫特莱、马海德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举行的聚会。

本年

在宋庆龄的关怀和帮助下，在上海的路易·艾黎、马海德、史沫特莱、西普、罗森堡、魏璐诗等，组织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宋庆龄把马海德在上海开设的诊所安排给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作为联络开会的地方；并让马海德通过各种关系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材，送往红军革命根据地。

1935 年

1 月 30 日

宋庆龄在美国纽约《今日中国》杂志发表《向美国朋友呼吁》。

文章指出：“我向你们呼吁，请尽全力争取做到：不让一枝美国枪和一分美国钱用于帮助南京政府及其走狗粉碎中国广大群众的合法愿望。任何种类的帮助都不能给予南京政府，它的历史作用只是无耻地、不断地背叛中国的国民革命事业。……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在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瓜分中国的惨象正在我们眼前可怕地出现，并将导致世界性的战火。这一流血灾祸必须避免也可以避免，只要中国人民的朋友们团结一致，坚持不懈地努力，并同我们携手并进，揭露真相，帮助我们阻止外国帝国主义支持南京的卖国政府。”

6月5日

宋庆龄致函鲁迅，信中说：“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7月25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8月5日

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马海德以外国人的身份护送中共领导人陈云等到一艘停泊在黄浦江的苏联货轮上，使陈云等得以安全离开中国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以及遵义会议的情况。

8月

宋庆龄和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中共中央于八月一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影响甚大。

11月6日

宋庆龄与何香凝、鲁迅、茅盾、史沫特莱等应邀出席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招待会。

11月23日

宋庆龄在未莅会的情况下被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1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签署的《抗日救国宣言》发表,提出十大纲领;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蒋抗日。

12月9日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坚持白区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一二九”运动爆发。

12月21日

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在北四川路青年会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千余人。会议选举史良、王孝英、罗琼、沈滋九、胡子婴、韩学章、陆慧年等11人为理事。会议发出通电和宣言,号召“全国妇女立即自动组织起来,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

12月27日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选出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钱亦石等30余人为委员。会议通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

本年

美国友人格兰尼奇夫妇抵达上海。不久,他们结识了宋庆龄。由于他们非常同情中国的正义斗争,因此宋庆龄请他们出面创办

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主要宣传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宋庆龄亲自为刊物搜集材料，约请一些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使《中国呼声》在国际上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6年

1月初

宋庆龄在寓所约见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委托其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将一封重要信件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宋庆龄再三嘱咐董健吾，这是件关系国家人民前途的大事，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此行将“益国非浅”。这是宋庆龄接受宋子文的委托，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重建国共关系的重要信息。

年初

中共北方局派东北大学学生邹鲁风为交通员，秘密携带向中央的报告来到上海，通过鲁迅，将报告转交宋庆龄，由宋交给中共中央地下组织，接通了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关系。

1月28日

上午9时，宋庆龄与何香凝、沈钧儒等在上海市商会大礼堂出席纪念一二八抗战4周年大会。会上宣布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参加此次大会的有上海各界救国会代表800余人。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何香凝等30人被推举为理事。

2月11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指名攻击救国会是受共产党和“赤色帝国主义”利用的非法团体，并扬言要予以严厉制裁。

2月24日

《救国时报》发表宋庆龄提出的救国六大纲领。

3月4日

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请博古转董健吾，提出与南京当局

谈判之意见,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5点意见,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3月22日

宋庆龄赠病中鲁迅“糖食三种,茗一匣。”

4月

宋庆龄约马海德到寓所晤谈,促成斯诺、马海德陕北之行。

4月25日

中共中央从陕北派往上海的冯雪峰到达上海,一周内先后同宋庆龄和鲁迅、茅盾、沈钧儒、史沫特莱等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会面,向他们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建立了关系。

5月6日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国难教育社联合主办的《救亡情报》出版发行。

5月31日—6月1日

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的号召和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18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50余人参加。宋庆龄等40余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大会通过了《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草案》等重要文件。《宣言》指出:“救国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

6月5日

宋庆龄致函救国阵线领袖指出:“我们反日的最好办法,是只有加强我民族革命的力量。所以我敢担保你们将作坚持到底的努

力。我们的路是漫长而艰苦的，但只有伟大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如果我们能够尽力干下去，这种胜利是有保证的，我们非常欣慰，签名于这救国会的纲领和宣言之后，我充分支持这个纲领和宣言。”

6月14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向全国人民发表对时局紧急通电，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领导，对日抗战”，“否则同室操戈，敌人得利，亡国灭种，谁负其责？”

6月

宋庆龄在《救亡情报》第六期发表致救亡阵线领袖函。宋庆龄介绍美国医生马海德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陕甘宁边区。宋庆龄通过地下党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获得了中共中央同意“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的信息。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埃德加·斯诺得以顺利进入陕北进行实地采访，撰写并出版了著名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使世人第一次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业绩和抗日主张。事后，埃德加·斯诺回忆说，赴陕北实地采访“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这彻底唤醒了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我请她（宋庆龄）帮助我，以便到红区以后起码作为一个中立者的待遇，而不被当作间谍。”

马海德到了陕北以后，留在边区，参加了工农红军。

7月10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推派沈钧儒、章乃器、彭文应、沙千里等赴南京，向国民党二中全会请愿，并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实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释放政治犯”、“以武力制止日本在华北增兵”等6项措施。

7月

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来电邀请宋庆龄以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身份出席9月10日在巴黎举行的扩大会议，共同讨论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和声援各国反法西斯群众运动的问题。

8月15日

由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宋庆龄实际上没有行动自由，无法赴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遂决定委派文化界救国会的钱俊瑞为其代表前往参加会议。是日，宋庆龄通过史沫特莱约钱俊瑞到寓所面谈，要求钱俊瑞在会上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不但要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还要反对日本军阀财阀的法西斯主义和残暴的蒋介石法西斯主义。宋庆龄对钱俊瑞的出国活动作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要求钱多听取美国反法西斯战士达德教授的意见。宋庆龄对钱俊瑞说：“这次达德陪你去，可以帮你许多忙。他的斗争经验丰富，他可以告诉你，在大会上，在小组会上，在个别谈话中，应该着重讲些什么，少讲些什么，那些东西可以不讲。”宋庆龄还对达德教授说：“你这次来中国是初次，你一定会发现中国的情形很精很糟。但是，我劝你相信，中国的情形一定会好起来的。中国有个共产党，我看希望就在这里。”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9月3日

由于上海各报刊载“武装自卫会”向国民党当局归顺的“自首宣言”，宋庆龄与章乃器联名发表《为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事告大众》，愤慨地指出：作为武装自卫会的发起人，对上述“无耻宣言，不能不加以驳斥”。

9月10日

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巴黎开幕。主持会议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会上多次赞扬宋庆龄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及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罗曼·罗兰指出：“你们以为我们的卓越的副主席宋庆龄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吗？不！不！她是一头名符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9月18日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市商会、地方协会、律师协会、记者公会、市总工会等20余团体共5000余人，准备去漕河泾举行九一八纪念碑奠基典礼，当行抵老西门时，遭到国民党军警袭击，伤百余人，被捕失踪30余人。为此，宋庆龄和何香凝于9月20日发出联名快邮代电指出：“请一致主持公道，严办负责官吏，抚慰受伤人民，释放被捕诸人，以安民心。”同时决定以救国会的名义就此惨案发表《通电》和《告全国同胞书》。

毛泽东致函宋庆龄，信中写道：“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信中提出：在此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严重时刻，希望宋庆龄“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央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

9月中旬

国民党市党部发布一个通令，诬蔑救国会是“借救国为名敛钱肥己”，禁止救国会募捐援助绥远的抗日军队。

9月22日

毛泽东致函蔡元培，力促“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偿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信中特别囑告：宋庆龄、何香凝等“统此致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她们的敬佩之情。

10月上旬

新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从陕北到达上海，立即到宋庆龄寓所拜访宋庆龄。

10月18日

宋庆龄和马相伯、何香凝等联名发表了《更正侮辱救国会之通令启事》指出：其等“对于救国阵线，或身居领导，或直接负责，曾否敛钱肥己，想为国人所共谅。十年来敛钱肥己者究为何种人，亦难逃国人之耳目。”并讽刺国民党当局“党政诸公既不能领导人民从事救亡工作，人民自动组织应何欣慰之不遑，诘忍诬为反动、实所不解。”

10月19日

上午5时20分，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逝世。宋庆龄立即到鲁迅寓所瞻仰遗容；宋庆龄和冯雪峰、许广平、周建人共商治丧大事，一切重要事情由宋庆龄主持。宋庆龄和蔡元培等人组成鲁迅治丧委员会。

10月20日

宋庆龄在为鲁迅逝世答《立报》记者问时说：“鲁迅先生底死，是中国一种重大的损失。至于‘身后’问题，鲁迅先生生前既然为中国民族求解放而奋斗不懈，死后我们便得拿他这种精神去宣扬给全国的民众，纪念他的办法，则是把他的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迹和伟业。”

10月21日

宋庆龄赴上海万国殡仪馆参加鲁迅的大殓仪式。

10月22日

宋庆龄参加鲁迅的葬礼。在送葬的行列里，宋庆龄紧随灵车，与广大群众一道行进。国民党特务慑于她的崇高威望，不敢对葬礼横加干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原拟破坏葬礼的卑鄙企图，使这次悲壮的群众爱国示威性的葬礼得顺利进行。下午5时，在万国公墓礼堂前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宋庆龄发表了激昂的讲话。她指出：“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

10月

宋庆龄致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第二次执委会，指出：“月来，诸同志在各地努力奋斗，至慰心怀。整个领导，亦甚正确。其所以能使运动日益开展者，非偶然也。惟救国功业，至为艰苦，如欲获得最后之胜利，尚须有更大之努力。尚希诸同志再接再厉，以取得民族之解放！”

埃德加·斯诺编译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集《活的中国》，由英国伦敦乔治·哈勒普书店出版，这本书是斯诺献给宋庆龄的，斯诺在该书扉页上写道：“献给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11月10日

宋庆龄发表纪念孙中山诞辰七十周年纪念词，指出：“全国同胞纪念中山先生，要继续先生的遗志，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尤其要联合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共同制裁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联合日本、朝鲜、台湾各地爱好和平的大众，建

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我们只要不屈不挠，勇往直前，铁和血一定可以铸造出来灿烂辉煌的民族解放功业。”

11月11日

针对上海仍有一部分人打着“武自会”的旗号进行破坏救亡运动的卑劣行径，宋庆龄与章乃器再次发表声明，予以声讨。

11月12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等联合召开了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

11月18日

宋庆龄和茅盾、蔡元培等联名写信给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信中说：“鲁迅通过自己的孤军奋战，揭开了黑沉沉的夜幕的一角……鲁迅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代表，而这种精神的火光暴露出了现今统治者的无能和卖国嘴脸。”“虽然鲁迅出生在中国，但他却是属于全世界的。”

11月23日

凌晨2时许，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勾结英、法两租界巡捕房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是为七君子事件。

当晚，救国会机关刊物《救亡情报》以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三位领导人名义发表《全教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国人书》抗议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七君子。

宋庆龄致函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信称：“国难严重至此，正国民急应奋起救国之时，章先生等系救国会办事人，救国为全国国民责任，岂救国者即为共产党乎？请先生主

张公道，迅电蒋介石先生立即释放章先生等七人，民族解放前途幸甚！关于营救章先生等事，兹托孙哲生先生与先生共同商议，如须廖夫人及庆龄联名加入发电时，即将名加入可也。”

深夜，宋庆龄接到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转送的方志敏烈士《可爱的中国》手稿。随后，交地下党转交陕北党中央。

11月24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沈钧儒、章乃器等7人无辜被捕发表紧急宣言。提出，“立即释放被捕诸领袖”、“公开保护爱国运动”、“立即抗战”等口号。

11月26日

宋庆龄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向报界发表《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声明》指出：“余以全国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鉴于全国救联七领袖被捕，特提出抗议，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救国会是不反对政府的；它也不袒护共产党；它要联合全国人民不分政治信仰、党籍不同的区别，以成立统一战线，从事民族解放战争。……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

宋庆龄接到冯玉祥复函，称章等7人“已经设法营救，并为介石先生去电。”

12月12日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

12月16日

宋庆龄与何香凝、马相伯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的身份联名发表《为救国会七领导人被捕事件宣言》，重申了救国会

的政治立场。《宣言》指出：“我们正同全国有良心的同胞一样要求政府立刻无条件恢复被捕九位先生的自由，释放一切因爱国行动而被捕的同胞，以巩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作，加强全民族抗敌的力量。……我们希望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数十万会员和全国爱国的同胞，集中一切力量，用宣传、募捐、救护、报效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援助和扩大绥远的抗敌军事行动。务使此次抗战成为收复一切失地，恢复一切主权的全民族的抗战，……同时，我们希望全国爱国的同胞参加并要求政府能给予人民自由组织各种各样的救国团体。这种团体，我们只问其是否抗敌，而不问其发动者是谁，领导者又为谁。……救国阵线的立场始终没有变更过，而且今后也决不会变更。我们的立场是要求全国人民，不问党派，不问信仰，不问地位，实行真正的精诚团结，停止一切内争，立即对日抗战，求得中国之自由和平等。”

12月中旬

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宋子文等亲往宋庆龄寓所请求她出面与中共联系，务求保住蒋介石的性命。宋庆龄将情况通报给了潘汉年，征询他的意见。潘汉年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已决定派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赴西安参加协商谈判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同时建议她敦促宋子文、宋美龄等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团商谈，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即，宋庆龄针对西安事变对记者发表了谈话，指出：“中国目前处在战争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正在入侵我国的绥远。考虑到现在国家正处在危急时刻，所有军队的当务之急是：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任何企图阻碍此战线形成的做法都是在犯罪。”宋庆龄强调：“内战必须停止！这是我一贯的立场。面临日本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我热切地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

12月24日

中共中央应张、杨电请，派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等于16日到达西安，俟在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22日，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顾问端纳，飞往西安谈判。23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开始谈判。周恩来提出双方停战、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等六项主张。24日，蒋介石允诺返抵南京后释放爱国领袖；宋子文、宋美龄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至于应该如何进行，明确提出：将要“与孙夫人(宋庆龄)商办法。”

1937年

2月15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至22日会议结束)。会上，蒋介石报告了西安事变经过，并散布其《西安半月记》，对张、杨八项主张不予置理；汪精卫发表继续“剿共”演说。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斗争和呼吁下，并经过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积极努力，迫使全会接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通过同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决定在统一军队编制和政权形式等条件下可以和共产党合作，将武装剿共方针改为“和平统一”共产党的方针，使国内和平局面初步打开。是日，宋庆龄领衔和何香凝、冯玉祥、李烈钧、经亨颐等13人联名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2月18日

宋庆龄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进一步说明所提出的“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3月1日

宋庆龄为日本改造社出版《大鲁迅全集》撰写《把鲁迅先生的战迹献给日本人民》一文。文章指出：“鲁迅先生三十年来作为战士的生涯，是他从学生时代开始便直接和间接的参加了民族的政治的斗争。而且在思想问题上他提出劳动人民必须获得个性解放，他是第一个肯定他们的力量而欢迎他们的人。三十年来，他乘着这个不屈不挠的信仰，斗争前进，对外表述了中华民族的真实的心声，对内向统治阶级提出了毫不留情的，而且也是最有力量的抗议。这使他成为伟大的民族战士，同时也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鲁迅先生在这一历史环境中，以他卓绝的天才，圣洁的人格和坚韧的意志，在一生之中，集中体现了使我们这个民族走向光明的时代的意志和力量。我相信，由于他的著作的介绍，日本的思想界将能最好的理解中华民族，使中日两国劳动人民达到进一步的理解和结合。”

4月12日

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

4月

宋庆龄在美国纽约《亚细亚》杂志发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文章指出：“三年以前，国内开始了一个名叫‘新生活’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这使得我们在实际上有很大的必要寻觅对儒教正确的认识。”宋庆龄在对儒教作了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和批判以后指出：“我们现在的社会组织正在急剧地变化、改造以及重建。新的社会秩序自然需要新的意识、新的道德标准和新的关系。……中国正在发生的许多大变化，带来了种种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很容易的事。儒教不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它已经完

全失去了实际价值。只有那些头脑反动的人，才要想法恢复它。”她强调：“中国今天需要另一种思想意识。人民生活中经济及技术的新发展和新情况，都需要新的思想意识。先总理孙中山已经指出了中国的需要。……实行孙中山的遗教，是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如果孙中山遗教已经在各地实行，那末我们十年来所面对的许多困难和问题，都已经被克服了。孙中山已经把他的理论综合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些主义适合于目前中国的情况。”“我建议用另一种运动来代替这个学究式的运动，那就是，一种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进以改善人民生活的伟大运动。这是一种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儒教，因为革命的目的就是提高人类和群众的物质享受；假如这一个目的没有达到，那就等于没有革命。”

6月25日

为了营救“七君子”，宋庆龄和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联名具状苏州高等法院，指出：“具状人等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为特联名具状，束身待质，仰请钧院将具状人等悉予羁押审讯。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救国责任。”

6月25日

宋庆龄和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为援救沈钧儒等“七君子”，争取救国自由，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爱国有罪的反动实质，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为此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宣言》指出：“我们准备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还发表了《为救国入狱运动向上海新闻界的书面谈话》，阐明救国入狱运动的重大意义，要求新闻界对这个运动予以“宣传和提倡”，“以使爱国无罪，成为每个中国人的信条，中华民国的光明前途，就将从这一事件开始！”

7月5日

宋庆龄抱病和胡愈之、胡子婴等11人，各带简单行装，离上海到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和反动当局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到法院后，宋庆龄和胡愈之、诸青来被推为代表，同该院院长朱树声谈判。宋庆龄提出：“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后去狱中探视七先生。

7月7日

宋庆龄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陈述救国入狱情况，明确表示：“沈钧儒等爱国救亡，不应有罪，迄今被押已逾半载，自应一面从速先予停止羁押。庆龄等及全国救亡运动中人，断不敢坐视沈等痠困，而己身独享自由。除一面仍依所立志愿并遵检察官之指示进行外，特亟通电奉达，务祈迅予主张公道，勿失全国志士之心。”

晚10时，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到当地中国驻军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驻守该地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冯治安师吉星文团官兵奋起抵抗。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

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芦沟桥，向各报馆、团体、军队、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出路。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动员海陆空军，准备应战。

7月15日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提出奋斗的总目标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解放，发动民族革命抗战；实现民权政治，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

7月18日

下午2时,宋庆龄和蔡元培等发起的鲁迅纪念事业筹备委员会,在上海静安寺路华安大厦举行鲁迅纪念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推举宋庆龄为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许寿裳、马相伯、胡愈之、胡风、茅盾、许广平、郭沫若、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内山完造等70余人 为委员。

7月22日

宋庆龄和何香凝经过广泛号召、联络和紧张筹备,以原妇女救国运动领袖为核心,团结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夫人以及各界妇女人士,创建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明确规定“以号召妇女团体抗敌以及战时负救护慰劳救济工作为宗旨”,表示要发动妇女“和男同胞共赴国难”,“一致起来抗战”。该会由何香凝主持,宋庆龄担任理事。

7月24日

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后易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上海分会”)成立,何香凝任主席,宋庆龄被推选为理事。

7月28日

上海文化界500余人集会,正式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大会推举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茅盾、钱俊瑞、周寒梅等83人为协会理事。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后,统一领导了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

7月31日

由于沈钧儒等坚强不屈的斗争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7月

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待在庐山与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谈判国共合作事宜后来沪的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等。宋庆龄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的主张。

8月4日

鉴于南京成立了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并要求各地组织分会的情况，宋庆龄和何香凝为了保持和扩大统一战线，以利于团结各界妇女和抗日救亡活动的发展，提议并经后援会理事会决议，将后援会改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从属于南京妇慰总会，并向上海市抗战后援会登记备案，从而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

8月13日

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八一三抗战开始。

8月14日

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

8月24日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在大型报纸《救亡日报》创刊。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钱杏邨、茅盾、巴金、郑振铎、邹韬奋、胡愈之、萨空了、金仲华、范长江、王芸生等担任编委。

8月

宋庆龄在美国纽约《论坛与世纪》杂志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宋庆龄在文章中指出：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在这情形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

9月9日

宋庆龄与蔡元培、胡适等教育界人士联名向西方各国文化科学界发出呼吁，揭露日本野蛮屠杀中国无辜难民的罪行。

9月17日

宋庆龄致函英国工党指出：“中国不仅单为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制止日本侵略以增强中国抵抗的力量，这于许多国家特别是英国有利。贵党承继着自由、民主以及为改善广大群众生活的奋斗的遗绪。我们的抗战是反抗压迫者、法西斯主义和黩武主义，而这一切也是你们的敌人。从这共同的基点上，我们有着呼吁你们援助和支持的权利。”

9月23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9月24日

宋庆龄就《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一文。宋庆龄在文章中指出：“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重新携着手，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我相信两党同志，经过十年以来长期的惨痛教训，再加上日寇无情的残酷的进攻，一定能够本‘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诚信地友爱地团结成一体，唯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

9月26日

宋庆龄答《救亡日报》记者问，指出“国共两党实现和平团结一致对外，是实现孙总理弥留时和平奋斗救中国重要遗嘱的开始。”

10月3日

宋庆龄在《救亡日报》上发表《致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的信》。宋庆龄在信中指出：“中华民族现在已经像一个巨人似站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了。……我吁请你们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不要坐视不顾。只有通过仔细的审查，你们才能认识到中国不

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我们的抗战是为了抵抗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而这一切也是你们的敌人。由于这个共同的基础，我们在这里向你们呼吁，请你们给我们支持和援助。”

10月14日

宋庆龄致电美国总工会，吁请进行抵制日货活动，并阻止美国军火运往日本。

10月15—16日

宋庆龄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中国当前的急务》一文，阐明了关于粉碎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野心的具体主张，支持群众救亡运动。

10月16日

在华安大厦(今金门饭店)出席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召开的外国记者招待会。

10月20日

宋庆龄在上海美商R·C·A广播电台以《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为题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讲。宋庆龄指出：“在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之下，中国已走上了完成坚强而民主的国家的道路。……深信美国对于我国争取自由与独立的奋斗，必然表示恳切的同情。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在孤军抗战。我们知道我们发动反抗这些法西斯暴徒的战争，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一切仍旧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

10月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由宋庆龄介绍到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后，写出了《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

10月下旬

中国军队撤离大场、江湾、闸北等处，日军逐渐包围了租界。这

时，汉奸亲日派乘机散布妥协投降的陈词滥调。对此，《救亡日报》、《抵抗》三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予以批驳和痛斥。

11月6日

为了进一步坚定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宋庆龄在《抵抗》三日刊上发表《两个十月》一文。宋庆龄在文章中指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及其野蛮和残酷，在我们领土上造成了混乱和恐怖。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这些破坏我们的文化和进步的人。”“我们将不仅在战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将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国家。”

11月12日

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上海，日本侵略军攻入南市区，上海失陷。从此上海“租界”地区成为日本侵略军包围中的“孤岛”。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特地从延安连拍两次电报给潘汉年，请他向宋庆龄提出离开上海赴香港的建议。潘汉年立即将中共中央的电报通过地下交通员李云转达给宋庆龄。

11月

宋庆龄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支持国共第二次合作。宋庆龄指出：“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倘使他所主张的国共合作一直不间断地继续到现在，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强国了。”宋庆龄呼吁：“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12月23日

晨，宋庆龄尊重中共中央的建议，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的掩护下，由李云陪同乘轮船赴香港。

12月

宋庆龄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告英国民众书》，呼吁英国民众：“在今天帮助我们抗日，维持世界和平，用抵制、制裁与封锁等办法来惩罚法西斯侵略者——这便是避免明天的世界大战。”

宋庆龄出任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名誉主席。

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了一套《救亡丛书》，共6册。除1册为蒋介石的言论集外，其余5册为：宋庆龄著《中国不亡论》、潘汉年著《全面抗战论》、胡愈之著《抗战与外交》、李公朴著《民众动员论》、钱俊瑞著《抗战与救亡》。

（本文资料主要源于《宋庆龄选集》、上海宋庆龄故居馆藏书信、《宋庆龄年谱》、《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申报》等）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研究室）

宋庆龄抗战时期大事记

(1938—1945)

冯秉序 戴 辉 冯秉良 编写

1938年

1月23日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宋庆龄与蔡元培、陶行知、吴玉章等19人被选为出席2月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代表。

2月

周恩来在武汉委托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到香港向宋庆龄报告抗日前线的最新局势和有关医疗支援工作的设想。

3月7日

宋庆龄发表《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一文，号召世界妇女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来战胜全人类的敌人”。

3月

宋庆龄在香港会见詹姆斯·贝特兰，听取了他转达周恩来的口信。

4月初

宋庆龄、廖承志等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

4月14日

宋庆龄与何香凝共同署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一文，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的7项具体主张，包括制裁国民党的腐败行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各党派精诚团结，坚持抗战到

底,反对中途妥协,改善人民生活等项,意在推动国内局势向进步方面发展。

詹姆斯·贝特兰乘船离港去美国和英国,宋庆龄委托他到这两个国家去宣传保卫中国同盟。

5月20日

保卫中国同盟以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在圣约翰大礼堂举办美术品展览会,应宋庆龄之邀请,蔡元培出席该展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了《抗战期中需美术之陶冶》的演说,他在讲演中号召大众“在全民抗战中担负起一份任务”。

5月25日

宋庆龄写信给詹姆斯·贝特兰,信中说:“由于你的高度热情和助人不倦的精神,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终于发挥作用了……我们也感谢你把塞尔温·克拉克夫人介绍给我们,因为这位夫人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也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想想这个场面吧,我们甚至在这儿的圣约翰大教堂里举办了一个英、美、中三国的书画艺术展览,就连总督和他的夫人都大驾光临了!”

6月2日

宋庆龄致函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指出大批青壮年来港避难会造成不良影响,建议“从速加紧壮丁动员参战工作;改善省市防空设备;迅予设立难民收容所。”

6月6日

汉口《新华日报》发表宋庆龄《苏联的和平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援助》一文,强调指出:“关键在于中国自己决心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以奠定世界和平与远东安全的根底,争取苏联以及一切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民族的合作。”

6月

香港中国战争孤儿救济协会成立,宋庆龄担任名誉顾问。

仲夏

在香港九龙宋庆龄寓所的小客厅里，保盟宣布正式成立。保盟的目标：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保盟由宋子文任会长，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希尔达·赛尔文·克拉克(司徒永觉夫人)任名誉秘书，诺曼·法朗士任名誉司库。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由宋子文、宋庆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诺曼·法朗士等署名。

7月7日

汉口《新华日报》发表宋庆龄的文章《抗战的一周年》。指出：“伟大的一年来的奋斗与牺牲，不过是争取我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开始，最后胜利的获取，还需要同志们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努力前进！”

宋庆龄致函尼赫鲁，信中说：“请允许我向你介绍约翰·利宁先生，他将离开香港去印度。利宁先生是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他掌握有关当前日本侵略中国的现状及今后趋势的第一手材料。”“你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我相信你将愿意从一位与中国的年轻人有密切交往的人那儿了解我们抗日战争的一切情况。”“我们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得知印度人民为表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举行了示威游行，这对我们是一种鼓舞。”

7月28日

宋庆龄致函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呼吁美国人民救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灾民。

7月

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和平运动世界大会上作出援华决议。经过

保盟的积极努力,决定在晋察冀边区五台山建立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大夫为该医院第一任院长。

8月20日

为安排中共中央代表邓颖超赴港事宜,宋庆龄离港到达广州。

8月21日

宋庆龄到广州各医院视察,亲切慰问受伤将士及被日机炸伤的难民。在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她发现一从被日机炸毙的妇女腹中取出的婴儿。抚抱之余,频频各医生小心看护。

8月22日

宋庆龄瞻仰广州中山纪念堂,目睹纪念堂被日机炸得弹痕累累,极为愤慨。

8月23日

宋庆龄在广州市长曾养甫等陪同下,向黄花岗72烈士墓敬献花圈。

宋庆龄向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作广播演说,指出:“我们中国青年的斗争,也就是世界各地青年兄弟的斗争。”并介绍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运动,呼吁对这个运动给予帮助。

8月25日

宋庆龄由穗返港。邓颖超在港期间,宋庆龄、何香凝约见了她,倾听中共关于加强民族统一战线和对时局的主张。约见后出现特殊情况,邓颖超得到了宋庆龄的特别关怀。

9月17日

宋庆龄以保盟主席身份到广州码头,欢迎由印度国民大会党特派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爱德华大夫等一行5人,并对医疗队来华服务的热情和侠义精神,表示敬佩和感谢。

9月18日

晚上，广州市民不怕日机的轰炸，举行了百人火炬游行示威，宋庆龄在这个行列中同群众一道步行前进。

9月20日

在广州，宋庆龄和各界代表到码头，欢迎来华考察中国妇女抗战情况和协助筹备国际和平医院的英国伦敦援华委员会代表何登夫人。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捐助2450英镑，保盟筹划了950英镑，支援建立国际和平医院。

9月23日

宋庆龄出席华侨抗敌总会在香港召开的第2届会员代表大会，并发表题为《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演说。汉口《新华日报》发表了演说全文。

9月

保盟广州分会成立，宋庆龄主持了第一次会议。它成立不到一个月，10月21日广州沦陷。

宋庆龄委托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吴大琨、美国友人耿丽淑，以及吴耀宗、沈体兰、张似旭等组成保盟上海分会，以便更好地募集医药物资和其他物品，支援江南的新四军坚持敌后斗争。

10月9日

宋庆龄发表《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一文，号召全国妇女们“加倍努力，团结在一起，以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因而获得自己的解放。”

10月11日

汉口《新华日报》报道宋庆龄在广州进行为前方将士及后方难民征集寒衣的活动，捐助法币5000元，并召集广州市各妇女团体商议征募寒衣办法。

10月28日

宋庆龄和何香凝、陈友仁等6人致函林森、蒋介石、孙科等，提

出4项抗战方针,并指出“必须政治与军事配合,实行民主集权,始能挽回颓势,转败为功,内得人民之拥护,外得友邦之援助”。

11月6日

宋庆龄致函一位旅美友人,信中对他在一次演讲中使美国一些组织了解保卫中国同盟,表示十分感谢,信中还告知,“上周我在广州向瓦萨青年代表大会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他们不允许我在这里广播,因为我拒绝修改某些他们要求我修改的段落。由于日本人的干扰,广播并不清楚,所以广州政府将全文用电报发给大会。我看到了空袭后的营救工作,看到我们的救护工作是如此英勇,我感到骄傲和满意。他们中许多仅仅是十几岁的男孩和女孩。”“北海和海南岛(我的故乡)没有组织起来的妇女听到日本人登陆,立即放下田里的活赶回家去……与他们的男人们一起用陈旧的来福枪把入侵者赶了出去,我为在那里的姐妹们感到骄傲,一旦环境许可,我希望能到那里去看看”。

11月22日

宋庆龄出席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并讲话,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深切怀念。

11月24日

宋庆龄号召香港妇女,积极响应法、美两国中国人民之友社为帮助我国抗战所发起的义卖筹款活动。

11月30日

宋庆龄在香港会见吴耀宗、沈体兰、吴涵真等。吴耀宗在会见时,报告了保盟上海分会工作的情况。宋庆龄请吴耀宗等带信数件与印度贾·尼赫鲁等。

12月27日

尼赫鲁复宋庆龄7月7日的信中表示:“我们以最密切的、最关心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局势。我但愿能给你们一点实际的帮助。但不幸的是,我们备受束缚和限制,使我们帮助国外朋友们的能力极

为有限。但我们举行了无数项大游行示威以声援中国人民，当中国人民处于患难时，整个印度的感情是同他们在一起的……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12月

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保盟上海分会安排下，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在王纪华、顾执中率领下，通过敌人封锁线和国民党第三战区，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他们带去保盟筹集的一批手术器械和药品，以及食品、被服、文化用品等。保盟每月向新四军医院提供经费1500元。

冬

宋庆龄在香港会见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会见时，宋庆龄表示同意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的看法：军医工作对鼓舞士气有重要的作用，军医工作做得好，胜利就有保证。

本年

宋庆龄与蔡元培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正副主席的名义发函海内外人士，为出版《鲁迅全集》募集资金。

宋庆龄在广州接待一个由世界学生联盟派出的援华代表团，其成员有英国的詹姆斯·克卢格曼和伯纳德·费拉德、美国的莫利·亚德、加拿大的格莱特·莱思。这个代表团后来到了武汉，接着北上延安。

保盟在新四军组建时，将募集的捐款购置一批通讯设备，资助新四军。

1939年

年初

保盟开始在香港西摩道21号办公。

在宋庆龄的建议下，保盟得到了香港 5 个妇女团体的帮助，募集到 4500 多件中国艺术珍品，其中有青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牙雕、锦缎、刺绣等。这些物品将在纽约、巴黎和伦敦义卖，所得收入将用于中国的医疗救济事业。运往英、法两国的物品都得到免税优惠，而纽约美国海关尚未同意免税。为此，宋庆龄和保盟向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发去电报，求得她的帮助，电文如下：为在纽约举办中国医疗救济义卖，下列对此作贡献的人，惊悉纽约海关扣留义卖品。鉴于英、法已同意免税，如蒙出面调解说情，我们将万分感谢。在电文下署名的还有：全国妇女救援会，中国妇女俱乐部，中国妇女士兵救济会，广东妇女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

1 月 17 日

宋庆龄致信埃德加·斯诺，告诉他在澳门时石岐遭到日军猛烈轰炸的情况，发电厂和许多房屋被毁，7 辆客车被炸坏。“日本人以为终于把我干掉了。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未免打得太早了一点……回到家里，我完全安然无恙。”

1 月

在宋庆龄建议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受理海外的外国友人和华侨向工合的捐款、捐物。由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陈翰笙任秘书。

2 月 24 日

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和紧急难民救济会主席何明华发表《吁请香港人士紧急救济各地难民函》，指出：“桂南、贵阳等各地城市被炸，灾情惨重，同时更有伤兵约五十万，咸待救护。”“敝会之运输队行将出发，相信本港中西热心人士，断不忍视其空车北上也。”“捐赠物品可交本港会督，或保卫中国大同盟。”

3 月 1 日

保盟和香港维多利亚大教堂以及香港国际医疗救济会共设晚宴进行募捐。席间，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济委员会林可胜博士和保盟主席宋庆龄相继发言。这次晚宴共募得捐款 2750 美元。

3月8日

宋庆龄出席香港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并发表题为《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的演说。她说：“我们中国人民已和这种恐怖的法西斯侵略作了一年半以上的斗争……同时也为着你们的和平作了斗争……如果中国投降，如果中国不战而沦为日本法西斯军事机构的一个物资供应基地和人力补充站，那末，请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在香港安静地坐在这里吗？”并指出，最需要援助的是中国的游击队战士们，我们要“帮助这些无名英雄；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3月11日

保盟和中国赈济难民委员会、维多利亚大教堂等，将募得的 5 辆卡车和满载的货物，由保盟成员哈利·泰博特大夫和另一位保尔·德翰大夫负责监运，乘“绥远号”轮离港开往海防，转道重庆、西安、延安等地，运交八路军以及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3 辆载货卡车是在 3 月 9 日通过中国赈济难民委员会发出的，2 辆卡车的开出得到了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宋子良先生的护送。

3月15日

宋庆龄致函旅美华侨陈其璠、赵建生，信中说“第二次捐款名单，及纽约陈李公司主人李德予君捐助八路军衣款（汇单）国币伍百元正，亦均收到。不胜感谢！先生等及侨美同胞为祖国努力，屡次汇款援助抗战将士，具见爱国热诚，不胜钦佩。现在抗战尚未达到最后胜利目的，端赖先生等继续努力，经常赐助，务求早日获得光荣胜利，是为至盼！”

3月28日

宋庆龄在香港为战灾儿童服务运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救济

战灾儿童)的演说,吁请各界人士紧急救济战灾儿童,指出:“这些因战争变得无家可归和无所依靠的儿童的需要,比我们的同情和恩惠要多得多。他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

4月1日

保盟中央委员会编辑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简称《保盟通讯》)英文版由油印改为铅印,定期出版。《保盟通讯》的编辑方针为“报告本同盟倡办各项活动的进展、新的需求、以及来自世界各地朋友的援助等情况”。

《保盟通讯》第1期上,刊登战地报告《新四军的医疗机构:成就与需要》一文。

春

保盟资助陕西三原建立孤儿院,收养儿童500名。

港英当局突然封闭粤华公司(即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之一连贯被拘留。经宋庆龄和各方面的营救以及国际友人的交涉,连贯于5月后被释放。

4月14日

宋庆龄致函李国清,信中说:“我要代表战争孤儿们感谢你托我转交的25美元。”并告知该款已交给孤儿院。

4月15日

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支援由林可胜博士负责的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济委员会急救医疗培训学校及其实习医院建设工作。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妇女救援会香港分会、香港妇女士兵救济会、中国妇女俱乐部以及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代表。林可胜

呼吁对培训学校和实习医院给予人力和必需的物资，并提出要求提供 10 辆卡车，在实习医院建设期间运输建筑材料，建成后，可用来从前线接运伤员。保盟名誉秘书塞尔温·克拉克夫人在会上强调：“不把材料运到现场而想建设是无用的，如果无法把伤员接运来，医院也不会有多大用处。”

4—5 月

保盟支持中国漫画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举办的以抗战为主题的现代漫画展览会，在香港中环中央戏院开幕。宋庆龄参观了预展，接见了部分漫画作者并合影留念。

5 月 1 日

《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8 年—1939 年》发表宋庆龄《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指出“中国人民绝不会投降。他们正在为自己也为世界各国人民而战斗着”，吁请“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助”。

5 月 5 日

《保盟通讯》第 3 期发表《为我们的伤员提供 2 万条毯子》一文，反映“战斗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一支游击武装的指挥员，给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发来的电报称：‘我们的医院在入冬前要 2 万条毯子。’”“保卫中国同盟向所有为中国工作的团体和本《通讯》的所有读者们呼吁：在今年冬季不要让这些事情重新发生。对那些不仅为中国的自由、而且也在为全世界和平和正义而战的人们，世界没有充分尽到它的责任。要求西方富国里的中国朋友们‘保证不使中国的伤员们冻死’！这并不过分。”“现在就需要行动起来。我们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朋友们，应立即把轻便、暖和的毛毯送往中国。”

5 月初

保盟应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 4 月 12 日来函要求，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保盟上海分会派出吴大珉任团长、殷扬（扬帆）任副团长的上海人民第二次慰劳团，带给新四军医院的紧急援助物品，有：

6000 码蚊帐用料, 20 万片奎宁, 400 听炼乳, 12 万剂霍乱疫苗, 2000 个消毒包等。慰劳团 20 多名青年, 在那里参加了新四军。

5 月

詹姆斯·贝特兰代表保盟在海外介绍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和筹集资金, 获得国际上的支持, 于是月回到香港。

6 月 1 日

《保盟通讯》第 4 期, 发出呼吁, “向保卫中国同盟提供救济难民的基金。这些钱将直接帮助在每一次新的灾难后需要救济的人们, 将被用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有关的计划, 帮助那些因遭轰炸而失去家园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建立新的生活, 并在各地建立新的堡垒, 抵御想以暴力摧毁世界、自由人民精神的敌军。”

6 月 20 日

《保盟通讯》第 5 期, 以《不要忘记》为题, 再次呼吁捐助急需的奎宁、蚊帐、毛毯等物品, 并在《可耻》标题下, 转引著名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访问一些中国军队后, 写了如下的话: “外国在援华中力求使自己丢脸方面, 似乎在互相竞争。美国红十字会和德国红十字会捐送的是 1917 年生产的药品和绷带——他们自己无法使用的上次世界大战的废物。”接着表示: 保盟也曾有过相似的经历。一批运来的捐赠器具不仅是旧货, 而且已生锈无用, 并指出这对中国伤员们和那些尽一切努力医治战士们的优秀医务人员来说, 则是一种侮辱。

6 月

保卫中国同盟为英国举行的“中国周”, 提供大量的文章、宣传画和图片, 寄往伦敦。

保盟写信给著名记者埃德加·安塞尔·穆勒告知在他写的《穆勒在中国》(原名为《龙的觉醒》)一书中在谈到保盟时, 作了一个有损于其非党派性质的断言。它能够并且已经妨碍了保盟的国

外朋友的工作。由此引起的危害，请他在意识到它的错误后予以更正。穆勒复信表示：“如果……我以任何方式伤害了你们有益于中国的行动，我感到非常遗憾。正如你们完全正确地设想到的，我并无别的什么意图。你们可以确信，如果我的作品今后得以再版时，我将很高兴地予以更正。”

夏

在保盟的安排下，由参加保盟工作的詹姆斯·贝特兰和德国医生汉斯·米勒为保盟护送 30 辆卡车的 600 箱医药用品到西北国际和平医院，同时将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勒克诺弗特捐助的 1 辆大型救护车送至延安。

保盟驻重庆代表王安娜受宋庆龄的委托，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前往晋察冀边区了解华北前线的情况，还曾前往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向白求恩大夫了解医疗工作的详细情况，并将了解的情况向香港的保盟和宋庆龄汇报。

7月7日

宋庆龄发表题为《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公开信，指出：“由于不能征服我们的战士，它们（指日本帝国主义）现在阴谋利用如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来破坏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文中还指出国民党内的保守派是一种障碍，因为“这些人在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时，言行不一致”。

7月15日

《保盟通讯》第 6 期发表宋庆龄的保盟工作报告《我们的第一年》。报告中说，到 1939 年 6 月 15 日为止的 13 个月中，各国友人通过保盟的捐款约为港币 25 万元（约合美元 8 万元或 1·6 万英镑）。这些捐款大多以医疗物资形式送到内地。同期《保盟通讯》还刊登了宋庆龄的《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的信。

8月21日

宋庆龄被聘为欢迎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筹备会的顾问。

8月26—28日

菲律宾的华侨团体和当地艺术家在碧瑤市展出当代中国木刻、漫画作品300多件，支持保盟和中国工合。观众达500人，其中有教授、大学生、矿工、华人农场主、土著居民，共募集到474.12比索，全部送往香港，其中部分捐款给予国际工业合作中心菲律宾分部。

9月3日

宋庆龄致函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提到“香港很紧张，比两周前日本人包围我们时更紧张。人们逃往各地以避免封锁的威胁”。“对于我们这些必须住在这里的人来说，国币的贬值是个大问题，这里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上海。现在要四元半国币才能换一元港币，你不难想象我们的困境。”信中还告知詹姆斯·贝特兰和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艾达·普律德、亚历克等友人的行踪。

9月15日

宋庆龄托印度医疗队的木克华大夫回国之便带去一信给尼赫鲁。她在信中说：“我刚知道，你在到达重庆时没有收到我给你的电报。我正打算乘飞机看你，却在报上看到你离华回国的消息，真是遗憾。”“但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是会见面的。我热切地期望着有一天我们能欢迎你到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中国来……我将努力使自己随时了解你所进行的工作，并以最大的同情注视你们的事业的进步，因为你们的事业也就是中国的事业。”在信中还提到“关于在印度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分部的建议”。

10月13日

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复信香港宋庆龄，信中说：“木克华大夫带来的信收到……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发了一个电报到重庆，是给我的，但我没有收到。我满心希望能有机会见一见你，但战

局迫使我匆匆回国……我同你一样，希望不久的将来，当中国和印度都获得自由时，我们能够相见。”“我但愿我们能更多地帮助你们……也许目前根本没有任何条件。”信中还提到“我们确实期望他们（指英国政府）不要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使之不利于中国”。

10月16日

宋庆龄写信给尼赫鲁，对他决定继续派遣印度医疗队到中国解放区，表示很高兴，还在信中说：“我以最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贵国所发生的事件，愿你在为印度而作出的崇高努力中取得伟大成就。”

10月20日

《保盟通讯》第9期发表了宋庆龄《致外国团体的信》，重申保盟同“全世界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世界和平的斗争的紧密团结”。呼吁国外朋友继续进行“已为中国作出良好开端的工作”。同期还刊登了詹姆斯·贝特兰受保盟委托，去大西北考察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后，写出的战地报告《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

10月

宋庆龄致函李兆焕，信中说，“现在法西斯侵略浪潮已扩及欧洲，我们保盟中央委员会愿重申我们完全支持全世界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世界和平而进行斗争”。信中指出，“中国军队中的军医和护士只有15%是完全合格的，肯定地说，是在中国这样急需挽救生命（而不是为士兵提供舒适的条件）的地方，你们的捐助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保盟将继续接受所有捐款和实物，并开始收据。这些东西将送往最急需的地方或捐助者指定的地方。”最后她呼吁“认同中国的斗争就是你们自己的斗争，但中国有更大的需要”。

11月7日

宋庆龄就重庆新华日报社10月24日寄来的支援香港《南华》、《天演》、《自由》3报反汪（精卫）罢工工友捐款复信，告知捐款

“已妥收，并已即转罢工工友”，并把工友的收据寄给该社。

11月11日

宋庆龄应菲律宾马尼拉华文《新闻日报》之约，撰写《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文中写道：“孙先生认定，中国的民众，假使没有得到民主的权力和经济上的改善，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永远不能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国家……唯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然后才有真正独立的中国。”

12月10日

宋庆龄以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在香港 ZBW 电台发表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讲，她阐述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展不仅是有利于中国，实在是有利于全世界的。“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

12月15日

《保盟通讯》第11期为悼念白求恩大夫逝世，特发表《一个为中国而斗争的战士的牺牲》和白求恩生前7月1日写的战地报告《在河北游击区4个月的工作》两篇文章，并刊登了白求恩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一起的照片。

12月16日

宋庆龄致函尼赫鲁，信中谈到“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你们已作出决定：你们医疗队的工作将继续在西北地区进行下去。这个地区严重缺乏合格的医务人员和医疗用品，所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这个医疗队的非常良好的服务”。还谈到“由保卫中国同盟扶持的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却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得非常出色。他在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用品的条件下独自一人负责三百个病号的治疗任务”。

12月25日

尼赫鲁复信给宋庆龄，信中对她告知著名加拿大外科医生、国际主义者白求恩大夫不幸去世表示哀悼，并说，“你也许知道，我们

国民大会党医疗队的医生已去了五台山”。

冬

宋庆龄在香港寓所会见并宴请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卫生部长沈其震，并陪同沈其震到保盟的仓库，查点即将运往新四军的一批医药救济物资。

年底

宋庆龄安排埃德加·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的身份，赴延安了解抗日根据地工合的具体困难，并多方予以帮助。

宋庆龄委托西北工合承制 10 万件棉衣，运交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保盟出版杰克·贝尔敦的《新四军》一书，这是作者采访新四军在长江流域斗争的报告。

保盟出版多种大型宣传画以使各国援华机构开展动员援助中国抗战、为救济战争受难者募集经费的活动——橱窗布置、游行、集会之用。这些宣传画有《最后胜利》、《难民》、《抵制日货》等，并印上标语：“侵略者使他们无家可归！保卫中国同盟在安置难民！”“抵制日货！！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向中国的战争受难者提供帮助！”每幅宣传画并留出 3 英寸宽的空白，供各团体在其上自行印上宣传文字。

本年

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中央银行的钟秉铎为首的中国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西奥多·赫尔曼为执行秘书。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温源宁博士、陈翰笙夫人顾淑型、香港大学的许乃波等。该委员会致力于把海外友人的力量联合起来，以帮助工合运动。

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援华会和哥伦比亚温哥华医疗援华委员会成立联合办事处，在其成立通报中宣布：“作为援华会活动的一部分，医疗援华委员会将致力于募款以进行对华医疗援助，生产绷带，并制作成卷寄送到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它将支持五台山地区新的国际和平医院。”

《保盟通讯》的发行量已从创刊时 1000 份增加到 2500 份。

1940 年

1 月 17 日

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宋庆龄被推举为名誉理事。

1 月 24 日

宋庆龄写信给徐瑛（弗兰克·司徒夫人）信中提到保盟主办的义映电影《裘莱士》，它是一部反映裘莱士领导墨西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故事片，她写道：“这部影片也是为我们的事业的绝妙宣传，因为当时墨西哥的情况同我们现在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2 月 6 日

保盟为国际和平医院募捐，由宋庆龄主持在香港皇家剧院义映影片《裘莱士》。

2 月 12 日

保盟中央委员会决定：为 4 所国际和平医院病员的伙食、衣服每月拨款各 1500 元。还向工合西北办事处订购大批棉背心、担架、绷带、药棉、纱布等，给西北医疗单位，并每月向林可胜为首的红十字医疗队提供 3000 元，作为运送物资到抗日根据地的费用。

2 月 15 日

《保盟通讯》第 13 期上，发表纪念白求恩文章《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在继续》和马海德的《我所认识的诺尔曼·白求恩》。

2月20日

宋庆龄和蔡元培、何香凝、毛泽东、朱德等人被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

3月8日

宋庆龄与宋霭龄、宋美龄一道参加三八妇女节茶话会。

3月28日

宋庆龄和宋霭龄一起参加了由宋美龄召集的香港各爱国团体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在香港开展伤兵之友运动。在这次会议上，宋美龄对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社，为中国的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赞扬。

3月31日

宋庆龄与宋霭龄应宋美龄之邀请，并由宋美龄陪同，自香港飞抵重庆。同机到达的还有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张治中代表蒋介石前往珊瑚坝机场迎接。宋庆龄此行，主要为考察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抗战局势和妇女工作，并与亲属团聚。宋庆龄在重庆住孔祥熙家（上清寺范庄）。

3月下旬

在香港，保盟被委托审计当地伤兵之友运动的所有帐目。保盟除了积极从事这一工作外，还首次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该运动的行政管理开支。

4月2日

上午，宋庆龄到重庆市内巡视日机轰炸的地区。

晚上，出席孔祥熙为三姐妹洗尘的宴会。蒋介石、孙科、宋子良等参加。

重庆各报均以醒目标题报道宋庆龄到渝消息。《大公报》发表

短评：《欢迎孙夫人》，称赞她的精神是反侵略的，不妥协的。短评说：“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无论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

4月3日

上午，宋庆龄与宋霭龄由宋美龄陪同，到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视察，并与该会妇女干部训练班学员共进午餐。

下午，到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看望难童。宋庆龄对儿童讲话说，难童诸生既受此良好训练，将来必不致产生汪精卫一类人物。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欢迎孙夫人来渝》，称赞她在孙中山逝世后，“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的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在促进团结抗战，力求实施民权方面，尤多显著成效。”表示相信：“重庆的、以至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获得更进一步的团结，能够使妇女运动有更迅速的、广泛的和深入的发展。”

4月4日

宋庆龄、宋霭龄和宋美龄参观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中苏儿童照片展览”和“儿童科学玩具展览”。

以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名义向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赠送500多份糖果，祝贺儿童节（当时4月4日为儿童节）。

4月5日

宋庆龄与宋霭龄、宋美龄到重庆郊区参观军毯合作制造厂、第一印刷合作社。随后察看市区被炸残迹和防空洞。

4月6日

宋庆龄、宋霭龄出席蒋介石夫妇为她们举行的宴会。政府有关

高级官员，以及美国大使詹森、美大使馆参事贝克等参加作陪。

4月7日

宋庆龄、宋霭龄出席在重庆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举行的欢迎孙、孔夫人莅渝盛大欢迎会，中外妇女界团体和知名人士200余人参加，由宋美龄主持。蒋介石到会并简短致词表示欢迎。宋庆龄在讲话中说：“我来重庆后看到敌机狂炸痕迹，心里很痛愤，但看到大家对于工作的努力，心里很安慰。不过我很希望大家还要再接再厉，特别着重于教育工作，不要只做表面文章。国民大会期近了，大家要好好在这方面推动；民主政治是和妇女有密切关系的，我们要好好起来奠定一个宪政的基础。”

4月8日

上午，宋庆龄和宋霭龄、宋美龄同赴伤兵之友医院慰问伤兵，并亲自向伤兵分送慰问袋。同时看望了住在该院的5个受伤的日俘。当他们知道3位夫人身份时，同时坐起致敬。

《新华日报》刊出宋庆龄为该报亲笔题词：“抗战到底”。

4月9日

宋庆龄和宋霭龄出席蒋介石夫妇为她们举行的家宴。孔祥熙，宋子文，以及英国大使卡尔夫妇，英国大使馆参事柏美德，卡尔私人秘书亚历山大夫妇，伦敦《泰晤士报》特派员麦唐纳等应邀作陪。

国民外交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举行座谈会，由邵力子夫人傅学文担任主席，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主讲。李德全在发言中传达了孙夫人宋庆龄对妇女工作的意见，要点谓：要从教育着手；希望该会分别举行对于英、美、法、苏、日各国之讨论会，加强妇女对于国际问题之认识。同时亦可将国民一致之意见影响于外交。

4月10日

早上，宋庆龄、宋霭龄和宋美龄同赴某处检阅后方交通车辆，

军政部长何应钦、西南车辆管理处主任宋子良及华侨巨子陈嘉庚、庄西言等同行。

宋庆龄、宋霭龄和宋美龄一起视察中正学校及遗族学校。宋庆龄在给全体学生讲话中指出：“同学们应为总理之真正信徒，努力研究三民主义。”

晚上，她们又一起出席孙科的宴请。

4月上旬

宋庆龄在重庆表示：“不久我便要回香港，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意义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这里那样，当展品。”

4月11日

宋庆龄和宋霭龄出席蒋介石夫妇为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夫妇举行的宴会。

4月12日

宋庆龄和宋霭龄、宋美龄赴中国电影制片厂参观。

4月14日

宋庆龄和宋霭龄、宋美龄出席马俊超夫人沈慧莲的宴请，妇女界领导作陪。

4月15日

出席孔祥熙、宋霭龄在嘉陵宾馆举行的欢迎宴会。出席宴会的有蒋介石夫妇，国民政府各院、部长夫妇，英、美、法、苏4国大使及中外来宾300余人。

发表《给国外朋友的一封信》，再次说明保卫中国同盟的目标和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呼吁各国朋友继续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1940》发表由会长宋子文、主席宋庆龄署名的《给国外朋友的一封信》，还收有下列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国际和平医院的运输计划，西北药厂，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难民，战灾儿童，抗大、鲁艺，保盟出版物等。《报告》还发表了1940年2月止的年度帐目。其中资助：国际和平医院港币46878.46元，法币6800元。八路军港币27411.50元，法币16415.25元。新四军港币14900.83元，法币23056.67元。中国工合港币30616.19元，法币59016.37元。鲁艺港币9800元，法币25992元。抗大港币923.87元。战灾儿童港币5789.47元。救济难民港币5511.03元。红十字会医疗救济港币6939.80元，法币1032元，并支出运送物资费法币75267.97元。

4月16日

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由广西飞抵重庆访谒3位夫人。

4月18日

上午7时，宋庆龄向美国发表广播讲话，她指出：“中国人民艰苦抵抗日本的军事侵略，很快就要满三年了，日本借着它拥有优越的武器，在开战以前，曾经向世界夸说，要使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于三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曾经始终不屈地作有效的抗战在三十三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胜利。太平洋和全世界人民的将来历史，一定和以前不同，且将更见光明灿烂，因为中国不愿做奴隶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世界人类，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

4月20日

宋庆龄被聘为伤兵之友总社理事。

4月21日

宋庆龄与宋霭龄由宋美龄陪同、上午8时自上清寺出发，乘汽

车赴成都。11时25分抵永川县。视察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之乡村服务队第七队队部，并参观该队所服务之毛织工业合作社和妇女工艺社永川分社。中午在途中山林间休息食用随带干粮。午后抵达荣昌，径往县立女子初级中学，视察借驻该校之乡村服务队第六队队部及该队主办之干训班，并接受县女中学生代表献花。下午4时5分抵隆昌县，2000余人列队欢迎，3位夫人下车步行答谢，旋至财政部妇女工作队队部及所属之挑花、织麻两工厂视察。随后经内江转自流井。当晚寓檀木林友人家。

4月22日

上午8时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至润记盐井等处参观，并与盐场职工谈话。随即返转内江，参加在内江公园举行的万民众大会，3位夫人均在民众大会上讲话。宋庆龄在讲话中说，此次到内地各县，见同志同胞刻苦努力之精神，甚为钦佩。前由香港到渝后，目睹各地惨遭日机轰炸后情状，深感同胞敌忾同仇，抗战前途甚可乐观。但吾人所需克服之困难尚多，端赖同胞共同协作，努力不懈。敌人速战速决之迷梦，现在完全打破，全世界亦均知中国为一不可克服之民族。但吾人不可因而稍有疏怠，应遵照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指出之方针，切实努力奉行，则一切困难皆可克服，民族复兴前途，将更为光明。

会后，继续向成都行进。途径资中、资阳、简阳，三县民众皆列队相迎。晚7时半抵达成都。

4月25日

宋庆龄、宋霭龄和宋美龄视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并在工人欢迎会上讲话，指出：“工业合作事业，正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使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会后，参观工合产品展览会。

4月27日

宋庆龄和宋霭龄出席宋美龄在成都励志社举行的欢迎茶会。宋庆龄在会上讲话：“承被邀请到川，目睹一切，足良佩服。余以为我妇女界所宜着重者，厥为教育工作。将来国民大会，不日召开，应使妇女界明了其重要性，由各团体推出代表参加宪政运动，动员广大妇女努力于此，也为吾人对抗战的重大贡献。”应邀出席茶会的有成都各界妇女代表 400 余人。

4 月 28 日

宋庆龄与宋霭龄、宋美龄筹办工人托儿所。

5 月 1 日

重庆各报报道宋庆龄由蓉返渝后，中央党部在国府礼堂举行茶会，欢迎孙夫人。中央执监委员林森致欢迎词后，孙夫人致词，痛斥汪逆，略谓：“此次来渝，目睹党、政、军诸同志努力精神，非常钦佩，复睹敌机轰炸惨状及被难同胞之流离，不禁百感交集。抗战前途，工作繁重困难，端赖诸同志努力以赴。国父主义遗教，由抗战之事实加以证明，乃更有颠扑不破之伟力，闻有人对国父主义遗教惑疑，谓与当前时代未能吻合，试问国父手创之三民主义及所著之建国方略，尤其是亲草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亲授之遗嘱等，有一与当前时代不相吻合者否。只有汪逆精卫之徒，不知羞耻，投靠敌人，妄组伪府，察其所为，无非毁弃三民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破坏国家统一，此种丧心病狂之徒，不久必然消灭，吾人首当坚定信念，然后能精诚团结，共救危亡”。到会的中央执监委员有林森、吴敬恒、于右任、冯玉祥、邓家彦、蒋作宾、何应钦、叶楚傖、邵力子、陈立夫、朱家骅、吴铁城、覃振、孙科、鹿鍾麟、陈济棠、张默君等 100 余人。

5 月 3 日

宋庆龄和宋美龄参加宋霭龄设宴招待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高级干部训练班同学。宋庆龄训勉各同学研究总理遗教。

5 月 9 日

宋庆龄结束了对重庆、成都等地的视察、访问，与宋霭龄同机飞返香港，并向记者谈访问大后方的个人观感。

5月15日

《保盟通讯》第16期登载宋美龄专为该刊撰写的《伤兵之友运动》一文，并刊登《伤兵之友运动在香港——蒋夫人盛赞孙夫人》的报道。

5月20日

宋庆龄发表重庆之行观感，《中央日报》、《国民公报》同时刊登：（一）人民对抗战信念极坚，内地生产建设与日俱进，散漫人力，业已团结，抗战必胜；（二）政治已大见改善；（三）各方均深明抗战大义，情绪团结，敌伪造谣徒见其心劳日拙。

5月31日

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宋庆龄《渝行观感——自重庆返香港后对中外记者的讲话》指出：“本人回港后，不断有人以国内团结问题见询，敌伪报纸且不断造谣，称本人赴渝与此有关，本人实则迄未预闻其事。际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时，国内各党派均有一致团结对外之认识。日寇汪逆宣传国内分裂在即，只能说是他们的梦想。际此大敌当前，困难未除，我信贤明当局，均不愿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之举，为日寇所乘。只有少数不明大势之人，故作恶化之宣传，实妄人也。日来敌伪新闻机关不断造谣，可见彼等企求我民族阵营自相分裂如何殷切，其用心之深，可以想见，吾人岂可不加以警惕。”

5月

宋庆龄致函四川省军政长官，信中证明：“爱泼斯丹（现译爱泼斯坦）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会执行委员”，“因公须赴重庆路经粤、桂、湘、黔、川各省，拟沿途调查各地合作运动，特介绍前来晋谒，请赐见，并予方便为感”。

6月1日

重庆《新华日报》为宋庆龄谈她视察后方之个人观感发表题为《谈孙夫人讲话》的社论，指出孙夫人在讲话中，充分表示对抗战胜利的坚决信心，并指出：当此欧战紧张，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日寇汉奸正在利用欧战与我内部困难，实施种种阴谋活动之际，国人对孙夫人之谈话，实应加以反省。

6月15日

宋庆龄在《保盟通讯》第18期上发表题为《中国、世界和你》的文章。

7月19日

保盟上海分会成员、《大美晚报》发行人张似旭，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起士林咖啡馆被日伪特务枪杀。

9月15日

《保盟通讯》第20期刊载《国际和平医院——概况和呼吁》一文。

9月

詹姆斯·贝特兰开始负责《保盟通讯》的出版工作。

秋

宋庆龄在香港第一次会见保盟上海分会成员美国友人耿丽淑。宋庆龄说：“我们已是老朋友了，通过你转送的信件，我已认识了你的坚定勇敢。”希望她回美后，加强对美国友人的团结工作。

10月18日

保盟为战灾儿童筹集基金，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义演，舞蹈家戴爱莲、歌唱家斯义桂等参加演出。宋庆龄出席观看。

10月

宋庆龄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撰写《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

11月1日

《保盟通讯》第22期，以头版新闻报道了题为《滇缅公路重开

了)的消息,它指出:“滇缅公路现已成为世界性抵抗侵略扩张和威胁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同期还报道了由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题为《华北反击战》的新闻。

11月17日

澳大利亚—中国合作运动委员会在墨尔本的喜剧院隆重举行集会,出席者约1000人,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募到47英镑。

11月27日

碧瑶的中国工合促进委员会会同新建立的菲律宾救济中国委员会的碧瑶会员合作,在伯恩翰公园礼堂组织了一场援助中国难民、伤员和战争孤儿的义演。收入达337.34美元,其中一半捐给设在香港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另一半给孙夫人,用作保盟的伤兵和战争孤儿基金。

12月1日

《保盟通讯》第24期新年专号上,发表宋庆龄《圣诞节前致国外友人》的信。她在信中希望正在欢度圣诞节和新年的国外朋友,不要忘记支援战斗中的中国人民。保盟乐于接受大家的捐献,并将收到的物品,送往最需要的地方。还刊载了白求恩大夫遗作:《创伤——一个来自中国的圣诞故事》,詹姆斯·贝特兰的《纪念白求恩》、《白求恩逝世周年纪念日——在边区首府举行的群众大会》等文章。

本年

保盟委托英国救济物资运输机构的埃弗特·巴杰和菲利普·赖特把美国和英国的救济机构指定拨给的8吨药品,运送到延安。但在途经陕西三原时,这批药品竟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扣留。这批药品后来发现竟被他们在西安的私人药房里以黑市价格出售,中饱私囊。

保盟印制圣诞卡,共3种:红色中国纸、厚艺术纸的木刻图案、

直接手绘在丝绸上。由英国伦敦中国运动委员会，纽约美国援华会、旧金山援华会、费城美国援华会、华盛顿特区西梧饭店，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弗农中国战争救济会，菲律宾中国救济会，澳大利亚妇女联合会销售。销售收入用于救济中国的伤病员和战争孤儿。

英国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工党)从印度循重开的滇缅公路去中国，经尼赫鲁介绍在途经香港时，拜访了宋庆龄。

英国救济基金会向保盟捐助了一笔款项，保盟用这笔钱买了9套外科设备，每套设备都附有消毒用品和前线可能急需的备件。保盟把8套设备赠给国际和平医院的4所中心医院，另1套直接给部队前线医疗工作。

保盟驻重庆代表王安娜受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的嘱托，去贵阳接受红十字会提供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疗物资，并向该会介绍保盟的工作计划。

1941年

1月1日

宋庆龄和宋子文、克拉克夫人联名发表《致国外朋友的一封信》，重申保盟完全相信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伟大斗争中，将取得最后胜利。但是，不能否认，目前的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严重。在远东1941年将是关键的一年，甚至是最关键的一年。

1月14日

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和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他们发动皖南事变，要求蒋介石和国民

党当局“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一挙手措足之劳，即可奠定抗建基础，安如磐石。”

1月15日

皖南事变后，保盟在《保盟通讯》第25期上，发表《中国的新四军》的评论文章和美国伊文思·卡尔逊上校反映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地报告《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

1月18日

宋庆龄和何香凝、陈友仁为皖南事变联名电斥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1月19日

晚上，保卫中国同盟开会，由廖承志作关于皖南事变情况以及延安抗议的报告，引起全体人士同情激愤。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夫人提议立即电告伦敦援华委员会，詹姆斯·贝特兰也提出马上电告埃德加·斯诺，并同时向英、美公布。

1月22日

由保盟和援助昆明医院委员会共同发起，在香港皇家剧院举行一场音乐、舞蹈义演，邀请舞蹈家戴爱莲、歌唱家斯义桂以及中国合唱团等演出。宋庆龄出席观看。晚会净收入4500元，捐助给国际和平医院和昆明（惠滇）医院。

1月下旬

英国会议员电告保卫中国同盟，表示对皖南事变极为关切，并希望将事件发展情况继续电告。

2月初

宋庆龄在埃德加·斯诺即将离开香港返回美国时劝他留下来，她说：“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幸福的。你是属于中国的。”

2月7日

宋庆龄致函李兆焕，信中对他“忠诚地支持我们的救济工作，深表谢意”。还告知“罗斯福总统派来的代表劳克林·柯里先生在此，我们希望他能做许多工作，促使官员们认识到巩固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清楚，中国是国际反对日本的集体的一个统一战线因素”。

2月15日

《保盟通讯》第26期上，发表《统一战线继续存在》一文，向世界舆论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和中共方面的严正立场。

《保盟通讯》中文版在香港出版，由保盟执行委员邹韬奋、金仲华主编。

2月28日

保盟宴请中国红十字会医务总队队长林可胜博士。席间，林博士作有关中国红十字会的医务救济状况的讲演。

3月7日

《保盟通讯》第28期发表《致美国友人》，这是写给卡尔森工业合作公司的信，信中对美国援华会、美国医疗援华会和工合促进联合会为保盟募集的救济基金，通过美国工合促进会向所有美国友人表示谢意。

3月20日

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在青年俱乐部举行的午宴上，发表题为《中国当前的需要》的讲演，其中谈到保盟对国际和平医院和边区孤儿院的支援。

3月

保盟中央委员会设立4个小组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由诺曼·法朗士负责；运输委员会，由麦克斯·比克顿负责；宣传出版委员会，由邹韬奋负责，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任秘书；促进委员会，由玛丽恩·苔德莉负责，邱茉莉任秘书，其他成员有温源宁博士、

陈翰笙夫人(顾淑型)以及香港大学的许乃波。

4月2日

由保盟主持,在香港首映反纳粹影片《牧师礼堂》,将所得款项用于救济中国的战灾儿童。

4月8日

皖南事变后,为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需要,保盟拨款资助的香港中文《华商报》创刊。邹韬奋、金仲华、邓文钊3位保盟执行委员参加该报编委会,宋庆龄为该报题词:“为坚持抗战作有力之后盾,为保持团结作有效之喉舌,为实现民主作正义之呼吁,为人民幸福作公正之申诉,给予侵略者以严重之打击。”

4月15日

《保盟通讯》第29期发表邹韬奋撰写的《中国的政治发展前途》一文。该文针对皖南事变后,中外人士对中国前途的严重关注,指出:我们深信中国必将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不管反动势力现在如何趾高气扬、得意扬扬,但可以肯定,一切想使历史倒退的企图,最终必然是要失败的。

5月2日

保盟派出由刘良模、蔡绍序等组成的艺术代表团,到美国进行义演募捐。他们参加了由美国援华会和美国援助中国战争孤儿委员会主办的于费城布罗德伍旅馆举行的“中国之星”的演出。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也参加了演出,他还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次演出为国际和平医院和中国战争孤儿募得500美元,寄给保盟。

6月1日

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宋子文发给《保盟通讯》声明退出保盟的电文。同时发表了宋庆龄的《关于宋子文退出保盟的声明的声明》,“对于宋博士感到必须采取这一步骤,只有表示遗憾”,并重申保盟“信仰民主和言论自由”,“对中国团结的支持决不动摇,对任何危

及中国团结的事情坚决反对”。

6月15日

保盟应宋子文的要求，在《保盟通讯》第33期上，全文照登他退出保盟的声明。同期还登载了宋庆龄6月1日发表的声明以及在宋庆龄主持下，以保盟中央委员会名义撰写的《救济工作与政治——答宋子文先生》的重要文章。从本期起，刊头上删去了原有的“会长宋子文”几个字。

7月1日

一碗饭运动举行开幕式，会上宋庆龄讲话指出：“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它“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在港中外人士150余人出席，其中有英军驻港陆军总司令贾乃锡少将、海军司令哥连臣、辅政司史美夫人、医务总监司徒永觉、中国红十字会林可胜、香港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等。港督罗富国爵士致贺信。

7月7日

香港《华商报》刊载宋庆龄撰写的《纪念七七四周年》一文号召全民族的抗日团结。

7月10日

重庆《新华日报》奉令免登宋庆龄撰写的《纪念七七四周年》一文，特登报向宋庆龄致歉：“宋庆龄先生《纪念七七四周年》一文，对当前抗战要务及加强团结之重要阐述，至为警辟，长约四千余言，惠赐本报发表，惟送检时奉令免登，兹特向宋先生致歉。”

7月15日

《保盟通讯》第34期发表编辑部文章《中国坚守东方前线》。文中写道：“自慕尼黑会议以来的灾难岁月里一直不清楚的事，现在，

其直接后果已经十分清楚了。”“中国能够坚守远东战线，但要有效地做到这点，中国应得到其他各国的全力援助，这些国家把中国的斗争看作他们自己的斗争。中国能够取得胜利，但中国的领袖们必须认识到，同任何地方的法西斯主义都无妥协的可能；必须认识到，民族解放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通过人民的团结和共同的努力，政府必须反映人民的巨大努力和牺牲。”

8月1日

宋庆龄为一碗饭运动在《华商报》发表题词：“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

8月21日

香港文化界举行许地山追悼会，宋庆龄亲临会场悼念，慰问家属。

9月1日

一碗饭运动从7月1日到8月1日正式进行。由于得到中外人士积极支持，运动结果延长到8月30日。9月1日举行结束典礼，所得捐款悉充中国工业合作社扩大救济伤兵与难民之用。

9月12日

宋庆龄致函美国援华会米尔德里德·普赖斯，信中说：“我们听到詹姆斯·罗斯福夫人逝世的消息，至感哀痛。”“请向她的家属、向你们的全国委员会的福克纳博士和其他成员转达我本人及我们的委员会对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去世表示最诚挚的悼念”。“保卫中国同盟深知美国援华会的工作对中国的伤员和其他战争受害者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愿再一次代表他们对你们的高质量服务以及你们的已故名誉主席的个人贡献，表示感激之情。罗斯福夫人在我们国家里将特别受到爱戴，她的姓名在我国是最受尊敬的。”

9月18日

在九一八10周年之际，保盟中央委员会邀请旅港剧人金山、

王莹等排演揭露希特勒摧毁文化教育科学的著名话剧《马门教授》。演出收入全部捐助国际和平医院。

10月13日

尼赫鲁复信给宋庆龄，表示代表印度医疗队队长爱德华和他自己“欣然同意”“接受(保盟)名誉会员的职位，作为印度同中国人民在他们争取自由的英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象征”。

10月

宋庆龄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撰写题为《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指出，“中国缺乏民主，只对第五纵队、潜在的妥协派和求和派有利。而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无论如何也不会妨碍抗战事业。相反地，我们人民热烈支持抗日战争……为了抗战，为了抗战所不可少的统一战线，海外的我国同胞们和外国朋友们应该支持我们的要求——加强民主。”“我希望美英朋友们，为了帮助我们和他们自己，支持中国的民主的要求，坚持要他们的政府尽可能援助中国，并终止在物质上或政治上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支持”。

11月11日

保盟与工合国际委员会联合在香港海军操场，举办嘉年华会。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孙科、陈翰笙、路易·艾黎、钟秉铎，以及美国平准基金会的福克斯，香港知名人士周寿臣、郑铁如等参加了开幕式。大会主席威尔逊致词后，宋庆龄发表了简短演讲，她对英、美等国友好人士的支持表示感谢。在谈到中国抗战局势时说：“抗日战争是中国的人民战争，不是任何一个政党可以包办的。真抗战人民欢迎，假抗战人民唾弃。”嘉年华会为期3周，义卖所得港币2万元，存入银行。香港沦陷后，被日本侵略者冻结。

11月28日

香港《华商报》发表宋庆龄《纪念邓演达》一文。指出“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

11月

《保盟通讯》出版了第36期后，由于香港沦陷，被迫停刊。

12月9日

宋庆龄在遭到日机空袭、无数男女老少惨遭残害的现场用电话发给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一个声明。声明指出：“战争已降临香港。”“日本法西斯主义曾经想先征服中国，现在又尝试另外一个更加危险的计划”，“我们所必需的是一条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把中国自身的斗争同英国、俄国和美国人民的一致努力联结起来，把世界各地法西斯主义彻底粉碎。”“让我们共同战斗到底，直到把日本强盗赶过大海，回到他们原来的岛屿上去。”

《华商报》晚刊以《战争来到香港》为题发表宋庆龄的文章。

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轰炸香港，在日军占领九龙，到达启德机场前8小时，宋庆龄在机场乘最后一架班机，飞往重庆，在离开香港之前表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等，由于“太平洋战事爆发，香港已成死港”，望派人帮助“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港”。

日军进攻香港，保盟中央委员会的名誉司库诺曼·法朗士在参加城防志愿队作战时牺牲。

冬

宋庆龄到达重庆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举行欢迎茶话会。宋庆龄在会上发表她到重庆后的第一篇讲话，针对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政治形势发展，义正词严地指出：要争取抗战胜利，

必须实行民主，要求各党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并痛斥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而实则是中山先生的叛徒。

宋庆龄初到重庆时暂住于范庄宋霭龄家，其活动受到监视。约见祝世康、卢季卿夫妇，宋庆龄在简短询问近况后，就放低声音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等我找到住处后，再约你们谈吧！”

宋庆龄在范庄约见邓颖超，谈话中她暗示：“有人监视，谈话慎重。”

本年

皖南事变后，宋庆龄在香港接待了新四军代表沈其震。沈其震向宋庆龄介绍了事变真相，并转达了刘少奇、陈毅的致意，请放心。

1942年

2月22日

宋庆龄致函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说：“银行刚通知我，你同曼尼给我寄来一张支票……我并不需要，但我对你们这一最深切的关怀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你自己比我更需要它……我深深感动，忍不住流泪。”信中还提到“被关在香港集中营内的中国士兵最后经英国人允许参加香港保卫战”，“但英国人只给每个中国士兵50发子弹，据他们向某些外国朋友透露，这是因为他们害怕中国人会掉转枪口打英国人！这500个中国兵中生还的只有两人。英帝国的日子到头了。个别英国人在这里对一些朋友透露说，中国人开始瞧不起他们了，在苦力的脸上也露出一种傲慢和轻视的表情”。

3月8日

宋庆龄和宋霭龄、李德全等被推选为重庆各界妇女三八节纪念大会主席团成员。当天，宋庆龄与宋霭龄、宋美龄、邓颖超、李德

全、刘王立明、史良等出席了在新运模范广场陪都各界妇女联合举办的三八节纪念会。

3月29日

宋庆龄和宋霭龄、宋美龄等参加悼念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邓尼斯少将及同机罹难之英、美军官侨民的追悼会。

4月17日

宋庆龄和宋霭龄、宋美龄等，出席中美文化协会在孔祥熙寓所举行的游园茶会。茶会上，同时举行向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献赠“海鹰图”的典礼。

4月18日

周恩来在“关于对反共高潮的估计致毛泽东并中央的电文”中，列举国民党加紧反共活动109项，其中第58项称：“孙夫人住孔家，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房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每群众会故意推孙夫人为主席团，但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

春夏之交

宋庆龄自港来渝后，蒋介石让宋庆龄住在宋霭龄家，但暗中派人监视，使她没有外出和会友的自由。后经宋庆龄争取和宋子文帮助，才住进了两路口新村3号。尽管附近是断墙残壁，周围仍有特务监视。

在两路口新村3号寓所，宋庆龄约见祝世康夫妇，并很高兴地和他们畅谈，主张同共产党真诚合作，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并鼓励祝世康夫妇坚持走革命的道路。

5月13日

宋庆龄参加中英文化协会举行的中、美、英人士联欢会。

5月22日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于晚7时半，在大使馆开茶会与中苏文

化协会同人联欢，招待中苏文化协会名誉会长宋庆龄、于右任，会长孙科夫妇，副会长陈立夫夫妇、梁寒操夫妇，常务理事郭沫若夫妇、王云五、西门宗华、曹靖华、葛一虹、周一志、洪钊等 20 余人。

5 月

宋庆龄在蒋介石夫妇的陪同下，于 5 月的一天午后，去黄山蒋介石官邸中的云峰楼。蒋介石夫妇企图让宋庆龄住在那里。尽管宋美龄夸说那儿环境幽静，夏天凉快，有专车、专船、专用电话供宋庆龄使用，但宋庆龄以“太不方便，朋友们来看我不方便”为由，拒住黄山云峰楼。

为支持、协助宋庆龄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和安排叶挺夫人探监，周恩来电嘱避居澳门的廖梦醒偕女儿与叶挺夫人同来重庆。

6 月 3 日

宋庆龄出席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的中华交响乐团成立两周年纪念音乐会，到会的有孙科、孔祥熙，和英国、苏联驻华大使及各国军事代表团人员等 300 人。

6 月 22 日

宋庆龄和邓颖超、郭沫若、史良、李德全、侯外庐、曹靖华等，出席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广播大厦举行的纪念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一周年茶会，并在会上讲话。她在讲话中强调加强团结，指出“苏联之所以能够抵抗侵略者，并有力地击溃纳粹匪军，是由于苏联全民之团结一致”。会上，李德全代表妇女界向苏联大使潘友新夫人赠送了由宋庆龄等 30 余人署名的、绣着“并肩克敌”4 个红字的锦旗。孙科、冯玉祥、何应钦、商震以及苏、美、英大使等出席了纪念茶会。

7 月

宋庆龄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撰写重要文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重申对中国人民和人民革命的信念。在详细回顾中国

妇女的革命斗争史以后说，“我国妇女们的觉醒仅仅是在开始”。“我国妇女的斗争史不允许我们相信，她们将来会有一天听任民族敌人或者国内的社会反动势力奴役她们。只有扩大民主，包括妇女权利在内，才能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这种靠人民一致努力所赢得的胜利，将不允许任何不民主的制度存在下去。”

7月7日

宋庆龄和宋霭龄、宋美龄一起观看为纪念抗战建国5周年举行的赛龙舟。

8月3日

清晨，廖梦醒偕女儿李涓，经由肇庆、桂林、独山、贵阳到达重庆。当晚，廖梦醒去曾家岩50号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告诉她这次调她来是要她协助宋庆龄恢复保盟工作。

8月14日

宋庆龄致函王安娜，信中提及让爱泼斯坦写两封信给美国援华会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和维多利亚医药援华委员会，“给这两个委员会提供尽可能多的情况”。并说“许多人秋天要到重庆来，我们应能与他们合作，并为我们的救济活动举办一次演出，让保卫中国同盟在这里更为旗帜鲜明和为人们所知晓”。

8月16日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聘请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孔祥熙、孙科、王宠惠、朱家骅、王世杰等为名誉理事。

8月中旬

保盟在重庆正式重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爱泼斯坦、王安娜、廖梦醒、许乃波、约翰·福斯特、简·斯坦尼福思、贝克、苏士·陈、邱茉莉等；在保盟的名誉成员中有“克莱尔·布恩、托马斯·曼、路易斯·勃鲁费尔德、贾·尼赫鲁、赛珍珠、保罗·罗伯逊、爱德华·卡特夫人、文森特·希恩、埃德加·斯诺、冯玉祥、何香凝、孙科、茅盾、理查德·沃尔士等；宋庆龄继续任保盟主席，廖梦醒担

任秘书，兼办公室主任、财务主任。保盟办事处设在宋庆龄的高所（重庆两路口新村3号）。

10月3日

宋庆龄出席蒋介石夫妇在军委会礼堂招待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的宴会。

10月4日

宋庆龄出席宋美龄在两浮支路外交部举行的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援华会名誉会长威尔基的茶会。

10月5日

宋庆龄致函早在1913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蒙特利尔认识的阿莉，信中说，“我们三姐妹都在这个城市里，各自为反法西斯战争而工作。我的姐姐和我在日本轰炸香港时被困在那里。第三天我们终于好不容易乘坐最后一班飞机逃离香港……这几个月我力图把我以前所做的工作——重新接上线，向国外募捐救济我们的伤员，帮助五千万难民重建生活，并为孩子们开办训练学校。”“我的三个弟弟现在在华盛顿，他们为我们输送抗战物资。这样我们全家都在为抗战而工作。”

10月6日

宋庆龄和宋美龄出席孔祥熙在范庄私邸举行的欢迎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的宴会。

宋庆龄致函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说：“你和曼尼对我的永远可靠的友情和慷慨，我对你们深深地感激。卡彭特博士几天前带来的那部机器（指打字机）和漂亮的袜子。……这部机器将由几个朋友（其中也有你的朋友）来共享，所以你会明白，在这部历史性的工具上开始工作将为了同一目标而用其他方式来加以继续。光是这一点足够给你带去一些安慰。”信中还告知“威尔基风靡了中国。……明天将动身去视察前线，然后回国。……我在几个场合见到

他,但始终没有办法同他单独谈话……周恩来会有机会在他临走之前同他谈一次。”“我们希望他此行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轰炸机。那时我们将能对日本法西斯发动一场攻势,在他们进攻西伯利亚之前把他们消灭掉”。信中还告知路易·艾黎、邹韬奋、沈钧儒、史良、章乃器以及廖梦醒、廖承志等的情况,并说:廖承志“又被抓起来了。这一次老太太(指何香凝)没有像上次那样紧张,因为他已有了一个孙子。”

10月7日

宋庆龄和宋美龄、孔祥熙、居正、孙科、吴稚晖、吴铁城、邹鲁、李文范等,及中央党部全体妇女工作同志等 500 余人,参加胡汉民夫人陈淑子的追悼会。陈系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 3 月 29 日黄花岗起义。

10月中旬

宋庆龄在寓所会见了从延安来的、代表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见的林彪。宋庆龄听取了林彪关于华北八路军抗击日军的情况介绍。会见时,爱泼斯坦、廖梦醒在座。

11月7日

上午 11 时,宋庆龄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列赞诺夫在大使馆举行的茶会,庆祝十月革命 25 周年纪念。

下午 2 时 30 分,宋庆龄出席中苏文协在道门口银行公会大礼堂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 25 周年纪念会。

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宋庆龄为纪念十月革命 25 周年题词:“纪念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必须学习苏联人民刻苦耐劳的毅力和举国一致的团结精神”。

宋庆龄致函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说,“我正在用你给我的

机器打字。你的另一些朋友也在使用它。所以你会明白它发挥着多大效用”。还告知“我有一部车，但很少用，因为汽油短缺。但今天我要不顾一切地去参加中苏文化协会并观赏为庆祝节日放映的保卫列宁格勒的影片”。接着信中提到“我的弟弟（宋子文）刚回国，但很快要回（华盛顿）去，……他希望中苏之间能建立起较好的关系。在他公出期间，因为他的一些部属急于讨好反动分子，使中苏之间产生了某些误会。为此，他很感遗憾”。信中还提到“英国的角色是很明白的。它永远不会体面地放弃任何东西，包括他们从别人手里抢来的领土。今天他们英国——是我们的盟友，明天是什么呢？”

11月11日

宋庆龄出席蒋介石夫妇欢迎英国议员访华团艾尔文、泰弗亚、劳森暨秘书都伯森的宴会。

11月16日

宋庆龄与邓颖超、李德全、史良、刘清扬、张晓梅等出席妇女界在嘉陵宾馆为欢迎英国议员访华团而举行的茶会。会后同大家参观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成绩展览，观看保育院小朋友的精彩表演。

11月17日

宋庆龄于下午5时，会见由英大使馆秘书盖治陪同访问的英国议员访华团团员。

11月29日

《国民公报》刊登了罗斯福夫人最近在其读者众多之“我的一日”专栏中，著文呼吁救济中国难童，并协助孙、孔两夫人工作的消息。

12月9日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年仅32岁。

12月30日

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追悼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宋庆龄特发去唁电：“后世将比今天对他更崇敬——因为他是为未来而斗争，为未来而献身的。”

年底

宋庆龄在寓所举行茶餐会，欢送董必武等返回延安。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李德全、陈乙明夫妇、徐舜英等均应邀参加。席间，周恩来分析了西北战场的战绩和国内外形势，满怀希望地共同憧憬着人民坐江山的日子。

本年

保盟将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和其他人士的捐款，资助延安创办洛杉矶托儿所。

宋庆龄在保盟重建后，为了争取海外援助，她通过写信和通过王安娜等途径，同纽约美国援华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弗农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荷属西印度阿鲁巴爱国华侨协会和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等保持密切联系。其中，美国的国际皮裘制革工人工会，还主动以数目可观的捐款，支援了晋察冀边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建立分院，负担它一年的部分开支。这就使保盟的工作逐渐得到了开展。

保盟对募得的款物，除捐赠者指定用途的按捐赠者愿望分配外，都资助了需要最迫切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2月，将1.2万美元捐款转给了抗日根据地，并指明请周恩来签收后，转交给国际和平医院。1942年8月到11月，保盟又向抗日根据地提供了6万美元的捐款。

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7.54万美元，医院工作1500美元，儿童工作500美元。延安战士子弟学校108567元，延

安制药厂全年开支的12%。

1943年

1月11日

宋庆龄参加《新华日报》创刊5周年庆祝活动，在邓颖超陪同下，到化龙桥该报馆观看文艺演出，并为该报题词：“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

1月25日

宋庆龄就中美、中英于11日分别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与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事，发表声明。指出：“两个新条约的签订，展开了中国与国际关系的新历史。废除不平等条约，原是（孙）总理毕生致力的一大目标，到了现在开始实现了。”她还提出3点愿望并号召全体国民党人，“均应淬砺奋发，以实现总理的遗教”。29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

1月30日

国际妇女联欢会在重庆举行，在渝盟邦妇女均被邀请参加，与会中外妇女共约200人。会上，中外妇女演说反对法西斯。宋庆龄因临时有事，未能参加，她的演说词由潘光逸夫人代为宣读，讲词中介绍苏联妇女前方救护及游击战事迹甚多。

2月7日

宋庆龄写信慰问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柯棣华大夫的家属。信中说：“柯棣华大夫在为中国的河北省敌后作战的我军负伤将士服务期间，不幸于1942年12月9日逝世。我谨代表我本人和由我担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向你们表示深切的同情。”信中还高度评价了柯棣华大夫同白求恩大夫一样，“也为了同一个理想——为了各国人民谋求解放和取得缔造与决定自己未来权利的共同斗争——而在那里工作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月23日

宋庆龄和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郭沫若、冯玉祥、程潜、邵力子、孙科、孔祥熙、商震、刘仲容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苏联红军节庆祝茶会。

3月8日

宋庆龄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平等自由，声气相通，精诚奋斗，共建大同。”

3月8日

《新民报》记者访问宋庆龄，她对记者发表谈话（一）对于目前妇女工作的意见：战争发生之初，中国妇女曾被世界上的妇女们所钦仰，因为她们是对抗战工作最活动的一群。但现在我们更需要加强动员妇女们参加抗战工作，同时妇女自身亦得求取技术上的进步，不让联合国家的妇女们超过我们，成为战争中很重要的一环。（二）对于“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的战略意见：我们的战争，只有一个共同的战线，一般来说，联合国家所定的战略是对的，但中国的战场应当更受注意，得到更多的援助，同时中国自身应更加紧动员以利用此等援助，使日本不得有喘息的机会，这样，亚洲的战场将可成为欧洲战场一样的活动。（三）总理诞辰纪念即届，国民如何在纪念中实行遗教，开国民会议，在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建设工作。（四）应该怎样准备反攻：除准备军火外，应作建设的准备。

3月11日

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前一天，在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应该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群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派，也应该给以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胜利。”

4月13日

宋庆龄出席美驻华大使馆代办范宣德在美大使馆招待中苏人士举行的晚宴。

4月17日

宋庆龄致函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告知“廖梦醒的母亲一两个星期内将来这里，争取她的儿子获释”。“我希望六月间能去兰州、西安，在西北作两个月的旅行。但这要看能否得到警备司令的许可。我渴望亲自去看情况。美国联络官约翰·戴维斯可能也去，但他的目的地是延安。人很不错，肯帮助人”。“我将在这里开展一些活动，为这个地区及难民募捐”。“通货膨胀正在这里造成许多人自杀，一所学校里有四个人在同一个晚上悬梁自尽……学生们受很多苦，学习水平下降，三十五分就算及格……你很难想象，对一个平常的中国老百姓来说，生活发生了多大变化。如果我们是在积极战斗，我们是会乐于忘掉物质上的艰辛”。

4月20日

黄河决堤，使河南发生特大水灾，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亟待救济，为此，宋庆龄在重庆发起赈济豫灾国际足球义赛，由中、美、英、苏选出代表，组成英联队、韩青队、沪星队、东平队，将义赛所得全部收入捐赠灾民，门票分荣誉券、普通券两种，荣誉券由社会服务处代售，以1500张为限。

5月3日

宋庆龄致函坎农，信中对他在(美国)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医药卫生顾问委员会讨论对被封锁的游击区的医疗工作给予帮助的问题时，直言不讳地表示了支持意见，“我希望你知道，我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全体人员听到了这个消息有多么高兴。五年来保卫中国同盟一直在尽力帮助这些英勇的战士。”“这些战士，无论工作在医疗部门的，或是战斗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岗位上的，都已做了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游击队在几乎没有武器和外界支援的情况下，不仅在装备精良的占领军的后方建立了、保持了和扩大了抵抗基地

(这些基地总有一天是会成为反攻的前哨),他们还赢得了人民的光荣称号”。“我很高兴地知道,在另一条战线上,我们有一个如此杰出的富有经验的战士为了增强人类的健康和力量而和我们站在一起”。

5月15日

宋庆龄发起的赈灾国际业余足球义赛,于下午3时,在川东师范球场举行。(球赛开始前,荣誉券、普通券已全部售完)。宋庆龄亲自主持开幕式。保盟技术顾问许乃波事前提出:宋庆龄入场时军乐队要演奏中国国歌。当她步入场内时,6000余中外观众起立致敬。参加各队的队员分行立于场中,她缓步趋前,一一握手为礼。英大使薛穆爵士亦随同至场中,与各队队员见面。球赛由宋庆龄、英大使开球。

5月16日

宋庆龄出席了球赛的闭幕式,又亲自向各队赠送锦旗,向运动员赠送纪念章。此次义赛,净收入为125530元,全部汇给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主席卢广编,赈济河南灾民。

6月2日

宋庆龄致函斯图尔特·艾伦,信中说,“对你作为加拿大红十字会委员会主席以及重庆救济工作协调员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我希望你能长远支持我们的项目。特别是,我希望你抵加拿大后将努力为我们争取20000剂斑疹伤寒疫苗,并很快空运给我们”。

6月5日

宋庆龄出席苏联大使潘友新招待中外佳宾的招待会,会后放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影片。

6月19日

宋庆龄出席中美文化协会会长孔祥熙及夫人在范庄代表该会举行的联谊会,欢迎由美返渝的史迪威将军。

6月26日

美国威斯里安学院，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赠予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由宋美龄代表3人前往该院接受学位。该院院长还宣布设立奖学金两名，一名纪念孙夫人，一名纪念蒋夫人。

午后，宋庆龄出席中美文化协会会长孔祥熙及夫人于官邸花园宴请史迪威将军及其他在渝美军军官的便宴。

6月

保盟援助国际和平医院的物资，虽不到一吨重，但有红十字会和私人援助的宝贵外科手术器械和磺胺药品。运输卡车是由八路军谈判代表护送，才得以进入游击区（在此之前已有3年不准医药物资进入游击区）。

7月4日

宋庆龄为募款赈济广东灾民，晚8时 in 道门口银行界同人进修社举行国际音乐会，由英大使薛穆的夫人担任主席，并由本市中、美、苏、英人士担任演奏。至7月13日，赈济粤灾国际音乐会全部工作结束，净得19万余元，汇给了广东灾区。

7月8日

《新华日报》报道河南灾民救济委员会为收到赈灾足球义赛捐款致保盟的感谢信。信中说：“承惠捐夫人主办之足球义赛全部所得国币125530元，以为赈济河南灾民之用，该款现已照数收妥，至深感谢。”

7月14日

宋庆龄在重庆寓所会见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外科主任、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华大夫。巴苏华带来了该院受到保盟支援的技术方面的工作报告以及柯棣华大夫的文件。

7月16日

宋庆龄写信给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除告知“胡宗南集中7

个师在边区周围并向边区守军发射迫击炮，在我们的朋友中间引起很大的震惊”外，还告知“周（恩来）、他的妻子和林彪将军正在回延安的路上。他们是两星期前离开这里的，共有4辆卡车。由于许多外国组织的同情支援，我们托他们带去一些医药供应品……还有一大笔钱给国际和平医院和其他项目。钱的数目看来不小，但通货膨胀已使国币贬值到这样的地步——大概很快就要用一篮子钞票才能换到一磅面包。”

8月27日

上午10时，宋庆龄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议会议员艾伦·华德女士。

8月30日

下午5时，宋庆龄再次会见艾伦·华德女士。

9月2日

宋庆龄通过重庆《新华日报》摘要公布了宝鸡赈济豫灾委员会主席专门报告赈款用途的来信，并借此机会对曾帮助赈济豫灾足球义赛的工作人士表示感谢。

9月12日

宋庆龄在粤灾筹赈会妇女义卖会上赠手皮包。

9月15日

宋庆龄以保盟中央委员会名义，在保盟工作报告《在中国游击区》一书中，发表了《从香港到重庆》一文。回顾保盟成立5年多来的工作概况，指出到重庆后，工作的开展遇到重重困难，由于保盟的艰苦努力仍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保盟在重庆负担起宣传和动员工作。为救济河南和广东的灾区人民设立了两个国际组织。通过戏剧义演和球类义赛，在重庆就募得了30万元法币等等。特别提出：“在保盟的整个存在的过程中，它强调团结。现在，当这些成果为不祥的阴影笼罩着，预兆着新的和自杀性的内战时，我们更要强调这一点。”

9月18日

宋庆龄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报告《在中国游击区》一书所写的序言(即《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提出要把援助的重点放在游击区。并阐明了保盟对于“救济”的观点:“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救济。只有这样办,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并帮助你们自己。”

10月4日

宋庆龄和冯玉祥等18人,被国民党中央第239次常务会议增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10月13日

宋庆龄和宋霭龄、宋美龄一起,出席指导工业合作协会理事会。

10月15日

宋庆龄和宋霭龄、宋美龄一起出席文化劳军运动委员会。

10月27日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中国和印度共同为自由而战——巴苏华大夫访问孙夫人记》,并全文刊载了访问当天(7月14日)宋庆龄交巴苏华《致印度人民》的一封信。

11月7日

宋庆龄和董必武、郭沫若、沈钧儒、茅盾、潘梓年、胡风、史东山、刘清扬、李德全、程潜、邵力子、孙科、孔祥熙、何应钦、商震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十月革命节所举行的招待会。

12月14日

宋庆龄致函美国红十字会驻重庆代表约翰·尼柯尔斯。信中说:“获悉最近美国红十字会接到从美国来的一大批医药物资。我们谨代表地处华北的国际和平医院,请求能在这批药品当中拨给若干。”并表示该院“所服务地区的需要至为迫切,因而你们如能分配任何东西给他们使用,都会满足一些渴求已久的需要的”。

12月29日

宋庆龄致函斯图尔特·艾伦，信中说：“我在此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身份，向加拿大红十字会重庆委员会提出一项申请。我们的申请分为两类：1. 以我们三个国际和平医院的名义申请药品和医疗设备。2. 为帮助我们在山西饥荒中的难民和儿童的救济工作申请援款。”信中还根据马海德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网的报告开列该院最需要的药物和医疗用品以及为山西难民和儿童救济工作申请20万元拨款。

本年

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5.45万美元，医疗工作87411.50美元，儿童工作12327美元，西北计划200295美元，救济河南灾民5万美元。

1944年

2月3日

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夫人发起于3日和4日两天晚上，在重庆银社，义演英语乐剧《杂耍》，为广东灾民募款。

2月8日

宋庆龄在美国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阐明中国抗战与美国利益的密切关系。文中强调指出：“对中国抗战的关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求把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凡是不这样做的军队，就不予分配。”并指出：“对中国民主的关心，只要公开声明反对中国发生内战。中国反动派正在准备这种战争，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这些部分就是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

2月14日

下午，宋庆龄约见美国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在与他的交谈

中,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表现了极大的愤怒。宋庆龄对他说,最近有几个美国团体邀请她访美,但国民党当局通知她,不许她出国。原因是她曾致电美国一些团体,叙述了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并且要求取消这种封锁,以使医药和其他物资能送到那里去,从而使一切中国人都能获得同等机会进行抗日战争。

3月4日

宋庆龄再次约见谢伟思,在谈话中,她提到廖承志被国民党特务关在集中营;她还说军统把重庆的一些防空洞作监狱,而特务头子戴笠却推说不知道。

3月11日

宋庆龄写信给在缅甸前线的理查德·杨(杨孟东,史迪威的副官)少校,信中提到:“你不在的时候,我写了几篇争取支援救济工作的文章,其中给美国劳工的一篇(《致美国工人们》)惹得这里的大官们火冒三丈,为之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们不承认事实,只是一个劲地责备我呼吁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

3月12日

宋庆龄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所作的题为《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的广播演说,指出,要了解孙中山遗嘱的意义,首先必须了解民族或国家间的自由和平等的联系;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联系。在阐明国际民主的意义及其重要性的问题时说:“国际民主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同时每一个国家内部也有一个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与自由表达意志的基础上的政府”。同时,演说中回答了所谓中国“有依赖外国的倾向”的批评,指出:“只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致哭哭啼啼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

3月14日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孙夫人对美广播》的社论，指出：孙夫人对美广播，把国父遗教的真谛和精神，说得清清楚楚，也把中国人民对政治局势的意见，传播到了海外。这不仅帮助了美国人民对国父遗教的认识，也增进了中美人民间的友谊和团结，毫无疑义的，全国人民将为国父的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加紧奋斗。这个奋斗将决定抗战和建国的胜利。

4月7日

宋庆龄出席在重庆夫子池新生活运动服务所举行的由湘灾筹赈会主办的古今书画物品义卖展览会，捐出珠宝盒1个，当场义卖，并在义卖会上购买画3幅及物品，以示提倡。外宾也争相购买。全日所得超过40万元。

4月14日

宋庆龄为筹款赈济湘灾，特请舞蹈家戴爱莲、音乐家斯义桂以及中国舞蹈艺术社和中华交响乐团，在国泰大戏院举行音乐舞蹈义演。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观看演出。这次义演的净收入45.9万多元。

春夏之交

重庆成立文化联络站，主要任务是向国外及国内的一些报刊发播解放区文艺作家的作品，供他们选用。茅盾任社长，叶以群任总编辑，冯亦代任经理。宋庆龄资助了该社一部分开办经费。

6月8日

宋庆龄致函加拿大医药援华会的鲁思·基普林。随信附去最近收到的135英镑的收据。信中说：“在开列从去年11月1日起收到的款项的清单时，我要再次告诉你，我们是多么感激你们的定期支援，它对国际和平医院是多么有用。”

6月21日

中午12时，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拜会孙夫人宋庆龄。

晚 8 时，宋庆龄出席蒋介石夫妇为欢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的宴会。

6 月 25 日

中加民众协进会临时主席马超林致函宋庆龄告以该会于 4 月 9 日至 11 日在云埠天国大礼堂举行卖物游艺会，共筹得加金 1148.03 元，信中说：“已将上列全数之款交本埠加拿大红十字会购买药物转交主座。”

6 月 26 日

宋庆龄致函史迪威将军，信中说：“乘写信之便，向你转达我国人民对你和你的功绩的思念之情。”“我期待着有一天我能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去美国，那时我将受到你这位将军指挥官的接待。”

6 月 29 日

晚 8 时，宋庆龄与宋霭龄、宋子文等出席蒋介石夫妇在官邸欢宴巴西、土耳其两大使的宴会。

7 月 6 日

宋庆龄致函鲁思·基普林，信中附去 35 英镑和 200 英镑的捐款收据。信中说：“对于你给予我们经常性的支持和真心实意的帮助，我要在这里向你再次表示我们的深切感谢。”并告知“目前中国东南部的情况非常危急，然而还是有这样的希望：这个挫折也许会引发一次新的群众性的抗战浪潮，并使国共关系得到某种改善”。

7 月 15 日

周恩来致函毛泽东，提议他在会见中外记者访问团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时，请爱泼斯坦代向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对我们的援助表示感谢。（爱泼斯坦是保盟中央委员。）

7 月 22 日

宋庆龄致函驻重庆美军司令部毕德进少校，信中说：“据悉 26 日有一架飞机赴延安。如能把目前存放在你们司令部仓库的医药

物资运送到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将不胜感激。”

8月1日

宋庆龄致函鲁思·基普林，随信寄去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报告和该院第三组的工作报告，信中说：“所汇报的内容都是关于今年4月份以前的工作情况，我非常希望你能设法把它们传播出去，使我们在加拿大的朋友们都能了解它们的内容。”

8月4日

宋庆龄致函美国红十字会帕克暨夫人，信中说：“不知你们能否亲自帮助我们安排一下美国红十字会给保卫中国同盟的药品。我了解到，在7月20日从印度运抵昆明的货物中，有一批标明K-179的是给保盟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已答应每个从昆明到重庆的车队为我们捎带一两箱，在这批药品中我们特别盼望尽快收到一号和二号箱。我听说英国军事代表团有些卡车在10天内将离昆明来重庆。不知你们能否同他们联系，看能否把这两个箱子捎上。”“如你们能帮忙，我们将极感激。”

8月5日

宋庆龄写信给理查德·杨少校，信中写道：“两星期前，由戴夫·包瑞德上校率领的一组20名军官启程前往‘禁城’Y（指延安）。谢伟思也在这群兴奋的人之中。由于Y城的地面非常泥泞，天气又不好，飞机撞到了地面上，幸好没人受伤……我真是高兴，因为有200多磅医疗供应品送到了我们支援的医院，还有3架显微镜和磺胺药品。”

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秘书陈金致函宋庆龄，信中说“各会员同业为一再响应夫人号召援助西北敌后游击队医药费，计共捐得美金1213.5元”，由“美国援华会转汇夫人，收到时请转交西北和平医院，以应购买医药之用，并请代向敌后的英勇军民致以慰问”。

8月25日

宋庆龄写信给保盟驻延安的代表马海德，称赞他的工作，还特意赠给马海德一张她的 10 英寸的半身相片。相片背后有宋庆龄的亲笔签名，还写着：“感谢你对国际和平医院所作的努力和献身精神。”

8 月 30 日

宋庆龄致函帕克，信中说，“往西北去的上一架飞机已满载，但最近将另有一架飞往，我想由英国军事代表团卡车带来的药品将能赶上”。“我们今天已写信给许先生，请他进行并作出尽快运输的最佳安排。我们准备同意让商车同公谊救护队的车队同行的建议，如果这看来是最好的办法的话。但我们不知道美国红十字会是否要自己来办这件事，因为运费是他们付的”。“许先生告诉我们，X 光机上若干零件丢了，我们在这里见到卡尔逊先生，他说他会尽力帮忙找到这些零件，所以我想不会有什么困难装这台你已分配好的机器。由于 X 光机很笨重，可能要从这里走陆路运往西北，因此，我们已请许先生运手术器械、磺胺制剂以及治疗黑热病的药品，这些都是急需的”。

9 月 12 日

宋庆龄自重庆致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告知：“大约 4 个月前去访问延安的记者们已经回来了。他们都为在那里所看到的伟大行动而热情高涨，还有那里丰衣足食和进行大生产（虽然使用的是原始的方法）的情形。所以我们该改变看法了……他们已不再仅仅是些游击队员，而是生气勃勃的九千万人口……为抵抗日本而组织起来。确实，他们不用惧怕任何国内或其他敌人——这是解放了的区域。在党的大会（指中共七大）之后，他们将会发表一些令人大吃一惊的宣言，也可能使全世界震动……”

9 月 18 日

宋庆龄与宋霭龄、李德全、吴贻芳、薛穆大使夫人等于 8 月 22 日发起组成儿童福利工作人员会议筹备委员会，经筹备商洽，在中

央图书馆正式举行儿童福利工作人员会议，着重讨论战后儿童福利设施计划。

9月25日

宋庆龄致函约翰·尼柯尔斯，告知：“X光机于9月11日运到这里，几天后即转运去西北。你帮助我们得到这部机器，还答应继续供应我们X光片和药水，对此我们非常感激。”

9月26日

邹韬奋(曾任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出版委员会负责人)因癌症于8月24日在上海医院病逝。宋庆龄和董必武、林伯渠、冯玉祥、于右任、孙科、柳亚子、许德珩、马寅初、夏衍、胡绳等72人，发起召开邹韬奋追悼会，并在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启事。

9月29日

宋庆龄为援助贫病作家，于29日和30日两天举行晚会。全国文协赠送郭沫若、茅盾、老舍、孙伏园、曹禺、巴金、冯雪峰等人的著作，作为晚会奖品。晚会共得捐款80万元，由茅盾、郭沫若、老舍等3人代表全国文协接受并致函表示感谢。

9月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由刘伯承、陈赓等休养人员和工作人员148人在一幅白绢上亲笔签名，写信给宋庆龄，全文如下：“掠世界者虽倾颓在即，而国内暗影足虑尚多。先生继总理遗志，鹤立堪风，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敬先生者，爱先生者，固不仅我院工休人员全体也。特赠庆龄先生。”

保盟为敌后根据地募得许多医疗器械和药品，其中有南洋华侨捐献的一台大型X光机，宋庆龄决定立即送往延安。因陆路已被国民党封锁，只能设法使用飞机运送。在宋庆龄的联系下，得到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史迪威将军的帮助，把一架美国军用飞机的舱

门改大，才装上 X 光机，直接运往延安。飞机抵达延安机场后，周恩来亲自把这一消息电告保盟。宋庆龄接电后，高兴地说：“这架大型 X 光机是占中国人口已达 9000 万的解放区的第一台和仅有的一台！”

10 月 1 日

宋庆龄和林伯渠、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马寅初、史良等参加在重庆道门口银社举行的追悼邹韬奋大会。她亲题了“精诚爱国”的挽词，对邹韬奋表示深切的哀悼。会场上国民党特务密布，但慑于宋庆龄崇高威望，未敢下手进行破坏。

10 月 19 日

宋庆龄和沈钧儒、茅盾等主持在重庆百龄餐厅召开的鲁迅逝世 8 周年纪念大会。到会的有重庆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百余人。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和发扬鲁迅的坚韧精神，挽救民族危机。

10 月 20 日

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因同蒋介石矛盾激化，被罗斯福总统免职，于 19 日由乔治·马歇尔来电召他回国。他在离开重庆前一天，于 10 月 20 日专程到宋庆龄寓所辞行，依依惜别。

10 月 28 日

宋庆龄写信给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说：“上星期我们为鲁迅开了一个纪念会。那些特务在我离开之后（因为我有另一个约会）冲进会场，桌椅横飞，出现一场暴乱。”这封信中，她还写道：“此刻你大概已经知道史迪威将军离去的消息了。他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做了那么多事情。……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最富同情心、最讲求实际的外国人之一。我们全体人民都很热爱他。”

11 月 7 日

宋庆龄和郭沫若、孙科、于右任、邵力子等出席在重庆青年馆举行的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十月革命 27 周年庆祝会。

11月10日

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情报辑要》严字第5号谓：“新村3号孙夫人处，昨日似有集会，住良庄的王安娜曾于下午3点10分前往。不久，尚有贝克夫人及不知姓名的俄人前往。”宋庆龄在重庆期间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特务组织的严密监视。

12月22日

宋庆龄致函约翰·尼柯尔斯，信中说：“我们从信中获悉在10月和11月在昆明收到了供应品。对你为国际和平医院所作的持续不懈的努力并为我们开辟了更为方便的运输路线，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还注意到，为了集中一大批供应品直接运往延安，从别处借调来更多的供应品。”

本年

宋庆龄在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李约瑟博士的安排下，安全会见原全国各界救国会干事吴大琨。听取了吴大琨汇报上海保盟对新四军援助的情况，以及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上饶集中营的种种法西斯罪行。

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医疗工作 110135 美元，法币 1888996 元；国际和平医院 1.25 万美元，法币 4710978.50 元；以及儿童工作 179430.52 美元，法币 1808460.87 元。

宋庆龄写信给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感谢她寄赠的礼物，但遗憾的是一件也没有收到，最失望的是马海德的以及为延安的几位将军订购的几块手表，据说在途中丢失了。信中还提到了许多外国友人的近况，并希望寄赠一张近照。最后，“致以最热烈的问候！为了我们的明天，还要好好拥抱你。”

1945年

1月18日

宋庆龄致函阿瑟·卡尔文,信中说:“承蒙你帮助把医疗用品迅速运到了我们的国际和平医院。”“我们知道,美国红十字会在你的监管下,我们仍将像过去那样得以与之继续进行良好的合作。为了把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办好,相信你会尽心尽力帮助我们的。”

3月17日

宋庆龄与英、法、美、苏、澳、加、墨、土、荷等国使节,并和孙科、于右任、翁文灏、张治中、郭沫若等,联合发起追悼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定于25日上午9时,在青年馆举行追悼会。

5月19日

宋庆龄与英驻华大使薛穆夫妇发起,举办慈善舞会筹款,捐市救济院及工合培黎学校。舞会于18、19日两晚在胜利大厦举行。18日晚酷热中,莅会者仍甚众,多为盟军军官。19日晚招待盟军士兵。宋庆龄亲自出席,并向与会者致谢,谓重庆难童及工合培黎学校学生实受惠不浅。(舞票每张售2000元,茶点在内,两晚共售600张,计可得120万元,连同义卖摸彩等项,预计可得200万元)。

6月6日

宋庆龄和李宗仁、白崇禧、于右任、沈钧儒、郭沫若、邓初民、茅盾、潘梓年、冯玉祥、左舜生等出席为欢迎苏联新任大使彼得罗夫和庆祝苏联红军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举行的鸡尾酒会,同时参加了“苏联的首都——莫斯科照片展览”。

8月8日

宋庆龄赠送礼品,祝贺冯玉祥夫人李德全50寿辰。

8月10日

晚上,日本投降消息传来,重庆市民狂欢。宋庆龄坐着“国渝

2820”的汽车，出现在两路口，人们从开了的车窗可以看到她满面笑容。

8月20日

宋庆龄致函罗伯特·德鲁蒙德，信中说，“感谢你8月8日寄来的通函，告知1945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用以支付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的主要路线的运输费用已落实”。“你们在为急需的医疗物资运送到国际和平医院而寻求最佳路线和办法等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希望你们在为中国广大地区的健康方面继续给予合作。”

8月30日

宋庆龄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会见了从延安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是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邀请，于28日飞抵重庆，共商团结建国大计的。

9月1日

下午7时，宋庆龄就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于8月14日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事，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冯玉祥、张治中、陈诚、王世杰、陈立夫、郭沫若、马寅初、谭平山、王芸生、李德全、王昆仑、史良、刘清扬、茅盾、侯外庐等，出席由中苏文化协会主持召开的，为庆祝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盛大鸡尾酒会。其间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并举杯互祝健康。

9月3日

晚7时30分，宋庆龄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冯玉祥夫妇以及民主同盟的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沈钧儒，并和英、美、法等国的使节，荷、比等国的使节、我国政府与外交人员出席苏大使彼得罗夫夫妇在大使馆举行的茶会并观看苏联最新纪录片《胜利大检阅》。

宋庆龄致函罗伯特·德鲁蒙德，信中说“编号V—94和V—

73的两批物资已在上星期寄到。这些医疗物资已交给了有关当局转运,很快就可以运抵目的地,而且一定能得到很好的利用”。“随着和平的到来,平民百姓的需求自然而然地要与日俱增”,因此“希望我们美国朋友将像他们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那样,对我们的恢复工作和维护和平的努力,同样地给予出色的支持”。

9月5日

下午,宋庆龄去机场会见因病出国疗养一年恢复健康后从美国返渝的宋美龄,并陪她至休息室休息。

9月6日

宋庆龄以保盟主席名义,在重庆寓所设晚宴招待抵重庆参加和平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金仲华出席作陪。

9月8日

宋庆龄出席毛泽东、周恩来为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在桂园举行的茶会。毛泽东同志致词,衷心感谢各方人士8年来“对边区及解放区的诸多援助,并希望继续这种援助”。宋庆龄在讲话中表示:“过去救济多为战时救济,今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建设方面仍将继续予以帮助”。英国援华会负责人、英驻华大使薛穆、美国联合援华会爱德华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茶会。

9月9日

宋庆龄专程到桂园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当宋庆龄乘车到桂园时,毛泽东等已到门口迎候,然后到客厅亲切交谈。在会见中,毛泽东、周恩来对宋庆龄“忠诚不渝信守孙中山的革命三大政策,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的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贵的革命气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宋庆龄则赞扬了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业绩,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政策的坚定支持;对光明前途充满信心

心。

10月10日

9日上午,宋庆龄亲赴重庆市民医院,吊唁被国民党士兵误害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少石。10日,李少石灵柩移重庆小龙坎八路军办事处公墓安葬,宋庆龄与周恩来、徐冰、潘梓年、柳亚子、郭沫若、茅盾、陈树人、张友渔、韩幽桐等前往执拂。出殡前她曾到市民医院向李少石灵柩行礼,把鲜花一束放在棺上,并慰问李少石夫人廖梦醒及其女儿李涓。

10月11日

马海德致函宋庆龄,告知“X光机已经装置好了。国际和平医院的X光部,也已经按照标准建立起来”。“我们希望,像过去一样,请求你的帮助”。

10月16日

保盟致函纽约美国援华会,信中发出呼吁,“苏北的国际和平医院迄今为止收到的供应品是最少的,所以它理应首先得到运抵上海的物资的绝大部分。”

10月19日

宋庆龄和周恩来、邵力子、沈钧儒、柳亚子、许寿裳、舒舍予、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曹靖华、胡风、冯雪峰等联名发起,并出席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的鲁迅逝世9周年紀念会。约500多名中外人士出席了紀念会。

10月25日

宋庆龄致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蒋廷黻博士,呼吁行总战后才能继续对那些一贯受保盟援助和救济的国际和平医院,医科大学和制药厂以及那些属于国际和平医院的60个流动医疗队等给予支援。

10月29日

马海德从延安写信给宋庆龄,自10月11日以来收到30箱空

运药品，并告将于下周寄上1944年10月至1945年10月的药品清单。同时，要求继续支援的药品和医疗用品项目的清单。

11月1日

何香凝致函宋庆龄、孙科和宋子文。信中说：“我们四人都是亲受孙中山先生临终囑言的人。我们不忍看见在国外的压迫解除之后，民族的前途又陷于黑暗。我不能到重庆去，希望你们三位向蒋先生苦言力争停止内战，一切问题以政治协商求得合理解决。如此，庶几能告慰于总理及先烈在天之灵与八年来流血牺牲的将士和同胞的英魂。”

11月8日

宋庆龄致函加拿大红十字会驻渝办事处，信中说：“我现在向你们附上一份呼吁书，即请你们大力支援我们的一项非常急需的项目，而在过去，你们所给予的友好帮助，我是永志不忘的”。信中接着介绍了4所都冠以白求恩名字的国际和平医院面临新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困难。“希望你们委员会能很好地考虑我们的呼吁，并希望对这呼吁加以传播。”（四所都冠以白求恩名字的国际和平医院：一所在延安（陕西）；一所在山西岚县；一所在河北北部的阜平；一所在苏北。）

11月

宋庆龄离重庆回到上海。随即召开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

12月

《保卫中国同盟声明》在重庆发表，自即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它指出：保盟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经济和医药等的援助，并收养了上千的战灾孤儿，“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保卫中国同盟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运送给真正

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的得到应用。”“我们将继续这样工作下去。我们将在中国的需要者和全世界朋友中间起着联系作用。”

年底

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南京路外滩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331室开始办公。

本年

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法币 166175629.04 元, 510034.80 美元;儿童工作 359297.60 美元,法币 40408363.63 元。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

后 记

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为了缅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卓越功绩，弘扬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中国福利会于今年8月22日至24日在上海召开了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本市以及来自北京、江苏、广东、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10省市的70多位宋庆龄研究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议就宋庆龄的抗战思想、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宋庆龄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宋庆龄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了大会交流和小组研讨。

参加研讨会的代表提交了近60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系统地论述了宋庆龄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革命实践、光辉思想和伟大贡献，反映了近年来各地研究宋庆龄的最新学术成就。这本书就是从这些学术论文中选辑而成的，是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

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部分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指导和帮助。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福利会的同志做了不少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有关同志怀着对宋庆龄无比热爱和崇敬的感情，积极支持本书的出版。谨向上述单位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1995年12月